CQ 常青藤译丛

Guide to Human Thought

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

——形成世界的观念（上）

Ideas That Shaped the World

[英] 肯尼思·麦克利什　主编

查常平　等译



新华出版社

常青藤译丛

Guide to Human Thought

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

——形成世界的观念（上）

［英］肯尼思·麦克利什　主编

查常平　刘宗迪　胡继华　董志强

刘雪怡　哑石　赵玙　潘晓放　林和生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英）肯尼思·麦克利什主编；查常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
（常青藤译丛）
ISBN 7－5011－6504－1

Ⅰ.人…　Ⅱ.①麦…②查…　Ⅲ.概念－词典
Ⅳ.B812.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728 号
著作权登记号：01－2000－080

Guide to human Thought

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
——形成世界的观念

〔英〕肯尼思·麦克利什　著
查常平等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a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神剑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53.5 印张　1310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1－6504－1/G·2362　定价：128.80 元(上、中、下)

编者序言

《常青藤译丛》是本社推出的一套思想文化类丛书。其名称和主旨皆受到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主体的“常青藤联盟”Ivy Leagne的启发。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学术盛名的联盟，该联盟致力于“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具体说来，多年来，它以追求理想的激情和探索现实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探求新思想、新事物、新价值，倡导自由探索、自由审视和自由创造。

《常青藤译丛》是一套力图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全球性的眼光推介外国前沿思想文化成果的丛书。我们将分辑出版，陆续为读者推出。第一辑共四本，它们是《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50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英〕约翰·雷契著)、《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美〕劳伦斯·哈里森、塞缪尔·亨廷顿主编)、《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德〕哈拉尔德·米勒著)、《学术责任》(〔美〕唐纳德·肯尼迪著)。第二辑共四本:《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的领导艺术》(〔美〕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著)、《创新性思维——实现核心价值的决策模式》(〔美〕拉尔夫·L·基尼著)、《公民与国家》(〔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美〕威廉·麦克高希著)。

本社自推出《常青藤译丛》前两辑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

迎，特别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学术责任》既提供了一个学术规范，又为中国学术腐败现象起到了警示作用。《创新性思维》使你的“决策”占领先机，它从高层次来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具有21世纪科学发展特征的新复杂性科学。《敲开智者的脑袋》的出版，提供了前沿性的文化思想资源，促进了我国哲学界关于从“符号学”、“结构主义”到“后现代性”的研究。《总统政治》、《公民与国家》与《文化的重要作用》构成了“国际问题”系列模块。《总统政治》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了美国总统与国际问题的内在关系。《文化的重要作用》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世界经济、文化转型、社会发展、国际政治的重要性影响。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格罗斯在《公民与国家》一书中，研究了诸如多民族国家的边缘社会群体、族属身份、本土文化、政治多样性，以及国家起源和国家赖于建立的基本纽带等相关问题。他以全球性的视野重新审视了与国际问题相关的民族、公民和国家等学科范畴。《世界文明史》、《文明共存》与我社《文明的冲突》构成了“文明”系列模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米勒的“文明共存论”形成了同一命题的合题，两人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热点话题。“文明的二重性”在我国学术界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反思。《世界文明史》，提供了在传媒时代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作者在论证了以汤因比为代表人物的各主要历史文明学派与“四大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第五大文明”。

今年本社推出《常青藤译丛》第三辑：《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上、中、下）（英）肯尼思·麦克利什主编、《哲学的社会学——一种全球化学术变迁理论》（上、下）（美）R·柯林斯著、《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构建与

商业体制的变迁》(英)理查德·惠特利著。

《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的主编是世界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有著作50多部。他组织世界上35位不同学科的知名学者和专家结集介绍人类思想史上的主要观点，准确解释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重要概念。全书共有2500个词条，从早期人类文明到当代计算机技术的最新领域都有诠释。诸多词条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著名学者的不同学术观点。本书几乎涵盖人类文明的所有领域——历史、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哲学、社会学及文学艺术，各种思想越穿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一本具有重要价值的工具书。

《哲学的社会学——一种全球化的学术变迁理论》是一部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的著作。该书展示了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内涵，在1999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协会杰出学术著作奖。作者R·柯林斯是世界著名的哲学社会学家，他站在哲学的高度，立足于全球化的视野，追溯古代希腊、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现代欧洲的哲学思潮，提炼出了一种全球化的学术变迁理论。这一理论既避免把观念仅仅还原为社会的影响，又避免还原为偶然的本土意义的建构，作者尤为关注的是人类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定位。

《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构建与商业体制的变迁》是一本十分有价值的著作。著名的社会学家理查德·惠特利运用社会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的建构理论，通过对20世纪末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研究与比较分析，区分了6种商业体制类型，提出了不同于欧洲与美国模式的新型资本主义概念，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特征，构建了全球化的社会制度与商业体制的变迁理论。

为了便于读者对《常青藤译丛》的连惯性了解，现将前两辑

的内容简明介绍如下：

《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50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是关于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性理论的一本书。作者约翰·雷契在书中介绍了当代极具影响力的50位著名思想家。其中包括尼采、弗洛伊德、德里达、利奥塔和卡夫卡等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各个时期思想理论及其影响，作者特在每部分前写有一个简短的导言性评述。此书不仅是理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重要参考，而且对于希望更多了解本世纪最重要的知识革命的读者来说是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是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亨廷顿参与主编的一部书。本书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亚洲危机和促进变革等几个方面论证并阐述了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回答了文化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的。由埃通加·曼格尔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命题，"文化是制度之母"可以说是本书点睛之笔。

《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的作者哈拉尔德·米勒是一位极具权威的批评家。他不仅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亨氏文明敌对论的全球观，而且向我们警示，简单地渲染或者接受这种片面的世界观或敌对论是极其危险的。作者明确指出：不是文化的对抗，而是文化的共存与对话；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尝试进行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对抗；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善加利用。只有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全球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得以实现。虽然国际现实政治的发展似乎证明了亨廷顿理论的某种预见性，但哈拉尔德·米勒的理论仍然具有现实价值。我们不妨将塞缪尔·亨廷顿和哈拉尔德·米勒的看似对立的理论观点看做同一命题的合题——这样两

位思想家就在智性和善性的目的上汇合了。

美国学者亨廷顿和德国学者米勒从“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的视角考察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提出了文明分析的世界框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讨论、关注和反思。“文明冲突”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动力，文明共存是融合各种文明不同的特质、扬弃不合适宜文明，形成多样化的新的文明体系。文明共存中必然有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中包含着文明的共存和融合。文明在产生同一性的同时也必将产生多元性，两者密不可分并互为前提，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历史上每一次文明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形成文明共存与融合，而每一次经过文明共存与融合产生的新的文明又会孕育着更为深刻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引发世界文明的变迁、演进、发展和多样化，不同文明在交融中发生碰撞而走向整合。

《学术责任》的作者在斯坦福大学做过多年校长。现在仍在该校执教的唐纳德·肯尼迪无疑是著述此书的最佳人选。他以学者和大学校长的双重身份，从学术责任的高度首先阐述了如何影响未来大学，如何恢复大学使命和忠诚的价值观的问题；其次，作者论述了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给人类提供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以大量的个案着重论述领导艺术、政治策略和“总统作为政治变革推动者”的重要观点。作者根据每位总统的个性气质、知识结构和家庭背景探究总统的动力来源。以大量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说明，美国的生存发展、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经济繁荣和世界性的地位都与总统政治休戚相关。与此同时，本书也论述了一些总统的花边新闻和拙劣的政治技巧。所谓的“总统政治”，就是“总统们创

造的政治”。

《创新性思维——实现核心价值的决策模式》的作者曾与霍华德·雷法合著《多重目标决策》，该书获美国“兰切斯特奖”。他的专著：《创造性思维》在美国获“决策分析最佳著作奖”。本书是一部既充满灵感，读来又令人振奋的著述，在众多学术著作和商业教科书中本书的观点另辟蹊径：回答了如何把握有关决策的潜在机遇，如何使一项“决策”具有“重大的价值”，如何“创新性”地运用“思维”等重大问题。创新性思维是从更高层次来考察世界的联系。创新性思维方法被认为是预示了21世纪科学发展特征的新的复杂性科学。

《公民与国家》是作者历经半个世纪的思考和研究写出的一部名著。本书集中讨论了国家起源、国家赖于建立的基本纽带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政治多样性问题。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格罗斯认为，民族归属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民族主义是导致冲突的根源，民族问题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秩序中的主要问题。“民族与国家”的问题是古老而又现代的永恒问题。它既是关于战争、民族冲突、种族屠杀的悲惨记忆，又是具有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背景的世界各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期盼和共同发展的不懈追求。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和睦相处并共同发展？带着这样双重的历史和经历，带着这样一个对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作者从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国家本质出发，以丰富的人类学研究经验，以独特的边缘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对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重新审视了当代民族关系、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使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文明的兴起和消亡。著名的历史学

家麦克高希在这里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技术”的概念和“世界五大文明”的学说，并追寻这“五大文明史”的发展轨迹，全面阐述了长达5000多年的世界文明史的演变。作者着眼于历史性的纵向视野和全球化的横向视野，以“传媒技术”的发展为前提、以“文化变革”为线索、以“历史维度”为依据，把世界文明史分为五个阶段，这是作者重新认识与划分“世界文明史”的独到之处。本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与分析从汤因比到各大历史文明学派理论观点。第二部分阐述并论证“四大文明”发展规律。第三部分重点介绍了第五大文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过程和未来展望。

如果说，人类思想文化是智慧的结晶、进步的阶梯、文明的象征，那么上述多部著作就成为反映当代思想文化深度和成果的最好文本。

文化和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德谟克里特说：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告别了20世纪和经历了20余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给我们提出了更深层的课题，为了实现中国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一方面我们固然需要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与此同时，还要从多类文化的宝库汲取思想文化的营养——这就是编译出版《常青藤译丛》之目的。

英文撰稿人简历

主　　编

肯尼思·麦克利什：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有著作50多部，包括《好书阅读手册》、《20世纪艺术手册》

科学顾问

亚历山德拉·麦克德莫特博士　约翰·P·保罗教授

撰 稿 人

安德鲁·亚当斯　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工学士

戴维纳A·阿伦　剑桥安顿布鲁克斯医院护士、社会学家

理查德·伯奇摩尔博士　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员

伯纳德特·凯西博士　普利茅斯圣马可与圣约翰学院传媒系主任

尼尔·凯西博士　普利茅斯圣马丁与圣约翰学院社会学系主任

安德鲁·克鲁登　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硕士

保罗·杜罗　澳大利亚民族大学艺术史讲师

特雷莎·法龙　芝加哥大学硕士

蒂姆·戈登医生　药物代谢研究所主任

罗布·格雷厄姆　伦敦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所影视学主任

迈克尔·格林哈尔希　澳大利亚民族大学艺术史教授

特雷弗·格里菲思博士　伦敦北部大学传媒与交叉学科系主任

安德鲁·杰克博士　伦敦国王学院哲学系访问讲师

E·M·杰克逊博士　兰开斯特圣马丁学院宗教学系讲师

杰西卡·詹姆斯　西雅图核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玛格丽特·约翰斯通　心理治疗家、作家
拉明德尔·考尔　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社会人类学学士
坦尼亚·克里兹文斯卡　伦敦北部大学现代戏剧与电影专业硕士
卡桑德拉·罗瑞斯　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社会人类学学士，记者、作家、文献研究家
亚历山德拉·麦克德莫特博士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高级讲师
凯瑟琳·麦克德莫特　金斯顿大学设计史教师
西门·麦克利什博士　伦敦大学数理逻辑研究员
雷切尔·蒙塔古拉比　加的夫新犹太会堂牧师
杰里米·马森　建筑史学家
布伦丹·奥利里博士　政治学家，讲师，播音员
约翰 P·保罗教授　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生物工程师
奥尔南·罗泰姆　布里斯托尔大学宗教学系讲师
菲利普·萨雷博士　开放大学地理学高级讲师
马修·萨克斯顿　伦敦大学心理学系讲师
约翰·谢泼德博士　兰开斯特圣马丁学院社会伦理学系首席讲师
休·史密斯　伦敦北部大学戏剧研究课程导师
史蒂夫·斯坦顿博士　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伦敦城市大学音乐系高级讲师
克劳斯－迪特尔·斯托尔　编辑，翻译家
伊丽莎白·斯图尔特博士　普利茅斯圣马可与圣约翰学院高级讲师
罗斯玛丽·韦德尔　曼彻斯特大学比较宗教系讲师

中文译者引言

怀着一身敬畏、震颤的心，把这部《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的译稿，奉献在读者面前。但愿它能对我们智慧的增长、教养的形成、心灵的丰盛、文化的创造、知识的累积、财富的预备有所裨益。不过，人类思想史一再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完全拥有了这些，却丧失爱与真之心，这对他人将造成最可怕的灾难，并在他的人生中带来遗患无穷的后果。没有真的爱，是虚伪与装饰；没有爱的真，是冷酷与残暴。但是，我们都渴望度过热情而诚实的人生。或许，这部人类思想的指南，在培养我们个人爱与真的品质方面，更将有益无穷。

本书用2500个概念词条，呈现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的思想精华。其中，既有我们熟知的如工作、城市规划、计算机、会计、文明、生态学、病毒学、善和美，又有令人费解的如虐待、专制主义、复调音乐、混沌理论、后现代主义、通灵学、基督教艺术，但从每个概念的起源、形成到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都在书中得到详尽的描述和阐释。这些概念，曾经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时代对我们人类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本书的词条，由英语世界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精心撰写而成，内容涉及人类文明的所有主要成就，含盖历史、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哲学及文学艺术，时间横跨古代至当代。其表述文字通俗易读，以普通公民、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的非专

业及专业读者为对象，是人们理解那些构成我们生活世界的重要概念的理想案头手册。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略去了每个词条后面作者的缩写姓名，以及相关的参考书目。因为，这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大多未被翻译出版。

本书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博士、研究人员承担翻译工作，译文力求准确、通俗、平实。各个词目的翻译分工如下：查常平译宗教、神学、建筑、心理语言学及部分生物学、医学词条；刘宗迪译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地理、化学、电子及部分艺术词条；胡继华译哲学、影视、传媒、戏剧、政治学、经济学、民族音乐学及部分艺术词条；董志强译艺术、艺术史、设计及部分物理、数理逻辑、社会文化心理词条；刘雪怡、赵玥译部分文学、科学哲学、翻译、艺术词条；潘晓放译部分生物学、医学词条；哑石、林和生译数学、物理学、数理逻辑词条。其中，查常平对赵玥、刘雪怡、潘晓放的全部译文和胡继华、董志强的部分译文进行了核对，并承担全书的翻译主持、统稿工作。作为本书中文版主编，我衷心感谢每位译者的辛劳！更感谢新华出版社齐鹏等编辑的作为！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上海东华大学的顾铮博士、著名建筑师刘家琨先生，他们为我提供了几个日本人名的汉语拼写法；还要向四川大学的胡冰霜博士致谢，我在生命科学、医学方面的译文核对中曾向她请教。四川美术学院的解亚平女士、我的妻子刘丽，也协助我完成了部分译稿的术语统一工作，在此一并向她们致谢！在第三个千禧年开始的盛夏，我们共同以手指为键盘、以人脑为电脑，其工作之难度，或许只有过去的辞书编纂者才能心领神会。

在这个思想和智慧越来越贫困、知识和信息越来越丰富的时

代，翻译出版这本思想性的浩浩巨著，乃是一种冒险与探险的事业。它呼唤着学者的责任、勇气；它呈现着出版者的良知、方向。由于本书涉及的知识领域包罗万象，且有的词条属于20世纪90年代最新问世的术语，译者有限的翻译水平，译文中难免有错误，我们满怀感激与受教之心，拳拳期待着读者及专家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查常平

2001年7月10日于蓉城

英文编者引言

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获悉、思考、整理和运用将近十五亿亿条信息。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获悉、思考、整理和运用信息的过程，被认为是、也被称之为思想。我们人类，是惟一能进行思想活动的生物，是惟一能想象比我们现在更富智慧的存在物的生物，是惟一能形成和表达关于异类生物的形象及其可能行为的观念的生物。

然而，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人类如何思想，我们仍然知之甚微，这的确匪夷所思。人脑活动的早期研究，仅仅局限于原始的物理实验，譬如用电流代替神经脉冲刺激肌肉运动或改变肤色，仅仅局限于对反应、情绪和意念的心理活动的测验。这种测验，能说明人的大量的思想对象以及思想活动所受的影响，但对于思想过程本身实在未做多少揭示。近来，人们利用扫描仪所做的实验表明，当人们开始回忆一个简单的事实序列，譬如五、六个日期，或者从一到十的数字，脑电波就快速掠过整个大脑皮层。可是，这项探索迄今尚未揭示：这种现象为何发生，这种反应模式意味着什么，“记忆”贮存于什么地方，每一个“记忆”都包含了些什么内容。譬如，“记忆”是那一条死气沉沉的消息，如一块收入钱包中以备使用的硬币吗？或者，“记忆”是那种具有动力意义的东西，“使用”时它就生气勃勃，不用时它又复归于沉寂吗？

大量的人脑活动——“思想活动”——都是反应的、出于本能的活动。我们在一生中能获得十五亿亿条信息，可是在特定的时间内，我们所能思考的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的下意识“思想”，大都由“所予之物”决定——如上有高天，下有厚土，火能燃烧……，如此等等。对这些“所予之物”我们熟视无睹，过着自己自然的生活。在我写书、你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的每一瞬间都同时进行上百次思维过程，但只有极少的思维过程才自觉地关联着实在的活动。我们呼吸吐纳，我们调整身体状态，我们消化上一顿饭，想象下一餐，我们感到舒服或不适，我们觉得安全或恐惧威胁，我们记住急务，我们以虚静释然的情怀求知；我们记得如何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也记得怎样阅读。这些事情活动在我们自觉的心灵，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支配着我们的注意力。它们——就是这节引言中所表达或交流的思想经验的一部分，对此，您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它们——对我们的思想经验是根本的，但对另类经验却无关紧要。

“思想”活动大都并非人类所独有。每一个生命有机体或多或少都可以进行这种活动，但我们人类高傲狂妄，认为它们根本没有“思想”，对它们的“思想”视而不见！譬如说，我们假想蝎子决不会想“我饥饿”或“最好不要碰到鼬猫”；我们假想取暖的蜥蜴不会思考阳光为何让它舒服；我们假想一只病猫，既不感到悲哀，也不知道有意识地逐步改善病况，或展开对生命的展望。当我们人类在种植、狩猎、寻求避雨遮风之所的时候，常常不只是受本能思想支配。要生存，就必须“思想”，这天经地义的道理可能只有人类才能肯认，因而人类必须不断地思及“异类”，使大脑持久保存着健康活跃的状态。

本书所关注的主题，是后一种思想，即我们作为生存者而行动时的所思，一种为好奇心所驱使的为交往愿望所激励的精神过

程，而不是我们用来求生存的思想。人类思想，永远是以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模式开始对周围世界现象的观察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探询。这些观察与探询，是思想之网不断拓宽的开始，思想也不仅仅广泛生长于我们心中，也广泛生长于与我们一样进行思想分享的每一个人心中。思想大厦，不仅奠基于我们大脑之内的无数事实，而且奠基于他人的观念与认识，其中包括我们同时代的人、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裔的观念与认识。在所有特定的思想领域，思想都是呈指数级增长。这种增长不像连续渐进的线，而像正在生长的机体组织中细胞的不断分裂。有些人士，尤其是宗教与科学领域里的人士可能认为：存在着一种所谓的绝对真理，所以也至少潜在地存在着“绝对知识”。但是，人类思想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努力所建立或宣告的“绝对”只不过是暂时的驿站，即连续的精神之旅途上的暂时安顿之地而已！

人类思想“纯粹”发展的最佳典范，是我们对所谓“超自然力量”的态度。超自然存在及其力量观念，起源于直接解决或者有意回避日常生活中某些更为复杂的问题。这是向我们所观察的周围环境中未知的现象与行为的投射，这种投射又为经验所印证。所以，譬如像光明与黑暗的本性，就被比拟为可见世界的存在与力量。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我们所认识到的关系，在我们的想象之中又是对立的，是自然世界与不同生物之间互相对立、或同一生物不同侧面之间更隐秘对立的普遍模本。

从这种简单的观念，产生了对超自然存在与力量的巨大等级秩序的想象，产生了人类可能以自己在自然世界中建立的关系模式为范本，再建立与超自然存在的关系这种思想。时过境迁，对可见物与不可见物的观念与态度都与日俱增，随之出现了发明、抽象与理论化的过程，从而出现了传统、习俗、哲学与惯例的宏大体系。反过来，这些建构又变成了“知识”，在此基础上又永

恒发展出新的观念，直到它们与我们所认识到的人类本性相联系，这种联系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要避免这些知识之扰而自由想象、祛除先入之见，以及遗忘这些知识所带来的人为性与立场，都要有巨大的精神勇气。整个过程的发展到今天为止，还是以善意的精神游戏为目的，即使有人相信超自然力量，他们也能宽容其他不相信超自然力量的人，他们能相容共在。火星上的观察家，也许觉得不可思议：宗教的狂热信徒也接受科学的成果，科学家也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但是，情况恰恰如此：人类普遍思想的荣耀，尤其是关于超自然存在的思想的荣耀永远无法脱离怀疑精神。不过，怀疑精神所直指的对象，与其说是不信任，不如说是逻辑。

初看起来，科学范式似乎更为严谨。但我们加以合理化的并不是世界，而是我们研究世界的方式；我们发明了体系，体系又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认为合理的关于思想本身的客观对应物。演绎、归纳、实验方法，都是人类推理活动的成果；对使用这些方法的人而言，几千年长期共存的对立而又使上述方法更加诱人。那些把自己的世界观建立在接受权威而不是运用逻辑的基础上的人，一再揭示了方法的魅力。因为对立面的共存最能强化信念，这也许不是“科学的”姿态，但它却是许多科学家的姿态。

难中之至难在于，我们的世界似乎永远准备摧毁我们设计的解释法则。譬如，四百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在排除了许多错误的假设之后，终于发现了宇宙“规律”，系统化了宇宙“规律”，“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一旦确立新观念，一旦做出新的发现，“规律”也就遭到挑战。科学家宣称：正在进行的与其说是对规律的重新定义，不如说是对规律的精雕细琢；虽然我们不时偏离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仍然是一个真实的过程。由此看来，波意耳化学在17世纪是以炼丹术为基础“发展”起来，它

意味着科学家再也不必去考虑炼丹术了。同样，现代医学知识也宣告历史上的许多态度与实践的过时。可恰恰在这里，宇宙似乎再次明显地指向了另一种思想。例如，对碳的本质发现越多，我们也越是认识到炼丹术家以其原始的方法和有限的表述能力获悉了许多秘密，我们只不过是重新发现这些秘密罢了。同样，医学也如此富有，为时间神圣化，又落在现代“科学”医学逻辑之外的极其成功的观念与实践，以致作为理性科学而非印象和实用体系的整个医学观念都受到了严重的侵蚀。

人类好奇心最为充满魅力的主题之一，永远是人类自身：作为物种的类本质，作为个体的自我，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祖先。我们如何思想？我们的情感是什么？怎样组织我们的社会？我们下一步想什么、采取何种行动？我们的这些思考都受到科学秩序的影响。这种努力，使人类思想上升到一个全新的维度；从人类学到语言学，从心理学到社会学，都远远超出了遗传学、粒子物理学等纯科学，诸种新学科都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的创造者和象征。这些学科，存在于印象与实验的交叉界面上，它们都是特别具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人类思想形式。

艺术依然存在。关于这一思想范畴，有人认为它是人类最精致的精神业绩，有人认为它徒具骄奢浮华，仅为虚文之物；这种思想似乎又不求回报地养育了别人；它关心的是想象而不是理性；它在转瞬即逝的情感中表现人的意志、游戏和对美的欣赏。这些正位于每一种阐释与每一道陈规的中心。我杜撰神话、雕塑石像、吟诗谱曲、创作弦乐四重奏，每每在这种时刻，我对于严格的思想是聚精会神，而非舍弃逃避。艺术所依赖者是选择与呈现，艺术的成功源于有分寸的暗示，也就是它向我们呈现事物，引领我们回忆、沉思成千上万的其他事物的方式。在所有思想形式中，艺术并不是最为主观的，但它的主观特征又最显而易见。

它引领精神与情感的不成熟者追回到观者的位置上，引导我们深入体验，去发现或发展生存姿态。我观望一道瀑布，我聆听一支关于同一道瀑布的歌曲，其中的情感体验迥然不同，原因在于：在歌曲之中别人的观念已经被程式化了；甚至当我思考之时，与别人交流亦改变着我对瀑布的想法。这节引言一开始就提到：那些与人类思想和行为相伴而生的暗示、记忆与联想的灵光——它倏忽即逝，充满反讽意味，富于暗示性，是我们的体验之中的意境，因而也是全部人类思想之彼岸的艺术圣地。

探索人类思想特殊领域的书籍——语汇词典、技术术语汇编、专业百科全书、学科分类目录——不可胜数。这部“思想手册”却有相当不同的使命。我们不想写成一部百科全书，也不想提供理论教条，而是展现控制着我们的行为的思想网络。我们敬请主要学科的专家首先精选，然后撰写他们工作领域里一直被认为且现在依然被认为是举足轻重、影响甚远的观念。收入本书的上千词条，都经过了提纯净化，而且代表了专家们对人类思想的沉思。这种以观念和影响为中心的选择，使本手册又不可避免地要淡化实际应用、技巧或技术细节。有些学科，像语言学与数学，就容易做“理论”或“学问”的阐发；另一些学科则归于描述，所描述的与其说是各类思想本身，不如说是对人类经验中特有现象、特有领域的共识。因而，我们漫天撒网，广种精收。其他书中所疏漏的东西，在人类思想历程中已经成为人类旨趣的东西，如理智上的来龙去脉，在完全开放的意义上我们的当下体验，尽管尚在探索之中，也都尽收入我们的视野。书中许多条目交叉重合，不仅表现了本质关联，而且还开启了理解观念与思想的新路径。本书的内容相互关联尤为重要，因为百川归海，广纳细流。

作为主编，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同行撰稿者。书之扉页上署有

他们的大名，书后录有他们的简介。文中出现的第一个缩写姓名表明谁对条目负主要责任。是凯西·鲁尼最初构想了这一导引的计划，他在规划和成书的主要阶段上都发挥了指导作用。吉尔·保罗主持了成书的全部过程，订正了发排与清样中的错误，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萨姆·梅里尔作为原稿的责任编辑，是他加工了几十人手书的原始文稿，以及同等数量的电脑光盘，而且常常是系统互不兼容，这是现代出版工具书中最令人烦恼的事情之一，是他把它们转换为该手册的现在的统一样式。对于上述朋友和每一位参与该手册成书的人士，我致以最诚恳的谢意。

肯尼思·麦克利什

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　目　录

上　卷

A

B

A

先验与后验（A priori and a posteriori）

一个陈述是先验的（源于拉丁语，字面意思是“从前者而来”），惟一的条件是可以不依赖经验而判断它的真理或虚假。“2＋2＝4”是先验的，因为可以不依赖于经验而判断它为真。

一个陈述是后验的（源于拉丁语，其意思为“来自后者”），惟一的条件是不能独立于经验而判断其真、伪。“猫在垫子上”，这个陈述是后验的，因为不能独立于经验而判断其真假。我们只有具有某种经验如看到猫和垫子这样的经验，才能决定这个陈述是真还是伪。

参见：“认识论”，“严格和不严格的命名”。

自然发生说（Abiogenesis）

自然发生说（希腊语意思为“生命源自于无生命物质”，即生命是自发产生的），是对生命起源的一种古老解释。其依据源自于对一些事件的表面观察，例如：从腐烂的肉质中生长出蛆虫，或者过期奶酪附近总有老鼠出没。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提出如下的思想，已有的或将有的生物均自发产生于泥土中。他认为棘鱼是出现在陆地上的第一个动物，并在其演变过程（形式的变化）中形成其他动物。

17世纪以前，自然发生说的基本观点曾以各种形式一再出现，如公元9世纪阿拉伯生物学家阿尔·雅希克在其著作《动物

记》一书中提到，生命自然形成于泥土中。直到17世纪哈维才通过对鹿胚胎组织的研究，于1651年提出了“每种生物均源自于卵细胞”的思想。随后，意大利内科医生雷地也于1668年揭示，未经苍蝇叮咬的肉制品不会生蛆。至此，高级生物不是自发产生的观点开始被人们所接受。但是，早期的显微镜学家列文虎克发现微生物后，使得自然发生说理论再度盛行。1860年，巴斯德解决了这一难题并回应来自法国科学院的挑战。他的实验显示：除非给无菌培养基接种微生物，否则能使微生物生长的培养基仍会保持在无菌状态。

虽然巴斯德对废除无生源说作了不懈的努力，但对第一个活生物是如何形成的这类问题（**无生源说**），在20世纪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认真思考。

参见：生源说；种质。

绝对（Absolute）

哲学家常常把客观真实与主观表象对立起来，即把不同的视角看事物的样子与事物真正具有的样子对立起来。比如，我们可能把独立于一切视角的真实存在的岩石与它通过鱼眼和人的视觉器官而显示的不同状态对立起来。在这个语境中，绝对总是意味着客观现实整体。这个整体，超越了对它观照的一切主观视点。

参见：客观与主观。

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

经济学上的绝对优势是个贸易上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有效率地（即以较少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产出一

定量的产品。

例如，1981年，日本仅仅9.4个劳动小时和502美元的成本就能产出一吨钢材，而相比之下，英国产出一吨钢则要16.2个劳动小时和622美元的成本。但是，这种统计数字，并不意味着日本应该专门生产钢铁，而英国不应该生产钢铁，因为日本在其他方面可能更加依赖英国。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利润最大化的真正指标，是**比较优势**。不仅如此，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都不一定永远是静态的：英国钢铁产业曾经就比日本钢铁产业有效率得多。

纯音乐（Absolute music）

纯音乐是这样一种音乐，它仅仅由于其自身的理智和情感的性质而存在，例如遁走曲、奏鸣曲和交响乐（除非它们有明确的"标题"）。与**标题音乐**不同，纯音乐不涉及音乐外部的具体内容。由于这一性质，纯音乐通常都是器乐，或者是没有词语发音的声乐。然而，有些器乐却不是"纯"音乐，例如印度古典音乐，因为在演奏者所演奏的旋律和节奏的式样中，已包含着传统的观念联想。

专制主义（Absolutism）

专制主义是一种不受法律、宪法和习俗等任何形式约束的统治；其权力是不受检查的，其法律是统治者（君主）的命令，而他本人又不服从法律。专制主义必然是一种理想，因为哪一个君主都不能完全控制他的臣民。

专制主义理论深受早期欧洲君主的欢迎，他们粉碎了贵族

（政治）和罗马天主教对他们权力的制约。法国思想家布丹和英国哲学家霍布士首先表述了这种理论。他们认为，专制政府不仅适合于**封建主义**，而且是避免“自然状态”具有人类特征的暴力的惟一途径。他们相信，**主权**必须集中在君主手中，专制主义是文明化的必然。

专制主义君主制，被批评者谴责为独裁（参见**独裁统治**）。专制主义政体存在于**农业社会**，而今具有类似特征的政治体制被称之为“集权主义”。

抽象代数（Abstract algebra）见代数

抽象舞蹈（Abstract dance）

抽象舞蹈，最初是用来称呼一种特别风格的**芭蕾舞**，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并在**包豪斯**得到发展。它的目的是在舞蹈中排除一切外在的内容联想，这样舞蹈演员便能全神贯注于纯粹的舞蹈动作和式样。（另有一些舞蹈家和芭蕾舞设计师，从邓肯和格雷厄姆以降，曾用“表现舞蹈”、“自由舞蹈”以及“新艺术舞蹈”之类术语来描述这同一现象。）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大量的舞蹈都是“抽象的”。例如交谊舞，它给予跳舞者的愉悦来自于舞蹈自身的动作和式样，而不是外在于舞蹈的“内容提示”。象征性（即非抽象的）舞蹈主要是宗教舞蹈，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宗教舞，和芭蕾舞——然而即使在这些舞蹈中，例如在伊斯兰教祈祷仪式上旋转托钵僧跳的舞中，或者是在从巴伦琴到艾里、从泰特利到鲍希的现代芭蕾中，抽象仍然是其普遍的性质。

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

抽象表现主义是美术批评家使用的术语，大致用来描述活跃于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的一个由不同风格的艺术家组成的团体，与“纽约画派”同义。“抽象表现主义”这一名称的最初使用，与19世纪20年代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有关，因而它表明：此艺术流派的兴趣在于个人的情感表现，而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从**新造型主义**和**构成主义**承继而来的几何抽象风格相对立。正是这一主旨，使得风格迥异的众多艺术家聚集成一个艺术团体。然而，他们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几个不同的派别：莫热威尔、纽曼、瑞恩哈德和罗思科的抒情抽象、色域绘画；波洛克的全盘滴画（批评家罗森贝格曾称之为“行动绘画”）；以及德·库宁和豪夫曼的具像表现主义。批评家格林伯格，创造了“美国风格绘画”这一术语来描述上述艺术倾向。抽象表现主义很快为人们接受，使美国的艺术处于急进的状态，并使美国主导了现代主义论战中的许多术语。

抽象（Abstraction）

抽象——把物理客体的性质从客体本身中剥离出来的行为，是**数学**中的一个基础概念，或许可以说是惟一的基础概念。抽象标志着数学得以产生的开端。抽象的发现者是认识到数字乃独立于被数的客体的第一个人，即认识到（例如）两个桔子和两个苹果享有同一个性质——“贰性”，它与水果本身是什么种类没有关系。自从有了这一发现，抽象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重要主题，数学工作者提出了大量的观念，并愈来愈深入地把它们与其现实

世界中的存在基础相分离，然后又通过一定的途径把这些观念带回到现实之中，告诉我们许多关于现实世界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便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

通过抽象的方式，可以对事物的一般性质进行直接的推理；没有抽象，思想便被限制于个别事物。在许多方面，智力本身已与进行抽象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特殊事物的抽象来思考一般的能力，是智力发展的基础。举例来说，一旦“贰性”的性质被从具有此性质的具体事物中分离出来，便可以决定所有具有“贰性”的事物的性质——诸如两个“一双”放在一起总是组成一个“四重奏”——而且虽然儿童已能这样思考，拥有这样的思维，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心智过程。

在数学中，这种思维过程的运用已达到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想象的地步，事实上，数学家们通常更感兴趣的是抽象本身而不是具体的应用。数学所拥有的从现实世界中抽取本质属性的能力，使它具有了普遍性，以及应用于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科学家便不能用数学来考察环绕他们的宇宙的属性。（自然，一种数学如果完全与现实世界无关，那么，它的发展便是成问题的。）数学学科的每一分支，本身都是抽象的产物：例如**几何学**，是对用于建筑和测量方面的计算的抽象。甚至有些数学分支是对数学的其他分支的抽象的产物；例如，**范畴论**便是对**代数**研究的客体的一般性质的抽象。

另一种略微不同的抽象方式构成**美术**和**民间艺术**的共同基础。艺术中的抽象有两种主要形式。首先，艺术家创造的形象，涉及的并不是可见的世界而是他或她自己的想象。典型的例子是早期陶器上的涡旋纹或之字形图案，或者是见于美国人衣物上的装饰——用小圆珠构成的成排成行的和几何形的形状。这些图案的吸引力，一方面基于对称和反复，另一方面也基于这种对称的

中断。在美术中，使用类似的抽象技术的主要风格流派（特别是绘画中）有**抽象表现主义**、几何抽象、**新造型主义**、**至上主义**和**滴色派**；抽象风格也是遍布于世界的实用艺术和**设计**的主要特征。

艺术中的第二类抽象方式是，创造者从可见世界中“抽象出”形象，（例如）从十字状物、花朵、钩子、树叶、鹅卵不等物件中抽取形状，使它们构成抽象图案的基础。在此，抽象所产生的魅力是双重的：智力上的（对图案制作本身的欣赏，如同对第一类抽象形式那样）和情感上的（源自于物体的“抽象形式”带来的愉快或挑战，因为这些“抽象形式”仍具有在现实世界中的可识别的对应物，以及非艺术上的“意义”。）这种抽象形式在民间艺术中也普遍存在——图腾艺术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在美术中，则是那些追求打破早期艺术图像传统的现代艺术流派的特征，如**立体主义**、**表现主义**、**野兽派**和**未来主义**。

参见：**数学的应用**；**人工智能**；**科学方法**；**思维**。

虐待（Abuse），参见：虐待儿童（Child abuse）

学院（Academe）

学院原是古代雅典一个公园的名字，它是为纪念传说中的人物阿卡德莫斯而修建的。公元前 4 世纪初期，柏拉图在那里创建了一个教学机构，在贵族学生们开始从事政府工作之前，对他们进行**哲学**、**政治学**和**科学**上的教育。这个学校，延续了 800 年左右，它闻名于世，不仅由于其教学活动，而且由于它是一个理性知识的宝库，是对过去观念的有影响力的解释的源头，并且是我

们今天可能称之为的“思想库”。

所有这些功能，已成为学院的通常的功能，并一直保持延续到今天。那些著名的大学，从伊斯法汉大学到牛津大学，从北京大学到维坦伯格大学，从亚历山大大学到哈佛大学，还是重要的以物质形式保存的知识集藏地：尤其伊斯法汉大学和亚历山大大学的图书馆，在它们的时代被认为包含了所有可能的人类知识，而且它们的藏书（尽管遭到毁坏和轶失）仍然是我们关于古老过去的书面文本的基础。这样的大学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至少在理论上说，它们能独立于宗教的和政治的偏见。它们可以是由君王和政府资助的，也可以是由具有特殊宗教信仰的人们资助的，但是，大学的核心理念决不会丧失，那就是理性思想依其自身的本性必须独立于现世的或信仰的各种压力，必须对所有的人都是公正无私和可以接近的。

从学院的最初时代开始，其保持纯净不染的愿望便与宗教的**隐修生活方式**的核心观念之一相类似。僧侣们相信，只有通过让心智和精神从日常欲求中超脱出来的隐居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和对神的真正膜拜。在所有的主要宗教信仰中，都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即如果一个团体的人们能使自己摆脱世俗世界的缠绕，并把他们的时间奉献于沉思、祈祷和精神修炼，他们将在情感和理智上产生一种超越日常知觉的强烈的虔敬意识。奥古斯丁曾谈及在一个“封闭的花园”（hortus conclusus）中沉思修炼——此即修道院的起源；波斯的智者们同样相信美丽的环境有助于沉思冥想，并在正式的、宁静的花园中工作；佛陀倡导每天在同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沉思悟道。在古代世界中，由于最初的教育活动，往往是通过这些修道院、寺院进行的，于是在修道院的理念和学院的理念之间便产生了一定的混合或混淆。在某些情况中，同一群人既是僧侣又是学者；而在所有的情况中，（由两种

传统共享的）这种理念——离群索居的智力修炼，能导致全神贯注的沉思玄想并因此通向更真实的理解和思想，已变成一个危险的但却是指导性的原则。无论他们是否认识到，学者们已处于成为两种妄念的猎物的危险中。这两种妄念是：他们在研究学问上表现出的杰出能力，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他们的机构、团体和他们自己的杰出品质，而把自己凌驾于普通大众之上；以及对大学院墙之外发生的活动抱有鄙视的态度，认为它们不可能是智慧的和杰出的。

也许，这种妄念中包含着或者说曾经具有某些真理的成分。时常出入图书馆中，与前辈的亲近以及同行之间的交流切磋，使古代大学中的学者们获得超出其学院外的同辈的一种契机和开端，并且，他们的所学与日常社会的分离，也常常使他们的确有机会把自己的研究深入下去，而超越常识。例如，在古代的巴比伦、中国和印度河峡谷，关于天体运动现象的预测和解释的研究，起初从事于使宗教或国家所需求的**占星学**体系变得更有效力，后来却导向与之完全无关的构成现代人类所有知识基础的宇宙学和数学的发现。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最初是人们在实践中为日常的实用目的而设计的，在学者们的手中已被精细化为巨大的知识大厦（而且它必须被承认，并不断自我繁殖），这方面，**犹太教**拉比的学问系统和**伊斯兰教**教法（shari'a）是尚存的著名实例，其中对诸如罪恶和正义这类概念的涵义的探索，已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所关心的范围。一些“秘密的”研究（如果在社会中公开从事，常常被处以死刑）导致了某些象**医学**这样的学科的进步，同时也使许多受到宗教或政治当局反对禁止的知识和文本得以保存下来。

到中世纪晚期，离群索居和自我陶醉，已经导致几乎整个学术研究的僵化。前人和权威的话语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学习成为

私人的领地，只向那些愿意“像我们一样思考”的人开放。在学术的某些领域，这种愚蠢的具有毁灭性的态度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导致许多昔日主要领域的学术研究已边缘化到濒临死亡的程度。不过，从总体上看，最近300年以来，理性科学、大众教育和文字普及的崛起，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净化效果，扫荡了**经院哲学**的蛛网陈迹，返回到开放的心智和好奇的态度，它们曾是学院最至关重要的品质。（然而，在某些社会中，科学研究人员已趋向于变成独断的、自我宣称和自我保护的精英团体，似乎任何其他的人们都是一种可怜的、抱有希望的短暂现象。）通过政治家们和（这是必须提及的）一些大学院系的教师们的努力，人道的思想再次获得普遍的宣扬。在某些特殊机构中，人们可以更系统、更熟练和更舒适地从事思想活动，但是总的说来，思想又一次变成任何只有大脑的人都可以亲近的对象，正像当初柏拉图在**学院**中开始组建讨论团体时的情形那样。

西方艺术学院（Academies of western art）

接近16世纪末期，欧洲众多的画家和雕塑家群体，出于对现存的艺术行会体系以挣钱为目的的工匠性质的不满，纷纷联合在一起成立艺术学院，以寻求提高艺术品制作在智力和创造性方面的水平，从而超越以前的基于手工艺的作品。学院的目的，在于强调艺术家作为自由艺术的典型代表的高尚地位。1563年，第一个艺术家学院（与当时由艺术爱好者、收藏家、艺术商和业余画家组成的所谓学院相对立），由艺术家兼传记学家瓦萨里创建于佛罗伦斯，美第奇是学院的赞助人，米开朗基罗任学院院长。其他城市很快便仿效佛罗伦斯的榜样，其中较著名的是罗马，圣路加学院于1593年在那里创建，苏卡罗出任院长。在法

国，雄心勃勃敏于政治的查理斯·李·布鲁恩，于1648年建立了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学院由于获得了皇室的支持而使整个欧洲为之羡慕。到了18世纪，许多其他城市如柏林（1696年）、波隆那（1709年）、德雷斯登（1750年）和伦敦（1768年），也纷纷建立了艺术学院。

在一切可能的方面，艺术学院都力图使自己的工作与艺术行会拉开距离。他们散布影响，鄙视行会，说他们腐败并追逐私利，并声称行会窒息了创造艺术的事业心、自由选择和理性秩序，使其成为通向于知识分子的游戏的陈规陋习。为了避免这些已觉察到的缺点，艺术学院的教师们教授学生“美术”——其基本意指不是绘画或雕塑的技巧训练，而是解剖学、历史和几何学的理论方面。学生们学习的是**素描**而不是绘画，因为素描被认为是能够进一步根除行会的手工艺技法残余的有效手段。

在政府的总体控制下，学院通过竞争、展览、讲座、讨论会和论文等手段使艺术体制化。所有这些活动——它们最终会阻碍美术的进步，其目的在于表明绘画和雕塑是值得被归入自由艺术的。为了同样的目的，学院派画家认为：只有历史题材的绘画才是适于他们创作的样式。这样，一个循环的理由——即学院派艺术需要一个学院捍卫它的趣味，与此同时，学院声称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来训练历史画画家——把学院派画家引向自我封闭没有出路的实践途径，基本上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

到了19世纪，学院派被视为过时的古董、他们根本不能回应**浪漫主义**的挑战。浪漫主义认为、一个艺术家从规则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面对这种异端邪说，学院派的反应是，以他们拥有的一切势力来压制创新。结果，在19世纪的进程中，学院派从深受敬仰的地位（在18世纪，法兰西学院欢迎几乎所有的当代

重要画家)，衰败到一个世纪后没有一个著名的艺术家肯屈就于学院派的信条。在这种氛围中，学院被看作是仅能提供某种技巧训练的地方，而不具备两个世纪前它们在创建时曾拥有的理论上或理智上的领导地位。

调整理论 (Accommodation theory)

在语言学里，调整理论来源于这样一个前提：当人们修正他们的言语、使它更符合他们的谈话伙伴的言说方式的时候，言语调整就会发生。人们一度观察道：谈话中存在广泛细微的修正现象，并且，这种现象，或多或少倾向于在无意识中发生。例如，人们谈话的速度，停顿与言说的长短，词汇的种类和所用的句法，以及语调、音高、发音，都从属于调整过程。

这种趋同性，决不是所有谈话的一个自动特征，我们可以辨别能够预言调整现象的某些社会背景 。比如，调整，倾向于在说话人彼此喜欢时发生。另外，当出现惯于顺从的需要时，当一个人想让另一个人舒坦时，人们就能见到谈话中的调整现象。所以，调整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有礼貌的言语策略，它有意传达如下的印象：听者的言语是合理的，并且值得效法。有趣的是，调整理论强化着这样的观点：当和朋友的关系从一种正式的访谈处境调换为非正式的谈话时，由于发现女人比男人表现出更强烈得多的言语修正的现象，因此，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成为合作性的对话伙伴。

参见：人类学语言学；言语人种论；社会语言学。

可辩解性（Accountability）

政治的可辩解性，要求政治家、公仆——无论他们是行政、伦理还是经济官员——的行动都必须接受审查、质疑和挑战。政治可辩解性是负责任的**代议制政体**的试金石。统治者不能接受代表或法官质询的政治体制就被叫做武断独裁的体制。在议会制中，部长必须接受以口头或书面的质询——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弹劾”即要求他们对政策或行政问题做出详细的答复，从而做出辩解。

管理的可辩解性——无论在公共的或私营部门——都同样要求管理者对他们的职位负责，他们就已负约履行这种使命，并依照一致认可的能力标准履行义务。狭义看来，财政审核保证经费的开支符合特定程序，而效率与效果审核又调查管理者是否实现了资金的价值，是否提出了合适的方案来实现组织目标。管理者应该对资金开支、遵纪守法、执行计划和产出结果接受质询，做出辩解。

参见：“行政理论”，“民主”。

会计（Accounting）

会计是经济实体的资产、负债能力和交易活动的记录，它表明（有时也掩盖了）经济组织的经济状况。评价股份、资产和负债能力的历史成本会计，是以原始成本为基础对企业的评估。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快速的**通货膨胀**使这种会计方法失效之前，一直在为人所用，决无疑问。随后，有的经济组织采用通行成本会计，这就开始了一种会计方式的改变；但由于 1981～1985 年的

反通货膨胀，历史成本会计又获得了重视。

现行的会计方法，是深刻重要的技术发展的结果，在某些理性货币会计的形式发展之前，商业革命尚未发生。会计技术在历史上初为市场行情表上的商务记录，有时也不过是几本贸易活动笔记。开始大多采用罗马数字进行计算，总和常常是有错误的，长除法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怪事，而使用**零数**又是不可理解的。到了12世纪，威尼斯人开始运用精明老练的会计技巧。相比之下，欧洲其他地方的商人在会计知识的无知方面比中学生强不了多少。要认识到保持和流传账簿的需要，还要花大量时间：到17世纪，复式记录才进入规范的商业实践。只有理性地计算资金，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才成功地运行。

涵化（Acculturation）

涵化是一个文化集团在同另一个文化集团接触时接纳它的习惯、特性以及**传统**和**价值**的过程。涵化研究尤其注重移民共同体，重心放在新的不同的文化条件对原来的文化产生的影响上。涵化使政治上的**整合**（integration）更加容易完成。涵化可能不同于**同化**（assimilation），因为后者是单方面的：一个集团使自己的文化适应于另一种文化，而没有发生同一性身分的合并。在涵化尚未完成之前，情感上不忍心同化的个体可能会抵抗，呼吁“民族复兴”：致力于重新激活正在消失的文化。

极点主义/阿克梅派（Acmeism）

极点主义（源出于古希腊语 akme；“顶点”）是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一个诗歌流派，其倡导者是作家古米勒夫和高罗底特

斯基，响应者有艾卡迈托瓦和曼德斯泰。他们的创作主张是：用词语和形象的基本的、本色的和独立的意义来描写日常生活现象，不用隐喻、生涩的造句法或其他的“诗歌创作”形式。他们与**象征主义**写作的神秘主义和色情暗示，以及马雅可夫斯基和**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实验针锋相对。纯化语言、为词语而使用词语的创作理念，一直是诗歌中再三体现出来的特征，尤其在20世纪是如此（例如在艾略特和威廉姆斯的诗作中）。但是，在20世纪初期，以此作为自己创作特征之标志，并且予以命名和提出一套特殊的创作程序与方法的，惟有极点派诗人。从1909到1917年间，他们出版了名为《阿波罗》的杂志，最后被苏联当局以其宣扬颓废和“个人主义”为由而查封，因为**社会主义**要求的是与极点主义迥异的**现实主义**。

参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行为（Action）

我们可以区分某人所做的事（他们的行为）和仅仅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杰纳特推了约翰一把，这是杰纳特的行为，但跌倒却不是约翰的行为。

并非一切肉体运动都是行为。如果别人举手，我也跟着举手，这举手的动作就不是我的行为。仅仅以合适的意图为先导，主体的身体运动才是行为。但是，身体运动要成为行为，仅仅以合适的意图为先导是不够的。设想：医生让我举起近来麻木的手臂，我有意地举起、医生也跟着举起了手臂。我有意举起手臂，手臂起来了，但我的手臂举起却并非我的行为，因为不是我的意图引起了我的身体的运动。当由合适的意图为原因，主体的身体运动才是行为。这是行为因果论的核心命题。

并非一切行为都是身体运动，行为因果论，也可以运用于想象和推理这样的精神行为。只是有一个玩具熊的形象，对于想象一只玩具熊是不够的。如果一种产生幻觉的药物也让我具有一只玩具熊的形象，但我并未想象一只玩具熊，因为我具有一只玩具熊的形象是某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不是我的行为。当我有一个合适的意图在先，这种具有形象才成为我的行为。如果纯粹出于巧合，我有意想象一件玩具，又还没有让产生幻觉的药物发生作用，使我具有一只玩具熊的形象，那么我就没有想象一只玩具熊。当主体合适的意图引起精神事件时，这个事件才是行为。

参见："因果必然论"，"因果论"，"自由与决定论"，"责任和道德幸运"。

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参见抽象表现主义

行动观点（Action perspective）

行动观点是诸如韦伯主义社会学、**符号互动主义**、和**民族方法学**等**社会学**流派所共同采取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社会学家将行动与行为区分开来，因为前者涉及意义或意向，——社会活动的含义取决于谁参与其中。这些学派的社会学家相信社会现实是社会成员有目的、有意义的活动的产物，并且主张，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其所研究的人们赋予其行动的意义，并据此对社会现实做出解释。与此相反的是**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取向，后者强调，社会**结构**较之个体行为更重要，并且试图对社会现实做出因果律的而不是目的论的解释，它认为社会现实是超越于社会结构中的社会个体的，因此，对这一学派而

言，意义在社会学研究中无足轻重。

所有行动理论家都认为解释社会生活的第一步是从人们的意向或目的的角度出发分析问题，不过，关于这一观点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与其他那些诉诸社会结构的解释方式相辅相成，这些社会学家却各持己见。

参见：交换；功能主义；抽象的他者；个别；个人主义；自然主义；现象学社会学；合理选择理论；现实的社会建构；社会事实；社会秩序;社会自发结构主义;结构——动因之争;理解。

现实（Actual）

哲学家区分现实性和可能性，事物的真实存在和可能存在。我留短发，但可以让头发变长而不去理发店。由于现实世界是它可能的状态之一，因为现实世界本身就是可能世界，哲学家们就在现实性和非现实的可能性之间做出区分。

参见："样式"。

适应（Adaptation）

生物学中，适应这个概念（源自于拉丁文 ad 和 aptus，前者意思为"朝向"，后者意思为"适合"）是指生物增强自身能力以适合环境的过程，或者生物性状改变使之更能适合环境变化。在十七、十八世纪，人们观察到，生物能在其自然环境中完好地生长。这些观察常被作为造物主存在的证据。1802 年神学家培利在其著作《自然神学》一书中认为，假如有人在荒滩上发现一只手表，他自然会想到这样复杂的机械定会有一位制作者。培利认为，生物的存在同样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相反，达尔文认为生

物并未被设计得十全十美，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只不过努力生存着而已。

适应是物种通过**自然选择**使自身不断改变，以适合生态**小生境**的过程。所有生物均受到自然选择的作用。由于环境条件不稳定，为了适应环境和更具竞争力，所有物种都须处在持续的生存压力所致的动态平衡状态中。生物的所有遗传特征都受到适应的作用，例如：在实验室里，若细菌在抗菌素的亚致死量而不是抑菌浓度中得以生长的话，这些细菌就能经诱导产生适应性改变，使之产生对抗这种抗菌素耐药性的个体，而这些耐药性细菌比其亲代更具竞争力。

参见：适应辐射；达尔文学说；进化。

适应辐射（Adaptive radiation）

生命科学中，适应辐射是指一个或数个物种通过**适应**作用分化或演化成能适应各种相关生态**小生境**的许多物种。物种通常能适应移植后的新栖息环境，另外，这种适应作用也拓宽了物种广泛的生长环境，使得物种再度适合生长在目前的新环境中。因此，最原始的鸟类通过适应辐射可形成多种鸟类。据化石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始哺乳动物经过适应辐射产生了现今的各类哺乳动物。

参见：进化；同源现象。

附加节奏（Additive rhythm）

附加节奏，被大量用于民间音乐中，在非洲和东欧的民间音乐中尤其突出，并且从 20 世纪开始，它已成为西方音乐会音乐

的标准范式。在音乐中使用非附加节奏或称“分立节奏”（这是西方音乐中最常用的形式）时，其节奏是对一个较大时间单位的二拍的或三拍的划分结果。（例如，一支华尔兹曲的节奏样式的形成，以三个相等的节拍为一组的有规律地重复为基础，其中，主要重音在每一组第一个节拍；在“普通拍子”即 4/4 拍中，主重音落在每四拍中的第一拍。）与此相反，在附加节奏中，节拍、韵律和旋律的节奏是从最小音乐单位的多种组合形式中形成的，而不再是把一个大的时间单位细分为有规律的节拍。

这种聚合过程的结果之一，便是节拍之间不需要等长的音程。尤其是在巴尔干半岛一带的音乐中，节奏和韵律的模式常常是非对称的，包含有两倍于和三倍于基本小单位的不同结合方式。例如，保加利亚的潘都希卡曲（paidushka），包含有五个基本单位，其中有二个重音，比率形式是〔2+3〕；拉柯尼萨曲（rachenitsa）有七个单位〔2+2+3〕，以及干基娄考诺曲（gankino khoro）有十一个单位〔2+2+3+2+2〕。这些不对称模式的还产生出组合，并被描述为“附加步格”。这种模式的典型例子要算是一种十四个单位的重复模进，其功能相当于两个重音 5 单位和 9 单位模式的合成，即〔2+3〕+〔2+2+2+3〕。

附加节奏的听觉效果，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一种有节奏的发狂。训练有素的民间音乐演奏者，觉得它很容易演奏，但是对于接受古典训练的乐器演奏者来说，它会引起麻烦。因此，在西方音乐会传统中，附加节奏乐曲的记谱方式通常带有时常变化的时间记号。例如，斯特拉纹斯基的《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的结束部分《神圣的舞蹈》（Danse Sacrale）中的一个典型的小节模进，它的时间记号是〔2/16+3/16+3/16+2/8+3/16+5/16 等〕，它的意思是，采用 16 音符作为合成曲子的基本单位，构成〔2+3+3+4+3+5〕的模进。在实践中，对这类

问题是不加争论的。例如，管弦乐团在演奏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时，曾对其中的“华尔兹”节奏（非附加的，“分立的”）感到难于演奏，于是便用5拍的小节模进代替了原谱中3拍的小节模进。

阿德勒学说（Adlerian thought），参见个体心理学；自卑情结；男性抗拒力；

管理公则（Administrative doctrines）

管理公则是为管理的“主体、方式与对象”提供特殊法则的观念体系。管理法则的简单例子是这么一种主张：组织内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穿统一制服；必须对年长者保持敬意。

管理公则是日益增长的组织复杂性发展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许多管理公则在农业帝国时代有其历史根源。在当代西方社会文明中，管理公则常常以不同系列分类，以理想化的原型组织如军队、商人、宗教共同体、民主制度的构想为基础。

按照C·胡德和M·杰克逊，管理公则几乎与政治信念、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的关系。如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常常规定了集权化公则，尽管其活动各不相同；保守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可能组织自己的政党，其组织就像家族或真正信徒的教会。

参见：“管理理论”。

管理理论（Administrative theory）

必须把管理理论与**管理公则**区分开来，前者涵盖了更为广泛

更为多样的关于组织、尤其是公共管理应该如何运行的观念。管理理论家对**官僚制度**（bureaucracies）运动及其在社会系统中所起作用提出了解释性和规范性的说明。

古典管理理论强调，应当按照功能和意图原则，并且以促进政治**可辩解性**（accountability）的清楚阶层制组织官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1864—1920年）提出了这种思想，他认为，与传统官僚制、家长官僚制相对立的现代合理官僚制的特征是：官员清楚的阶层分工，聘用与程式的非个人性，形式与档案的连续性，职能专家的优越性。这些特征都保证效力和抑制腐败。

近来的管理理论家，批评古典的韦伯式的管理理论，认为它辩护了“官僚的机械模式”。**马克思主义者**和**精英理论家**坚持认为，韦伯的官僚制是统治的代理，又抑制了社会更彻底的民主化。公共选择批评家认为，古典官僚将要被废置，他们必须服从“最大化预算官僚阶层”的意志；官僚应当接受来自私有部门代理的竞争；公共职能缔约对于保障有效管理是必要的。

组织理论家认为，古典的“线性官僚制”不适合于动荡不定的环境，一种更为特别的专业组织为完成某些管理任务是根本的。

参见：“多元主义”。

广告（Advertising）

广告从本质上被当作一种社会消费的修辞手法，即公开地赞美商品促成公众购买和使用这些商品的办法。广告把许多有用的发明、有益的观念和重要的研究成果推荐给大众，显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若是认为它的功用正在于此，那就是太肤浅了。从理论上说，广告是社会传播的主要载体，如此它就成为许多批评

观念和批评意图的主体。当符号学分析方法被运用于其产品，若干其他“文本”也随之出现，但它与被促销的产品关系不太大(有时还没有关系)。J·威廉姆逊在《解码广告》（1987年）一书中指出，“广告是塑造和反映我们现代生活的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我们与商品互相交换的结构，〔广告〕实在是我们的自我推销”。它说服人们自我认同于消费品，广告销售梦想、理想形象、生活方式与价值。广告永久地推行的消费至上的价值与人类形象都是些简单的陈腐形态，但它又广为传播，无处不在，部分地赋予了它巨大的权力。过去，广告仅仅使人联想到推销商品、技术或某些专业技能；现在，它活跃在像竞选这样的活动中，形成了我们的政治运气（参见公共关系）。

而且还可以说，大众传媒的所有形式的存在都依赖于广告。报纸被挤出商务之外，就因为它对广告商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如1960年英国的《今日信使》就是如此）。广告具有诸种形式，但并不是都直接联系着商品销售，比如政府“广而告之”曰：“香烟有害于健康”。在体育和艺术中，近来的主要发展是得自于赞助。在其表面价值上，赞助似乎是一种有价值的形式，支持文化事业，造福所有的人。但赞助却只不过是间接的广告，这存在着一种危险：这种赞助活动开始依赖于广告，但久而久之会暴露出和反映出他们的商业初衷，或者失去支持。“无条件”提供支持，也许只是一种理想，而不属于商业现实。

广告最普遍的形式是那些以大众消费观众为目标的形式，其中电视因为控制着最大数量的观众而成为最有优势、最有力量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量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质的重要性。有的广告联系着公共关系（PR)，创造和推销（有时是潜意识的）公司形象、个人形象。每个大公司都设立公关部和许多自由人组织，其主要意向就是为公司、个人或政党创造和维持“佳誉”。在更

接近日常生活也并不缺乏力度的层面上，商务与“小型广告”服务于共同体特殊的部门。这些都是整个投资体系的构成部分，不断有免费的报纸涌进西方世界的信箱。

艺术多年来被严肃地当作广告，波普艺术在1960年的运动也许是最明显的佐证。A·沃霍尔的肥皂盒油画已变成了人所共知的神话，实际上成为广为传播的“现代艺术”构想的同义语，具有最高的信念。那些广告公司也不再对其哗众取宠的消费主义兴趣做任何辩解，却总是给它最优秀的实践者以最优厚的奖励，这依赖于那些一贯地为所谓“严肃戏剧”所保留的美学艺术标准。广告已经给电视和电影以优厚的报偿，因为它们将那些为促销商品而发展的许多技巧重新注人媒体而吞噬了其他媒体。只要把它看作是“真正艺术”的贫困远亲，广告就具有许多杰出人物所赞美的独到贡献。比如，英国作家和广播主持人T·K·马丁在1986年爱丁堡电视节的麦克塔伽特讲演中提出以短小的“微型戏剧”作为新的电视形式的想法。这些戏剧，在结构和长度上与商业广告竞争，而且可以多次重复。它们可能“……由一些戏剧片段、经验碎片组成，很快创作很快上演……〔而且〕……有节目正式演播中的‘零度可视性’，作为能提高它们的质量的流程的组成部分”。这些戏剧，仍然存在于未来，尽管有许多更短小的电影被制做出来，录像文化也发展起来形成了与传统戏剧结构的竞争之势。而且，当几年前电视、电影业的作品被许多严肃的演员和导演蔑视为舞台银幕戏剧的可怜的（但也是有用的）替代物，许多著名人物的作品在一周的每个晚上也还是可以看到和听到的。

空气动力学与飞机（Aerodynamics and aircraft）

空气动力学（希腊语，意为对空气的力的研究）是关于运动中的空气或其他气体的研究。空气动力学研究主要用于航空技术，此外也用于研究风力对诸如桥梁、高楼大厦等人工建筑的影响、研究涡轮机内的气流和风力发电机的运行等。

飞行的概念是由达·芬奇首先提出的，他画的草图很像现代直升飞机和悬挂式滑翔机。虽然达·芬奇的想法在他的时代非常先进，它仍注定落空，因为那时人们对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尚一无所知。

飞机的飞行有赖于四种力：推力、阻力、重力和升力。只要推力大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飞机就不会坠落并会向前飞行。推力由引擎产生，而升力则来自飞机的机翼，凭借机翼上下表面的特殊形状和其面对飞行前方的弯曲度，机翼上方的空气压力减小而下方的压力增大，由此产生了升力。推力和升力共同作用克服了重力，因此使飞行成为可能。

最早的人类飞行，并非依靠飞机，而是气球，首次气球飞行是由蒙戈尔费埃兄弟在 1783 年进行的。最早人们用来填充气球的气体是氢气，因为它是已知的最轻的气体，后来，人们发现热空气较轻，而现在用的最多的则是氦气。芒氏兄弟的飞行拉开了人类飞行竞赛的序幕，其他人，如利林塔尔，他制作滑翔机并进行了滑翔飞行，尝试了最初的动力飞行，而动力飞行的成功，则是由赖特兄弟于 1903 年在北加州的基蒂霍克地方实现的（飞行仅仅持续了 12 秒）。

飞机在其发明之初的 30 年中一直处于幼稚状态，未取得重大的发展。那时尚无一种使用优质、经济的燃料的轻便、可靠的

引擎，此外，也没有一种实用的高强度的轻型飞机结构材料。在此期间，飞机的用途越来越广泛，从邮政到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于侦察，它也被用于娱乐，飞行员热衷于长途飞行以获得巨额奖励。1927年，林德伯格单人驾机飞越大西洋，被视为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这次飞行为长途客货运输奠定了基础。

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飞机的发展水平使人们认为其主要作用是用于战争，随着第一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在1923年的建立，飞机的商业作用也得以发展。飞机的推进器仍然像最初那样是由活塞引擎驱动的，直到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喷气推动被首次用于军用飞机。商用飞机继续使用涡轮机驱动的推进器，直到1949年才有了第一架喷气式商用飞机哈维兰彗星号，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旅行方式，世界变得更小了。

参见：**喷气发动机**。

审美判断（Aesthetic judgements）

审美判断（来自希腊文 aisthanein，意为“感知”，“感觉”）是关于审美状态或审美客体、关于它们的美与丑的判断。“米开朗其罗的大卫”是美的，这是一个审美判断，关于艺术品的审美判断。“洛机山脉是丑的”，这是一个关于并非艺术作品的自然物的审美判断。

哲学家尤为感兴趣的审美问题包括：美的性质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客体之美丑独立于心灵和心灵做出的判断吗？客体之美丑仅仅是因为心灵对它们的美丑判断吗？

参见：“美学”。

唯美主义（Aestheticism）

唯美主义是一个盛行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的短暂的英国艺术流派。它主张：艺术作品应该只为自身的缘故而存在，而不应有外在的关涉或意义，正如唯美主义者领袖佩特所提出的："为艺术而追求美，为艺术而热爱艺术"。唯美主义者追想**拉斐尔前派**在绘画和写作中体现的美的理想，他们也欣赏当时法国**前卫派**的矫揉雕琢的风格和放纵的作风。也许，唯美主义最著名的实践者，要算是比尔兹利和绿色——粉红色时期的王尔德。对此运动表示赞赏的则有史文本恩、叶芝和比尔博姆。唯美主义流派，在当时受到人们的嘲讽（例如吉尔伯特和莎利文在《忍耐》杂志上的讥讽文章），并曾经被当作前卫派艺术家的（准确或不准确的）因袭观念提供给门外汉和喜剧演员们，唯美主义者被看作是颓废的、傲慢的和浮夸的骗子。

美学（Aesthetics）

美学（源出于古希腊语aisthesis，意为"由感官获得的知觉"）是一门哲学的和批评的学科。它的目的是为美和**趣味**两个概念下定义。这种努力本身是很古老的——最早记载下来的对美的本质的讨论，出现于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公元前14世纪）中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之间的讨论。但是，这一术语（美学）本身则是由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首次提出的，并由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1790年）中加以发展。康德认为：审美鉴赏使人类本性中的理论与实践的二重分离获得勾通，从而确立了这样的思想，即美是一种深刻的主体性，而不必然地内在

于艺术作品中。从那以后，美学被认为是哲学的一个主要分支。

有许多活动被描述为“艺术”（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等），从这一前提出发，哲学家们询问：是否存在一个关于“艺术”的定义，能使我们发现什么是它们所共同具有的特性。人们不能说一件艺术作品是一个美的“东西”，因为在大自然中有许多美的东西，它们并非是艺术作品。但是，人们能说一件艺术作品是一件美的人工制品吗？也不行，因为一些艺术作品似乎不是“美的”，而是“丑的”。

艺术能够按照它的特征或功能来获得标识吗？有的艺术是再现性的：小说以及某些绘画再现真实的或仅是想象中的事物的状态。但是，音乐和抽象绘画似乎不是再现性的。报纸再现现实世界，却并非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可以说是表现作者情感的。然而，这充其量是人工制品成为艺术品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说话和写作，常常都是对情感的表现，却并非就是艺术作品。或许，艺术的特性，便是它缺乏外在的特点或功能。可以这么说，艺术，只是为艺术而艺术。

什么是艺术的本体？艺术作品是一种物理客体吗？或者它们是另外不同的东西？艺术的丰富性再次拒绝一种简单的答案。一幅画或一件雕塑可以说是一个物理客体。但是，一部小说则不是任何特定的手稿或手稿的复制品，如果一部小说的所有原始版本都被毁掉了，只要还有原始版本的复制品，那么，这部小说就仍然存在。还有，戏剧的演出和剧本、配乐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进一步的问题，关系到审美价值是客观性的或是主观性的。事物的美或丑是客观的呢？还是仅存在于观赏者的眼里？（请注意下述两种观点的区别：即认为审美价值是客观的和认为存在着对审美价值的一致判断。一幅画可以是客观地丑的，即使是某些

人认为它之所以丑，是由于它使人受到惊骇。同样，出于社会原因，人们可能一致认为一件雕塑是美的，即使是它的美是一个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事实。）

审美判断仅仅是一个关于趣味的问题吗？当你说一幅画是美的而我说它是丑的，这意味着在我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意见分歧吗？或者，你只不过是说你喜欢它，而我也只不过是说我不喜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出于我们自己个别的喜好而已？某一事物是美的，是否仅仅由于它往往能使与它相遇的心灵产生某种情感上的反应？或者是，美是某种对这类反应做出回报的东西？

参见：为艺术而艺术；表演艺术；附加属性。

病原学（Aetiology）

病原学（源自于希腊文 aitia，意思为“原因”＋学）是研究疾病原因的科学。在公元前7世纪由希波克拉底创立。希波克拉底认为：疾病的发生并不是诸神的意旨，而是受地上自然因素影响的结果。几百年后，希腊医师、哲学家盖仑把疾病的发生归因于人体内四种维持生命的**体液**（即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平衡失调。然而，由于许多疾病病原不能被肉眼所见，因此在一些先进技术（如显微技术）发明之前，以及对**遗传学**原理深入了解以前，病原学的发展受到阻碍。然而，将病因与病理变化联系起来的观察性研究却时有发生，例如，古代埃及人认识到血尿与寄居在血液中的寄生虫有关，因而，“强壮的体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预防疾病起着重要作用。现代病原学研究包括对所有疾病（遗传病、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以及由环境因素、病原体和营养不良所致疾病）的研究，以及对易感者体内

不同疾病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对社区中疾病行为的研究称为流行病学）。

情感谬误说（Affective fallacy）

在文学批评中，情感谬误说认为，文学作品不是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结构而阅读，而是被按照它们对读者的情感或其他方面的影响来阅读。换句话说，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是带有成见的——我们的文化的、情感的和语言的储备，以及有关社会和作者的上述方面的体认，这些成见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作品文本的“意义”的组成部分，并且不能把它们从我们对文本的感知中分解出来。与此相反，“非情感”阅读排除所有上述的外在联系，而只专注于真正存在于文本中的东西。

赞助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赞助性行动的出现，最初是作为一种自愿实践的代码，后来体现在 1964 年通过的“美国人权法案”之中。这个法案规定了许多方法，保证来自从前受到歧视的集团的个人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后来，世界各地广为采纳赞助性行动计划，尤其是反对以种族、性别、宗教、民族渊源、年龄、生理缺陷和性别取向为基础的歧视。

弱赞助性行动意味着，当所有的候选人资质均等时，优先雇佣和提拔来自弱势集团的候选人。赞助性行动的其他形式包括“拓宽计划”，鼓励人们申请具有某种特征的人无法正式申请的工作，合理配置劳动力结构，以保证公平就业。最强的赞助性行动的形式包括确立目标，以保证组织中就业结构的更合理平衡状

态。

赞助性行动的支持者主张，这是一种公正的政策，因为（1）它以牺牲不公正的利益而补偿了不公正的受害者；（2）它从最好到最坏进行了重新分配；（3）它在社会上是有用的，因为它避免了在歧视社会造成的不能实用的能力浪费，创造了一个更公正、因而更稳定的社会。他们常常认为，政府有必要干预，反对各种形式的存在于现代国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里的种族、宗教、民族与性别歧视。赞助性行动的批评者宣称，它最后翻转了歧视，它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由组织建立的"分裂配置"。这些人相信，偏重少数民族和女性而进行"优先录用"的政策：（1）歧视了那些没有受到歧视的人；（2）取消了偏爱不自由和布道的（种族、宗教、伦理和性别）标准的优势原则；（3）唤起了先前占优势的人之间的反叛。赞助性行动的批评者似乎相信：自由市场的社会，自然会消除不公正的歧视。

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

富裕社会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1945年以后的民主福利资本主义社会，加拿大经济学家伽尔布莱斯最先使用了这一概念。他论证说，西方民主长期谋求的经济增长的后果是"私人富有"与"公共贫困"的同时发展。一方面是非常有效地刺激了对私人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包括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又倾向于低额提供公共消费，如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公共交通。

伽尔布莱斯后来又修正了这一论证：因为现代自由民主制包括了富足的多数，他们都有避免贫困的技巧与资源，因而，一种"安身立命的文化"（Culture of Contentment）对立于积极参与和

渐进再分配的大政府而发展起来。一方面，在早期选举民主制度中，穷人构成了（潜在的）选举大多数，富裕自足的社会可能满足于减税的保守政府。

非洲主义（泛非洲主义）(africanism，Pan－africanism)

非洲主义是意识形态的信念，它主张非洲大陆的土著民族都属于一个单一的种族，具有同一的民族性。以此为广泛的政治文化运动的首要原则，致力于提高全世界的非洲人的福祉。在非洲人的离散居住中，非洲主义在历史上是一种与**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相对立的诉求，在美国和加勒比海诸岛的奴隶及其后裔之间唤起了“回到非洲”运动。

泛非洲主义是一个以建立统一的非洲国家为目标的运动。受牙买加的马库斯·伽尔维（1887—1940 年）的流行修辞学的影响，也受到美国 W·E·B 博伊斯（1868—1963 年）的最有智慧的作品的影响，泛非洲主义成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殖民独立运动的支柱。由加纳的恩克卢玛领导的“卡桑布兰卡组织”热切的支持，泛非主义统一非洲国家的理想广为传播，但也受到了塞拉西的蒙罗维亚组织（Haile Selassie's Monrovia Grope）的抵制，他们强调的是独立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合作。创建于 1963 年的非洲统一组织代表了更为温和的蒙罗维亚组织目标在制度上的成功。今天，泛非主义的抱负却很少获得公众与政府的支持。

参见：“民族主义”，“黑人立场”。

攻击行为 (Aggression)

生命科学家用“攻击行为”（拉丁文意思为“攻击、袭击”）

一词，来描述一个动物对另一个动物的足以引起伤害或退避的行为。不过，对攻击行为的界定很难做到切实可行。例如，哺食行为有时不属于攻击行为，但动物为某些需要（如地域、食物或配偶）发生争夺时，就可能产生攻击行为。攻击行为在哺乳动物中的研究最为详尽。哺乳动物的攻击行为，可分为攻击和防御两种方式，在某种动物身上两种方式都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攻击反应需要与另一个体的反应相互影响，且随之产生的攻击行为的发展过程也可因对方的反应而改变。因此，攻击行为能导致屈从反应，如喉部暴露，而这一反应又能阻止攻击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当攻击行为发生在同种动物或同一社会团体的个体间时，在这种情况下，单独的个体常会在暴力出现以前退缩。但是，动物种群间的攻击行为却可导致暴力，如果发动这种行为的攻势足够强大，攻击行为甚至可导致死亡。

参见：动物行为学；拟态。

不可知论（Agnosticism）

不可知论（希腊语指“不可知的”），在宗教术语里是这样一种观点：赞成上帝存在的证据和反对上帝存在的证据是均衡的，人的理解力很有限，以致无法形成任何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判断。尽管这个术语实际上是赫胥黎在19世纪创造的，但正是康德早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里，最大限度地展开了上述命题。他在这部论著中阐述道：人类不断受到诱惑，把既可理解的、又是必需的概念用于正常的推理；在思辩的进行远远超过了人的经验的地方，他们自我欺骗地认为他们能获得真实的洞见。19世纪的不可知论者如米尔、斯蒂芬，把这种论点附带地用于有关神学问题的科学方法中。

农业社会（Agrarian society）

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农业社会一方面对立于狩猎/采撷社会，另一方面又对立于工业社会。大多数人口直接从事粮食的系统生产和贮藏，农业的商品化最低限度的发展，就是农业社会的特征。尽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社会尤其在宗教文化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它们都共同具有的是压迫和剥削的统治形式，以及以等级为基础的贵族制度。因为这些理由，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社会具有敌对于民主、民族主义和平等——即大多数工业社会的显著的决定性特征——的气氛。

炼丹术（Alchemy）

炼丹术（阿拉伯语 al－kimia，意为“埃及人的艺术”）是研究事物的一种形式，它产生于古代中国，并在亚洲、中东地区和欧洲获得广泛的实践，延续了几千年，直到大约 400 年前才被现代科学所取代。炼丹术的产生，源出于下述观念的某种暗示：地球上的所有物质，都是由四种基本元素混合构成的，它们是气、土、火和水。炼丹术士们相信，如果他们能发现这些元素在事物中的混合比例，他们就会改变比例而改变事物的本质，从而创造或再创造出适合于自己需要的事物。

许多世纪里，有四种追求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炼丹术士探求着“长生不老药”（一种使必死的躯体永生的药）、“万灵丹”（能治好所有疾病的药）、“哲学家的石头”（它能使贱金属变成金子）和“万能溶剂”（它能熔化创造中的任何其他东西，这不仅在炼丹术士的实验中有用，而且对于战争也是极有用的）。为了发现

这些东西，炼丹术士们对于他们所能掌握的每一种物质进行各种加热、煅打、混合和测试的实验，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今天在**化学**中仍然有效的发现。

经过了许多年后，四种追求的全部失败，导致一些炼丹术士在他们的实验中增加了绝望的**巫术**。他们使用的咒符和咒语，使旁观者相信他们是在和撒旦相勾结，从而使炼丹术声名狼藉。1661年，玻意耳出版了《怀疑的化学家》，首次对真正的元素、化合物和混合物进行了区分，并对四种基础“元素”的观念给予极度的蔑视，从而宣告了炼丹术的终结。

偶然艺术〔Aleatory（or aleatoric）〕

偶然艺术（源于拉丁词 aleae，意为“骰子”）是一种可应用于任何艺术种类的附属性艺术形式。在这种艺术中，偶然性成为构成作品的有机因素——尽管这也包括“完成了的”艺术在内。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达达派**艺术家阿尔普制作的报纸拼贴作品，它的构成依赖于他把报纸碎片从上方向底层报纸的无规律的掷落；同样，30年代的德国雕塑家施维特斯用他偶然碰见的随便什么东西，做成了作品“垃圾房”。

偶然艺术的技巧，主要应用于**表演艺术**中，尤其是**音乐**中。在艺术音乐领域，20世纪的著名作曲家如波利兹、李吉蒂、鲁托斯劳斯基以及斯托克豪森，把偶然艺术技巧当作一种可全盘接受的构成作品整体所需要的有机因素。在偶然音乐中，演奏者被鼓励去挑选组合运动的序列、部分或个别的和弦和音符，或者是在作曲家暗示的样式或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即兴演奏，例如，在李吉蒂的《偶发事件》中，是按字母的拼写顺序去演奏；在鲁托斯劳斯基的《前奏曲和赋格》（Preludes and Fugue）中，是按一系

列的线形、正方形和三角形去演奏。这样，同一支曲子从一个演奏者那里到另一个，从一次演奏到另一次，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偶然音乐，在观念上相似于远东艺术音乐以及**爵士乐**和**摇滚乐**，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它们都把**即兴创作**作为表演的特征。

偶然艺术的程序，已被用于**戏剧**和**诗歌**的朗诵；不过尚无明显迹象表明它们已发展到超出实验的阶段。

代数（Algebra）

语词“代数”的原始意义是通过数学的演算来解决简单方程的问题（具有现在称之为线性方程的形式，其中只有未知数出现而不是它们的平方或立方或其他次幂）。它是由阿拉伯人发明的，并且这个词本身是名字 AL Jabr（杰伯尔）的误用而产生的。杰伯尔是 8 世纪阿拉伯的一位数学家，他的著作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代数著作。在此意义上，代数的目的，总是通过在一方程系统内的算术运算，去发现通常以“x”标示的未知数。未知数被认为是一个能立即满足方程的数（这就是为什么这类系统常被称为联立方程的缘故）。

代数之能获得发展，缘于运算的简化。这种简化是由从属于**数系**的位数的发展和印度数学家们引入**零**这个数而引起的。从这一起点始，代数发生了两大转变。

第一种被称为线性代数，是关于比上面介绍的具有更高普遍性的线性方程系统的研究。其目的是要说明，当方程系统有解时，如果确有的话，那么这解是惟一性的。这与**笛卡尔坐标系**中的**矢量**概念密切相关，并导致矢量**空间**和矢量**维度**概念的公式化。这一领域的理论，大部分都已与**解析**和**拓扑学**联在一起。在此背景中，它被称为函数解析，并已被证明是一种对量子力学作

数学描述的简单方法。在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线性变换，一种保留加法的函数（在 $f(a+b)=f(a)+f(b)$ 的意义上）（见**线性**）。

第二个领域更为复杂，一般称之为抽象代数，尽管公理代数可能是更合适的名称。在此领域里，用于线性代数中解方程的数的属性，被当作公理（见**公理化**）来对待，而对这些公理系统的属性进行研究。乘法的交换性，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即对任何二个数 $ab=ba$；也可以对具有交换运算的所有数学结构的一般属性进行研究。这种代数的不同分支，通常以所用的公理系统命名；于是，我们有群论、环论和域论（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分别是**群**、**环**和**域**）。这种代数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同态，与线性代数中的线性变换相似。同态是从一个群、环或域到另外一个的函数，它以与线性变换中保留加法相同的方式保留运算的属性。一个相关的新的研究分支，是**范畴论**，它更为一般地考察这些代数对象的属性；它的研究对象是集（群或环都是一种集）和函子——同一集中的元之间的同态。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非常有用。但是，由于其极端的一般性，它又是数学上特别困难的领域。

代数在数学中很重要，因为它的应用已引起许多其他学科领域的革命。例如，下述几个数学分支，便得力于在另外背景中的代数应用：像代数拓扑、代数**几何**学以及代数**数论**。代数把标准记号法引入许多其他问题中，这样，便使数学各分支间的相似性显现出来，一种使寻找问题的解变得极为便易的过程。因此，它的重要性根植于它在数学其他领域中的应用。

代数几何（Algebraic geometry）

这一**数学**领域是笛卡尔（1596—1650 年）创立的，**笛卡尔坐标系**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从那以后，代数几何虽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其基础，仍然是坐标系统，它的重要性体现于三个主要领域。

首先，代数几何证明：**代数**和**几何**这两门曾被认为似乎是不相干的数学分支，具有内在的关联。代数中的方程，定义着坐标系中相应维度的曲线。例如，线性方程 $y = 3x + 2$ 定义着这样的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具有坐标 $(x, 3x + 2)$，这表明它是一条直线（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方程被叫做线性的）。更复杂的方程，给出更复杂的曲线；方程 $x^2 + y^2 = 1$，给出以坐标原点为中心半径为 1 的圆。这种关联导致**函数**观念的公式化，函数（在其原始形式上）即一具体图形上的任一点在坐标系中的坐标 x 和 y 之间的代数关系。

其次，在笛卡尔坐标系中，**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定理，可以用代数的方法掌握（原始的古希腊证明方法不允许这样做）；因此，这表明欧氏几何是自我相容的，即不存在矛盾命题，假定算术相反也是相容的。然而，这并非同时也就证明欧氏几何是真的；还有一种与其平等的**非欧几何**的坐标系（因为它是弯曲的，而宇宙也是弯曲的，所以，现在它被认为是对宇宙的更真实的反映）。例如，地球表面的经纬度系统，是一个坐标系（只有极地没有严格定义的坐标），然而欧氏几何定理在这个坐标系中是不真实的，例如，三角形的三角总和大于二直角之和（把一个角放在北极，另两个角置于赤道，则这两个角都是直角）。再如，用代数坐标测量直线的长度，这极易做的事，后来**伽罗瓦理论**证明

用欧氏几何是做不到的。

代数几何的首要重要性，是它以这种方式清楚地证明了如下事实，即记号的清晰性对于数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参见：象征主义。

代数数（Algebraic numbers）

在数的发展中，概括地说代数数产生于**有理数**和**实数**之间。一个有理数，是能以 P/q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数，其中 p 和 q 是**整数**并且 q 不能是零。古希腊人发现了一个（对他们来说）惊人的事实，即并非所有的数都是有理数。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反证法**技术的杰出应用而得到的。假设存在一平方为 2 的有理数，它能被写作为没有公约数的 p/q 形式（这意味着 p 和 q 没有共同因子）。这样，$(p/q)^2 = p^2/q^2 = 2$。因此，$p^2 = 2\times q^2$，如此，2 能除尽 p^2 并因而能除尽 p（因为 2 是一个**素数**）。于是我们可以把 p 写作 $2\times r$，并把原等式写为 $(2\times r)^2 = 4\times r^2 = 2\times q^2$。这样，把等式两边除以 2 便得到 $2\times r^2 = q^2$，这意味着 2 也可以除尽 q。这样 2 可以同时除尽 p 和 q，这便与 p/q 是没有公约数的形式相矛盾。因此，原初的假定命题 2 的平方根是有理数必然是假的。

这一事实的发现，使古希腊人极其沮丧，因为它否定了他们原有的数应当像什么样的全部观念。他们实际上放弃了整个学科。直到 16 世纪，西方数学家们才认识到，有理数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下一步是建构代数数。有这样的数，它们是系数为整数的**多项式**方程的解。例如，2 的平方根是方程 $x^2 - 2 = 0$ 的解，或者是方程 $ax^2 + c = 0$，当系数 $a = 1$ 且 $c = -2$ 时的解。可是，并非所有这类方程都有解。例如方程 $x^2 + 1 = 0$ 便无解，理由很简单：x^2 总是正数，因此 $x^2 + 1$ 必须总是大于 0。一个多项式所必须具有的关键属性是其

符号的变化性。它会给出一个解，是介于它有正值时的一点和它有负值时的一点之间的（例如，x^2-2 当 $x=1$ 时它的值是 -1，而当 $x=2$ 时它的值是 2，因此，它有一个解在 1 和 2 之间。）

即使这样也还不是故事的结束。当利欧维勒（1809—1882 年）发现了何时一个数是代数数的标准时，（基于这个数如何快速地能被一特殊有理数序列逼近），这便很明显了。运用这一标准，他于 1884 年第一次构造出了著名的超越（非代数的）数。大约 30 年后人们才明白，任何有用的数（即不是为某一目的而特别构造的数）都是超越的。赫米特（1822—1901 年）于 1873 年证明 e（圆锥曲线的离心率）是超越数。几乎紧接着，康托尔（1845—1918 年）用他的新**集合论**证明，存在有比代数数多得多的超越数；并且代数数是可数的（即属于最小的无限大），但实数是不可数的。它遗留下来一个很难证明的属性；对于数学中通常使用的数，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否是代数数。

算法（Algorithm）

在**计算**中，算法（出自于阿库维兹米（ALKwarizmi）——9 世纪的波斯数学家——的名字的拉丁化形式）是决定如何完成任务的一套规则。下面是制作一块乳酪三名治的算法的例子：（1）打开冰箱；（2）从顶端第二层取出乳酪；（3）剥掉乳酪的包装并把它放在案板上；（4）用快刀切下四片 0.5cm 厚的乳酪；（5）在两片面包的每一面涂上黄油；（6）把乳酪片放在一片面包的有黄油的那面上；（7）在上面放上第二片面包，有黄油的那面朝下。

大多数算法，都远比这个例子复杂。计算机被输入程序后完成的任何工作，都必须事先被还原为一定的算法。算法规定着计

算机活动的范围和边界。看到很多活动能被还原为算法，这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一些更没预料到的活动包括学习、玩游戏，甚至于在某些限定的情况下构造算法，都可以还原为算法。

异化（Alienation）

在社会学中，异化（源于拉丁文 alienus，意为局外人）指人们觉得其对自身能力的控制权被外在力量褫夺的境况。异化原本具有哲学和宗教学的含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年）用这个词表示独立于人类自身的诸神和上帝力量的确立，马克思最初是用这个词表示人类将其自身力量投射为神圣存在，后来则将异化一词用于劳动经验而将之转变为一个社会学概念。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种最重要的人类活动，因为人类通过劳动才体验到其自身的个性和创造性，但被异化的劳动者却发现其工作既不称心又无回报，劳动丧失了创造性价值。然而，异化劳动不只是让人感到厌倦而已，异化指劳动者的无力状态，他无力控制其工作的性质和其劳动的成果——因此，这个词蕴涵了一系列特殊的社会关系。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中，虽然劳动又累又苦，但劳动者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仍拥有对其日常劳动的支配权，相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工人对其劳动境遇的支配权则几乎丧失殆尽。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必定会导致高度的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极少数的人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不拥有生产的工具，只拥有极少的产品，生产活动针对的只是一个抽象的市场，而不是为了自己或每个具体的消费者。在此情况下，异化程度被机器化生产和高度的**劳动分工**（将一种工作分解为简单的组成要素）进一步强化了，与手工工人和前工业社会不同，工业社会的工人每个人不再生产一个完整的产品，相

反，产品被肢解，每个人仅仅制作其一个片断，劳动于是成了例行公事，许多技艺就这样被遗忘了。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不仅被从其工作和产品异化了，而且还与他们自身异化了，并最终与别人也相互异化了。马克思认为，被异化了的劳动者不可能通过劳动得以自我表现，这导致与自身的疏离，并且，由于劳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与劳动本身的异化必然导致与他人的异化，最终，工人与其同伴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

异化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就像**失范**概念一样，成为一个将个体行为联系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进行解释的概念。在马克思之后，异化一词被用来描述广泛的社会现象。20 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强调了异化一词主观方面的含义，他们将异化等同于人们心中对生活的不满情绪，这导致异化概念的含义远远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最近，有人指出，马克思在其后期著作中抛弃了这一概念，而更乐于使用剥削概念，因此，有人主张没有必要继续使用这个概念。

异化概念（Verfremdung）（译者按：又译“疏离化”、“陌生化”）被剧作家布莱希特（1898—1956 年）用于**戏剧艺术**中，用来意指他希望通过其**史诗戏剧**手法取得的戏剧效果。一般地说，用陌生化手法制作的戏剧在许多表现手法上都与**自然主义**的戏剧不同，布莱希特希望观众面对舞台上的表演能获得批评和反思的距离，而不是一味陶醉于戏剧造成的假象中，他的目的是藉此唤醒人们对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政治）结构和过程的认知，这些结构和过程平时总是被**意识形态**所掩盖。布莱希特认为这样一种“陌生化效果”发生于——例如——有人看到他的老师被地主家的管家驱逐之时，也就是说，一个平时高高在上的人突然陷入一种完全不同的境遇中。

尽管有些戏剧工作者误用了布莱希特式的戏剧辅助手段（如可视的发光道具），这些手段是为了面对一系列具体的戏剧状态取得距离感，因为布莱希特的表现手法适用于所有情境，这并未贬低其变熟悉为陌生这一根本原则的重要性，而这些手段仅仅是为了实现这一原则的创作手法而已，这一理论的关键点是：陌生化意味着历史化，意味着再现人物与事件的历史性，因此也就是意味着揭示人物与事件的可变性。

不幸的是，像其著作中的其他概念一样，布莱希特这个本来并不深奥的概念却由于被不加区分地用于美学与政治、由于一词多译而变得纠缠不清。布莱希特的术语 Verfremdung 和 Verfremdungseffet（e）有时被译为异化（Alienation）和异化效果（Alienation Effect），有时又被译为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间离（Estrangement）、疏远化（Distancing）、距离化（Distanciation）和 A 效果（A－effect）、E 效果（E－效果）、V 效果（V－effect）等。用“异化”（alineation）一词翻译德语的 Verfremdung 容易导致与马克思的“异化”（alienation）（德语是 Entfremdung）相混淆。虽然两种类型的“异化”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而且布莱希特的理论常常倾向于揭示导致社会和政治异化的因素，布莱希特的反对者和那些混淆了异化的两种意义的人有时将布莱希特的异化理解为对观众和读者的疏远（即置之不理）。布莱希特的 Verfremdung 显然类似于与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的 ostranenie（“新奇化”或曰“陌生化”），后者是**形式主义**的中心概念。

参见：资产阶级；资本；阶级；冲突理论；资产阶级化问题；劳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职业；组织；理性化；社会分层；结构；工作。

寓意（Allegory）

寓意（古希腊语，意为“以另一种方式提出”）是一种广泛地运用于**美术**（特别是西方的**叙事绘画**）和**文学**中的表现技巧。在**叙事绘画**中，寓意手法，内含着一种表达隐蔽的意义或解释的工具作用。例如，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裸体画的“真正意义”，可能不是性感愉悦而是真理的人格化体现。呈现于**历史绘画**中的**寓言与神话**，以及宗教绘画中的教义比喻，都是寓意表现的明显例子，除非理解它的寓意，否则画的“意义”将会完全丧失。从中世纪**七大死罪**的描画到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作为自由象征中的半裸妇女，以及常见于政治漫画中我们的领导人成为的蛇、昆虫、狮子、老鼠和其他动物，这种表现方式，普遍地贯穿于西方叙事绘画的历史。其他类型的寓意，更为隐秘，并需要一套更复杂的参照系统来解释。例如，“在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这种故事的呈现是寓意式的，因为他必须在崎岖的美德小路和宽阔平坦的邪恶大道之间做出选择，而每一条路，都由一个充满诱惑的女人作向导。在绘画中，寓意并非是一种类型，甚至它本身也是一种叙事。它依赖于观看者对绘画手段的解释能力，诸如抽象概念的似人化（如善和恶化做人的形象）或是惯例与象征的运用（如，蚂蚁相对于勤劳或百合花相对于纯洁）。

西方艺术中，有三种特别受人喜爱的寓意资源，它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或许它是寓意手法的起源，因为它是以变或诸如树、岩石等物体的人构成的故事）、《圣经》以及各种游侠骑士的史诗和寓言（诸如关于乔治、撒旦以及圣杯等的传说）——它们是中世纪欧洲传奇文学的主要内容。随着**现代主义**的登场，虽

然二十世纪的艺术家们已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象征图像（例如，齐瑞珂和达利的风景画，以及米罗的长耳朵的梯子），它们和过去绘画中的那些寓意意象一样地丰富和复杂，但寓意却已基本上从艺术中消失了。

在文学中，寓意是这样一种手法，即以一类事件或符号的描写代表另一类。例如，班杨在《天路历程》中以对实际的旅行和冒险过程的描写，象征着基督徒灵魂的游历和试探；在赛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考菲尔德对纽约弱点的探究方式，意指着从青春的希望和焦虑中显露出成人的敏感。

寓意是**反讽**的一种形式，其中被赋予的意义，通常比借以展示意义所直接描写的事件更为重要。在中世纪欧洲，宗教寓意是极为流行的，爱情故事、自然描写及英雄冒险传奇都被寓意化而具有一种更深的基督教意义。帕西法尔和圣杯的传奇故事便是典型的例子。故事中，骑士代表被围困的基督的灵魂，龙和巫师代表撒旦和他的奴仆，而目标物的寻获则意味着基督的改变形象和升入天堂。

寓意也可以是哲学的和政治的。哲学寓意在不同的作品中是不一样的，如维吉尔的《埃涅伊特记》、斯宾塞的《仙后》、伏尔泰的《老实人》、加缪的《鼠疫》以及哥尔丁的《蝇王》（一群被放逐到荒岛上的社会堕落男孩，寄寓着作者认为人性中固有的邪恶观念）。政治寓意的作品，像阿里斯托芬的《骑士》（其中两个奴隶在讨好主人上的竞争，代表着政治家们对地位的追求），乔叟的《鸟国议会》、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1979 年考普拉把它改编成反战寓意的电影《现代启示录》）、米勒的《熔炉》（其中 17 世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对巫师的搜捕，象征着 20 世纪 50 年代麦卡锡政府的反共听讯）、以及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其中农场围院里的权力斗争代表着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源起）。

在西方之外，寓意手法的运用较为隐蔽。例如，在波斯和阿拉伯文学，常用美丽花园的意象比喻哲学秩序和灵魂的安宁。日本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的部分内容，是一种政治寓意，苏非派传教士用轶事趣闻（类似于《伊索寓言》），比喻人类面临的宗教、社会和道德问题，以及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

参见：隐喻；象征主义。

变异的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变异的意识状态是一个用来描述超乎日常经验的肉体和心理状态的术语。在许多社会中，这种状态的发生与秘术、狂欢和迷狂相关。现代心理学将此种变化的起因归于心理，而有些文化则将之归因于外在世界的改变，如与精神王国或超人力量的沟通，迷狂状态取决于处于变异状态的个体与精神王国之间的交感的程度。据说，置身此境的人们完全将自己交由精灵支配，其肉体成为精灵呈现自身的载体。在萨满教中，精灵或精灵界被萨满驯服，他利用其与灵界的关系为改变日常生活效力。

“萨满”（shaman）一词源于西伯里亚，在那里它是指一种宗教术士。在亚洲各地和其他一些文化中都能发现萨满的踪迹。他们常常是依靠有节奏的击鼓声进入变异的意识状态，藉以与精灵世界沟通。由于其与灵界沟通的能力，萨满和其他有些宗教术士一样，在其社会中常常是被当成强有力的人物，并担负思考人类福祉的重任。由于萨满释放出的力量往往被认为具有危险性，因此，他们有时会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排斥。

人类学家们发现，边缘社会的弱势群体往往通过过渡状态获得力量，通神秘仪和宗教狂欢仪式的参与者通常多来自于边缘性的社会群体，“迷狂”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出离（出神）”，藉

以沉思他们孜孜以求的超越于世俗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

致幻类药物——如佩奥特仙人掌——常被用来获致迷狂状态，藉以进入超凡脱俗的精神王国，这一习俗在20世纪60年代被人类学家卡斯坦纳达（Charles Castaneda）公之于世，他对一位墨西哥雅基族印第安人萨满的入会仪式进行了人类学调查，不过，他的这一研究的可靠性现在已受到了质疑。

参见：本土形而上学。

可替代能源（Alternative energy）

最近30年，人们已经认识到必须充分利用燃油能源，以节省资金和矿物资源，随着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节省财力，各国政府以及个人的观念都开始发生转变。

近期以来，西方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石油、天然气、煤和核能，由于这些能源的有限性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研究被用于可替代能源项目上。

太阳能有多种利用途径。可以直接利用太阳对水或空间进行加热，太阳能导致作物生长，而这些作物又可以用来转变为别的类型的能量，可以利用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电能。应用太阳能收集器的太阳能系统只能用于气候温暖和光照充足的农村。太阳能电站已经建成了几座，著名的如法国南部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阳能电站（加利福尼亚的“太阳1号”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站，其最大发电量是10兆瓦。）

北欧国家将太阳能的充分利用作为一项重要的措施，它们巧妙地设计房屋的结构和形式以保证内部环境的舒适，为了节约能源，房屋的结构设计通常考虑到太阳能的利用，如购物中心常常有玻璃顶的中心天井。

由于太阳是目前已知所有能量（除了核聚变能）的惟一来源，因此应该认真考虑太阳能的开发利用问题，另一种直接源于太阳的能量是风能，驱使气流运动的是太阳辐射所导致的大气和地球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高空风的特性完全取决于这种辐射。在靠近地面的几百公尺内，空气运动变化无常，被称为边界层或混合层，风力涡轮机主要工作于边界层中，在安装风力涡轮机时应保证充分捕获风能。许多环境主义者反对在山顶上建立风力发电场，他们称这样做为了获取能量而破坏了大自然的美景。

波能可以避免破坏自然景色，因为波能发电机需安装在远离海岸的海中。波能和风能的优点是其天然的季节性恰与人类能量需求的季节性合拍。风能和波能的最大缺点是发电机无法对风能和波能做到完全的控制。

水电站和潮汐电站是对水力的利用。典型的水电站都有一座建于河流或湖泊上的堤坝，形成水库，以提供驱动涡轮机运转的稳定的水流。在电力消耗变动不定的地方，可能会建造泵站，以便在发电量高峰期用过剩的电力将水抽回到水库储存起来，可能是抽回原来的水库，也可能抽到另一座水库中。潮汐发电使用可逆式涡轮机，既可被涨潮推动，又可被退潮推动。在高潮位时，将水闸关闭，从而将海水滞存于海湾的水库中，然后可以根据需要有计划地释放海水发电。世界上重大的潮汐发电站在法国的朗斯，其发电量是240兆瓦，足够一座数十万居民的城市之需。水力发电和潮汐发电都能生产大量的可控制能源，因此，应最大可能地开发这两种可再生能源的潜力。

另外一种可替代能源是植物。木材、植物的残渣和动物的粪便提供了这个星球所用能量的40%，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们是惟一的能源，现在，人们开始重视种植快速生长的树种，以提供充足的柴火。植物还被用来制造酒精，酒精与汽油混合可用于内

燃机。

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也和植物一样可以燃烧用来供热，此类供热计划已在斯堪第纳维亚地区实施，那里的人们通过焚烧垃圾加热水，然后将热水用管道输送到附近的家庭和办公室。甚至掩埋到地下的垃圾也是可资利用的能源，垃圾在地下腐烂和分解的过程中产生热量和沼气，两者都可以被开发利用，下水道的污物在沼气厂经过沉积和细菌分解后产生的沼气，可以输送到厨房，或用来加热暖气。在中国，有2000万人使用这种沼气系统。

只有有限的几个国家可以利用地热能，在这些国家中，辐射元素在衰变时加热地下水，很容易开采到温泉热水，像冰岛和新西兰等国家就利用其地热能发电，或者直接向家庭和工厂供热。目前，只有诸如冰岛这些国家对地热能进行了开采，但现有的技术足以满足世界数百年的能源需求。像英国康沃尔郡的地热井，所产生的热量足以驱动发电涡轮机。

当石油储量日益减少，人们必须认真对待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合理的能源储备、利用更好的绝热材料、过剩热量的重复利用，将保证地球的能源足以满足全世界未来几个世纪的能量需求。

利他主义（Altruism）

在生物学的语境里，利他主义（来自于意大利语 altrui，“其他的人”）描述的是个体的某种行为。这种行为，致使个体消耗能量但不会带给它直接的利益。一个利他的行为，通常将增加另一个在遗传上相关联的个体生存的机会，尽管常常有一些危险，但很少导致这个利他者的死亡。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那发出警告、请求注意鹰的鸟：它因此提醒它的儿女，同时引起鹰对它自

己的注意。这个例子中，或许偶然导致如下的结果：利他者也警示任何其他潜在的猎物，但是，梅纳尔·史密斯在他的著作《进化理论》中提出：在提醒相当远的同类时甚至有一种有利的**亲属选择**。

一些权威人士，驳斥本能处境下的利他现象的存在：即使基因是保护同类对自身的复制，**自私基因**的概念，把一种明显的利他主义行为，归属于对该基因有利的行为。生物学家道金斯发明了**自私基因**这个术语。例如，一只工蜂，牺牲自己防守蜂窠，正好是由于它的不育本身而保护着延续自身基因链的机会。

在哲学上，利他主义者相信：当我们决定我们会如何行动时，我们应考虑他人以及我们自己的利益。例如，他们相信：有时，我们能够并且应该把钱用于施舍，因为我们关心他人，而不只是由于我们希望得到他人的赞美，或认为自己是好人。

利他主义，在哲学上与伦理的自我主义形成对照。伦理的自我主义者（源于希腊语 ethikos，“关于某人性情的”；拉丁语 ego，“我”）认为：我们决定如何行动时，我们不应考虑他人的利益，而只应追求我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也许主张：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例如，那些由于关心他人认为他们将钱用于施舍的人，只是自欺。实际上，人们只是为着自己利益的缘故才会舍弃钱财。

参见：**群体选择；享乐主义；道德规范；自然选择；社会生物学**。

环境音乐（Ambient music），参见：谬扎克（Muzak）

歧义（Ambiguity）

在修辞学或**文学**中，歧义（出自拉丁语，意为“叉路”）指在词语的使用或格调中使得词语本身具有多出一个以上的意义解释。文学批评家恩普森在《歧义的七种类型》（1930 年）中，把它定义为：“……任何字句的差异，无论是多么细微，都给出了对同样的片言只语作替换反应的空间”。在所有的情况下，从双关语到最复杂的**寓意**和**反讽**，歧义都邀请听众或读者，可以说，帮助创造一旦被说出或写出的词语的完满意义。在涉及到言辞的细微差异时，除非正在对那些词语作反应的人加入他或她自己的细微差别的理解，否则所听到或读到的东西便没有活力。而运用歧义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唤醒和鼓励这种理解，这种修辞的和文学的微妙构成。

偏害作用（Amensalism）

生命科学中，偏害作用（源自于希腊文 a-，意思为“不”；与拉丁文 mensalis，意思为“合用同张桌子的人”）是指两个种群间其中一个种群受另一个种群的损害或抑制的关系。高斯的竞争排斥原理表明：两个种群不能居住在直接竞争的环境中（例如它们都需要同种食物），因为一方或另一方会更具竞争优势，并通过自然选择占据上风。

参见：共栖现象；小生境；寄生；共生现象。

肛门期（Anal stage）参见：口唇期、肛门期和生殖器期

同功（Analogy）

生命科学中，同功是指两个生物系统之间的相似性，它们的形态或功能相似，但无遗传联系。19世纪，欧文提出了“同功”这一概念，用以区分**同源**器官和那些仅外在结构或功能相似的器官。例如昆虫的翅膀与鸟的翅膀是同功器官，因为它们的起源不同，其基本结构也不相同，但具有相同功能。

参见：进化；形态学。

解析（Analysis）

在**数学**中，解析（古希腊语，“自由呈现”）是对**微积分**及其相关课题的研究。17世纪牛顿和莱布尼兹完成了微积分上的革命——发现了微积分的基本公理，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微积分被看作为数学其他分支的一个“穷亲戚”之类的东西，只是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会被使用。其原因在于：它不是一门以任何精确方式建立起来的学科，它使用的证明方法，依赖于“无穷小”以及其他模糊的和定义不严密的概念。（一个无穷小是比任何其他数在量上都更小的数，却不是真正的零；这类数的存在，似乎是极其不可能的。）微分和积分的计算方式的产生，也如此强烈地依赖于无穷小（至少在莱布尼兹的系统中是这样），以至于好像数学家们并不能成功地消除它。在更早的时期，这还不算太大的缺点，然而当时却是数学家们开始追求愈来愈严格的精确性的时代。罗勒（1652—1719年）甚至教导说，微积分是一连串天才的谬误。

19世纪初期，维尔斯特拉斯、波尔扎诺和考奇，通过对其

基本原理的严密考查，为这门学科带来了精确性，而且维尔斯特拉斯最终发展出一个不涉及无穷小的“极限”概念的定义。以前，一个**函数**在点 a 的极限，被定义为此函数无限小地趋近 a 点的一个值；其问题是，一个函数如何能被定义为无限小地趋向某一点？根据维尔斯特拉斯的新定义，函数 f 在点 a 的极限是数 y，如果对于每一个 t，存在一个 w，这样，如果 x 与 a 之间的距离小于 w，则 $f(x)$ 与 y 之差小于 t。从此定义出发，便很容易定义积分法和微分法；例如，函数 f 在点 a 的导数，是距离 $f(x)$ 到 $f(a)$ 除以距离 x 到 f 之商在 a 点的极限（如果它存在的话）。

这一成功，促进了解析学科在 19 世纪的巨大进展。有几条不同的途径都使这些观念获得了推广和发展。首先，数学家们开始试验把两个数之间的距离和连续性函数〔一个函数 f 在 a 点是连续的，只要 f 在 a 点的极限等于 $f(a)$〕的概念普遍化，这导致了对**度量**（函数的一般化距离）的研究，并因此产生了**拓扑学**和函数解析（解析与拓扑学的技术与**线性代数**的技术的结合）。

其次，考奇把实数解析的特殊规则，扩展为**复数**的普遍规则。他证明了新的复数分析领域的基础定理，其中有许多似乎是极端反直觉的，因此复数解析是一种极富效力但难于使用的技巧。

分析与综合（Analytic and synthetic）

一个陈述仅当它依其意义为真或为假的时候才是分析的。“一切单身汉都是男人”这个陈述在分析上是真的，因为它仅仅依其意义——“单身汉”意指“未婚的成年男人”——是真的。“有些老处女是已婚的”，这个陈述在分析上是假的，因为它仅仅依其意义——“老处女”意指“未婚的成年女人”——是假的。

一个陈述仅当它只靠意义无法断定其真假的时候才是综合的。“约翰是单身汉”这个陈述是综合的，因为依其意义无法断定其真假。这个陈述是真是假，不仅依赖于它的意指，而且依赖约翰的实际情形——即依赖于他是否结婚和是否成年。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无政府一词起源于希腊语，意即无人统治。无政府主义者相信，政府和国家都不仅不必要，而且是剥削的：无政府状态远远不是避之而犹不及的永恒暴乱之源，而是人类解放的最大希望。最著名的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有蒲鲁东（1809—1865年）、巴枯宁（1814—1876年）和克鲁泡特金（1842—1921年）。

无政府主义者，既不可能是个人主义者，也不可能是集体主义者。无政府的资本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相信：社会可以自发地出现，仅仅通过无异议的个人之间有意的交流与同意即可以维持社会。无政府的工团主义者则相反，都是集体主义者，他们相信：占有和管理企业的集体可以用一种没有中心的意志方法整合它们的活动。

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家坚持认为，社会的组织秩序必然要求强制的组织（如权威或国家），无政府主义者把历史中的罪恶归咎于**国家**的存在，这是极为天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常常采取以恐怖主义行为反对国家权威的形式，尽管无政府主义也回答说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实践。

解剖学（Anatomy）

解剖学（希腊文意思为“切割”）属于**生物学**范畴，它是研究机体的形态结构以及形态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科学。解剖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标本解剖。人们从标本解剖获取知识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亚历山大医师希罗菲勒斯，约在公元前300年，当时正处于古希腊历史上允许人体解剖的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希罗菲勒斯公开对人的尸体进行解剖。然而，不幸的是，他所有的原始资料都随着亚历山大图书馆一同被毁。希罗菲勒斯的大部分研究，是由他人的描述而为人所知。之后，在公元2世纪，古希腊斗士、医师盖仑有机会对人体结构作深入的研究，然而，他却未能进行尸体解剖。

文艺复兴时期以前，古希腊解剖学家的研究结论，大多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再次激发出对解剖学的兴趣。达·芬奇绘制了详细的解剖图谱，他还认识到人和马的腿部骨骼结构上的**同源现象**。医生维萨里，因与他在巴黎的上司意见不合而搬到了意大利的帕多瓦教授解剖学，1543年，他写下了《人体构造》一书（共7卷），并创建了以探查为主要手段的新的解剖学原则，这为当时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17世纪早期，显微镜的出现使显微解剖学的研究成为可能，并且开创了对组织的解剖学（**组织学**）研究。比较解剖学，是研究不同种群间形态构造的相似性以及识别同源结构（如翅膀和腿）的科学，它是由泰森（他对人类和黑猩猩的解剖学进行了研究）创立的。比较解剖学家（如泰森和居维叶，后者研究物种化石的解剖学——**古生物学**）的观察研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事实基

础。

参见：同功；形态学。

双性同体（Androgyny）

双性同体（源于希腊文，意即“男人—女人性”）用于描述一个既具有男性又有女性特征的人。双性同体的形象，出现在许多艺术形式和世界神话之中，比如在希腊神话中，特瑞西亚斯过着不男不女的生活，从而得到了性差别的知识。双性同体的形象出现在**女权主义**思想中，常常用于体现生物性别和性征的关系。许多女权主义者对双性同体现象着迷，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这种现象。

在早期女权主义理论中，沃尔夫倡导以双性同体作为对男女不平等地位的反抗策略。后来的女权主义者怀疑把双性同体作为男女性差别的解决办法，相信这没有考虑到把性别差异强加于人的方式。许多女权主义者相信，电影中的双性同体形象（如黛德丽或嘉宝）就侵犯了男女两性的服饰与规则。

当代女权主义者，像克雷芒宣称，宗教和神话中双性同体的形象是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秩序可资运用的以女性为其父权牺牲的工具。在论述混合服装、假面舞会和电影的作品中，双性同体的形象常常出现在当代女权主义理论中。

愤怒（Anger）

在心理学中，愤怒是一种短暂的情绪，它与爱和恨这些持续性的情感不同。愤怒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短暂的情绪，是因为它通常是在挫折或自身价值受到攻击时的反应。可以将愤怒视为一种

受阻反应的释放，它有时是健康的，但也可将之视为受挫情绪针对他人或事物的发泄，这可以化解诸如失败感这种更严重、更痛苦的情绪。

英国国教（Anglicanism）

圣公会（英国国教），是基督教教会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团契，它承认坎特布雷大主教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的代表每隔十年在伦敦举行一次朗伯斯会议，他们主张并维护使徒统绪，同时在本质上是相互独立的。然而，英国国教本身，是一种社会精神特质，一种精神，一种共同享有的历史，一种生活与崇拜方式。它不是一种运动或一个组织。圣公会信徒声称：他们和不列颠群岛上最初的凯尔特基督徒、撒克逊人的隐修院、中世纪教会拥有历史连续性。不列颠群鸟上的中世纪教会，常常明显同大陆的基督教世界相背离。尽管有1170年托马斯·贝克特的殉道，但它通常受国王控制。1532年，亨利八世和罗马的决裂，这更多地同他需要一个儿子作继承人而不是宗教改革相关。隐修院随之而来的瓦解，这主要因为他需要现金而不是因为任何宗教原则。但是，他那忠心又神圣的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暗中用英语准备了一本《公祷书》。直到今天，《公祷书》都滋养着公共崇拜与私人祈祷，被改编、翻译成多种语言。它为英国国教确立了各种礼拜仪式的原则，例如方言的使用。

在名义上，每个出生在英国的人都属于英国教会的成员。他们可以要求得到牧师和教育的服务，除非他们宣告放弃这些服务。实际的成员资格，要通过洗礼、坚振、定期参加地方教会及在地方教会选举名册上登记来获得。

愤怒的一代（Angry young men）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许多西方国家年轻人的心目中，整个社会结构已经腐烂。他们感到他们的存在被长者们所忽略，并认为社会的价值应受到质疑，甚至可能遭到彻底扫荡。或许，这在年轻人中是一种普通的甚至是健康的情感，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情感尤其强烈，并成为导致大约与此同时产生的“青少年文化”的力量之一。

在英国，这种情感被一群绰号为“愤怒的一代”的作家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包括爱米斯、奥斯本、赛林多、万恩等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仅以思想和声音而且以一种社会的方式（通过让我们听到某批评家曾轻蔑地称为“光明的劳动阶级”的声音），攻击现行的社会权力机构，尤其是，运用通俗文化的手段（特别是日常流传的滑稽口头禅），把神圣的权力机构形式颠覆为“观念小说”和“佳构戏剧”。这种贴近大众生活的思想传播途径，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比“愤怒的一代”他们自己的作品的影响更持久。他们之中，除爱米斯和奥斯本以外的其他人，已被证明不过是文学上的稻草人。在同一时期，许多同类作家，有拉肯、恩瑞特等人，创作了相似调子的流畅的讽刺诗，他们获得了“运动”的绰号，虽然他们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尚不足以真正配得上这一称呼。

女性意向和男性意向（Anima and animus）

女性意向（拉丁文意为“精神”）和男性意向（拉丁文意为“心智”）分别指男性身上的女性心理因素和女性身上的女性心理

因素。荣格认为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都潜在有异性的无意识想象，他将出现于其病人梦中的象征符号归纳为两类，即女性意向和男性意向。

女性意向作为男性无意识中的雌性因素常常体现为雌雄同体的形象。男性维护其自身的雌性因素的欲求，在神话中常常体现为英雄救美人的意象，引导人们穿越精神之旅的女仙形象，也常常被作为女性意向的象征。例如中国佛教中的观音、基督教诺斯替教派中的索菲娅，以及古希腊的智慧女神雅典娜，这些男性都是所谓的“圣洁的女性”，歌德称之为“永恒女性”。

女性意向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性幻想，女性意向能够投射到一个女性身上，最终使她变成它的化身，女性意向也可藉女巫或女祭司的形象而人格化。女性意向和男性意向都有两面性，既具创生性又具毁灭性。

女性意向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典型体现就是夏娃，她具有本能的、生物学的功能；第二阶段的典型体现是《浮士德》中的海伦，代表浪漫的、审美的阶段；第三阶段的典型体现是童女马利亚，她代表爱和献身于精神；第四阶段体现于萨品塔神，代表智慧，是最神圣、最纯粹的阶段。在荣格看来，一个男人全面而健康的成长，应包括这四个阶段，但是由于男人的女性意向取决于母亲，因此可能具有消极的作用。

沉睡的王子被一个女人的爱情或一吻唤醒的故事，象征女性自身的男性意向的觉醒。女性的男性意向因素体现为诸如勇敢、进取、敏锐、冷静和睿智等所谓的阳刚气质，像男性的女性意向因素一样，女性的男性意向因素也以潜意识的形式存在，并常常体现为女性心中一种隐秘的负罪感。

从消极的方面讲，可以认为，女性的男性意向会表现为一种张扬、固执、残忍的女性人格，导致一个女人不择手段地追

逐权力。女性的男性意向取决于父亲，其负面影响据说会导致冷酷、执拗和高傲；在**神话**中，这些属性表现为强盗、杀手和死神。

男性意向的发展阶段包括：第一，肉体力量的人格化；第二，主动性和实施计划的能力；第三，语言，其具体的象征是说教者和牧师；第四，意义和宗教体验的沉思。

在希腊神话中，普绪客女神象征男性意向，爱神厄洛斯爱上了她，却禁止她看他，她违背了这一禁忌，看了他，因此遭到了他的抛弃。她历尽千难万苦之后终于重新获得爱情。这个故事表明，消极的女性意向通过创造性活动获得再生。

动物磁性（Animal magnetism），参见“梅斯梅尔主义”

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

法国杂志《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的第一个名称是法国历史学家团体的总称，这些史学家创办了这份杂志，具有共同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学派早期著名的成员是布洛赫和费布夫列；近来与这一学派相联系的还有布劳德尔和拉杜里。年鉴学派的重大成果之一，是布劳德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及三卷本《文明与资本主义》。

这一学派有四个显著特征：批评那些过分集中于事件的历史学家；相信历史学家可以也必须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拒绝像传统的历史学家一样狭隘地以“上层政治”为中心；集中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结构与动力运动。强调长时段的历史“**地理学**”，物质**文化**，研究“精神气质”，这是他们不同于现行年鉴学派的最显著

特征；历史学家应该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这一信念现在已被历史学家——起码是英伦三岛之外的历史学家——广为接受。

参见：历史唯物主义。

失范 (Anomie)

失范（源于希腊语，意为“非法”）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涂尔干的应用而为众所知的，它表示社会的失范状态，通常引导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不再能够约束个体的行为。像异化概念一样，引入失范这个概念，也是为了从广泛的社会结构出发解释个体的行为。人们相信，人类的行为是受或明或暗的规则制约的，特定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共同遵循同样的规则，这些规则使个体能够在其日常生活中知道该如何举措，并且同样期待别人在特定的情境中如何举措。如果放任自流的话，人类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人类个体的野心、欲望和需求并无什么“天生”或内在的界限。当在特定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并无现成的明确的准则可为行为的依据时，就会出现失范的情形，涂尔干断定，身置此境的人们会觉得恐惧、焦虑和茫然失措。

涂尔干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失范无所不在，他认为现代社会中存在失范的劳动分工，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与其天赋不符。他还认为失范是导致自杀的社会原因之一，涂尔干认为，自杀这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可以根据非个人的外在因素得以解释。他发现在经济崩溃和经济繁荣时，自杀率都会上升，涂尔干将自杀律的这种变化归结于惟一的因素：失范，他指出不管是经济繁荣还是经济崩溃，都会导致社会的急剧变动，从而打乱了许多人的生活。环境的变化使人们原本习以为常的规则失效，个体要能够适应这种变化需要假以时日，在过渡时期，弥漫着一种无聊感和迷惘

感。

最近，这个概念被用来解释其他社会领域的现象。默顿用失范概念解释犯罪，他对这个概念的含义进行了修正，用以表示当现行的行为准则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时产生的紧张。例如，在西方社会中，据说不管是谁，不管你的起点如何，只要你卖力工作，就会成功。现实情况却是，大部分弱者出人头地的机会少得可怜。在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压力可能会使人们为了生活下去而不择手段，最终可能导致犯罪。默顿指出，对此种意义上的失范，会有四种反应：标新立异——使用社会所反对的方法实现自己的企图；墨守成规——遵循社会允许的手段追求目标的实现却很少成功的可能；逃避现实——自动放弃；反叛——试图改变整个体系。

参见：共识理论、功能主义、内化、规范、实证主义、角色、社会整合、社会秩序、结构主义、结构—动因之争、价值。

人类学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人类学语言学，关注作为人类社会习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语言的功能方面。这种研究，起源于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年）。他的参与性观察的方法，允许调查者从内部观察各种集团，同时又维护一种客观的立场。当语言以自然的话语出现、稳固地嵌入它的文化背景时，人们便研究它。因此，研究者异常强调语言使用的方式，强调实际的知识。这种知识，说话人展示在各样社会背景（交往能力）下的言语创造里。人们论证道：一个特定的言语集团的成员，对交往活动独特的全部功能更为熟悉。不同的说话人，可以分享一种共同的语言，但除非他们也来自同一个言语集团，否则，由于交谈应采取的方式的观点冲突，

在交谈中也许会不时出现中断现象。显然，言语集团的人在他们形成谈话的方式上、在他们实际展开他们的语言知识方面，存在广泛的差异。对于人类学语言学家而言，语言并不仅仅是通达文化知识宝库的一种工具。它是文化知识的一个基本方面。

参见：人类学；人种论；社会语言学。

人类学（Anthropology）

人类学（源于希腊语 anthropos 和 logos，意为“关于人类的话语”）这个词是在 1594 年由**卡斯曼**创造的。自从人类学在 19 世纪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人类学家就一直关注对非西方的小规模社会即所谓**原始**人类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对世界各地各种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人们生活方式的研究，研究对象涵盖村落和城市，也包括人类学家自己的社会。

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居住于遥远地方的陌生人就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在欧洲，从 15 世纪以来，旅行者们关于远方风情的报告就广为传播。**启蒙运动**时期，淳朴单纯的“原始人”观念非常流行。1761 年，法国哲学家卢梭对“高贵的野蛮人”极尽赞美之辞，他认为这些生活于原始公社中的人们，尚未丧失人类的尊严，他们的生存状态远较经济不公、社会堕落的欧洲世界更理想。

19 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对“原始”的理解不同以往。其**种族**理论和**进化论**强调，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野蛮的状态进化到当代的欧洲文明。体质人类学对记载的各人种的生物学特征进行研究，以支持这种理论。欧洲殖民地的扩张导致与不同文明的广泛接触，许多人类学家就在亚洲、非洲等的殖民地工作，在那里，他们对当地的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进行了调查研究。

正是在此期间，人类学成长为一门与欧洲的**社会学**和**哲学**相互独立的特殊学科。

到20世纪初，由进化论和体质人类学建立的早期“原始”学说因为来路不正和充满偏见而遭到人类学家的拒斥。1914年，马林诺夫斯基开辟了人类学研究的新纪元，他所关注的是社会制度在当前的运作机制，他主张人类学家应投身于广泛深入的**田野作业**，以获得对其所研究社会的更明晰的认识，他将这一方法称为参与观察，成为其**功能主义**学说的基础。功能主义所关心的是当前的各种社会制度和措施是如何相互联系为一个体系的，通过对**亲属关系**、**仪式**、政治和经济等各种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制度的内在逻辑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每一个社会都可被视为一个复杂内在关联的整体。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人类学家创立了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关注社会角色、社会规范和社会组织的研究相反，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将对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等**文化**现象的研究放在首要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将源于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方法引入人类学，从而彻底变革了文化研究的传统方法，凭借结构主义的理论模型，他试图通过对诸如**神话**、**象征**、**图腾崇拜**等外在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考察揭示内在的观念结构。列维-施特劳斯的学说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成为人类学批评的众矢之的。结构主义，正如其先行者功能主义一样，未能充分考虑其所研究的社会和种族的历史进程，他还忽视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建构作用，后来的**交互作用理论**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在研究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如何为符号赋予意义时创建了**解释人类学**。这些人类学家相信，他们能够从当地人的世界观中揭示出符号的意义，同时又不会忽

视当地对文化符号多层次解释之复杂性。解释人类学高度重视**自反性**活动，注意检讨人类学家在将一种文化翻译为另一种文化时，是否将自己的意义强加于人，这一点已成为当代人类学对其所扮演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中介角色进行自我批判的着眼点。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忽视了被研究的社会和人类学家自己的社会之间的政治关系，包括历史上的关系和当前的关系。源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则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开始对殖民地社会及其与宗主国的关系进行历史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研究。60年代许多非西方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但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指出，**新殖民主义**继续存在，因为那些前殖民国家仍依靠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操纵着世界。人类学家开始重估其对这些社会的作用：人类学研究究竟是维护了不同群体、社会或国家之间关系的现状，抑或对这种现状提出了挑战，譬如说，人类学证明**性别**角色因文化而异，从而对普遍的女性歧视提出置疑。

这种全球性的思考表明不能再继续把人类学视为对小规模的“原始”社会的研究，它的研究领域已经大大拓展，它在对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学理论等学科的成果兼收并蓄之同时，也影响了这些学科。这种跨学科的特点对社会的研究非常必要，因为研究社会要求对人类的动机和能力有全方位的理解。人类学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各个社会日益被各种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事务联系起来。

这些广泛的课题导致了一系列人类学的观点，其中每一种观点都需要根据其特定的社会语境才能获得明确的界定。体验和认知生活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这一点启发人类学家从文化建构的观点而不是从**自然**决定的观点理解现象。人类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研究人们如何安排其生活、信念和价值的宽泛的研究方式，而不再是一门企图发现能够解释所有这些现象的终极真理的学科，

正因如此，人类学才能够让人们对**种族中心主义**保持警觉。

越来越多的研究课题要求人类学拓展其固有的学科范畴，这些课题包括**发展问题**、**旅游问题**、**视觉人类学**、**情绪研究**、**种族特性问题**，也包括旅行、移民、政治、经济、传媒等如何对世界上不同社会发生影响的全球化问题。人类学话语现在已经变成了多种文化视野之间的对话，它试图在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同时也更好地理解别人。

宗教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宗教（源于拉丁文，意为“约束者”）意指关乎一个超自然的“彼岸”世界的仪式和信仰。超自然是一个宽泛的字眼，用以区分超人的世界和存在的等级，诸如**献祭**、巫术、**萨满教**、集体膜拜等五花八门的宗教实践都可归于对超自然的信仰。与这种将世界判然割裂为自然和超自然两界的观点不同，自然宗教是从与自然的联系出发对神性事物进行解释，因此对存在持有一种更通达圆融的观点。

19世纪的人类学家关心的是追索宗教的起源，并建立一种对“原始”社会的宗教进行分类的方法。进化论人类学家从其体制化的宗教观念出发，认为宗教最早是源于祖先崇拜，它后来逐渐演变为**万物有灵论**、**多神教**，最后是**一神教**。还有一种观点将宗教视为**科学**的胚胎。在进化论者看来，所有这些类型的宗教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功利需要，宗教确定了人类在其特定的宇宙观中的位置之同时，也给人类的存在提供了理由。与一种文化体系一样，宗教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其个人经验的解释手段。宗教通常包含一系列的仪式，其目的是为了维持与“彼岸世界”的恰当联系，当伦理联系遭到破坏时，必须通过举行**仪式**寻求一种恢复平

衡系的途径。正是凭借这一途径，宗教在巩固道德和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学家涂尔干将宗教视为一种与日常生活迥异的深刻时空范畴，其作用是在社会成员中造成一种精神凝聚力。诸神源于社会的共同意象，而不是源于别的什么地方。这种观点导致早期的**图腾崇拜**研究将图腾视为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

20 世纪 60 年代，结构主义再次发起了关于科学、技术、**经济**制度的**理性**较之宗教等是否具有优越性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不管是宗教，还是科学，它们都是为周围世界赋予秩序的普遍性分类方式，它们并无高低优劣之分。

由于可以从多种角度对宗教进行解释，由于宗教具有丰富的涵义，因此，现在人类学家们越来越怀疑是否能够将宗教归结为单一的范畴。**解释人类学**将宗教重新界定为“一种关于真实的终极形象和实质的观念系统，”这种定义表达了世俗社会秩序和形而上存在之间的关系。

非洲的许多宗教对世界进行了区分，区分为人类的世界和“彼岸世界”，宗教人士的作用是对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沉思，他们的知识不是源于经文或信念，而是来自其在表演和仪式中的肉体体验，在此语境中，宗教知识就是一种本体论观念和经验实在的综合体。

参见：象征主义；传统。

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

拟人论（希腊语指“赋予人形的”）是把人的形状、观念、感情给与非人的存在物的技巧。它是一种和人类一样古老的习俗。它的根本目的，看来与其说是通过将非人的存在物想像成我

们一样的东西、"使"它们"变得崇高"，不如说是要把它们纳入我们人的理解力的范围内。因此，在简单的意义上，例如，人们可以说云有"面孔"；在更为复杂的意义上，称它们在"皱眉"或"快跑"。最初作为一种诗歌想象，诗人声称大自然和人的情感是相通的。人们可以谈论"狡猾"的狐狸、"忠心的"狗，或者比如想像一只牛羚为她刚出生的牛犊被狮子叼走而悲鸣。有感觉力的动物（实际上包括树木、河流、乃至岩石和建筑物），构成了每种**文学**形态的基本内容。〔例子有从伊索寓言中那充满野心要成为一只牛的青蛙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表现出理智及人性的马，从非洲的恶作剧人形精灵、美洲的民间传说到托尔金的**恩茨**（Ents）、乔治·奥威尔的拿破仑猪的变化。〕**巫术**的目的之一，是要让人类进入动物的境况、获得比如"第二听觉"之类东西（理解所有动物"语言"的能力）。

拟人论对人类试着理解超自然现象尤为重要。面对无形的超自然力量——如古希腊的提坦众神，我们很难接受它们的特性。古希腊的提坦众神只要有变成什么的想法，他们就会成为他们预想的东西（火球、山、树叶、威能、狂怒）。把人的一些卓越的特性投射到超自然的"存在者"（这个词本身就是拟人化的）上，然后按照人的原型试图形成各种关系，这是更为容易的事情。整个**泛灵论**，都依赖于下面的观点：在对存在共有的知觉与接纳方面，环境本身和人类有几分一致性。许多宗教，都将它们的众神拟人化，或者作为带有夸大了的、人的每样特性的存在者（如在古希腊或北欧日耳曼民族的宗教里），或者为了与人交流而作为假定有人性的存在者。一些宗教走得更远，将兽形观附加于拟人观上：它们的众神呈现出兽与人的形象。例如，古埃及宗教中的塞赫迈特女神、阿兹特克人宇宙论中的大地神，具有鳄鱼的形状；**印度教**中的象头神，带人的身体大象的头；许多澳大利亚本

土宗教中的造物主——神是一条彩虹状的蛇。甚至那些未将人的身体形状归属于它们的神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把上帝当作“他”、一位“父”、“有智慧的”、“怜悯的”对象等等来谈论。神道神社并不包含有可见的形象，但神道神话学依然充满了拟人化的形象。对于信徒而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信仰本身非常简单的、一种本质的、无可置疑的构成要素。对于非信徒而言，看来我们无论是面对古代本土宗教中的魔鬼面具，还是涉及基督教“上帝造人”之类相对复杂的观念，我们都处于某种东西面前。这些东西，告诉我们关于超自然现象的神秘本性，和关于人的心理学的规则相比要少得多。

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

反教权主义是与神职人员的政治权威、权力与地位相对立的自由原则或社会主义原则。在欧洲，反教权主义潮流的特殊目标，是天主教神职人员。反教权主义兴起于后启蒙时代，对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19世纪中叶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影响。20世纪，教权主义与反教权主义之间的分裂形成了对政党竞选的支持，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更为明显。反教权主义运动的范围极广，从具有某种特殊主义的目标（如摆脱耶稣会）到同一切教权的普遍对立（如1930年苏联的无神论运动）。当代有组织的反教权主义运动的典范是美国的反教权运动，它旨在防止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赢得在州立学校中从事宗教事务的权利。

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是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精神怨恨或思想偏见。它有许多形式：因其排外性和独特的宗教实践而憎恨犹太人；基督徒因犹太人是基督的公开谋杀者而生出的怨恨；在现代，反犹太主义者一般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指出犹太人在遗传学上是劣等人，本性邪恶，诡计多端；认为犹太人不仅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大企业，而且还操纵了共产党。

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现代反犹太主义的政治形式是拒绝以色列国家的存在。他们认为，“以色列是否有权存在?”这个问题，等于“犹太人是否有权存在?”这个问题。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断然拒绝这么一种论证：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对立是反犹太主义的一种形式；他们坚持认为，诋毁反犹太主义是一种修辞策略，用于回避对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居民的殖民主义的批评。

宗教上的反犹太主义，在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前基督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潮。种族主义的反犹太主义，以反动的形式出现，反对肇始于18世纪末欧洲的犹太人的合法解放。18世纪70年代，麦尔、斯托伊卡尔和特雷希克等德国人的著作确立了一种犹太种族劣等论，这种学说在中欧与东欧广为传播，而且还以一种较温和的形式传到了法国。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奥的政治危机和精神危机加速了反犹太主义的发展，成为一种对**纳粹**原理的整体构成部分。纳粹主义认为犹太人必须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邪恶负罪受罚。反犹太主义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登峰造极，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作为他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今天，种族主义的反犹太主义，仍然是新纳粹主义、欧洲和美国的整体

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见：种族与种族主义。

反英雄（Antihero）参见英雄

幕间滑稽节目（Antimasque）参见假面具

非正统派小说（Antinovel）

非正统派小说，是对传统**小说**观念假设进行挑战的一种小说。通过巅覆读者的预期，让读者的注意力聚集于作者的潜在议事，而不是风格或描绘的表层方面。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并非它的结构所呈现的那样是一个冒险传奇；托马斯·曼的《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不是**流浪汉小说**故事，而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也并非人们所宣称的**教育小说**。对正常预期的巅覆，常常是滑稽小说的特征，如斯特恩的《项狄传》和海勒的《第22条军规》。非正统派小说，在20世纪达到了顶峰，对过去的各种风格和形式的全面了解，解放了艺术家的各种创造力。他们不仅能以简略的、反讽的或迂回的方式来处理题材，而且将其演变为创作技巧，并确信读者会跟着他们走。非正统派小说，经常被宣称为20世纪60年代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及其后继者的特权。而实际上，这种风格贯穿于整个20世纪。在此意上，贝克特、卡尔维诺、格拉斯、赫塞乔伊斯、莱哥奎斯特、劳伦斯、玛奎兹和伍尔夫都是非正统派小说家——但这绝不是说他们都仅仅是非正统小说的实验者。

古典艺术（Antique，the）

尽管古迹被描述为“因年代久远而变得珍贵的废品”，“古典艺术”这一简略术语在艺术批评中，指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世纪左右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的全部艺术和建筑遗产。关于古典艺术的研究，对于自查理曼时代以来的欧洲艺术的特点及其发展，具有持续不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通过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而获得确证。“文艺复兴”之意，即指在古代范式影响下的艺术的“再生”。绘画、雕塑和建筑，一直处于古典艺术的影响笼罩中，直到**现代主义**的来临才有所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传统现在已经死亡，因为在**后现代主义**中已经看到了它的复苏。

对西方艺术来说，古典艺术的深刻的重要性，通过本书中触及它的概念的文章数量而清楚地显现出来，古典艺术作品，是古典传统的脊柱，**艺术学院**的建立就是为了发扬这一传统。重要的收藏家、公共博物馆以及画廊，都优先地把收藏的目光聚焦于古典艺术品。所有古典艺术品的提供，以几乎是系统的方式来自于那些进行欧洲大陆观光大旅行的年轻绅士们。而所谓的观光旅行，常常不过是掠夺的一种更文雅的说法。对古典艺术的兴趣并不是从文艺复兴才开始，这种趣味是加洛林王朝艺术的核心，并在13世纪建筑师豪奈考特的著名素描手册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尽管古代社会可能是专横的，但它所提供的典范作品的情感丰富性和风格多样性，常常使它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艺术中表现得格外强烈，因为它们所反映并使之不朽的文明的宏伟成就，赋予它们内在的生命。

焦虑（Anxiety）

焦虑（源于希腊语，意为“痛苦”）指心神不定的心理状态。在心理学中并不是被视为一种非理性的恐惧感，譬如说像“焦虑让我丧失了理智”这样的日常用语意义上的焦虑。焦虑不像恐惧感，人们往往并不知道它发生的原因，但是终究可以被追溯到无意识活动（在**精神分析学**中）和不当的反应及思想（在**认知疗法**中）。

精神分析学一直关注焦虑的无意识渊源，最初，它将焦虑视为被压抑的**利比多**的产物，弗洛伊德曾一度认为焦虑是对出生时**创伤**记忆的结果。

精神分析学界近期的观点是认为焦虑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焦虑是环境变化的征兆，此时人们对内在和外在的危险进行评估；其二，焦虑是**自我**无力抵御由自我与其他潜意识和无意识因素之间的紧张所导致的内在威胁的结果，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各层次对其应付危险的能力进行估价，每一层次都构成了一道防御体系。当精神失调时，内在现实的表象遭到扭曲，这又反过来扭曲了外在现实的表象。**精神病**患者通常忍受巨大的焦虑的折磨。

弗洛伊德将焦虑视为一种自我保护本能，这一观点得到其他心理学观点的支持，这些观点认为，焦虑主要是一种反抗或逃避的反应，一种有益的心理功能，是人类生存境况的基本组成部分。另外一些观点认为，焦虑是应付威胁时出现的破坏性因素，认知疗法认为外在的威胁总是导致对威胁的评估和对威胁的应付，焦虑发生于评估的阶段，并且通常是基于错误的表象，对情境的错误估价导致不必要的痛苦，而一旦遭遇真正的威胁，情况

会更严重。因此，认知疗法学者将对环境的错误估价作为治疗焦虑的一个着眼点。

失语症学（Aphasiology）

在**语言学**里，失语症学（希腊语的意思为“关于言语缺陷的研究”），是对由于脑损伤引起的语言失常的研究。因严重的事故；如肿瘤之类疾病；或脑血管意外的结果（中风），都可能导致脑的损伤。正如在许多科学领域里一样，失语症学背后的理性根据在于：当某一系统中断时，我们常常能够获得这个系统运行的有价值的洞见。因此，人们期望：失语症病人言语中特定功能障碍，将阐明他的未受损伤的语言系统的功用。

1861 年，法国神经病学家白洛嘉，报告了失语症学中最早的发现之一。白洛嘉的两个病人，语言严重失常（其中一位，倒退到只能发出 tan 与 sacré nom de dieu 两个音）。根据随后对这些病人的尸体解剖，发现他们大脑左半球前额的特定区，曾遭受损伤（后来，人们将那一区取名为白洛嘉脑回）。自那以来，人们看到：凡是患白洛嘉失语症的病人，一般都能理解对他们所说的话，但他们在说出言语方面却相当困难。他们所说的句子，往往是短的，句子间有长时间的停顿，只能间歇地说话。白洛嘉失语症的患者，也带有缺少语法句子的特征。这种句子，来源于所谓功能词例如“这”、“的”、“向”的省略。

自从白洛嘉的领先研究出现以来，失语症学的研究，已涉及作为潜在言语中心的其他几个脑区。其中最重要的之一，位于大脑左半球的后半部分，1872 年它跟韦尼克取名为韦尼克脑回。患韦尼克失语症的病人，可以说出流畅的言语，一般带有完整无缺的语法结构。但是，在相应的语境中，也许会有粘连词缀如

ing 的问题，（例如，用“大声说着”代替“大声的”）。不过，韦尼克失语症最明显的症候，是在言语理解能力方面的锐减。

失语症学研究中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曾经基于这样的联想：大脑特定区域的损伤，将带来特定的语言缺陷。这个发现，看起来是在暗示：某些语言功能，是高度定位化的。例如，从以上白洛嘉失语症和韦尼克失语症的讨论中可见，它也许在诱导性地引出如下的结论：白洛嘉脑回是言语创造的关键，而韦尼克脑回控制着对言语进行加工、理解的能力。虽然许多研究者依然称赞这种定位假说，其他人受神经病学损伤的影响提出警告；尽管言语功能似乎是高度定位化的，但事实上，在其他区域有着不可预见的结果。最为明显的是：导致一种大脑机能障碍的临近区域，也许充满了血，而在受伤部分之外的区域都缺血。因此，同样未受影响的区域的正常功用，会严重地受阻中断。显然，失语症学提供给我们的，是对大脑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极为宝贵的洞见，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受伤的大脑，并不总是代表正常的大脑。

参见：神经语言学。

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

启示文学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是犹太－基督教的观念，即人类的生命，确切地说是宇宙的生命，不是无目的的而是从创世通向末世的有序行进。有些启示文学作家，如布拉克，对末日特别关切，并直接从《新约》的最后一书《启示录》——其中详细地描述了世界最后几天的情景——获得形象、观念和语言。

然而，一般说来，启示文学的作者更为关心的是，末日来临前一系列文明崩溃的可怕事件，此类异托邦写作，把人类看作是

注定要毁灭的（通常是自我毁灭的）。我们就如同跌落陷阱的动物、实验室中的样品，处于被某种不可把握的力量的摆布之中；我们被养育得过分优裕，尤其是在智力上，而我们的智慧就是毁灭自己；我们繁衍得太多了；我们正在掠夺地球。一旦允许对末日观念进行这样的扩展，则有大量的作家——从斯威夫特到奥威尔，从左拉到刘易斯，可被描述为启示派作家。批评家们已提出启示意象是20世纪写作的显著特征，这既直接表现于**科幻小说**（如作家巴拉德、哈瑞森及特纳常常描画恐怖的未来。其中，许多当今的问题——**温室效应**、人口过多、汽车过剩——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最终湮没一切），也表现于在更宽泛的语境中使用科幻观念和技巧的作家的作品中。这类作家，有巴斯、葛瑞、宾琼及沃奈戈特等。

新启示派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短暂的潮流，卷入其中的诗人出版了一本以新启示为名的诗集（由海恩德瑞编辑）。他们的兴趣，在于"爱情、死亡、追随神话和认识战争"——比像欧文或萨松那样关注战争的早期诗人的兴趣稍微宽泛些，他们中包括威特金斯、特瑞斯和麦克凯哥。

数学的应用（Applicability of mathematics）

数学的真正效力，在于应用，它与科学方法的密切相关表现于这样的事实，即它在解释真实世界方面非常成功。

数学开始于对我们周围真实世界的属性的**抽象**；当从这种抽象中获得的结果又被返回到真实世界时，它便表明了自己的有效性。这便是科学家的工作方式。科学家从实验证据中，抽象出他们想要研究的属性（例如，对行星运行的多年观测被用于发现行星的位置）；然后，对这种抽象结果进行数学运算，可能把它与

其他外加的假设相联系（例如，牛顿假设两个行星间的引力变化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以寻找对这些资料（在牛顿的例子中，即行星在围绕太阳的椭圆轨道上运行）进行描述的数学方式，然后再由进一步的实验（在此例中，它已由开普勒于一个世纪前做过）获得证实。整个**物理学**以及许多其他科学的大部分，都依赖于这一程序。数学还曾被用于料想不到的地方——**文艺复兴**早期的**美术**中，例如，**透视**科学便是以数学方式发展出来的一种方法，它使绘画看起来更真实。

上面所介绍的数学应用的方法，已被证明是极为成功的。今天，如果为证实数学结论的实验没有给出符合预期的结果，科学家并不就此认为数学是无用的。相反，他或她会首先检查实验程序的其他部分：即错误结果的产生，可能由于某种因素在起初没被考虑进来，或者是因为抽象中存在错误（像过分简单化）。即使这两种情况都没发生，仍然对数学的可靠度抱有充足的信任。结论是，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数学缺乏可应用性，而是已经（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的额外假设是错误的。

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

现在，“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非常流行，但很显然，对这个领域任何全面的描绘，也许都会使它变得空泛；各个组成部分，作用于应用语言学整体的，是根本不一样的。例如，言语疗法，便尴尬地和类型分析相近似；而类型分析，以一种看起来偶然的主题编纂的方式，必须为**语言计划**、由电脑协助的语言学习、教育学语言等等的研究留下空间。正如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除了不可能承认应用语言学作为一种统一的学术训练外，它已经成为了一切。在这种混乱之上，应用语言学这一术

语，还紧密地同特别关心第二外语学习的现象相联系。

不过，在应用语言学中，人们还是能够辨别出一种普遍的态度或通向语言的途径。特别是存在一种压倒一切的献身精神，献身于探索语言的显现，如同它实际地在人的生活中发挥的功用那样。

遍及在应用语言学的许多关注对象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交往能力的概念。交往能力的概念，改善着我们对语法规则的（直觉的）知识，并赋有如下的思想：为了实现语言的交往潜能，我们还要具有关于语言得以展开的系统知识。因此，在这方面，语言运用的知识，被认为是语言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和我们对**音系学**、**语义学**、**句法**等等的知识是不可分的，也完全不次于它们。所以，在应用语言学的许多方面，我们能够看出一种对语言学的方法本身的有意识的反驳。照语言学本身，语言被认为是一个抽象的对象，语言在脱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发挥作用的方式中得到研究。

交往能力的概念，立即可以运用于研究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应用语言学上。近年来，大量实质性的研究建立在如下的假说上：一门第二外国语的成功习得，关键依赖于学习者所经历的交往互动的质量。因此，交流所形成的方式，会影响学习者的能力，这不仅是传达与理解信息的能力，而且是增强精通外语的能力。这里，存在明显的教育学的影响，它们决定了：语言如何被教授的问题，等同于关于所教的是什么的问题。

对外语学习的关注，也促进了和一个孩子习得他或她的母语的方式有趣的比较（参见**心理语言学**）。对于一位初学外语的成年人而言，根据一个有意识精心准备的教学大纲的规律，在教室里学习语言的概念，这不是完全不正常的。虽然婴儿的父母从来不为他们开设明确的语言课程，但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

样，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语言的技能。这些技能，是成人从来不可能比拟的。另一方面，在习得第一和第二语言的过程之间，存在着不可质疑的近似关系。结果，最近已从应用语言学研究得出支持**普遍语法**的概念和基因方案的证据。基因方案，支配着成人和婴儿关于语言所知道（并且是可能知道）的东西。因此，令人鼓舞的是：应用语言学研究，除了要时常关注更多的可触摸的和语言相关的问题外，而且显然同抽象的理论问题有联系。

应用数学（Applied mathematics）

应用数学，涉及数学的概念和结论与真实世界的关系。自从古希腊人创立了系统的**纯粹数学**学科以来，在研究者的心目中，应用数学一直被看作是比前者更低一等的。纯粹数学家们，倾向于鄙视他们的从事应用的同行——因为他们已被不纯洁的世界以某种方式所玷污。（这种态度，或许是遗传于古希腊人，他们把数学——实际上是所有科学看作是应当尽可能地远离现实生活之腐蚀的某种东西。）

毋须说，这种对应用数学的鄙视，并没遍布于整个社会。一般大众，可能倾向于把所有数学都看作是同等地抽象，并脱离实用世界而毫无用处。然而，政府在提供研究基金时，却倾向于支持应用数学，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应用数学的研究课题，比较容易说明其结果在短期内可产生的实用的社会效益。这种观点是极为短视的，它忽略了这一事实，即应用数学通常是对已经存在的纯粹数学的应用；反之由应用数学或理论物理的需要而促进了纯粹数学之重大发展的惟有一例，即牛顿为了能解决行星运动方程而创建了**微积分**。

必须把上述两种观点加以平衡。应用数学，在纯粹数学中的抽象概念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关系的能力，是一种纯粹数学家们少有的天赋。另一方面，许多科学上的重大进步，都来自于对纯粹数学的各分支的新的应用。而这些纯粹数学，是在丝毫没考虑到其应用可能性的情况下已被发展出来的（的确，它们常被怀疑能有任何实用价值）。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是爱因斯坦对**非欧几何学**的应用，从而解决了存在于 19 世纪晚期物理学中的问题并提出了他的**相对论**理论。

近似值（Approximation）

在**数学**中，近似值被用于解决没有精确结果的问题。

应用数学关于真实的物理图像所能给出的结果，全是近似值。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在物理世界的实验中，永远无法得出精确的答案，这是由于测量仪器之精确度的限制以及人类的谬见。其次，在**抽象**和应用过程中的数学分析，通常要做出简化的假设（见**数学的应用**）。有时，只能发现近似的数学解决方式，就像在**混沌理论**中那样。

近似造成的与真实世界的差异，对科学并不产生真正有害的影响，因为科学家们总是认识到这种近似。如果科学家们对用实验检验理论时导致的差错进行修正（大量的数学工具帮助他们弄明白差错会有多大），他们将会严格遵守**科学方法**，由此他们将努力发现愈来愈接近于真理的近似值。这样，在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理论时，牛顿的引力理论被一个更好的近似所取代。

阿拉伯主义（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

阿拉伯主义（阿拉伯语 urubah）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意识形态，把阿拉伯语言文化强调为北非与中东众多民族之显著民族身份的标志。

阿拉伯主义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是时奥斯曼帝国衰落，随后在1918年之后广为传播。19世纪上半叶，塔塔维之等学者为反对西欧国家的民族主义组织和保护伊斯兰信仰免遭基督教世界的入侵，从而主张阿拉伯本土爱国主义是更大的奥斯曼超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

一战前后，新出现的阿拉伯主义成为分裂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广为接受。1918年，奥斯曼帝国的覆灭意味着阿拉伯人不再具有保护性的同盟，用以反对西欧权力，这种变化使阿拉伯主义获得了决定性的发展。复兴主义（即阿拉伯语“复活”）是最初的泛阿拉伯运动，它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组织的影响，又反对把**伊斯兰**作为奥斯曼帝国内部统一信念的优先地位。阿拉伯主义者并不拒绝伊斯兰教：他们倒是把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文化的果实，因而断定**民族主义**优先于宗教。

泛阿拉伯主义追求建立包括所有阿拉伯语言的民族的统一国家。像泛非洲主义运动一样，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也分化为两大派系，一个派系支持主权阿拉伯国家（如黎巴嫩）之间的政府进行经济政治的合作，另一个派系则主张现存的阿拉伯国家合并为单一的国家（如叙利亚）。创建于1945年的“阿拉伯联盟”就以形成最后统一为志向，但这一联盟仍然只是坚持政府之间合作这个谨慎目标。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1961年），尽管寿命短暂，但毕竟创造了一种暂时的乐观信仰：一个

更广泛的泛阿拉伯主义的理想是可望达到的。复兴主义党派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在阿萨德总统统治下的叙利亚执政，他们的统治并未达到泛阿拉伯主义的统一，而是引起了反叛。

而今，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与泛伊斯兰教主义运动相合一，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见："非洲主义"。

仲裁（Arbitration）

仲裁是通过第三者的努力斡旋使冲突各方妥协从而解决纷争。仲裁概念通常对立于中介概念。仲裁暗含着仲裁者有能力强行推行一种解决方案，而这种权力按惯例乃是冲突各方在最后调解前就一致认同的、正式认可的。中介者（调解人）则相反，在法理规范上并不具有这种推行解决方案的能力与权力。由于仲裁可以容许提出灵活的原则，卷入的各方可能事先部分地同意这种原则，所以仲裁不同于调解，后者是严格遵循法律判例所规定的既定程序。

仲裁作为国际关系之冲突——解决机制，开始于1794年美英之间的杰伊条约。1899年，"常设仲裁法庭"建立于海牙，为国际冲突提供了仲裁人集团。这个仲裁法庭，对几个冲突的解决做出了贡献。但是仲裁在国际冲突中的角色并未如人们原来所期望的那样占统治地位，这部分是因为该法庭要转换成更严格的法律实体。结果，仲裁法庭（处于劣势位置上）与其他的地域和国际组织构成竞争，尤其是"国际公正法庭"，以及"欧洲人权法庭"和"欧洲正义法庭"这些地域司法机构。但是，把仲裁条款载入国家和联合组织的条约中，这一实施规范仍然是共同的。

更一般地说，仲裁越来越被当作技术事件中值得采纳的调解纷争的手段，因为纷争各方可以不依赖（身价高昂的）律师，而是提议技术专家为仲裁人。

考古学（Archaeology）

考古学（古希腊语，“关于古代事物的研究”）是一门相对晚近的学科，以18世纪庞贝古城的重新发现和首次发掘为诞生的标志。起初，考古不过是由欧洲富豪资助的有组织的珍宝搜寻活动，那些富豪们，渴望拥有以前仅在叙述或**文艺复兴**的模仿物中见到的那些花瓶和雕像的真品。但是，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贝尔兹奥尼在埃及的工作），它变得愈来愈体制化，并且现在，在其有始以来的主要工具——粗糙的小铲子和灵感式的猜想工作的基础上，已扩展到拥有地理学的、科学的、统计学的和工艺学的庞大技术系统领域。同时，关于历史发掘的报道，以及博物馆、大学收藏世界各地考古发现的物品制度的存在，使考古学家在关于历史事物的经验及推测其用途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考古学家的工作开始于证据（例如文件或其他历史记录），或开始于某一被发现的隆起的特殊地点。（在现代都市社会，最初的消息，有时可能来自于挖地基时发现古物的建筑人员，他们要求到现场进行“抢救性考古”。这种“抢救性考古”，需要纪实性地描述遗址，并在他们继续施工之前把古物移走。）然后，开始位置勘探、测量和拍照，之后才开始挖掘。挖掘的进行是程序化的：先把遗址用栅栏围起来，然后每一层都小心翼翼地打开，并在下一层被接触前做逐一记录。（这与早期考古学家的工作方法形成对照，例如谢里曼，他们兴高采烈地挖掘并把上面的几层扔到一边，直到挖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为止。）这一阶段的首要任

务是，通过记录、描图、地形绘制、编号和拍照等手段，为每一种出土的文物建立**背景档案**。被发现的物品，可能是在它们原初的位置（即遗址的原初主人放置或使用它们的地方），或者是在第二位置（比如在垃圾堆中），或者在原来的拥有者留下它们后被自然现象或动物搅动过。有时，它们被送走作进一步的分析（例如，测量日期的方法，有同位素放射分析或类型学方法——把它们与已知时期的相似发现物进行比较），有时则将其留在发现地点。随着工作的进行，关于发掘地点的地层学被建立起来：一种对地层的垂直描绘，既可以是一种刻度性的描绘，也可以是模型式的（地层图有时像一棵家族树），发掘的每一层次和每一件物品，都被精确地标在图上并注明日期。

考古耗资巨大，许多遗址都只能部分地发掘（埃及的鲁克塞尔和泰国的安科尔沃特便是如此）。或根本就不发掘，由于考古学的昂贵费用以及其活动与土地的其他用途相冲突，它是一个政治上极敏感的学科。但是，在它存在的200年历史中，考古学已经和**美术**、历史、语言研究、文学及宗教方面的工作，以及科学的明晰性与客观性结合为一体，对我们关于过去的几乎每一方面的观点做出重新的修正。

拟古主义（Archaism）

艺术中的拟古主义，指一种崇尚原始、天真的风格，一种对复兴这类古代样式的审美趣味。它常常肯定对较早时期的艺术样式的固有价值的信念，断言这些形式的复兴，将促进那些早先世代生活的、被想像的品质的复兴。早期的艺术样式，起源于一个更简单、更纯粹的**黄金时代**。

参见：古典主义；浪漫主义。

原型（Archetypes）

原型（源于希腊语，意为“原初”）是荣格在对梦进行分析时发现的。他发现在梦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意象，他还发现，这些似乎别有来历的意象往往会按照预定的模式或符号自行组合，他的所谓原型就指这些模式或符号。弗洛伊德在对梦进行分析时也遇到同样的现象，他称之为“古老的遗迹”：它们是我们遥远的过去和生物进化的遗迹，是我们的精神中近乎动物的因素。在此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灵魂，它是集体表象和原始母题的积淀，在荣格看来，它们是本能的白日梦和形象的再现。每一种原型都是人类进化过程的再现，它会自我呈现于神话人物、意象或母题。有六种原型一直伴随着我们，它们是英雄、孤儿、流浪者、武士、殉教者以及巫师。

建筑师（Architect）

建筑师（希腊语意指“建筑家”）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建筑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它又是比较现代的概念。人们常常认为：建筑师既是一幢建筑的设计者，还是它的施工建设的监督者。

公元前1世纪，罗马理论家维特鲁威在他的专著《建筑十书》中写到建筑师，他把建筑师描绘成一种博学的理想人物，一位精通各种艺术门类的人，一位历史学、哲学、音乐与医学的学者。每个学问领域，都能很好地促成建筑师的设计能力。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的帕普斯尽管给出的修辞叙述较少，但他强调建筑师有必要具备一种理论背景。这种背景，包括最新的数学与力学方面的知识。

在中世纪的欧洲，正是传统意义上技艺精湛的石匠在一幢宏伟建筑物的建设中扮演着最重要的人物角色。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大部分文化生活，都以重新发现古典文本为特征，维特鲁威专著的再发现，导致了人们对各种最高理想的强调。这种理想的内容，指那些促成一位建筑师的教育与技能的东西。由于建筑师们的名声，他们开始被指定为艺术家（例如乔托，就曾受委任担当佛洛伦萨大教堂的建筑师）。他们也许依然出生于卓越石匠的家庭，他们常常将建筑与绘画、雕塑相结合。达·芬奇发展出“艺术是理想自然”的理论。通过这种理论，他努力证明绘画与雕塑属于**自由艺术**而非手艺。

直到19世纪，欧洲教育都带有用古典原理正规训练学生的特征。那时，兴起了关于“建筑：是艺术还是职业”的争论？它的职业特点，由于资格考试的引入、其他相关行业的不同作业的逐渐流程化而得到加强。这便要求具有一个建筑工程师或城市规划者的各种技能。

参见：工匠；城市规划。

建筑（Architecture）

可以说，直到非常晚近的时期，建筑（希腊语和拉丁语，“掌握建造的技术”）同任何**艺术**相比，还是一种（比如说）与外科手术或船只建造有更多相同点的活动。这就是说，它的技术是被普遍地了解和运用的，并有个别天才的实践者（他们中的一些甚至名载史册，例如伊姆豪特普，他设计了吉萨的大金字塔，是历史上第一个“已知的”建筑师），但是却没有关于它的一般理论或批评上的一致意见。建筑物被委托设计、建造和使用，就像伤口被包扎或船只被建造：这类工作，是功能性的，人们决不会

用非功能性的术语去评价它的技术或估量它的成功或失败。

这种“建筑”的主要目的是：首先，提供庇护和安全；其次，使诸如宗教实践和统治之类的活动显得高贵。即使审美的考虑竭尽全力，也不过是在材料和装饰上做选择——纵然这样，在早些时期，除了那些最华丽的建筑物（例如寺庙或陵墓），其他的不过是可称之为“有机的”建筑，由当地固有的材料构成，像树林或小山一样从周围环境中自然地“生长”出来。在此状况下，关于建筑的“思想”即使是最优秀的，也不过是倾向于实用性的而非表现情感的——不仅史前时期是这样，而且直到完全进入现代纪元仍如此。毫无疑问，像雅典的帕提农神庙建筑群、安科尔沃特或麦克修庇修的寺庙和范特普尔·西科瑞的宫殿及街道的设计者和建造者，肯定曾对关于建筑物在其环境中的地点和位置的全盘构想作过热烈的讨论；他们肯定作过计划并加以讨论；在从事这一工作时，他们必定深刻地体验到一种创造带来的满足与激情。但是，他们的工作，却被看作是一种技艺而不是艺术，而且他们所谈论的，更可能是关于基础和材料之类的东西，而不是诸如“形式服从功能”或“建筑环境”之类的抽象概念。当古罗马作家维特鲁威——奥古斯都皇帝的“建筑师”——于公元前1世纪出版他的著作《建筑十书》时，他并没把它当作是艺术方面的著作，而是当作一部手工艺方面的著作。

这种对艺术上的权利要求的缺乏，使得建筑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的世界大部分地区中，处于一种低调的形象（尽管它有如此之多的宏伟壮丽的作品）。建筑师只是工匠，更多的时候，是与跟他一同工作的测量人员和建筑工人一起呆在家里，而不是在赞助人的沙龙里。在绝大多数建筑实例中，设计者和建造者一样默默无闻。——其实，他们很可能原本就是同一个人。这一状况，至今仍存在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建筑现在可以被作为一门

实用艺术，用一套编纂的理论和技术以及历史上各种风格的范本来教授；但是，现实世界中的房屋、商店、仓库等等是因需要而建造的，它们的一致风格，是由实用性和费用决定的而不是设计者的灵感。惟有富豪——在现代往往是市政当局或公司而不是个人——才能把建筑物当作艺术作品来修建。

建筑师作为艺术家以及建筑作为美术的概念，是西方的产物并开始于**文艺复兴**。关键的观念是，美的艺术作品，应该和谐地放置于美的建筑物里。这种组合本身，能增强整体的效果。环境本身得到设计，每一部分不仅从其自身而且从其作为事先设计好的整体之有机构成因素这方面，都要有艺术的意味。建筑涉及空间的分割与形成，是一种三维的艺术形式，而且，三维性是建筑与其他种类的艺术的惟一真正的区别。建筑师能构造最壮观的空间——单个的（如比萨的“神迹广场”所呈现的空间）或是群体的（如罗马的圣彼得建筑群所呈现的空间）——他常常同时也是画家或雕塑家，他们共享着美术的原理和抱负，以及从业者的自我沉醉与创造的权利。在建筑师手中，对建筑物以及建筑物矗立于其中的空间的设计，第一次取代了实际的粗野的建造活动：勘探现场、清理工地、聚拢材料以及等等（在创造活动的阶梯上），被移交出去就像在其他艺术中，诸如浆裱画布、制作颜料、准备大理石块或浇铸青铜等实践活动被移交出去一样。

建筑师的这种从匠人到天才的跃升——“跃升”、“匠人”和“天才”是当时理论著作中的典型术语——从那时起一直被保持下来，并从西方扩展到整个世界，至少从市场的昂贵价格方面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建筑师主要是一个设计者和策划者；“建造环境”是他们首要的兴趣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工作是设计我们的居住方式，因而他们在计划时要考虑人口统计学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20 世纪 20 年代的苏联、第三帝国时期的

德国及那些遍布各地（从英国的彼得利到巴西的巴西利亚）为特殊目的建造的城镇和城市的建筑师们，走得更远，他们所刻意设计的，不仅仅是建筑物，而是整个社会。科比西埃著名的观点是：一座房子就是一个“生活的机器”。他设计了“辐射式城市”，在其中每一种活动——居住、工作、休闲——都有自己的区域，并与其他所有的活动区域分离开来。从19世纪中叶以来，在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中，每一单独的艺术上的“主义”，都已被付诸于生活实践，而根本不顾大多数人们的反对。事实上，人们不得不去使用这些建筑物，并生活于它们所体现的那些“主义”的阴影笼罩中。

这样说，并不是把创造的傲慢归咎于作为一种职业的建筑师，或至少不是归咎于他们全体。由于他们的工作的实践性的压力，就算不提他们自身的生存重担，他们至少必须以某种方式调整自己的创造性灵感，以适合时代及市场的口味。博爱——珍视为生活和工作提供健康安全的环境的愿望，是建筑自其开始便内在具有的成分——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问题是，与其他种类艺术的产品不同，建筑师所创造的产品，不论好或坏，都是巨大的和永久性的。没有人被要求用一幅静物画来遮风蔽雨，或是在一个小雕像中安家过日子。如果你不喜欢它，可以把它卖掉或扔进垃圾。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如果芝加哥闹市区的围栏系统和摩天大厦令你压抑，钱迪加尔的兵营及其帝国主义的暗示使你悲哀，或者古根海姆博物馆、鲍伯格或香港大厦以及上海银行大厦让你自卑自怜，你只能自认倒霉。所有这些作品，有三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由“富于想象力”的人们设计的，他们的行为像有创造力的独裁者而不是民主人士；它们都耗资巨大极其昂贵；并且无论是祸是福，它们都将矗立在那里持续几个世纪。

在艺术家的权利和主张与时代和市场的口味之间进行平衡，可能是20世纪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中的主导现象。这是一个在现实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不幸的冲突。20世纪的建筑师们，既创造了许多美丽的场所和宏伟壮丽的建筑物——适于居住的艺术作品，同时也创造了一些畸形怪物。在后现代主义时代，他们已开始不仅向他们的赞助人也向那些实际上使用他们的创造物的人们听取意见，并且我们也已养成了健康的习惯倾向——对于金融上的损失咬紧嘴唇强咽怒火，并炸毁他们的最糟的创造物（此时，浮现于心的是1960年代的那些高层楼群蹩脚货）。总之，如果说在过去500年间，建筑师们曾在某一阶段忘记了他们的谦逊的话，那么经过近40年持续的大量反对批评，现在已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开始重新把谦逊找回，而这对我们所有其他的人只会是一件好事。

参见：建筑师；工匠；功能主义；空间与建筑。

亚里士多德主义（Aristotelianism）

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的追随者。亚里士多德，对希腊罗马的古代政治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根本影响。其发生影响的途径，尤其是他的修辞学教学，既不在论证中提供逻辑证据，也不提供切实可靠的经验证据，是一种精湛的说服技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还对西方政治哲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因为他对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主义进行批评。亚里士多德构想了第一个政治体制形态学，而区别这些政体的形态之标准是：（1）它是否由单一统治者、少数统治者、还是多个统治者统治；（2）他们的统治是以所有人的利益还是以他们自己的利益进行。这种形态学，提出了六种体制，其中有三个

形式是好的体制：（a.1）君主制；（b.1）贵族制；（c.1）有组织的社会（或立宪政府）；有三个形式是差的体制：（a.2）暴政；（b.2）寡头制；（c.2）民主制。后来，亚里士多德把亚洲**独裁统治**区别出来，作为东方特有的政府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支持混合政府组织，因为这种组织形式组合了君主、贵族和大众政府的优秀因素，他称之为“有组织的社会”（Polity）。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预示着**现代功能主义**。他的论证是：政治生活根据于生物学，具有各种自然的形式；国家应该采取自然形式，他认为这就是指国家应该相对微小，其中的个人、社会阶层，尤其是奴隶都是有必须完成的自然功能。亚里士多德及其后代思想家，就运用这些假设去给予自然的政治制度以正当性论证：我们现代人则认为这自然的政治制度是令人厌恶的，比如它认为奴隶制以及男人在家庭生活中的统治具有正当性。

算术（Arithmetic）参见整数；数系；数论；有理数；实数

艺术和工艺（Art and craft）

把某些活动重新标识为“艺术的”，以及把这些活动的从事者重新标识为“艺术家”，这发生于历史上的较晚时期。在欧洲，它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建筑师、音乐家、画家、诗人和雕塑家，被一些学术权威们称为“美术”的从事者，他们具有某种不同于（例如）演员、陶匠、散文作家、石匠等的创造性。在17世纪随着（艺术）**学院**的创建，这一区分变成了一种信条，并最终经**浪漫主义**运动演变为一种学说。那时，“美的艺术家”被认为是天才人物，而同样的称号却几乎很少或仅仅是讽刺性地

用于其他领域中的创造才能。19世纪的批评家，开始一种热情的修正论计划，致力于弄清楚过去的那些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家中哪一个——阿培里斯？荷马？普拉克西蒂利？维特鲁威？——可以被天才的众神封为一个“绅士”而不是“戏子”。这种观念，趋向于把“艺术家”从所有仪式的和社会的功能中分离出来，而这将会让古希腊人不知所措，因为对于贯穿历史的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艺术创造者来说，这种观念是陌生的。在他们看来，作品就是一切，而创造性范畴则是不相关的。虽然如此，关于“艺术”和“工艺”的观念，以及在它们之间能做出一些有效区别的观点，仍然存在于学院和批评的圈子，这对**艺术**本身不见得完全有益。

参见：视觉艺术；鉴赏力；创造性；批评；民间艺术；宗教艺术。

装饰派艺术（Art deco）

装饰派艺术（源出于短语“作为装饰的艺术”）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盛行的一种设计风格。它的特征有：几何形式、独特的色彩配置、现代材料如不锈钢和镶嵌家具表面的光滑豪华的纤维板。装饰派艺术设计，是两次大战期间影响**美术**和**设计**的诸种变化风格的有机混合，例如**野兽派**和**立体派**绘画中奔放的色彩，和**现代主义**的建筑。新的现代主义的大众化应用，导致设计横跨了从电影到收音机以及吸尘器的广阔领域。这也引起了几个重要的批评家和设计师的批评。他们认为：装饰派艺术只是一种纯粹的风格，而缺乏标志“现代运动”思想的理性深度。在此语境中，术语“现代派风格的”这种风格，是现代主义不太严肃的变体。被用于表示装饰派艺术风格。尽管如此，到20世纪30年

代末，尤其是在美国，装饰派艺术已变得普遍流行，从昂贵的定做物品到大批量生产的陶器和餐具，都成为它的领地。

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

认为艺术作品应为自己而存在，而毋须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信息”，这种观念，作为对**现实主义**的回应，盛行于19世纪法国。19世纪末，经由**佩特**（他创造了短语“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审美主义**流派的支持者的活动，这种观念在英国登场。“为艺术而艺术”，是贯穿于20世纪每一种**前卫艺术**运动的基本信条（尽管鲜有用这么多词来表述的），——从**达达派**到**超现实主义**，从**极少主义**到**荒诞戏剧**。

新艺术（Art nouveau）

新艺术（法语，“新的艺术的意思”）在德国被称为“Jugendstil”（“青春风格”），是装饰性**艺术**和**建筑**的一种流派。它崛起于19世纪90年代，流行于欧洲和北美，是19世纪最后一种庞大的装饰设计流派。新艺术，依靠观察而不是创构植物形式和旋涡的、卷须类的式样，不仅把它们应用于绘画和雕塑，而且应用于家具（例如，盖勒和马玖瑞勒的作品）、餐具、灯具、街道信号和铁器，如巴黎的地铁车站。也许，它的自然主义，源出于莫里斯的工作和**艺术与工艺**流派，但是，它缺乏那一流派由模仿中世纪风格和形式而产生的自我强加的克制。

到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媒介，新艺术已基本死亡，战后质朴的和古典主义的氛围使其难以生存，更不用说它自己那过分的柔软化风格和夸张的自然主义形式。它的轻浮，在

装饰派艺术中保留下来，并对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好莱坞音乐剧和滑稽剧的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尽管它夸张，1890年代到1900年代新艺术流派鼎盛期的某些艺术家，诸如麦肯多希和维尔德，的确也设计了一些较克制的作品。它们的简洁性，非常适合工业设计的要求，从而为新艺术赢得了某种“古典主义”以及它自己的尊严。

视觉艺术〔Art (s), visual〕

视觉艺术，可以被定义为带着表现观念、经验或情感的意向，使质料——如木头或石头——成形或是在一平面或其他表面上涂抹颜料之过程的实践活动。

然而，在构造称为“艺术”的范畴时，我们假设它有一个历史的但不是概念的基础。如果今天人们相信，关于什么是“艺术”以及它的功能是什么，有一种普遍一致的看法，那么，这种一致的最早时间，仅仅开始于18世纪，当时美学研究致力于为艺术的鉴赏和理解，提供一种方法论。在此之前，虽然有艺术，诸如绘画的艺术或雕塑的艺术，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被恰当地称为“艺术”的学科。如果这在西方世界是真实的，那么，在考虑亚洲、非洲、美洲和东方的艺术时，提出我们关于艺术是或应该是什么的僵死的假定，显然将会在方法论上失效。

视觉艺术的理论和实践，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以西方世界为例，从文艺复兴以来，绘画、雕塑和建筑，被提升到大学文科的领域。作为一种推动力量，它促进了16世纪至19世纪一系列的发展，其中包括艺术学院的创立和艺术家作为天才之观念的产生。这一观念，在浪漫主义时代达到了最辉煌的顶峰。接下来，从18世纪开始，美术（建筑、音乐、绘画、诗、和雕塑

——人们也许会反驳说，真正的美术对象是画布上的油画）与装饰性艺术（诸如服装设计、制陶业或珠宝设计）的进一步分离，对于我们今天建构“艺术”领地的方式，也有重要影响。然而，这种建构引发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有人指出，西方艺术已把某些“美的”艺术实践从其他领域中独立出来。而这些领域，在非西方文化的某一给定社会里，很可能属于视觉艺术的本质方面。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非西方艺术形式，这种类型学的问题便暴露无遗。在许多文化中——人们可以举出：印度、亚洲和哥伦布前的拉丁美洲，并不存在“艺术”作品（仅以审美愉快为目的而与任何其他目的无关）与工艺品之间的同样的区别。这些工艺品，是为实用目的而设计的，并且带有样式、形象或图案形式的装饰性。在这些社会中，以及在诸如澳洲山脉的土著居民或新几内亚的部落氏族的视觉文化中，标志的制作——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岩石或其他表面上，总是内在地与仪式的式样联系在一起。诸如此类的观察证明：把艺术当作一个似乎可以被界定和定义的范畴来讨论，是毫无结果的。

虽然如此，还是可以提供一些评论意见。首先，非西方视觉文化，具有本质的象征或仪式功能，而西方艺术则没有这些属性——这一结论并不具有公理性。例如，不言而喻，15世纪佛罗伦萨的祭坛装饰雕刻，便具有仪式化的功能（它是从属于灵修的)。然而，这样说则是真实的，即後起的对“艺术”的鉴赏以及关于个性化的创造天才理论的发展（艺术作品的自律性依赖于天才)，倾向于把（我们称之为的）艺术尽可能地从它的仪式化的、社会的或实用的基础中分离出来，并把它置入一个独立的范畴中，使得其假定的固有本性（即它的审美价值）可以得到鉴赏。

然而，即使我们最终不能确定是什么构成艺术作品的客观标准，我们至少能指出某些似乎是所有艺术活动形式共有的属性。想象力的活动，情感的游戏和理性的运作，是内在于任何艺术活动的。很可能，这些因素，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对所有形式艺术——不论是西方的还是其他的——构成做出贡献，因为它们使艺术家得以把他或她对世界的经验转换为一种关于这一世界的表述。

这种表述所采用的形式，当然是艺术创造过程的核心，而对形式的探究也是艺术鉴赏的有机构成部分。形式是观念的可塑性实现，在形式中，观念被转换为形象（抽象的或具象的），并以颜料、石头、木头或一些其他物质为媒介而获得有形的存在样态。在此意义上，探究形式，就是探究创造它的艺术家的内心世界，通过我们自己的前理解和成见得以知晓，并以呈现物、语境化和背景环境构成的手段的陌生化为条件。

在此最后的评论中将指出“艺术”生成“艺术”的内在方式。一个很好的有名的例子，是杜尚装在凳子上的自行车轮子。这一物体，凭借着其被置入美术的环境——在此情景中是博物馆——而生成为“艺术”。而如果它被放在垃圾堆上，它将不会吸引我们片刻的注意力，它被置入一个受到控制的环境（一个清晰地区别并确定展示物具有假定的内在价值的环境），是使它获得质变的手段。这说明内在品质的观念（无论是通过珍贵材料的运用还是艺术家的变形技术）并非美术的惟一特性，而一种“不同于什么”（不要与惟一性相混淆）的意义，也同样是美术经验的内在构成因素。

这种“哲学的”思考，或许主要是专家们才关注的。一般大众，都愿意看到确定的而不是有问题的艺术领域，以及使艺术对象既明了易懂又富于意义的呈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核心的观

念是合适（如传统、美或在较小的程度上可接受的古怪）。然而，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西方和非西方的艺术形式的本质差异。在西方，审美鉴赏，也许是对艺术品的最普遍的反应，（即我们称赞一个作品，是因为它吸引我们的趣味，或确证我们的意见）；而在非欧洲文化中，合乎习俗的观念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些文化中，形象无论是光耀一个本地的神、治好一个生病的孩子、还是标志季节的转换，它都是某一重要仪式的功能，而不管这一形象是否符合某种“美”的观念。

自然，上面描述的这些功能，在欧洲艺术中并不少见，尤其如果我们想起至少持续了2000年的由基督教教会赋予神圣形象的巨大冲击力。但是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失去了这种原初的意义，开始以另一种替代性形式的“宗教”经验投资于艺术作品，此即艺术鉴赏。即使这样，对于大多数人说来，“艺术”远不止如此。的确，那些艺术流派，比如**现代主义**，倾向于自我指涉，避开呈现于如此多的视觉形象中的模仿的或指涉的属性，它们仍然是“普通的”艺术消费者所难于理解的艺术。一般说来，大多数人期望艺术告诉他们关于世界的某些事情。这些事情，不能立即出现于“现实的”生活中。在此意义上，艺术永远具有拓展我们经验的功能。

既然什么构成了艺术之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不能被解决，只要人类社会继续重视不同于获取生存手段的商业经营的活动就行；并且，既然各种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目的的理解不同，那么，被认同为既是美化日常生活的手段，又是在其他任何活动中不能以同样方式发现的一种知识形式之仓库的艺术，就将继续引起讨论。

参见：抽象；基督教艺术；具象艺术；民间艺术；宗教艺术。

艺术哲学（Art，philosophy of），参见美学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计算机对人类思维模式的复制，在今天，是一个最富争议的计算机领域，也是科幻小说作者的宠爱的一个领域。这一领域，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图灵（1912—1954年）的理论工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由于我们对人类思维的理解的有限性，要说明人工智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非常困难，例如，想要回答“计算机具有关于它们所拥有的资料的知识吗?”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定义术语知识。（这一问题，还具有法律领域的后果——计算机能被允许作为法庭上的证人吗，如果它并不真正知道它在说些什么的话?）在现阶段的哲学和心理学中，这类问题是真正不可回答的。

要想弄清你将怎样告诉人们一个计算机正在设法复制人类思维模式，这也是很困难的。通常的观念是，当一个计算机能做仅有人才能做的事情时，复制便告成功。这种“某事”的许多候选者已经产生：计算机能从经验中学习（例如，如何下棋），产生全新的观念（一个名为人工数学家的计算机，提出了数论中的一个人们从没梦想到的结果），从不充分的知识中推理（已开发出的“专家系统”，能根据可能性回答有关矿产勘测和有机化学方面的问题），等等。然而，随着这些使用不完全或不精确的知识的系统的出现，计算机出错的可能性产生了——而这长期以来被

认为是一个全然属于人类的领域。

有关人工智能研究目标的最著名表述，是图灵试验。在试验中，一台计算机与一个人被和测试者隔离开来，然后他或她提出问题，答案将由人和计算机分别给出。当测试者放弃或决定哪一个是计算机时，试验便结束。如果测试者放弃或出错，计算机便通过试验；然后断定人工智能有充分的人类智能。

还没有计算机能通过图灵试验。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目标，包括使计算机理解英语，对陈述作正确的反应并驳回无意义的，或者在美术和音乐中把计算机作为创造性因素白文部分而不仅仅是作为工具或手段来使用。某些看起来容易的任务，已被证明对于计算机却非常困难；制造能处理哪怕是最简单的非实验室环境，如家庭或办公室环境的计算机，那将是未来某一时间的事情。

参见：计算机艺术；创造性；电子音乐；认识论。

艺术和工艺流派（Arts and crafts）

艺术和工艺流派，由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一群寻求复兴设计标准的英国建筑师、艺术家和设计师组成，鼓励传统手工艺的复兴是其鲜明的旗帜。它是对欧洲19世纪中叶批量生产的廉价家具和建筑的敏锐反应。

这一流派的起源，可以中世纪文化研究专家和鼓吹者普根（1812—1852年）和罗斯金（1819—1900年）的著作如《维尼斯的石头》（1851—1853年）为标志。这部总结性的著作，考察了欧洲中世纪建筑领域中那些创造了杰出作品的工匠艺人的状况，并将其与现代同行的状况作了肯定性的比较：自由和奴役的对照。这一观点给予莫里斯（1834—1896年）以深刻的影响。莫

里斯可以被称为艺术和工艺流派之父。

莫里斯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建筑，并与拉斐尔前派艺术家有过接触。在大学时，他便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才智在于设计，并于1861年组建了名为“莫里斯、马歇尔、福尔科夸和考”的自己的公司。直到莫里斯去世，这个公司及其产品一直是艺术与工艺流派的中心。

这一流派认为，一系列简单的原则应被用于产品的设计。这些原则中首要的是质料的真理。莫里斯相信，每一种质料都有其内在的品质，例如陶罐的抽象釉彩或木头的自然色调。带着这种认识，他试图复活传统的制作方法——例如，在其存于萨里郡默顿修道院的绘画作品中，他重新引进传统的植物染料（如靛青），而它们当时已被1830年代新发明的人工合成染料所取代。在致力于复活传统手工艺技术的同时，莫里斯也研究传统的式样，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伊斯兰的地毯和砖瓦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纺织品。这些式样，被莫里斯重新用于墙纸和纺织品中，它们至今仍深受欢迎。

一些年轻的建筑师，深受莫里斯的亲手工、反机器的伦理本质的影响，成立了许多团体，如1884年由五个建筑师发起成立的艺术工作者协会，其中包括列萨贝、普瑞尔和麦卡特奈，他们都是理查德·诺曼·肖（1831—1912年）的学生。他们坚持建筑作为一种艺术的观念。“协会”的这个名称，是自觉地认同于中世纪行会的标志。协会的其他成员，有画家、雕塑家、工艺师和设计师，并且，由于艺术和工艺流派的氛围渗透于他们所有的技术和兴趣，的确关注“艺术的统一”，正如科朗福德所说：“没有建筑，则艺术和工艺流派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建筑物能显示出手工艺人的触觉，材料的质地以及古老技术的优良品质。”1887年，艺术和工艺展览会成立，并展出了艺术工作者协

会及此领域中其他人的作品。

艺术和工艺流派一贯坚持的最后信条，是干预社会问题。莫里斯本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相信为所有人生产美的物品将丰富生活的精神品质。他创作了一系列乌托邦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乌有乡消息》)，为人类描绘了一个幸福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与早期的费边社有联系，并巡回全国讲演和教学。许多艺术和工艺派的设计师，以公有生活的原则为指导，进行社会实验的尝试，例如，阿什比协会和1888年建于奇坪卡姆顿的手工艺学院。

尽管艺术和工艺运动贯彻商业和智力统一的原则，它在改变时代精神方面却收效甚微。它的反机器伦理根本就不合时宜，而妨碍了它那高水平的设计和强烈的道德品质成为当下世界中真正有影响的力量。莫里斯及其跟随者，曾想使手工制造产品适应于一切领域，然而实际上，由于制作方式和材料的价格决定了其产品不会便宜，它们简直是太昂贵了。尽管如此，他们的观念、产品和著作对设计的功能和目的及手工艺对抗机器生产的价值，做出了有力的挑战。一旦理性适应于机器时代（例如在包豪斯那里)，它们便成为影响20世纪西方设计尤其是建筑的精魂（引发了从房屋作为一个“艺术的总体作品”的概念到本土复兴观念的发生)。

参见：工匠；功能主义，哥特式复兴。

艺术（Arts，the)

艺术（拉丁语 ars）的本义，指任何天生的或学到的技能，如口才、理发术、骑术、操作能力等等。在古罗马时代，“工作”是奴隶或下层人做的事，而任何有见识的人都热衷于使自己与做

工者脱离联系。正如一首（贵族）诗中指出的：ars est celare artem 即“技能在于隐藏技能”——一个“绅士和悠闲者”关于艺术和技艺二者的势利话的早期例子，这在今天仍广为流传。

在颇为狭窄的意义上，“艺术”后来变成了贵族孩子们学习的东西。它们主要源出于神话中缪斯女神负责的学科（天文学/占星学、喜剧、舞蹈、历史、音乐、诗歌和悲剧），并被认为是生活的提高和装饰，而和诸如计算、烹调或测量之类的实用技能相对立。这些实用技能，不属于贵族雇主们操心的事，因而不需要学习。在欧洲这一区别被保存到中世纪。8世纪学者阿尔昆，在为查理曼皇帝设计遍布神圣罗马帝国的教育课程表时，把它建基于他称作“文科七艺”的东西，它们一起构成“学习”的课程。“三艺”（trivium）基础课程由语法、逻辑和修辞构成，而“四艺”（quadrivium）高级课程由算术、天文学、地理学和音乐构成。所有这些学科，仍然不是作为实用技能而是作为心灵技能才被教授的；奴仆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照看世俗事务，以使学者们获得自由，让他或更罕见的她的心灵自由漫游——如阿尔昆所指出的：“像漫步于美丽花园中的人们那样，闻闻那里的花香，照看这边的植物，为自己或他人的享受采一束赏心悦目的鲜花。”这并非完全是势利，而是与僧侣的观念保持一致。这种观念认为，如果人们想要自己的心灵贯注于“更高的事物”，从世俗的操心中隐退，即使不是必须的，也会是有益的。

阿尔昆的分类与其他文化中的观念惊人地相似，而这些文化不可能依赖于欧洲人的观念或与它有联系。例如，在古代中国，文学和音乐被称为“修身艺术”，意思是服务于人的感性能力的技能，并与更世俗的技能如油漆或摆弄器具或操持家务等分离开来。这种区分，不是脑力上的，许多世俗技能要求很高的智力能力。实际上，要想从这一视角去看清这种区分的真正意义，非常

困难。这很可能归因于当时中国哲学家们独特的成见，认为美是某种能被归类的东西，有一个“美的东西”的等级系统。与此相反，大多数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贵族，把所有的智力事务都让受过训练的职业人员去做，自己则满足于欣赏结果（对于他们，音乐和绘画是有用的物品，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被买卖），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则是更具实用性的上层阶级的技能，例如打猎和观看礼仪。令人吃惊的是，在两个社会中**数学**都被认为是最高的“艺术”，这主要因为它是**占星学**和其他形式的宗教数字占卜术所必需的。但它是一种神圣的而非世俗的艺术，也与其他基于数字的实用活动彻底分开。这些活动如测量或贸易活动。它们属于一个非常低的社会阶层。

像这样的传统，它更关乎社会地位而不是真正的研究或兴趣主题，是所有依靠奴隶劳动或严格的等级体制的古代社会的特征。无论在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圈子，你的地位越高，就越需要去“理解”世界，并越不需要懂得世界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在东方，这没成为知识进步的障碍，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想到的像科学这样的东西，是受过教育的非贵族出身的人们的重点研究对象。与此相比，在西方，阿尔昆的分类以及基督教会与可能否定圣经教义的任何形式的科学探究之间的尖锐对立，致使实用知识被建基于先例而不是观察上，而停滞不前达数世纪，并使人们把创造的能量贡献于其他事业。在大多数大学中人文著作（古典语文学和**哲学**）**神学**是被研究的主要学科，而数学则有点不情愿地被列入第四。

因此，当理性的科学解释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实用的和非实用的事物之间的鸿沟已持续了数世纪，并且两边几乎都没人认为有任何勾通的需要。文艺复兴还激发了对“美”的巨大兴趣，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可以被讨论、被分门别类，并由此导致这样

的观念：美的事物的创造者——音乐家、画家、诗人———直在追求某种卓越的抽象准则，并且他们能够达到这些高度。这样，两个观念同时产生了："科学"是一门独立于"大学文科"的学问；艺术创造者一直在努力使他或她的工作与某种抽象理想相抗衡。这种抽象的理想就是：完美是可测量的并能被追求。

这样，在18世纪的欧洲，我们达到了可称为现代观念的"艺术"和"艺术家"。狄德罗及其他**百科全书派成员**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来讨论这些观念是什么以及它们与"科学"和"技艺"的关系是怎样的。大体上说，艺术是诸如音乐、绘画、诗歌和戏剧之类的东西——不客气地说，是一种矫饰的娱乐。艺术家是这样的人，他不仅拥有技能（正如这一词的本意所暗示)，而且拥有"天才"———种比我们其他人所具有的更高层次的天生的感性鉴赏力。(男女工匠拥有技能但是没有创造的天才。艺人是这样的表演者，他有技能但没有高级的审美激情：一个悲剧演员或管弦乐队的大提琴手是"艺术家，而耍杂技者或小丑则是艺人。）素描、雕刻、油画和雕塑甚至形成了它们自己的亚范畴——"美术"，而与"实用艺术"（那些具有实际用途的工艺品）相对立。

这样一些使艺术混乱的范畴已持续了几个世纪，并继续形成（或许有人要说破坏）我们今天的艺术态度。艺术和科学之间的鸿沟，似乎还是像它一直所是的那么宽阔，站在两边的从业者们公开地相互蔑视对方。现代科学的复杂性，以及曾被称为"实用艺术"的领域（即，**技术**）的崛起，促使美术的学者和批评家们，采用前所未有的更夸饰更深奥的语言，来描述那些有创造力的人们在其领域中的所作所为。普通大众对理论的主要要求，是引导他们去认识那些令人愉悦的、刺激的、具有挑战性并使人提高的"伟大的"文学、音乐和绘画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巴别塔，似乎是无意义的而令人沮丧。艺术，就像它一直所是的那

样，仍然是批评的经院哲学——词语的墓碑——手中的人质。它们实际上很简单，是人类智慧和人类精神最显著的明证之一，并且能给予任何接近它们的人以激动、提升和满足。

参见：艺术和工艺流派，批评；戏剧；表演艺术；雕塑；两种文化。

苦行主义或禁欲主义（Asceticism）

苦行主义（源于希腊语 askesis，“训练”之意）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理能力或精神知觉、战胜邪恶、培养美德而进行的自我否定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导致一种严谨的生活方式。它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实践，尤其和早期西方哲学（如希腊的斯多葛派、犬儒学派）以及宗教有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宗教中，世界被否定，以便使人将目光集中于上帝或众神身上。特别在印度教与佛教里，包含着上述观念。这里，苦行主义被看作是使人脱离世界的一种方式，人们从而能更好地沉思神圣的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苦行主义教导自我克制，将人训练得能忍受苦难。在佛教里，苦行主义也被视作一种与人的主认同或效法他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佛陀和世界各种宗教中的其他许多伟人，都是从实践非常严格的生活开始的，但后来无不改变或放弃了极端的苦行主义。基督不是一个苦行主义者——相反，人们批评他享受各种宴乐——但是，为着福音的原故，从教导人要舍弃家庭、家人的观点来看，他要求否定自我。基督徒的福音，指内在的操练而不是外在的禁欲行为的炫耀。这和犹太教的下列观念是相吻合的：上帝为着我们的喜乐把世界赐与人类。也许是因为这最后一条信念，犹太教里很少有苦行主义。它主要限于先知与神秘主

义者的言论中。早期基督教教会中，人们把苦行主义看作是对祷告、默想的一种补偿，一种为殉道的预备。在公元后3世纪，亚历山大的奥利金与克雷芒，开始研究苦行主义的理论基础，借用斯多葛派关于灵魂从情感中得到净化的观念（佛教里也有一种指向苦行主义的净化思想）。他们的著作在神学术语方面，为基督教的隐修生活方式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苦行主义是隐修生活方式的主要构成要素。新教改革时期，苦行主义这种为着所有平信徒的东西，重新出现在清教主义中。著名的清教徒伦理，包括诚实、节俭、勤劳（目的是为了让人拥有教育与慈善工作的财力）、禁食，弃绝“今世的”享乐。这些伦理已超越宗教进入世俗世界：例如，它现在具体表现在绿色运动中，并超越了民族、政治与宗教的界线。

修行处（Ashrams）

修行处和佛教的寺庙、西方基督教的隐修院有很大的不同。在本质上，它们是些围绕一位宗教人物形成的群落。《奥义书》传统的智者走入森林默想，产生了由门徒与虔诚的信徒构成的各类群落。他们环绕智者的小屋居住，跟随他们老师的指引。也许，在现代最著名的，是位于西孟加拉邦的香堤尼基坦的泰戈尔群落。泰戈尔在这里进行他的教育与文化实验（尽管泰戈尔群落最初更接近于背弃传统形式的学校、无正规教育和艺术训练的讲习场所，但现在已被批准为一所大学）。另外还有甘地的修行处。它位于阿默达巴德附近的萨巴尔马蒂沙洲，是甘地领导独立运动的一处跳板。

在一个真正的修行处，并没有等级制度。一切都依赖于导师所说的话。人们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来了又离去。他们惟一要

起的誓言，是顺服导师（或老师），遵守群落的准则。这些通常包括参加一定模式的每日崇拜、默想，分担如煮饭、清洁之类共同事务，过一种极为简朴的生活，穿手织的棉袍（有时色泽鲜明），戒绝酒、肉、烟。

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的著作里所提到的最含糊也最充满争议的“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就已经清楚地解释和理解的马、恩著作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这么一种制度：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不存在私有财产、复杂的劳动分工以及重要的外部贸易。地主和他的下属占有和利用农庄，他们收敛地租和税收。以宫廷贵族和君主制度为中心的城市人口，寄生于乡村人口。马克思沿着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描述了这些东方社会，认为它们不能发展为更为高级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是随意的、独裁的、停滞不前的历史死巷，只有通过更先进的社会的外在干预才能转化。

这个概念是充满争议的，原因在于：(1)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种社会所论不多；(2) 它似乎反映了欧洲对亚洲的偏见；(3)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者，运用这一概念来警告对沙皇封建制的不成熟打击；(4) 由于这一概念具有公开的革命政治含义而引起了亚洲共产主义者的激烈争论；(5) 尤其是维特福吉尔当作一条寓言，用于显示共产主义一统天下的独裁对社会造成的后果。维特福吉尔还错误地宣告，马克思有意地抑制了这种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可能危及他背叛自己的信念。

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容易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相一致，因而它在理智上引起了争论：它似乎否定了历史必然行进在进步的道

路上，暗示了国家而不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阶级可能是某些前现代社会的剥削中心，因而这也是充满内在矛盾的。尤其是出于这些理由，这一概念就是斯大林在1930年代的苏联禁止公开讨论的概念。所以，苏联、东欧的不同政见者，常常使用这些概念作为一种惯用手段，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裁。这种影响深远的重大概念，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所提出来解释西方文明独特性的许多不成功的思想之一。

参见："农业社会"，"亚里士多德主义"，"独裁统治"，"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

流水线生产（Assembly－line production）

流水线生产，源于早期自动化工业；亨利·福特为它的发展提供了信念。流水线生产是这么一种生产系统，生产过程被分解成简单单一的步骤，由每一个工人来完成，诸如旋紧螺栓和点焊一个接缝。必须集合或加工的材料由传送带从一个车间转运到另一个车间，产品从标准化的部件中渐渐组装出来（与更早时期劳动密集的方法相对立，其中每个工人要完成不同的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生产制度超出了流水线，扩大到生产过程。随着科学管理为达到努力的最低化和工时的产量最大化而运用时间与动作的研究，这种技术就广为传播。流水线生产，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概念的逻辑延伸。

卓别林在其《摩登时代》的电影中，把许多人在流水线上进行简单重复的工作引起的问题漫画化。但是，过程的步骤还原为越来越简单的要素，这才使机械化成为可能。重复劳动的某些问题，因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人来完成那种比人手更精确的任务而有所缓和。某些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已经出现。但是，在许多高度

“发达”的工业社会，由此引起的失业问题仍然在探索之中。

同化（Assimilation）

同化（源于拉丁文，意为“熟悉”）意指弱势族群认同而非疏离社会强势文化的向心过程，不过，学者们越来越愿意使用**种族特性**这个更具动态性的术语。

参见：**冲突理论**、**共识理论**、**文化**、**规范**、**种族**、**社会整合**、**社会化**、**社会**、**典型化**、**价值**。

占星学（Astrology）

占星学（古希腊语，“关于天体的研究”），是最古老和最普遍的人类活动之一。它作为一种“伪科学”（即，一种假装依靠于客观调查与理性证明的活动）而被广泛地驱除，并且，它具有的巫术和江湖郎中的味道使它声名狼藉。但是，它存在于遍布世界的各种社会中，并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如果没有它，人们可能不会与任何种类的迷信或伪科学打交道。

占星学有两种。“自然的”占星学是绘制天体图表，及制成依据天体在天空中的位置及运动数字表格。它是天文学的前身，并且是仍在通用的时间划分诸如年、月、周、日、小时等等的源头。（这导致了在早期数学中，十进制计算系统被认为是旁门左道，因为最方便的时间划分不是十进制的，所以，以此为基础的数学，使用的是不同基数的单位。）这种占星学与宗教和社会实践有关，它的技能是（经常受到令人妒忌的保护）祭司或其他精英们的特权。他们的图和表，以观察和计算为基础，这使他们能预测一些重大的事件，诸如（在非常原始的社会中）太阳在夜晚

之后会返回，冬天过后是春天，以及（在较发达的社会如古埃及或玛雅王国）洪水或干旱的威胁和诸如此类的大灾祸。例如，在8世纪，圣比德把他的大部分时间，奉献于解决并著述关于基督教纪年中复活节及其他“变动节日”的精确日期的计算方式，他的工作至今仍对我们关于日历的理解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在许多古老的社会中，虽然“自然的”占星学最接近于我们现今认为是“真正的”科学，并且，它的操作者属于该群体中最博学和具有最深奥智慧的社会成员，但有两个因素最终阻碍了它的发展。第一，缺乏能精确观察天体的工具及数学系统或发明。这些系统或发明，除了（用我们的术语说）最粗糙的计算外容许一切可能性存在。第二，占星学与宗教的相互依赖性。因为占星术士与天体（它们被认为是在众神的控制下）打交道，因为他们能做出预测，他们便被认为拥有常人所无的与超自然的联系和能力。甚至在像古代中国和古巴比伦这样发达的社会中，巫术和秘传的咒语仍是占星术士所必备的工具，使他们与女算命者、占卜者或其他形式的先知结成同盟，而不是与例如测量者或商人等善于数字计算的另一主要群体联姻。

第二种占星学是“审判的”占星学，它依赖于第一种，但又与其有本质的区别。与仅仅观察、记录于图表并计算天体的位置不同，它的从业者试图把他们的主顾与此类运动故意地联系起来。通过询问人们出生的精确时间之类的问题，推算出那时的天空形象，然后把它与后来任一时间（如协商的时刻或未来的某一日子、时间）的天体状态作比较，从而做出将发生什么，当事人该如何应付的预告。据称，在天体与每个人的性格与生活方式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因果联系：我们出生的确切时辰被认为像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而我们的整个生活都能被追踪。我们遭遇的人越多，这类计算便越复杂。例如，在古代中国，皇帝有一大群

皇后和宫妃，并有一个完整的占星术士机构致力于弄清皇帝和每一个女人性交的最有利时辰，以保证生下健康、“幸运的”继承人。迦太基的统帅汉尼拔，只在他的占星术士宣称有利的日子作战，而且如果战败便归咎于选错了日子而不认为是罗马军队的策略高超。（我们不应对他们过于嘲讽，其实拿破仑和蒙哥马利一样的迷信，而在当代至少有一个美国总统——里根，据说除非得到他夫人的占星术士的赞同，他不作任何出行。这既可说是轻信也可说是审慎，因为这些人操纵着无数人的命运。）

在世俗社会中，这类占星学一方面退却到象牙塔，它的从业者成为富豪和掌权者面前备受尊敬的教师；另一方面则降级为发表在畅销报纸上面向大众的预言，成千上万具有相同出生迹象的人们从中得到温和的劝告，要在压力下保持平静；或者获得慰藉，15号将是幸运日。但是，在世界上几个最大的信仰体系中，包括**佛教**、**印度教**、**神道教**和**道教**，占星学受到高度的崇敬并成为人们生活的有机部分。这既表现于婚礼和葬礼此类过渡仪式中，也更多地表现于迁居或生意买卖之类的世俗事务中。在这种场合，占星学绝不仅仅是娱乐，而是与某种或许我们未分享的信仰体系相关的。它的有效性是建立于客观的可证实性呢？还是依赖于这样的事实——历史上曾有无数的人依赖于它并使他们能生活下去，使它获得了超出仅仅是相信的明证？

参见：信仰；占卜；手相术；巫技。

天文学（Astronomy）

天文学（古希腊语，“给星星命名”）的诞生，始于人们对夜空星星的移动的观察和追踪。最初，人们自然地假定星星、太阳和月亮全都绕地球运行。可是，那些行星——像明亮的恒星的客

体，不能很好地适于这一图画，而显现为与固定的恒星背景作反向的运行。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新的解释。

哥白尼（1473—1543 年）第一个认识到，如果把行星考虑为是与地球一起在绕太阳转，它们的运行方式便能得到解释，这样便显示为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并把地球贬到卫星的地位。开普勒（1571—1630 年）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系统，表明行星的运行轨道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并且太阳是其焦点之一。这种运行方式。被牛顿证明为是万有引力性质的产物。

自牛顿时代以来，天文学已变得极为复杂。早期的望远镜只能从天空中观察到可见光。然而，可见光只是电磁光谱的一小部分。今天，从无线电波、微波到紫外线和 X 射线领域，我们已对电磁光谱有大量的利用。我们的大气层是一个观察的障碍，它的闪光造成观察上的混淆或模糊，它还衰减除了可见光波和无线电波之外的所有频率。因此，许多观测台，都建在大气较少的高地。这样可见光能以较少的歪曲形式被探测到，并使其他频率以更大的密度抵达望远镜。计算机和电子造成了天文学上的革命，极大地减少了跟踪和分析客体所需的时间。

望远镜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依据其要探测的辐射类型而被设计出来。无线电望远镜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盘，它之所以需要很大，是因为无线电波有一米数量级的波长。光望远镜要求高质量的镜子和透镜，好的望远镜镜面的平滑度必须达到这样的要求，其表面的不规则要小于光的波长——千分之一毫米。微波望远镜的底盘通常有几米长的直径。用其他波长观测太空的追求导致了太空望远镜的设计，它能消除大气的歪曲。

天文观测，揭示了有关宇宙的大量的信息。从中我们了解到宇宙的早期生命，恒星和星系的进化以及像中子星和黑洞之类的怪异客体的存在。因为我们观测到的是以光速旅行的电磁辐射，

所以一个客体越远，我们正在看到的便是它历史上的更早时期。如果一个星星发出的光花了1000年才抵达地球，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便是这个星星1000年前的景象，而不是它今天的样子——此时它甚至可能已不存在了！因此，要想看到宇宙早期是什么样子，我们便盯住非常遥远的客体。

天体物理学（Astrophysics）

天文学（古希腊语，"给星星命名"）与天体物理学（古希腊语，"关于星星的性质"）之间的传统区分在于：天文学家观测天体而天体物理学家寻找对它们的解释。由于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范围都已扩展，这一区分现在已被超越。关于恒星和行星的位置和运行的观测与研究，被单独地从天体物理学中分离出来。主要属于天体物理学领域的课题有广义相对论，宇宙学，恒星的结构和进化，星际物质的构成，以及对某些由剧烈事件产生的极高能粒子的研究。

广义相对论由天体物理学和天文学共同检验。关于水星运行及太阳引力场造成的光偏移的研究，是天文学证明的例子；天体物理学证实的一个例子是双星系统的旋转减缓。这两个恒星相互绕对方运行，以及它们的轨道速度减小比率是由广义相对论精确地预测到的。

对于宇宙论和早期宇宙的研究，需要各种各样的技术。其中一项涉及对所谓三度背景辐射的仔细测量。它是宇宙大爆炸的残余物——它所保留的是那个创造宇宙的剧烈爆炸事件的残骸。我们把它看作是均匀的能量背景。最近，在此背景中观测到的细微的不均匀性，给予我们追踪星系是如何进化的重要线索。

通过观测恒星释放的光的频率，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是由哪些

原子构成的，因为每一个原子释放出一组独特的频率。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到星体如何创造原素和自我进化。

星际物质，是一个有巨大魅力的领域，因为我们没有确实地看到它。恒星和星系的运动方式表明：在其周围存在的物质比我们实际见到的要多得多。人们猜想，所谓的“黑暗物质”——未释放辐射因而我们不能看到的物质，可以提供对失去的物质的解释，并且，这类物质可以存在于恒星之间的虚空中。

释放高能粒子的来源，有超新星残余物，射电星系，脉冲星和类星体。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早期宇宙的客体，它们的光才刚刚抵达我们。通过研究它们，我们可以了解宙宇的进化。

返祖现象（Atavism）

生命科学中，返祖现象（源自于拉丁文 atavus，意思为“曾祖父的祖父”）是指个体出现某些更像祖先而不是双亲的特征的现象。孟德尔遗传学说为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在几代中已消失的特征再度出现的现象并不罕见。返祖现象这个术语常与“退化型”或“返祖型”的出现相联系，但事实上它属于遗传畸变，例如：唐氏综合症是一种先天性疾患，它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祖先的返祖型，由于这一综合症独特的面部特征，因而又被称为“蒙古样痴呆”。

参见：遗传连锁；遗传学；孟德尔学说。

无神论（Atheism）

“愚昧的人在他心里说：没有神。”我们在《圣经》里发现：《旧约》经文准确地概括出无神论的态度。但是，那里的问题在

于：人是否仅崇拜和顺服真神耶和华或一位假神。甚至在《约伯记》（写于公元前4世纪）中，被质问的内容都不是神的存在而只是他的公正、怜悯、慈爱。当约伯最后被证明是无辜的，他的虚伪的朋友们据说“不认识”神，这意味着由于他们所有的信仰异议，他们对一切都不理解。在古希腊世界，作为无神（“没有神”）的人，同样是指拥有各种假的信仰和不参加官方崇拜活动，而不是指根本没有信仰。在罗马时代，早期的基督徒与犹太人经常遭到指责，说他们是无神论的，因为他们并不制作关于他们的神的形象，没有祭坛、圣殿或神龛，也无任何可辨认的祭司职位。他们的信仰，是谋反性质的，因为他们不参与任何公共的献祭。虽然他们为皇帝祷告，但他们并不献酒给皇帝的“守护神”(内住的灵)。直到18世纪末期，基督教世界依然保留着许多同样的态度；在英国，亵渎照样是一种可提起公诉的犯罪行为。在一些穆斯林国家，无神论者由于他们的现实存在而被认为是一种对神的侮辱，由此遭到相应的惩罚。

在和真神一样的意义上，由于假神不能说成是存在的，无神论（一个否定词）就成了指对信仰的否定。不但神不存在，而且坚定地断言信仰神是错误的——一种现代的态度要求有神论的论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1752年的里斯本地震中，成千上万忠心的天主教徒死了。这事件，使许多欧洲知识分子采纳了这样一种无神论立场。进入所谓的理性时代，人的理性被认为能够解决神的存在问题，且答案却越来越成为否定性的。19世纪，科学的众多发现使人们坚信对宗教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它们逐渐削弱了尤其是关于创造说的经文叙述的字面解释。20世纪，“神学的无神论”主张：“作为一个概念的神（上帝)”已经死了；为了考虑现代的无神论，应彻底改造神学语言；正是由于神的干预不再可能用于解释我们不理解的现象，须抛弃关于神存在的传统论

证。这样发展的结果，是理性支持的对神的信仰，已不再是准则，神学家们把形而上学的领域放弃给哲学家了。

正如古希腊的思想流派（以诡辩派、犬儒派为代表）对流行的有神论展开过攻击一样，东方古代宗教中也存在同样的现象，过去和现在都呈现出无神论的发展倾向：教导无神论的各种哲学流派，与借助强调人的努力而事实上充当无神论的各种宗教流派。但是，对西方人而言，当全部东方宗教所欠缺的即是一位造物主——神的西方概念或一种可比较的信仰体系时，他们的危险在于把东方宗教归入无神论的范畴。东方宗教依然基于对各种超自然现象的体验，这尤其体现在**儒教**与**道教**中。在那里，道德的律法，像一个自然的过程统治着世界，得到人的遵从；还存在关于仪式对平息诸灵是否是必需的争论，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诸如慈善之类人的属性能否纳入这种道德力量。

在现代的印度，很少会遇到自封的无神论者。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通常是因为他们受到西方的影响。尼赫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感到：印度有“太多的宗教”，这对社会改革是个巨大的障碍。构成对印度有神论最为激烈的反对力量，来自**佛教**与**耆那教**。有这样的论证：一个围绕德这个概念展开的体系（参见**德宗**），本质上是无神论的，由于一切都依赖于实现人的德，在来世修成更好的业。耆那教的目标，是通过**苦行主义**把人从这种体系中解放出来。虽然耆那教教徒接受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但他们相信它永远存在而不是被创造的。对佛教徒而言，世界是无常的，所以，它不可能被一位不变的神创造。无论如何，这位神都没有创造世界的善良动机。

亚特兰蒂斯岛思想（Atlanteanism），参见：乌托邦思想

大气和生命（Atmosphere and life）

地球大气的构成为79%的氮、21%的氧和少部分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数量虽少，但却正呈上升趋势。对下面这个事实，人们了解的不多但肯定会感兴趣：地球大气现在的成分已远远不同其原始状态了，那时的大气不宜于生命。大气如此剧烈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最早的大气可能含有氢、氮、甲烷、氨、二氧化碳等气体，因为这些气体在其他行星的大气中也能发现，这些气体的大部分被火山喷发出的气体取代了，水蒸气、二氧化碳、氮、氧化硫、氯、氟是火山喷发气体的主要成分，水蒸气很快就会转变为雨水降下，而其他化学性质较活跃的气体则与别的气体结合为其他物质。因此，在地球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内，大气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只有少量的氮气。现代大气的形成需要清除大量的二氧化碳，释放大量的氧气，同时需要氮气数量的剧烈增加。

转变的迹象出现于前寒武纪的岩石中。最早的沉积岩中有一些是铁矿石，此种岩石只有在缺氧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在前寒武纪的后期，铁开始沉积为“红色矿床”，这表明已有少量氧气的存在。在这两种沉积岩之间，大概从30亿年前开始，出现了叠层石，它是由蓝绿色细菌的化石化形成的。蓝绿菌如今仍可在澳大利亚的海边的海水中发现，它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们不呼吸氧气，但却通过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它们是最早的自由氧气的制造者，但是它们对大气成分的影响并不大，因为这样形成的氧气很容易与其他残留气体和因为风化而形成的其他物质化合，只有克服了这一障碍，其他的过程才会加速氧气的形成并减少二氧化碳的含量。

最早的绿色植物是生活于海洋水面的浮游植物，像其他绿色植物一样，它们也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同时又通过呼吸消耗了氧气。但是，由于它们生活于深海中，它们的细胞中的一些碳化合物沉降到海底并被封闭于沉积岩中，由于那里气温低、黑暗无光并缺少氧气，因而不会氧化腐烂，这样就形成了少量的氧气净剩余。

当陆地上的植物越来越多并越来越进化，它们进一步导致二氧化碳的减少和氧气的增加，从3万5千万年前开始，尤其是在所谓的泥炭纪，有些陆地植物由于沉降到了泥泽中而没有氧化腐烂并最终变成了煤和石油，这一时期大气中的氧气含量增加到了1%。

最近一段时期，尤其是从1万4千5百万年前的白垩纪开始，碳的沉积开始大量出现，小型的海洋动物利用海中的可溶性二氧化碳形成碳酸钙外壳，这些动物死后，沉积到海底并变成白垩，由此形成的白垩数量非常巨大，这点可由英国多佛的白色山崖看出，白垩的巨大数量表明，上述过程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数量减少的主要途径。

这一过程的效果可由封存于各种“碳仓库”中的碳的数量估计出来。如果假设如今仍残留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为1个单位的话，那么，陆地上的植物和土壤中的碳就是5个单位，溶化于海洋或海洋沉积物中碳超过14000个单位，岩石中的碳主要以碳酸钙的形式存在，超过71000单位。由此看见，自然具有消耗大量二氧化碳的能力，但这种过程非常缓慢，并不足以扭转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燃油消耗而导致的全球变暖效应。

植物和细菌的活动也导致氮气含量的上升，尽管氮气本身的化学惰性也是其数量增加的重要原因，还有部分氮气是源于火山喷发的氨气。现在，氮气通过土壤和植物进入动物或植物组织的

数量保持稳定，而且不能被腐烂释放的氮气数量非常小，还有少量的氮被溶解了，但这些又从海藻和循环过程中得到补偿，总之，氮气的减损远远慢于其由火山喷发而生成的速度，从而使氮气成为大气的最大组成成分。

大气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物理活动和生物活动互动的结果，其中也包括更为复杂的生命形式的进化。诸种机缘巧合造就了宜于人类生存的理想的大气，这一奇妙的过程促使一些人为之寻求神圣的缘由，还有的人认为这是大地之母**盖亚**的业绩。

无调性（Atonality）

调性音乐是这样一种音乐，在其中听者能持续地把他或她所听到的和弦与一个调性中心联系起来（在许多 18 和 19 世纪的作品例子中，对于一个特殊的调音，一件作品能被称为例如“C 调”或“升 G 小调”)。在无调性音乐中，这种对和弦中心的感觉为声音的连续感觉所替代，其中每一个别的和弦与其他所有的和弦是平等的。因此，虽然术语“无调性”曾（错误地）专用于**十二音阶音乐**，但它能描述任何以和弦的含混、减弱与增强主导人的感受的音乐。它不仅能包括 20 世纪作曲家象麦西恩、蒂皮特或瓦雷塞等人的作品，而且也包括从巴赫的赋格到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或德彪西的钢琴序曲等更早期的作品。根据同样的特征，许多 20 世纪的音乐如巴尔扎克的，普被认为是“无调性”的，现在则能清楚地听出它有强烈的调性驱动。它基于从某一包罗万象的“调音”之和弦的出离和返回。

赎罪（Atonement）

赎罪（'at－one－ment'——和解、协调之意），最初是一个法律术语，指当事人双方的和解，后来几乎是因为专为神学上的使用而将'at－one－ment'合并成 Atonement（赎罪）。在佛教与犹太教中，赎罪被认为是由神圣的一方发起的。这种行动不看人的罪及软弱导致的疏离，乃是出于神圣者的怜悯和慈爱。基督徒相信：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和好，是通过耶稣基督生、死的献祭来完成的。人类陷入罪中太深，太可怜，受到人的处境的缺陷制约太多，如果人要提出和解，基督的死就是必需的，为的是更新人的意识，使人类从罪的结局中惊醒，从而胜过死亡、平息上帝的震怒。

态度（Attitude）

态度（源于拉丁词 aptitudo，"合适"），作为心灵的一种属性，是人类所独具的，其他生物虽然也采取某些姿态并随之产生特殊的行为后果，但它们似乎毫无例外是本能性的。当一只猫高视阔步或一只亭间鸟左顾右盼时，似乎不是故意选择的结果，如果人这样做，那却是有意的。但也存在一些模糊的区域，例如，海豚与人或靠近人时的"游戏"，或者宠物明显地改变它们的行为以取悦主人。然而，即使野狗趋向于群体等级中的更高地位的行为方式，甚至这类反应对于人类来说，也仅仅是一种本能。20世纪早期的一个著名实验表明，"聪明的汉斯"，一匹能明显地加减数、用踏蹄给出答案的马，实际上不过是对其训练者的身体语言之微妙"暗示"的本能反应，而这一点它的训练者甚至都没意

识到。

人类本能地以相似的方式发生行为。但是，我们以某种方式意识到世界，其他动物则不能。我们持续地重新审视我们对于所遭遇的状况的一系列反应。我们计划、促发并控制事件。我们能把我们的心灵投射到过去或未来，用想象替代现实。所有这一切的总和，便是态度。我们常常观察自己、想象自己、判断自己——没有其他生物这样做——并且我们依据情况来调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一种智力的构造，从属于理性过程。（对于我们，不采取理性的行为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可以说，从民主决定的形成到诗的写作，从谈恋爱或发动战争到制造手套，态度是人类每一种活动的本质构成因素。我们探索和解释环境的决心，是原初的自恋行为，在此选择的基础上，整个人类知识及幻想的大厦得以建成。艺术批评家谈及态度时，仿佛它是创造性的舞蹈家、音乐家、作家等的特殊品质。他们寻找（确定）作家对他或她的素材的“姿态”，或是表演者对观众的“姿态”；他们思考影响和策略，企图揭示隐藏于作品中的态度，并因此净化我们（观众）对作品的态度。但是，这仅仅是对于所有人类活动中都存在态度这一事实的一种精练的（有人会说是过分净化的）反应。牛顿或爱因斯坦的工作所源出于并依赖于态度的，正如广重的或贝多芬的一样多。——或者，转入一个更有争议的领域，佛陀和基督的工作也是如此。人类经验行进得越远，就越是依赖于对更多的过去经验的总结，并且，这种一切过去的人类文化的可获得性，以及它所提供的现时选择的范围，是我们人类独有的另一种财富，同时也是我们的慰藉和光荣。总之，返回这一词语的本义，态度是为我们在世界之所是和所为而“适合”我们的东西。而结论是明显的：如果我们的行为方式导致把我们种族在这个星球上永远地灭绝，那也是态度，不是本能

的或附带的行为，而是选择的结果。

听众（Audience）

听众（源于拉丁语 audire，意为“听”），在它作为**传媒**文本的经验的潜在接受者的意义上，越来越多地成为传媒研究争论的焦点。在传媒学范围的一极上，是无助地被文本感动的消极观者的模式，而在另一极上则是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文本的主动观者的概念。

许多论证都集中于“效果分析，宣布大众传媒无疑有力量把意义强加给观众，从而引起直接的社会政治效果（有时，这里可以用皮下针头的注射作类比）。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则力求揭示，在电视暴力和在某观者群体中引起的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联系。在过去，针对喜剧、广播和黑帮电影也提出过同样的控告。这些作品中许多是无说服力的，但它仍然证明在激发对大众传媒的道德怨恨时却是有力的、颇受欢迎的。

这种相对忽略观众主体性的情形反映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他们认为，正在发展的大众传媒通过电影、**广告**、流行音乐和电视而成为意识形态的促进者，这种意识形态有利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再生产和对工人阶级的顺从。近几十年来，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在英国文化研究领域中工作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积极主动有意识地与文本互动的观众概念，代替了强制观众的概念。在解码过程（这多少依赖于社会经济背景）中的观众，可能通过创造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本阅读来确认，但这些观众也同样抵制统治，其方法是创造协调的或对立的阅读。因而，按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说法，统治集团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观众，但必须通过斗争而“赢得统治”。

同样，效果分析还受到另一种研究的反对，后者不是追问传媒对人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是追问人们对传媒有何作为。使用和满足理论，研究观众如何以自己的意图运用传媒来满足自己现存的需要。因而，个人会买特定的报纸来确认自己的政见，或者由于喜欢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而安上卫星信息收视器。用美国社会学家 H·加芬克尔的话说，上述两种读者既不是消极的，也不是“文化快餐的消费者”。上述理论的批评者则反驳说，读者进行自由选择的思想是一个神话，所以必须重新集中研究谁创造了传媒，为什么要创造传媒。

更新近的研究，则力求把“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发展与强调葛兰西的文化研究中的解码过程融合起来，在这种理解中读者被严格限制在社会立场上，但是在这一语境中自由地以不同方式进行解码。研究的中心是看的经验，而同时又意识到，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明显世俗化节目又怎样从根本上影响了看的行为。

参见：“编/解码”，“表演艺术”，“大众文化”。

奥古斯都时代（Augustan age）

奥古斯都时代的实际历时时期，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统治期（公元前 27 年—公元 14 年），在当时及自那以后，它便被称为文学的**黄金时代**，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李维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光耀于文坛。18 世纪有点自我崇拜的英国作家们，把他们自己的时代描述为第二个奥古斯都时代，声称他们自己是他们认同的古罗马的同样的“黄金般的杰出人物”：风格的优雅、言词的有力和**趣味**的高雅。涉及到的主要作家有：蒲伯（他发明了与奥古斯都的罗马的这种类比）、巴特勒、德莱顿、琼生、斯威弗特。但是，18 世纪奥古斯都主义所表述的理念和肯定的优

点，可能也曾被狄德罗，伏尔泰或任何其他的**启蒙运动**的作者们宣称过。

自给自足（Autarky）

经济学上的“自给自足”（源于希腊文，意为“自足”）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目标，即一种经济体制完全自足，创造全部消费品而无需从外进口任何东西。但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以竞争价格生产一切必需品，因此，实践中自足自给只会迫使它的信奉者缺衣少食、相对贫困。

为了免于对外来物质供给的任何依赖，在战时更好地保卫社会，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努力实现自给自足。另一些国家既追求自给自足，又保持社会闭关自守，维持土著人口的习惯风俗和血统的纯洁，或者维护领袖人物的控制力量。在今天高技术生产和人们普遍交往贸易的世界上，这些努力事实上必定失败。

导演主创理论（Auteur theory）

在影视批评分析中，导演主创理论或原则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从二战结束以来，这种理论一直是争论的领域。法国电影评论家生造了“导演主创理论”一词。他们在占领期间被剥夺了好莱坞电影，到战争结束，他们又热情拥抱和再度评价好莱坞电影。在巴赞主笔的《电影手册》杂志中，就有许多关于这一理论的争论。这家杂志，成为法国新一代电影评论家的重镇，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颇有影响的制片人（如J·戈达德，F·特津富特，C·夏布罗）。

1954年，特津富特发表了一篇“论法国电影的一些趋势”

一文，引起广泛争议。文中责难传统的法国电影重形式与风格的保守倾向，尤其是它们过分依赖文学作为其创作的惟一源头。作为这种批评的一部分，先前被贬低的好莱坞 B 级影片被重新给予地位和更高的评价。导演主创论的基础是视觉风格、天赋视觉才能和创造性；有些导演表现了这些方面，尽管好莱坞制片体制对此强加了许多人为的限制与界定。因而，人们认为，是电影导演，而不是原著的作者，才是特殊的创造性视觉形式的根源。

《电影手册》以其“导演主创的政策”而在 1960 年名噪一时，多年来又对围绕特殊制片人的价值或别的方面引起的争论负有责任。这家杂志，因其独特的风格和嘉奖导演而著名于世，比如说它宣称有些导演是天才的作者，另一些导演只不过是聪明的技术员（或执行人）。其撰稿人也明显特别关注那些在特定风格范围内、外景拍摄地工作的导演，他们有第一手电影剧本和分镜头剧本，而不是从小说和戏剧中采用改编的电影素材。

导演主创理论，后来生根于英美批评，在美国尤其是通过塞利斯的著作为中介。这种电影批评方法，在许多层面上都遭到了批评，包括它的评价的武断性和潜在的精英主义。但它对传媒分析者和批评家仍然有用，尤其被当作一种可贵的手段去再评价大众商业影片。

参见：“批评”，“新浪潮”。

本真性（Authenticity）

本真性是人类学家在真正理解异文化时追求的根本目标，自从 20 世纪 20 年代**田野作业**成为人类学的标准训练以来尤其如此。一个社会如果未曾被传教士或殖民者涉足，则会被认为是更具“本真性”，许多早期的人类学家都想捕捉这样一幅淳朴未开

的社会画面，克利福德所谓的“人种学的现时”就是一个在时间中凝固了的社会画面，这种静态社会的意象常被用来反衬变动不息的西方**文化**。

现代人类学家运用哲学家阿多诺的观点，考察了当代西方文化对本真性一词的用法，例如，旅行（参见**旅游人类学**）可被视为对通常存在于远国僻壤的本真经验的求索，而对那些待在家中的人们而言，通过接触本真文化的片段，不管是借助于电影、书本还是博物馆，都有可能将异文化的本真性融入其个人经验之中。本真性概念的问题是它预先假定了不同文化的视野和象征是能够相容并存的。

在考察异文化的文物是否被按西方的标准评价和篪改时，本真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艺术品收藏和交易是真品升值，而仿制品则相反。同样，这个概念还被用于整个文化，即作为用以评价其文化制品的准则。

参见：人种历史学；视觉人类学。

集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集权主义，是一种政府形式的信念及其实践，其中，统治者并不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行使权威。按照这种定义，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政治体制和我们现代的政治体制，都是集权主义的。正是因为如此，批评家有时也责备说，集权主义是一个时髦的“无所不包的”或剩余的范畴，用来描述一切非民主的政治体制，如**独裁**、**专制**、**法西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国主义和**极权**独裁统治。

更加有用的是，政治学家把集权主义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对比。两种制度，都是强加于被统治者身上的，而根本

没有真正的政治竞争。但是，集权主义制度，常常没有支配一切的单一意识形态，无需通过单一的政党制而组织起来，不期望控制整个社会系统，而仅仅是挫败对手。

在西方自由的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的冷战期间（1945—1989年），西方右翼政治家常常认为，对于共产主义（极权）制度而言，集权主义是可供选择的，因为集权主义可以得到改良，而极权主义只能通过战争来摧毁。外交政策的涵义是，西方民主制应该（有所批评地）支持右翼集权主义制度，而有必要时即通过战争来反对左翼极权主义制度。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内部地崩溃（1989—1991年），这就表明或者西方右翼是错的，或者共产主义制度是集权的，而不是极权的。

一些社会科学家相信，像帝国一样的集权主义制度，在**农业社会**是非常可能的，因为权力资源不能广泛分配；相反，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中，权力资源和治国技术在人们之间广为传播，这就削弱了集权制度可能维持或至少有效地得以维持的可能性。但愿此论不虚。

参见：“亚细亚生产方式”，“工业社会”。

权威（Authority）

权威（源于拉丁文，意为“创始的权力”）指人们必须遵从不能违背的**权力**，因为它被承认是合法的。承认“权威”的人认为，权威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因此实施权威保护其对象往往是有效的。权威也用来意指在一个社会或国家中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既定政治规则。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区分了三种权威的“理想型”：合法的理性权威要求遵守经由有序的公众程序所建立

的形式规范；传统权威要求遵守传统习俗和陈规；奇里斯玛权威则取决于追随者相信其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能力。在韦伯看来，任何政体看起来都有一定合法性，即使只有极少数人承认它，即使它依赖于暴力。

在**社会学**中，权威一词被宽泛地用来表示领袖的影响力。社会心理学在探讨小群体的活动时，也用权威一词表示对个体信念和行为的影响因素。

参见：奇里斯玛、社区、统治意识形态、霸权；理想类型，意识形态，合法化、社会控制、社会、国家。

孤独症（Autism）

孤独症（源于希腊语，意为“自我”）是一种心理状态，当一个儿童没能成功地掌握认知手段而且不具有与他人包括父母亲沟通的能力时，就表现出此种心理状态。这些儿童往往表现出对无生命之物有浓厚兴趣，否则他们也许会被视为低能儿。人们认为孤独症开始于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一出生就有了。孤独症会导致长期的焦虑，致使患者不能与别人沟通，缺乏社交技巧。这种与他人的交流障碍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模式，贝特尔海姆在其《空虚的堡垒》一书中指出，这种心理状态是由于儿童在早期与母亲缺乏情感交流的结果，但是，研究发现有些患孤独症的儿童是对噪音特别敏感，这种症状可以经由训练彻底治愈。

自主（Autonomy）

自主（源于希腊语，意为“自己为自己立法”、“自我管理”）在**心理学**中是指一个人克服了儿童期的依赖性而获得成人的独立

性。一个成人可能在心理上有一种病态的依赖感，自认为他依赖于人而不是自主的，这种依赖神经症的根源在于误认为他人拥有机会而自己却没有。关于自主性是如何获得的，心理学家有不同的认识，虽然所有的成长心理学学说都同意自主必须包括相对于父母的自主。

在**精神分析学**看来，自主取决于是否成功地度过俄狄甫斯阶段（参见**俄狄甫斯情结**）。俄狄甫斯期的第一阶段发生于当儿童觉得在其与父母的三角关系中需要有同性的双亲伙伴之时：在这一阶段，双亲之一被视为篡权者。随后，儿童发现要夺取这一位置是十分危险的，儿童将自己视为篡权者并且害怕遭到报复。这一问题通过掩饰性别以及与同性双亲的认同而得以解决。当孩子到了青春期，开始感受到异性的吸引时，双亲相异的性别才被重新注意到。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会出现恋父或恋母的行为倾向，以及精神病性的依赖症。

在荣格心理学看来，在童话故事中，自主性体现为儿童获得象征性的礼物的帮助，获得特殊的助手支持，但这些故事强调的是儿童依靠自己找到道路，并最终找到同伴。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对父母的依赖就会转化为对成年伙伴的依赖，就无法获得自主性。自主意为着坚持自己的要求、独立抉择并寻求自己的伙伴。

在政治学中，自主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表示一个国家、地区、群体或个人摆脱威压或外界影响获得自由的程度。当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称“国家的自主”时，其所谓自主的意思可能是指国家官员追求国家利益的能力，而非仅仅体现和满足社会统治集团的利益。

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所有被承认为独立的国家都是自主的，不受其他国家的支配。实际上，独立国家的自主性受到种种限

制，这些限制来自诸如联合国、北约、东盟之类的国际组织，欧共体之类的超国家组织，以及国家间的经济、文化、政治的相互依赖性。

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地区或个人也会要求自主权，而不是相互依赖。也就是说，他们寻求在国内事务中的自治政府，而不是在国际事务中的主权，这种自主权可能采取联邦制国家内的州或省自治政府的形式或者超领土的形式。

个人的自主是西方大多数自由主义的中心观念。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自主性涉及关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和法律、个人权力与公平分配等问题的论争，最近，自主观念在文化多元论的论争中发挥着中心作用。

参见：联盟、民主、联邦精神。

前卫派（Avant-garde）

前卫派（法语，“前列”）可以是艺术中任何创立或运动的一部分，只要它被其支持者或敌人判断为领先于其余的艺术，而与落在后面和 relardataire（落伍者）或至少是与现状保持一致的人，形成鲜明对照。术语前卫派带有政治的和社会的含义：“我是稳定的，可靠的和赞同社会现状的”；“你是个危险的反动分子”；“她是个左翼前卫派”。艺术创造者与社会的疏离与消费者的被现行社会规范抛弃之感受的混合，使这整个概念成为**浪漫主义**的副产品。同时，它又能令人安慰地（并或许是创造性地促使）去想象自己不是在主流之外，而自身就是主流，只要世界其余的人能赶上并加快步伐的话。

艺术前卫派的整个概念的产生，决不会早于 19 世纪。在那之前，需要委托任务的艺术创造者的表面目的是符合人们的预

期，或可能以可预料的并无威胁性的方式迷惑他们。(这些令人窒息的程序，既非原初的亦非发明。随便以一种艺术如戏剧为例，埃斯库罗斯和易卜生，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都要服从当时的传统——各自都服从古希腊宗教悲剧结构和“佳构戏剧”的结构——而他们的作品，刚好是当时的观众和戏剧鼓吹手如伊奥奈斯库或奥斯本所爱戴倡导的那种优秀。)但是，19世纪欧洲人的真实情况是，他们受充满战斗性的艺术家的浪漫观念的影响（这一品质的衡量标准，取决于他或她与现行潮流的对抗，至少也不能被通常的专家们所欣赏)，提出前卫派的概念，不仅用于解释不被欣赏的创新，而且常常用于使艺术中的极端激进主义合法化。

在使用前卫派这样的标签时，我们真正谈及的大多是艺术中的时尚而不是艺术本身。把前卫派贬低为某种你不能理解的东西或发现它的威胁性，是比较容易的；而试图领悟它的衡量标准则较难。把自己或你喜爱的艺术家的艺术创新鼓吹为前卫派，通过说这件艺术作品就在于它超前于时代以此解释多数人的冷漠也同样是很容易的。由于对所有的样式来说，时间是惟一真正的裁决者；从长远的观点看，标签和流派的首要目的，是作为一种刺激和/或一种鞭策，对创造以及艺术创造的那个胆大妄为的婢女——鉴赏发生作用。或许，如果我们艺术家和消费者一起都想要牢牢抓住艺术，那么为了保持警觉，我们需要噪音，几乎就像我们需要真正的艺术一样。

参见：趣味。

选择公理（Axiom of choice）

选择公理，是20世纪数学中受到最激烈地辩驳的原理之一。一旦无限的概念经由康托尔（1845—1918年）开始获得审查，

选择公理便似乎是极易表述的东西；（在宽泛的意义上）它使无限集合发生作用非常像有限集合。选择公理已获得几种不同的表述，做出表述的有热麦罗（1871—1953 年）和弗莱恩凯（1891—1965 年）。他们是现代公理**集合论**的发明者。

这些等价表述中的几个如下：(1)“古典选择公理”：对于非空集的每一集合 A，存在一集合 B（称为选择集合），它有且仅有一个元素与 A 的每一元素相同。(2)“良序集原理”：每个集合都能是良序的。(如果对于每一元素 a、b、c，我们有 $a<b$ 或 $b<a$ 但两者不同时成立；并且如果 $a<b$ 且 $b<c$ 则 $a<c$，并且任何非空子集有一个最小元素，则 A 集合是良序的。)(3)“每一集合有一个基数”，这种表述指对于无限集合，大小的概念得到充分的定义。对这同一原理还有其他几个更复杂的表述形式，最通用的一个称为左恩引理。

这些定义一旦被理清，起初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这一公理的某些后果，是人们很不想要的，因为它们与常识完全不一致。例如，（给定选择公理）下述情况便是可能的；取一球形客体（比如一只桔子），把它切成一些有限数目的小碎片，然后它们能被重新聚合起来产生两个和原来同样大小的球体。这与我们对空间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解相冲突，但其本身不构成使数学家们放弃选择公理的充分反驳：它不是悖论，而仅仅是奇怪。此外，选择公理，具有广泛的有用性。第二种反驳是，用选择公理证明某类数学客体的存在通常很容易，但却很难说明这样的客体看起来像什么。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根据良序集原理，预言实数的良序集存在(见下)。这给数学家出了难题，因为他们喜欢能确切地看到他们提出的客体，并因此力图以“建构性的”方式提出客体。

1939 年，当哥德尔（1906—1978 年）证明，选择公理与集合理论的其他公理相一致时，纯粹数学家们对此集体发出一声慰

藉的叹息。他没证明它是必然地真，仅证明它的使用永远不会产生与其他公理相冲突的结果。这一证明，全部被广泛地接受。然而，1963年考汉指出，否是或对立于选择公理，与集合理论的其余部分相和谐。他证明存在一种集合理论，在其中，实数集不是可良序的（这意味着即使选择公理可以被承认，它也不可能明确地找到实数良序化的途径）。

这一证明，使选择公理成为一种遗弃物。今天，如果数学家们不能发现其他的途径去证明一个定理，他们便会使用它；但是，从有人认为它是假的时候起，它的使用便带有瑕疵，并且当被使用时，它总是无力的。

公理化（Axiomatization）

公理化，指通常但并不绝对地发生于**数学**中的一种过程，即从一堆知识中分离出某些命题来描述这一知识。这些命题是公理，并且它们有下列有用的性质：（1）它们应显示为直觉地真的。（2）它们的意义应易于掌握。（3）它们应是一致的（即，它们的逻辑推论之间没有矛盾）。（4）这一知识（以定理而闻名），总体应尽可能多的是它们的逻辑推论。（5）它们在数量上应尽可能的少（即，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不应是其他的逻辑推论）。〔在（4）中要求“尽可能的多”而不是“全部”的原因，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使“全部”在大多数推理的有效系统中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数学中属于公理的逻辑推论的理论命题称为“定理”。性质（4）和（5）一起通常被合并为“生产性”属性——少数的公理生产出大量的定理。〕

在数学中，公理化扮演着与日俱增的重要角色。公理系统的原初谱系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公理（约公元前295年）（他实际上

称之为“公设”）。在数学中对不断增加的严格性的追求，导致越来越多的理论的公理化。这一过程，在热麦罗（1871—1953年）和弗莱恩凯（1891—1965年）的**集合论**公理化中达到顶点。现在，它通常开始于选用一组公理，然后看什么能被从它们中减掉，而不是取一堆现存的知识并从中抽取一组描述它的公理。

公理在数学中扮演的角色，经弗雷格的**符号逻辑**的引进，已被表述得非常准确清楚。符号逻辑精确地揭示出那些严谨的数学家们所假定的是什么东西——即绝不假定非公理的东西的观念。公理在许多数学领域的成功，导致（并非无理的）使整个数学公理化的尝试，这首先发生于罗素（1872—1970年）和怀特海（1861—1947年）合著的《数学原理》，然后是**希尔伯特纲要**。前者从未完成，而后者被哥德尔证明为不可能。它还导致在其他领域中复制推广这一观念的尝试。斯宾诺萨（1639—1677年）曾企图建立一个公理性的**哲学**体系，而19世纪马克思试图在政治理论中作同样的事。摧毁了其工作之有效性的问题是，他们两个都没认识到，除非公理是被接受的，否则公理的推论不可能被接受。那些试图把“数学的”精确性带入非数学领域的人们，也被这同样的问题拖住了后腿。

形式化的问题之一是，在符号逻辑中的一系列形式证明很快便变得枯燥乏味；经过几个定理后，读者便开始对那种小题大作的繁琐作法不堪忍受。结果，现代数学的倾向，是采取所谓的“**柏拉图式的观点**”：给出非正规的证明去说服一个“能推理的”人，他能（至少在理论上）以更正式的证明武装自己去反驳异议。这种方法，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因为某人关于一个确信证明的看法，不同于其他人。这种从**形式主义**中的撤退，还可能导致以不精确的语言掩盖（自己或他人的）错误，提出未加说明的假设。在不正确的证明中，隐藏错误的，常常正是“清楚地”这个词。

B

复兴主义（Ba'athism）

在阿拉伯文中，Ba'athism 的字面意思是“复活”，1953 年，出现在叙利亚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创造了这个术语。它的基础是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合，不完全拒绝**伊斯兰教**，又与它区别开来，把伊斯兰教描画为阿拉伯文化的重要产物。最初的复兴主义运动，是豪拉尼的叙利亚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和阿弗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的混合物。复兴主义对于反对贵族的阿拉伯农民利益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到 20 世纪 60 年代，产生了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各国的政党强有力的网络组织。

在叙利亚，叙利亚与埃及在 1958 年形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中，部分地实现了复兴主义统一阿拉伯的政治理想。1960 年，埃及领导人纳塞尔禁止复兴主义运动，努力巩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权力。复兴主义运动对埃及叛乱的报复引起了共和国的分裂，以及更为激进的复兴主义运动的出现。1963 年，后者在叙利亚开始执政。1970 年，阿萨德将军统治下的激进运动，通过拉拢叙利亚共产主义运动巩固了权力，建立了与前苏联的军事经济同盟。

在伊拉克，复兴主义，是在 1958 年推翻哈希姆君主制之后出现的一次强大的政治运动。泛阿拉伯运动，导致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建立，这就加重了伊拉克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库尔德人之间的纷争，促进了复兴党的出现，作为一种宗教与民族

的世俗选择。1968年，阿马德·哈逊·巴卡尔将军掌权，并邀请复兴主义者组阁政府，这时复兴党已部分主宰了政权。1980年，巴卡尔让位于逊尼派穆斯林萨达姆·侯赛因，复兴主义者权力转移已告完成。侯赛因又系统地剪除所有的政治对手而很快巩固了权力。侯赛因的权威在伊朗受到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挑战，后者动员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多数反对世俗的复兴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威胁，引起了伊拉克先发制人的出击，后逐步扩大为两国之间长时期的流血战争（1980—1988年）。在几年战争中，叙利亚支持伊朗，这表明在实际上复兴主义已成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民族社会主义形式。

参见：“阿拉伯主义”，“伊斯兰政治思想”。

细菌学（Bacteriology）

细菌学，是**微生物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是研究细菌结构和特性（尤其是那些在工业或医学领域有重要意义的特性）的科学。“细菌”一词来源于希腊文 bacteria，对最初研究细菌的人们来说，它们看起来呈微小杆状，故而得名。细菌通常为一组形态各异的原始单细胞生物构成，它们难以被归入植物界或动物界，但是，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更接近植物王国而不是动物王国。所有细菌都是原始型的，即它们具有比动植物（属真核生物）更为原始的细胞组织。原核生物不具有染色体。

1872年，科恩首次提出了细菌分类法，然而接下来按照某些分类学原则对大量细菌进行分类时，却遇到了很大困难。通常细菌按照其形态、大小和对特殊化学染色剂的反应分为不同类型。科赫（科恩的学生）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者，他致力于对导致严重疾病（如炭疽病和结核病）的细菌的研究。细菌细胞在遗传

物质和结构方面比体积较大的生物细胞更为简单，它们的繁殖速度很快，在适宜条件下，每20分钟繁殖一代，并且它们具有迅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由于这些原因，细菌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中。致病菌仅占所有细菌的一小部分，它们是通过细菌繁殖的数量和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毒素而发挥其致病作用的。

参见：自然发生说。

权力制衡（Balance of power）

描述政治体制平衡条件的理论家，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权力制衡”理论。它们可以分化为两类：一类描述内在（国内）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另一类描述外在国际政治制度。

内在权力平衡理论，描述某些党派和利益集团影响政治资源分配和靠近政治权力的过程。

国际权力平衡理论，集中研究用于防止主权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的机制，其关键理念是：现存权力平衡的打破引起战争。政治理论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则集中在：一个单一的霸权法制（统治权力）对于防止战争是不是必要的，威慑对于保持国际关系的稳定是否必然重要，又如何重要。1815—1945年之间“伟大权力”关系仍然是权力平衡理论家争论的主题。

威慑理论的发展，随着氢弹与原子弹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两个原子武器超级权力（美苏）的出现，导致了从单纯恐吓基础上的权力平衡过渡到双方决定为基础的军备竞赛，他们都把握恐惧的平衡，掌握一种摧毁或灭绝敌对力量的攻击能力。日益升级的军备竞争，导致了威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著名的“互相担保毁灭”

(MAD)。每一方都相信：任何一种先发制人的核武器攻击，都不足以阻止对方以充分的杀伤性力量进行报复，这就会保证全部直接的相互摧毁，同归于尽。

军备竞赛似乎于1991年已经结束。但这种竞赛的开支，是两个超级大国权力在经济衰退中的重要因素；这就使美国在经济上处于软性停滞状态，又加速了前苏联的解体。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意识形态上分裂的减弱，导致了一种新型权力平衡形式，其基础主要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不是纯粹的军事实力。权力多极平衡正在出现，其基础是复兴的西欧、日本和中国。这些经济上的超级力量，部分抵消了美国联合的军事经济力量。

在冷战期间，至少是在世界"北方"的二极权力的相对稳定；正在兴起的多极世界能否维持，还有待观望。

参见："多元主义"。

巴托劳兹声音 (Bartolozzi sounds)

巴托劳兹声音，是以巴托劳兹为命名的，他于1967年写了一部描述这类声音并解释它们是如何从吹奏器中产生出来的著作。通过运用"新的"指法和吹奏法，便可能产生和控制以前认为是非正统的各种声音，如和音、泛音及微音程音等等。这些声音，曾被认为是怪诞的，但现在已成为乐团标准保留曲目的有机构成部分，如作曲家贝里奥或斯托克豪森、演奏家侯林格或长号演奏家哥劳鲍卡等人的作品。

蓄电池（Batteries）

蓄电池由一个或多个电解槽组成，电解槽通过化学反应直接产生电流。世界上第一个蓄电池名叫伏特电池，是根据电池的发明者伏特（1745—1827年）命名的，伏特将几种不同的金属浸到含有少量酸液的水中，发现有电流产生，于是就发明了电池。自产生以来，电池历经发展，现在已被应用于各种场合，从手表到动力燃料电池。

蓄电池最简单的构造包括一个装有电解液（例如盐水）的容器和浸在电解液中的两块不同材料的金属板，金属板不能碰到一起。这样，在两块金属板之间就能测到电压，电压的大小取决于两种金属在电化次序中的位置。（所谓电化次序是按照从阳电性到阴电性对金属电解特性的列表，表中相距越远的两种金属，其产生的电解电压越高。）如果将两块金属板用导线连接起来，就会有电流通过。

所谓干电池是用糊状的电解质代替电解液，其原理是一样的。

如果要求较高的电压，可以将多个（设为n个）这样的电池用电线串联起来，最后达到的电压就是每个电池电压的n倍。由于电池内部的电阻和容器的容积有限，因此蓄电池不可能产生较大的电流，这是蓄电池发电的主要缺点。用蓄电池产生一度电的成本是市电的上百倍。

铅蓄电池用于需要移动电源的场合。铅蓄电池中有两块铅板，铅板表面上有许多呈直角排列的凹槽，其中一块铅板的凹槽中充满氧化铅，容器中则充满硫酸。在铅板之间输入恒定的电压，电能就被储存起来，并将电池充满电能，电能可以在铅电池

中保留较长时间，并可以携带，供需要的时候使用。汽车上的蓄电池大多都是此类，汽车上的蓄电池是在汽车开动时由汽车的发动机充电，它被用来启动汽车引擎，汽车蓄电池的电能可以保存几个星期乃至数月。为了获得足够高的电压可以将几个铅蓄电池连接起来。铅蓄电池有一系列的缺点：它的重量较大；其中装填的是腐蚀性的酸液，如果溅出，会有危险；充电时释放出氢气，遇明火会发生爆炸；如果蓄电池被过度使用，其中的铅板就会损坏；充电也不能过快，如果充电过快，还会在铅板上形成气泡，妨碍了铅板与酸液的接触。这一系列缺点限制了铅蓄电池的使用场合。

包豪斯（Bauhaus）

包豪斯（德语，“建造房子”）是一种设计思想库，1919 年建立于魏玛并于 1933 年被纳粹解散（这之后，它的许多成员移民美国，在那里继续他们的工作和讨论奇思妙想）。它的目标，是把现代艺术中最好的形式和风格应用于日常生活，尤为突出的是把大批量生产技术与优秀设计中的最新观念相结合———一种生动的 20 世纪 20 年代的**艺术和工艺**流派的哲学。包豪斯自身的运作，象是上一代爱迪生的“发明工厂”，或是象后来许多大公司的研究发展部。讨论、试验和开发，是日常工作，而生产（特别是大批量生产）则是明确的附属性活动。

在实践中，包豪斯的创造物（由金属管家具、适于各种位置的台灯和立方形建筑物所扩充），对于观看来说是僵硬的且对于购买则是昂贵的。然而，包豪斯的理念，对消费品设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任何人都能证实这一点，只要他在一高层公寓中坐过可塑塑料椅，或用模压聚苯乙烯杯喝过饮料。“思想库”的

方法，也对20世纪建筑、纺织、家具和安装的设计和规划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包豪斯有关的建筑师、艺术家和设计师（并且后来他们继续进行更伟大的和更少匿名的创造）包括布罗伊尔、格罗皮厄斯（包豪斯开初九年的院长）、康定斯基、克利、罗厄（他于1928年接替格罗皮厄斯担任院长）以及莫霍利—纳吉。

贝叶斯统计学（Bayesian statistics）

由贝叶斯（1702—1761年）表述的贝斯定理，引起了统计学上的一个激进的新方向，即概率理论在数学中的应用。此定理显示如何掌握“条件概率”——它揭示一个事件对另一事件的影响。例如，如果知道一个病人声称背痛，则这个病人背上有问题的概率便比较大。我们使一个事件（病人声称背痛）成为另一事件（他或她背上有问题）的条件。倘若已知事件B已经发生，则事件A的条件概率通常写为P（AB）；贝斯定理告诉我们：P（A）＝P（AB）×P（B）＋P（A非B）×P（非B）。

贝叶斯定理用于发现一事件实验的概率；实验者开始于对他或她的假设的某种信任度，然后根据实验结果用贝叶斯定理去修正这种信任度（例如，一个实验可以由询问病人是否背痛所构成）。今天，这一方法已被普遍使用于计算机，产生了用于医学、勘探和错误诊断的“专家系统”。

熊市/牛市（Bear/bull market）

价格正在下落并还会下落，这样的市场就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熊市”。这个名称一般被用于证券市场和商品市场，作为牛市的

对立面。同样，熊市可能用来描写一个期望股票价格下落而抛出股票的人，在未来时间也不购入相当的股票。当未来时日一到，熊人想以更低的价格买入，又抛出在未来契约中以更好价格卖出的股票。

在历史上看来，以熊来代表这种人，最早出现于18世纪，首先是一位熊皮批发商，原来词句的原义可能是“卖熊皮”，其最初的形式出现在一句著名的格言中：“捕熊之前先卖熊皮。”与熊市相关的牛市出现得较晚，而且也许受到了熊市的启发。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在1950年代中期美国文学生活中，垮掉的一代引人注目。“垮掉”（beat）既有“被打垮”（beaten）的意思，又有“为……祝福”（beatified）的含义，因为作家们既感到被过时的社会价值所压垮，又感到沉醉于他们自己的反叛中的提升。（在这方面，他们与英国**愤怒的一代**有相似性，尽管他们的反叛方式及实际的作品风格迥然相异。）垮掉派作家们，蔑视社会和艺术两方面的“规则”，使用俚俗的、创新的语言〔其中“屁股”（‘hip’）是已变成日常用语的最著名的词〕，并把狂怒与禅宗顿悟式自由漂浮的思想无序混在一起。这些都是十年后嬉皮士运动的先导。这一流派的主要人物，有诗人金斯伯格和科叟，小说家克鲁亚克（他为此运动起的名）和巴勒斯（尽管他后来走向其对立面）。受垮掉派思想影响但并没完全加入的，有麦勒尔、米勒，莱克斯鲁斯，以及一系列**科幻小说**作家，从狄克、赫伯特到沃尔夫。

美（Beauty）

美（拉丁文“bellus”，美丽，其法文的派生形式是Beau）是一种在哲学家看来非常难以定义的性质。其标准的定义是，美是能愉悦感官和理智的事物的性质。然而，被敲打可能使感官愉快，但很难恰当地说被敲打是美的。一些哲学家坚持认为，美是客体内在的依赖于心灵的性质。另一些人认为，美不是客观的，而在于在心灵主体中产生某种反应（像赞美的感情）。在这两种定义中，艺术作品是美的，不是艺术作品的自然的各部分（如植物）也是这样。

人类学家指出，美不仅是体现在客体或行为本身中的本质，而是派生于创造者或观察者的价值和观念。创造者或观察者，相反也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因而，美的概念，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也是跨文化而有所不同。无论是否与肉体的自然吸引力、艺术实践或产品，优雅的动作或其他因素或属性相联系，美的观念非常紧密地与特殊共同体的价值与期望相关。它们负载着由某些界限所支持的集体思想理想。比如，关于人的美的观念，就是由个人的性别预先决定的。

西方人关于美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提出：美是什么与真理和神圣是同义的。从此以后，各种各样的美的理论都被提出来了。美可能是一种在个人身上唤起特殊反应的属性。美可能是一种表达非占有之爱的方式，如此等等。

在尼日利亚南部的第夫人（Tiv）中间，身体乃是美的观念的原始语境。油抹在身上发光，这被认为是特别美的。风格怪异的服装，身体上的刻纹，在早期历史上的穿牙也被认为是美化身体的手段。这些身体艺术的趋势，被人们注意到了，它们在连续

的世代之间提供了不同的美与价值概念的索引。

J·法里斯呈现了一幅努巴人对身体之美的图画，这是20世纪70年代。努巴女人在人生过程中的不同关键点上给身体留下刻痕，尤其是在少年时代和儿童时代，而努巴男人则按照年龄的发展阶段以颜料纹饰身体。在仪式性的竞赛中鼓舞努巴男人以身体的艺术进行试验，以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在共同体中受欣赏的形象。只有进入最后年龄阶段的男人，才有权全身穿上黑色。对所有努巴人的重要要求是，他们必须束细的腰带。否则，就不能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衣饰。这种努巴人心目中的美的观念，一方面宽容个体的无限的变化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又是受社会文化的价值与期望相当程度地影响而形成的。

参见：“身体”，“美学”，“视觉人类学”。

美术（Beaux—arts）

美术一词在欧洲**建筑学**中，用来描绘精致的、在古典样式启发下创作的建筑风格。这些建筑风格的实践者们，19世纪与20世纪初在巴黎美术学校得到训练。

这所学校的核心理想，是**古典主义**。它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因为学生应该把“古典的”原则运用在他们感知为建筑使命本质的东西上，直到他们发现了一种相应的结构表达。这种学习方法，就是学生要在数学、透视、切石艺术、构成和建筑史方面得到授课培训，同时在现实的建筑师工作室中学习设计。它产生出一种创造性的、在意向上带纪念性和给人印象深刻的样式。学生们竞争罗马大奖。该奖项的获得者，可以到罗马学习一段较长时间，为接受政府委托的设计项目预备资历。

豪斯曼完成的宏伟的**城市规划**方案（例如他将巴黎重新设计

为一个由横向街道连接林荫大道的辐射体系)，亦是美术建筑风格的具体体现。这种风格，有时被称作“第二帝国样式”。19世纪下半叶，它在南北美洲得到广泛的运用，常常将创造性的古典形式转换成木材而非石材。

从1819年到1914年，美术学校也许是欧洲最著名的正规建筑学校，它广泛地影响了整个欧美的建筑师。因此，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建筑教育的原型而发挥作用，其次作为传统建筑风格确立的象征。和这种确立传统建筑风格相较量的，是正在成长中的**现代主义**运动。20世纪后半叶，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对美术学校的方法给与了相当的注意。

参见：新古典主义。

吃掉对方（Beggar－my－neighbour）

在**经济学**上，吃掉对方是指竞相压价的贸易政策，也就是各个国家为了让出口价格具有更强的竞争性而快速地压低外汇率。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政策流行一时。在汇率浮动的条件下这种目的不易达到，虽然人们常常指责日本为了刺激出口而力图人为地把日元维持在低水平。

虽然吃掉对方的外贸政策，在短时间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增长，但是也存在一些有害的结果：(1) 保护企业（工业）没有效率，消费者为此不得不购买高价产品；(2) 贸易伙伴也被迫以保护主义的政策互相报复；(3) 因所赢外汇更少，所以也更少购买第一个以吃掉对方为目的的贸易国的出口商品。结果，每一方都不占便宜而贫困化。这种情形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之后，上述吃掉对方的外贸政策已部分被禁止使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各国

经济的缓慢增长，又重新刺激了吃掉对方的经济冲动。

参见：“贬值”，“自由贸易”。

行为科学主义（Behaviouralism）

在**政治科学**中，一种严格的行为科学研究的方法是：一切解释必须以代表人公开表述和可观察的行为为基础，以“真正发生的事”而不是无法测定的价值与动机为基础。行为科学主义者强调：理论必须是“有实际作用的”，也就是能够在经验中验证的。如某些选举学家认为，借助集中于选民的（不可观察的）主观情感和立场，不可能科学地研究人们的投票方式；但是，测定客观规定的**阶级**、**民族特性**和宗教对选民投票方式的影响却是可能的。

“行为科学主义”，常常一般地用作对那些坚持庸俗**实证主义**观点，使用数学和统计技术的政治科学家的工作的轻蔑描述。一般说来，这样的行为科学主义的批评家们，如果不是在哲学上那一定是在数学上完全无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在北美**社会科学**中颇有影响。这些政治科学家，在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方面的技术，作为行为科学主义者努力的产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提高。然而，少数当代政治科学家也认可行为科学主义心理学，也就是认可了这样一种观念：“不可观察”与“不可测定的”东西不值得进行分析；或者说，认可了这样一种论题：法律和宪法文件的形式分析，在他们的学科中是没有地位的。

参见：“芝加哥学派”。

行为主义（Behaviourism）

对于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行为主义有不同的意义。在**哲学**中分析的行为主义，常常被表述为这么一条原理：关于心理的陈述与关于行为的陈述具有同样的意义（或者说在分析上是等价的），那些反对私人的内省心理现象（如痛苦）和公开的可观察的行为的人们是错误的。举个粗浅的例子说，行为主义者坚持认为，“她痛苦”这个陈述，与“她正表现出一种难受的行为”这个陈述是同义的（或者在分析上是等价的）。

如果行为主义是对的，那么它就能解决**心身问题**。如果关于心理的陈述与关于行为的陈述是同义的，那么（则可以推论）心理现象恰好也是行为现象。痛苦就是表现出难受的行为。可是，行为与身体的关系是根本不成问题的。所以，如果行为主义是对的，心理现象与身体的关系也是不成问题的。

同样，如果行为主义是对的，那么它就可以解决他人心理问题。他人心理问题的基础，是这么一个假设：关于他人心灵的信念，是从公开可观察的行为到私人内省心理现象（如痛苦）推论的结果。如果关于心理的陈述在分析上等价于关于行为的陈述，那么就不存在这种推论，在行为与心理之间也没有“认识论裂口”。

对于行为主义，哲学家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反对意见。第一，行为主义者坚持关于心理的陈述与关于行为的陈述同义，但极为明显的是心理现象引起了行为。痛苦不能等同于“难受的行为”，“她痛苦”也不可能与“她正表现出一种难受的行为”等价同义，因为痛苦引起难受的行为。第二种反对意见依存于两个思想实验。想想“超级斯巴达人”的竞赛，他们能感到痛苦，但他们的

行为就像是感觉不到痛苦。所以，有时“他痛苦”在超级斯巴达人身上是真的，但“他正表现出一种难受的行为”却是假的。因而，两个陈述不可能同义。又如一组优秀的演员，他们并不感到痛苦，但是他们的样子就仿佛很痛苦。因而，“她正在表现出一种难受的行为”，对一个优秀的演员而言有时可能是真的，但“她痛苦”却是假的。因而，两个陈述不是等价同义的。

在**心理学**中，由华生创于1913年的行为主义理论，是这么一种观点：心理错乱反射回应于过去生活的条件作用；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行为主义寻求以行为即可以观察的动作来解释人类心理。不像**精神分析**和许多精神疗法这些心理动力学理论，行为理论并不相信简单地认知这些反应即可治疗情绪的错乱。相反，行为主义者运用一种反条件作用，拒绝任何从病人反思他或她的意识经验中获得的信息或概念。行为治疗主义者相信：环境的决定力量和可观察的行为模式的共同作用，他或她将努力减少神经官能症，运用外在刺激，支配报偿与惩罚，在某种程度上使病人暴露在使病人害怕的处境或客观对象中。其他技术还包括系统的使脱敏感、松弛训练、涌进疗法、积极的强制和自信心确立训练法。

因为纯粹的行为主义观点认为：主体完全是被动的，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与命运，而是被环境中的强化刺激所支配，因而对于个人意义并不重要，所以这种理论也认为自己是有限的。

心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行为主义上承精神分析学说，下启**认知疗法**。作为一种以再认知为基础的治疗方法，它更靠近认知疗法（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更远离精神分析学。后者监视着通过解释和洞见而来的变化发展，因而行为主义合并了或被合并于像认知疗法这样的方法之中。

参见：“功能主义”。

观众（Beholder，the）

直到最近，观众或参观者对艺术作品的要求或预期，被认为对于考虑作品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在探究意义的答案中，艺术家的意向被赋予优先权。最近，这种态度受到挑战，有人认为意义的构成是一个双向过程，并且在此过程中观众的作用至关重要。在近期的艺术史中，这一观点已被几个学派所采纳，从接受理论家到女权主义者，他们都认为观众的社会地位、智力结构及性别是构成意义的核心要素。

信仰（Belief）

信仰（源于古英语 belyfan，“保持亲近”）带领我们进入人类思维最巨大的领域之一。信仰是一种思维功能；没有理性，没有创造、学习和记忆心智结构的能力以及把个体的生命经验与其相联系的能力，便不可能去相信。

信仰是知识的直接镜像。知道某物，就是有关于它的经验证据；而相信某物，则是跨过对证据的需要。知道黑是白与相信黑是白，是两件迥异的事。然而，信仰者的贯常行为表现，仿佛他们所拥有的是知识，并拥有他们的信仰本身。这种情况，在伟大和渺小的事件中都存在，而在我们对待超自然事物的态度中尤其如此。如果人们相信超自然物的存在，则下一步便是使相信变成信（有行为要求的相信），而接下来便是宣称证据的存在（奇迹、个人的启示等等）。科学家能证明，例如，黑体辐射或空间波的存在——证明的过程可能是艰苦的，但最终结果注定是旁观者能接受的真正的知识。同样，历代宗教信仰者，已提供了颇具苦心

和细节性的证明——但是这里，在最终的分析中，为了分享这一信仰，旁观者首先必须分享那种启示，接受那种非理性。为了获悉黑体辐射的存在，我并不需要相信它的存在；但为了获悉上帝的存在，我却必须相信上帝。同样，除非我是个傻瓜或江湖骗子，反证将改变我知道的东西；而作为对照另外某人的不信，则对我所信仰的东西没有丝毫影响。

在理性思维中，证明是针对衡量我们观念的一种客观的对应物。在信仰中，这种对应物是主观的和想象的。尽管如此，在一个客观的论辩中，我们对待信仰即使不能说比证据更严肃的话，也起码是和对待证据一样的严肃。在每一情况下，好像是我们都绕过了对观念的最终责任，或是对基于这些观念的行为的责任。例如，我不准备对另一肤色的人们所受的体制化的压迫负责任，最终仅仅建基于我感到喜欢它；因此我创造一（真诚的）信仰系统，我能向它呼吁公正，并且它会作为我的行为的理智替罪羊起作用。对于分享我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人，我不能以个人的方式保证其未来生活中的幸福，但我能（真诚地）肯定一种提供它的信仰系统。

如果我们把信仰置于这样差劲的地步，我们便是在把人类的信仰降低到游戏场的水平。信仰者可以采取两种论辩反对这种还原论。首先是分享信仰的现象。有某些不可证明的观念——例如超自然物的存在及其属性——它们被人类普遍地分享，并且是自我们所能追溯的人类有意识之日起，它们便被人们享有。这是一种普遍的幻觉，一种（确切的）心灵状态？还是像信仰者所宣称的那样，是对信仰的真实性的确切证明本身？其次是人类的智力才能。这种或那种信仰，已经和将要产生某些智力上和实践上的人类创造的最宏伟壮丽的大厦。它们是我们人类物种的惟一性的一个方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并且（我们喜爱去认为）是人类的

光荣，没有其他的生物能写出交响曲，创造福利社会，信仰上帝。这一论辩继续下去，则必然的事实是，信仰不只是我们所拥有的某种东西，而是我们所是的某种东西。它内在于人类大脑；它是一种客观属性；某一天，当我们发展出足够的推理技术，我们将会发现这一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并且代替相信的将是我们知道。

大爆炸（Big bang）

大爆炸理论，是人类想回答最基本的问题的尝试：宇宙是如何开始的？我们相信宇宙开始于一个难以置信的密度奇点，并一直处于膨胀之中。这个奇点的起源，可能只是一偶然的波动，不需要外来力量的干预，但是理论不同意这样说。

关于初始期宇宙最成功的说法，被称为膨胀模式。它告诉我们说，在奇点宇宙形成的即刻，它便开始惊人的快速膨胀，比光速还要快得多。由于信息的行进无法超过这一速度，这一原始爆炸的一部分几乎不受其他部分的影响，因此，宇宙甚至在这初始阶段，就变成“多块状的”或颗粒状的，而不是完全均匀分布物质。这些不规则形状，最终导致数百万年后星系的形成。

大爆炸一微秒后，称为夸克的基本粒子形成，并相互碰撞。千分之一秒后，物质和反物质间的不对称性产生，导致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物质远远多于反物质。到了几秒的时候，那些更奇怪的粒子没有一个存活下来，只有电子、中微子、光子和它们的反粒子成为重要的东西。一些质子和中子产生了，一些结合在一起形成最轻的元素氢的原子核，大约 100 秒后，氦及其他一些元素的原子核形成。

大约 100 万年后，宇宙已充分地冷却，使电子能附属于已存

在的原子核上，于是原子（大多数是氢）首次形成。原子的形成，是我们熟悉的宇宙的开始。更晚时候，这些原子以巨大群团的方式集结而形成星和星系。

对于大爆炸理论有两件重要的证据。其一是，大爆炸残留下来的辐射今天仍充满四周，尽管它几乎不具有大爆炸强猛的能量。我们把它视作一常态能量背景，等同于具有大约绝对零度之上3度的温度，或-270°C的空间。另一种证据是，宇宙仍在膨胀。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来自遥远星系的光具有比我们预期的更低的频率——此现象被称为“红移”。这意味着：那些红移的星系正以巨大的速度远离我们。

一个尚待今天回答的问题是，宇宙是否将继续膨胀，或它是否将由于其内部所有物质的引力牵引而最终减缓下来并收缩。倘若我们知道宇宙包含有多少物质，我们便能回答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人们相信，大量的质量存在于所谓的“暗物质”中，它不释放任何我们能探测到的辐射。

参见：宇宙学；粒子。

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

教育小说（德语，“成长小说”）是欧洲和北美的作家常用的一种小说形式。此类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被看作是当下社会中的一种原型，并且他或她的生活与冒险经历（小说的主题）是更广泛的社会的、伦理的和道德的说教的框架或隐喻。这种形式，发源于德国——哥德的《威尔海姆·梅斯特》小说系列（1777—1829年）是典范的例子——并被其他地方的作家完整地或部分地采用，如狄更斯、福楼拜和果戈理。在20世纪的北美创作中，它已是一种果实累累的醒目形式：奥琴克劳斯、戴卫斯、欧文、

里查勒、罗思、幼庇狄科和魏德曼，都杰出地运用过它。在德国，鲍尔、格拉斯托马斯·曼及其他一些作家对这种形式的运用，已到惊人骇俗的地步：曼把20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撕得粉碎，格拉斯描绘了**纳粹主义**的尸骸堂，鲍尔则展示道德的空虚。他们以种种方式追随这一形式，使故事与说教之间的区别更加一团模糊。

双语制（Bilingualism）

语言学专家们，为那些精通两门语言的人保留下双语制这个术语。据估计：一半多的世界人口，在某种程度上都使用两种语言。大多数说两种语言的人，在特定背景下无不优先选择一门语言。例如，他们也许主要在家里使用一种语言，在工作场所用第二种语言。两种语言所使用的背景，对说话人在每门语言里所具备的专业知识的程度与类型，会带来深远的后果。当然，平行地说两种语言的人（两门语言同样程度可以使用的人），是很少能遇见的。虽然许多人在生命较晚的时候才学习一门第二语言，但语言学家研究兴趣最强烈的焦点，总是集中在自然使用双语的人身上。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自发地习得两门语言。一般说来，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在区别他们的两种语言方面没有困难，但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故意混淆两种语言。当主要用一门语言交流期间，说话人也许会把另一种语言的一、二个词（通常为名词）插入话语中。这种“密码混淆”和“密码调换”形成对照，其中，整个片语或语句都混在一起，贯穿在说话人的谈话中。

复本位制度（Bimetallism）

在**经济学**中，复本位制度如其所示，就是一种同时使用两种而不是一种金属作为国家货币的货币体制（金属常常是金和银）。在历史上看，复本位制度得到了那些认为仅仅使用一种金属会不必要地限制货币供给，又抑制了普遍价格水平的人们的支持。在某个特定时代，人们还认为内在价值的货币是惟一“优良的”货币。（由此看来，为方便起见，只要能够得到先前金属货币的100%后援，完全允许发行纸币。）

必须在两种金属之间建立一种官方的汇率，以同一面额的货币中的每样金属重量来代表。当美国在19世纪采用复本位制度时，当两种金属的市场价格比率不同于官方规定的硬币使用中每盎司的价格比率时，麻烦出现了。因为市场价格常常不同于新货币价格，所以同时在流通中使用两种金属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会（为了获得金属的市场价值）熔毁更贵重的硬币。因而，**葛莱兴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法则。

生物化学（Biochemistry）

生物化学是通过组成生命的物质间的化学活动，来研究生物变化过程的科学。一般来说，生物体内的化学变化过程属于**新陈代谢**，而且受到被称为**酶**的生物催化剂的调节。酶是蛋白质分子，它们本身是**基因制品**，所以实际上新陈代谢受遗传物质的控制。“生物化学”一词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末，但是这门学科却起源于早期的化学科学。18世纪的先驱者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揭示，生物的呼吸作用和化学氧化作用之间具有定量的相似性。随后，

让·因根豪茨也证明植物能通过太阳光产生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是与呼吸作用相反的一种反应。19世纪，结构有机化学的发展，为科学家首次研究重要的生物分子（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等）以及这些分子的合成（同化作用）、降解（异化作用）、代谢过程及其控制铺平了道路。现代生物化学在生物学的许多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如营养学和遗传学），其主要原因在于：对涉及生物生长、繁殖和遗传的所有代谢活动的彻底了解，将导致对生命本身的全面认识，至少将促进对生物机理的认识。

参见：生物物理学；无生源说；细胞学；机械论；分子生物学。

生物气候学（Bioclimatology）

生命科学中，生物气候学是研究生物与气候间相互作用的科学。虽然早期人类必然已经认识到气候条件对他们决定种植何种粮食作物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生物气候学仍是一门新兴学科。这不仅因为气候条件直到最近才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也因为动植物能明显地影响气候条件这一观点还没有被人们所认同。

参见：生态系统；盖亚假设；全球变暖。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生态学中，生物多样性是指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大量的物种类型。这种多样性，是物种在**自然选择**影响下，自然发生的遗传变异的产物。生物要适应它们的生长环境，因而在**进化**过程中趋向于使自身高度分化。特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常常被看作是生态系统稳定的指标——即**顶级群落**往往容纳了最大范围的物种，

而先锋群落（指新近发现的不毛之地如废弃的建筑工地）则通常仅有几个物种组成。人造环境往往也仅容纳少数几个物种，这是因为对人造环境施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所致。当人类的活动更多地集中在先前不发达地区，生物多样性水平就会有下降的趋势。从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是令人沮丧的。新近已出现了一些保护复杂栖息地（如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的尝试。

参见：适应辐射；盖亚假设；污染。

生源说（Biogenesis）

生命科学中，生源说理论与自然发生说相反。它强调所有生物均起源于其他生物，因而生命不是从无生命物质中自发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先前已存在的生命，且生生不息。生源说思想是现代生物学的主要原理之一。

参见：无生源说；达尔文学说；进化。

生物地理学（Biogeography）

正如其名称所示，生物地理学是研究生物如何在地球上的分布的科学。例如，生物地理学家可以研究干旱地区动植物群落的种类。气候条件是影响动植物栖息地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参见：生物气候学；物种形成。

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ol）

生命科学中，生物防治是指利用其他生物对有害生物进行控制的方法，从而避免使用非特异性的、昂贵低效的杀虫剂。传统

的生物防治措施，是采纳将有害生物的天敌或病原体放入有害生物的环境中的形式。这种方法常常是可行的，因为人们曾引入过这种有害生物本身。它们充当大量的致病生物，正是由于其引入时它没有自然的天敌。兔子曾作为食品和狩猎动物被引入澳大利亚，但是它的繁殖速度太快，而成为一种有害生物，单靠射杀和设陷阱诱捕无法使其得到控制。当把能使兔子产生粘液瘤病的病毒引入澳大利亚后，兔子的数量得到了极大的控制。

生物防治常常包括使用捕食性昆虫，然而事先必须对其进行仔细地研究，以确保这些引入的昆虫本身不会成为无法控制的害虫。生物防治也可以通过干扰有害生物的繁殖而取得成功，主要的方法是引入大量雄性不育昆虫，分离和利用被称之为外激素（动物气味的活性成分）的化学物质，使之改变害虫的生活习性。例如，雌性鼹蛾通常释放外激素来吸引雄性昆虫靠近，用这种外激素作饵可诱捕鼹蛾。从遗传工程获取的病原体若其性状能被人们充分认识，用这种病原体也有可能控制住有害生物。

参见：小生境；寄生。

生物节律（Biological rhythm）

生命科学中，“生物节律”一词被用来描述不断变化的生物现象与环境周期性改变之间的关系，如昼夜交替和季节周而复始的变化。周期现象（如繁殖期和月经周期）和每天变化模式（如花朵清晨开放夜晚凋谢）都是生物节律的例子。以 24 小时为一周期的节律现象叫昼夜节律，它受每日昼夜交替变化的影响。如果生物被置于实验室环境里，持续给予光照，温度保持恒定，生物将会适应这一环境；如果将生物置于另一时区的环境中，节律现象经过短暂的延迟后将会继续出现。某些周期性事件与环境的

周期性改变并无明显联系。例如，蝉的繁殖周期为17年，而且总是出现在同一季节，但却不清楚对于16年的漫长等待，环境起到怎样的刺激作用。

参见：生物钟学；物候学。

生物主义和生物决定论（Biologism and biological determinism）

生物主义，是一种宣称要以生理过程来说明人类行为的理论。生物决定论，运用这一模式去揭示男女差别并不来自于文化强加的性别特征，而是源于生理差别。

对于生物学模式，女权主义者采取了许多相当不同的立场。许多人一致认为，男女肉体不同，因而女人的经验也是不同的。像J·密齐尔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就认为男性与女性主要的生理差别就是再生殖，她批评那种从父权制出发把生殖所用的方式看作是女性劣于男性的生物学理由。

玛丽·达莉以及另一些激进而革命的女权主义者认为，由于心理属性的生物学决定作用，女人与男人相比自然更少进攻性。但是，其他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和社会决定因素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例如，密齐尔认为：女人要求工作的习性“更少”，也对暴力“更不胜任”，这种情况就是社会强制的产物而非“自然”生物倾向。

在当代女权主义思想中，运用生物学模式来强调男女性别差异遭到了抨击。亚当斯认为，当儿童获得男性或女性的性别立场时，他们是采纳在占统治地位的（父权）秩序的表征体系中被预先规定的角色。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生物学模式支持的是父权制，它把男女差别形成为一种“自然的”和“可证实的”事实。

精神分析学的女权主义者，同许多其他人一样，怀疑我们追问“这服务于谁的利益”的问题而区分性别生物差异的方式。这个问题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男女之间看起来的简单差异就更为可疑更为复杂，同时对于性别差异的表达而言，性别构成，性别表征问题尤为关键。

生物学（Biology）

生物学（希腊语意思为“研究生命的科学”）是研究生物的物理和化学系统变化规律的科学。其广泛的研究范围包括：研究生物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生物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生物学”一词是由伯达克（1776—1847年）发明的，用于描述对人类的科学研究。而德国心理学家特雷维阿努斯（1776—1837年）将其范围扩大，用于描述对生命的科学研究。

参见：解剖学；生物化学；植物学；生态学；生理学；动物学。

生物量（Biomass）

生态学中，生物量是指在特定区域（如栖息地或**生物群落区**）内某一物种的活生物体的总重量。生物量是一个群落内能量储备的指标，它的变化速度反映了所研究的生物系统的生产力。在某一**食物网**或食物链中，生产者（绿色植物）的生物量大大超过消耗者（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的生物量，这是因为生产者与消耗者之间的能量转换能力低下的缘故。

参见：群落；竞争。

生物群落区（Biome）

生态学中，“生物群落区”一词用来表示组成**生物圈**的主要生物群落。生物群落区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其主要作用是人为地将环境划分为几大类型（如热带雨林），然而，这些环境类型汇聚了众多的较小的生物群落，它们在诸多方面相互影响。通过群落构成的所有物种类型的同步增长，生物群落能对相似的环境条件做出反应，形成诸如红树林沼泽和针叶林这样的生物群落区。

同种类型的生物群落区常见于几个不同大陆，例如，灌木地是一类生物群落区，它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世界各地。不同地域的同类生物群落区中的物种常常也各不相同，但由于它们对相似的环境条件做出同步、各自的反应，实际上它们已逐步形成具有相似结构的生物群落。在这种趋同进化中，气候条件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因而某些特定生物群落区仅限于全球的某些区域，例如：热带雨林，就是一个局限于赤道地区的生物群落区类型；同样，落叶林能够在南北回归线的高温地区见到。其他许多局部因素（如土壤类型和海拔高度），也是决定生物群落区类型的重要因素。此外，生物群落区与外部环境，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改变的，土壤质量取决于土壤植被、地理情况、气候条件，同样湿度和降雨量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生物群落区类型的影响。

参见：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生物统计学（Biometry）

生物统计学（希腊语意思为“生命的测量”）是用定量方法（如统计学）来研究生物系统的科学。它主要源自于数学家们如

皮尔松（1857—1936 年）对**进化**和**遗传学**的研究成果。皮尔松认为：能对基于事件的生物现象（如遗传现象）进行测量有着重要意义。孟德尔的早期遗传学研究就是生物统计学研究的一个实例。广义来说，如今生物统计学是对生物数据的统计分析，它在实验生物学的所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见：流行病学；分类学。

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

生物物理学是将物理学应用于生物学和生物体研究的一门应用性科学，它是一门交叉学科，主要是 20 世纪技术进步的产物。但是，这一学科的发展是基于历史上早期全体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他们运用其聪明才智对整个科学和其他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在早期的生物物理学观察性研究中，有对萤火虫的生物发光现象原因的研究；有对电鳗电流的研究以及电流与肌肉收缩关系的研究。

技术时代使生物物理学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离心法、色谱法和电泳技术的应用，使生物分子能按其物理属性进行分离。现代生物物理学最重要的进展是分析技术的提高，它使得分子的立体结构得以确定；20 世纪初布拉格父子创立了 X 射线结晶学，它可直接应用于对病毒和血红蛋白结构的研究，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使人们能清楚地阐释 DNA 的分子结构，DNA 是基因的分子基础。随着**遗传学**和**免疫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目前这一学科正在迅速发展，在生物学、遗传学和医学的诸多领域中，都有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尽管也许因其技术本身的限制，生物物理学仍是一个能在 20 世纪产生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高智慧领域。

参见：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无生源说（Biopoiesis）

生命科学中，无生源说（希腊语意思为“制造生命”）是对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来源于非生命物质的一种解释。据估计地球约有45亿年的历史，南非德兰士瓦省的无花果树燧石化石据估计也有约31亿年的历史，化石中含有细菌和蓝绿藻。因此，最早的生命似乎有可能产生于地球形成后的数亿年内。

一些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来自于外层空间（**有生源说**），但无生源说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也不能废除无生源说的思想，因为就像生命存在于地球上那样，它也必定在某时早已存在于某处。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霍尔丹和前苏联的奥帕林提出，生命出现时地球的环境条件与现今的环境状况极为不同，这一理论成为了无生源说的思想基础。奥帕林认为：溶液中单分子能够相互作用，并在这些条件下随机形成复杂的有机分子（即含有碳元素），其中一些分子被作为模板能进行自身复制。如果时间充足，“溶液”中各种成分能够相互作用，再次随机形成具有特殊性状的化合物，如在各种成分的周围形成膜状物，使它们与环境隔离开。生物，可被称为是具有繁殖能力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能力的组成单位。因此，无生源说阐明了被称为eobiont（希腊语指“原生物”）的原始生物是任何通过**生物起源**和**进化**的历程，发生和发展成为今天地球上的生命。

无生源说思想多为理论假设，由于这些假设似乎太牵强，因而无生源说成为众多批评的目标。同时，无生源说也遭到**创造论者**的抨击，他们认为无生源说的思想是对上帝的亵渎。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实验已经证明霍尔丹和奥帕林思想的

正确性。早期地球上可能已存在着某些化学物质，将装有这些化学物质的溶液试管进行紫外线辐射或电流作用，能快速形成各种有机化合物。随后研究表明：许多生物分子的前身物质能在相似条件下产生。

参见：自然发生说，生物化学，自然选择。

生物圈（Biosphere）

生物圈是指地壳上层与大气圈下层之间的区域，所有生物都生活在这一区域。生命科学家用“生物圈”一词，集中描绘出地球上的生物赖以生存的全部空间，换句话说，把所有生物看成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充满生机的生物群落。

参见：生态系统，生物地理学。

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

生物技术（希腊语意思为“操纵生命的科学”），是人类按照自身的目的对生物过程或有机物进行开发和利用的方法。生物技术是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它的发展取决于**分子生物学**中新技术的应用，如**基因工程**。然而，人类对生物过程的控制利用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例如：酵母被用于酿酒和烘烤面包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直到近代人们对酵母的作用才有所了解。随着人们对生命过程所反映的生化原理以及遗传机理的了解，生物技术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也被人们所认识。1876 年，巴斯德首次提出微生物的存在导致了发酵过程中物质的变化。1897 年毕希纳发现酵母的无细胞提取物仍然可以进行发酵。首批生物酶很快被人们提取出来，如今人们可以从特殊的微生物中，运用工业化技术

大批量获取生物酶来生产各种产品。洗衣粉就是应用生物技术的一个成功范例，在洗衣粉中加入一些生物酶，这些生物酶是从基因工程获取的耐高温微生物中提取的，因而在热水中洗涤衣物能使酶的功能得到最好发挥。

生物技术的关键方法，是酶的催化作用、基因转录和生物合成技术。生物技术，可应用于医学领域（如生产青霉素制品），也可用于生产燃料（如酒精）。采用基因工程进行育种和食品生产新的可能性的开发（如真菌的使用），使农业生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已成为现实，将特定的人类基因插入到微生物的基因型中，然后使这些微生物发酵，可生产出某些药物，如胰岛素和人体生长激素。运用计算机模拟分子的相互作用方式，能够很快设计出符合特殊要求的分子（如药物），并采用生物细胞进行合成。生物技术的前景充满光明，它在改善营养、加强卫生保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使用新技术修复旧技术对环境的许多破坏方面蕴涵着巨大的应用价值。但是，在新技术的使用合法化以前，必须认真思考生物技术进步所涉及的伦理学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将改变了遗传信息的生物放回到环境中这类问题。

参见：转化。

双调性（Bitonality），参见：多调性（Polytonality）

黑色喜剧（Black comedy）

黑色喜剧，是一种处理怪诞和不愉快情境的喜剧，它抨击关于社会禁忌的舒适前提，例如把死亡当成喜剧。这一用法，常常

被认为以法国戏剧家阿诺维为最后起源。这位戏剧家认为自己的戏剧是“玫瑰红的”又是“黑色的”；这一用法也许还可能来自于A·布雷东的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作品集》（1940年）。虽然如阿里斯托芬的《骑士》和琼生的《狐狸》这些早期作品由于具有辛辣的讽刺技巧而被认为是黑色喜剧，但这个术语是指许多20世纪戏剧和电影的一部分。这些艺术形式在悲喜剧模式内运作，其范围包括从迪伦玛特到奥顿，从阿尔比到阿尔莫杜瓦尔。

黑洞（Black holes）

宇宙中存在着大量的恒星死亡后的残余物。和我们的太阳差不多大的小恒星，死时象是白色的侏儒：小、密、冷的物质团块。这些物质团块，在星球的相互作用中将不再扮演任何角色。几倍于太阳质量的更大些的恒星，则有一种非常壮观的结束。它们死于一种巨大的超强爆炸，他们的物质大约有一半散入太空，遗留下一个中子星，一个仅有几公里直径的微小而密度极大的客体。然而，那些更大的恒星，爆炸后它的质量仍几倍于太阳，便会形成黑洞。

有些理论推测，在早期宇宙中可能形成了许多微小的黑洞，对此，我们尚无任何观测结果。

黑洞是一种超级客体。它的边际，是由“事界”来定义的。它的半径，由黑洞的质量所决定。事界是光可以接近黑洞而不被吸进去的最近的可能距离。在事界之内，黑洞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以致没有光能逃脱出来（这就是其得名的原因）。然而，霍金已证明，由于在边界上的时空“张力”，某种辐射可以从黑洞中释放出来。

之所以称为事界，是因为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有黑洞内部事

件的任何知识。如果光不能逃逸出，那么，关于其内部的信息也不可能逸出。时间膨胀，是发生于靠近事界处的另一奇怪现象。时间受巨大引力场的作用便会变慢。这种效应，在地球上刚好能被测量到，但在靠近黑洞时则非常巨大。在事界处，时间完全停止了。这意味着：如果一个观察者看到另一观察者掉向黑洞，他将看到他的朋友下落得越来越慢，最终完全停止。他的朋友，从她的视点来看则没有这种幻觉，她将下落得越来越快，直到穿过事界。然而，超过了那一临界点，她再也不能逃离，并因此永远不能返回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然而，无论如何，这并非是一个真正可能的设想，因为早在她抵达事界之前，引力的力量便会把她拉扯成一条长长的细线。

黑洞依其本性是一种躲避观测的客体。对被认为是黑洞的客体的最具决定性的观测，来自于双星 X 射线系统，在那里有一可见星正在围绕一巨大的看不到的伴星运行。那个伴星的质量和不可见的属性，意味着除了黑洞以外，它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这样的双星系统，已有三个被观测到。其他可能的黑洞，或许能在像我们自己的银河系这样的星系的中心发现。

参见：恒星。

魔法（Black magic），参见：巫术（Magic）

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黑人权力运动是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于美国的一场激烈的社会运动。黑人权力运动关注白人控制的权力体制的作用，它导致黑人境况的低下，这一运动主张减少白人的权力，以改善黑人的

生存条件。

虽然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南方的奴隶制，但却并未根本改善黑人的福利，大多数黑人仍生活于可怕的贫困之中。1890年到1912年间，南方通过的一系列种族歧视法案禁止黑人享受一系列只有白人才能享受的生活设施，黑社会组织三K党的暴行使这种种族隔离政策得以维持。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全国城市联盟分别于1909年和1910年成立，这两个组织为争取黑人国民权利进行了漫长的斗争，终于在1964年由国会通过了一项黑人民权法案，禁止在公用设施、教育、就业和其他政府资助的部门进行种族歧视。然而，在贯彻这项新方案的时候，却遇到了剧烈的抵制，民权运动领袖遭到毒打，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

黑人民权运动的失败激发了黑人权力运动，其目的是切实地改善黑人的生存境况。在激进的黑人权力运动团体兴起之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的愿望是使黑人广泛融入美国文化，然而，黑人权力运动逐渐地改变了这一最初的理想，转而强调作为黑人的尊严和黑人文化固有的价值。黑人们开始寻求其在美国这个由各种种族、语言和宗教社群组成的多元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而不是将自己同化于广泛的白人文化。

那些企图依靠暴力手段实现其目的的黑人权力组织，后来不是因内讧而解体，就是被官方镇压，许多黑人回到投票箱前，把选举作为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

参见：同化、集体行为、冲突理论、文化、种族特性、权力、种族、社会整合、社会运动、亚文化。

黑市（Blackmarket）

黑市是当商品价格为法律所压低或交易为法律所禁止时，以自由市场价格进行的商品非法交易。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既不报告给收税人也不显示在**国民总产值**（GNP）数据之中。黑色经济，可能是指一个国家实际上可能比报表数据所显示的富裕得多。测定黑色经济规模的方法之一，是在国民总产值与国民总支出之间做出区分。由于开支了未公开的钱，它应该转入支出数据之中。惟一的障碍，是上述方法忽略了个人或集团所隐瞒的资金，如海外的避税场所。

黑色经济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英国它也许占国民总产值的4%—5%，在美国大致持平。相反，在意大利，它代表着同期国民总产值的1/4。乐观主义者认为，黑色劳动让失业者远离贫困线。但是，似乎是更有可能从事黑色工作的人已经有工作，因而占据了必要的工具、设备和人际关系。取代黑色市场的更具文化意蕴的术语，是灰色经济（Shadow economy）。

融合遗传（Blending inheritance）

19世纪末，孟德尔的研究获得普遍认同前，生命科学家几乎普遍接受融合遗传的思想。尽管尚未有明确的证据支持双亲的性状融合在子代中这一假定，但是子代呈现双亲外貌特征这种可观察到的遗传现象，似乎是对融合遗传的明确说明。通过对物种间杂种体遗传性状的观察，似乎也支持融合遗传的观点。据个体的组织碎片能定量地确定从其父辈、祖辈等每一位祖先那里所获得的遗传性状。如果融合遗传是客观事实的话，那么杂合体能很

快成为纯合体，事实上这一现象却未能出现。因为基因是作为独立的组成部分在亲代与子代间传递，使得遗传性状能被无尽地保存下来，并使每一个体具有独一无二的基因组合，其中部分基因来源于母体，部分来源于父体。

参见：基因，孟德尔学说，泛生论。

块状构造（Block construction）

在**音乐**中，块状构造是一种作曲手段。以持续地改变一些短小主题或和弦式样为手段构成的乐曲，导致这种音乐实际上就是一种持续变化的流动体（例如，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的开始乐章）；代替这种作曲法，作曲家们开始用创造大量的短小音块，然后再把它们基本不变地组合起来，用此方法作曲。与变化导致的行进不同，这种乐曲使用并置和对照的手法。每一音块的重新出现，都由其背景赋予新的色调，并同时也给予背景以新的色彩。(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便是一范例。)。这种方法，被大量用于**民间音乐**，并且是**巴洛克**时期欧洲艺术音乐中倍受宠爱的资源。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这一方法受到冷落，因为当时推崇的是创新的风格；但在20世纪，它又再次成为规范。它是创作**序列音乐**的一种手段，并深受象巴尔托克、麦西恩、斯特拉文斯基和蒂皮特等著名20世纪“传统主义者”的喜爱。

布鲁斯（Blues，the）

布鲁斯（名称可能源于表述“一群蓝色的可怜虫”，意为忧郁）是音乐的一种式样。它的产生，与19世纪末美国的黑人歌

手相关。它的确切起源不清楚，但很可能是出自于美国黑人的乡村民歌和劳动歌曲。“布鲁斯”是一个有多重涵义的术语，它具体是什么涵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社会语境。例如，作为一种乡村音乐形式，它不过是一种演唱模式的音乐对象。通过这种形式，歌唱者宣泄出他对艰辛苦难的个人环境的情感反应。它结合了叙述、悲哀和怨愤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意向性的情感抒发。随着布鲁斯在南方各州的广为传播，它的诗和音乐的结构，也变得越来越标准化：歌词被安排成三行为一段，每一行有四个音乐小节——由此产生了术语“12 音节的布鲁斯”。（偶尔也能见到 8 音节和 16 音节的布鲁斯。）这种音乐是一单独的线性旋律加上重复的和弦。和弦的内容是固定的，其风格使用切分韵律（尤其是拖拍）和“忧郁的”调子：略有平缓的主要音阶的那些音级的变体，主要音阶通常是在第三和第七拍，并突出地给出明亮的声音。

20 世纪早期美国黑人开始都市化，这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布鲁斯的诞生。所谓的“古典布鲁斯”，以小型爵士乐队伴奏的黑人女歌手而著称，把基于乡村形式的歌曲与受各种因素及黑人娱乐音乐影响的材料合为一体。另一种都市形式的产生，是器乐“钢琴布鲁斯”。它省略了布鲁斯的吟唱歌词，而保留了其乡村对应物的形式与和弦的结构；它的表演者曾发展出了丰富的有韵律的通俗曲调，诸如“低级酒店爵士乐”、“布基伍基曲”、“顿足爵士曲”和“花式慢步舞曲”。这最后一种风格的布鲁斯，成为影响**爵士乐**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其爵士乐基调的衍生物“节奏和布鲁斯”，对所有后来的**波普**音乐和**摇滚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布鲁斯，不仅因其自身的缘故活跃至今，而且是 20 世纪西方通俗音乐的摇篮，是艺术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观念之一。

身体（Body）

所有社会都将人的身体不止视为一个物质性的有机体，更视之为一系列有关其心理和社会意义之信念的聚合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着我们认知和理解肉体经验的方式。现代欧洲人关于身体的观念主要受笛卡儿二元论的影响，它认为身体与精神相互是分离的。在欧美文化中，情绪常常被归于肉体，与理性的心灵相对立，其他一些社会却不一定如此区分，有些社会将人的存在区分为三个部分，而有的则将肉体视为完满的整体。罗萨尔多对菲律宾伊隆戈特人民族猎头习俗的研究，揭示了一种与流行于西方思想中的心－身对立论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当地人关于猎头习俗的解释中，在猎头活动实施者身上，情绪和知识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

人类学家通常将身体视为身份的一种表述，身体的纹饰、衣着和装饰常常传达出一个人在其社会中的地位——他的身分、性别、氏族或宗教身份，许多通过仪式就通过改变一个人的身体形态体现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在中部非洲的某些地方流行的以身体为牺牲的习俗，就是为了表示一个人度过了其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例如，在努巴人（Nuba）中，女性在初潮时、结婚时和生育第一个孩子时（此时她们才被认为真正成人），都要以特定的方式以其身体作为牺牲。

身体可以被视为社会的一个缩影，针对身体各部分的规范和禁忌反映了社会或宇宙论的根本原则，左手不洁这个广为流行的观念就是其中一例。

身体可以被用作社会的隐喻，肉体经验则可能被社会范畴所决定，个体和社会，血肉相连，密不可分。按照结构主义者道格

拉斯的观点，身体还是身体政治的体现，那些展现肉体的庄重性和通过控制身体的孔穴以维护身体界限的仪式，目的是为了巩固群体的凝聚力。最好的例子是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对荣誉和羞怯的重视，男性的荣誉（勇猛果敢）和女性的羞怯（谦恭羞涩）似乎既保住了身份体面又维护了社会群体的和睦。在中东地区，个人的荣誉为整个群体增光。另外一个同时关注社会和身体的例子是广泛存在于非洲的女性阴蒂切除术，这一习俗既控制了整个女性群体，同时也控制每一个女人的性欲。

参见：美、心－身问题、象征主义。

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起码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波拿巴主义”这个术语。在自由传统中，波拿巴主义被看作（或被批评家认为）是一种具有特殊纲领的政府制度。这种政府制度，得名于拿破仑·波拿巴在执政府与帝国期间（1799—1815年）所统治的法国。波拿巴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由军人执政的具有积极性质的政府制度；一种**集权主义**的行政机制，奉行一种侵略性的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一种对内强调礼仪功能，实施开朗独裁的政策；一种集权化的精英政治管理。法国政府制度，现在亦常常被指责是波拿巴主义趋势的体现，特别是总统执掌行政权力的程度、大范围的官僚体制以及历代共和国时代延续和法定的永久遗产的重要性。但无论如何，议会共和制，非扩张主义而又独立奉行的现代法国外交政策，可能使拿破仑成为无所事事的病弱者。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波拿巴主义同样也指这么一种体制：在个人统治下，国家的行政享有对其余一切社会制度的独裁权力。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把波拿巴主义解释成紧张而且势均力敌

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后果：没有一个阶级有足够的权力统治自己，因而需要一个强加于社会的仲裁，国家才能“相对自治”。马克思认为，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德国国家制度，都表现了波拿巴主义的共同特征；马克思主义后学说运用这一原理，去分析法西斯主义体制和第三世界军人独裁。

布尔逻辑（Boolean logic）

完整的逻辑观念（即命题有一个不同于其内容的形式）的产生，与古希腊人密切相关，他们对这个学科的研究，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的工作中达到顶峰。即使他的工作有严重的局限性，但两千年来只对其作了一些没什么价值的附丽，尽管亚氏逻辑之外的推理一直被使用着。

莱布尼兹（1646—1716年），是第一个对逻辑感兴趣的现代大数学家。他首次尝试着为逻辑寻找一套系统的表述符号。他没能把他的工作贯彻到底，并于死后留下未完成的工作。最终，提出一完全有效的符号表述系统的任务，落在了布尔（1815—1864年）和摩根（1806—1871年）的头上。

这种符号表述（在其现代形式中），通过把一复杂命题分析转换成符号形式的过程，也许能获得最好的演示证明。试考虑这一命题：“如果西红柿或大豆意味着食物是难吃的，那么，食物是可口的这一事实便意味着没有西红柿和大豆。”（这一命题，读起来相当拗口的原因，在于英语可以相当随意地卖弄其丰富的逻辑形式，因此，一个英语命题能表达多种逻辑形式。）上述命题的内容中有四个概念：“西红柿”、“大豆”、“食物”和“可口”（“难吃”等同于“不可口”）。可口是对食物的描述。它的作用像是一个从食物到对偶真/假的函数。因此，我们把“食物是可口

的”写作N（F)。我们用T代表“西红柿”，B代表“大豆”。现在，省略掉不具逻辑功能的词，我们有“如果T或B意味着非N（F)，那么N（F）意味着非T和非B。”命题具有形式“如果……，那么……”，它可以用一箭号表示从条件到结果，并用括号括起来，便有“〔T或B指非N（F)〕→（N（F）指非T并非B)”。接下来对每一个括起来的句子进行分析。“T或B指……”相同于“如果T或B那么……”；第二个句子与此类似。上述命题，现在变成“〔（T或B）→（非N（F)〕→（N（F）→（非T并非B))”。“非”，“或”及“并”这些词，都有它们自己的逻辑符号（依次为～，∨和∧），因此，上述命题的最终表述形式，是“〔(T∨B)→(～N（F)〕→（N（F）→〔（～T))∧(～B)〕”。

所有这一切，说明这样一个命题，其真值仅仅依赖于它的逻辑形式而不是它的内容；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的任何命题在相同的条件下是真的（上面的那个命题形式总是真的)。这些符号使逻辑形式更清楚，并使它的真或假能被更容易地看出。此外，一旦知道符号T，B和N（F）的真值，命题的真假，便能以一种纯粹机械的方式来决定。这种逻辑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构成了计算机工作方式的基础，在计算机中，真值（或1）以电流流通来表示，而假值（或0）则以电流不能通过来表示。电路可以被设计为把A和B的输入值转换成A∧B，A∨B，A→B或～A形式的输出值。计算机中实施计算的部分，便是由巨大数量的此类电路构成。

参见：符号逻辑。

植物学（Botany）

植物学（源自于希腊文 botane，意思为“植物”）是研究活体植物各个方面的科学。最早获得普遍承认的植物学家，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约公元前 371—281 年），他著有《植物研究》、《植物病原学》等著作。但是，这些著作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欧洲的哲学家们重新认识。最早的一些植物学研究，是基于对有用的草本植物进行医学分类的需要，例如：公元一世纪迪奥斯科里德斯编写了一部草药志，收集了约 600 种植物。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得科学的植物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批植物园和植物标本馆相继建立，将旅行家们从东西半球所采集到的植物标本保存起来。1628 年，鲍欣编写了《植物图鉴》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约 6000 种植物采用双名法命名，许多植物配有图例。16 世纪，由于透镜和显微镜的出现，使植物解剖学成为继**解剖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和**分类学**之后的又一门新兴学科。植物学研究在生命科学的某些领域（如细胞理论和**遗传学**）已取得重大进展，它对农业、林业以及制药业的科学进步也有着重要贡献。每天人们都会发现一些尚不清楚其农业价值和药用价值的新品种植物，植物学仍然是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

参见：人种植物学，古植物学，光生物学，向性运动。

市民剧（Bourgeois drama）

戏剧批评家和学者使用“市民剧”这个术语，是指代以资产阶级为主人公的戏剧和以资产阶级为主要读者的戏剧。它尤其用来刻画那种表现明显不具有英雄地位的人的严肃戏剧，其主人公

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上一般不被认为是潜在的悲剧人物。在伊丽莎白戏剧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但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市民剧（在其两种意义上）都出现在18世纪，而且以后继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参见：自然主义；现实主义。

资产阶级（Bourgeoisie）

“资产阶级”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文，同源的英语词还有burgess（自由民）〕在**社会学**中有两种意义，都源于马克思。

就其第一种意义而言，社会学家将之泛泛地既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又用于其中的统治阶级，在此意义上，资产阶级指那些一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因而与工人阶级处于对立面的群体。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包括两个主要的阶级：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所雇佣并获得一定的工资，但其工资并没有反映其生产的商品的全部价值，“剩余价值”被资产阶级占有，成为利润。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使这两个阶级成为冤家对头，两者中间的阶级斗争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

就其第二种意义而言，这个词具体地指一种历史的涵义，指由企业家、商人和工业家组成的城市市民阶级。他们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积极力量，在此意义上，这个词是指一种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群体。

参见：异化；资本；阶级；冲突理论；劳动过程；马克思主义。

婆罗门教（Brahmanic religion）

婆罗门教（由婆罗门**种姓**信奉和传承的宗教），学者们已经把它当作标准的**印度教**来对待。梵（Brahman）一词，源于梵语词根 brm，指"产生、生长"之意。当梵语词根 brm 用于 Brahmans（婆罗门成员）时，它可能指他们假定的、增强生命、面对众神、行医和占星术的精神能力。一个婆罗门（通常用 Brahmin 来表示），是一位赋有神秘表达能力的人，例如**献祭**中说出仪式话语的能力。梵即道、言说本身，宇宙的第一原理，因而是一个关于神：万物之灵的完全抽象的概念。这个思想，具体化为创造主梵天的思想。创造主梵天，是印度"三位一体"梵天、湿婆、毗瑟拏中的第一主神。他很少被单独崇拜，但他是终极的神。毁灭之神湿婆、守护之神毗瑟拏两个概念，都是婆罗门教固有的。梵居住在人心中，并生成它。

婆罗门教将人生分为四个阶段（称为 ashramas）。孩子成长过程中，有取名、给米、最后是赐线的仪式。此后，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到来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宣告他有意向去瓦腊纳西学习各种经典。他的父母恳求他留下，给与他礼物，按传统是安排和一名导师或老师一起学习。当他返回时，他要接受另一种仪式的洗礼。除非他订了孩子婚，否则，他要很快寻得一位新娘。第二阶段是作为家长，他成婚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家庭的献祭、养育孩子。当婆罗门看到他的孙子们时，他也许会带他的妻子（由她自己确定）或独自隐居，首先到森林中默想，最后即当他成为一名鳏夫时，把自己奉献给**苦行主义**，并在预备死亡中认识自己。在每一阶段，他可能穿上苦行者的赭色长袍，发誓过独身生活，借助严格的修行更快地获得觉悟。不管跟从哪一种模式，它们都

是通向知识的道路 gnana marga。妇女也许会成为尼姑，或成为一名特定导师敬虔的门徒，但一般说来，她们不会选择苦行的生活，直到她们作为守寡的祖母时。这个时候，她们不再负责在家中安排家庭生活。但是，也有一些著名的婆罗门女圣徒和哲学家。

除了《吠陀》与《奥义书》的神学外，婆罗门教还由两部伟大的史诗构成。这两部史诗，即《罗摩衍那》与《摩呵婆罗多》。后者中尤其是《薄伽梵歌》（“福者之歌”）的教导。**吠陀**崇拜，通常在野外举行，但可能是在接触希腊的寺庙崇拜后开始的，随之而来的还有寺庙艺术。据说由于这种苦行的传统，婆罗门教是弃世的。虽然一些教义如 maya（“幻”更好的译法为“无常”）或许给人倡导苦行的印象，但在实际的践行中，经典与婚姻仪式所设定的生活的三大目的，依然是法（dharma）、富有（arthi）和业（karma）（“乐”）。

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

布雷顿森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25 年解除“国际货币制度”、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协定的名称。1944 年，来自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员在美国新汉普辛的布雷顿森林开会，对国际债务和汇率管理制度由“国际货币基金会”统一管理达成共识。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一种正式的世界协定为国际货币制度立法。

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下，国际货币基金成员国的汇率固定为黄金或美元；只有美元可以按一盎司为 35 美元的固定价格兑换为黄金。成员国保证在每一平价交换方（买卖通货时）把他们的货币价值维持在 1%之内，而且还要求每一个成员国要向国际货币

基金会通告一切平价的交换；如果兑换超过了10%，他们还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批准。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条款规定，只有在一个国家的支付平衡表外在“基本不平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兑换交易。

当政府支付困难时，布雷顿森林协定设想了两种国际储蓄的形式：

(1) 控制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这种控股过去很小，现在仍然很小。国际货币基金会成员国存入国家货币份额（直至1976年仍为黄金），作为给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抵押，确定存入“份额”的依据是国家的现实“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会然后运用这些抵押存款作为贷款去帮助那些国家实现支付平衡。它也还可以使用对特别支出权的控制。

(2) 国家通用货币。原则上是美元，但老大英帝国的大部分隶属国也使用英镑。由于美元可以兑换为黄金，所以它具有货币所需的一切属性：价值稳定、方便，在交易中广为接受。

首先，美元外债全部由黄金偿还，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债务已超出了黄金贮备。国际货币的稳定性，取决于对美元本身的信赖。1971年8月，这种信赖被粉碎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和越南战争的开支问题，迫使尼克松总统贬降美元对黄金（一盎司38美元）和其他主要通货兑换价值。中央银行的储蓄也一下子贬值了。在几个月的波动、混乱和美国高压影响之后，最重要的工业国在1971年12月一致同意按照史密逊协定采用新的平价兑换率，到1973年所有主要货币都进入流通。

野兽主义（Brutalism）

野兽主义（出自法语brut，“未经装饰的”）是盛行于20世

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个建筑流派：当时，似乎每一赢得赞扬的新建筑，都是一个张扬赤裸的混凝土、水泥砖及裸露的通风管、水气管的纪念碑。野兽主义的主要建筑师，包括美国的鲁道夫（生于1918年）、英国的爱利生和斯米森（1920年代）。这一流派的代表性建筑，有几所战后的英国大学及这些大学所在地的几个丑陋的新城。这些建筑，给人强烈的感觉是，建筑物是重要的而人的需要则是次要的（为了建筑师们更高贵的信仰）。虽然如此，尽管纯粹的野兽主义似乎是与其名称十分相称，但是，未经修饰的美的观念，的确导致了一些更古怪风格的建筑物的卓越不凡，其中，巴黎的鲍波格便是优秀的范例。

佛教（Buddhism）

“佛教”一词，是由19世纪早期欧洲的东方学家创造的，指在中亚、东南亚人们遵从的一系列宗教修行与神秘的典籍。但是，在佛教存在的2500年间，它得到异常广泛的传播。佛教覆盖了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在一些时候影响了包括缅甸、中国、印度、日本、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甚至最近的欧洲和美洲各地的宗教与文化生活。

佛教最主要的信条，是息灭一切不同形式的“苦”(duhkha)。苦是比多数人在某些时候遭遇的日常患难更多的东西。对佛教徒而言，整个宇宙万物都屈服于苦，没有一样事物是例外的，众神、魔鬼、居住在地狱或天堂中的事物也如此。快乐总是无常的；生命总是在死亡与朽坏中结束。甚至死亡本身，也不可能给出解脱得救之路，因为所有无常之物都在不断重生于死亡和新生的无尽轮回中。这种关于世界的理解，既不是悲观主义的，也不是虚无主义的。的确，所有佛教教义，都指向灭苦的可

能性。这种解脱，构成佛教的得救概念——涅槃的内容。

涅槃（即极乐世界）怎样实现呢？佛教通达得救或觉悟之路，要成全三大要素：（1）德性（戒）：包括通过对一切生物履行普遍的慈悲怜悯来过正确的生活方式。（2）智慧（慧）：借助思想和批判的考察要求追寻对事物本来如此的真相的理解与知识。（3）践行（定）：包括通过溟想的修行、定慧与洞见来实现心理的拓展。这种修行、定慧与洞见，以达到对实在的直接理解为目标。

这三大要素，不是互相孤立的。德性、智慧、践行，在佛教里互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并不像花瓣那样彼此粘连，而是如大海里的盐水相互交融（使人想起佛教的一个著名明喻）。它们是通向得救之路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条道路向所有人开放，既非通过盲目的信也非借着神圣的恩，而是因着“如事物实际所是的那样观看它们”方可获取。

按传统，做一个佛教徒就是要“藏”于“三宝”，又指“三藏”。它们是：佛（“觉者”）、法（“言教”）和僧伽（“僧团”）。通过这些，一个人便能超脱苦。为了世俗的目的，人们可以转向别处的地方神祇、婆罗门的仪规、巫术等等。不用奇怪，佛教总是和其他宗教信仰并存，带有容纳其他“本土”宗教仪式的明确倾向。多数情况下，这些“本土”信仰，并未被看作和精神寻求相关的东西，所以，它们容易被接纳。这种内在的开放性，促进了佛教的广泛发展与多样性。

buddha一词，在字面上意味着“已觉醒的人”。但是，在印度的宗教语境中，它已成为一个对有知识的人的荣誉称号。根据佛教信仰，一直存在许多佛陀，各自都应有许多人跟从。最新的佛陀，在历史上通常指乔答摩·悉达多。他可能出生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释迦族。这个家族，居住在离尼泊尔边境不远的印

度北部。传说他是一个王子，他的父亲王国的继承人。他放弃由王室养育的世俗欢乐与奢华，寻求对生活更深的理解。他和生活的各种严峻现实的冲突，促使他寻求一条解脱普遍之苦的道路。于是，他舍弃家庭生活，为寻求真理而成为一名苦修者。他徘徊六年，在不同的宗教导师指导下学习。虽然他掌握了一切著名的技能，但他并没有得到满足。35岁时，他决定走自己的路。他进了一餐、坐在一棵树（后世以菩提树闻名，即“智慧之树”）下，深思冥想后，达到对真理的彻悟。他由此以佛著称。佛即“觉悟（或被开启）的人”。他在现代的波罗奈斯城外的鹿野苑，向五位苦修者传讲了他最初的证悟。

佛陀的言教，不承认**种姓**或阶级有差别（这是革命性的一步，也为他的同时代人大雄所拥有的思想，参见**耆那教**）。他的目的，是要为全人类打开解脱之路。在许多方面，佛陀的生活都体现出佛教教义与伦理的基本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中道”的强调。“中道”这个关键论题，贯穿于整个佛教中。佛陀既体验过作为王子的感官的快乐，又经历了作为一名苦修者克己的痛苦。两者由于中道而被弃绝。

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人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创立者的生与死中。毫无疑问，虽然乔答摩被描绘为充满人性的，但过分强调此点有时会引起误导。的确，佛陀不是一个神，佛性在人的环境如许多生活的高潮也能达到。不过，成佛，既不是成为人又不是成为神，而是超越两者的本性。

佛陀在鹿野苑的首次言教，被称为“初转法轮”。法是“三藏”中的第二，在佛教和印度思想的整体发展里，法是核心术语。它既是客观描述性的，指万物实际存在的方式；又是主观规定性的，指万物应该存在的方式。为了强调这方面，它常常被翻译为“（无为）法”或“宇宙法”。在佛教里，要认识法，同时就

是要理解精神生活的法则并达到它的目标。

佛陀用“四圣谛”的形式解释法。“四圣谛”在佛教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它们是：

(1) 苦谛（见前面）。据说万物皆苦：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阴盛苦——事实上，无论任何快乐或痛苦的体验，都苦。苦有三大要素：在心理学意义上经历患难之苦；启示万物永恒流变的“形而上之苦”，以及决定存在者真实本质的内容之苦。人们也许可以用下面的话简述为：苦在心理学与本体论意义上包括存在者一切可能的非涅槃状态。

(2) 集谛（关于苦的起源的宝贵真理）。苦的原因，是贪（字面义为“渴”）感官享乐、其他事物，贪图更多或更少、存在或非存在。这种贪瞋，是一个循环链里的环，每种因素在其中既产生又被它的对应物生出，最后把人囚禁在苦牢里。这种“链”，被称为“相互依存的缘起”，在那里蕴含着条件性、现实性、相互依存性的原则。它们构成佛教解释一切心理学、物理学现象的内核。

(3) 灭谛（关于断灭苦的宝贵真理）。最高和最后的自由，是“灭尽”（涅槃的字面含义）贪、嗔、痴的欲火（有时指贪求、嗔恨、痴迷）。人们常常用一个医学上的比喻来解释四圣谛。人的病情被诊断为苦。这种病的发生原因是贪，如果消除这病因，就能确保健康。在这个比喻中，健康即涅槃。

(4) 道谛：关于途径的宝贵真理（通向灭苦的方式）。道有八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八正道，重新确立了前面提到的（道德行为、智慧和践行）佛教的精神训练与操练的三大要素。因此，四谛涵盖了佛教教义的全部，创造了一个复杂精细、和谐一致的整体。

关于“道”的更多的历史意义，指僧侣与尼姑的修道会。僧

侣和尼姑，在形式上承担着寻求过佛教生活、遵守修道会的“戒律”（vinaya）的任务。在佛教里，一直都有一个地方，是为普通的追随者而保留的，得救解脱从来不只是僧侣、尼姑的事。但是，正是从一开始，佛教都带有僧侣、尼姑世代相袭的特征。他们舍弃世俗生活，决定在同其他僧侣、尼姑构成的共同体中将自己委身于严谨的修行。这便是僧伽（僧团）一词的含义。僧伽一般地意味着那些求道的团体。僧侣、尼姑抛弃一切世俗所有的财产，仅带着最少的个人用品（三衣一钵、腰带、剃刀、针，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在传统意义上，僧侣与尼姑过着流浪的宗教乞丐生活，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时间仅限雨季中的三个月。他们依靠施舍获得衣、食、住及药物。虽然一个僧侣或尼姑如果愿意总是可以自由离开僧伽，但逐出僧伽，过去、现在都是很少的现象，除非极端的情况。

僧伽在佛教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它是法的知识的护守者与传承者。和其他许多宗教不同，佛教同一个特定的地方或阶层没有联系，它不控制各种过渡形式。佛教“基本原理”的核心，总是让守护佛法占据了更多的优先地位。这种守护，不是通过政治权力结构或控制社会习俗与生活方式、而是借助一个委身的共同体嫡系来实现的。

从一开始，僧伽都缺少一种至上的权威。佛陀拒绝建立一个实用的等级制度或指定一位继承人。权威在僧伽中，被看作是集体的；级别的高低，仅根据授戒日期计算的资历来确定。言教只由一名指定的、成熟的教师传给每位新人。一名师傅根据自己继承来的权利轮流训练教师，并依次享有佛陀本人的权利。一个嫡系的观念，是僧伽的中心观念，其中师徒关系的统治方式，弥补了中心权威的缺乏，将权威的重担转移给师徒关系的个人层面上。

以上描述的诸种主要思想，为佛教的所有传统共有。但是，对这些主要思想以及体现它们的术语，各个时代不同的传统一直有着不同的解释。虽然宗派、异端在佛教中得到承认（且将是对佛教之道的重大偏离），但教义的差别并未被看作衰弱的象征，而是这道合法演进的一部分。总体上，教义的差别，没有导致在法方面的裂痕。另外，地域和教义的差别，致使佛教徒与西方学者把累积的传统划分为更容易理解的几部分。有三大“乘”（教派），它们侧重对得救的过程和目标不同的理解：小乘（Hinayana）、大乘（Mahayana）和金刚乘（Vajrayana 通常指密教）。流传至今的小乘，主流是广传于东南亚国家的上座部。大乘佛教，这种北部、东部佛教的主要形式，从印度传到中国（含西藏地区）、尼泊尔，再从中国传入日本。当今中国西藏和日本的佛教（包括禅宗），全都属于大乘佛教。它更多地倾向于适应变化、本土的影响，其神秘的典籍用几种庞大、差异、多样的语言书写而成。金刚乘或密教，很大程度上可归入主流的大乘佛教，但和印度教密教的修行形式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密教的核心，是一套仪式体系，它围绕诸神的召唤、超自然能力的获取、觉悟的顿开而展开，并以默想、“咒语”（mantra）和瑜伽为手段。

预算赤字（Budget deficit）

预算赤字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是指发生在预算期内收入低于开支的情形。如果没有早期建立的可供支取的足够储蓄，赤字就成为债务。在美国联邦财政中，**国债**就是多年联邦赤字预算的总净额，还要把那些消极赤字的偶然余数计算在内。

联邦赤字可能是一种**财政政策**，用于私有花费注定不足时通过提供更多的政府开支扩大经济结构中的经济活动。但是，三十

多年过去了，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持续增长，因为政府和国会不愿意用各种费用和税收去提高足够的基金以支付他们想要的开支。最后一次联邦预算盈余（3亿美元）是在1960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赤字增加到了20亿和30亿美元。因为赤字是预算好了的，所以赤字是有意造成的；但是，在许多年中，赤字等于通货膨胀，因而也是合适的财政政策的对立物。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努力通过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是越来越困难了。

参见："赤字开支"。

官僚制度（Bureaucracy）

官僚制度的本义是指"依靠官员进行统治"，现在仍然是指这个意思：这暗示官僚制度与民主制度或贵族制度一样，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成熟的政府组织体系。然而，官僚制度还有一种更为中性的涵义，它既指公共行政部门，又指一种以科层制、人事聘用和工作程序的非人格化、组织形式与文件的延续性，以及专家意见的优先性为特征的组织方式。

政治学许多关于官僚制度的论争仍围绕着其原始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左派批评家指责官僚体制危害了民主制度，并提出用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防止这种可能性。他们的论敌反驳他们说，他们的建议较之官僚制度更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曾沮丧地预言整个世界的官僚化，认为所有非官僚的组织方式都将被官僚体制取代，因为后者的效率更高。韦伯及其理论先驱法国政治理论家托克维尔认为，现代大众社会既是官僚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他们认为，一个强有力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政制**是防止权力过于集中的国家压制市民社会的惟一有效手段。

正是韦伯提出了官僚制度的经典模式。在传统社会中，官僚组织的规模还是有限的，但韦伯相信官僚体制的扩张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的扩张是理性化的典型体现。韦伯指出，对组织的理性追求目标而言，官僚体制是最有效率的管理形式。

韦伯建立了官僚体制的“理想型”——这是一种对官僚体制的抽象描述，它凸现现实官僚体制的某些特征，以呈现其基本属性。韦伯列举了官僚体制的下列基本特征：(1) 存在一个金字塔状的精确的权力科层制，指令链从塔尖直抵塔底。(2) 所有级别的公务员的行为都有成文的章程进行规范。(3) 公务员各司其职，其工资待遇和聘任晋升以形式化的资格考评为依据。科层中的每一份工作都有相应的明确规定的工资，组织内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会获得预期的履历。(4) 工作人员在组织内的分内事与其在组织之外的生活不相干。(5) 官僚组织内的物质资源如办公室、写字台、机器设备等不属于工作人员所有。

不过，研究表明，现实的官僚体制并非准确地按照韦伯所描绘的模式运行。成文的章程可能会导致职员的僵化，不能应付环境的改变，而由职员自己摸索出来的权宜之计可能比墨守成规更有效率。

经济学家，尤其是公共选择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行政体制不利于自由市场和企业。他们指责官僚机构预算庞大、人员臃肿，并且挤兑、干涉和压制私人部门，也就是说，他们将官僚体制视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雏形，他们建议用私有化、承包制、市场化解决官僚化的弊端。公共管理官僚体制的拥护者则反驳说，官僚体制的政府的运作高效、可靠，而且官僚体制是已知的预防公众普遍堕落的最好途径。

参见：可辩解性；权威；履历；劳动分工；精英理论；理想

类型；职业；多元论；专业；理性化。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

在**经济学**上，经济周期是指繁荣和萧条交替出现的时间段。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周期的出现有不同的幅度和延续的时间。产出的波动，伴随着就业和收入的波动。由于其原因复杂多变，周期也不是完全重复的。许多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从低谷到低谷或从高潮到高潮来测定周期。J·施姆彼德（1883—1950 年）认为，上述方法不适合也背离了历史的驱动力。他认出了周期的四个阶段：繁荣（从平衡到高潮的扩张），衰退（从高潮到趋势线上的下一个点的下落），萧条（进一步落入低谷）和复苏（从低谷到趋势线上下一个平衡的扩张）。他通过四个阶段来测定从平衡到下一个平衡的经济周期。另一方面，“国家经济研究局”则认出了扩张与衰退两个阶段，从高潮到高潮或从低谷到低谷测定经济周期。

康德拉迪夫周期，是以 19 世纪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迪夫命名的经济周期，他认出了经济活动的周期的跨度是 50～60 年。他的著作《经济生活的波长》于 1925 年出版。这部著作暗示，**资本主义**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人则宣称资本主义自我毁灭、永不稳定。他的著作近来激起了崭新的兴趣，因为许多经济学家试图解释 1973 年之后大衰退的原因。不幸的是，康德拉迪夫并没有非常清楚地证明。他的统计学建立的周期，是 18 世纪 80 年代末到 1844—1851 年，从 1844—1851 年到 1890—1896 年，一个从 1890—1896 年到 1914—1920 年的上行发展（他的支持者说，这后面跟着一个大约 25 年的下行发展这 25 个黄金的战后年代，而现在是衰退。）但是，康德拉迪夫

的分析最多也只是个大概。

参见："萧条"，"国民总产值"。

拜占庭（Byzantine）

在艺术史上，拜占庭一词，指从4世纪末以来东罗马帝国的**艺术**与**建筑**。它以君士坦丁堡（另外又以古罗马拜占庭城闻名）为基础。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建筑，把希腊—罗马**古典主义**建筑传统与阿拉伯世界的装饰传统相结合，它形成了从5世纪至今的东正教世界的教会建筑的基本风格。

也许在这种传统中，最重要的建筑是圣索菲亚教堂（圣索菲亚指"神圣的智慧"）。它建于6世纪，至今保留在伊斯坦布尔。人们认为：圣索菲亚教堂是最出色的拱形空间建筑，它的建成未用任何阻挡人们视线的中间立柱。一个位于中心的穹顶，看起来"由一段从天而降的金链子悬"在教堂上方。圣索菲亚教堂，成为随后大多数拜占庭教会建筑的原型。

C

微积分（Calculus）

词微积分的拉丁语本义，指用于算盘之类的计算工具中的小石头。今天在**数学**中，它被用来指任何一种符号操作规则系统，对于以使用符号表述为核心的学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见象征主义**）。在**逻辑**中，有两种主要的算法，称之为命题演算和谓项演算，它们共同构成逻辑演算法。它们在计算机理论的**语义学**研究中也很重要。

通常，在没有限定的情况下，这一术语用来指无穷小演算（微积分）。虽然微积分经常被认为是牛顿（1642—1727 年）和莱布尼兹（1646—1716 年）的发明（应归功于谁，这一直是太多争论的话题），但实际上，它是许多 17 世纪的数学家们尝试解决应用数学中的两个主要问题之工作的产物。牛顿和莱布尼兹的主要贡献在于，认识到这两个问题是内在相关的。

第一个问题是决定曲线切线的微分演算。对于曲线上一确定的点，可以有一条通过此点的直线，它只与曲线相接而不相交。这种直线称为切线。（对于某些曲线上的某些点，不存有这样的直线。）问题是，给定一条曲线及其上面的一点，如何发现它的切线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如何找出它的斜率——即曲线在此点的导数。这对物理学非常重要，因为一运动物体的速度的方向，总是沿着描述其运动路径的曲线的切线方向。因此，微分演算法的知识是力学研究所必备的。

第二个问题被称为积分问题，是关于积分的计算。问题在于

怎样才能算出曲线内面积的大小。在二维的笛卡尔坐标系中（即 x，y 坐标），一条曲线通常写作像 $y = f(x)$ 式的方程，其中 f 是一个函数。于是，（从 a 到 b 的）曲线的积分被取为，由在〔$a, f(a)$〕和〔$b, f(b)$〕之间的曲线本身和连接〔$a, f(a)$〕到 $(a, 0)$，〔$b, f(b)$〕到 $(b, 0)$ 及沿 x 轴的 $(a, 0)$ 到 $(b, 0)$ 的直线之间的面积。这被写作 $\sim a^{\wedge} bf(x)dx$。

牛顿和莱布尼兹分别独立发现的两个问题间的内在联系，被称为微积分的基本定理。函数 $F(x)$ 被定义为曲线 $f(x)$（对于某一确定的数 a），在 a 和 x 之间的积分，于是 $F(x) = \perp dx\ f(x)dx$. 微积分的基本定理即 $F'(x) = f(x)$，其中 $F'(x)$ 是 F 在点〔$X, F(x)$〕处的导数。换句话说，积分过程，是使我们从函数 $f(x)$ 到函数 $F(x)$，而微分过程是使我们从 $F(x)$ 回到 $f(x)$。实际上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它们仅是一种演算法。

牛顿和莱布尼兹使用了无限小数（一种小于任何其他的数，但又不是零的数）；莱布尼兹把基本定理与无限小的神秘观念联在一起，这导致微积分被认为并非真正是数学中的代数的真实内容。这一问题，于 19 世纪初被玻尔扎诺、考齐和维尔斯特拉斯解决，并由此产生了数学的解析理论。

食人行为/吃人肉（Cannibalism）

食人行为（源于 Canibales，加勒比人原初的古西班牙语名称。加勒比人是加勒比的土著人），在人心里唤起的几乎是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更极端更本能的反应。据已有证据表明，食人土著集中于南半球大约有巴布亚新几内亚那么大的范围内，散落于玻利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群岛、中非南部和中美洲的一些地区。对于他们来说，食人可能是与同类打交道的一种方式：通过

吃食他人，你占有了他们的存在，使他们成为你的一部分（确实，经济的需要，似乎不是这类行为的驱发原因）。食人行为吸取了其敌人的力量，它同时也是把敌人从世界上彻底消灭并使其加速离去的一种途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广为报道的食人案例中，食人的连环杀手们供认了一种类似的满足：吃食其受害者的全部或部分肢体，是一种占有形式，某些罪犯在描述时用的几乎都是性交术语。

尽管抽象地看，人们可以争辩说，吃人与吃其他动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在实践上，食人行为现在是而且一直是所有最久远和被最广泛持有的禁忌之一。或许，其原因之一，是同类理论的一种颠倒；如果我们吃自己的同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便是在吃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种观点的引申，便是许多宗教所持有的观点：人类是按上帝或众神的形象被创造的（因此吃食人类将招惹超自然力的震怒），或精神和肉体在死后将分离（因而吃食肉体将剥夺精神在死后生活中的完整，所以它会将其愤怒发泄到吃食者或整个社会的头上）。还有一个信仰是，死人属于另外的世界，因此，吃食他们便是侵犯活人被禁止僭越的界线。这种推理是复杂的，但结果却很简单：几乎每个具有“高级”宗教实践的社会，都禁止食人行为。

宗教允许我们以战争的方式或司法审判去杀死同类，然而，一旦他们被杀死，对他们的尸体却要敬畏地处理——而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驱除罪恶）这种敬畏并未扩展到吃食他们。英国作家诺曼曾写过一本小说（《末世产品》），讲述在一个未来的社会中，一群人（碰巧是白人）“牧养”另一群人（黑人）作为食物，但被牧养者在出生后不久，便必须被小心翼翼地除去推理能力（通过脑手术），这样他们变成了一种亚物种——动物人。这是一种可怖的假设，但却是对所有关于普通的吃肉与特殊的食人之混

为一谈的观点的透视。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说来，食人行为是一个如此悠久的禁忌，以至于已不可能把它解释清楚。对食人行为的憎恨，似乎与其说是一种意志的行为，不如说是使我们成为人并构成我们的本质的一部分。（其他动物愉快地吃食自己的同类，甚至是自己的后代。）这方面一个自然的推论是，食人者本身经常被以某种方式看作为有缺陷的亚人类——然而，这只是一种同情的考虑，完全缺乏逻辑性。

资本（Capital）

在通常的用法中，资本（源于拉丁语 caput，“头”的意思，罗马人口财产调查中使用的财产单位），指金钱或财富；对经济学家而言，资本是生产的第三个要素（其他两个为劳动与土地）。三者结合产生出货物与服务。例如，资本与劳动的比例用于制造一辆小车，这依赖于两个东西：（1）它们的相对价格即劳动成本与利率。利率是资本的价值的一个计算量；（2）技术状况——相对于劳动而言，资本用得多的工艺流程被称为“资本密集”，同时，劳动量用得多的称为“劳动密集”。

人们通常将机器、建筑物、厂房等当做资本货物——任何用来生产其他事物的东西——但资本本身被进一步分为两类：固定资本和流动、流通资本。固定资本就是机器、建筑物和厂房；流通资本就是原材料设备、半成品、部件，并且关键是钱。后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很快被用尽。

的确，在私有财产的意义上，资本存在于前资本主义世界。但是，虽然资金存在，但人们并没有重新和积极使用它们的冲动。亚当·斯密在18世纪的著作中，认为资本积累对社会具有巨大的利益。因为，如果将资本用于机器生产，它便提供了劳动分

工。而劳动分工，会成倍提高人的生产能力。

19世纪，马克思使用资本这个术语，指资本家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私有财产。对马克思而言，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划分为许多时代。按照各个时期的经济结构与相关的社会关系，它们彼此互相区别。马克思论述道：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少数资本家阶级拥有生产手段，而大多数工人阶级没有。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价值，低于他们生产的商品价值。这些商品在市场上销售谋取利润，资本家提取这种利润，用于积累并再投入生产过程。

一些社会学家，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资本这个术语。它指任何“财富”，它又直接或潜在地用作一种收入资源，例如“文化资本”。在此意义上使用的资本，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与此相反，马克思是在更为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它：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惟有的特征。

参见：异化：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阶级；冲突理论；劳动过程；马克思主义；权力；新教伦理；社会。

资本主义（Capitalism）

资本主义是这么一种经济制度，其中存在着对自然资源和资本商品的私人占有。租金、利息、利润的回收都付给私人，他作为占有者决定着自然资源与资本商品的使用。

实际上，决不存在纯粹形式的私有制经济制度，——某些公有制和公共决策使用生产资料，也存在于一切社会。所以，“资本主义”一词，是指这么一些经济，生产资料（自然资源与资本）主要是由私人占有和管理。更纯粹的资本主义典型形式是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

随着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占有和管理自

然资源和资本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日渐允许他们的农民至少在市场上出售部分产品以获取利润，社会主义国家为提高效率也越来越多地转向市场化生产。这就出现了如下情形：各个国家以不同的速度运动，从相对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相对纯粹的社会主义发展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种程度的结合，而形成混合经济。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英国和法国似乎在经济中向政府更少占有的趋势发展。1989年和1990年，不流血的革命发生在大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以后，他们努力采用民主政府形式，为向生产资料私有的市场经济过渡而进行持久的斗争。

碳-14年代测定法（Carbon dating）

碳元素年代测定法，是一种决定某些物质年代的方法。地球的高层大气，不断受到太空事件发出的宇宙射线的轰击。这种轰击，和构成大气的80%的氮相互作用，产生出一种稀薄而不稳定的碳同位素，即炭-14。自然产生的碳，有两个稳定的同位素碳-12和碳-13。不过，碳-14是不稳定的，它会衰变为氮，其半衰期为5700年。半衰期这个术语，指任何衰变的样品中原子衰变一半的时间。因此，这即是说，一个内含碳-14的32个原子的样品，经过5700年后可能内含有16个原子，而在11400年（2×5700）后将有8个原子，只是在100000年后样品最后的原子才会衰变。当然，通常可得的会远超过32个原子。

所有生物与某些土壤，都同大气交换碳，所以，它们内含着和大气同样百分比的碳-14。由于宇宙射线的轰击，其循环速度往往与它衰变的一样快。生物只要死亡，它便停止这种交换，碳-14也不再进入生物体内。生物体内含的碳-14，会发生衰变

而停止替换。所以，如果我们考察一块化石内含着同等生物一半多的碳－14，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也许有5700年的年代。这样，借助碳－14的含量，我们能够确定化石的年代。

测量一个样品的碳－14含量，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由等待原子衰变再测定这种衰变品构成。对于只含有几个原子的小样品而言，这不是太有用，因它们的衰变将花很长时间。一种更好的方法即高能质谱分析法，在原子衰变前便测定原子本身；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测定只有几毫克重样品的年代。这包括使那些原子离子化以便获得负荷，对它们进行加速，使它们因一个磁场而发生偏移。偏移时原子运行的轨迹，不再依赖于它们的质量，这常用来测定现有碳－14的数量。

我们曾假定：碳－14的水平在整个历史中是保持不变的。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过去的20世纪，它不一定真实：未来的考古学家会注意到，由于核试验，20世纪60年代以降碳－14的水平有明显增长。也许，因为地球磁场的变化，碳－14的浓度过去也有变化。但是，只要我们知道碳－14的这些浓度过去是如何变化的，我们依然可以精确地测定样品的年代。狐尾松的年轮提供了这种资料。狐尾松的寿命，可以达到令人吃惊的几千年。每轮内含着那年内存在的碳－14的浓度。根据对狐尾松的研究，我们可以自信地测定上至公元前6000年的样品。

参见：考古学。

履历（Career）

“履历”一词（源于拉丁文carraria，意为车道）指一个人在其整个工作经历中所从事过的一系列工作，可分为体制化的和非体制化的，体制化的履历是一个人工资晋级和社会威望的依据。

这个词也可指非职业性的生涯，譬如说“漫长的生涯”。

参见：官僚制度；劳动分工；职业；专门职业；社会分层；地位；工作。

讽刺（Caricature）

词语讽刺源于意大利语 caricare，“装载”，这是英语单词“charge”的本意。它指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其中遭到讽刺的人或风俗的正常外貌或特点，被滑稽地夸大。在**文学**和**音乐**中，讽刺如果醒目的话，通常是一种个别的效果，而不是整个作品的基调；与此相对照，在**戏剧**和**美术**中，它可能是整个作品的主导原则。今天，我们把讽刺与喜剧联在一起，这尤其要归功于政治卡通和讽刺作品。然而，象在艺术中，博希的可怜的人群或霍伽斯的浪子与妓女；或文学中，莎士比亚的查理三世；《格列佛游记》中的斯特鲁德布鲁格斯或《1984》中的“老大哥”之类人物。——其讽刺也能产生出深刻而揪心的严肃效果。

狂欢剧（Carnival）

狂欢剧是中世纪一种类似于戏剧的轻松演出形式，即一种大众自娱自乐的**街头戏剧**，它对教会和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了挑战。演员和观众，没有明显的区别。狂欢剧更为正式融入到**文艺复兴**戏剧中，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中特殊的表现策略，以此挑战伊丽莎白社会的权力，但最后又被再度吸收从而加强了这种权力。更为晚近阶段，狂欢的观念被用来创作那种可能潜在地反对政治权力的戏剧。

参见：“戏剧”。

卡特尔（Cartel）

在商业术语中，卡特尔是指成文或不成文的协定，约束生产者稳定价格，分割市场，确立产品标准，进而限制竞争和提高利润。正如垄断者所做的那样，卡特尔也被用于调节市场和稳定物价。史密斯认为，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发展卡特尔的诱惑是如此自然的强大，以至于他带着极深的怀疑看待一切商业契约。他写道："同一次商务活动的参加者即使是为消愁解闷也极少聚在一起，而谈话的结束不是阴谋反对公众，就是设计提高价格。"在美国，反托拉斯立法的法律宣判卡特尔违法，但有时美国公司也获许加入国际卡特尔，尤其是加入由政府支持的有商品协定的各种卡特尔。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卡特尔尤其成为流行的趋势，如德国的几家钢铁公司就形成了卢尔斯达尔卡特尔，三家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同一行业的贝伊尔、巴登苯胺苏打公司和豪伊切斯特合并而成一家名为I·G·法尔本的控股公司（后来由于经营化学武器而臭名昭著）。

由于有意瓦解卡特尔的力量，尤其是国际力量的存在，所以卡特尔的成功是阵发周期性的。如一个或多个成员可能觉得降一点价而无视配额有利，为卖出更多，从人为抬高的价格中获取更大的利润。所以根本无须害怕其他卡特尔成员的市场制裁，因为他们束手无策。买主乐意接受更低的价格（即使只降了一点点），而供方也很愿意支持扩大生产。

参见："卖方垄断"。

笛卡尔坐标系（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传说，笛卡尔（1596—1650年）看见窗格投在桌面上的阴影，这激发了他设计第一个坐标系的灵感，该坐标系赋予空间中的点以数值。它至今还在使用，而且被称为笛卡尔坐标系，以示对他的敬重。

在一维情况下（换句话说，在一条直线上），选取一个被称为原点（坐标为0）的点，再确定一个长度单位（坐标为1的点离原点有多远），这样就可定义笛卡尔坐标了。现在，这条直线上的点都被定义了惟一一个实数值；例如，若坐标为1的点离原点有1cm远，那么，坐标为-243的点就是在相反方向上距原点243cm的那个点。

二维坐标系是一维坐标系的推广。这里，目标是为平面定义坐标。像前面一样，先选定原点，并让一条直线（称为横坐标）通过它，然后在横坐标上定义一维坐标。第二条直线，纵坐标，与第一条直线垂直（成90°）地通过原点，它的坐标系用横坐标上同样的方式定义。如果某人伸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食指代表沿着横坐标从0到1，那么，纵坐标上坐标为1的点就是拇指表明的方向上离原点有同样距离的那个点。（这也许听起来有些让人糊涂，但当你把它画到一张纸上，就容易看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现在，平面上的每个点，都有惟一的坐标(x,y)，其中，x是该点到横坐标的垂线（将该点与横坐标连结起来的最短直线）的长度；y是该点到纵坐标的垂线的长度。

重复同样的过程，可以为空间给出三维坐标系。它也能够推广到任意维数，其中，有些原来看上去毫无意义的东西，在今天的宇宙学理论中，却有很多应用。为了将空间物体的运动坐标

化，譬如地球，要给出它的位置，就需要三维，而给出它的速度又需要三维——总共六维。这时，多维坐标系就极有价值了。运用角（相反于线性的）测度的思想，以相同的方式，人们提出了柱面坐标，球面坐标以及其他极坐标。

自笛卡尔以来，**代数几何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它对数学思想进展的重要性，主要还是来源于坐标系的观念。当然，**笛卡尔**坐标不是惟一可以发展的坐标。

制图学（Cartography）

简单地讲，制图学是绘制海图和地图的科学和艺术。说它是科学，因为制图需要对地理位置的细致观测和地理资料的详尽记录，说它是艺术，因为选择地理材料并将之用符号图示出来，需要有审美的判断力。地图的性质取决于其用途，其范围包括从内部发行的特殊机密资料到面向公众的地图或地图集。通常情况下，地图的绘制手法决定于地图的精确度、分辨率以及地图的用途，但有时地图也出于虚构，或用于宣传目的。

人类很早就学会使用地图了，例如，古人用地图记载巴比伦冲积平原的地貌，罗马人用地图记载古罗马交通网上的驿站。甚至最原始的社会就已经需要地图了，他们将简略的地图画在地上、木板上或布片上，还用故事或歌谣讲述异地的风情以及去往那里的途径。古代制图学的顶峰是托勒密（公元2世纪）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yia)：其中论述了几个制图基本原理和几种**地图投影法**的具体细节，记载了8,000个地方的经纬度，还有几幅世界地图。不幸的是，这本书后来在欧洲失传了（却被阿拉伯人保存了下来），导致此后一千年间欧洲的大尺度地图的形状和尺度都严重失真，最典型的也许要算中世纪的地图将耶路撒冷作

为世界的中心，这些地图受一系列抽象概念的影响，如世界上的陆地和海洋面积应是均衡的，远方异国的人不像欧洲和地中海的人这样开化等。不过，用于实际用途的地图，尤其是海图，却远为先进，这最终导致了制图学的变革。

制图学的第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源于15、16世纪欧洲的“航海大发现”，对托勒密的重新发现和来自航海界的新资料激发了制图学的发展，诸如罗盘、计程仪、六分仪、精密时钟的使用等技术使精确确定船只和海岸在地球上的位置成为可能，制图学家利用新发明的印刷术印刷地图册，这是一件艺术性的工作，但同时也得益于新的地图投影法，而其中最著名的墨卡特投影法将地图上的直线等同于恒定的罗盘指向，决不仅仅是巧合。甚至连过去的错误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是托勒密错误的地图和波塞多尼奥斯将地球圆周长度低估为7,000英里鼓励哥伦布向西航行寻求一条通向中国的航道。到18世纪时，世界上大部分的海岸线都被画到了地图上，但许多陆地却仍是未知之域。

陆地勘测方面决定性的发展是由于三角几何学的应用，通过测量角度而不是距离来确定一个地方的方位，这一方法大大推进了陆地勘测的进度和精度，最初使用这种方法的是私人地图绘制者，例如萨克斯顿，他于1597年出版了世界上首部国家地图册。两个世纪后，法国的卡西尼地图使英国军队认识到高精度地图的重要性，英国开始进行军用勘测，并对整个不列颠岛乃至整个大不列颠帝国都测绘了地图。20世纪在地图测绘方面的其他进展也是由军事开创的，从航空摄影到卫星技术。现在司空见惯的天气预报鲜明地体现了制图学的巨大进步，利用卫星、雷达和全球数据站网络，可以为计算机提供数据生成近期天气形势图并预报未来的天气情况。从由等压线和锋线组成的天气图到由方向箭头、云层和温度分布区所组成的卫星云图，显示了为了使地图便

于被使用者理解，其图示手法的重要性。

到20世纪末，关于世界各地的可资利用的资料越来越丰富，以至于不可能把这些资料容纳于一幅地图中，制图学者现在正致力于用某些方法将这些资料应用于定位系统，以使不同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选用相应的地图，这就是所谓**地理信息系统**。

种姓（Caste）

从理论上讲，种姓是由特殊的职业和仪式结合而成的一个社会等级。它决定了人生来就具有的社会地位及其婚姻的范围，不过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种姓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只有在**印度**才存在的文化现象，英语中的种姓一词源于葡萄牙语 casta，这个词是16世纪葡萄牙人在印度定居以后用来称呼印度人的（而这个葡萄牙词又源于拉丁文的 castus，意为“种族”、“种类”或“氏族”）。有些人类学家怀疑是否惟有印度社会才有种姓制度，例如西非的一些社区似乎也划分为类似于印度种姓组织的社会等级。但是，人们所最为关注得仍是印度种姓制度的性质。

有几则印度神话将种姓制度的起源与瓦尔纳（varna，其字面意思是“颜色”）的四重结构相联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布鲁沙（purusha）神肢体化生的神话：婆罗门（教士和学者）源于他的嘴，刹帝利（统治者和武士）源于他的手臂，吠舍（商人）源于他的臀，首陀罗（农夫、手工业者和仆人）源于他的脚。

传统的印度意识形态认为其中三个高等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生来就具有精神上的优越性。这个种姓之外还有所谓的“不可接触者”，这是一些被认为生就肮脏并从事肮脏职业的人，例如剃头匠、清扫夫和皮匠，“不可接触者”被排斥于

上述四个种姓的社会边缘，但他们又是相互依赖的，因为正是由于“不可接触者”将污染物从社会体系中清除出去才保证了高等种姓的洁净。

实际上，每一等级都包括不止一个种姓和亚种姓，呈现出地位的差别。印度的种姓观念，规定了一个种姓能够与哪个种姓一同进餐、交换食物、水以及相互提供服务。例如，人们认为，一个高等的婆罗门就不应该从一个低等种姓的手中接受盛在陶罐的食物和水，以免被玷污，并受到社会的谴责。

研究印度种姓制度的著名学者迪蒙在其著作《人类等级制度》(homo hierarchicus)（1966年）中指出，印度教的种姓观念决定了印度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因此，在印度传统思想中，种姓等级制度是合法的，从而与西方的平等思想迥异。后来，人类学家重新评价了迪蒙的观点，有的学者指出他混淆了印度的观念和实践，还有的学者指出他虽阐明了婆罗门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却忽视了低等种姓，人们指责他歪曲了印度社会并将它神秘化了，从而提供了一幅面目全非的静止的图画，以此迎合**东方学者**的偏见。历史的研究表明，印度的种姓的体制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英国殖民行政机构，殖民地的统治者将种姓“想象”为一个种族类型学体系，用它作为标签对印度人民进行划分和治理。

斯里尼瓦斯提出了几个有用的与种姓相关的概念，他提出用“统治种姓”一词表示处于高等地位的种姓集团，用上流化表示种姓集团试图在社会中提高自己地位的愿望，通过疏远像喝酒吃肉这些不洁之物等途径就能达到上流化的效果。

显然，即使在印度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关于种姓也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由于种姓制度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所体现的不平等现象，印度采取了一系列宗教和政治的措施根除种姓制度。工业化和民主化对种姓制度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20世纪。

现代社会基于经济成就的灵活的阶级划分方式打乱了传统的种姓职业等级，然而，种姓观念在今天的印度日常生活中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尤其表现于婚姻对象的选择、寺庙僧侣的选拔等方面，在政治领域，尽管在推进社会平等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在社会中袒护“不可接触者”这种“积极的”种族歧视的做法，反而不知不觉地导致了对种姓制度的拥护。

参见：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种族特性；种族；结构主义。

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

在弗洛伊德看来，正是阉割焦虑或曰阉割情结使个人发展的**俄狄甫斯**阶段充满痛苦。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只有两种情结，其一是阉割情结，其二是俄狄甫斯情结。俄狄甫斯阶段大概指 3—4 岁之间，幼儿喜欢双亲中与己性别相异者而想杀死与己性别相同者，这一阶段的男孩意识到父亲的阴茎（生殖器阶段）并对它的体积和力量充满敬畏；他同样认识到女人（他的母亲和姐妹）没有阴茎，因此，他就有一种失去自己的阴茎的危险，这就是阉割焦虑。这种焦虑会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这一时期的所有有关性的思想和情感都被压抑，专注于克服这种痛苦。弗洛伊德将这种紧张的敌对状态和对父亲的恐惧视为一种重大的精神事件，它使男孩的性欲被迫处于潜在状态，同时在精神中形成一个伦理中介物，即超我。

由于生理结构上的差异，在女孩那里没有发生与在男孩那里相同的导致阉割焦虑的事件。弗洛伊德认为当小女孩看到其父兄们的阴茎时，她会认为她从一开始就被阉割了，因此，她的焦虑就是一种怨恨和嫉妒的心理状态，即所谓“阴茎嫉妒”。在弗洛

伊德看来，这种怨恨指向女孩的母亲，女孩要弥补这种缺憾，就希望与她的父亲生一个小孩，于是就陷于与父亲的俄狄甫斯式的纠葛之中。俄狄甫斯模式及其后果，即性的压抑和超我，就是通过这一途径在女孩身上形成的。正是基于由有限的几个事例得出的这种关于女性性欲的看法，弗洛伊德从女性的俄狄甫斯情结发展模式得出结论，认为女性的超我比男性弱，其道德感也弱于男性，认为这是由解剖结构注定的。他的这一观点后来遭到精神治疗医生们的反对。

催化剂（Catalysts）

催化剂（源于希腊语，意为“游离者 looser”）是一种用来改变化学反应速度但其自身并不因反应而消耗或改变性质的物质，许多物质都可用作催化剂，如铂、银和五氧化矾等氧化物。

催化剂大量用于工业生产中。最早使用的一种催化剂是磁铁矿石，用于氨的大规模生产中，促进氢和氮的化合，在这一过程中添加催化剂，可以用比此前较少的能耗进行氢和氮的结合，从而形成了低成本的工业化生产。

由于催化剂不参与化学反应，而只是其表面积促使化学反应速度的提高，因此，应尽可能地扩大催化剂的表面积，尤其是当使用贵金属作催化剂时，催化剂的表面积可能受到“抑制”，从而降低催化剂的效果。

在活的有机体中也存在催化剂，即所谓**酶**，它能够降解有机质。酶用于消化食物、食品饮料制造业和制药业。

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参见“道德规范”

范畴论（Category theory）

随着现代**代数**的发展，数学家们开始认识到：数学的不同分支证明的定理，常常彼此是相当类似的。范畴论，就是代数的分支，它研究代数对象的这些共性。一个范畴由两个对象构成：一组基本的对象（如**域**、**群**或**环**），以及这些对象之间的一组**函数**（如群同态——指那些维系乘法运算的两个群之间的函数）。这些概念的函数具有高度抽象性，其理由是因为人们提出它们以便反应数学不同分支之间的共有因素。由于它们的普遍性规定，通过使用范畴论得到的结果，是有效力的，但是，正因为它们太抽象，所以它们也是很难把握的。

参见：**抽象**。

卡塔西斯（Catharsis）

戏剧艺术中所运用的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卡塔西斯（“净化”）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用于讨论**悲剧**作用的术语。他的意思是悲剧“通过怜悯与恐惧”净化这些情感，因而一般认为卡塔西斯是指伴随着悲剧行动的解决而释放情感，获得满足的感觉。但这个术语的准确意义依然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天主教政治思想（Catholic political thought）

天主教政治思想，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15世纪，罗马天主教经典法律的系统化，及其在中世纪中和中世纪之后的解释，尤其影响了西方自由宪法和法律传统

的发展。经典主义者开创了普遍道德法则对法律问题的系统运用，直接导致了君主立宪、世俗权威、竞选、联合执政、全体一致在自然（与神圣对立）的法律体系之内可能和应该发挥作用的阐释，间接导致了**主权**观念的发展。甚至“附属权”观念，即在有组织的等级制中最合适的层次上执行决策的公理，也要归功于天主教经院哲学学者。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年）所实现的**亚里士多德**思想和**基督教**启蒙的综合，是中世纪天主教思想的最高成就。阿奎那论证，国家不仅仅是起防止战争的作用，还有积极的功用，即表现神圣的使命；基督教伦理不仅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政治的引导观念。

中世纪以来，天主教政治思想中的最基本变化，反映了教会等级制与世俗权威关系的转型。调和论者与支持教皇的人士之间的内部斗争，反映了宗教改革人士对教会权威的挑战。调和论者的出现，是作为解决 15 世纪早期大分裂主义的方法。但是，教皇的至上权威，又随着新教改革的危机而重新确立。在后宗教改革时代，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影响在欧洲的部分复兴，又导致了 17、18 世纪法国高卢运动和詹森运动对教皇权威的再次挑战。调和论者对教皇专制主义的挑战，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支持；在革命后，拿破仑与庇护七世于 1801 年签订宗教协定，保证国家享有对教会产权与教会管理的最后控制权。

19 世纪，在梵蒂冈已被削弱了的世俗权力领域内，教皇主义在庇护九世统治下重新获得了权威：在《论错误纲要》（1864 年）中他重申教皇无过失的教义，宣布社会主义、非教派的教育、世俗婚姻和世俗政治民主思想的其他成果。但是，19 世纪末，某些天主教**联合主义者**开启了一条更具现代主义色彩的方向：他认识到，教会需要适应**工业社会**、**民主制度**和阶级斗争。权威主义的天主教在战争期间巩固了地位，当时重要历史人物似

乎都支持同样保守、反共和、反共产主义的教条——正是这些教条发展为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但是，当纳粹体制的过分放纵大白于天下之时，早期法西斯主义运动被人们默默地接受，这严重损害了教会的信誉。合法性危机再次削弱了教皇的权威主义；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他的继承人保罗六世的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统治下，调和主义的新纪元降临了。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1963—1965 年）不仅代表了教会内部调和主义的复出，而且表明一种意义深远的解放，即教会的原则免于一种教义专制主义或相对主义，同时提倡教会普世论、主观道德性、礼拜仪式的自由化、神学上不一致的合法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天主教已清楚地接受民主政治以及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治。

新神学，是对把天主教作为普遍基督教会来接受的合法性的日渐衰落的认识。在特定社会现代天主教政治思想的影响，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现代化（或世俗化）程度，以及互相竞争的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力量。但是，无论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天主教都渐渐在地域的世俗的政治影响下而不是在教皇或经典主义影响下发展它们的政治思想。

天主教（Catholicism）

和**东正教**教会及一些**圣公会**教会一样，罗马教会宣称自己是惟一真正的、普遍的教会。因此，在梵蒂冈公会议的教令里，它自称为“神圣的、普遍的、信徒的罗马教会”。“普遍的”（“天主教”这个词便由此演化而来），意味着“包括一切的、广泛的”。当今的罗马天主教会，是一个世界组织。尽管不同的国家有细微的差别，但罗马天主教会在整个世界都有同样的基本组织结构、崇拜形式和神学信仰。“普遍的”和“天主教”这些词，结果就

具有了较狭窄的、更多宗派的涵义（参见**宗派/宗派主义**），以致在路德宗各教会中，我们发现了《尼西亚信经》中的一段话："我信神圣的、普遍的、信徒的教会"。由于概念进一步的模糊不清，一位东正教大主教，在东正教教会中相当于都主教级的主教。

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是仿效晚期罗马帝国的殖民地行政机构设立的。它既是区域性的，又是地方性的，形式上将堂区分组并入教区、然后为大主教区。主教连续的路线，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罗马宣称拥有主教教区的权利，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它基于彼得和保罗在那里殉教的传统。自中世纪以来，教皇的讲话永无谬误（ex cathedra 意思为一贯正确的，即他的讲话来自于教皇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宝座）。这是普遍的信仰，于1870年正式被频布。在同1054年（那时教皇把君士坦丁堡的最高级主教逐出教门）以来的东正教和新教领袖们的辩论中，天主教会也坚持教皇阐释教义绝无谬误。

天主教除了宣称具有普遍性、无可争议的权威、高度集权的主教制政府外，它的其他明显特征便是**教会学、圣母马利亚研究**以及基督真实存在于圣体（**圣礼**）的面饼、酒中的教义，也有主教、司铎、助祭三重传道职位。并且，自5世纪开始，独身得到严格的强调。

由于天主教会通过敬虔的教派（他们在所谓的"黑暗时代"保存了西方文明）的工作而扩展到全部欧洲，宗教生活无论在修士、修女的共同体，还是如跟从一种教规的个人献身那里都受到高度尊重。修士、修女以围绕一个特殊的中心组成的个体隐修士群为代表，而跟从一种教规的个人同时生活在世界上（"第三修道会会员"）。这便导致了无数的圣徒崇拜。在现代，天主教神学家们一直站在**解放神学、女权神学**运动的最前线；此外，在许多

第三世界国家，天主教会已从政治现状的拥护者转变为人权的捍卫者。

参见：天主教政治思想。

因果论（Causal theories）

哲学家提出了不同概念的因果论，其中包括知识、行为和记忆概念。行为因果论指出：主体身体（或主体心灵）的运动或事件是一个行为的条件和惟一条件，它是由一种合适的意图引起的。所以，我的手臂运动是一个行为，其条件和惟一条件是：它是由我的一种合适的意图如我要招手这一意图引起的。知识因果论指出：一个主体的信念作为知识的条件和惟一条件是：它是由某种使其为真的东西引起的。我知道天在下雨，其条件和惟一条件是我的信念——天在下雨——是由使这信念为真的东西——天在下雨引起的。

参见：行为；因果关系；知识；记忆；知觉。

因果关系（Causation）

某些事件引起或导致了其他事件。可是，什么是一个事件引起另一个事件呢？

有些人努力以持久联系来解释因果概念。这种事件引起另一个事件，其条件正是这第一种事件都永久地联系着第二类事件。比如，在充满了煤气的屋里划着一根火柴引起爆炸，因为第一类中的每一个事件——在充满煤气的屋里划火柴——必然伴随着第二类中的另一个事件——爆炸。

另一些人则按照非真实条件来解释因果关系。假如两个事件

现实地发生，那么，第一个事件就引起了第二个事件，其条件仅仅是：与事实相反，第一个事件如不发生，第二个事件也不会发生。比如，在充满煤气的屋里划火柴和爆炸现实地发生了，第一个事件引起了第二个事件，这仅仅是因为，如果与事实相反，火柴没划着，爆炸也不会发生。

因果论的非真实条件解释具有优势，它不像按持久联系所作的解释，它可能允许并非一切原因都决定结果。每天抽烟 20 支使提纳得了肺癌。但是每天抽烟 20 支只不过提出了概率性（可能性），但不能确定它导致了肺癌。持久联系的解释则错误地暗示：每天抽烟 20 支不会让提纳得肺癌，因为抽这么多烟并不与肺癌构成持久的联系，并不是每一个抽这么多烟的人都得肺癌。相反，非真实条件的解释正确地指出：每天抽烟 20 支使提纳得了肺癌。因为，与事实相反，如果提纳不抽烟，她就不会得肺癌了。

但是，当非真实条件的解释可以允许有些原因只是提示了结果的可能性，但它也面临了其他问题。一个问题涉及到超决定性。假如两个谋杀者都同时想直接击中总统的脑袋，那么，总统的死亡在因果上是超决定性的。有两个独立存在的原因——第一位谋杀者开枪，第二位谋杀者也开枪——每一个谋杀者的开枪都足以导致总统的死亡。于是，第一个谋杀者开枪杀死了总统；但与事实相反，若第一位谋杀者没有开枪，总统也仍然会死亡，因为第二个谋杀者会开枪。因果关系的非真实条件解释不能满足因果超决定论的情形。

参见："事件"。

细胞生物学（Cell biology）

细胞生物学，是研究细胞生理学以及细胞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科学。一种细胞与其他类型的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整个机体的影响，也是细胞生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最深入的细胞类型是淋巴细胞，淋巴细胞行使细胞调节性免疫反应。其他类型的细胞也因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而成为细胞生物学研究的重点，例如：对巨鱿鱼轴突进行了大量的神经细胞生物学研究；对细胞行为的研究也常常集中在游走细胞（如阿米巴细胞）方面。

参见：细胞学，细胞病理学，内分泌学，原生动物学。

凯尔特复兴（Celtic revival）

对凯尔特文学兴趣的复活开始于18世纪，当时，苏格兰诗人迈克弗森出版了奥森——声称是从前一个人们不知道的诗人的诗。这些诗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并导致另外一些凯尔特作品的出版，其中既有真实的（如《马比劳根》及关于库丘林的爱尔兰传奇）也有想象的（坦尼森的《国王的快乐时光》）。一个凯尔特文学会在牛津成立，“诗歌比赛会”传统在威尔士又重新焕发活力，而收集和出版所有存留下的凯尔特故事和传奇的计划也被提出，就像芬兰的《卡里娃腊》集“抢救”北欧日耳曼民族的资料那样。1893年，叶芝出版了一套民间诗歌故事集，并取名为《凯尔特曙光》。而并不热心于这一运动的人嘲讽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来世学派的名字。

在音乐中，凯尔特复兴运动涉及到几个极为不同的人物：麦

都逊（他的《芬戈尔洞》抓住了象1830年代初期那样的情绪）和巴克斯（英国人，创作了一些基于古凯尔特和爱尔兰主题的歌词），以及真正的凯尔特人斯坦福和迈克昆。在20世纪，纯正的人种学和人类学研究倾向于扫除一切迷雾，而一些奇思怪想则主要游荡于诸如《步兵旅》、《鳕鱼的彩虹》之类的音乐作品中，以及迈肯热和林科莱特的尖刻的喜剧中，迈肯热的《威士忌盛宴》尤为典型。

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中央银行不仅是商业金融体系的庄家而且也是政府的庄家。它常常是政府所有的运作机构控制着金融体系，是发行货币的独家权威。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或共享某一中央银行（如所属法国的非洲共同体）。在美国，中央银行即"联邦储备"，在英国是"英格兰银行"，在德国是"国家银行"，在日本是"日本银行。"中央银行坐落在很不方便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控制会集之地，保证政府有足够的财政实力应付开支，偿还由此而负的公债。中央银行很少或根本不控制财政政策，但它们又推动货币政策，监督金融系统。中央银行的职能可以分化为四个方面：

（1）作为政府的庄家。公共事务设施的公共开支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如果包括转让偿付，还可能更多）。政府以其收入和储存货币抵押给中央银行，并以中央银行的开户付偿账单。中央银行一般向政府索要为其作庄的费用——这是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2）作为银行业的庄家。中央银行从各家银行收取抵押，反过来又贷给他们。这种作用帮助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也帮助

它维持经济体制的稳定性。中央银行作为最后一道求助的贷主，也就是说，如果银行的确有困难，如果消费者（顾客）需要撤回抵押，中央银行准备为一切银行提供现金。这种安全净值使各银行短借长还，不会对此漠然视之。中央银行还常常通过规定必须存于中央银行的固定抵押比例来控制银行贷款。

（3）作为银行业的监督者。中央银行常常有权决定谁能起到银行的作用，谁能收取公众抵押。中央银行定期审核负债表，或者依法而办，或者靠善意的劝说，迫使金融机构收紧底线（银根）。

（4）发行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充当引导。设计、印刷、发行和取消纸币（以及硬币），是中央银行的工作。与政府和其他中央银行共同协商，中央银行干预货币市场，平息金融波动，保护目标价值。中央银行还可以参照在其他国家时下的利率，上调或下调利率而轻微改变货币的流向。

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中央计划经济是指公众权威而非私人做出基本经济决策的经济。重大的决策涉及到厂房和设备的投资，而这就决定了生产什么。其余决策包括：怎样配置资源，怎样把产品分配到家庭。生产能力（自然资源和资本）由国家而又是由私人占有与控制。

中央计划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特征。在理论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比可能更加合理、更加平等，但在实践中，它常常导致低效率，怠惰的**官僚制度**，对艰苦劳动与创造革新缺乏刺激。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处在中央计划经济的影响下，20 世纪 70 年代小范围内开始引进生产的市场导向，努力克服中央计

划的低效率。变革的斗争到1989年和1990年已白热化，并和平推翻了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府。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化为自由市场经济，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至于实现这种转化的最佳途径是什么，还有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阐发了相竞争的思想。当前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既是最好的，又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

参见：“资本主义”，“混合经济”。

确定性，不可怀疑性，不会出错性（Certainty，indubitability and incorrigibility）

乘客们确定——即在感到的一定意义上——飞机将要坠毁。但并不是这样。于是，在感到的一定意义上，确定性并不负载真理，因此也不担保知识。乘客感到飞机一定要坠毁，但飞机并非真的要坠毁；而且（正因为知识要求真理）乘客也不知道飞机要坠毁。哲学家常常不是在感到的一定意义上而是在不可怀疑、不会出错的意义上运用“确定”一词。

对我而言，我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我不能怀疑我存在。(同样，对你而言，你存在也是不可怀疑的。) 所以，我确定我的存在，这不仅是指感到我一定存在，而且是指我不能怀疑我存在。对于我存在这个命题的证据——我感到热，我极力怀疑我存在——排除了我不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我不能怀疑我存在。飞机上的乘客感到飞机一定要坠毁，但是他们的证据——突然摇摆和引擎中发出的古怪声音——并不排除飞机真的坠毁的可能性，而且也的确如此。乘客可能怀疑飞机会坠毁，因而也可能坠毁，在这种更强烈的意义上，他们不能确定飞机是否会坠毁。

“确定”一词的另一个意义，是不会出错。仅当一个句子是这样的句子——如果你相信它你就不能认为它是错的——时，这

个陈述才是不会出错的。考虑这么一个陈述："我存在"。如果人们相信他们存在，那么他们就存在：人们不可能错误地认为他们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确定性在感到的一定意义上对于知识是不充分的，也不能担保认识，而只有在不可怀疑、不会出错的每一种意义上方能满足知识。如果我不怀疑我的信念之一是真的，那么我的信念可以算作是认识。如果一个陈述是不会出错的，我又相信它，那么我就认识了它。有人设想，在这些意义之一或其他意义上的确定性对于下述认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信念不是具有不可怀疑的真实性和不可出错性，这个信念就不能算是认识。假如不可怀疑或不会出错是如此微小，这个断言结果就成为怀疑论：我们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参见："信仰"，"认识论"，"知识"，"怀疑论"。

室内音乐（Chamber music）

在欧洲艺术音乐中，室内音乐（出自意大利语 camera，"房间"）以较小的力度运用富于智力的音乐形式：弦乐四重奏代替交响乐，奏鸣曲或三重奏代替协奏曲，抒情歌曲或其他种类的"艺术歌曲"代替歌剧。由于它的特性，室内音乐增加了对智力密度的亲近。然而，这并未妨碍它成为一种重要的由名家演奏的音乐会形式——它的大部分作品都超出了大多数业余爱好者的理解能力，不论他们是出现于大型音乐会大厅还是独奏演唱会的室内场所。

变化（Change）

人类并不是世界上惟一好奇的生物。人普遍存在对事物的困惑和弄清楚的强烈欲望。那么，是即将发生的事，使得我们成为独一无二。其他动物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后，便到此为止。当同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它们便再次探究并再次满足。它们的好奇，是狩猎本能的一部分，极少或根本不需要智力。

与此相对照，人类的好奇涉及理性——反映、思考、比较、记忆——并常常导向创造。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几乎不会长期地满足于现状。当我们接受现状时，我们的接受不是本能的，而是从一堆可供选择的情况中的一种挑选，一种判断的产物。并且，我们很快便会厌倦。变化的刺激，是我们心智健全所必需的，我们无止境地努力追求要么使变化发生，要么做出让事物保持原样的选择——在涉及选择的地方，每一次的重复也是变化的一种形式。没有一种人类活动不涉及我们好奇的兴趣，不唤起我们对变化的热望。甚至像对食物、庇护和再生产的本能性追求，也从属于恒常的变化，并且当涉及到象社会组织或信仰之类的事件时，我们和其他动物间的差异，我们对变化的独一无二的需求所创造的差异，便再明显不过了。其他生物没有对时尚或风格的需求；它们从不建立或回应传统（它们的行为式样是本能的）；它们不创造任何东西（一只织鸟的巢并非是以“创造”摩天大楼或悲剧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它们既无想象又无批评。

如果说对改变事物的需求是人类的荣耀之一，那么，它也是我们的祸因。贯穿于历史（它本身是一种持续的变化）的对变化的强烈欲望，常常像导致创造一样地导致毁灭，并且我们可能真正地结束改变自己和我们的星球，直到我们消灭自己。这种思想

已促使许多人去从事反省、沉思，或向非人类的代理和神灵现实的或想象的，请求帮助——而每一种此类活动也是我们不满足于现状、需要变化的另一种表现，一句话，是恒常的人类智力状态的表现。

混沌理论（Chaos theory）

在其整个历史上，**应用数学**几乎一直与解线性微分方程有关；大多数的物理现象，似乎大致上都是被这类方程所统治的（见**线性**）。在这种系统中，初使条件的微小变化的影响，仅使整个系统发生微小的变化（例如，移动一台球一毫米，对于它被球杆球撞击后到达其他球的位置，没有什么区别——所有其他的事物也一样）。

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下述情况已变得很明显，即对于许多系统（特别是地球的天气），线性微分方程并不适用于模似这类系统，尤其是在某些初始条件下。因此，注意力开始转向非线性微分方程的应用。这种方程表明，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有时可导致系统的巨大差异。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一只蝴蝶扇动一下它的翅膀，将因此导致另一半球的一场台风。（自然，并非蝴蝶的每一次扇动都会如此；而是必须精确地在恰好的地点及精确地发生于恰好的时间。）

这一方法的困难在于，实际上没有非线性方程能以**解析**的方法求解。这意味着能发现的惟一解决途径是通过计算机的使用，使它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算出方程的结果，并找到近似解。这一切都必须非常快地完成，这意味着致力于混沌理论的计算机科学家们，经常受到今天所能拥有的机器和软件的局限性的困扰。

20世纪90年代初，混沌理论尚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与普通

领域相比，它对于计算机、数学和物理科学有着更重大的意义。然而，已有迹象表明，它已开始在**艺术**中产生影响，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新多元化的一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各种艺术创造者们已开始探索这样的观念，即混沌理论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据此，艺术家们不再努力去强求秩序和结构，而是可以利用偶然和随机的因素。这类例子，从波利兹及其助手在喀麦隆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将随机性与严格的音乐模进混在一起），到剧院中的即席喜剧表演（这是20世纪90年代遍布西方的巨大的汹涌潮流）；从“计算机诗歌”（“诗人”将程序输入计算机产生一些无目的词的组合式样，然后从中做出挑选）到诸如日本的矶崎新和仓俣及加利福尼亚的格瑞之类的建筑师的作品，此类事例涉及极为广泛的领域。

混沌理论及其相关领域的工作，进展得极为迅猛，以至于在展望其未来的发展时，不可能确切地预测任何东西，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任何关于混沌理论现状的描述和预测，一旦做出便也就意味着已经过时。

性格（Character）

性格是源出于古希腊语的一个词汇，其本义是用圆石或圆环在蜡上留下的印迹。这一本义，仍然用于印刷或计算中，在此领域中，一个“character”是一个有单独意义的记号，仅当它被以某种方式更改或与其他记号联在一起时，它的意义才会变化。（因此，a具有不同于A或a的意味；1不同于-1或11。）

在古希腊哲学中，词语“character”开始获得第二种意义：我们每人所拥有的个性的“标签”，仿佛我们是被诸神或环境打上印记的蜡。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习惯于通过描述某种我们可以想

到的（再次使用一个印刷的意象）“铅板”之类东西的“characters”，来讲授人的本性，这类流传下来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性格》（公元前3世纪），今天我们阅读此书不是为了学习其中的哲学内容，而更多的是为书中对诸如地主、迷信的人、闲话者和吹牛者的个性展示之活泼机致的描述所吸引。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常把一个人的性格看作是一些对立力量拉扯的结果——如善和恶，上帝和撒旦。这无意识地相似于古希腊的观念，即性格是出生时诸神印在我们身上的记号；但它也许诺了性格变化和改变的可能性，因为人们可以抵制或接受某种特殊的拉扯。在**文学**领域，作家们跟随这种观念或玩弄（来自**炼丹术**）主张，即所有物质都是土、气、火和水的混合物。“**幽默**”理论（最显著地表现于英国本·琼生的运用，并普遍体现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欧洲文学中）认为，各种类型的人都是这四种元素的混合，鲜有超出它们之外者——这是一种赠送给**喜剧**的特别礼物。

进入现代，性格更多的是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小说中，性格的晦暗性和隐匿性——早期作家所极为讨厌的东西——已成为重要的资源，并且，在许多现代文学和**戏剧**的鉴赏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发现一个人物的性格随着作品的展开而自我发展或自我泄露。某些现代文学，如贝克特或卡夫卡的小说，以及许多**荒诞戏剧**作品，甚至致力于刻画完全没有性格的“人物”。在此术语的原始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和新奇有用的**反讽**。

性格分析（Character analysis）

性格分析是赖克（1857—1957年）的主要概念之一，他将

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按照赖克的观点，性格特征是病人在治疗中体现出来的身体症状。性格是在反抗性（生殖）的渴望和禁忌过程中形成的，性感的人要能脱颖而出，必须摧毁自我或性格的硬壳，赖克相信在治愈身体之同时，心灵也被治愈了。

赖克将病症、反抗和性格特征等同起来，认为它们来自同一源头和机制。赖克继承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里比多**是生命的惟一驱动本能，他主张一种关于人类本性的泛性论观点。在赖克看来，快乐原则就是一切，可以从性的能量及其挫折出发解释人类所有的神经症。**焦虑**源自性的受挫，而进攻性为里比多提供了一个新的实现渠道。他不喜欢弗洛伊德对生殖期和前生殖期的区分，而将前者视为惟一真正的性欲。他将性交时的性幻想视为性变态，——他推崇没有性幻想的性高潮体验。他厌恶所谓升华的观念，认为真正的创造力与毫无拘束的性生活是一回事。赖克最终还是加上了死神萨纳托斯，即**死亡本能**，将死寂的状态视为他者，作为驱动力的反面。

赖克试图证明，精神分析学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性质，在此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他希望通过社会革命推进性的革命。

赖克还致力于对生命活力的具体源头的追寻，其生命力疗法的目的就是想循序渐进地化解肉体组织的僵硬性，在他看来，人的身体可划分为不同的环节（就想一条蚯蚓一样），他声称自己的任务就是放松每一环节，以恢复生命的活力。

性格舞蹈（Character dance）

术语性格舞蹈，用来描述既非**芭蕾舞**又非交际舞的一切舞

蹈，诸如民间舞、宗教舞、软鞋舞和其他多变性舞、传统舞蹈和喜剧中的古怪舞蹈。在芭蕾舞中，性格舞蹈经常出现于嬉游曲中：对芭蕾舞的主要动作进行各种各样的侧面展示，例如，柴科夫斯基的《胡桃夹子》中的一套民族舞便极为典型。

奇里斯玛/神校的能力（Charisma）

奇里斯玛是一个神学术语（源于希腊语），意为“优雅的天赋”，在宗教的语境中，它指自称禀有特异之力的个人或信徒群体。

在**社会学**中，这个术语指赋予一个人或此人所声称禀有的特殊素质或力量，这种素质或力量使之有能力影响一大批人，成为其追随者。奇里斯玛式的领导人可能是一位宗教领袖或政治导师。

奇里斯玛式权威是韦伯界定的三种合法化**权威**类型中的一种。奇里斯玛指由门徒或追随者由于相信其领袖具有非凡的力量和超凡的天赋而赋予他的权威，这种形式的权威基于对领袖的情感承诺。科里斯玛式领袖的权威可能会压倒一切既有的权威。

参见：教会；权力；宗教；宗派；社会控制；社会运动。

慈爱（Charity）

“慈爱”是詹姆士王对拉丁文圣经中的拉丁词语 caritas 的翻译用语，而 caritas 本身则是古希腊语圣经中的词语 agapé 的审慎的翻译。在拉丁语中，caritas 是几个表示不同种类的“爱”的词语之一，而这几个词之间的区分，曾占据了中世纪基督教学者们的极大的注意力。实质上，caritas 被看作是一种不沾染任何肉体

欲望的爱的方式（其他种类的爱则不然）：它是上帝对人类的爱，并且作为回报，它是人类应当渴望的对上帝及上帝的所有创造物之爱。它不同于对国家的爱、对美德的爱或是爱恋之爱。它是一种非自我的、利他的和神灵启示的爱。在由圣保罗所宣告的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的三大支柱——信、望和“爱”中，用圣保罗的话来说，“爱”是“最大的”。

完成对慈爱的定义后，基督教的注经家们接下来进行的是思考它如何能被显现出来。他们的结论是，人类的慈爱应当以上帝为楷模，他“如此地爱这个世界，以至于他让他惟一的儿子降生于世……”。从爱中产生出的给予，不是慈爱本身，而是慈爱的产物。这个词语意义的这种描述，已成为固定的标准解释，并且在现在依然被普遍地接受。因为我们感受到慈爱，所以我们把它给予那些需要的人。在此意义上，慈爱近似于 zakat，**伊斯兰教**的五大信条中的第三条：施舍（通常涉及到的穆斯林的捐赠，是把年收入的 2.5% 送给穷人）；区别在于 zakat 是一种神圣的义务，而慈爱不是。在**佛教**中，施舍也是很普通的，但是在这里它是用来资助和尚与尼姑的，并且大多数的捐赠者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恩惠而不是义务。

慈爱的世俗形式（在帮助比自己更不幸者的意义上），有时把我们带入动机、良心和罪恶的黑暗领域。仁慈的给予常常是机构化的：我们更喜欢把物品或钱捐给代我们支出的人，而不是直接送到需要者的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慈善机构常常被看作是福利国家的一种补充或代替，所谓的“滴入式”福利，象征一个社会的“自身安逸”。在现今第一和**第三世界**的政治中，“慈爱”常常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概念，被认为含有恩惠和**帝国主义**的暗示，并且是对平等和自然正义的藐视。在所有的此类态度中，我们似乎已从这一词语的原始意义中出走得很远；正如某些社会

人类学家所说的，人们有权利推断："良心"和"利他主义"不是人类的内在品性；因而需要某种**客观相关性**，某种外在必需性，如果它们真正起作用的话。

喧闹的仿小夜曲（Charivari）

喧闹的仿小夜曲（源于法语 charivariser，"嘲弄"）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又被称为 chiassio（"喧嚣"）、katzenmusik（"叫春声"）、"粗砺音乐"和"喧闹的庆祝"。通过用在手边的任何东西如厨房用具、砖块与石头，制造出不和谐的喧嚣声以及大喊大叫和口哨声，构成了这种音乐。它的原始用意，是表明人们对那些可能有恶意的超自然力的藐视，认为它们不值得注意。它是婚礼过程、丰收节日之类活动的流行伴随现象。它也一直是对于社区所不欢迎的人的嘲弄方式。例如，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及肯尼亚的通奸者便被如此对待。

喧闹的仿小夜曲，是酒神节狂欢的伴随现象之一，古希腊的**喜剧**（由此导致所有后来的西方喜剧）便起源于此。在一些远东宗教实践中，诸如中国的春节庆祝活动或印度尼西亚的驱魔活动，它仍然是标准化的范式，并且是伏都教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西方，在常常伴随着一年轻男人的"牡鹿之夜"而发生的猥亵的喧嚣中，还能看到它的残留遗迹。

哈西德派教徒（Chasidim/hasidim）

18 世纪，东欧兴起哈西德派运动，但不要把它同具有相同名字的另一个犹太教派相混淆。后者指马加比暴动期间（公元 2 世纪），要在以色列恢复摩西律法的教派。哈西德派的创立者以

色列·本·以利撒（“美名大师”，1700—1760年），强调真诚的、喜乐的履行超越学问的戒命。学问在当时，通常是宗教名声的来源。由于在遵守仪礼方面的松懈、祷告与研究上的革新和可疑的神秘力量，早期哈西德派教徒受到他们同时代人的批评，但在当今，他们的后继者却以严谨、保守的生活方式著称。哈西德派教徒，使神秘的教义大众化。直到他们出现时，这些教义都一直为一小撮获得真传的人所维护。多夫·波尔拉比，是梅日里奇的“传教人”（1772—1827年），他被规劝加入哈西德派运动，开创了一个漂泊的有魅力的传教人的传统。但这个运动的力量，依然是对saddikim（“被证实者”或“公义者”）、领袖们以及神秘主义者的信仰。领袖们如精神的导师，神秘主义者能指导他们的跟随者，并开发出他们的精神能力。哈西德派教徒，由于过分自信具有在上帝和凡人之间做中间人的能力而受到攻击。随着这个运动的发展，它分化为地方小组，每组一位拉比。教徒尊称拉比为领袖，或许为一位神迹施行者。后者是他们遭到理性主义的批评家较多批评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哈西德派运动，还发展出教师——门徒的拉比世系。今天，最著名的哈西德派世系，是卢巴维奇。这个名字，来源于俄国南部的小乡村。该系的第一个拉比（精神导师）谢尔·扎尔曼（1745—1813年）便来自那里。自1917年以来，他们以纽约为基地，随着许多人把一位具有魅力的、圣人般的领袖当作弥赛亚（救世主），他们积极努力将所有犹太人引入过较严谨的、守戒命的生活，并追求智慧与智性。哈西德派运动，在许许多多的国家都取得了太大的成功，以至于可以将它同各种基督教复兴运动相比。他们总是鼓励返回以色列。

性别歧视主义（Chauvinism），参见：偏见

化合物（Chemical compounds）

化学元素通常很难以纯净的状态存在，而一般是与其他元素相结合以混杂的形式存在。各种元素是通过化学键而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是偶然的，但却与元素的原子结构相对应。

原子的结合能力取决于其外层电子的数目，如果外层没有饱和，原子就会与其他原子结合以达到稳定状态，像氖、氩这样的惰性气体，其原子的外层有 8 个电子，是饱和的，因此达到了稳定，不会与其他元素起反应。

既然 8 个电子就使原子达到稳定，而欠缺的原子结构会导致结合，因此，一种电子数为 7 个的原子会向另外一种电子不满 8 个的原子“借取”1 个电子。当两个原子中的一个向另外一个借取 1 个电子而使两个原子的外层轨道都有 8 个电子时，两个原子都会达到稳定状态，钠和氟原子就是两种这样的原子，其中，钠的外层只有 1 个电子，而氟的外层则有 7 个电子，这样的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化合物，即氟化钠，两种元素的外层电子通过借出和借入达到饱和。

氢原子有 1 个电子围绕其原子核旋转，一般不会单独存在（除非在化学反应的短暂的间歇或高温条件下），而是以各自都含有两个相互结合的氢原子的分子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这种分子的外层有 2 个电子。

因为电子带有负电荷，具有较多电子的原子就会变成负离子，而具有较少电子的原子就会变成正离子，正、负电子通过化

合相互结合就使电荷相互抵消，总体上就呈现出中性。并非所有的原子都通过电离进行化合，有些化合物，尤其是有机化合物，通过共价的电子相互结合，也呈现为中性的。

参见：化学。

化学（Chemistry）

现代化学源于**炼丹术**，后者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炼丹术最早发生于尼罗河三角洲，那里的人们发现通过加热矿石可以使其中的金属与矿石分离，后来，炼丹术传播到中东和亚洲。炼丹术的目的之一是发现哲人石，以将低级的金属转变为“高贵的金属”，即金子。哲人石虽然渺茫难求，但在寻求哲人石的过程中进行的实验却为现代化学铺平了道路，到12世纪时，阿拉伯人关于炼丹术的著作逐渐启发了关于化学过程和化学反应的科学探讨，波意耳（1627—1691年）《怀疑论化学家》（sceptical chemist）一书的出版，以及他关于物质都是由简单的要素组成的假设，标志着化学科学的最终建立。

18世纪时，各路化学家，包括布莱克和卡文迪什，都着手对各种元素及其化合物进行研究，被誉为现代化学之父的拉瓦锡证明任何物质的燃烧都是与氧的化合，正是由于他的一系列广泛的实验，化学最终与炼丹术分道扬镳，称之为化学之父可谓当之无愧。

拉瓦锡的新体系是建立于化学元素的概念之上的，由此出发，他建立了一套新的术语，被科学家们沿用至今，他的理论一旦被认可，就为化学家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18世纪后期，道尔顿的原子理论被引进化学，使拉瓦锡的理论变得更为准确，化学从此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

当今的化学可以被分为三个主要分支：有机化学（研究碳化合物），基于有生命有机体如细菌、植物和动物产生的物质；无机化学（研究矿物质）；物理化学。

由于植物资源稀少及其性质的不稳定，化学被用来人工合成某些分子结构复杂的药物，最初，“人工合成”一词指拙劣的替代品，现在它指的是高纯度的药物，“人工合成”一词的贬损性含义源于从石油残渣中提炼纤维的化纤工业，尼龙是一种吸水性很差的简单纤维，无法产生棉、毛的质感，但是，由于新型纤维的出现，以及纤维制造工艺和纺织工艺的改进，现在已能够生产出质感宜人的“人工合成”纤维，以至于有时“人工合成”意味着优于“天然”。

在人类文明早期，人们主要利用植物染料给织物着色，而现在鲜艳多彩的染色则主要是由化学原料合成。

参见：**催化剂**；**化合物**；**金属和合金**；**周期表**；**科学**；**科学方法**。

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学派一般是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首先发展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政治思想，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还有少量的**政治学**领域的思想。

在经济学上，现在等同于G·贝克尔、M·弗雷德曼、G·斯蒂格勒等作家的名字，芝加哥学派以敌对于**凯因斯主义**经济政策、热烈支持货币主义和全面肯定自由放任经济学而为人共知。芝加哥学派成员相信，经济学家应该以下列假设为工作前提：合理决策统治个体行为（参见“民主”）；以这一假设为基础做出推论；以这一假设为基础检验预见的优势。是预见，而不是假设要接受

检验。这一学派的支持者运用这种方法去研究从前被认为是处在经济学中心领域外围的主题：如婚姻之供求关系，犯罪与种族主义。芝加哥学派对公共决策产生了间歇性的冲击，为新右派对行政选择的抨击和主张以货币政策作为控制通胀之单一手段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现在，美国和英国都对这一学派的原理投注了更多怀疑的眼光。

社会学上的芝加哥学派，主要受到了R·帕克，E·博尔吉斯及其同仁的影响，他们指导大批大学生研究芝加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以运用社会过程行为分析和象征互动理论为基础，开创了对城市生态学现象的研究。

政治学芝加哥学派基本上与C·麦里阿姆和H·高斯纳尔关于政治权力和投票行为的著作相联系。他们大大地信赖于H·拉斯韦尔的社会心理学方法。严格适应政治意图测验和立场调查就是芝加哥学派创始的，这代表了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研究的成功结合。

参见：“行为科学主义”。

虐待儿童（Child abuse）

虐待（源于拉丁文，意为“反作用”）指错误地对待他人，包括斥责、施虐和施暴，它指在人际关系中滥用权力，并主要指对儿童的虐待。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和70年代的妇女运动中，虐待儿童的现象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对**心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弗洛伊德在其学术生涯中很早就意识到了儿童性虐待现象的存在，通过分析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病人的精神分析，他提出了其诱引理论。他认为这种病症是由于这些妇女在小时候曾

被诱唆和骚扰，主要祸首是她们的父亲或家庭的亲友，通过压抑和替代，可以回避这种痛苦的记忆，但病症却并未因此得以缓解。

后来，弗洛伊德抛弃了这一理论，主要出于三个理由：第一，通过回忆性虐待的遭遇并未能缓解病症；第二，他认为童年的记忆是靠不住的；第三，他认为在生活中虐待经常发生以至于似乎都具有了合理性。他用关于儿童在俄狄甫斯阶段有强奸幻想的观念代替了诱引理论。费伦茨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记中就认为现实中可能确存在有儿童虐待现象，但是，只是到了60年代，临床医生们才开始将童年时有过被强奸和虐待遭遇的病人的自述作为真实事件的叙述。童年遭受性虐待的后果会影响一生，它可能会导致郁郁寡欢、暴躁易怒、自暴自弃（如酗酒、吸毒等），并会终生被犯罪感和耻辱感所困扰。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被虐待过，他长大后可能依然会对虐待逆来顺受，或者自己成为施虐者，从而成为双重人格的典型，自身既是受苦的孩子，又是暴虐的父母。

儿童精神分析（Child analysis）

弗洛伊德本人没有进行过儿童精神分析，尽管他对童年经验非常关注，他惟一一个小病人是“小汉斯”，他是借助其父亲的叙述对孩子进行分析的。第一位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的是克莱因，后来，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孩子的分析技术。

儿童精神分析的主要特点在于，在儿童的生活中，父母和父母的形象在儿童的生活中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外在形象，还没有转变为内在的父母形象，儿童仍依赖于父母，因此这种依赖性对儿童来说就不是中性的症状，此外，还涉及到一个道德问题，因

为这种分析并未获得儿童的许可。

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游戏和玩具代替了**自由联想**。对克莱因而言，这是儿童和成人精神分析手法的惟一不同之处。她相信，甚至一个仅有三岁的孩子，也像成人一样，有他的往事，并在当下经历着这些往事。克莱因、温尼科特和伊萨科斯于20世纪50年代于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工作期间，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婴儿与其母亲的对象关系至关重要，她们尤其关注从母子关系出发对**精神病**进行研究。

安娜·弗洛伊德在与柏林顿共同工作期间，对儿童精神分析的技术进行了改造，她关心的不再是通过分析神经症来探讨精神的结构，而是对正常的和反常的个性结构的理论研究。

中国剩余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正如定理名称所示，中国剩余定理由中国人发现。远在西方人之前很久，中国数学家就发现了该定理。它与欧几里德（约前295年）关于数论的成果密切相关，其证明通常运用欧几里德**算法**来完成，虽然欧几里德本人并不知道中国剩余定理。中国剩余定理看起来违背直觉，好像不可能。它阐明：任何给定的由没有公因数的数组成的有限集（例如3、5、17）和另一余数集（例如2、4、3），找到一个数，当被第一个数除时剩下第一个余数（在上例中，当被3除时余数为2），当被第二个数除时剩下第二个余数，等等，是可能的（在上例中，一个这样的数为224）。事实上，这样的数有无穷多个，因为，加上最初数集的积（$3\times5\times17=255$）的任何倍数，将给出另一个有效的数。

中国式装饰风格（Chinoiserie）

中国式装饰风格（法语“中国式的”）标示着中国瓷器和应用艺术对欧洲人的趣味的影响，尤其是在18世纪时期。随着帝国列强如大英帝国和荷兰等对贸易路线的开辟，中国物品首次大批量地流入西方。中国设计风格的时尚风行，对室内装饰、陶器、建筑和风景园艺的影响尤其重大。中国式装饰风格所真正指涉的，不是中国的工艺制品，而是欧洲制造商制作的旨在与中国风格相竞争的那些产品，或是远东的工厂对这些欧洲模仿品的复制产品。

骑士精神（Chivalry）

骑士精神（源于法语chevalier，“骑马的人”）是中世纪的欧洲艺术中，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贵族生活中的一套极为重要的价值系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8世纪。当骑士们为查理曼的皇家圈子所接纳时，他们宣誓：支持基督教教会和教皇的名称，保护弱者并挑战强者，避免**七大死罪**并实践**七德**。在中世纪的文学和艺术中，骑士和圣徒之间的区分常常很模糊：例如，圣乔治被描写为一个征服巨龙并拯救少女的骑士，而加拉哈德，则被描写为一个具有超自然力的纯洁的圣徒甚至是基督的形象。确切地说，在十字军的时代，这种模糊特别重要。它进一步促进了一种误导的十字军的浪漫形象；而从整体来看，十字军不过是暴力冒险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范例。

骑士观念激发了像圣杯和亚瑟的全套传奇故事和罗兰史诗这样的杰作。它渗入现实生活，并明显地表现于欧洲封建社会的整

个结构，表现于后来许多欧洲法庭和贵族秩序的建构。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以及他所有的英国历史剧作显示，甚至在**文艺复兴**的高峰时期，骑士观念是如何地盛行。在 19 世纪的欧洲，骑士观念经历了一次有点苍白的复活，这与司各特和**拉斐尔前派**之类的人们对中世纪信仰的嘲弄有关。今天，在欧洲自身以及曾是欧洲殖民地或附属地的国家中，刚刚开始的中世纪观念和行为的记忆，出没入贵族和政府机构圈子里的某些仪式和实践中。

价值系统极少是由知识分子几乎完整地发明，并随后被现实的人们采纳作为现实行为和社会文化的基础。骑士精神的最相近的类似物，或许是日本武士的武士道信条，尽管缺乏宗教的回响，它曾发挥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在发挥骑士观念这样的效力。

合唱队（歌舞班，Chorus）

在古希腊**戏剧**中，合唱队大约由 15 或 25 人组成，是表演者中最重要的团体，原本是主要参加者，他们唱歌和跳舞，在创作中起着重要作用，既解说又发展主要人物的行动。在全剧的 1/3 和 1/2 之间上场表演，大大地有助于作为整体的表演情态与场景。在后代西方戏剧中，“合唱队”一词用来描述那个直接对观众说话的个人，常常作为一个序曲、场记，或者对剧情的评价者。“合唱队”最通行的当代用法是描述在**音乐剧**中集体表演的歌唱演员或舞蹈演员团体。

基督教艺术（Christian art）

像所有的**宗教艺术**一样，基督教艺术提出了目的问题。其原

始的和首要的功能，是激发对上帝的挚爱，并把一个赞助人所能委托的或一个艺人所能创造的最精美的作品奉献给上帝。审美价值虽然受到关注，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普通的木制耶稣受难像，或是墙上的一个涂鸦轮廓像，与出自最优秀的艺术家之手和心的最精雕细琢的作品，具有一样的效果。肖像学的价值比完美更为重要：包含于作品中的象征是最为重要的，祈祷目的轻视任何我们今天可能认为是艺术灵感的东西。

在大多数宗教中，艺术是一种静止的现象。它的风格和技巧，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便形成的，并且从那时起便少有变化、艺术，像包含于其中的象征一样，是指涉性的和永恒的。然而，基督教艺术则不同。从其一开始，它便是对创造它的社会的反映，尽管它的象征意义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致，但是它的外观、风格和技巧，则是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世纪、一个国家到另一国家、几乎是从一个艺术家到另一个艺术家，一直发生着激剧的变化。这使它具有区别于其他宗教艺术的丰富性，并使它总是特别地贴近于世俗的鉴赏家和商业——或者，依据你们的观点来说，一直是后者的猎物。从基督纪元开始以来，在西方和正统教的东方，艺术和建筑的资助、生产和发展，一直是一个主要焦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这时富于侵略性的世俗主义和消费主义（产生于工业革命）开始降低它的影响。（即使如此，基督教的肖像学曾持续地并在现在仍继续在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常常以惊人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20 世纪中期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或 1970 年代的“**废物艺术**”流派的艺术家，对基督教象征意象的使用，以及对早期基督教艺术家的观念的戏仿。）因此，如果完全不具备一些圣经的知识，以及涉及到表现圣经故事和建造并布置上帝之屋的教堂观念的肖像学传统及其各种变形的知识，则没有人会对西方艺术感兴趣。

从古希腊和罗马到基督教，肖像示意法和形式的转变，表现出惊人的顺利，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古希腊罗马艺术是基督教徒（他们自己也是同一传统的一部分）采纳的自然范式。因为古罗马异教徒的艺术和建筑的方法论，被基督教徒所采用（例如，皇帝的胜利变成基督的胜利；用作审判和集会的长方形廊形大厅变成教会的场所），在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连续性，是一种长期活跃的力量，为艺术家们继续描画提供了有所依据的全套资料。

我们可以沿着从罗马帝国到罗马教庭的权力转换的路径，来欢察基督教艺术对异教徒形式的采纳，而后者在许多方面同时是前者的世俗的和精神的继承者。这对朝向连续性的偏爱，提供了一种解释。因此，在基督教艺术扩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会本身和修道院的世俗权力的持续增长，在中世纪时期，它们在财富和声誉两方面都在增长。虔诚（确保个人不道德的灵魂获得拯救所需的态度和行为）是至高无上的：建筑物所反映的，不仅只是胜过邻居的愿望，而且为信仰本身提供了纪念碑，由此产生了“大教堂的时代”。巨大的建筑物（常常是与当地人口相当不成比例的巨大）经常要花费几代人的努力才被建成。朝圣是一种重要的中世纪制度，而通向重要朝拜地点（如罗马和圣地亚哥）的沿途，仍在炫耀它们华丽的殿堂。

教会、修道院以及虔敬的俗人在艺术资助的供应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的资助包括一切对象：从建筑、壁画颜料和纪念碑雕塑到祈祷书、圣物盒及朝圣纪念品。对此，某些在中世纪之后仍长期存在着的建筑物，如佛罗伦萨、塞纳或巴伐利亚的教堂中的小礼拜堂，是很好的证明。

新教改革对于基督教艺术和建筑既是一种危机也是一种鞭策。罗马教会因试图（反对宗教改革）以扭转新教倡导的潮流，而向艺术家委托建筑物和装饰工程。改革者们蔑视“天主教的”

肖像学和权力机构（宗教战争或英伦三岛共和国便是明证，二者都伴随着对许多“偶像崇拜的”艺术的破坏）。结果，完全不同风格的新教的肖像示意法被创造出来（例如伦勃朗），它更强调的是对圣经的个人理解而不是信仰的公共证明。

启蒙运动，至少在新教徒手中，提供了对基督教艺术的理性挑战，并降低了后者明显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情况可能并没有导致基督教艺术在数量上的衰减（就像在**哥特式复兴**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在19世纪的法国，生产出巨额的灵修图画和印刷品），但是就我们的认识而言，在启蒙运动所催生的19世纪实证主义向其猛烈进攻之前，其相对的重要性便已衰落了。例如，库尔贝拒绝画他没看过的东西，因此从来不画天使。

现在，尽管基督教艺术一直有一些重要的复兴和委托作品（大部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毁坏导致的结果），但毫无疑问，它已失去了在**绘画类别等级体系**中曾有的中心地位。

基督教民主（Christian democracy）

起源于欧洲、拉美19世纪以来对教会与国家分裂的反抗行动，只是在二战以后基督教民主才变成欧洲的重大政治使命。顾名思义，它力求协调基督教价值与自由民主，尤其不独尊天主教价值。在实践中，基督教民主是一种本质上具有中心主义的政治运动，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自由个人主义这孪生的“恶魔”之间的差别更加巨大。**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过度发展，君主立宪保守主义的过时性质，造成了西欧政治学的真空，基督教民主党能够填上这一真空。他们把建立在性别、教育与文化的基督教家庭价值之上的保守社会福利政策，同国家在医疗、房产与工业政策各方面日益进步的社会福利作用结合起来。不像经济自由主

义者，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乐意在联合政体论的政策制订中与商业联盟携手合作。基督教民主党在历史上也坚定支持欧洲的统一。

自二战以来，基督教民主党的命运沿着一种循环模式运转，广泛地相关于阶级政治学摆动。在紧接着战后的几年，基督教民主党在意大利、西德、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和法国占统治地位。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中期，现代化的有节制而温和的社会主义党派在西欧东山再起，又挑战了基督教民主党的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洲政党转向右翼，上述趋势才有所扭转。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基督教民主党一直是意大利、比利时、德国、卢森堡以及（短期）爱尔兰的执政党。但是，作为欧洲议会内的障碍，基督教民主党人（由欧洲人民党代表）在1984年和1989年欧洲大选中落于社会主义之后。在德国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传统统治力量证明，它在边缘上衰落，它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威胁和腐败的威胁，受到长期霸权的刺激，也受到共产主义坍塌的激励。因而，基督教民主党还可能保持它在欧洲政治生活里的中心地位。

参见：“保守主义”。

基督教人文主义（Christian humanism）参见人文主义

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

基督教社会主义，描述的是基督教（特别是新教）的和平、兄弟情谊和非等级的权力结构诸原则，与平等、公有和非竞争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结合。受卡莱尔（1795—1881年）著作的启发，英国**圣公会**成员最早使用这个术语以支持19世纪30年代晚期宪

章运动的内容。虽然它主要是激进的**新教**的产物，但法国、荷兰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会极端的教牧人员曾发起过类似的运动。

基督教（Christianity）

拿撒勒人耶稣死后（约公元29年），他的跟随者发起了一场运动，人们称之为基督教。这场运动，迅速发展为一个**世界宗教**。随着7世纪**伊斯兰**的袭击和10世纪在中国的受挫，基督教在中世纪早期，因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皈信而向北传播，并成为在欧洲人中占支配性地位的信仰。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宗教的不宽容和迫害致使所有教派团体都迁往美洲，同时南半球的广阔地域在名义上成为属于Patroado体系下的天主教的（借此，教皇在1378年把世界分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影响的球体”）。

有时，基督教的传教士跟在殖民军队后，有时（像14、15世纪流浪的圣方济各会修士或19世纪的大卫·利文斯通）他们又先于殖民的军队到达某地；但一般而言，人们感到虽然殖民地的开拓在为传教士提供交通便利和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的传教是一种帮助，不过，一些殖民者、贸易通商者的文化**帝国主义**态度及非道德的生活对福音在非西方文化中的植入，证明是一个主要的障碍。虽然现有的统计资料极不可靠，可现在的大多数基督徒，仍然是来自非洲的加勒比海人或非西方人；英国和印度的基督徒人口比例，实际上是相同的（占人口的百分之2～3%），尽管前者代表多数人的宗教，后者为小部分少数人的宗教。两种情况下，从所有关系到他们的人数、财富、地位来看，虔诚的基督徒都有全国性的影响。不过，人口学的变动，其发生的原因部分是

因为基督教在西方的衰落以及战后的道德腐化与世俗化，它将为神学、灵性、普世运动带来深远的后果。

最初，耶稣的跟随者和公元1、2世纪其他伟大的拉比（老师）很少有差别。他们自称为“道的跟随者”，换言之，他们是在一个新的共同体中，奉行耶稣教导他们的生活之道，他们宣告先知以西结与耶利米应许的新约已经实现了。他们把耶稣的复活理解为罪、死亡被战胜了；在经历五旬节那天的神秘体验后，他们感受到的随之而来的经历，催逼他们去传讲耶稣悔改的福音，作为对上帝之国来临的一种回应。他们像耶稣显示给他们看的那样，用爱宴庆祝复活，使洗礼成为进入教会共同体的手段。

当这个运动推进到说希腊语的城市安提阿时，那里的人戏称他们为“基督徒”（基督的跟随者）。基督徒带贬义。虽然这个词在塔西佗关于尼禄的大迫害的记载中、普林尼（描述了图拉真统治时期他审问基督徒的情景）的文字中能看到，但直到3世纪，基督教作家，都避免像异教徒和政治家那样使用这个术语。

基督徒相信：正是上帝对全人类的爱，催逼他们离开犹太教的发源地，在彼得和保罗倡导下进入希腊世界，然后深入罗马的行政机关，在西方的拉丁城市和北非建立教会，并在不断追寻真理中把希伯来经典、古希腊哲学、拉丁民族的组织融会在一起。

参见：英国国教；赎罪；天主教；基督教艺术；约；教会学；普世教会运动；福音派教义；女权神学；诺斯替教；上帝之国；解放神学；一神教；自然神学；东正教；圣灵降临说；新教；圣餐；宗派/宗派主义；混合派教义；双重国度教义。

变音体系（Chromaticism）

在西方音乐中，变音体系（源于古希腊语 chroma，“色彩”）

与**调性**相关联。在任一给定的音与八度音程中更低或更高的同一音之间的音程，传统上分为12个相等的半音程。这些半音程，依次组合起来形成音阶。“大”音阶的鸣响，由全音、全音、半音、全音、全音、全音、半音所构成。“小”音阶的鸣响由全音、半音、全音、全音、半音、小三度音构成。（1全音=2半音；1小三度音=3半音。）同一个八度音程如果划分成规则的半音，将包含12个半音程——并且，这些半音程出现12次，但不是在音阶中，而是使音阶“色彩化”的变化音调。

探索变化音调能有多少用途，即有多少半音音阶能被使用，一直是作曲家们的游戏。直到中世纪的晚期，变化音调还几乎是完全被禁止的：一旦你的基本音阶确定下来，则在音乐的自始至终你都不能偏离开来。然而，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们开始用“变调”作实验（使用半音音调使音乐从一种基础音阶转换到另一种，“变化音调”）。起初，这只是小规模地主要用于润色文本的意义（以词语为例，弥撒信经乐中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取得极为显著的效果。盖萨瓦多的牧歌（16世纪后期）是这种风格的最一贯的“实验”曲子。同时代的其他作曲家，写出了作为一种创新事物的器乐“变化幻想曲”。

17世纪晚期，一种“平均律”转换法被发明出来，使12个半音全都具有相等的价值。因此，这意味着音乐完全可以用任何音调写出（理论上讲，也能演奏）——一个当时因巴赫而受到称颂的事实，他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由48个序曲和遁走曲组成，其中大音调和小音调两两相对。

从这一起点开始，越来越多的变音体系组合被使用。虽然它仍然保留着占主导地位的润色的角色，但变调已成为出入“遥远的”音调（即远离“本”音调的音调）间的流行手段。在19世纪，由于乐器制造方面的进步，使得即使是充满尖锐和平缓之间

音调变换的最复杂的乐曲，管弦乐队也能演奏。并且代替从一种音调到另一种的实际地变调，作曲家们开始使用变音音调作为过渡，使旋律与和弦增加了新的色彩和表现力。到了20世纪，这一进程已达到这种地步，几乎任何音或音的组合都是“被许可的”，只要它在语境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完全变音体系（在其中音乐是“在”一本原音调中，但能运动到作曲家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变音区域）导致了**无调性音乐**并最终导致了12**音阶音乐**的产生。

参见：音调、调弦和调律。

生物钟学 (Chronobiology)

生命科学中，生物钟学（源自于希腊文chronos，意思为“时间”＋生物学）是指研究时间因素对生命系统进行控制的科学。所有生物事件的发生都有一个时间过程，但许多生物事件的出现有周期性，其周期可以微秒计（如翅膀扑扇），也可以年计（如交配期）。生物的周期性变化分为两类：一类与环境的周期性变化有关（参阅**生物节律**），另一类似乎与环境因素无关。与环境的周期性相关的节律现象其特征是：节律现象不会因药物的影响或环境因素的消失而改变，它们会自发产生（如实验室里的产卵过程），且不受温度条件的明显影响。有证据表明，所有动植物体内都存在生物钟，假如生物钟与外界环境变化同步的话，节律现象会受到环境变化的精确控制。对生物钟机理的研究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因为要区分生物钟的组成和它的调控功能是一项困难的工作。

参见：物候学。

教会（Church）

教会（源于希腊语 kuriakon〔doma〕，意为“主人的居所”）指群众集会、社会机构以及那些使之结合为一个独特的宗教群体的共同信仰和实践。教会和宗派不同（参见**宗派/宗派主义**），主张人人生来皆有资格参加教会，承认国家以及其他世俗制度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

参见：文化；新教伦理；宗教；世俗化。

丘奇论题（Church's thesis），参见“可计算性”

电路理论（Circuit theory）

顾名思义，电路理论是对任何实际电路进行详细的定量化研究，这一理论是电学研究的支柱，自从它在 18 世纪初被提出来，工程师们才有可能设计越来越复杂的电器。

1820 年，来自哥本哈根的奥斯特发现，当电流通过导体时，会产生一个磁场，使磁针发生偏斜，这一发现引起对**电磁学**的研究，即对**电**与**磁力**相互作用的研究，这一领域的先驱之一是法国人安培，安培对电流（即流过导体的电荷）和电压（使电流流过闭和的电路所需要的电的“压力”）做出了明确的定义。

然而，安培并未发现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直到 1827 年，欧姆才发现电压与电流之间的比例是一个常数，这个常数即导体的电阻。这一关系可以用管子中的水流类比，为了克服水管的阻力，水流速度越快，需要的水压越大，同样，为了克服导体的电

阻，电流越大，需要的电压就越大。

正由于欧姆定律的深远影响，为了纪念这些科学的先驱，他们的名字被用作电学单位的名称，电流（I）的单位是安培，电阻（R）的单位是欧姆，电压（V）的单位是伏特，欧姆定律就表示为 $I=V/R$。

在欧姆定律和电阻的作用被发现之后，其他的电学定律也被接连发现，1841 年，焦耳发现电流通过导体所产生的热量（P）(单位是瓦特）是电流（I）的平方乘上电阻（R）：$P=I^2R$。

利用电路理论设计电动机和电路可追溯到 1848 年，当时基尔霍夫发现了电流和电压定律，这些定律后来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他将欧姆定律应用于含有多个支路的电路，发现通过节点的电流为零，一个封闭的电路回路上的电压总和也为零。

随着另外两个电学概念即电容和电感及其对电路活动之影响的发现，包括基尔霍夫定律在内的电路基本理论基本完备。电容指电容器储存电能的能力，而电感则指线圈抵抗交流电的能力。分析交流线路时需要这些概念，所谓交流电，是指以恒定的频率在正电和负电之间变化的电流（即每一周期内电流的方向都发生反转)。汤姆逊，在改善海底电缆性能时认识到了电容的重要性，亥维赛由于参与早期电报机的工作发现了电感。

现在，电路理论已较最初大大拓展了，其研究范围包括从**网络理论**的应用到更为复杂的电路如**计算机**中硅芯片的分析和设计。

市民文化（Civic culture）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60 年代早期，在**功能主义**传统中工作的政治学家提出了一种市民文化的观念。他们追求解释政治文化

的发展是如何影响了国家与政体的延续与合法性。市民文化观念的支持者阿尔蒙德与维尔巴认为自由民主与“市民政治文化”具有“亲近性”：在这种文化中，市民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市民的市民义务和政府的履行，社会共识与判然有别的分裂都在一种合适的混合中联系起来。这种论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行为科学主义**（它集中于对待政治意识与积极主义持个体心理学立场的决定因素）；二是对战争期间欧洲民主的理智反思。

对这种以市民文化方法解释民主稳定性的学说持异议的批评家认为：(1) 它对于因果关系的思考是错误的（是制度创造了文化而不是反过来）；(2) 它对精英主义的民主构想持有偏见（假设女性和次要社会阶层的被动性）；(3) 尽管没有断然两分的分裂（Crossiy－cutting cleavages）的分工社会，也存在产生自由民主制的情形（参见**联合主义**）。还有人谴责市民文化研究方法是**种族中心论**的，是以英美标准的自由民主制作为它内隐的基本标准。但是，作为一种开拓性的努力，在描绘政治文化的经验研究方面，这种方法仍然有其辩护者。

文明的抵抗（Civil disobedience）

一般的用法中，文明的抵抗包括那些反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政治抵抗形式，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在某些地方已落入自然力量与制度对立之间。第一次清楚地表述这个概念的是梭罗的著名论文“论文明抵抗的义务”（1849年）。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肯定人们有权拒绝向蓄奴制政府纳税，并且宣称“我们有权承担的惟一义务是在任何时候都做我们认为正义的事”。但是，与文明抵抗相联系的行动方式早在梭罗之前就有较长的历史。文明的抵抗在最严格意义上是指不同政见者违背法律（去反对非正义或反对荒谬

的思想)，但对当局的追捕既不躲避也不抗拒。文明抵抗有时可能就是反国家的革命斗争的序幕；有时在组织上可能既采用秘密行动，又采用文明抵抗行动。当然，文明抵抗在反对既定权威和帝国政体的斗争中极少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在民主环境中它却可能转变公众意见。20 世纪，南非和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非暴力大众动员是成功地运用文明抵抗的典范。文明抵抗也用来协助如下一种或多种目标：(1) 公开运动的原因；(2) 强调法律的不合法性以及产生这种法律的体制的不合法性；(3) 煽动反叛行动，瓦解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以及相对地以更加偏爱的语气描述激进行动主义。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和北爱尔兰人权运动的示威者的早期活动，证实了它的基本功能。在奥克拉荷玛和北卡罗利亚，黑人占用“白人专用”的午餐柜台，这就激起了广泛的轰动一时的新闻媒介报道，强调种族主义分裂公众享乐的法律的荒唐性，揭露地方白人警察的压迫本质。

政治哲学家常常在他们讨论政治义务的时候对文明抵抗的道德性还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文明抵抗只有在不公正的国家才是合适的，因为在那里已用尽了其余改良方法；另外一些人坚持认为，使用文明抵抗是个策略而非基础问题；但是，保守主义者信任“现实权力”的权威，力求保存这种权威，因而他们全盘否定文明抵抗。

土木工程（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是指公共工程的设计和建造。调动大量持久的人力、大规模工程的建造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已经开始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约五、六千年之前尼罗河河谷、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河谷等地的工程。“土木工程”的发展只有在定居的和有组织

的社会才有可能。

美索不达米亚的道路已经四通八达，但是，直到罗马帝国时代，土木工程和道路建设才成为一门特殊的艺术和科学，罗马人建造了许多桥梁和高架桥，用拱型结构作为支撑。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欧洲的土木工程也陷入突然的停顿中。

工业革命为欧洲的土木工程提供了又一次推动力。为了给新兴的工业中心供应廉价的原材料，并为制成品开辟市场，需要良好的运输体系，为此，一大批规模空前的新道路、运河、桥梁和隧道被建立了起来。

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土木工程也越来越重要——需要修造更为通畅的道路，修造水库蓄水，修造下水道排污，土木工程对整个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19 世纪人类寿命期望值的提高，并非由于制药业的进步，而是由于自来水工程和排污工程的发展，这一点已得到公认。

公民人身自由（Civil liberties）

公民人身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一般认为是自由民主政府的本质要素。最重要的公民人身自由禁止政府或国家官员无限度地干涉公民个人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活动（参见**自由主义**）。公民人身自由的基本内容包括：个人自由，隐私自由，运动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它们都被认为是自由文明社会的本质要素。

“公民人身自由论者”抵制国家对个人的过分干涉，这种干涉会导致**集权主义**政府。但对于何种自由更为根本，他们又没有一致的看法：左翼人士坚持占有和处置财产的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左翼人士认为，与民主组织结构相联系的自由（如言论和结

社自由）是最需要保护的。

参见："公民权"，"民主"。

公民权（Civil rights）

公民权一语在不同环境和不同国家中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在民主的欧洲，公民权出现于18世纪，与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个人权利紧密相关。这些权利包括：公正审判，免于酷刑，在法律面前平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与信仰自由等等。上述诸项，大多都被认为是**人权**，即一切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公民权有时又不同于19世纪欧美所争取的政治权利，虽然实际上公民权与政治权利大大地叠合。政治权利是保障公民运用自由结社、自由组织和投票的权力参与政府权力的构成与运作。公民权与政治权，常常都写进了大多数自由民主宪法（英国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外）的权力法案之中而得以确保 公民权与政治权也完全不同于社会经济权利。有些政治思想家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们认为，实质的社会权利必须融入法律：像最低限度的营养权，有酬劳动，若干年公众教育和享受健康劳保。他们坚持认为，许多公民权乃是局限于对待个人的程式上的平等，而不是使用权利为公民确立社会标准。公民权可以用**公民人身自由**区分开来，尽管这种区分尚存争议。公民权并不像公民人身自由那样可以自由选择的，即不是广泛允许的。公民人身自由无须允许即可以让人去做某些事，可是公民权却规定了标准。在美国有关公民权的话语尽管与欧洲人的有关公民权话语具有相同的内涵，但在美国却是与法定权利相联系，保护被虐待的种族与民族的少数；认识到公民权立法化实际上并未停止隔离与歧视，这导致了**赞助性行动**的发展。

参见："民主"，"自由主义"。

文明（Civilization）

文明（源于拉丁文 civilis，意为“归属一个社会”）是一个含混的字眼，在当代，这个词被用来指一个统一的社会体系，并被赋予了技术水平以及以社会分层为特征的文化复杂性等内涵。因此，文明的概念既被用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程度，又被用来作为敲打那些缺少文明者的棍子。

在 18、19 世纪的进化论者看来，文明是人类成就的高峰，是西方**文化**的特权。尽管人们对墨西哥、中国、埃及和印度的古老文明早有所知，但当这个词被进化论者用来谈论西方文明时，就染上了一层暧昧的色彩。然而，正如圣雄甘地挖苦的那样，一个文明的西方，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但迄今为止，这一点还远远没有实现。

进化论将文明视为开始于所谓蒙昧状态的人类发展历程的终极目标，这一观点在摩尔根的《原始社会》（1877 年）一书中得以系统勾勒，它将文明进化的等级划分为“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正是文明与所谓“原始”的对立，使诸如“蒙昧”和“野蛮”等概念具有了贬损的意味。西方文明能够将野蛮人文明化，这一点使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文化和政治统治变的合法化了，就像借口殖民是为了殖民地人民的福利从而为殖民主义辩护一样。当代**人类学**拒斥这种充满偏见的社会比较研究方法，对“文明”一词的用法始终保持警觉。

参见：殖民主义；种族中心主义；进化论，书面性/口头性；原始主义。

阶级（Class）

阶级（源于拉丁文，本意为“集合”）指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分化，这种分化导致财富、名望、权力等的差别。这是一个常用词，但对于其准确含义却一直众说纷纭。

马克思用阶级指一个人与其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他认为存在两个阶级，即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他们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占人数大多数的阶级共处于相同的境遇中，受到生产体系的剥削，尽管并非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马克思称这种无知状态为“虚假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不同阶级之间的这种冲突或曰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由于遭受**资产阶级**长期的剥削，工人阶级共同的阶级立场终会觉醒。工人们一旦获得阶级意识，他们就会起来斗争，推翻统治的资产阶级，用一个平等的社会代替剥削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一种更复杂的阶级模式。他认为阶级反映了“市场能力”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生活机会”的差异。在韦伯看来，**资本**只是诸多市场能力资源中的一种，其他还有技艺和教育水平等。他指出了四个主要的阶级：财产阶级、管理和经理阶级、小商人、劳动阶级。韦伯认为冲突会在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之间发生，如在财产阶级和经理阶级之间发生。韦伯还指出社会也可能因为**地位**和荣誉的不同而分化。

在实际研究中，社会研究者使用了多种社会阶级的指标，收入和职业被作为较粗糙的衡量阶级地位的指标，尽管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完备。批评者指出，其他方面的社会分化对于生活机会也有重要的影响，但却无法被上述指标涵盖，如**性别**和**种族**。此

外，社会习俗、口音和价值观的差异也形成不同阶级的特征。阶级意识指人们思考阶级和阶级分化的方式，许多人认为在西方阶级意识比较强烈——西方的主要群体可划分为上流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人对于阶级体系、他在其中的地位和不同阶级的特定立场有清醒的认识。

研究表明，一个人所属阶级对其生活机会有根本性的影响。

参见：冲突理论；文化；劳动分工；资产阶级化问题；种族特性；女性主义；劳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职业；权力；专门职业；新教伦理；社会闭锁；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社会；社会语言学；结构；价值；工作。

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参见“阶级”

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参见“阶级”

古典设计（Classic design）

古典设计是一个 20 世纪的术语，用来标示那些既经受住了时间检验又得到批评赞赏的客体。尽管这一短语没被用于 19 世纪，其意义依然得到暗示——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以最适宜者的长久生存为原则的设计观点。作为一种设计理论，它是由那些**现代主义**的赞同者们所探索的，他们授予工业生产的重要样品以“古典的”品质。要想获得成为古典的资格，一个客体必须以某种方式触及**趣味**和**风格**的外观结果，并保留自己的价值和完整。例如，科比西埃选出的陶奈特弯木摇椅：它的设计，他说，具有

"相对性和永久性"的"品质"。

最近，古典设计的观念，已逐渐走向更多地反映市场和时尚的内容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家具公司利用古典的概念开发出一个复制品市场，对包括瑞特威德和布罗伊尔在内的20世纪著名设计师作品进行复制。在80年代，"古典的"这个词变成了强有力的市场工具，超市，百货大楼和闹市街区，到处都能看到不断增生的商店在销售古典设计产品，这些产品覆盖着灯俱到牙刷的广阔领域。

在20世纪晚期的消费景观中，尽管短语"古典设计"及其所暗示的价值判断，是一种活跃的因素，它们最终却不过是一种广告宣传的骗局。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们泄露出的对过去（某些方面）的态度，而"古典的"设计概念本身则较乏味。

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

直到20世纪人们将古典经济学提炼为新古典经济学时，古典经济学构成了18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米尔主张：个人自我利益的追求，产生了最大的集体利益。

古典派认为：一种经济结构，或者总是处于平衡状态，或者是趋于平衡的。这种理论提出：平衡是由工资（劳动价格）和利率（资本价格）的运动来保证的。

利率高低运动，以确保储蓄和投资的均衡。例如，如果企业突然决定（也许由于技术改进）它们想投资更多，那么，商行便会增加借贷，于是哄抬利率。利率上涨有两个结果。其一，是家庭愿意储蓄更多，因而间接地将更多的钱借给投资公司。其二，是一些公司渐渐拒绝投资更多的想法，因为借贷付出较高的成

本。这两种力量相互起作用，产生了储蓄等于投资的一种新的平衡。

这种理论，建立在两个假定上：首先，投资容易引起利率波动；其次，利率会自由变化，所以，储蓄和投资会很快相等。至于工资，它们将调整以确保国民收入的均衡水平同带来充分的就业的水平的一致性。如果有失业，那么，工资将下跌，劳动需求的增加以吸收失业者。相反，如果一种经济制度在国民收入工资方面未保持增长，它将导致扼杀劳动需求。

由于凯因斯（参见**凯因斯**理论）的跟随者，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和 70 年代中期，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影响减弱了。凯因斯攻击两个主要的古典信条。他论述道：(1) 债券持有人的投机行为，决定并影响着利率；(2) 工资总是下跌的，国民收入所以在未充分就业时也许处于明显的平衡中。最近，人们的注意力已转向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逻辑命题。

古典主义 (Classicism)

在西方**艺术**中，古典主义是一个标识体现出秩序、和谐和理性原则的作品的一般性术语。这些原则，被认为是构成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美术和**文学**的基本原则。从古希腊和罗马的范本来看，古典主义主要是一种智力的艺术，尽管也涉及道德——仿佛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古典主义的冲动是“阿波罗式的”（以古希腊的音乐神为名，他通过运用智力使混乱的大自然变得温顺，使其成为宁静的、有智慧的、文明的、规范化的和有道德的）；它与个人的、激情的和混沌的浪漫冲动形成对照。这种冲动，称为“狄奥尼孛斯式的”（以古希腊的沉醉与享乐主义的狂欢之神为名）。在每一种情况中，风格特征与上述的精神特征相

匹配。确切地说，“古典式的”或“新古典式的”作品，运用的创作技巧与过去的相同。

在西方建筑中，古典主义具有头等重要性。按人们通常的理解，古典式建筑的特征，通过运用特别的限定的建筑元素而标明，它们已成为古典主义可辨认的词汇表。古典式建筑的基本要素是“柱型”，一种关于各式各样的圆柱的标准。这些圆柱，用于支撑柱上的楣构。古典式的寺庙柱廊模式是设立标准的基础。这种圆柱与柱上楣构的关系有时被描述为“柱子和过梁”式建筑——圆柱是垂直的成分（由柱头、柱身和柱基构成），而楣构是水平的，由挑檐、雕带、过梁构成。在古希腊社会中，寺庙是最富意味的建筑物类型，并且由于其功能和仪式的原因，它以均衡的比例和严谨的对称为特征。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雅典的帕提农神庙建筑群；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寺庙一样，它是一个长方形封闭空间，四周由结构性的圆柱支撑着屋顶，它们都是以柱廊模式组织成列。

对古希腊建筑模式稍加修改，便为古典式罗马建筑提供了基础。罗马时期的主要发明，是把圆柱与圆形拱顶结合起来，在技术上获得更大的承载空间，而这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审美上的结合，对此我们可以在罗马的圆形大剧场的结构中观察到。

公元前1世纪，奥古斯都大帝的建筑师和工程师维特鲁威，写过一部建筑著作（《建筑十书》），这是从古典的古代留传于中世纪的惟一建筑著作，为后来罗马共和国的建筑实践，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奠定了基础。他详细地描述了培养建筑师的教育程序和要求，以及建设城镇、城堡的最适宜的地点之类的事情。在15世纪，随着对古典文本兴趣的重新兴起，这部著作成为当时大多数建筑理论著述的基础，并且在欧洲，这部著作，以及那些几乎是它的翻版的著作，统治着随后数世纪的建筑学科。所有后来时

期源出于古典主义的建筑，尤其是在柱型方面的仿照而不仅只涉及比例的建筑，都可以称为古典的或是**新古典主义的**。

在音乐中，“新古典主义”具有不同的含义。它指运用像巴赫或莫扎特这样的18世纪作曲家的技巧，并具有20世纪的尖刻与和谐的一种作曲风格——是对斯特劳斯或马勒等浪漫主义的华丽音响风格的激进的取代。

对词语“古典的”的普遍误用，造成了“古典主义”内涵混淆的问题；“古典的”，意指一件艺术作品成为一种“标准”，名扬四海并几乎超越了批评所能达到的高度。另一种最初仅流行于西方但现在已是世界范围内通用的表达是“古典音乐”。这一术语，过 去用于指从**巴洛克**末期到**浪漫主义**开始其间的欧洲艺术音乐。那期间，是格卢克、海顿、莫扎特和青年贝多芬的时代，然而现在则广泛地用于指最近4或5世纪里的欧洲艺术音乐。有时，西方人谈及“古典主义的”印度或亚洲音乐，包含有同样的暗示，即在艺术音乐和更通俗的音乐形式间存在着一种区别。所有这些术语，都广泛流行，但是，没有一个与古希腊和罗马的传统或艺术观念有任何联系。

分裂（Cleavages）

社会分裂以清楚的社会标准区分了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等级制、宗教、阶级、语言、性别与年龄群体界限，可能是重要的社会分裂的标志。民主国家社会分裂的重大政治作用是影响政治分布或对政党的依附。“显著的突出部分”以及它同其他一切突出分裂的关系强化了特定社会分裂的影响力量。一次社会分裂的“突出部分”就是它相对于特定社会个体认同的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它用来预见个体对政治集团——宣称代表了一种特殊

的分裂或一组分裂——的依附关系。比如，宗教的突出部分，作为一种分裂，在对政治分布的影响上是相当不同的。在比利时和荷兰这样的国家，两个以上重要的宗教（或反宗教）共同体的存在导致了代表着忏悔与反忏悔分裂的政党的出现；分裂如此之多，以至于只要知道一个人的政党，即可知道他的宗教（或缺少宗教）。相反，在英国，宗教不像政治那样有突出的分裂，因为其他分裂（主要是阶级、地域与民族起源）占据统治地位，但宗教也可能与这些分裂标志有关。后一种可能性向我们显示了分裂结构的重要性。两种（或更多）分裂一旦涵盖了同一社会集团，这种分裂就被认为是“巧合”。比如，在一个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是穆斯林、而所有的非穆斯林都不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中，阶级和宗教的分裂正好是巧合的。相反，当一个分裂集团里的成员也广泛地分布在另一种分裂集团的成员之间，这种社会分裂是“交差对列”的（Crossiycuttiy)。比如，在一个有低层、中层和上层阶级的穆斯林平衡于整个人口分配的社会，那种宗教与阶级的区分就是“交差对列的”。自然而然地，在纯粹巧合与纯粹交差对列的分裂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经验上的可能性；甚至它们彼此巧合或彼此交叉对列的界限在政治影响上也不可能是同样重要的。有些政治学家认为，大量显著的社会分裂与多党**民主制**相关，而单一统治的分裂与两党体制相关。把社会分裂看成是政治分布与竞选结果的基本决定因素的政治理论遭到了批判，这是因为：(1) 它们无法说明改变不同分裂的力量和构成的历史偶然；(2) 忽视了竞选体制在形成政党的过程中的重要性；(3) 因为投票越来越以特殊的偏好主题为基础，而传统的分裂日益失去了其突出地位。**多元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交差对列的分裂是民主制稳定性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在分裂既是巧合的，又是以种族、宗教、民族、国家标志为基础的地方，要继续维持民主制度是非常困难

的。

参见："联合主义"。

顶级期（Climax）

当演替过程自然发展，组成**生物群落**的所有物种都处于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并且假若环境因素（包括气候、土壤和水源等）也处于稳定状态，生态学家将这种平衡状态称为生物群落的顶级期。多数未受干扰的群落被认为是顶级群落。凡平衡状态受到干扰的地区，在恢复环境稳定性的过程中，可出现各种暂时性群落，最终则会导致顶级群落的重建。例如：覆盖不列颠群岛大部地区的栎树林顶级群落，就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影响下，荒地自然发展的最终阶段。

参见：保护，演替。

临床心理学（Clinical psychology），参见：精神病学

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

计量历史学是给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发展于英、美和欧洲的"**新经济学历史**"或"数量经济历史"的讽刺名称。Clio是指司掌历史的女神，而metrics是指度量衡器。在方法论上，这些精明过度的经济学家废除了经济历史学科中先前的陈规（基本上是涉及到事实收集和历史个案研究之后的谨慎概括），而是像经济度量制度学家一样行事（只关心以数量形式测度经济理论）。他们的基本方法是设定一种理论或者一种假设，然后以资

料来验证它，通过回归分析，看它是被证实还是被证伪。无论以这种观点进行工作又有多少特殊的欠缺，这些经济学家也还是改造了经济历史，给经济历史以一种先前没有的概念严格性与经验严格性。可是，他们的批评家仍然宣称：太阳底下无新事！

参见：“计量经济学”。

克隆技术（Cloning）

基因的克隆技术（源自于希腊文 klon，意思为“细枝”或“嫁接”）是指采用**基因工程**对某一**基因**或 DNA 片断进行大量复制。通常从 DNA“库”中获取原始 DNA，再将原始 DNA 以质粒（为 DNA 的小闭合环）的形式植入到细菌中，从而实现基因的无性繁殖。为了在亲代细菌的子细胞中制造出大量的克隆基因，细菌和质粒要进行多次复制。DNA 库是 DNA 克隆片断的集合，而 DNA 克隆片断又是通过采用限制性内切酶，对特定生物的 DNA 进行分解而产生的。克隆技术思想常常扩展至所有生物，不过主要以单细胞生物或某些植物为主。就此而论，无性繁殖系是指从一个选定的亲代细胞产生的所有细胞。这些细胞以二分裂方式繁殖，如果不考虑所出现的基因突变，在一个无性繁殖系中所有细胞将携带相同的基因。由于机体的所有细胞都包含完整的基因成分，因此，从一个非生殖细胞产生一个完全的新个体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这在一些植物和动物（如两栖动物）中能够实施，但对人类的克隆却久久停留在科幻小说的情节里。

参见：免疫学。

共同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参见：语用学

联合党派（Coalitions）

联合是政治对手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反对共同的敌人。联合政府是倾向于联盟而非竞争的政党仅仅是为分割权力而形成的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31 年到 1945 年间的英国即由联合政府执政。

有一种发展完整的理论体系，致力解释联合政党形成过程以及它的长期稳定性。联合是重要的，因为它是各种政党、各种利益集团、各类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政治合作、共同决策的原始形式。

对于联合政党进行理论探讨，其基础是数学上的**博弈论**命题，集中于以下四种要素：（1）参与者在加入联合政党之前所考虑到的刺激（动机）或回报；（2）（如果这就是要求赢得最低限度）特定制度下的联合政党的最佳规模；（3）参加者共有的特征（常常被定义为共有价值）；（4）联合政府所要遵循的决策价值。运用于政党的联合理论在经验上的检验，运用计算机模式和实验模拟，支持了两大普遍法则：第一，联合成员为了增加其个体所得到的回报（如入主部委）而最低限度地控制联合成员的数量，这就是所谓“最低限度赢得”法则。第二，联合政党在那些有关政策问题上分歧最小的政治伙伴之间最容易形成。这就叫做“政策距离最小化”或“最低限度冲突原则”。联合模式化越来越复杂，而必须把可变的利益回报和随时间而不同的条件变化考虑在内，这就使联合政党的支持者也难免招致如下批评：真实条件的可变性是不可能足够模型化的。但是，以现实条件的经验分析为基础的可供选择的方法，都取决于如此多的特殊要素，以至于在那种来自经验博学的常识之外，就根本不能提供预见力量。

参见：“选举制度”。

代码（Code）

在**语言学**、**传媒**研究和**社会学**中，代码指一种文化的成员用来进行交流意义的符号体系。要使代码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套形式规则。语言是一种由符号（语词）组成的代码，其语词意谓一定的事物并可按一系列的惯例进行交流。同样，莫尔斯电码、盲文、交通信号灯、服饰和身体语言都是具有交流功能的代码系统。

在传媒研究中，代码通常是指符号系统、形象、声音、技术手段和形式，所有这些都被按一定的惯例加以利用以在媒体文本中生成一定的意义，例如，电视节目就是按一系列规则利用编辑、灯光、摄影剪辑等技术过程传达一定的讯息。另一个例子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普罗普的叙述代码，他揭示了童话是如何运用各种重复再现的人物类型和事件范畴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编造故事。这表明了通过以特定的方式创造和利用代码就能生成特定类型的文本，不过，代码并非总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于文本之中。

代码系统可被用来对一个文本进行编码使之具有意义，但是，学术界最近主要感兴趣的是编码者的本意能在何种程度上被解码者（听众）所理解。

参见：编码/解码；文类。

编码理论（Coding theory）

数学中关于用代码传递信息之诸种方式的研究，称为编码理

论。今天，越来越多的信息通过电话、无线电等方式加以传递，该领域的重要性日趋显著。在发送信息、避免失真等问题上，编码理论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工具。

参见：信息论（see also information theory）

认知疗法（Cognitive therapy）

认知疗法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凯利的人格建构心理学、埃利斯的理性-情绪疗法和贝克的认知疗法，现今至少有 17 种其他形式的认知疗法。认知疗法学者并非依据或并不相信**无意识**的概念，他们认为，所有的心理活动，虽然并非每时每刻都被意识到，但总是能够被直接了解的，而并不属于无意识的关系或动机。认知疗法要求病人诉说其围绕非理性情感和行为的想象和思想，以求与其非理性的思维模式进行直接交流，从而对病人的非理性思维模式做出估价和研究。

认知疗法的核心要素包括：个体对其本人生活事件的不适应解释的可变性；对其解释自己环境的方式的重新思考；处事模式的发展以自动地改变其行为、环境和认知；承诺对反应和行为进行监控以提高理解力。认知疗法具有方法论上的严格性，并利用评估、问题表、目标体系、常规监控和效果测量等科学手段。

尽管不存在惟一的模式，但在美国埃利斯的理性－情感疗法被应用得较为广泛，而在英国则有一大批从事贝克的认知疗法的开业者。

硬币（Coins）

硬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每个时期每种硬币都含有一定数量的金属，其作为金属材料的价值等于设置在硬币之上的货币价值。如一角硬币含有价值10分的银子；一块银元可以变卖，银子可换美元。

显然，由于金属的市场价格波动，问题也就出现了。当金银的市场价格高于铸造的硬币价值，金银就被变卖来换取金属，因此而从流通过程中消失。由于人们为了消除某些金属价值而削去硬币的边缘或者擦损了硬币，而同时又不想使之失落货币交换价值，因而存在着很大困难。为了保持流通中硬币的使用又使它完好无损，货币权威机构把硬币上的有价金属数量还原为象征数量。这就意味着，硬币常常因为交换媒介比作为金属更有价值。

参见：复本位制度；葛雷欣法则

拼贴（Collage）

拼贴（出自法语 coller，“粘贴”）是一种艺术技巧，即把物体粘贴于艺术作品的表面而并入作品的构图之中。这种技巧，常见于**民间艺术**，例如在某些非洲和加勒比海人的宗教**雕塑**中，创作过程不是使用雕刻的手段，而是通过组装已经存在的物体来制作面具或图腾。在**美术**领域，拼贴极为罕见，直到20世纪的开端，西方画家才开始使用这种技巧。**立体主义**艺术家把报纸条、公共汽车票、菜单的碎片和其他物体拼入他们的画中，而**超现实主义**画家走得更远，用“现成品”的明显的无序组装构成整幅的画作。毕加索制作了拼贴雕塑，把像自行车龙头、刨花片、螺丝

钉之类的物体变成艺术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劳申伯格用汽车轮胎、美国国旗、甚至一完整的山羊标本拼贴成他的雕塑作品，通过丝毫无损于物体整一性的组装来制造艺术品，而不是（像大多数早期画家所做的那样）仅因物体的审美属性或因它们在整个蒙太奇中产生的效果，使用物体的碎片。

在**音乐**中，术语拼贴指把其他作品的剪辑片段插入其中的作品——甚至不是引用和重新构成（像在**戏仿**中那样），而是杂乱地粘接起来。最常引用的例子是，出现在艾甫斯作品中的砰啪作响的各种圣歌曲调和流行进行曲的碎片——因为鲜有其他作曲家追随他的示范，而成为当时的谈论热点。但是，在电子音乐、**混合音乐**和**后现代**音乐中，拼贴是流行的操作方法，而且许多“主流的”古典作曲家，例如考普兰德、肖斯泰科维奇和蒂皮特，也运用这一手段。也许是因为严格的版权法的缘故，这种技巧在**波普**音乐和**摇滚乐**中鲜有使用；更常见的是，一行乐谱或和弦的模进可能成为“标本”——即被纳入一般的构造中，并且以与原始材料相同的方式发挥效果。然而，打击乐经常以类似拼贴的方式使用这种标本化作法，先前存在的唱片的扭曲了的声响之短促爆发，被插入基础构造之中。

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广告的制作者开始试用拼贴法。通过运用计算机技术，他们把现代演员嵌入老电影的片段，或者用现代产品展示老电影中的演员：常常配以新的声带以增强传送的信息。一些主流电影制作者，也采用这一技术。例如艾伦的《齐利格》，在影片中他把自己嵌入一系列著名的历史场景，出现在纽伦堡集会上希特勒的身边或与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一起出现于雅尔塔会议；还有赖奈尔的《死人不穿披肩》，在影片中，作为20世纪40年代私人侦探的马丁，与其现代同行鲍格特、劳里和罗伊交换着俏皮话。

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

集体行为指群体或人群中人的行为。早期最有影响的关于集体行为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是19世纪后期勒旁进行的研究。勒旁指出，一个社会在衰落和瓦解期间，受到群众规则的影响，人们之间的相互亲近导致个体人格被淹没于集体心态之中，从而导致个体行为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行为会偏离日常的社会行为准则，而可能变得具有突发性和难以预料。

在当代**社会学**中，集体行为一词指群众为了改变社会的**结构**而进行的全面动员。变革社会的运动可以是世俗的也可以是宗教的运动。斯梅尔瑟在《集体行为理论》（1962年）一书中提出的关于集体行为的一般化理论最有影响，它所关注的是在社会急剧变动时期信仰和价值观对引导**社会运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参见：权威；冲突理论；共识理论；组合政体论；女性主义；合法化危机；权力；宗教；底层结构；价值。

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

荣格用集体无意识这个词指那些在本质上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象征符号，其中主要是宗教符号，这些集体性符号是天生的、自发的产物，而非由个体所创造。

宗教信徒可能会把这些符号视为通达接受上帝的人的途径，无神论者则可能认为它们是编造的，但它们不可能是编造的，因为无法确定编造它们的日期、时间或作者，它们似乎不是源于人。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认为它们是集体表象，源于人类世界初期

的创造性幻想和梦——“原梦”，因此，它们是“无意而自发的表现”，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有意的创造。荣格将梦视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保存场所，并由此观点出发解读病人的梦境，而不是将梦视为被压抑的激情的伪装。

梦保存这种古老遗留物的方式很像人类的身体保存其进化历史的方式，人类心灵被认为是按相同方式建构的，包含了先民心灵的遗迹，他们的心灵更近似与动物，古初的精神是我们心灵的基础，它充满了集体表象和原始母题，集体无意识使**原型**得以呈现，原型是源初意象，而不是习得的象征符号。

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

殖民主义（源于拉丁文，本义为“派兵到国外军垦”）指殖民化的理论和实践，它有时被用为**帝国主义**的同义词。“行政殖民主义”指从帝国或宗主国派遣官员对某地领土及其居民的治理，“行政殖民主义”有时会与“移民殖民主义”相结合，后者指从帝国或宗主国移民于土著人的地盘，例如，17世纪向北爱尔兰的移民、19世纪向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和最近发生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移民。自从世界上有了第一个城邦国家，也就有了殖民主义。殖民主义的动机有各种各样，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屯殖移民以扼制战略要地；可能是由于经济上的贪婪，殖民掠夺土著人的资源和劳力；可能是出于宗教的信仰，通过殖民传播真理；也可能是由于宗主国的人口过剩，或者为了放逐“害群之马”。

“殖民时代”指15世纪后期欧洲国家向美洲、非洲、亚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扩张。殖民主义者为了为其殖民行为辩护，或如新生的美国那样主张赤裸裸的强权，声称这是出于天意，或者像声

称是为了向可怜的异教徒们传播西方文明。尽管在殖民地对土著采取的政策千差万别，大多数欧洲殖民政策背后的指导原则都是通过在当地建立行政机构为宗主国输送当地的资源，同时开发当地市场，吸收宗主国的出口商品和投资。不过，欧洲国家在殖民地的行政权力模式及其对殖民地的开发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别。尤其是自从1945年之后，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合法性，殖民主义越来越丧失其道德、政治和经济的存在理由。

殖民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可以让我们对殖民主义的底蕴窥见一斑。实际上，正是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长期发展中，与异文化的相遇，才使人类学成为一门科学学科。人类学在日本向台湾和朝鲜的殖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殖民地国家中，人类学通常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那些非殖民地社区直到现在还远未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和记录。

20世纪30年代，英国在其非洲殖民地由政府资助对当地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到当地社会的领导体制、亲属关系、土地利用和法律体系等，所有这些研究最终都为殖民地的行政当局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人类学不知不觉地成为政府对土著居民进行更有效统治的同谋，这一点常为人们所诟病。人类学知识究竟是为谁服务的？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在当代，即使本土的人类学家在前殖民地国家已受到赞赏，人类学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人类学家居高临下的观察者视角令人怀疑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面兴起反殖民主义运动，人们对人类学与其研究课题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一历史的视野有助于人类学家觉察到现在的国家关系与以前的殖民体系之间的相似性。新殖民主义指许多欠发达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

关系延续了其以前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被剥削和依赖性。

“新殖民主义”一词常常被用来指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继续依赖殖民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强权，也被用来指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对一些主权国家越来越强的经济控制。这些发达的工业国凭借其在世界贸易中的领先地位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保持它们对弱国的经济控制，西方国家自作主张制定的世界贸易规则巩固了它们的特权地位。

参见：依附理论；传播论；全球化；世界体系。

量子色动力学中的色〔Colour (as in quantum chromodynamics)〕

量子色动力学中的色，是表明不同**粒子**之区别的一种标记，与通常的“色”这个词毫无关联，这一点必须认明。

为什么要引入色的概念？要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理解费米子的性质。粒子被划分为**费米子和玻色子**。费米子必须服从“泡利不相容原理”，该原理说明：一个系统中两个费米子不会具有同一个量子数集。于是，不可能存在一个由两个或更多的完全相同的费米子组成的粒子。

然而，由夸克组成的某些粒子，似乎违背这条原理。一个例子就是由三个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怪夸克组成的粒子。1964 年，格林伯格提出，每个夸克拥有他称为色的一种性质，据此，格林伯格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按照格林伯格，上述三个夸克可能各有一个不同的色量子数（红、绿或蓝），但在其他方面则完全相同并仍然保持为费米子。这一看法意味着夸克的数量是最初的三倍。这种三倍夸克已在诸如中性质子衰变速度系统中得到证实。

格林伯格之前未发现色，是因为所有夸克服从限制条件。也就是说，夸克总的说来只按照中性色的方式结合。这与带电粒子有些相似。一个阴性粒子与一个阳性粒子相互吸引，会形成一个中性粒子。同样，红、绿、蓝三种夸克相结合，形成中性（白色）粒子。二者间本质的区别在于：我们可以观测正负电荷，却绝无可能看到“带色的”系统。某些粒子，是色中性的，但只包含两个夸克。这一现象可解释为：每一种色，具有一对应的反色。反色抵消色。于是，一个粒子可以由一个红色夸克和一个反红色夸克构成，并表现为色中性。

喜剧（Comedy）

喜剧（源自希腊语，意为“婚礼歌曲”）是主要的戏剧类型之一。尽管真正有效的喜剧定义仍然是一个幻想，但许多稳定重复的要素使喜剧不同于**悲剧**、**闹剧**和**传奇剧**。从历史上看来，喜剧常常以社会和家庭、而不是以政治和英雄为主要表现内容；但是有一种讽刺的传统，嘲笑政治家和社会改良者的伪善，这种传统自古希腊阿里斯托劳的喜剧以来，就一直在发展着。一般说来，在喜剧中受到贬斥的人类愚行，通过对过分时尚的行为与装束、过分浮跨的言辞、尤其是对过分伪善的集中表现而显得更加荒唐、可笑。因而，喜剧是在通常的社会处境中刻画平常的、陈旧俗套的人物性格。喜剧不同于悲剧，悲剧可能升华精神和提高个性，喜剧则总是特别地按照我们共有的身体功能突出我们共有的人性。喜剧的作用之一是引人发笑，许多喜剧也通过笑而发生作用，表现观察世界的方式，使观众更多地理解自己，通过认识他们自己和别人的愚行，更多地理解世界。

参见：“市民剧”；“狂欢剧”；“生活喜剧”；“幽默”；“反

讽"；"浪漫喜剧"。

生活喜剧（Comedy of manners）

生活喜剧一般用来描述复辟时代的英国喜剧，埃斯里奇爵士和范布勒爵士的喜剧最为典型；也用来描述（莫里哀或20世纪兰斯岱尔和柯瓦德的戏剧）类似的著作，在这些戏剧中，闲暇阶层的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获得了戏剧表现的冲动。尽管按照这种定义，生活喜剧与时尚、礼节和体面只有轻浮的表面关系，但它也远远不是一种镜子一样的对时尚生活的复现，呈现在舞台上以此使观众能够自我欣赏。其出发点是这么一种看法：人类行为被模式化，并且由（常常是隐而不显的）密码规则和生活惯例构成，它们通过使经验可以预见和可以控制而加给经验一种秩序；我们向别人发信号，他们也（总是无意识地）运用这些信号来"回答"我们。生活喜剧所关心的是良好秩序的外在习俗表象与平静表面之下的内在骚动之间的断裂。外在表象与内在现实之间的分裂，可能是一种有力的手段，可以研究隐藏在规则之中的价值和人们实际上信奉的价值之间的关系。

参见："市民剧"；"喜剧"；"幽默"；"浪漫喜剧"。

职业喜剧（Commedia dell'arte）

"职业喜剧"，源于意大利语，其字面意思是指开始于16世纪意大利的流动群体，他们即兴围绕剧目脚本和人物进行表演，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面具和服装，让人马上认出所表现的角色。这个术语就用于这样的群体所作的表演。基本说来，他们的固定人物——丑角，傻瓜，百纳衣小丑，丑角的情人等等——表演的

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具有人格化和秘密计谋，伴随着丰富的身体闹剧情节，而这正是这种风格的试金石（这种事件，这种情节和程式化的人物形象全部都来自于罗马时代的普劳图斯和特伦斯的喜剧，来自于中世纪**狂欢剧**传统中的喜剧恶魔与粗鄙人物）。

职业喜剧的影响可以从**哑剧**——约翰逊,莎士比亚，莫里哀，维加的作品——中体现出来，这种影响还体现在迈耶尔霍德这样的20世纪反自然主义者的戏剧实践之中。它还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意大利艺术大师（如达利欧·浮和雷姆）和许多模仿借用其表现技巧的剧团产生了最为广泛的影响。而且它还在木偶表演（如英国的庞奇与朱迪）、马戏表演以及音乐厅小丑表演中具有历史沿革，而这一历史（在许多方面很少变化）也汇入无声电影喜剧的传统之中。

参见：“喜剧”。

纪念性建筑（Commemoration）

纪念性**建筑**，通常是为纪念死者而建造的建筑物。它在大多数人群定居的社会的建筑物中，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复杂而又宏伟的墓地建筑，既是为纪念死者又是为让他们居住而修成的建筑物，如位于埃及吉萨著名的金字塔，它们是对从最早的时代以来关于死亡的哲学和宗教的沉思的持久不衰的意义证明。

最早的坟墓结构，非常类似于当代家庭房屋的原型，据说可以几乎完完全全把它们感受为死者的住房。正如在许多文化中一样，人们相信死者进入了来生，很多这样的坟墓用各种各样的必需品装饰而成，或者采用实际的、具象的、象征的形式。在不少发达文化里，因着持久不衰的仪式建有各类庭园。

坟墓和其他纪念性建筑，以无数的形式发挥作用的同时，古

代经典世界带有特征的穹顶坟也是值得注意的。关于它的起源，仿佛是从一个基本的冢、一堆在坟墓上的石头到隆起的、封闭的、再由一个穹顶覆盖的圆塔发展而来。穹顶是许多古典的、罗马式的和文艺复兴的坟墓的模型。

应当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文明中坟墓的保留，常常是现代世界建筑学信息可以获取的最大资源。用于纪念的支墩，不应作为只是和死亡相联系的东西。罗马古迹中富有明显特征的凯旋门、拉丁建筑中伟大的革新，它们除此之外，保留有太多希腊寺庙建筑痕迹的东西，并且，为庆祝一个重大事件而修成的其他许多建筑物或框架结构，它们在建筑环境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纪念性建筑的许多方面是复杂的。在众多文化里，许多优秀的宗教建筑的修造，是为了纪念神、或跟从一个特定宗教的圣洁的男女；还有许多是为了纪念一位可爱的人，将他们的灵魂交给天堂。但是，资助一些建筑的纪念性价值，也许远远多于让一个家族的姓氏在人间不朽的愿望。

甚至在墓葬建筑里面，纪念性常常只可能是一部分动机，如同大多数宗教的真正动机，会拥有强烈的社会与政治意义。它们在整个历史中为工匠、设计者、建筑师的技能练习提供机会。

共栖现象（Commensalism）

共栖现象（源自于拉丁文 commensalis，意思为“共享同张桌子”）是生命科学术语。据生物学家贝内登 1876 年的著作中指出，共栖生物是指能从另一生物获取营养，又不给对方造成任何伤害的生物。如今，共栖生物也包括了能从其他生物获取庇护或行动方面益处的生物。

参见：偏害作用，寄生，共生。

原始商品（Commodity）

在经济学中，原始商品（拉丁语“存货”）常常指相对同质又用于自由市场交换的原材料或原始产品，如咖啡，罐头，糖，棉花，橡胶，银子，可可。原始商品买卖在商品贸易中由商人或商品经纪人来完成。原材的同质性，快速的交换，高效的质量检测和控制系统意味着商品可以没有商品的现实转移而实现交换。投机商、倒把商与中介商在现货市场或期货（未来）市场上买卖所有权。

与制造品相比较，原始商品价格的波动更为剧烈。供给稍稍大于需求可能引起价格暴跌；如在生产国家的水灾或霜灾会使粮食价格狂升。

对于那些依靠一两种出口来换取主要外汇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而言，原始商品可能是举足轻重的：赞比亚的铜，象牙海岸的可可。消费者也更乐意接受稳定的价格。于是，有两种方式可以尝试稳定原始商品的价格（但两种方式都有缺陷）：

（1）国际原始商品协定。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许多协定来试图稳定价格，同时运用调节存货和出口或生产股份。1977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UNCTAD）为协定举荐了18种原始商品，而这时使用协定的调价方式一度流行。可是，这种方式行之无效：现已签订的协定只对糖、可可、罐头、橡胶和咖啡有效。其麻烦在于，最大的生产者或最大的消费者往往不加入协定。而且，当价格上升幅度较大时，生产者往往退出协定，而当价格暴跌时，消费者也退出协定。迄今尚无调节存货足以稳定价格。有关罐头的协定尽管设法相对稳定了价格多年，但在1986年由于缓冲存货经营者用完了资金而协定的赞助政府拒绝提供更

多的资金时，这个协定被公开地废除了。原始商品协定有利于已经建立（常常有高成本）的生产者，而牺牲了正在发展的（低成本）生产者。

(2) 长期契约。这些契约为生产者提供稳定价格，但是按照市场价格协商形成；长期契约越多，现货市场价格也越是边缘，或者越是反复无常。

稳定价格的这些努力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其特殊原因在于1980—1985年原始商品的价格在同一时间全部下跌，使缓冲存货所能得到的资金陷入一片混乱。所以，“国际货币基金会”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力求以补偿金融进行让渡或贷款实现收入的增长，从而稳定生产者的出口利润。但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利润的下降又大大地压倒了所能提供的现金。

传播 (Communication)

定义传播的一个合适术语也许是F·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中提出的“通过信号的社会互动”（1990年）。然而，这个词语还是难以定义。问题在于，“传播”是一种人类活动，其如此普遍，以至于每个人都能认识它，并对它司空见惯。“传播”，不仅发生在我们彼此谈话、互相写信的时候，而且还发生在我们穿衣、梳头和开车的行为方式之中。它就是我们走路、站立、坐下和跳舞的行为方式，它就是我们装饰生活空间的方式，它就是我们在拍摄家庭快照时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因而也就是我们选取而纳入取景框的东西)。

但是，无论其内涵是如何广泛，一般还是一致认为，不考虑把重点放在哪些方面，也无论采用何种理论框架，传播都有五种切实可辩的基本要素：发送者，接受者，信道（方式)，信息和

结果。因而，在最为基本的意义上，对一切实际发生的传播而言，都是一个发送者发出一个信息，然后编码（即把信息转译成一个或多个信号，如纸上符号，文字，图画，莫尔斯电码，电视信号等等）。这个信号通过一个信道或媒介（像一本书、一部电话、电视机或一套衣服）而发送到接受者，由他破译这个信号。在破译信息的过程中，接受者用某种方式译出信息，然后又总是发回一个信号（回答），标明他是否理解了信息。比如，一个市政长官（“发送者”）穿一身灰色套服和白色衬衣（“信道”或“媒介”）去上班，这就传播了她对工作的立场。她可能有意给上司（“接受者”）以一种严肃与敬业的印象。而这种意图就是她的信息。她的这种传播行为可能诱出（“破译行为”）她顶头上司的赞许回答（“结果”）。在交往传播过程中，回答构成了一个回头信号，在上述例子中，回答可能是沉默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如果相反，同一位市政官长官身穿紧身皮夹克、牛仔裤、还理了个剪短的头发去见上司，那么，她的上司的反应信号可能是高度有意识的，这是由于惊讶（“结果”）和困惑（努力破译信息的结果），还可能是高声说出那种反应。或者，为此而选择的传播媒介可能采取书面信息的形式，如解雇通知。

上面详细描述的核心传播过程已经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中展开了研究；在上述费斯克的名著中，这种方法被确立为“过程方法”和“**符号学**方法”。传播研究“过程学派”尤其与**心理学**和**社会学**相联系，而符号学派更多地同**艺术**和**语言学**相联系。

“过程学派”把传播看作是信息传递，用费斯克的话说，是“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的行为与心态”的过程。如果传播的结果不同于传递者所意图的结果，过程学派就要研究这个过程，看看为何出现了传播的失败。“符号学派”把传播看作是信息或文本的传递。信息与文本都是特殊**文化**的产物，因而必须接受相关人

的不同解释。也就是说，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能在传播中改变原意，而造成误解。但是，这种误解不能看作是传播失败的标准，而是文化差异的标志之一，它也可能创造新的意义。

传播是一种灵活、复杂、持续波动的过程，受到大量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些重要的要素中的两个是：噪音（物理的和语义的）和多余（及其对立物——平衡）信息量。

“噪音”是阻碍和干扰信号、不为发送者所想要的一切。物理的自然的噪音是对交流传播渠道的干扰，如嘶嘶响的电话，电视屏幕上的“雪花点”。语义噪音是影响信号接收，也不为发送者所想要的对信息的歪曲。因而，语义噪音可以是指对发送者、接受者，信号或结果的干扰。

在传播术语中，“多余信息”是指可预见的或习惯既成的信息成分。这是我们的语言的一个本质特征。它的存在反抗着噪音的结果；靠不只一次地表述事物，我们强化信息，减少误释的机会。“多余信息”的反面是“平均信息”（即熵），它是指不可预见、出其不意的一切，比如说，它可能体现在诗歌这样的艺术作品中，所追求的结果是独一无二、富有挑战性的表现之一。

某些传播方式受到了特殊的注意。上面所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传播）。当我们对自己说话，在一种内在独白中和形成对周围世界的印象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在进行个人内在的传播(交流)。我们的一切内在思想，对其他人，对天气、交通、电视、书刊，对我们的健康和一般的情绪的反应回答，都形成了一种无声的言语，它们在不断变化的同时也反过来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知觉。

也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传播过程不一定发生在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可以论证传播（交流）也存在于人与无生命的客体之

间。我们在此不考虑某些人有对小动物或植物谈话的天性，而只讨论这些人与艺术家的创作产物交流的天性。如果没有人看过一幅油画，能不能说在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中就没有传播（交流行为）呢？可能没有！但艺术家会认为可能有；他或她的传播发生在自我发送的行为之中，存在于油画之内。因而，传播过程可能是：艺术家（“发送者”）——主题（“信息”）——材料（“信道”）——艺术家的自我（“接受者”）——艺术家对作品的看法（“结果”）。不仅如此，甚至当其他人欣赏这幅画的时候，其他人对其信息的解释（“破译”）也可能不同于每一个欣赏者。每人都是根据不同价值、文化和社会背景来感受艺术作品。

最后，一致的观点是，不传播（交流）是不可能的，甚至是纹丝不动、拉长面孔、毫无表情的样子也构成了一种传播形式，尽管是一种消极的形式。我们不可能论证通过所作的一切影响别人，但是可以论证即使我们在极力不去影响别人时，我们也仍然在施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是有意的。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有待阐释；传播（交流）永恒地发生。

共产主义（Communism）

财产共有，这一共产主义的核心观念非常古老。在**农业社会**，共产主义被规定为实现反唯物主义或禁欲的德性、防范自私的个人主义或自我中心主义滋长的最佳途径。在西方早期的**乌托邦**思想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至摩尔的《乌托邦》，所提出的财产共有是为了防止统治者或其他人走向腐败。在早期**基督教**社会思想中也体现了同样的理想：贫困、贞洁与顺从是基督徒禁欲生活的构成要素。通常这种农业的禁欲共产主义同对强大组织等级的尊重相联系，在这种等级之中，优者统治社会。

相反，在现代工业社会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禁欲的等级的乌托邦没有联系。的确，在**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构想中，即历史的最后阶段被想象成物质绝对富裕的社会，因为人类生产的难题已经解决，阶级分化与劳动分工不再必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废除之后，平等、自由、共产与富裕的完全实现被认为是可能的。

现代共产主义的批评者坚持认为，保护最低限度的私有财产权实质上是**民主**、自由与高效的前提条件；在实践中，这些批评者认为，所谓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已背叛了它的平等理想，而确立了独裁与腐败的精英的权力。

参见：“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

社区（Community）

在**生态学**中，社区（原于拉丁文，意味“联合体”）一词可用于所有的存在于特定环境或具有特定习性的生物群，这些生物群相互影响，但同时又保持其各自的鲜明特点以使自己与其他社区相区别，生态学家主要利用社区这个概念表示其研究的一个生物系统。任何一个活的社区都不可能与其周围的其他社区孤立开来，——譬如说，一片橡树林是一个社区，它是由那些较小的社区构成的，这些较小社区的生存则有赖于某些其他树种、动物的尸骸等。

一个社区中的每一物种都生活于其**生态龛**中以适宜于其生存的方式生活，其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中的其他物种。物种之间相互作用，每一个体也与同一物种的其他个体相互作用。人们主要从能量流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研究这种相互作用，生态学家所关心的是捕食/被捕食关系和疆域行为，将之视

为**生态系统**营养流。一个生物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因此并非静止不变的，但是，如果环境条件允许，通常总是可以维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如果环境受到扰动，社区就会发生变迁，随后会重新恢复平衡，达到**顶极期**。这一现象可比拟于生命个体的**体内平衡**过程，有的学派即把生物社区作为复杂的有机体看待。（这种整体性学说的要点体现于洛夫洛克的**盖亚假说**中，这一假说认为整个生物圈社区可以视为一个单一的、复杂的有机体）。

社会学中的“社区”一词意义非常含混不清，它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在特定区域、位置或疆域中的一系列关系，这个词也可用来指并非存在于确定的地点的关系，如“同性恋社区”。这个词通常被在规范性的意义上使用。

“社区”一词在社会学中的用法主要可以区分为三种：（1）意为地区（这与地理学对这个词的用法非常接近）；（2）表示一个相互冲突又相互关联的关系网络；（3）指一种特殊类型的具有特定内在品质的关系，这是它的最常见的含义，在此意义上，它具有肯定性的内涵，比如说“社区精神”，这是一种对于“传统性社区”的浪漫化的观点，导致了有关社区凝聚力、公信心、亲和力的社区观念。

不管定义多么困难，社区总需要有其边界或疆域。边界的作用是划分社区成员和非成员，某些社区严守其边界，如有的信仰社区，有的社区的边界则灵活和开放得多。

参见：同化；生态群系；竞争；文化；种族特性；食物网；种族性行为；社会整合；社会；亚文化；城市性/城市化。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在**经济学**上，比较优势是一个贸易原则，主张当相对有效率

地生产两种产品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时，也存在着专业化贸易的利益，虽然某个国家具有生产两种产品的**绝对优势**。

李嘉图最先描述了这一原则。他证明，即使一个国家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更有效率，各个国家是如何在互相贸易中获利。比方说，假若A国可利用其资源生产小麦或棉花，或生产两种产品，并行不悖。再进一步假设，A国能生产出小麦和棉花，其产品比B国更便宜（即用较少的资源），以至于A国在生产小麦和棉花上有绝对优势。A国就可以从那种成本更低的产品生产的专业化中获利，进而去交换B国的其他产品。

比较优势产生于世界资源的不平均分配，以及生产不同商品和服业产品所要求的不同生产要素配置。在这种语境中，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的规模和训练，以及技术知识。

比较历史语言学（Comparative -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几个世纪以来，通过系统地将一种语言同另一种比较，各门语言得到了研究；广而言之，语言学家们曾努力在语言的全部语族或语群之间建立联系。18世纪晚期，琼斯爵士带来了一个明显的促进因素，他惊人地发现：古代的印度语、梵语，和许多欧洲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享有某些基本的属性。紧随这个发现之后，一个生物学的比喻得到采纳：各门语言之间的遗传关系被找到了，系统树用来揭示以前语言的模式。从这个模式里，进化出后来语言的不同形式。

在语言的各种变化过程中，人们假定：一种单一的母体语言，渐渐地但又无可反驳地以这样的方式分化：后来的发展，在新的语言体系的创造中遵从独立的规则。这个分化的过程，促成异常不同的语言的同时，然而，由于共同的起源和语言变化内含

的系统的性质，一种语族的相似性得以维持。分化的过程不断重复，结果形成一棵树的图形，构成许多分枝和亚枝，最终以各种经过反复检验的语言和方言的诞生而结束。例如，在梵语与希腊语的情形下，人们推断：它们最终都必然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名为“原印欧语”。显而易见，这个祖宗语言，不再是现存的，所以，历史语言学家必须承担重构的工作（至少是部分地）。这种重构工作，将为母体语言提供似乎合理的描绘。

一个主要的困难在于：各种语言表现为许多风格。这些风格，可能会为反对一种精确的语言重构而战斗。此外，各门语言都会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变化，但并不只是通过历史过程的影响（例如，参见**混杂语与混合语**）。在重构关于语言之间的遗传学联系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外部的影响，必须经过仔细的考察。在这点上，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在那些本质上等义的不同语言中确定词项。等义，往往是根据特定的语词结构（参见**形态学**）以及显而易见的声音模式（参见**音系学**）建立起来的。这类变化的发生，不是随意的或武断的，它意味着：要重构长久已死的各种语言的雄心，比起它初次出现接受审视时是较少令人气馁的。

解释各种语言为什么变化的后续欲望，强化了对语言如何变化的关注。一种方法证明道：某些言语声音的结构，天生比其他更粗俗。因此，一种“自然的形态学”口头表明：特定的声音将保持永恒不变，此外，并暗含在的确发生于邻近声音的变化中。一种很显著的方法认为：语言变化是具有社会目的的现象。系统的改变，被当作语言的一个自然特征〔例如，考虑一下英语里“grass”（草）这个词不同的发音方式〕。因此，语言变化的起源，基于下面的前提而得到解释：人们根据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因素，包括年龄、性别、阶级、礼节水平等等，系统地选择一种语言变体而不是另一种。

竞争（Competition）

生命科学家将竞争定义为对资源（如食物、空间或配偶）有共同需要时生物间发生的相互作用。竞争是生物群落中种群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方式。假设资源不出现匮乏，那么该地区的群体数量将会无限增长。然而，现实的情形是资源十分有限而且不断变化，因此最终必将导致竞争的出现。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个体或种群，比它们的竞争对手有更多的繁殖机会，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当种群间为争夺**小生境**发生竞争，最终必定只有一个种群会获得胜利——这就是竞争排斥原理。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种群占据着相同的小生境时，通常微弱的栖息优势就可使双方避免直接竞争。动物已逐步形成一些复杂的竞争行为策略，这可从争夺配偶的竞争中获得详细阐释。人类对环境的控制，也常常建立在除去环境中的竞争对手的基础上，使一个适宜的物种能在通常由另一物种占据的生态龛中生长旺盛。有些时候，从遥远的生物群落引进一些新的竞争生物放入环境会使**生物防治**变得更为容易。

在**经济学**中，当市场上有多位卖方时就会产生竞争；同样，竞争也出现在市场上有多位买方的时候。竞争不是绝对化的行为，在纯粹的竞争和纯粹的**垄断**之间存在多种情况。对经济理论学家而言，完全的竞争是一种理想状态，须拥有大量的买方和卖方市场，双方拥有相同的利益，且能自由进入市场。买卖双方都不能通过他们的买卖影响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由价格制定者决定。假如一些公司取得了超额利润（即超过维持商业运作的最低需要），那么更多的公司将会进入市场，竞争的结果使得商品价格下降。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没有十全十美的竞争性市场。

参见：植物依赖集团。

复数（Complex numbers）

在**数学**中，我们可以通过扩充数系而得到所有可能需要的数，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便是复数。人们依次发现和使用了自然数、**整数**、**有理数**、**代数数**、以及**实数**（今天的教材通常略去了代数数）。实数是一个**域**；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实数不是代数闭的（“代数闭”意指每个**多项式**方程有一个解；在实数中，多项式方程 $x^2+1=0$ 无解）。而复数则是代数闭的。在实数之外引入数 i 形成复数，i 被定义为 $x^2+1=0$ 的一个解（$-i$ 也是一个解），是 -1 的平方根。这个数可以乘以任何实数，由此产生（多少有点不恰当地）被称为虚数的数。复数是实数与虚数之和，如 $3+4i$。

由此，复数是代数闭的。我们知道，任一多项式方程有一复数解。这一事实被称为代数基本定理，它表明复数的必要性。定理的名称即表明其显著的重要性，这一名称使得该定理与牛顿和莱布尼兹所发现的**微积分**基本定理并列，后者促成了通向现代数学的某些最重要的进展。不过，代数基本定理，实际上并未达到微积分基本定理那样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某些更深刻的复分析定理直接推导出代数基本定理。它并未拓展数学的视野，虽然它经常为人们所运用。

刚才提及的复分析由考奇（1789—1857 年）创建。当年，考奇试图对实数**函数分析**的方法进行拓广。考奇本人、魏尔斯特拉斯（1815—1897 年）和波尔扎诺（1781—1848 年）曾对这一分析的严密性做出过贡献。他们三人为极限一类概念所做出的定义，被考奇转化为更简易的复数术语。然而，复分析的结果与实

分析相去甚远。所有复分析结果，均源于考奇定理，其中某些结果大大出人意料之外。微分和积分概念与复数的联系，甚至比微分和积分与实数的联系更为密切。复分析之所以困难，部分是因为函数概念化中存在的困难。

无疑，复数总是涉及到虚量，所以看上去似乎没有用武之地。但是，电机工程师发现：交流电及其相关电路特性，可以运用复数轻易地加以描述。数学探索会产生某种全然抽象之物，但最终却会极为实用，复数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复杂性（Complexity）

在**计算**中，有一件事情极为重要，那就是：在一个程序运行之前即了解将要耗费的时间。如果运行一个程序将耗费近于无限的时间，那么，动用计算机中珍贵的硬件资源去尝试解决该问题，将是白费心血。运行某种**算法**去解决一个给定的问题，要耗费多少时间，这就涉及到复杂性的概念。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通常选定某个相关的数（例如，如果要检查数 n 是否为素数，那么 n 显然就是供选择的数），然后考查：关于 n 问题之算法的长度如何随 n 而变化。就这个素数而言，相应的复杂性是 n 被乘以某个常数。（通常忽略常数，因为常数依赖于运行相关程序的特定计算机。）

复杂性领域中被研究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推销员问题”。假定有 n 个城镇和一段预定距离，某推销员需要访问所有 n 个城镇推销产品，那么，他能否选取一段小于预定距离长度的路线？推销员问题是所谓 NP 完备问题中最著名的例子；NP 完备问题的意思是，用**多项式**的倍数解决该问题是不可能的（NP 是“无多项式”的英文缩写），而解答，即给出**来作**为回应的路径，可

以按多项式的倍数加以**检验**。

复杂理论（Complexity theory）

在**科学**中，复杂理论是源出于**混沌理论**和**自然律**的一种发展。它表明如果大自然中的随机事件任其发展，它们不会定于最简单的可能模式（像是曾经认为的那样），而是进入复杂的模式。例如，在计算机中，模拟蚂蚁搬运巢穴中的卵的活动，发现如果任其自由活动，它们将渐渐地把卵排成一同心圆，最大的在外面而最小的在里面。当这种抽象模型——它没有输入任何种类的外来的“智力”，仅仅是对未编码的随机运动序列的描画——用观察真正的蚂蚁来检验时，它们精确地做着同样的事。这一理论，对于**进化**过程和**宇宙学**具有暗示性意义——并且，象在它以前的**欧几里得几何**、**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那样，它表明我们关于“物理学定律”或“宇宙定律”的概念仍需重新定义。

地球的成分和结构（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earth）

由于地球的直径大约有6,370公里，而且地质学家迄今只能探测到地球外壳的几公里深，因此，当地质学家宣称他们知道地球内部的成分和构造时，肯定会令人惊奇。虽然自然活动将地球几百公里深处的物质（包括宝石）带到上面，地球表面上经常有陨石坠落，人们了解地球中心仍主要依赖**地震学**。幸好，观察和推理所给出的画面并不矛盾，并能够说明地球现在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只能简要地介绍关于地球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是如何知道的，以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地质学家将这个结实的地球主要分为三层：表面是地壳，其厚度从海底的6公里到大山脉的90公里，陆地是由各种不同成分构成的（参见**岩石循环**），但其主要成分是安山岩和花岗岩（也就是说，主要由铝矽酸钾和铝矽酸钠钾和一些单体硅组成），海底地壳则是玄武岩（主要含有铝矽酸钙和铝矽酸钠，此外还有不少辉石和橄榄石）。地壳下面延伸到地下2,900公里是地幔，地幔的岩石被带到地球表面，已知是由含有橄榄石（85%）和辉石（15%）的橄榄岩组成的。橄榄岩的形态随着深度的变化而变化，压力越大，密度越高，在50—60公里之间的区域，5%以上的岩石呈熔化状态，熔态部分含有玄武岩。在地幔之下是地核，已知地核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地核内部是由20%的镍和80%的铁的混合物构成的固态球，地核外层是含有88%的铁和12%的硫的熔态层，地核的密度是每立方米10—13吨，远远大于地幔的密度，后者是每立方米3.3—5.4吨。

人们是根据对地震波的观察推知地核的存在的，因为地震波穿过不同状态和密度的介质其速度和方向要发生改变。地震发出两种穿过地球的地震波，P波在地震波传播的方向震动，S波在垂直于地震波的方向震动，P波传播得快，介质密度越大，两种波的传播速度越大，S波不能穿过液体。当地震发生时，在与观察者相对的地球另一边观察不到S波，显然说明了地心是液态的。由于地震波穿过某些高密度介质时发生的折射作用，在某些区域观察不到P波。在震中对面的地面上观察到的P波早于其预期到达的时间，此外，有些地方的P波显然是经过地心表面发射的结果，由这些现象可以推断固态地核的存在。这些推断获得了地球磁场研究的支持，地球磁场可以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穿过液态金属地核的电流的结果。

根据地震波和地磁学说做出的解释同样能够从对陨石的研究

得到支持。陨石共有三种：铁陨石、石—铁陨石和石陨石，特别是所谓“球粒状陨石”，其中含有微滴状的颗粒。球粒状陨石含有呈球粒状的橄榄岩、镍或铁、硫化铁和橄榄石，其他天体，包括太阳，其固体成分，也是如此。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地球是类似于球粒状陨石的微粒的累积形成的，主要由铁（35%）、氧（30%）、硅（15%）、镁（10%）组成。

重力使这些微粒凝聚到一起，致使温度升高，以至于使铁熔化，由于铁的密度较大，因此沉积到地心，而较轻的熔态金属硅化物和氧化物则上浮形成上层即地幔，就像高炉中的溶渣浮到表面一样。

然而早期的地球并无地壳，那么，这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板块构造说**并结合地球已知的化学差异可以对此做出解释。在地幔上层较热的地方，形成对流，就像现在仍发生于海洋中央山脉下的对流一样，玄武岩岩浆较之橄榄岩轻，而且较富于流动性，因此就升到表面，经过凝固、扩散在海底形成为海底地壳，在破碎的板块边缘，这种玄武岩被拉到下面，因受到压缩而加热，较轻和较具流动性的矿物质则被留在表面，现在由安山石组成的岛弧仍是这样，经过数亿年的演变，这些岛弧将形成陆地，保留着侵蚀、沉积和山脉的构造。在山区下面，岩石熔化，有些矿物具有流动性，而花岗岩则沉到下面再次结晶，后来发生的侵蚀作用将花岗岩剥露于表层，其中有像加拿大地盾那样的大面积的花岗岩地带。

这一过程，以及某些元素和矿物的选择流动性，与对橄榄岩、玄武岩和花岗岩之间性质差异的观察是一直的，橄榄岩中含有较多的橄榄石和镁，并被保留下来，硅石和铝矽酸盐继续不断累积增多，玄武岩较之花岗岩含有更多的钙，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是使地壳具有了一个与地幔不同的化学构成，其中镁和铁较

少而金属尤其是铝较多。尽管如此，地壳仍主要是有有限的几种元素构成的，它们是氧（47%）、硅（28%）、铝（8%）、铁（5%）、钙、钠、钾和镁等，这些元素占地壳成分的99%，其他80种稀有元素总共才占约1%，而这些稀有元素大多是以化合物和性质稳定的矿石的形态存在，尤其是长石（铝矽酸盐），它们除了当作石料使用外，没有其他用场。幸好发生在地球内部和表层的某些地质运动导致某些矿物的积聚，从而使某些有用元素的资源有了开发的价值。生物运动也导致元素的积聚，对大气的变化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强迫（Compulsion）

强迫（源于拉丁文 compulsum，意为“共同驱使”）表示在不可抗拒的力量强制下的行为，或者是非自觉的行为，这种行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而是驯服的结果。这个词的拉丁文词根表明一种行为背后隐藏的驱动力不止一个。

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强迫性的思想和行为是那些人们觉得被迫去做的思想和行为，否则他们就会感到**焦虑**；非自觉的行为是无意识压抑机制失败而导致的结果，否则，就会表现为一种异化感，他会觉得行为不是其自身的一部分。尽管强迫行为看起来像是自发的，但并不能将之视为自发行为，因为它与创造性或生成性无关。

温尼科特提供了一个强迫行为的例子：一个小男孩将家中所有的东西都用细绳捆了起来，当他后来将妹妹的脖茎也捆起来时，家人开始担心。经分析认为这种强迫行为是因为他害怕与家人分离，是为了掩盖心中的焦虑，因为他曾经多次与妈妈分离，比如说当妈妈生病住院时和生妹妹时。

可计算性（Computability）

如果存在一种可为计算机编程以便计算某**函数**的方法，那么，该函数是可计算的。这不是一个准确的定义。人们作了若干努力，试图进一步明确上述定义，结果大同小异。第一个结果，是着眼于函数本身，而完全忽略计算机，这种方法给出了可计算函数的另一常用名称，即递归可枚举函数。第二个结果由图灵（1912—1954 年）做出；图灵是理论计算领域的真正先驱，他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即计算机内部的一种简单数学模型。他关于可计算函数的定义乃是：在可被证明为有限的一段时间内，图灵机能计算出该函数的值。计算机程序员可以相信，任何计算机都能在有限时间内计算可计算函数，虽然他也许无法预知该计算要花费多少时间（参见**复杂性**）。

根据递归可枚举函数的定义，可以证明存在可枚举的多个可计算函数（换句话说，这些函数可被排列在一个无限的表单中）。这意味着有的函数是不可计算的。存在不可计算函数这一事实，提出了计算机能力限度的问题。如果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理智思维必然遭遇不可计算函数，那么，计算机能力限度的问题，就将对**人工智能**领域有所启示。

考查可计算性的第三种方法是丘奇命题，以其创建人丘奇（1903—　）命名。它阐明，任一可为之写出非正式**算法**以计算其值的函数是可计算的。例如，对于为 2 的倍数的 n 值是 1 而其余是 0 的函数是可计算的，并且可通过非正式算法计算。这种算法即从 0 开始以 2 为级来计数，一直达到 n 或 n+1 为止；如果是前者则函数为 1，如果是后者则函数为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可计算函数的例子，不难把这个非正式算法转化为图灵机实

施过程必须终止的正式证明。对于更复杂的函数，我们并不能明确事情一定会如此。丘奇命题不是一种真正的数学思想，其原因在于，它事关非形式推理和形式化的数学论证方法之间的关系，属于哲学领域。出于同样的理由，它也是一种无法被证明的陈述：证据完全是科学的，还没有人找到过使丘奇命题失效的函数。

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也许，对语言发生兴趣的大多数语言学家和其他研究者而言，结果会把计算机看成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在传统意义上，同语言相关的论题例如语法的研究，曾依赖于大量语句素材。尽管这些素材在不断增加，但同那些目前能够被仔细考察的实际语言资料的纯粹总量相比，明显是少的。毫无疑问，将继续存在确凿的理由，即把注意力集中在有限而经过仔细选择的大量资料上的理由，但同样明显的是：关于语言的真正本性的新的洞见，只有通过研究大批语言实例的素材才会出现。

计算语言学的一个主要分支，曾包括要创造计算机体系的努力。这些计算机体系，可以有效地模仿我们理解和创作自然语言的方式。但是，为计算机编程，以便它的语言输出类似于人的自然语言，这是一回事；设计一套计算系统、该系统将以和人一样的方式处理语言却是另一回事。许多研究者渴望达到的，正是这后一个目标。这种方法的一大基本问题，曾经是普遍存在于如何适应交流的自然过程中的障碍现象。如果我们想要一台计算机能够有效地同人产生互动，那么，它需要能够应付多方面的领域，包括少量的中断、修正、不理解的符号、以及带有自然语言互动特征的等等东西。

在编纂各种字典时，计算机也有很大的作用。它普遍用于编纂字典的初级阶段，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增长。编纂字典的初级阶段，要基于对实际语言范例的庞大资料的计算分析。这些语言范例，包括几百万书面的和口头的语词，它们来自于各种广阔的原始资料。它的指导思想，曾是索引的使用；其中，为着一个特定语词的每个例子，连同它的语言背景，计算机会检索大量的资料。(计算机将基于所想要的词的任何一方面，突出几个语词。)这样检索的极大便利之处在于：它允许词典编纂者确立那些一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语词。因此，我们关于语句搭配的知识，已大大地得到改进；关于词汇与句法组织的内部运行，现在已开始给出了许多新的洞见。

毫无疑问，计算机时代，为研究和语言相关的广泛的论题，打开了新的远景。机器翻译、计算机协助的语言学习、言语综合、文体学、词典学与词汇学、言语处理、句法、人工智能，都是些代表性的领域。

计算机 (Computer)

计算机的发明被描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他工业技术上的进步很难与其相比。然而，计算仍然处于摇篮时代。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明了硅芯片，从技术上使计算机变得轻便而价廉，从那以后，工业化生活方式经受了彻底的变革，其范围从工厂车间到音乐欣赏，从银行存款到犯罪预防，不一而足。

为什么计算机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变化？这是因为它具有广泛的用途。在计算机时代之前，整个工业革命史可归结为越来越专门化的机器生产史，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要生产新式汽

车，就必须对汽车装配线进行极大的改动。计算机使这种局面得以避免。如今的计算机有数百万种不同用途，甚至可用于管理账目和产品检验，其间，计算机系统本身通常并不需要改变，只须改变计算机的程序，命令它干什么。

计算机实际上只有两类，其他只是这两类的混合。第一类是模拟计算机：通过某一物理量（例如电压或控制杆压力）的输入，经计算机内部程序处理后，以另一物理量形式输出。模拟计算机具有严重缺陷。首先，准确度低，要受到无法克服的物理问题（如摩擦）的限制。其次，输出结果的准确，要受测量仪器（如电压表）的限制，并依赖于观察者正确使用仪器的能力。再次，模拟计算机常常为有关人员头脑中的特定问题而设计，一旦该问题得到解决便无它用。（例如，土木工程师为了考察他所要建造的桥梁是否将在劲风中倒塌，会制作相应的模型，一旦桥梁建成，这一模型就完全再无用武之地。）

20 世纪 40 年代，人们成功设计出数字计算机，此后，模拟计算机实际上已被放弃。数字计算机接受数字形式的输入，凭借程序在自身内部进行数字处理，并以容易阅读的数字显示形式或打印形式输出结果。数字计算机解决了（或至少减少了）模拟计算机的所有问题；其准确度只受限于输入数值的准确度，以及操作人员在计算机上改进结果准确度的时间总量。通过改变数字计算机的内部程序，还可解决其他问题，这比那些为解决总体问题而设计的模拟计算机方便多了。

计算机艺术（Computer art）

由于不再存在关于画笔的任何神圣性，并多亏数字想象的发展，艺术家们现在可以用计算机作为工具进行艺术的生产，并且

这样做，相对来说成本极为便宜并能增加其效果。只要艺术作品仍在计算机的屏幕上，它就还只是一种光点的聚合。通过软件和输入设计（鼠标、操纵杆、电子笔），每一点都是可控制的，因此它可以被无限地修改；修改也是通过实施各种计算机程序的缠绕而进行（例如，颠倒、扩大、变小、使之尖锐、使之模糊、改变所有的色彩、变成美术，以及等等）。屏幕上的形象，在任何阶段都可以打印出来（作计算机的点图，或在某种系统上作为一种电视影像），并且由于“打印阶段”的形象能被存盘（计算机软盘或光盘），它还能继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种灵活性令人激动，并且在图画艺术中极为有用，但是目前（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可适用的输出设备价格昂贵及其品质的相对低劣，阻止了人们对它的使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展是互动艺术，你可以坐在计算机前，输入任何你想要的形象——从你自己创造的到目前或过去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并且进行修改，与其游戏，直到你心满意足。

计算机制图（Computer graphics）

计算机对当今文化的主要影响之一体现在娱乐领域。计算机之所以能产生这一影响，全靠它的制图功能——在屏幕上或纸上制造图像的能力。

最初的计算机图表，系人工制作（键盘键入，再打印，基本如此）。通过计算机键盘上的相应符号，可以绘制相应的图片，并最后组成图表。计算机与显示器连接后，就有可能通过电子枪在显示器屏幕上产生大量更详细的、并且最终是有色的图像；缘此，人们开始开发**计算机艺术**组合程序。操作人员可以输入图像并使之显示在屏幕上；利用扫描仪（它将照片一类的图像自动存

入计算机存储器)、光笔（它把操作人员在写字板上绘制的图像显示在屏幕上如同在一张纸上）等仪器，更有效的方法被开发出来，取代了传统的键入法。

以上仍然只是把计算机当作绘图工具；下一步是用计算机帮助进行图样设计。这方面最早的努力，导致了最初的计算机游戏：例如，在屏幕上绘制一对球拍和一个球，并利用键盘或控制杆传达游戏者的指令，移动球拍和球。这样的设计又分为两部分，可称为交互式绘图和非交互式绘图。

非交互式绘图利用计算机只产生一个图像；如今的计算机常常按照既定程序，依据有关数据，进行图表、曲线的绘制等工作。计算机也可用来绘制开始和结束的画面，以及从开始画面向结束画面过渡的一系列图像（这在动画产业中称之为中间性过程)，也可以合成画面（例如电影《星球大战》中的模型制作过程)。这样一类技术，已对电影工业的特殊效果部门产生重大影响。已经证明，计算机产生的**分形**图像与自然图像极为相近，海岸线即是一例。非交互式绘图也用于更重要的目的；某些艺术家甚至利用计算机进行艺术创作（由此产生一个值得考察的现象：计算机可以是艺术家吗?)。

交互式绘图已拥有重要的副产品，并不断提供更复杂的游戏。这一系统的主要局限是图像的复杂性；屏幕上一个令人信服的画面，其中包含数千条需要迅速校正的信息。娱乐业的需要，已为研究高速计算提供了资金，在许多其他领域，高速计算已显示出高度的重要性。

计算机模拟（Computer simulation）

20世纪，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主要难题之一，是实验经费。

例如，为检验新的设计而建造桥梁模型，需要投入经费。作为实际建造的桥梁的仿制品，这样的模型也许不很精确。另一个例子中，研究者不可能用望远镜对初始期的宇宙进行调查。这些问题的答案，便是计算机模拟。程序员将相关的参数（例如，对于桥梁而言，它可能是平均风速和所用钢材的强度）输入计算机。该计算机，内含模仿建造实际的桥梁或真实宇宙的程序。在第二个例子中，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将同当今宇宙的外观相比；而对于工程设计的桥梁，无需建造昂贵耗时的模型便可排除任何不切实际的设计。

参见：计算机。

计算（Computing）

作为信息处理工具的**计算机**，已对20世纪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信息处理方式的发明只有三种：书写，印刷和计算机。第三种方式与前两者颇为不同，因为它既涉及信息存储，又涉及信息运算。

因其多功能性，计算机能够具有异常巨大的效用。由于不同的**程序**运作，同样的计算机可以完成大量不同的任务；它们的应用永无止境。今天的数字计算机（相比于它们的模拟前身）的多功能性，有赖于两个洞见。由**向农**（1916—　）提出的第一个洞见是：**布尔逻辑**的两种状态（真与假）可用电路来表示，电流流过代表真而没有电流流过则代表假。使用二进制**数系**时，它们也可以表示数，电流流过代表1，没有电流流过代表0。第二个洞见由**冯·纽曼**（1903—1957年）提出，他认识到在计算机中，由符号组成的程序可用数据以相同方法构成程序来翻译，这开创了在存储器中存储程序的途径（参见：**冯·纽曼模型**）。

尽管具有多功能性，但计算机不是万能的。计算机能够完成的工作，存在着明确的限制。为解决问题而设计程序的第一步是制定出解决问题的**算法**（进行一项工作的规划集合）。计算机能完成的工作（严格地讲，是计算机能计算的函数）的研究，被称为**可计算性**研究。它始于**图灵**（1912—1954 年）关于**图灵机**的工作。图灵机是计算机的一种理论模型。其他方法，还包括**丘奇命题**的哲学观点，该观点基本意思是说，任何可为之非形式化设计计算其算法的函数在实践中都是可计算的。与此相关的是，关于计算机能够怎样快速完成它可以胜任的工作的研究，因为实际上一项花数千年时间去完成的工作并不值得尝试，这被称为**复杂性**研究。

对于一项工作的算法，一旦已经完成，就必须将其编制成进入计算机的程序，从而使计算机可以实施此算法。最初，计算机只能理解少数（典型地是一打）与存储单元操作有关的指令及其内容，存储单元中，储存着被记忆的内容。这些指令被称为机器语言。然而，对于程序员，理解这些指令和设想正在发生什么是困难的。由于这个原因，**高级语言**被开发出来，其中，每条指令相当于许多条机器语言指令，并且它允许一种更有条理的程序处理方法。在**函数式程序设计**中，这种构造也许会得到最大程度地发展。

机器人控制，是计算机的主要工业应用之一。尽管这些机器人不是科幻小说中贪婪的怪物，但它们确实提出了道德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因为在工厂，它们取代了人类。目前，它们能承担的工作还非常有限，这是由于很难设计出这样的机器人：它能够应付环境中那些无法预料的状况。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必须事先预见，且解决办法必须明确地编入程序，这就使它只能局限于一些非常有限且受控的环境，如实验室等。**人工智能**领域，是计算

研究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其（长期）目标是建构能够达到、甚至超过人类水平的计算机。

除用于工厂和作为研究工具外，计算机影响20世纪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娱乐进行的。从计算机首次编程来控制电视屏幕开始，人们便使用越来越复杂的**计算机制图**去设计游戏。计算机创作图像的功能，也已被电影和电视用于制作难忘的效果。

作为研究工具，**计算机模拟**已成为计算机最有助益的应用。对于冗长乏味且复杂的计算，它比人类快得多。这种能力（还没有抱怨）意味着：环境数学模型（诸如早期宇宙中粒子的位置或桥梁设计之类）可以被编入计算机程序中，然后进行实验（随时间改变粒子的位置，或改变风速），以看看会发生什么。这消除了建造和测试在工程中具有毁灭性的物理模型时所需的大部分昂贵费用，并使进行某些实验成为了可能：这些实验，依赖于地球上不能再生的条件。

计算机是人类已开发的、最具广泛用途的工具。就像所有工具一样，计算机有被滥用的可能。许多人预警过用计算机来控制大众的、一小撮人统治的社会；另一些人则把计算机看作这样的工具：有一天它将把人类从肉体劳作（甚至某种程度的精神劳作）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专注于悠闲与追求享乐。无论会发生什么，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社会决不会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概念（Concept），参见：观念（Idea）

概念艺术（Conceptual art）

概念艺术，是一个松散的概括性术语，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艺术**批评**中流行。它描述的是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它们所强调的不是艺术作品的物质现状，而是其“观念上的”意义。（这种方法类似于**文学**中的**新批评**。）在实践中，这种方法，孕育出形形色色的活动，从“行为艺术”和“身体艺术”一直到**极少主义**。这类作品的大部分，是通过一系列反艺术的实践活动的展开，直接探索艺术的传统边界。概念艺术在绝大多数观众的理解中，经常是荒谬的和乏味的，并且有意鼓励冷漠的反应。其意图在于：用非正统的艺术形式的试验，把注意力从再现和**摹仿**的问题上引开，而转向作品的观念框架的真实。心怀疑虑的人们，可能仍然要问一些概念艺术家们将鄙视为无关的问题：（1）“艺术”是为什么的？（2）概念艺术实现了其目的吗——无论它会是什么？

协奏曲（Concerto）

在欧洲艺术音乐中，协奏曲（意大利语，“协奏曲”）指用一个或更多的独奏乐器以对照于或融合于伴奏管弦乐队的方式演奏的作品。这一形式，产生于17世纪，起初供教堂使用，然后成为世俗的独奏尤其是小提琴独奏的表演方式。在这种初始阶段，流行于后期协奏曲中（显著地体现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巡回演出中）的表演理念，几乎没有体现。无论是在独奏协奏曲还是concerti grossi（“多重协奏曲”）中，对独奏演员和管弦乐队之组合的感受，是一种对比的感受——并且，这种方式延续下来，被

创做出来的四重协奏曲（并为大众所欣赏），也常常如同艺术名家演奏的作品。

联盟制（Confederation）

联盟制，源于拉丁语，意为“联合起来的人们”，是一种由许多独立国家或实体构成通过协定统一为平等整体的政治结构。联盟制与联邦制的主要差别在于：在联盟制中确定了中央权威的权力，而在联邦制中权力是独立的；换句话说，在联盟制中，**主权**在于有立法权的国家，而在联邦制中**主权**则由联邦政府和州（省）共同分享。这种区别在德语中更加清楚，其中联盟制是 Staatenbund，而联邦制是 Bundesstaat。

区别联盟制与联邦制的另一种方法是：联盟制常常是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联盟（如自由贸易或防御），而联邦制就是万能的。在其通用形式中，欧共体就具有联盟制特征。如，欧共体的行政权威就由成员国按部长大会共同集体分享，每个国家的部长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而且，欧共体并没有官方共同的国防或外交政策。但是，许多人认为，欧共体的法律制度已获得了联邦性质，（尽管是指认的）多数在部长会议上的投票也体现了原始的**联邦精神**；许多人还声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已确定了一个联邦的欧洲联盟。

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

社会学家用“冲突理论”一词指任何一种重视冲突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的理论。狭义的冲突理论是指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系列理论，它们提供了一种与后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流派即结构

-功能主义不同的社会生活理念。

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将社会描述为一幅各种价值一致共处的和谐画面，冲突理论指出，结构主义社会学忽视了社会中价值和利益的冲突，或者至少是将这些冲突视为次要的。与结构主义不同，冲突理论提供了一种社会及其变化的模式，这种模式高度重视**权力**、威压和经济政治利益所发挥的作用。

有的冲突理论是基于马克思的学说。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分为两个基本的阶级，它们分别代表了**资本**和劳动的利益，这两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最终将导致社会变革。还有的冲突理论源自西梅尔，他认为冲突对巩固社会的稳定性、维护组织和整体有积极的作用。

参见：异化；权威；资产阶级；阶级；共识理论；依附理论话语；统治的意识形态；种族特性；女权主义；霸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种族；社会控制；社会秩序；知识社会学。

儒家（孔教）(Confucianism)

儒家（的英文名称）取名于孔子——孔夫子（“孔圣人”）的拉丁语形式。关于孔子本人，能确切知道的情况很少。他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约公元前551——479年），根据各种不同的说法，他曾是一个文职官员，政府部长、地方长官和教师。他在死后，获得了相似于苏格拉底在西方的声誉：一种“方法”被归因于他，一系列的轶事由追随者创造出来，以及“他的”教义成为一巨大哲学系统的基础。然而，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他本人成为崇拜的对象，像一个半神的存在物：为他建立了寺庙，朝圣者前往朝拜他的坟墓，这一直延续到今天。

孔子并非宗教导师，而是一个伦理哲学家。他变成与宗教有

关联，是因为他编辑了《五经》（“五部经典著作”），贮存中国的宗教和道德思想以及历史的仓库。并且，因为他的追随者们编辑了一本声称是他的对话和言说集《论语》（“《集语》”或“《语录》”），它成为儒教的核心文本。由于其神圣的经典性，在今天人们仍对它保持着崇敬。他的信徒孟子（约公元前372—389年）和荀子（约公元前300—238年）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和信仰体系系统化，某些孔子本人可能会斥责的东西现在也被归附于孔子的名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关于这一思想体系以及珍藏它的儒家经典的知识（统称为“大学之道”），在中国一直是所有高等教育和文官训练的必修内容。

从本质上说，孔子对宗教不感兴趣。他曾谈及最高存在（天，“heaven”），但却完全满足于中国传统宗教中的泛神论和超自然存在物。尽管后来儒家过去和现在都有庙宇、祭司和类似教义的信仰法典，所有这些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在儒家中没有**基要主义**，至多不会超过柏拉图主义或荣格主义中的基要主义。

在缺乏宗教等级制度的情况下，孔子教导说，生活问题的解决之途在于礼的实践（一种我们可能称为习俗、礼貌和礼仪礼节的结合物）。礼的实行，保证了连续性；没有它便会发生混乱。礼关涉到维持宇宙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其自身存在的并且因为我们趋向它。在这种平衡中，超自然的存在物和世俗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位置；无论是超自然的还是世俗世界中的机构，都依赖于它而存在并保证它的持存，就像它保证它们的生存一样；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连续体，在其中所有的行为各得其所，不仅影响着现在，而且对未来和过去产生作用。

就宗教实践所涉及的范围而论，我们对此连续体的主要责任，是对我们的祖先负责。他们生活于死后的世界，就像我们生

活于当下的世界一样，并且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有需求和问题。礼，涉及到照料他们的需求和试图帮助解决其问题。我们通过制作他们在死后生活中将需要的物体的纸样（从饮食到玩具和收音电唱机的一切事物），来照顾我们祖先的物质需要；我们仪式性地烧掉纸样，便为我们的祖先在死后世界再创造出真正的物品。我们通过经常地向他们祷告，来照料我们祖先情感和智力的需求，使他们卷入到我们的事务中，并也使我们自己卷入到他们的事务中。从本质上简单地说，这种实践，历经数世纪渐渐变成一巨大的义务大厦，在其中，此时此地的家庭，为了确保其祖先在死后世界中的优裕生活，很容易使自己遭到破产，并且在此大厦中，献祭以及与超自然物的其他相互作用，变成了每一清醒时刻的主要内容。

孔子及其直接的信徒们似乎认为：礼是一种进行社会监督的道德和伦理力量。《论语》坦率地指出："如果你用法律措施领导人民，并以刑罚管理他们，他们将没有荣誉感和羞耻感。如果你通过德的力量（美德的榜样）领导他们，并用礼的规则管理他们，他们将有羞耻感，并将因此而改正自己。"（"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要成为真正的有道德，个人和社会应当拥有仁（"仁爱"），而获得这一品质，是所有儒家的学说和实践的主要目标。通过自律、沉思和诚实的行为而拥有它的个人，是一个君子（一个原来仅指"贵族"的词，但是，孔子将其发展为指"具有优秀品德的人"）。这样的人，应当是心胸开阔、富于同情和不自私自利；倘若他——儒家从来不考虑女性——具有这些品质，他在生活中的实际地位——无论王子还是乞丐，并不重要。

像许多宣扬持续和稳定的伦理和道德体系一样，只要儒家被限制于一个小群体并保持其纯粹的形式，它便是很好的东西；但

是，一旦它被普遍地应用，它便被粗糙地简单化并变成腐败的东西。尤其是，当礼的观念被应用于社会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时，便导致了使其变得荒谬的结果。崇拜自己的祖先是一回事，而让先前的知识困扰心灵完全是另一回事（并且是不相关的）。“官方的”中国学术，变成了对不断扩大的庞大的僵死事实的精通，关于过去的智慧的累积；发明是允许的（因为技术被认为是较低阶级地位的人们的活动，不值得知识分子精英们的注意），但是，思想的创新则受到压制。遵守礼仪成为支配一切的情感，从日常家务对祖先的祈祷到最重要的事务，皇帝及其官员们用祈祷和祭祀保证国家的延续。等级制度，被应用于生活的每一方面，而以一个阶层到另一阶层的变动极为困难，并常常是一种招致惩罚的罪过。总之，内在于孔子自己的学说中（或至少是归属于他的学说）的活力被成规的形式所取代，它们决定着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长达2000多年，直到1949年它们被共产党政府所废除。问题不在于（像在某些其他的伦理和宗教体系中那样）现代社会正在试图把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建立于古代或中世纪时代为小群体设计的体制上，不对其进行任何改变，而是孔子的学说从一开始便一直被灾难性地误解和误用。它与宗教实践的纠缠，也许根植于这种误解的心脏，并且是某种孔子本人（可以说，作为苏格拉底的一个灵魂伙伴）肯定会斥责的东西。

参见：佛教；道教。

连接论（Connectionism）

在**语言学**里，连接论是一种关于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提出了学习如何发生的模式。学习模式的建立，受到了几万亿大脑神经元以各种复杂的方式相互连接产生出一个联想网络方面的启

发。研究者提出：在各个神经元把信号传达给相联的神经元的大脑活动期间，它将使后者或者兴奋、或者受抑制。由另一个神经元引发的一个神经元的兴奋，强化了它们之间的连接，同时，抑制却使这种连接削弱了。各种连接力量的总模式，在一个给它的时间里被认为是代表关于此系统的知识。各种相关的连接力量，随着逐渐的强化与抑制而发生变化；知识的状况也相应地改变了。

在连接理论中，通过使用一个网络内代表神经元或单元之间彼此连接的相关力量的数字，人们设计出计算机模型来模仿真正的神经病学过程。但是，由于对大脑在神经病学水平上实际发生了什么所知甚少，连接论事实上是否为认识过程提供了有效的比喻说法，这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此外，可以完全想象的是：对认识而言，比起单纯的神经病学活动所能解释的来，还有更多的东西。

参见：思想。

鉴赏力（Connoisseurship）

作为艺术史领域内的一种方法论，鉴赏力（源于法语，“认识者”或“理解者”）与品质和真品的概念不可分离，它们形成了那一学科关于“此一艺术作品”的建构内容。

对艺术作品的内在品质（审美价值），而不是其功能或奉供目的（崇拜价值）的欣赏，导致考虑艺术作品的方式的改变。这至少对西方的专家们是如此。到**文艺复兴**时期，以作品所展示出的技巧而不是所使用的质料来衡量其价值，已极为寻常。它所接受的是鉴赏家们对“美的”艺术的趣味。他们的兴趣在于作品中使用的技巧和惯例。从16世纪到18世纪，鉴赏力意味着辨别能

力和知识，事实上与18世纪的业余从事者（这一词语在现今意指“爱好者”）的技术并无多大的区别。18世纪的鉴赏家做出的价值判断，与流行于**批评**中的价值判断属同一种类，但是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区别在于鉴赏家的专门化的学科知识，没有业余爱好者的主观性以及也许是过分的热情或者是批评家的客观的看法——尽管必须引起注意的是，鉴赏力经常把个人的热爱与称职的客观鉴定混为一谈。这方面近期的一个最醒目的例子，是不顾视像证据（至少对现代的眼睛是明显的）的反对，把造伪者梅赫伦的作品当作是弗美尔的“真品”。

鉴赏力的更接近于今天的第二个含义，是艺术专家区别真品和非真品的能力，例如在原作和一个**仿制品**之间做出区分。这暗示：艺术的真品体现着品质，或者品质是不能摹仿的——而这二者并非是同一件事。作为这种暗示的后果，某种艺术作品被称为“真品”（意指某一特定艺术家的原作），而另外一些则被称为仿制品。这种关于鉴赏力的工作之定义是狭窄的，但是它却对艺术史和博物馆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上述领域中，收藏品长期以来因其所拥有作品的诚实性（即，真品性）而获得推崇。在此限定的意义上，鉴赏力的贡献或建设极少超出作品的考证。

今天，鉴赏力的意义至少保留了早些世纪批评的/审美的兴趣这一含义。并且，由于它可能不恰当地暗示一种商业的意义（艺术作品的估价而不是评价），就像人们使用短语“艺术专家”可能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便证明把鉴赏力限定于鉴定真伪的狭义定义，是一种令人遗憾的限制。既然在过去鉴赏力提供的许多特征仍被视为艺术的规范，那么今天对这些观念继续进行非批评的应用，对促进艺术史的研究毫无意义。

良知（Conscience）

良知是（假想）的能力，依据它人们可以意识到自己行动的道德地位。它还是这样一种能力，根据它人们可以意识到在道德上该不该做什么，也是根据它人们可以意识到在道德上该不该做出某些可能的行动。

参见：“伦理学”。

意识（Consciousness）

意识（源于拉丁语，意为“知道什么……”）在心理学中描述了对周围事物的清醒状态：即使我们或多或少地限定了意识，我们都既不沉睡，也不昏迷，也没有落入某种药物引起的幻觉。意识就是注意到我们的行动或我们自己的心理过程的状态，这是动物所不具有的能力。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意识不同于无意识，因为它考虑到空间和时间，不容忍矛盾，给形象以不变的意义。**无意识**永远在改变梦中符号的意义，利用了像误置这样的矛盾作为防御机制。无意识以其语言化为中介变成了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意识也有把情感和观念整合到外在语言整体中的创造功能。弗洛伊德关于意识的主动性说得较少，而对无意识的主动性说得较多；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由于他忽略了意识的物质材料而招来了生存论、现象学、认知行为理论领域中工作的人的批评。

哲学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意识（它们一般用于“知觉”）。我意识到**我痛苦**，我希望我不痛苦。这也就是说，我处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中。两种意识对应于两种心理状态。诸如痛苦之类的心理

状态和感觉经验（如视觉或听觉经验）都是现象学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有感觉。对于现象学状态中的存在的意识也就是意识到如何感觉，即对它的感觉。这种心理状态似乎必然是意识的：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意识到痛苦而痛苦，这仅仅是因为痛苦必然是在某种意义上有所感觉；人们也不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这种有所感觉的状态中而痛苦。所以，意识即知觉，人们处在某种意义上有所感觉的状态。现象学状态必定是意识状态。

但是，心理状态并非都是现象学的。像信念和欲望这样的理论立场并不是现象学的。具有一种信仰或欲望，并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有所感觉。非现象学的心理状态并不必然是有意识的状态。正如弗洛伊德指出，也存在着无意识的信念和欲望。

由于具有信念或欲望并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有所感觉，所以，具有信念或欲望的意识也并不是意识到事物如何感觉，不是信念或欲望所具有的感觉。那么，它必定是对某种信念和欲望的意识而非其他吗？有人认为，对信念和欲望的意识就是对某人的信念和欲望有所信念。我意识到剑桥是美的，我意识到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因为我相信剑桥是美的，我相信我想成为优秀的演员。我没有意识到那个被压抑的信念——我妈妈是魔鬼，我想她死去——因为我不相信她是魔鬼，我也不相信我想她死去。

参见：“心理现象”，“意识流”，“思维”。

自我提升的意识（Consciousness raising）

自我提升的意识群体组织从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而来，这些群体组织的目标是给妇女以谈论和理解被压迫经验的机会，通过倾听其他妇女而认识性别压迫经验的共同性。“个人即政治”，这句话可以总括自我提升的意识群体组织的

方法论纲领。这些组织为妇女提供平等的空间和实践，让他们言说自己，以及妇女能够作为一个群体发言的论坛。有些女权主义者批评这种对共同性的探索，认为它否定了黑人妇女与女同性恋者的不同经验。自我提升的意识群体组织赋予妇女日常经验的价值，而这种日常经验通常在传统父权制话语中被认为是“平庸琐碎”和位于边缘的。

劳宾塔姆指出，产生于自我提升意识群体的各种见解导致了女权主义内部政治、理论、反理论立场的差异。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自我提升的意识在理论著作上加上了妇女经验维度，有助于妇女为反抗压迫而发现自我表达的声音。

共识理论（Consensus theory）

共识理论指**社会学**中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强调**共同价值**是维持社会秩序中的基础。**社会秩序**的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社会能够凝聚为一个稳定的关系、期望和社会结构模式，而不是分崩离析为一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其基础何在？

强调威压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抑或是强调共同价值和期望的一致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形成了社会学中的两个基本倾向，实际上，许多社会学理论都两方面并重。不过，帕森斯主义社会学学派却从价值一致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秩序问题进行解释，认为由于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经验，一致性价值获得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认可。

在社会学中，这种一致性的性质和广度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主导性价值并非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完全认可，即使人们接受了共同价值，也往往并非是全心全意的，而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

参见：同化；权威；冲突理论；文化；话语；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主义；霸权；意识形态；内在化；合法化；规范；权力；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社会运动；亚文化。

唯行为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

唯行为后果论是这么一种原理，我们应该做一切具有最好后果的事。我们在道德上要对我们的行为所招致的一切可预见的后果负责，当我们决定如何行动时，应该把所有可预见的结果考虑在内。当我们在决定是否给乞丐钱的时候，我们必须权衡一下乞丐幸福的增长可能会导致以流浪罪的发生为代价。至于怎样评价行为后果，唯行为后果论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做那一切能为整体人类创造最大快乐的事情，而另一些人则强调诸如美、幸福或平等的不同价值。但是，唯行为因果论者都一致认为，一切能够产生最佳事态的都是必须做的正确行为。

对于唯行为后果论，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反对意见：第一，即使在我们能够造成更好事态的时候，我们有时也有义务造成一种非常不合人意的事态。我可能因为在父亲临终床前做出的许诺，有义务把先父的钱花在建造昂贵的墓碑上，尽管这笔钱要花在子孙后代身上可能更好。行为本身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它们有坏的后果（就像我恪守诺言）；行为本身可能是错误的，尽管它们可能有好的后果（就像我违背诺言）。

对唯行为后果论的另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它的要求太过分了。全世界有许多饥饿的人们，我的钱应该更多地给他们用。我有没有义务把我的工资给饥饿的人，仅仅留下能足够使我免于饥饿的钱呢？有些人认为，这里的麻烦在于：唯行为后果论没有尊重行为与使命之间的常识性区别。

许多哲学家和律师区分了两类情形。第一类情形是人们让一件坏事发生；第二类情形是人们造成了坏事，同时又声称让一件坏事发生比造成一件坏事相比，后者更值得谴责。假设我听说有这么一个饥饿的家庭，如若我不寄去食物包裹，他们会在一星期内死亡。如果我不给他们寄去食物包裹，我就是让这一家人死去。这种冷漠可能是该受指摘的，但并不像谋杀那么坏。另一方面，我也许送给他们一个带毒的食物包裹，在一周内就杀死了他们。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我犯了谋杀罪，因为我是在积极地杀害一家人，而不仅仅是让他们死亡。唯行为后果论者在这里没有看到差别，——这一家人的死亡是一种可预见的后果，我的行动和我的非行动都导致这种结果。因而，如果我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杀人犯，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也像杀人犯一样地坏。

参见：“义务论”，“双重结果原理”，“功利主义”。

保护 (Conservation)

用于描述人类按某种方式对地球资源的利用，使资源既不浪费又不被破坏。它包括：人类为了维持环境的平衡状态而进行的环境治理，对环境的治理也常常包括对因污染而受到损害的环境进行修复的努力。

人们早就认识到，为了获取使文明发展的自然资源，人类须依赖于地球。然而很清楚的是，在人口增长的同时，许多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保护包括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修复和经回收后的再次利用。在这些过程中，技术进步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保护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历史上人们曾认为早期人类与自然界是和谐相处的，但考古学证据显示事实远不是这样，史前人类几乎没有掌握像今天这样能导致大规

模污染的技术，但是他们使用最有力的工具——火对他们的环境进行很大的改造。火被史前人类任意用来改造从森林到牧场或耕地的许多地貌。在人口增长的同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伴随着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与日俱增。正如人们早就认识到保护资源的益处那样，保护思想并不是现代观念，即使竞争常常使人们未能采取保护资源这样的策略，但人们同样认识到它的益处。

科学使人们对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破坏生态平衡所造成的远期影响有了更好的认识，这就导致了对再生资源的再度利用（如太阳能）以及对有限资源（如石油）开采采取一定程度的控制。保守地说，如今保护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许多国家已建立国家公园或类似的保护区，使它像某些地区一样，通过法律的手段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严格地控制。人类也已就朝着建立全球性保护权威机构进行不懈地努力。但是人类往往以其自身的目的而不顾及整体的生态系统，继续在对环境进行着破坏。目前，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仍然是通过立法手段对污染活动进行控制。

参见：盖亚假设，温室效应，生态学。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或右翼政治思想有四个核心价值：权威，等级，财产与共同体。这些价值一般地在拒绝人类可能走向完善的“常识哲学”中得到了辩护。

权威。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开始于对一切社会领域内的权威的辩护。法国大革命激进了著名的“反动”右派对欧洲古老秩序的捍卫。保守主义在法国的倡导者——最为著名的德·梅斯特尔，就辩护传统宗教权威，反对激进的怀疑主义和自由的世俗主义；支持既定的君主，反对自由共和主义；拒绝任何形式的对家庭中

父权权威的质疑。权威因其保护了秩序而得到了辩护。质疑权威将引起社会紊乱，于是服从传统和宗教裁定的统治者即是绝对律令。德·梅斯特尔断言，欧洲要求“教皇和刽子手”的权威复辟。在我们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仰的**基要主义者**们欢迎同样的神学**权威主义**。如果欧洲反动的保守主义者，像德·梅斯特尔和他同样的思想家波纳德和拉麦纳斯，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和君主立宪主义者，那么英国的保守主义者就不可能是如此。他们捍卫新教信仰，一种贵族政治秩序，至多也只是有限的君主制。爱尔兰思想家E·博克在他的名著《反思法国革命》（1790年）一书中清楚地表达了最严谨的保守主义哲学。在这部著作中，他预见法国革命会堕落到恐怖与独裁。他认为以革命去破坏神圣的习惯不能改良世界，而是毁灭世界；不仅如此，他还会鼓励和认可自由的滥用。权威所保护的传统，包含着过去世代所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传统的被玷污，责任全在我们自己。权威既允许人类进化，又保存过去文明的遗产。以历史进化为基础的合法权威，对于理性主义革命家制造的赤裸权力系统是有利的。权威主义对既定道德的保护优于放纵**自由主义**的妄行无忌。

德·梅斯特尔反动保守主义的专制精神与博克的进化精神之间的张力说明了各种不同保守主义者的标准分野。反动的保守主义者想复活的是一种已经消失而且常常是完全存在于想象中的过去，提供一种政治与宗教完全属于更美好的昨天；而具有进化精神的保守主义者并不反对一切变革而只是反对激变。欧洲和北美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拒绝反动的保守主义关于古代权威和宗教传统的优越性不可质疑的假设，但他们仍然在捍卫权威方面与保守主义者血脉同根。他们共同的信念是：秩序、稳定和传统家庭价值对于法治和发展自由而又有规则的市场秩序是最为本质的。但是，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巨大分歧：保

守主义者对于英国"议会主权"原则中所表达的那种没有限制的政府并不感到反感，而**自由主义**则从来就是一种力求通过权力分割和权利法案等手段限制和分化政府权威的政治哲学。

等级。像博克和德·梅斯特尔这样的保守主义者都一致捍卫传统等级制度。无论是被理解为财产权还是地位特权，世袭原则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保守主义者支持君主制、贵族制和私有财产权。相反，自由主义者则反对普遍运用世袭原则。他们相信世袭财产权，但不相信世袭政治权。在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看来，等级都是人类存在的自然形式，而与之相反的平等则是人为的。等级制之所以受到维护，是因为它提供连续性也产生差异。保守主义者都倾向于赞同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存在就是斗争，因为适者生存，而等级就是这种斗争的必然结果。而今的保守主义者倾向于相信**社会生物学**家，他们认为，在种族与性别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可移易的认识与情感差异。这种思想容易流于**种族主义**，即相信某些民族天生就优于其他民族；或者流于性别至上论，即相信男人优于女人。这些思想倾向使许多保守主义者为种族统治和种族隔离（如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的实践或德国纳粹的所作所为）辩护，以及要求妇女回到她们的传统角色，养育儿女和家务劳动。如果认为所有保守主义者都具有共同的观点，或者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都是保守主义者，那就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是不容否认，保守主义的等级政治思想同种族主义与性别至上论具有历史的联系。

等级主义也说明了保守主义为何一般地因为民主制的平均化后果和以一切成年公民政治上平等的假设拒绝等级原则而怀疑**民主制**。如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R·斯克卢东就断言民主制是一种"传染病"。保守主义者渐渐接受了诸如普选权之类的民主制度，只是因为他们已经相信这些民主制度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优先权的

废除。如奥地利哲学家哈耶克这样的现代保守主义者支持代表制民主，因为他们把这种民主看作是最利于自由市场社会的政府制度。换言之，代表制民主是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而被捍卫的。

财产。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对立，庄重地承诺个人具有私有财产的权利。保守主义者为强有力的私有财产权的公正做出了两个关键的论证。第一个论证来自于洛克（1632—1704 年），他认为个人在一切凝聚着他的劳动的东西中具有一种自然的财产权，这种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在原则上，一切财产权都可以追溯到原始的获得物，看看它们是否正义，而这种命题造成了某些容易想象的困难。第二个论证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 年）所提出的，他认为如果个人是自由的并且有能力运用这种自由，那么私有财产权就是根本的权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私有财产权，就没有真实的个人，只有部落成员或集体主义国家的奴隶。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分道扬镳了，但这是因为他们都认识到权威或共同体的要求有时必须高于个人权利而具有优先性。这一区别说明了特别是在欧洲基督教民主传统中保守主义者有时为什么接受福利国家原则——包括累进税收和社会基本商品的贮备，而这些正是被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是独裁对于财产权的侵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经济自由主义在保守主义者中处于上升地位，而对这一哲学的政治解释者即著名的“新右派”，特别活跃在英语国家高度自由的民主制度中。

共同体。与自由主义者不一样，保守主义者提倡团结一致富有凝聚力的共同体的维持和建立，这种共同体以情感、血缘、**种族特性**、语言和**文化**为纽带统一起来。他们论述说，自由主义者一心一意只想建立以**功利**标准为基础的联合体——即自私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把社会关系建立在契约基础上。像社会主义者

一样，浪漫的保守主义者也认为，把秩序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的工业化经济产生了孤立的个人和无根的、无血缘的大都市人，与历史断绝了关系。在过去，地方主义的忠诚——对国王、对王国、对封建时代“乡村共同体”的忠诚——表达了身分之认同。因而，保守主义者以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取代了上述忠诚。曾经怀疑**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又将这一原则化为己用。改造了博克的思想，民族观念跨越阶级差别统一死者、生者和尚未出生者于共同体之中。他们支持**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保护秩序、等级和财产权的合适手段，但他们坚持必须以民族利益调节资本主义。只要资本主义危及到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权威干预就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事实说明了保守主义有时为什么要为对立于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作正当性辩护；这一事实还解释了在拒绝消费者以性别倾向、文学与戏剧艺术作选择时为何不觉得矛盾。书刊检查制度和道德调节机制被认为对保护稳定民族共同体是最为本质的。

反理性主义。从18世纪的博克到20世纪的M·欧克肖特，一脉相承的保守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提出了抽象无情的意识形态的和理性主义原则。理性主义者被指控为仅仅以理性为尺度去评价社会实践，从而无情地侵害了能维护社会秩序的习惯风俗的复杂网络。理性主义者还被指控为仁慈地、简单地构想了人性，强调我们的认知能力，工具理性和利他主义的潜能，而忽视了可能仅仅是被传统文明纪律所驯化的自发冲动与情绪活动。这种对人类能力的失望和对人类进步的前景失去信心，对于保守主义者的气质而言是十分显著的。

联合主义（团结一致精神，或教派融合主义，Consociationalism）

教派联合（拉丁文 Cum + socius，意为“同时”“联合”）或权力共享的**民主制**具有四个显著的特征：（1）行政权共享，在分裂（或分化）的社会中主要团体的联合代表；（2）按照主要团体的竞选力量平衡分布立法、行政、司法和官僚岗位；（3）以文化为基础（如语言、教育和宗教）的共同体自治；（4）宪法明文规定少数民族的权力。发明“联合主义”一词的是荷兰政治学家A·里吉伐特（Arend Lijphart），其意在区分分裂社会的最佳民主形式和多数人民主模式。

要求达到稳定的联合民主制度的条件是存在着争议的。里吉伐特所声明的诸种要素之间，下列要素尤为重要：文化精英政治调解的历史；没有多数派别分裂；少量文化共同体（三到五个）；共同的敌人或共同的外在威胁；在共同体之间的相对经济平等。这样那样的条件严格限制的结果是联合民主制的成功范例受到限定，所以寥寥无几。联合主义政治在1945年和1943年分别实施于比利时和瑞士，更小范围地实施于加拿大和马来西亚，虽然在那里也存在着突出的民族**分裂**。在1919年到1967年之间，实施联合民主制又成功地使荷兰向现代世俗政治的过渡更为平稳。但是，在存在深刻分裂和本质上的民族主义分裂的政治体制中，联合民主制的努力迄今为止是失败了（如在塞浦路斯、北爱尔兰和黎巴嫩）。

联合主义的批评者集中攻击其三个明显的缺点：第一，它“不是民主的”，因为多数人必须放弃自治权利；第二，共享权力“不是有效的”，因为委托政府存在着固有困难；第三，它既维持

了分裂状态，又以制度化方式加深了分裂。联合主义的倡导者认为，联合主义仍然是解决深刻分裂的社会冲突的最有希望的民主方法，比其他方式更不可能引起突出的冲突。他们论证说，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多数人的民主制是问题而不是已经解决，真正的选择在于要么联合民主，要么没有民主。

参见："种族特性"。

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

构成主义，是一个被松散定义的流派，表现于**建筑**、**设计**和**美术**领域，与1917年俄国革命后的十年密切相关。它被看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它在机械结构中寻找它的审美表达，称颂结构和技术的进步，并试图消除艺术和生活之间的传统区别。

在建筑领域，俄国构成主义的第一阶段与用于展览和街头艺术中的临时性木材结构联系在一起，第二阶段则与建筑物本身相关。建筑物被构想为部分的机器形式和部分的生物学结构，一个有影响的作品是塔特林（1885—1953年）设计的1920年第三国际纪念碑：一座斜塔，一个螺旋式的扭曲的截头锥体，它包含一个备第三国际立法委员会使用的立体大厅，大厅上面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行政办公区，顶部是一个圆筒状的情报中心。这些独立的区域，将分别以不同的速率旋转，而结构是由钢铁和玻璃构成。一种当代的评论曾谈到，"通过这些形式在现实中的变形，体现出动力学的不可超越的意味"。然而，尽管它的模型曾在街上巡回展出，却由于钢材短缺而永远未能实际地建成。同样著名的还有麦尔尼科夫（1890—1974年）的激进作品，他既以再现传统的俄国农村建筑结构的方式使用木材质科，后来又致力于复杂的混凝土结构。在1927—1929年期间，他在莫斯科建造了5个工

人俱乐部，每一个都在外部展示出听觉巡环的空间。20世纪20年代后期，构成主义的影响扩散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荷兰，在20年代到30年代的“半透明”建筑物中，大多数内部的工作场所被暴露出来，经常显露出电梯或传输带的运动。

在**绘画**、**雕塑**及其他类美术中，构成主义，通过促进对“纯”艺术原则的理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表现主义**流派相对立，它不是按照空间的质量而是按照空间的容量来清晰地表现维度。在此意义上，它是绘画中的**至上主义**或是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组合的雕塑对等物。构成主义在革命的俄国的早期探索，表现为一种与社会相关的艺术（上述的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的标题便是例证），但是，那场革命很快便转向反对抽象而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使其许多重要的倡导者和同情者的幻想破灭（诸如盖布、佩夫斯纳、康定斯基、李西特斯基和莫霍利纳吉），并迫使他们逃离俄国。这种移民过程，使得构成主义的主张传遍欧洲和美国。

消费功能（Consumption function）

消费被当作一种收入的功能。消费功能的表达式是 $C - f(y)$，其中 C 是消费开支，y 是收入。凯因斯（1883—1943年）的分析集中于作为消费开支的决定因素的现行收入绝对水平上。其他人则引入了一些修正形式，如J·杜森伯里的相对收入假设，F·莫蒂格里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设，M·弗雷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设。上述每一种理论都分析家庭消费开支与收入的关系，因而夸大了经济的消费功能。

当代历史（Contemporary history）

当代历史是指非常近的过去的历史，一般指半个世纪左右的过去的历史。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由于不能自由地接近政府官方文件有碍于形成历史判断，由于事件离我们太近而不能以合适眼光来观察，所以根本不存在当代历史。当代历史学家拒绝这种论证，他们认为必须在官方文件和国家档案中去寻找历史真实的想法是滑稽可笑的；他们认为通过访谈（口头历史）和**社会科学**技能（社会调查，媒介**内容分析**），当代分析家可以为支持他们的论断而产生有效的资源。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内容分析是通过分析言语、文章和符号的系统分析从经验上研究交流**传播**。运用严格的分类形式和重点进行经验分析，内容分析可以被解释为**行为主义**对**解释学**初期实践的调适，即对基本意义的解释。作为**政治学**的工具，是H·拉斯韦尔等人率先运用这种方法研究政治宣传对公众意见的影响。开放反应的内容分析在公众意见分析中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因为它与那些对封闭问题所作的回答或者结构上多重选择的反应相比，可以提供更严格的实际立场的证据。

内容分析也运用于外交谈判研究和冲突调解研究，对于那些谈判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进一步具体化。研究政治言论录音、政治主张、竞选宣誓、新闻报道和选举报道，都是内容分析所运用来研究的主要信息来源。比如，对汉萨特同盟的主张（英国下议院的纪录）是分析政治信仰重大变化的有用工具，也是追

溯议会中首相行为变化的途径。

语境（Context）

语境（出自拉丁语 contextus，“编织在一起”），是能更改我们关于一种观念、现象或状态的观点的背景。将文物置入一**逻辑**关联中（在此情况下，它们仅具有一种身份，一种作为推理链条中的一环的客观的身份），和将其置入一语境中（在此情况下，偶然的意义从它们中扩散出来，就像池塘中的涟漪，使个别的意味模糊而丰富，而不是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后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一个词或音乐的音符的意味，被围绕着它的其他词或音符所改变；在考古地点的一个发现的意味，被其周围的人工制品和结构所修正；或者一历史文件或政治行为的意味，依赖于偶发的环境。

在几个学科中，关于语境的这种基本观念有所发展。例如，在**语言学**中，语境是“一个表达的非语言学环境”——关于其背景、表达者和听众的每一事物，即除了表达本身包含的内容之外的每一意义的决定物。与其相似，在词典学中，语境定义或暗示性定义，是一种显示词语意指什么的方法，不是通过使用同义词或给出词源，而是通过参考（用例子）词语被或已经被使用的环境给出意义。

语境，或背景主义，在**建筑**中是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规范。它指在其许多相关的概念中（即时间、风景、文化以及等等）理解一个新建筑物的设计，并且所涉及的不仅是通过参考其周围环境的个别建筑物的设计，而且还包括对**城市规划**来说这类语境（已存在的物理的和文化的环境）的重要性。

可以说，背景主义与19世纪晚期的**艺术和工艺流派**的建筑

师们奉行的原则具有某种关系，当他们被要求在一种敏感的历史语境中建造时，会像苏尔兹那样留意到："对于每一问题，都有一种可操作的、合理的、常识性的解决方法，并且在此我要说，在可能的限度内，它就存在于对区域的一般类型的附和，以及不去使用将造成不和谐的材料"。欧洲自觉的背景建筑的最著名例子之一，也许是文图里的"圣斯伯里侧厅"，即伦敦特拉费格广场的国家美术馆的扩建部分：这一尝试，使处于一敏感位置，其临街面朝向一重要的公共空间的新建筑物的要求，与一非常著名的公共建筑相和谐。

在**地理学和社会科学**中，语境性是同一观念的一种说法：没有任何现象（例如在一给定地区内的死亡率）能够得到考虑，如果不研究视此现象而定的各种关系和环境的整体网胳，然而它们起初看起来却似乎是遥远的或不相关的。

参见：民族方法学。

背景主义（Contextualism），参见：语境

互文性（Contextuality），参见：语境

大陆漂移（Continental drift）

任何人只要有一幅地图就会发现南美洲和非洲的轮廓之间的巧合，学者们早在 17 世纪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现象了。早期的解释倾向于从大洪水或陆地的沉没找原因，但是，这一解释在 19 世纪中期遭到了反对。在当时，人们认为地球一直在变冷和

缩小，大陆能够运动的想法更是不可思议的，几个世纪以来在大多数地质学家的脑中一直存在这样的观念。大陆漂移学说的问题是，虽然大陆位置发生变化的证据越来越多，但由于人们不知道导致大陆运动的机制，因此这些证据一直无人相信。

大陆漂移说的主要支持者是一位德国的气象学家韦格纳，他在1915年开始发表其研究成果。他认识到了大陆地壳与海底地壳之间的差异，并且相信大陆漂移于海洋地壳上面。他注意到地壳的均衡调节（例如在冰河期之后）需要有垂直方向的运动，因此认为这暗示了水平方向的运动也是可能的。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不仅指出了海岸线的巧合，而且进一步寻找这种巧合的证据。

他的三点论证至今仍被认为是确凿无疑的。第一，他指出北美洲和不列颠群岛上的山脉是同一时代的产物，非洲南部和阿根廷的山脉也是如此，不仅其海岸线若合符节，其山脉的走向也完全一致；其次，大西洋两岸的岩石中有相同的化石，包括同样的淡水鱼类；第三，他指出，特定气候条件下的地质特征，例如沙漠的砂岩，表明所有的大陆曾经相互连接在一起，他认为对存在于南美洲、非洲南部、印度、澳大利亚的冰河期遗迹的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曾经连接为一块超级大陆。他实际上走得更远，甚至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陆地都曾经是一块巨大的大陆，他称之为联合古陆。

韦格纳的理论很久才引起大多数地质学家的注意。譬如说，他的著作直到1925年才被翻译为英文，许多人宁愿相信他所指出的各种分布情况仅仅是巧合或者是因为过去各大陆之间曾经存在“大陆桥”，而不接受大陆漂移的学说。不过韦格纳也有几个支持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南非人都·陶依特，他不仅收集了新的证据，而且还提出，大陆漂移可能是地幔的对流运动导致的，在

这一方面，他的学说是步霍姆斯的后尘，后者是一位研究用放射性定年代的英国学者，他也提出对流运动会将超级大陆裂解。即使没有这样一种机制，关于山脉的研究也足以表明，只有假设陆地的水平运动，才能解释观察到的那些断裂和重叠形态。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其他研究领域的一些新的证据再次激起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古地磁学研究岩石形成时闭锁于其中的磁场，这一研究表明，岩石内部的磁极方向以及岩石相互间的方向曾发生变化，只有承认大陆发生漂移，才能解释这一变化。对地壳中热流量的测量表明，海洋中间山脊中的热流量较高，而海沟中的热流量则较低，这一发现与认为地幔中存在对流运动的观点相吻合。现在整个场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革命真正发生，其旗号已经更换，不再是陈旧的大陆漂移说，而是变成了**板块构造说**。

偶然性参见：模态/调式。

避孕（Contraception）

避孕，源于拉丁文，意为“反对生殖”，就是为妇女提供防止怀孕或有计划地怀孕的手段。大部分**女权主义者**认为，方便避孕对于把妇女从父权下解放出来的计划是最为核心的。许多女权主义者还认为，有权选择是否要孩子和什么时候要孩子，也让妇女能把生育和**性行为**分离开来，允许妇女对表现性欲有选择权，而不被强制于父权制家庭结构。安全而又自由的生育控制的便利性，还是一种持久的斗争，也是女权主义的激进行为和思想的重要因素。

当妇女们能自由方便地避孕，也存在着一种关键的问题，因为父权制抽象化和限制了女性的肉体。女权主义思想家认为，父

权制医学的偏见意味着没有充分地估计生育控制的长期效果。他们还认为，当在家庭或制度中可以方便地避孕时，控制生育的责任总是落在妇女方面。女权主义者认为，之所以如此，理由之一在于：如果妇女决定从母亲的单一角色中解放出来，他们也就更愿意冲破父权制家庭结构，但是，在父亲一统天下的意义上，她们又“无法获权”要求男性的支持。尽管从发现艾滋病以来避孕隔离方法功能已发生了改变，但上述情形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由于避免怀孕的方法不是理想的选择，而是在危险之间的选择，因而避孕方法也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为争得避孕的斗争仍然在继续。

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

应用语言学里，对比分析是魏因赖希 20 世纪 50 年代首先提出的一种方法。它强调两种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别，目的是要辨明人们学习外语的潜在困难的根源。基于行为主义的下列思想：当人学习新的习惯时，旧的习惯会进行干扰；研究者指出：人的第一语言（语言 1）的知识，也许干扰学习第二语言（语言 2）。干扰会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造成困难，导致产生错误的增多。干扰的可能性，随着两种语言间的差别水平（语言的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不过，假定语言的差别等同于学习困难的心理学概念，这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对比分析假说预言的大量错误，并没有完全发生。例如，英语语言 1 的说话人，学习语言 2 日语，他不得不同如下的事实作斗争：动词要放在日语句 2 的末尾。不过，这种基本的差别，很少会激起语言 2 日语的学习者，在说日语时使用英语的词序。对比分析的困难，主要来源于行为主义概念不恰当的

运用。但是，根据两种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别来预言学习者的困难的思想，是有价值的，并且对研究继续发挥着指导作用（参见**普遍语法**）。特别是，以不同语言的正常体系为基础的对比分析，可以对学习者在学习一种特定的外语的发音所面临的困难时，提供高度可靠的预言。

控制论（Control theory）

在电气工程中，控制论是指用来计算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及其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的一种数学理论。

这一理论依赖于用来提供模拟电气线路性能平衡的**电路和网络理论**的应用，模拟电路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827年，当时欧姆首次揭示了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

控制系统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自动控制系统，其中由输出产生一个反馈信号给控制装置进行自我调节（参见**反馈原理**）。一般情况下，控制器会将输出信号与参照信号或预设信号相对照，以对输出信号进行必要的调整，使之保持在参照信号规定的范围内。

1932年，美国人奈奎斯特发明了一种图解法，用于分析反馈系统，使设计者能够检查自动控制系统在运行时是否会变得不稳定。控制论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一个例子是电力线路的控制，其频率和电力输出的波动必须保持在规定的范围内。

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

历史学和**社会学**中的趋同理论认为，由于技术进步的深刻影响，所有工业体系——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的

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会趋同。这种观点，最初是由科尔及其同事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它植根于功能主义传统。功能主义认为工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型，它有特殊的需要，满足这些需要的相似的手段将产生相似的社会形式，这种学说是韦伯理论的现代形式，后者指出官僚体制在生产管理和服务分配过程中的重要性，还认为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的是其技术类型。

趋同理论家相信整个世界已进入一个完全工业化的时代。根据这种理论，“工业的逻辑”决定了所有的工业发展都会导致社会制度向确定的方向转变，所有工业国家将变得越来越相象。据说，只有经过工业化，**第三世界**国家才能摆脱贫困。

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工业化国家在许多方面将变得越来越像。现代工业生产体制形成了高度复杂的**劳动分工**，融合了广泛的劳动技巧和能力。不仅如此，与前工业社会不同，工业社会更开放，人们选择工作和改善社会地位的机会和自由越来越多，而不再为传统和家庭出身所束缚。在工业社会中，专家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整个人口的识字率和技术越来越高。趋同理论认为工业社会所具有的另外一个共同特点是，人口的大多数生活于城市而不是农村。趋同理论的主张者指出，随着工业社会变得越来越像，它们因而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网络。由于这些国家将逐渐具有相同的见解和利益，据说战争的可能性将会减小。

前苏联发生的资本主义革命、日本及德国等国家**混合经济**的成功、英国及美国等国家纯粹**市场经济**的衰落，似乎为趋同理论提供了证据。然而，历史经历的趋同，尤其是日本和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破坏和重建，对于解释其趋同状况也至关重要。此外，趋同理论还忽视了政治、经济制度可能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的“要求”。

近年来，由于认识到工业国家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而不是

别的方面变得相似，趋同理论有所修正。其相似性主要表现于相同的工业技术的运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相似性，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政治体制、宗教信仰、经济组织模式等，则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这一学说的发起者不像后来人走得那样远，将人性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寄托于趋同之上。前苏联著名学者萨哈罗夫就主张趋同的这种积极作用，他指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相似性越大，全球的紧张状态将越得到缓解。这一论断之正确性只有留待历史学家去检验了。

参见：官僚制度；资本主义；文化；依附理论；传播论；进化论；全球化；社会主义；社会；现代性理论；城市性/城市化；世界体系。

可兑换性（Convertibility）

经济学中的可兑换性是指货币可以随便地兑换为金银或其他通货的概念。主要的现代通行货币——美元，德国马克，英镑等等——都是完全可以兑换的，不可兑换的最后残余货币也在1958年被废除。这就加速了国际贸易的运营，因为各国都能以任何可兑换的货币而不是由中央银行所特许的货币偿付进口商品。

在陷于困境的经济中的次等货币，如墨西哥的比索币，只能在严格调节的情况下才可兑换。这些次等货币仍然构成了多数；通常情况下这种货币并不是完全可兑换的，或者也受到交易控制的保护。如1982年9月墨西哥取消兑换性，就是抑制货币投机的一种方法。要允许可兑换性，国家必须有充足的外汇或黄金贮备用以应付对货币的可能要求，或者必须有货币市场的托拉斯垄断组织。

仿制品（Copy）

对于西方**艺术**批评家来说，“仿制品”指一种非欺骗性的人工模仿品，它由另一艺术作品作为第三者而形成。因此，仿制品不是一种翻版或复制品，它真正所指的是由原作的艺术家或在他/她的控制下制作的复制品。仿制品既不是用机器手段复制的产品如重复生产的产品，也不等同于赝品或**伪造**——后者的意图是欺骗。

从古代开始，原型的繁殖一直是创造仿制品的内驱力。古罗马人仰慕古希腊雕塑的杰出，他们甚少发明却完善了仿制的机械手段，它能复制出选中的原始作品。今天，许多古希腊的雕塑家如莱奥库恩，都是通过其罗马仿制品而被人们所熟悉。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实践，鼓励重复作坊的工艺程式及成功的原型，而不是发明新的艺术处理方式。中世纪的艺术家们，对设计或作品创作领域中的原创性观念不太感兴趣，他们更看重的是使用真正的（资格的）第一流质地的材料。

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认识到在人类形象的再现方面，古代艺术体现出一种近于完美的形式处理方式，一种使古人复活的更自觉的意识，使艺术家们以过去的艺术来衡量自己。米开朗基罗由于模仿古人达乱真的程度而扬名。然而，艺术家们很快就转向审慎地表明，他们的仿制品是怀有敬意或为研究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作品，因为现在公众们向艺术家要求的是个性意识。而迄今为止，这尚未成为艺术家这一角色的有机内涵。在原作和仿制品之间做出区分的需要，导致了**鉴赏力**概念的产生（常常错误地被当作是艺术史家的工作的同义词）。

于是，仿制变成了艺术家研究过去艺术的手段。像鲁本斯这

样具有显著原创性的艺术家们倡导与古人竞争。随着（艺术）**学院**在17世纪的崛起，被认为由古典艺术最好地体现出来的一套价值系统，主要是通过对仿制品的研究和制作而获得传授。雷诺兹在《讲演集》中宣讲这样的观点：即为教授目的的模仿，远远不是对外观的奴性仿效。相反，其目标应是再创造出构成原作的那些条件，即使在实践中，这倾向于指对学院所指定的范例进行忠实的模仿。

到了19世纪，艺术训练严格地坚守模仿过去的艺术的信条。这种态度，使学生产生了一种危险的信念，即过去的艺术在一切方面都臻于完美，剩下的几乎是无所作为。然而，**现代主义**的登场，意味着艺术家们不再认为仿效是训练的必备因素。为研究目的而制作的仿制品，已被解释性的仿制品所取代，例如培根的《无辜的×教皇之肖像》（1953年）或毕加索追随马奈或委拉斯开兹之构图的重新制作，它们向原作提出挑战，而拒绝承认它的权威性。

然而，仿制品在当代艺术实践中并没缺席。例如，**波普**艺术对原初性观念作出挑战：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印刷作品是仿制品、拙劣的模仿品，还是原创的艺术作品？今天，后现代的兴趣在互文本性，关于原作/仿制品，或确切的真品/非真品的僵硬观念，不再有任何意义，关于什么构成了艺术王国的基础性观念正在重构之中。

组合政体论（Corporatism）

组合政体论是指那种“整体国家”理论，在天主教社会思想和**法西斯**意大利首先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这种理论假定：政治共同体是由功能各异而且在经济上有差异的组合体制构成；这种

理论认为，利益表达应该发生在这些独立的有组织的联合（或综合）的基础上，而不是发生在个人主义或地方主义的表达原则的基础上。实际上意大利的组合政体就由国家操纵，因而“权威主义组合政体”就常常被用来描述法西斯主义实践。

战后的许多自由民主制度中，政策的表达与执行相当依存于有组织的商业贸易统一化的劳动力，因而政府明智地认识到这些联合体具有高效力的表达垄断地位。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把这些实践描述为自由联合政体、新联合政体，或整体**多元政体**。至于这些自由联合政体实践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暂时特征还是永久特征，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

参见：“天主教政治思想”。

宇宙学（Cosmology）

宇宙学（古希腊语，“关于宇宙的研究”），直到仅约 400 年前，一直与臆测和宗教断言方面的问题相关。在缺乏任何**科学方法**的理念以及任何工艺学来帮助调查研究或计算——更不用说从来就没有构想过对那些事物的任何需要的情况下，古人发明了关于宇宙如何生成，它像什么样子以及它如何运作的解释。上帝或神创造了宇宙：如果受到催促，专家们会给出一个特殊的日期，例如通过在时间上回溯世代一直到“原初的推动者”或推动者们。那些专家中的少数人，的确曾以我们现在可能会称为科学的方式来推测天堂，显示出把理智推理置于调查和分析实际现象之上的倾向，并这样制做出宇宙的图画，给出对宇宙现象的描述以及它们的原因，这一切都像任何**神话**一样地富于幻想。

在所有的社会里，一致的观点是宇宙以地球为中心——实际上，在某些观点中，地球就是宇宙，并且宇宙中的所有生命物，

包括安排它的超自然存在物，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我们人类自己拥有的偏见。(超自然存在物更大些，存在于必死者的时间之外，具有魔力，但本质上仍然是我们自己的折射。)最重要的是，在人类的设计方案中，人们相信宇宙是由有知觉的存在物控制的。这些观念的形形色色的形式，仍然存在于某些宗教的信奉者中，或是（不安地）与现代科学宇宙学的发现并列在一起，或是（得意洋洋地）与其相对立。**伪科学**也极大地利用这类观念：仅仅100年前，人们曾激动地谈论着火星上的灌溉运河，并且现在仍然有人相信，像秘鲁的奈兹卡线这类事物是外星太空船的着陆地点。

理性的宇宙学，大约开始于400年前的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工作。他们对天空的观测表明，事实与已存在的宇宙学理论不能吻合。牛顿和其他人接下来开始探索自然的物理定律，研究像行星运动和光的本质及属性之类的事件。科学宇宙学的第三块基石，产生于18世纪后期，当时哈顿及其他人证明，地球——以及通过暗示，它是其一部分的宇宙——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比以前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更为古老。从这一起点开始，科学知识以指数的速率突飞猛进，并且在**天文学**、**生物学**、**化学**、**地质学**和**物理学**中的每一新发现，都重新定义和澄清关于宇宙的起源、本质和功能的真实图画。

在写作此文的此时——而这一图画仍将随着每一新的研究成果而变化着———致的观点是，宇宙开始于约150—200亿年前的一次惟一性的爆炸，即“大爆炸”。我们仍然能感觉到来自于这一大爆炸的回响，它的残留物，仍然在向外扩散，因此，宇宙既是持续地膨胀着又是无限的。某些科学家预测，当已存在的天体的引力牵力与仍在运动的残余物的速率达到平衡时，膨胀将结束，而静态平衡将开始。这一可能的事件，将是“大转折点”，

没有人能预见到随后发生的事件，除了可能会有能量的另一次聚集导致另一次“大爆炸”，并如此以至无穷。

咨询疗法（Counselling）

精神病学中的咨询疗法吸收了**心理学**其他各个领域中形成的方法，这些方法非常接近护理、倾听和反省等帮助技巧，为了创造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并对病人有所助益，同时尽量少做指导和劝说，咨询疗法致力于使病人形成对其自身问题的洞察，并通过用一种全新的目光看待自己的生活，在自身发现症结所在。

精神疗法倾向于关注深层问题，而咨询疗法则关注特定的当下问题，它提供全力以赴的帮助，利用各种帮助技巧，如通过询问发泄个人痛苦并赋予不幸以意义，人们发现，这种简单的方法能够缓解**焦虑**并释放**压抑**。咨询者和临床医生扮演了曾经由长老和牧师扮演的角色。

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弗洛伊德最先使用“反移情”表示分析者对其病人所具有的那种难以预料和难以分析的情绪。由于反移情反复重现的性质，精神分析学派越来越相信个人的分析对于分析者与对于其委托人一样重要，个人分析现在是精神分析训练的必修内容。分析者本人的移情以及对其病人的投射作用，仍然被视为治疗过程中的歪曲因素。在精神分析活动中，反移情也被可发挥积极性作用，正如病人在分析者身上激起的情绪也被理解为其与他人互动作用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可被作为精神分析的材料一样。分析者对其病人及其行为的情感态度和反应被作为临床依据：分析者或临床医生

的这些反应被视为对病人的意向和意旨的反映。

约（Covenant）

犹太人相信：他们和上帝有一种永恒的关系，上帝在挪亚洪水后与挪亚立约，应许地上不再会有类似的洪水。犹太教的传统相信：内含在那约里的是七条诫命，世上的义人如果遵守这诫命，它们便会确保这些人享有永生。这些诫命，禁止杀人、奸淫、乱伦、拜偶像、起假誓、偷窃和虐待动物，要求每个社会建立公义的律法体系。后来，上帝和犹太民族、亚伯拉罕的子孙签立了更详细的约。

最初的基督徒接受了约的概念，主张耶稣以他的宝血为印建立了新约。这新约的记号，就是基督徒像耶稣命令他们那样一起掰饼、分享酒杯时的圣餐。基督徒的圣经，结果以希腊语的“新约”著称（英语翻译为‘Testament’——圣约书）。1638 年，苏格兰激进的长老派，反对查理一世、他的主教们以及《公祷书》，恢复了约的概念，让他们的支持者签了一个约，这些人因此称为“国民誓约派成员”。

参见：犹太教。

工匠（Craftsmanship）

工匠（这一术语在时间上早于平等主义者的用语如“工艺工人”）是从事技术性工作的手艺人，技术性手工劳动的从业者，如石匠、木匠或细工木匠。定义“工匠”的尝试，或许尤其是作为区别于“艺术家”的尝试，有一个显赫的谱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关于“艺术理论”的讨论，描述了三种制造者：上帝

——制造理念的形式（它们具有完美的品质，存在于另一不同的世界）；工匠——按眼睛看到的形式制造，例如，一张床；和艺术家，他模仿工匠所创造的东西。作为技术代表者的是使用者，制造者和艺术家。工匠是物品的制造者，他从使用者那里获得指令。

所有时期的伟大建筑物的建造史清晰地表明：一个建造能手常常在建造过程中扮演**建筑师**、勘探员和工程师的综合角色，并且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词“建筑师”本身源出于古希腊词语（tekton），指称建造能手或工匠工头。在西方历史上，近代初期的建筑师常常是石匠能手的儿子，由于受过教育和社会的偏爱，他们被看作是建筑的职业设计者，而与从事手工劳动的工匠区分开来。

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对这类观念或柏拉图之分类法的有意忽视（或无知），许多“美术”的权威们——实际上是许多手工艺人自己——趋向于把技艺看作是不含智力因素的手工劳动。17世纪，法国绘画与雕塑学院的创建者们的态度便极为典型：他们把行会艺术家们贬低为缺乏“发明和学习”的“工匠”。由于几乎完全忽视了美术的确立，是为所有种类的**民间艺术家**这一事实，这种区分得到强调，他们把民间艺术家（如果没有忽略的话）归类于技艺的从业者而不是艺术的创造者。

19世纪，这种态度继续存在于欧洲的艺术机构，并且在建筑领域产生了一个相似的在“工匠”和“建筑师”之间的区分。这部分地归功于职业的建筑协会和检测会的创立，也部分地缘于土木工程和勘探测量作为独立职业的日益崛起。这一时期的几个群体，例如英国的**艺术和工艺流派**，的确试图通过提高手工艺的地位而沟通“工艺”和“艺术”之间的鸿沟，其目的在于：面对机器生产的挑战，重新捕获传统的手工艺人对质料的把握——就

像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艺术工作者协会的座右铭所说的："正确地使用材料"。具有代表性的范例，有莫里斯的印刷和装订活动（使用谷登堡会立刻理解的方法）和19世纪晚期吉姆逊的科茨沃尔德工作室。后者使用家具设计的传统方法。

不幸的是，这类**乌托邦**的设想，在与经济的必要性相遭遇时渐渐被淹没，而"工匠"这一老观念也没能引起影响。的确，20世纪建筑和设计的发展，从**包豪斯**和科比西埃以降，已使机器生产程序进入技巧和美的层次，似乎不需要从以前的风格或观念中借用任何东西。在当代的用语中，"工匠"的观念已失去它的尊严，变成了指称一种过时的传统主义的广告词语。不过，最近女性艺术家和女权主义批评家已为"工艺"的观念恢复名誉，把它在美术面前的卑屈地位，看作是工匠自己在不公正的社会和政治统治中的卑屈地位的反映。

创世论（Creationism）

创世论认为：宇宙及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就像《圣经》中的《创世纪》所陈述的那样。**基要主义**的基督徒认为：创世的发生精确地如所描述的那样在六天内完成。科学的创世论者更严肃地提出：宇宙是如此地复杂与丰富，它不可能是通过偶然的或是像**自然选择**和**均变论**这样的过程而产生，这些因素指向一个目的并因此趋向一个目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第一因"。尽管论辩中插入的超自然力是反理性主义的和反科学的，并且尽管迄今为止所收集到的所有的科学证据支持反创世论的观点，仍有大量的人们，包括科学家在内——包括那些在其他方面并不偏向于宗教信仰或实践的人们——相信创世论。

创造力（Creativity）

创造力（源出于拉丁语 creare，“〔从无中〕制造出来”），在制造某种东西能表达某人自己的天才或才能的意义上，曾被认为是独属于上帝或神的领域。惟有造物主能够创造，人类（他们自己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只能模仿，不能开创和创造。因此，想象力的作品，是神人关系的一种反映或副产品，并且它们所具有的任何美或理智或情感的力量来自于那种关系。的确，在许多社会里，宗教因素对创造力是有力的刺激：艺术家的工作，要么直接服务于诸神，要么服务于具有宗教含义的庆祝活动或其他社会仪式活动。甚至当艺术被世俗化后——例如，像印度莫卧尔人的宫廷绘画，或日本的舞蹈戏剧——仍保留着一种宗教性的因素，创作者们经常认为并在行为上显示出：他们自己不是神的助手，而是某类半神圣的神秘事物的助手。

这种恭敬的精神，使创作者们实际上作为有独特见解的、“有天才的”人，像（例如）荷马或费迪厄斯一样进行工作。当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写道，他的作品将成为“比青铜更持久的墓碑”时。这一短语，并非是一个包含傲慢或自觉之暗示的直接隐喻。贺拉斯并非声称自己是天才，而是把自己比作为手工制作墓碑的铁匠或是委托制作墓碑的当事人；正像其他人的墓碑是青铜制作的，他的诗也是如此。古代的艺术家们——从艾克塞凯斯到海亚姆，从瓦柴晏（Vatsayan）到紫式部夫人——鲜有或从不使他们自己之重复性的观念侵入他们的作品。如果作品是美的或宏伟的（他们的沉默似乎在暗示），这些都是内在于质料、主题或技巧中的品质，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力的显示。吹嘘他们自己的杰出的古代艺术家们，仅仅是像阿里斯托芬和奥维德这样的人

——而引文的出处是滑稽的喜剧，创做出来是为了诋毁对手和引发大笑。日本的画家和雕塑家，甚至于那些匿名创作者（绝大多数在古代），习惯于在其每一作品中制作一故意的“错误”——一条稍微歪斜的线，一小点浸染，一个折缝，一个微小的色彩变化。这并非是对自我权力的宣称；其目的在于使作品而不是艺术家从其同类中作为惟一的一个而突显出来。以相似的方式，当欧洲中世纪的石匠或木刻匠，通过把他们自己描绘为面貌丑恶的人，或是在基督的马槽上的崇拜者之中，或是在最后的审判中叫嚣着渴望宽恕的拥挤的灵魂之中，而给他们的作品“打上印记”时，他们并非是在宣称他们已创做出来的作品是属于他们的，就像他们属于作品一样；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把自己嵌人作品所表现并鼓励的普遍崇拜和恳求之中。

这种情感，即艺术家（无论多么独特的兴趣和才能）是创造的连续体中的一部分，在欧洲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而在东方持续得更长，比西方多达数世纪，直到他们开始吸取并改造西方的观念。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艺术权威们谈及创造力，是把它当作一种罕见的、天生品质，它把其拥有者与日常人们的野兽般的本能区分开来（实际上是置于其上）。哲学家和批评家（如瓦萨里），苦苦追求使“艺术家的塑造之手”像是表现于从普拉克西蒂利到乔托的几乎任何人的作品之中；16世纪诗人塔索更坦率地指出：“有两个创造者，上帝和诗人”。试图确认什么使得想象力的作品变成“伟大的”（即，挑战并满足于鲜有他人能匹敌的程度），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认为，这类作品的创造者自己，可能是“伟大的”和独一无二的个体这样的观念。创造者们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些人（像16世纪意大利作曲家帕利斯特里纳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布鲁尼莱希）认为自己就像创造者一直所是的那样，主要是有技术的手工艺工作者，是其赞助人和其艺术的仆

人；另一些人（像米开朗其罗或蒙提涡蒂）觉得并说到：他们已远离了普通的甚至是创造性的艺术家群体，他们不得不与之争斗的不仅是艺术的质料，而且还有他们自己的创造勇气，以创造出他们的作品。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创造性艺术家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天才有一种鲜活的感觉，并愿意表达这种感觉，因此一种艺术家的自大狂傲，一种有创造力的浮夸凌弱，内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艺术（并且的确内在于像德拉克或瑞赖格这样的人的行为中，他们以如此大量的词语宣称，他们的极端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

从文艺复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持续发展的趋势，是在艺术和手工艺之间、“创造性”和“实用性”之间制造鸿沟。从事于曾被认为是纯粹的手工艺职业的人们——例如建筑师和园艺设计师，现在已被常规性地描述为仿佛他们是艺术家，并且具有天才。例如，高迪和罗厄被认为更接近于毕加索，而不是建造巴黎圣母院或紫禁城（中国故宫）的匿名石匠。几乎每一种艺术形式，从舞蹈到雕塑，从诗歌到波普，都被创造力的杰出方面的等级和范畴所困扰。这类讨论，有时被置换为对创做出来的作品本身的鉴赏。现代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在他们能够开始创作之前，也不得不极其重视与过去的“天才作品”之间的妥协。总之，尽管这种变化对于艺术所做的工作，或对于他们收到的报酬几乎没有产生作用，但它却彻底改变了“有创造力的”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过去，他们在其所做的工作中获得反映、定义和实现；现在，在你开始创造之前，你必须建立一种关于你的艺术的态度，关于它的现实状况、理论、过去、现在和市场——实际上，你必须建立你自己。

参见：美学；文化；天才；趣味。

创造力和游戏（Creativity and play）

对**创造力**的定义是对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挑战。弗洛伊德将创造力视为性本能的升华，这一解释由于没有指出人类的高贵品质是什么而失败。英国精神分析学对象—关系学派的温尼科特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在母亲和孩子之间存在一个潜能空间，正是在这里孩子学会了游戏，游戏是创造力的先决条件。温尼科特认为与现实健康的关系是一种创造性的关系，那些对现实牢骚满腹并认为自己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病人，其精神状态是病态的，并对一切都不以为然，觉得一切都无关弘旨。

由于认为游戏与疾病和疾病的恢复密切相关，温尼科特还发现精神分析学关于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区分并未充分地涵盖游戏和创造的经验。在她看来，游戏导致文化经验、鉴赏力和创造活动，游戏消除了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界限。当孩子开始与母亲分开时，也就是说，当孩子不再觉得世界是其本身的延伸而是开始认识到其疏离性时，母亲对孩子的细心呵护，为孩子创造了一个潜能空间。如果孩子仅有贫乏的经验，在温尼科特看来，除了**内向性和外向性**之外，孩子就一无所获。精神分析者和临床医生的任务就是为病人提供这样的游戏天地。

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在**语言学**里，根据关键期假说，学习语言的能力，受生物学上所划分的时期的限制。这个时期，从大约 18 个月直到青春期的年龄阶段。关键期的概念，得到生物学上成熟阶段的概念的启发，凭借这一点，人的发育过程遵从基因决定的顺序。不过，基

因程序的表达，要求相应的环境条件。因此，研究者主张：在关键期缺乏通常的语言表达的情况下，其结果，自然是在生物学上不可能正常地习得语言。

关键期假说预言：成年人中致使丧失语言能力的大脑损伤，在幼儿期不应该具有这么严重的灾难后果。这是因为：儿童的大脑，一直是由各种成熟力量塑造而成的，与此相伴随的适应性，允许大脑的其他部分接替，并通常或多或少随着发育而成形。不过，研究者已经发现：幼儿期大脑特殊部位的受伤，会导致语言能力的永远削弱。此外，比较年轻的人的大脑的适应性，同成年并不是完全相分离的。事实上，目前不存在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青春期阶段有一个决定性的中点，即一个语言学习不可能的点。

批判的乡土风味 (Critical regionalism)

建筑学里，批判的乡土风味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条**后现代主义的**戒律，强调设计一座新的建筑时，必须对该建筑地域所处的现成的自然语境给与注意。

批判的乡土风味，并不等同于19世纪晚期本土的复兴，因为它不号召回归本土的建筑样式。它也不和现代技术学对立。它是对**现代主义**的全球一致性的一种反动，一种“国际样式”的意识特征。这种国际样式，努力打破民族主义的障碍。后来，观察家们注意到：如果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去旅行，那么，他们将不可能认同国际样式，但只会后悔对他们的本土文化没有任何注意。“批判的乡土风味”这个术语，是由措尼斯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明的，并同批评家弗兰普顿的理论著作相一致。弗兰普顿如此描述批判的乡土风味：“乡土风味，支

持个别的和本地的建筑特征，反对更普遍和抽象的东西。”

参见：背景主义。

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的方式与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学**有关，但**批判**概念却远较这一思想流派古老，它指否定性的判断。

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期间，文本批评发展为宗教斗争的武器，《圣经》批判继承了教会实践和教条的消极的但同时又是客观的判断。对黑格尔而言，批判意味着揭露被掩盖的偏见、置疑对于**权威**的要求，因此，也就是一种社会解放的途径。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批判的观念，并指出，仅仅解释世界还不够，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源于对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的不满，后者将批判作为对共产党的政治决策进行辩护的手段。批判理论的理论前提是，为了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的自我理解进行重新估价和批判。批评理论的主要鼓吹者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拒斥那种中性的、非政治化的科学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科学以事实和价值的分离为基础，他认为真理问题与自由交流和观念的交换这一政治问题密不可分。

参见：话语；统治的意识形态；霸权；意识形态；合法化；实证主义；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

批评（Criticism）

批评（出于古希腊语 krites，“判断”）是一种可以持有完全

相反意见的活动。它既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文化生活的重要担保人，也可以说是真正的知识活动的一个横切面，即使不能说是寄生于它。亚里士多德关于**戏剧**的著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著述，寻求的不是对戏剧创作的批评，而是对已经创作出来的戏剧的类型做出总结，并从中推断出关于戏剧的目的是什么及其如何才能实现的一种定义。这样，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某些一般性的观点，它们后来被许多代的剧作家和戏剧鉴赏家们奉为圭臬。实际上，在现在对戏剧进行抽象讨论的任何时候，它们仍会被慎重地提到。

另一方面，由于封闭了思想和创造性探索的大道，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产生了巨大的（不是故意的）危害。对今天来说，对古希腊戏剧的学术鉴别，把那些剧作与他的评论相关联，而不是与任何其他相关因素联系起来的诱惑，已成为一种束缚。另一方面，在后世对其"原则"的理解和奉行的努力中，已导致了某些西方最优秀的戏剧的产生。亚里士多德的工作，一直是各种新的创造性工作的起跳板；如果没有他的工作，这将是人们几乎不能想象的。也许，这就是被自负地许为"高雅的"批评所应该如何开展的范例——这种活动被19世纪诗人兼批评家阿诺德定义为："一种为获悉和繁衍世界上所知道并认为是最好的东西之公正无私的努力。"

这种批评，是**经院哲学**的一种形式；而像这样的形式，已几乎完全被逐出科学的思想领地。它仍持存于**艺术**领域，并且许多批评家追随着亚里士多德的足迹，对创作界产生着强有力的和积极的影响。然而，这类批评家中的最优秀者认识到，要"努力……去获悉和繁衍世界上所知道并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必须是一种自我校正的运作，批评的看法应当是暂时性的；谦逊，不应是创作者的而是批评家的品质。可叹的是，这种观点并不为批评

家或那些阅读其著述的人们普遍持有。19世纪维也纳作家汉斯里克自视为（并被他人看作）是一种拿破仑式的音乐批评家，领导着理性的常识的大军与瓦格纳式的敌人作战。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艾略特说起话来，像摩西颁布十诫一样，宣布关于“高雅”文化的观点，从那以后他的观点已把英国文学搞得混乱一团（艾略特本人，既是一个批评权威又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在其生命的晚期开始贬低并拒绝承认他自己的观点）。批评中最糟的例子，也发生于英国，即20世纪70年代初期艺术史家克拉克在标题为《文明》的一系列电视节目中，对“文明”进行定义的尝试。他非常突出地把文明定义为大约在1400年至1900年之间的西方欧洲的绘画、建筑、雕塑以及（勉强地）音乐、戏剧和文学。问题不在于那个节目，而是那个标题和遍布世界的成千上万的人们从表面价值上接受它的这一事实，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关于什么是“文明”的荒谬地歪曲了的、独断的贵族观点。

克拉克的节目，一个寄生于大象身上的跳蚤去描述大象的显著的例子，是目前发生于世界各地的许多错误“批评”的共有症状（世界的其他地区，已经接受了西方关于批评是什么以及它应如何进行的观点。甚至在其文化明显不是规范性和定义性的国家中——闪现于人心的有中国和印度——对艺术创造的基本原理的探索，以及在此方面基要主义对正统观点的传播，与那些习惯于无论是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在此例中的艺术的规范主义的国家，一样流行。）我们已经把批评家变成了占卜者，并紧紧揪住他们说出的每一个词。阅读X的关于悲剧死亡的“高雅”层次的观点，或是Y的关于昨晚的竖琴独奏的“通俗”水平的见解，并无任何不妥，只要我们从来不把它们错认为是他们所寻求描述的活动的一个分枝。

交换（Crossing over）

生命科学中，交换概念是遗传信息重组的核心，它发生在有性繁殖的过程中。当特定的配子形成细胞生成配子（即精子或卵子）时，相应的遗传信息将发生交换。与该机体的其他细胞相同，配子形成细胞为双倍体细胞。当精子与卵子结合后形成受精卵，受精卵中每对染色体为两条具有成对等位基因的相同染色体（人体有32对染色体）。受精卵经过多次分裂，形成机体的所有细胞，这些细胞均具有成对的染色体。

交换可出现在配子形成细胞中同源染色体彼此分离前，此时同源染色体呈线形紧紧地连在一起，这就为DNA双链的断裂和重新联合提供了机会。在这一过程中，DNA双链不是在染色体断裂处再次连接，而是在对应的等位基因间相互联合。因此，当等位基因发生分离时，每一条染色体都将拥有对应染色体前半部分的某些DNA片断。所产生的配子为单倍体，具有既来源于精母细胞又来源于卵母细胞的基因。

交换过程增加了子代间的个体差异，也是**进化**过程中产生变异的最重要的来源。

参见：基因，遗传连锁，减数分裂。

密码术（Cryptography）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密码术领域就是**数学**和**计算机**最重要的军事应用之一（希腊语，“秘密的书写”，或“隐藏的书写”）。到20世纪为止，战争中所用的密码，通常是简单的代码：原来是相同的字母，密码电报中也用相同一个字母来表示。无线

电的出现，意味着发出的信号可以被甚至不知道发送者的任何人用一个具有同样波长的接收机截取，加密变得更为重要了，这导致了所用密码复杂性的迅速提升。例如，密码电报中代表原来特定字母的字符，可以靠许多其他东西，而不是它所表示的那个字母得以表达——日期和时间，电报中的位置，电报长度，发送者和接受者的身份等等。这对密码破译者提出了严峻挑战，于是日益复杂的统计方法开始应用于破解新密码。随着 20 世纪 40 年代一个包括**图灵**（1912—1954 年）在内的小组破解了谜语密码，密码破译遂成为数字计算机最初的主要应用。

密码术不仅仅具有军事用途，在当今的数字通信领域，它也很重要。密码术的主要需求，是把信息编码为尽可能短的 0 和 1 的序列，传送中出现错误时纠正讹误，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防止被竞争公司翻译的诸种方法。

参见：**编码理论**。

立体主义（Cubism）

立体主义，20 世纪西方绘画风格的最完美的典范之一，肇始于塞尚后期作品中不断增加的几何构图倾向，而后这一兆头，于 1900～1910 年时期经由布拉克和毕加索（他的《亚威侬的少女》（1907 年）被普遍引用为第一批“正式的”主体主义绘画之一），获得了充满活力的发展。立体主义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现实主义**的重新定义而重构再现的方式，以展示物体的立体真实性而不仅仅是它们的外观。其技巧的开端，把艺术家想要描绘的（房子、树、水果、乐器、面部等任何种类的）物体分割成光和色的块面，与以前任何一种艺术都完全一样。然而，在立体主义作品中，不同的块面得到强调并相互分离甚至具有边界线，直到

几何形状统治着完成了的画面。（也是这种立体形，使这种风格获得它的名称，其中圆柱体、椎体和球体是常见的形状。）因此，在它的第一阶段“分析的立体主义”中，立体主义抛弃了**文艺复兴**的绘画空间传统，宣扬一种对此主题的多重视点的探索，从多种角度展示存在于二维绘画空间的物体，通过平面色块的相互重叠与相互联结，清晰地表明对画面的平面性本质的尊重。在它的第二阶段“综合的立体主义”中，它离开了对自然状态的物体的再现，转向在与其他客体或质料的关联中，对客体的质料本质的透视。综合的立体主义，通过包含“真实的”元素诸如墙纸碎片或新闻图片，而强调它的非幻觉的日常事项。〔因此，布拉克的《桌上静物》（1913 年）中包含有一报纸条，它的原始意义即它是一张报纸这一事实，但是一个引申的意义，是在一幅画中“再现”一张报纸，并最终提供了一种在绘画空间里的结构设计方式。〕

在其最极端的作品中（例如，毕加索的《抽烟斗的人》或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对于未被说服的观看者来说，一幅立体主义者的画，似乎只不过是一堆混乱的形状，它们很难与画的标题扯上联系。在其最有具象性的作品中（例如格里斯静物画中，格子图案的桌布、盘子和水果），一幅立体主义作品也只不过是对形式征服内容的愉快的强调。即使是在其最优秀的作品中（例如，毕加索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杰奎林的系列肖像作品中），它也只不过是变成终结 18 世纪前大画家手中的**透视法**的手段而已。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显示的创造艺术作品的可能性，即不再把自然悬置为最终的兴趣，而是把作品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意义的核心。在此意义上，它确立了美术领域自莫奈以来的**现代主义**的主要方向，并预示了**抽象**和格林伯格的“纯”绘画观念的发展。几乎不存在立体主义**雕塑**，并且，如果

说有的话——像利普希茨的作品——它所表达的不过是，在平面上的颜料，为这种明显的三维式样保留了观念的媒介。

膜拜/教派（Cult）

膜拜（拉丁语为“崇拜”或“虔诚”之意）在英语的宗教与神学著作中有两个明显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含义，类似于宗教虔诚一词的使用：热切地崇拜或献身于一位特殊的圣徒或神。人们认为：这样的人具有行神迹的大能。例子包括“法蒂玛我们的圣母”崇拜（**圣母马利亚研究**）、印度的穆斯林圣徒崇拜（他们的墓地被尊奉为圣陵）、在印度班加罗尔显灵现身的萨特亚·赛伊·巴巴崇拜。这样的膜拜常常是地方性的，基于一个特定的圣陵或纪念一位地方人物，成员依然是主流**教会**或**宗教**的一部分。

第二个含义，是作为对现在众所周知的新宗教运动的描述，或指较早的著作中处于主流教会之外的一个异端**教派**。它通常带有神秘的教义和崇拜仪式。古希腊—罗马世界的狄俄尼索斯崇拜便是一例。这种含义，已变成贬义的，因为修行者们的反对，它在严肃的研究者中正遭到废弃、不用。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膜拜一词，也同**神秘学**有着一种暧昧的联系。

文化灰视（Cultural grey-out），参见“音乐涵化”

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

文化相对主义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提出的。博厄斯在20世纪初建立了人类学的文化学派，它强调不同文化体系之间

差异的排他性质。博厄斯批评进化论人类学家的过分普遍化倾向，认为在企图指出各个社会的相似性之前，应该对每一社会作详细的记载。在20世纪初，美国的人类学家投身于对历尽战争和疾病等浩劫的印第安社会的文化遗存进行保护，对其生活中保存下来的东西进行记录。这种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详尽记载，以及文物和仿制品的收集，为现代人种志博物馆的展览奠定了基础。

文化相对主义兴盛一时，当时它对文化进化论关于“原始”社会的思维模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代之以对一个社会的“特殊性”的强调，不再致力于对那些据说是普遍的观念的广泛的跨文化比较。在最近几十年的人类学论争中，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与文化普遍主义的观念针锋相对，前者怀疑西方的准则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用来评价其他社会体系，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文化系统的多样性意味着，只能根据每一社会自身的价值和信念体系对之进行评价。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逻辑推到极端，拒绝超出一种文化体系的范畴将之置于广阔的范围进行评价，或拒绝将当前图景置于历史语境中，就可能成为美化现状的借口。人们指责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预设，即认为社会之间的界限是自然固有的，就像美国的印第安社区名义上被“封闭”于保留地那样。

参见：文化；进化论；语言。

文化（Culture）

文化，源于拉丁语 Colere，意为“习惯”，“耕作”，“保护”，“具有令人崇敬的品质”，但在英语中它是用得最多也用得最滥的词语之一。随着语境之变化和使用它描述它的人的不同，其意义不仅模糊而且多变。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文化是指能在体外媒

介中生长增殖的活细胞和细胞组织。在**考古学**上，文化是在封闭的地域所发现的或者被认为出自同一年代而又彼此相关的人造物品的收集。物质文化与特定的社会集团相联系，作为整理物质资料的工具，尽管当代许多考古学者更加怀疑人造物品与社会的简单等价关系。

上述全部含义过滤为**人类学和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意义：即为特定的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1871年，人类学家E·泰勒所下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后天获得的一切其他能力和习惯。"泰勒定义的问题是以欧洲文化为一切文化的蓝本。为了以智力、精神和审美性质来描述群体的一般发展，就暗含着西方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它暗示"原始"文化为了达到欧洲文化一样地"开化"就必须经历一段发展过程。

这些进化程式后来被取消；人类学家现在把文化当作一个中性词来使用，描述一种观念、价值和行为系统。20世纪早期相当长的时间内，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把文化对立于社会。在他们发展社会科学方法的志向中，文化被看作是一个随意的模糊的术语，而社会被用来指代功能角色、结构和组织；但是对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文化被认为与社会同义。

更近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抨击文化作为分散又有联系的东西而存在这种观念，因为文化是一种并不对应于社会生活现实的发明。它既不允许一个共同体之内观点的差别，也不真正考虑共同之间的关系。同样，人们也不相信如下假设：社会作为由统一角色和制度构成的约束体系而起作用。文化差异也反映在亚文化（Subculture）、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和个人文化（Personal Culture）的流行区别之中：**亚文化**与群体的不同价值、表

象和行为相联系，这些群体的自我认同对立于更广大也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反主流文化**描述那些蔑视多数标准和价值的人们；个人文化描述个人利用文化环境和与文化环境相联系的方式。

当与自然配合，文化就被当做像营养一样，考虑到人类思想和行为受到环境条件而不是生物构成的影响程度。在结构主义理论中，存在着发现心灵统一秩序原则，自然文化的区别被转换用来标明人类在分开社会成分和外于社会成分的方法。是人类决定了什么是自然，因为自然并不是自我决定的东西。在这一点上，M·萨林斯提出了最有用的论断："对文化而言自然是文化利用自然而创造的东西。"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出现了两种非常有趣的社会学现象：第一，（尤其在西方）是以古老的批评概念即文化天生关系着**艺术**和"高雅艺术"的观点对现象学文化观点进行阐释，也就是说，文化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全部经验；第二，在一种反常的方式上，（具有全部短暂性和转换性"产品"的）西方大众文化（如电视、**广告**、时装、消闲、社会活动）比早期帝国时代的西方"高雅文化"更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世界。大众传播、人造物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全球市场化是前提，它们已经统治了全世界的"文化议程"。

直到最近，在某些大学和其他文学亚文化团体中，从这种发展中出现的大众文化仍然被蔑视，被看作劣于仅仅体现文化精华观点的"高雅文化"。担心是经常存在的，在任何社会都是如此，因为文化被社会化过程所吸收，因为大众传媒在这个过程中占有中心化的有力地位，传媒的产物可能仅仅反映了控制或消费文化的统治群体的文化。这可能窒息那些不想屈服于主导观点的人们特有的文化价值。这可能是悲剧，但是这不是因为它对无聊大众阶层的影响（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而今大众阶层感到他们的文化

被边缘化了，就像他们从前对待大众人口的文化一样只能退而求其次），而是因为，让我们更严肃地说，它导致了对全世界少数人立场、少数集体的心灵习惯的侵蚀，甚至灭绝。

说到底，文化也许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文化，而是我们所生活的文化。作为一系列对于尤其在社会行为和精神活动领域存在的信念与生活方式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判断，文化是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除非其他生物也做出这种价值判断），因而文化不可能是客观的。文化是一个范例，证明等级化和分类化冲动是人类心灵的特征，也是我们乐于通过规定和排除的行为定义自己和他人的特征。在古希腊，说希腊语的人宣称，同（那些说话像狗吠的）“野蛮人”相比较，他们才是“文化的”；但这些野蛮人是怎样看待希腊人的，已无文字可考。在另一些地方，在特定的时代，作“文化人”就是成为日本皇室的成员，就是信仰伊斯兰教，就是成为欧洲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做西方人，欣赏贝多芬而不欣赏甲壳虫，研究艺术而不研究科学，拒不接受“死人、白人、欧洲人或男人”生产的一切（自然或精神的）制造物，服从社会特有的礼节规矩，或者，在每一种情况下，与对立物相峙而存在，做相反的事。

19世纪英国诗人与批评家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一书中写道，文化就是“研究人类的完美”——他进一步把文化定义为与本能相对立的理性的运用。（在这个定义中，理性的即包括理性的权力意识，“实用性”和本能意识。）在阿诺德看来，文化人要发展个人意识，为实现道德与精神的完善而奋斗。在阿诺德的著做出版70年之后，在追求一种不同的完美过程中，戈林（误引海因茨·约斯特的诗句）说：“我一听到‘文化’，我就拿起枪”。这也许形象化地表现了“实践”的（非文化?）人对自恋而又追逐时尚的经院哲学的反应，对于学院精神言之，重新定义文

化就是这么一种顽固的极其恶劣的典型。

参见：同化，批评，文化相对主义，传播论，统治的意识形态，种族特性，进化论，功能主义，霸权，意识形态，内在化，解释人类学，亲属关系，传媒，自然主义，自然/文化，规范，宗教，角色，性行为，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社会化，社会/社会学问题，社会，社会语言学，结构主义，亚文化，趣味，旅游人类学，价值，工作。

细胞学（Cytology）

生命科学中，细胞学（源自于希腊文 kutos，意思为“容器、脉管”＋学）是研究活细胞的科学。据 1839 年德国生物学家施万和施莱德提出的细胞理论，细胞是所有生命的基本单位。他们认为所有生物均是由一个或多个细胞组成。1855 年菲尔绍进一步指出，细胞只能形成于先前已存在的细胞所产生的细胞分裂。1892 年德国解剖学家赫特维希提出，机体的功能实际上反映了构成机体的细胞的功能。至此，细胞学作为一门科学被建立了起来。现代细胞学包含对细胞新陈代谢的研究以及对细胞遗传防治的研究。

生物细胞通过由脂质分子组成的细胞膜与外界隔离，细胞膜以内的部分为含有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分子的浆液（细胞质），细胞质内互不相连的膜包围结构称为细胞器，所有细胞都含有**细胞器**，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包括能量储存、能量转换和蛋白质合成。高级细胞（真核细胞）具有细胞核，细胞核为一种膜包围结构的细胞器，它含有能携带遗传物质（如 DNA）的染色体。细胞核与细胞质间的联系由 RNA 完成，RNA 以可用的块状携带遗传信息离开细胞核进入细胞质。低级细胞（原核细胞，如细

菌）有少量的细胞器，且无细胞核和染色体，其遗传信息以DNA和RNA的形式存在于细胞质中。植物和细菌细胞在质膜外有一层坚硬的细胞壁，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它是靠网状结构使质膜坚固。网状结构可以起支撑作用，也可收缩使细胞运动。细胞具有如下特征：它们能根据各自的功能进行分化，尤其是那些复杂的多细胞生物的细胞；这样，肌肉细胞含丰富的能收缩的肌原纤维、线粒体以及能将糖代谢转换为可用能量的细胞器。

D

达达主义（Dada）

达达主义（原义为“木马”），是1910—1920年期间的一个反艺术的艺术流派。它开始于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苏黎士寻求避难的一群艺术家的合作，其中有罗马尼亚诗人查拉，法国美术家阿尔普和德国作家保尔。1916年，保尔创办了伏尔泰夜总会，在那里达达派宣布它的诞生，并通过出版宣言、手册和杂志获得支撑（它的无政府主义的文字和图样，后来在前卫圈内极富影响力）。1917年，达达主义扩散到欧洲的其他地区和欧洲之外的地区（最显著的是澳大利亚和美洲）。查拉和保尔在苏黎士开办了达达画廊，皮卡比亚在巴塞罗纳出版了杂志《391》，而杜尚在纽约创办了杂志《盲人》和《错·错》。战后，在德国以施维特斯、阿尔普和恩斯特为核心，达达派的影响日增，而在法国，布雷东和阿拉贡使巴黎的达达派生气勃勃。

达达这一名称，号称是用小刀在字典中随意乱戳而选定的，它被用于象征其反理性的、无政府主义的和反传统主义的立场。这种理念，是想要通过嘲弄中产阶级的艺术标准而将其颠覆。达达主义者，发表随机选择的字词组合而形成的无意义的诗歌；展出像杜尚1917年的《泉》（一个签上“R. Mutt”字样的便壶）或是堆在凳子上的自行车轮之类的“被发现的物品”，并演奏由粗厉的噪音和混乱的喊叫构成的反音乐。这些惊世骇俗和无理性的策略，向即定的艺术价值观（如对美的崇拜）发出挑衅，达达派将其看作为与20世纪的军事化和工业化文明共谋的伪批评。

达达运动本身，是关于几十次展出、一些出版物和夜总会的表演的短暂的潮流，1919年后，达达主义者的工作开始初步的制度化（例如，1920年达达派并入巴黎独立沙龙），并且其分裂震惊的策略被以并置组合为审美原则的新兴趣所取代——这种审美原则，在1923年以后，显著地表现于**超现实主义**。在上述的双重影响下，达达的虚无主义原则有所收敛。尽管达达主义的生命不过是艺术中的一种蜉蝣之舞，给人以异化、挑衅和艺术即“偶然发生”的感觉，但它所带给我们的艺术经验，像是种子，生长于**荒诞戏剧**、**立体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中。——事实上，生长于本世纪的每一重要要艺术发展中。

舞蹈（Dance）

舞蹈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模式化的运动。人类学对舞蹈研究的贡献在于它将舞蹈视为一种社会事件，而不仅仅作为身体的或美学的经验。在传统社会中，舞蹈被作为**仪式**的展演，与口头的诵说相对应。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布洛克认为所有形式的仪式行为都是墨守成规的，其一成不变的特性所体现的信息巩固了传统的权威。

许多**功能主义**者将舞蹈视为恒定的文化表现方式，忽视了其自发性创造性的方面。舞蹈不仅被视为一种信息传达手段或一种社会控制方式，而且还被视为一种释放郁积情感的安全阀，或者一种令人心醉神迷从而超越现实世界的途径。通过考察舞蹈表达的信息、情感和社会语境，**人类学**能够揭示特定舞蹈的社会情境。舞蹈还反映了社会中阶级和性别的分类体系，例如，埃及婚礼上的肚皮舞就是性的展现，它使新婚夫妻获得了新的社会角色，即能够进行性活动了，又如埃及男子在集体苏非仪式上狂

舞，沉浸于狂欢状态之中，其目的在于凸现人的内在精神状态的重要性，这种舞蹈与其说是社会分类体系的反映不如说是宇宙论图景的反映。

当前人们关心的是对舞蹈的**现象学**和肉身性的研究，这种研究认为肉体不仅是参与社会的媒介，而且肉体还竭力在社会中凸现自身的存在。例如，迪斯科舞在中国被视为非法，因为它为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展开了一个表达其反叛性的舞台。

参见：身体；民族音乐学。

道教（Daoism）

“道教”一名源于《道德经》一书，这本书最初被归于公元前6世纪的圣哲老子（意谓“智慧老人”），但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是公元前3世纪编纂而成的。但是，关于老子的传奇，至少在一般的水平上，一直流传了几个世纪。据说，他在母胎中就已有62岁了（一说82岁），一生下就满头白发，而且天生就会说话了。到160岁（一说200岁）时，由于厌倦尘世，他以青牛驾车，西行寻找乐土，出关时被守关人拦住，要他给世人留下些智慧，他只好坐下，写下了这部《道德经》。

“道”意味“道路”，道家一开始是一种由禁欲主义者所实践的神秘主义宗教，直到公元1世纪，它才被融汇为一种大众化的宗教。这种宗教形态一直流传到现在，实际上并无多大变化。道是万物周流之径，是宇宙的原初之力，它无所不在，统摄万有，幽微难测，妙不可言。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与道合一，为此，就应过一种和谐的生活，沉思冥想，衣食淳朴，保持心灵的开放和明净。在所有这些方面，道家都与**儒家**密不可分。这两种思想体系，在中国哲学和宗教实践中一直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

道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立面的完全平衡：善与恶、明与暗、动与静、柔与刚、雌与雄。这种和谐，藉“阴阳图”得以象征。这是一个由形似蝌蚪的黑、白两色相互缠绕构成的圆形图案，阴表示黑暗、雌性和忍让，阳则表示光明、雄性和进取。世间万物都是阴阳之平衡统一，只有维持这种统一，整个宇宙才能保持和谐，智慧就来自对这种统一的洞察和体认。（在公众信仰中，这种统一能被自然或超自然的敌对力量所扰乱，通过祈祷和献祭就能恢复固有的统一。）

在中世纪，人们相信与“道”合而为一就能获得永生，由此导致这样的观念，即认为我们的肉胎凡骨能够通过**炼丹术**转变为超凡的、长生不老的形态，几个世纪中，道士们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炼丹术。同样，**占卜**也被视为一种探赜“道”之奥秘的手段，它同时也是一种考察道之超越有限时空的那些规定性的手段。一种流行的占卜形式就是卜问《易经》（“变易之书”），书中汇集了一系列意义含混的占辞，根据抛掷占筹得到的数字占卦模型，就可进行占测。**占星学**也成为道教仪轨的一个复杂的组成部分，以至于使之模糊了其真正宗旨（探索“道”）而堕落为一种庸俗的预测术。《道德经》本身的某些说法，也许是明确反对这种虚妄作法的，其第 40 章一开头就说“反者道之动”，这就是说，不管我们如何理解道，对立是真实的（即使我们持相反的观点，这一点依然没变），真理与虚假是相互对立的，两者的和谐是一个悖论。

如果说，儒教是两千年来中国哲学和宗教的现实性方面，那么，道教就是其神秘性方面。20 世纪 60 年代，道教的一种粗糙浅陋的形式开始在西方流行，它至今还歪曲着西方人对道教的观点。对真正的道家而言，德并非个体的德性，而是“道”本身的属性：我们藉忘我而回到自我。《道德经》指出，正是由于有了

德，“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

参见：佛教。

达尔文学说（Darwinism）

达尔文（1809—1882年）对**进化**提出了一种理论解释，这基于他对相似物种和它们彼此间的**生物地理学的**关系的研究。在其他人中间，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漠·达尔文于18世纪首先讨论过进化概念，但没有提出满意的解释。达尔文观察到：某些生物之间存在很多的相似性，他用共同的祖先来解释它们。在相似的生物不同的地方，他提出在对付环境的压力时，生物出现了**适应**现象。这便导致了一个新的但又相关联的物种的出现。生物的各种特征的继承，确保了后代非常类似于他们的父母——因此，达尔文承认：在生物的繁殖过程中，遗传是不断改变着的稳固特性。这种稳固特性，因变异而得到修正，是一种允许有限的变化发生在种群中的自由力量。虽然达尔文无法解释这两种力量（他是**泛生论**的信奉者）背后的机制，但他明白：遗传与变异，对于物种借助**自然选择**的过程的进化是重要的。自然选择过程中，一个物种的变异，是为了适应生存竞争。选择性的死亡率，决定着这种生存竞争的结果。它依存于单一个体的**应变能力**。因此，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把自己的有利特征传给后代。

达尔文学说的主要观念，在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得到阐释。尽管达尔文学说受到当代科学家与神学家们激烈的批评，但它引起了人们对**生物学**的重大的重估。当代的科学家与神学家们提出异议：达尔文未能恰当地解释遗传与变异背后的机制，而且没有给出证据证明曾经发生过进化现象。19世纪

后半叶，出现了支持达尔文的思想的经验证据，但显而易见，特别伴随人们开始理解遗传学，达尔文的理论过于简单化了。今天，人们将关于进化的通常解释，命名为新达尔文主义。达尔文学说的原理，保留在其中，这样，新达尔文主义，不接受生物习得的特征是可以被遗传的观念。达尔文时代，这种观念非常流行。现在，自然选择的概念，按照繁殖成功或应变能力的观点得到更为准确的解释。

参见：创造论；同源；拉马克学说；孟德尔学说；形态学；古生物学；物种形成。

地球年代的确定（Dating the earth）

许多社会都有解释大地是如何形成、何时形成的创世神话。就欧洲社会而言，直到19世纪，人们一直相信《创世纪》是对创世过程的如实写照。它不仅说明大地是在一个星期内形成的，而且还暗示《旧约》中记载的人类事件贯穿了地球的整个历史。17世纪的大主教阿尔马的厄舍尔在书中通过对《旧约》所载谱系的计算，得出创世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

如此短促的历史让地质活动来不及发挥任何作用，虽然人们对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信以为真，并据之对现已灭绝了的动植物化石进行解释，但是，一旦地质学家考虑到侵蚀和沉积的速度，更不必说造山运动的速度了，就发现必须假定更长的时间尺度。哈顿的**均变论**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有句名言："前无开端，后无终结。"史密斯收集了不同的地层区域的岩石样本，发现英国的岩石沉积有数万英尺厚，其气候状态包括炎热的沙漠、热带湿地、永久冻土和冰原。自从1895年，达尔文的**进化论**为长时间尺度提供了更多的线索，科学界开始认识到《创世纪》的记载仅仅是

寓言，地球的年龄必须用亿年甚至数十亿年的尺度来衡量。

19世纪末，此种共识受到严重的冲击，冲击不是来自教会，而是来自当时的一位著名科学家开尔文，开尔文利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提出了一个看来是无懈可击的证据证明地球的年龄非常短。人们测量了地球表面的热量损失——这种热量损失在火山非常明显，在其他地方同样可以观察到。人们认为这些热量是地球最初作为一个熔岩球时形成的热量的残余物。熔炉实验表明要将岩石熔化需要多高的温度，由此可以计算出地球最初的温度，然后就可以应用热力学定律计算地球从起始温度冷却到现在观察到的温度需要的时间。开尔文分别用稍有区别的起始条件进行了几次计算，表明地球的年龄不会超过2,400万年，这样的年龄使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理论失去依据。

这一问题在开尔文死去不久就由于**辐射**的发现而得到了解释。辐射导致地球内部热量的产生，因此使地球的漫长历史得到说明，而且还为测量时间提供了可靠的途径。地球表面大约有65种自然形成的辐射同位素，它们的性质不稳定，能自发地释放中子，从而形成子元素，后者可能是同一种元素的另一种同位素，也可能是另一种较轻的元素。每一种同位素都按半衰期瓦解，所谓半衰期是指同位素质量减少到原来的一半时所需的时间。如果知道了同位素的半衰期，并且在同一地方发现母同位素和子同位素，就很容易计算出衰变的时间。在实际应用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子元素本身也可能是放射性的，或者可能更为活跃，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利用多种元素的衰变周期加以克服。1906年，博尔特伍德最先测定了铀衰变为铅的周期，就足以推翻开尔文的观点并支持地质学家的主张，他对不同的岩石样本进行了测定，其周期从4亿年到22亿年不等，从而说明地球的年龄是开尔文所估算的数百倍。现在，一般认为他的估算高出

20%，但现在的方法发现有些物质的年龄更为古老。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石有35亿年，但地球自身的年代可能较此还要长10亿年。这是通过测量陨石和月球岩石的年龄得知的。前者的年龄是45亿年，后者的年龄是37—46亿年。由于地球和月球是同时形成的，现在一般认为地球的年龄最有可能是46亿年。

德布罗意波（De broglie waves）

德布罗意（1892—1987年）是早期量子力学的开创者之一。人们认识到：许多年来被认为纯粹是波的光也像粒子一样相互作用。德布罗意使这一认识获得了观念上的飞跃，他认为：波具有粒子一样性质这个事实，可能暗示着粒子也具有波一样的性质。他用

$$\lambda = \frac{h}{p}$$

定义粒子的波长，其中，λ是波长；h等于6.62×10^{-34}，称为普朗克常数；而p为粒子的动量。此假设的真实性，如今已为无数实验所证实；诸如电子之类的粒子，正是按照此公式像波一样传播的。

因为普朗克常数如此小，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到大粒子（例如台球）具有波的性质。台球的波长，是很小，我们不可能设计实验来检验它。但当粒子的动量非常小时（譬如电子），波长就大得足以检测了。

死亡（Death）

当哲学家们在考虑死亡的时候，很难为之确立一个定义。如

果死亡是存在生命的终点，那么谁也不能免于一死。但是，许多人否认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同时又坚持认为我们在肉体灭亡之后还在生存。他们相信死亡不是存在生命的终点，而仅仅是持续的肉体生物功能的终止。

关于人在死亡后如何能延续存在、即在肉体灭亡之后如何能延续存在，一些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相信肉体复活的人们似乎也相信我们就是我们的肉体，因而，没有肉体我们也就不能存在。当我们的肉体停止活动时，我们也停止存在。在审判之日，上帝将复活我们的肉体，我们也将会重新得到生命。我们将会死亡——我们的肉体将要停止存在——但是当上帝使我们的肉体复活，他也会让我们复活。

相反，另一些人认为，人们并不是他们的肉体，而是非物质的灵魂，它在我们的肉体毁灭之后还可以继续存在。灵魂的轮回迁移就是这么一种观点：我的非物质的灵魂一般内在地（在因果意义上）与这种人类肉体相关，但是一旦肉体被毁灭，我——我的灵魂——将持续存在，内在地（在因果意义上）相关于其他人类或非人类的动物肉体。我的同一性在于：我是非肉体的灵魂，当这副肉体被毁灭而不再存在，我不会重新体现在另一副肉体之上——我会**轮回转世**。

仍然有另一些人认为，我的非物质的灵魂将肉体灭亡之后延续存在，但是不能重新血肉化。在死亡时刻，我的肉体分解，我也不再具有肉体，在这种状态我的灵魂将会延续存在。相信个人死亡的存活，并不要求相信灵魂不灭。他们可以相信，在（现在的）肉体终结之后我们还会延续存在，但是我们仍然在此之后的某些时候同时希望它们不再存在。

人类学家认为，对死亡的立场以及与死亡相联系的**仪式**，是主要的研究领域。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文化进化论者对死亡

仪式、古代崇拜和死后生命的信仰倾注了很大的注意力。这些都被看作是“原始”民族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需要恢复信心的结果。古代崇拜不仅保证人类在死后生活的地位，而且还是支撑现存传统的有效手段。

财产法与继承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赋予个人死亡的重要性。一般说来，在狩猎采集时代有更少的礼仪，同时也更少有可处置的财产——除非个体死亡提出了移交权威和领导权问题。关于个体及其在社会或宇宙中的地位的看法通过死亡仪式得到了反映。根据死者的阶级和性别，或者假想的精神发展状态，死亡仪式也发生变化。因而，比如印度，死亡和葬礼的合适方式对于一个印度的僧侣和一个俗世的家庭成员都是有所不同的。

社会学家涂尔干断言葬礼加强了社会团结；在他之后，赫尔茨集中于如下方式：葬礼仪式是一种修复由死者所毁灭的社会生活之网的手段。在死亡之后所显示出来的强大力量可以用来重塑社会生活。赫尔茨还认为，个人情感正如死亡思想一样都是由社会语境形成的。相当不一致的怪异的死亡是不可能处置的。比如在苏丹，一个假定已死的努埃尔人，在他长时间失踪之后为他举行了葬礼，当他明显活着并未死亡而重返共同体时，村庄生活不会重新接纳他。“坏的死亡”，或车祸、自杀招致的非自然的死亡，常常认为会造成另一种恶意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反过来又形成活人们的问题。

葬礼反映出信念的本质。比如，如果存在着一种对死后生活的信仰，那么死亡仪式就会体现它。1905 年，赫尔茨发表了一篇用印度尼西亚语和马达加斯加语写成的论文，研究肉体状态、灵魂的命运与哀悼者的仪式条件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文化中，如若肉体并没有完全毁灭，骨头就必须擦干净，然后再进行第二次下葬，象征灵魂从有限的遗骸中的最后释放。这种二度下葬，既

重建了社会团体的凝聚力，而且也重新把哀悼者纳入完整的社会生活之中。生殖和性行为的生命价值也常常相关于死亡仪式，有助于重新确定社会秩序。新几内亚的吉半人中间，妇女们（与生育和再生相联系）要在拥抱之后出于怜悯地吃掉死者的躯体，以便解放他们的精神。

参见："个人同一性"，"通过仪式"，"自我"，"唯灵论"。

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

弗洛伊德最先在其《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1920 年）一书中对死亡原则进行了论述，这是一种新颖独特的本能理论。在本书中，弗洛伊德首次断定死亡本能的存在，它和性本能是人类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弗洛伊德自始至终将冲突和妥协包容于其本能学说中，因为它们是人类心理的基本组成部分。他认为仅仅靠利比多这一惟一的驱动力尚不足以解释人类本性的这些方面，为此，有必要假定相互对立的本能的存在。

弗洛伊德是鉴于其病人总是想要重复其悲惨的经验这一现象而提出死亡本能理论的，这种重复强迫症尤其体现于那些经历一次世界大战被炮弹吓坏了的士兵身上，他觉得这种强迫症具有本能的品格。在他看来，重复过去的事情的迫切性"是生命体与生俱来的返归原初的强烈本能"，是"生命体中与生俱来的惰性的表现"，他进一步指出，所有生命的目的都是在死亡中回归它所从来的惰性物质（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机械论观点）。他将死亡本能称为萨纳托斯，而将性本能称为厄洛斯。

颓废派（Decadence）

颓废派（拉丁语的意思为“沉沦”），是欧洲**艺术**中19世纪晚期的一个流派。它的主要精神，由一种道德和审美枯竭的情感构成，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对（平乏的）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整体做出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颓废派同样相信）只能尽力而为，及时行乐，在经验上使他或她本人得到满足，渴求表面的深沉。（对颓废派之外的人来说——如果不是颓废派本身，显而易见的是：其规范的丧失与随后兴起的颓废之间的关系乃是共生的；未意识到这种规范的逐渐丧失，颓废就是不可能的；因此，颓废在外延上依赖于它有意忽略的那些规范。）颓废派本身主要的纪念性艺术作品，是西蒙斯的小说《逆流》（1884年），但其“哲学”影响了英国的**美学**流派（王尔德的《莎乐美》，附有比尔兹利的插图，是一部典型的作品）。颓废派的思想，也隐藏在20世纪许多艺术家的作品后面。这些艺术家，包括杜勒尔、纪德、米勒、斯泰恩、**达达派**、**超写实主义者**、魏玛共和国厌世的德国作家、画家与表演家——此后，不用提还有**愤怒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的翫客之类精于世道的人。

解构（Deconstruction）

解构是**批评**与**哲学**的一种技巧，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那里，但现在主要和德里达（1930年—　）的名字相联系。它是一个极端怀疑主义的思想流派，它拒绝一切现成体系所推行的被认可的主张。例如，**文学**批评里（文学批评是应用这种技巧的引起争议最大的领域），人们从以下的假定开始：一个文学文本，

不是只有一种而是许多意义；“意义”本身，是片段的、弥漫的现象。详细考察一个文本，非但不会限定它所说的一切直到一条中心“意思”凸现出来，而且将释放出所有潜在的、碎片的、常常是矛盾的“意义”，但这不必然像是该文本的作者原来所想的任何东西。解构的方法，包括“拆解”文本，如同一个人拆开拼图玩具：换言之，它不是寻求同伙帮助将各个散片互相适应组成单一的东西，而是集中于个别的因素，集中于在它们之间的缝隙、混乱、分裂。这种技巧，不限于文学领域：例如，批评家还成功地把它用于**建筑学**的传统批评范畴（美、形式、功能、和谐、意义与秩序），用于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工作——虽然不是以德里达和他的跟随者所想的一种严格的方式，但在商业和政治中它也用作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装饰（Decoration）

装饰（来自于拉丁语“使……美化”），在建筑学的思想领域，指为了美学效果对修成的建筑实施各种各样的装修，使它们越出狭隘的实用和功能范畴。20世纪西方话语里，虽然“室内”装饰领域中给与了“装饰”观念以特别凸出的地位，但装饰一词，和“点缀”在同义上使用。“室内”装饰，就是用不同的颜料、织品、对象来处理室内环境。

从最早的时代开始，尽管一个建筑结构为了审美效果，也许依赖于它的形状、依赖于相关空间表达的体积或重量的造型，但是，由于使用不同的材料（如带雕刻的东西），由于模型与设计的使用，大量的功夫曾被放在附加的点缀如颜色上面，这正是大多数定居社会的一个特征。许多情况下，这样的装饰性也许是抽象的，如几何学的形式；还有的用雕刻、建筑材料的处理来实现

装饰效果。我们将几何学的形式，同马雅文化联系在一起。早期各种文化中，抽象的点缀、许多俱象的雕刻，都来源于动物或植物世界；在某些方面，它们同神话与宗教的信仰相关。

整个历史上，人们把**绘画**与**雕塑**看作建筑的“姊妹”艺术，但在20世纪，由于**功能主义**的**现代主义**学说（这种信念认为：美必然来自于一座建筑或对象的功用），对那些姊妹艺术有过戏剧性的拒绝。在传统意义上，那些姊妹艺术为建筑形式提供了表面的装饰。**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家们努力恢复这种传统的关系，成为他们的一个主张。

装饰艺术（Decorative arts），参见：视觉艺术

规范性（Decorum）

规范性，是一个拉丁术语。在古典的风俗习惯中，规范性指用于人的行为的所有事务中恰当或得体的标准；**建筑学**里，指适合一座特定建筑的特定功用的设计原则及标准。这个观念，来自于对亚里士多德“中庸”的运用，来自于对极端的合理回避；作为一个行为尤其是语言的概念，规范性表现在一种修辞学证明的结构中。例如，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里（公元前1世纪）极力主张：为着特定的众神使用特定的**寺庙**柱型；他也建议：在一座具有宏伟大厅的建筑里，无需一个居中的进口，而是要有适合大厅内部宏伟气魄的进口。作为一条影响设计的戒律，规范性也是主宰着**装饰**的原型；**文艺复兴**的欧洲，在人们重新发现维特鲁威后，规范性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演绎推理（Deduction）

演绎，源于拉丁语 deducere，意为“从……之中引出”，是**哲学**和**数学**的逻辑形式。哲学上的演绎推理是这么一种推理：如果它的所有前提为真，那么其结论也必定为真。一个演绎推理的所有前提不可能都为真，然而其结论则为假。下述推理是演绎推理：伽布利尔是人；所有人都是要死的；伽布利尔是要死的。这个推理之所以是演绎的，这是因为，如果它的前提为真，其结论也必然为真。当然其前提也不可能为真，伽布利尔可能是天使而不是人。但如果这样的所有前提为真，那么其结论不可能是假。

演绎推理成为数学的生命血脉，数学在其本质上由一系列规则（公理）组成，可能从这些规则中做出演绎推理。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可能产生新的知识：可能做出的演绎都隐含在原始公理之中。数学即力求去发现所有可做出的演绎推理，尤其是那些公理的并非明显的结论。（一个最近的成果是有限单一群集的分类，它是如此不明显，以至于要用几千页的论证篇幅来提供证明。）

数学中的演绎推理可以形式化，但它总是以一种不正式的可以更好地理解的方式进行。（至少对专家，这将仍然是运用某些符号语言，以求清晰：正是符号语言使非专家人士难以理解。）

参见：“公理化”，“形式主义”，“归纳推理”。

防卫机制（Defence mechanism）

在**心理学**中，压抑过程又被称为防卫机制，它使不受欢迎的观念变成无意识。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安娜花了很长时间研究防卫机制，精神运用这一机制应对不受欢迎的性冲动，对自我

(ego) 进行防卫以免它被本我 (id) 吞没。在防卫机制中，性冲动获得象征性的表现，这种防卫活动应对性本能和**自我**（现实）本能之间的冲突，在此意义上，它也是妥协得象征。

否认是一种防卫机制，它可能仅仅意味着对过分痛苦的现实的否认，对内在事件的否认体现于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个刚刚丧偶的人，却继续装出一副仍然在忙于家务的样子。

另一种常见的防卫机制是转移，它出现于梦境或歇斯底里症中。所谓转移，指导致痛苦体验的事物被转换到其他意象或症状上，从而与最初的焦虑脱离。在梦中，一种意象可以象征另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如瘫痪）可能是被压抑的性记忆的结果。例如，转移可能会使一个人不去揍讨厌的老板，而是在回家时把火撒在孩子身上，另一个转移的例子是，对母亲的**俄狄甫斯**欲望可能会导致其人选择一个长得像母亲的妻子。

此外，防卫机制还包括压抑和分离，后者也被称为分裂。在分离的情况下，由于伤害的压力，内在心理结构会一分为二，一部分保留在意识中，另一部分则沉人下意识，如果自我 (ego) 按此方式分裂，留在意识中的那一部分通常会被体验为自我意识 (self)。分裂通常还会导致将情感分为好和坏两半，将一半留在意识中作为自我 (self)，将另一半移交**无意识**的超我 (superego) 部分。这可能会导致双重或多重人格。

合理化是指为一件当事人想否认或回避的事情寻求一种似是而非的借口，例如，一个参与杀人的士兵可能会辩称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这是命令。

投射也是一种防卫机制，它指一个人将本来属于他自己的冲动赋予别人，例如，一个妻子可能会责怪其夫拒绝她，而实际上是她拒绝了其夫。

心力内投这种防卫机制又可称为自居作用。一个孩子（以及

他长大成人后）面对粗鲁的父母，可能不会满怀敌意的情绪，而是扮演母亲的角色，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反转是将从过去的关系中采取的态度用于当下的关系中，例如，将原本对父母的憎恨用来憎恨自己。隔离则是将一种情感与其原因分离并将之指向其他方面，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可以用一种超然的态度谈论给自己带来创伤的事件。反作用配置则将一种情感转变为相反的情感，例如将对父亲的恨转为对他的爱。

升华也具有防卫机制的特点，不过其区别与一般的防卫机制之处在于它似乎是服务于积极的目的。按照精神分析学理论，升华与其他防卫机制一样，也利用本能冲动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在升华的情况下，性感情的压抑被生产性的工作所替代，因此，这一机制看来是对现实的一种有益的适应。例如，弗洛伊德认为塞尚的绘画成就就是升华的结果。

赤字开支（Deficit spending）

在**经济学**语汇中，赤字开支可能是**财政政策**（金融体制）的一个部分，即政府为了在衰退或**萧条**期间刺激经济发展而计划的赤字。在繁荣时期，是一种平衡的财政体制为抑制**通货膨胀**而要求政府追加的财政政策。美国并不追求这样的平衡财政体制。一般说来，由于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不愿面对平衡预算所要求的政治争吵，不愿提高税收和费用来偿付急迫的开支，或者不愿削减开支水平使之与收入平衡，所以美国常常发生赤字。事实上，仅仅在1949年和1989年之中有5年时间内，美国财政才完全以**赤字预算**渡过全部繁荣与衰退时期。最近一次的**财政盈余**是在1960年的300万美元。

自然神论（Deism）

一般而言，自然神论（源于拉丁语 deus，“神或上帝”之意），描述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但不相信超自然的启示——即信仰一位上帝并仅仅以理性为基础展开宗教的实践。这个词的运用，有很大的差异。它能代表对一位上帝的信仰，一位根本没有人格的上帝，或不介入人类事务的上帝，或因信上帝但不信来生，或乃至信上帝但拒绝关于信仰的一切教义。加尔文派神学家维雷特；首次在他的著作《基督教指南》（1564 年）中使用这个词。17 世纪，自然神论的拥护者，尤其在英国遭受了严酷的迫害与囚禁。但是，它继续吸引了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到 18 世纪，它在欧洲和美洲已成为一个著名的运动。许多有名的人物，都主张自然神论的观点，例如英国的 E·赫伯特、J·托兰特、M·丁道尔；欧洲大陆的 G·布鲁诺、卢梭、莱辛以及美国的富兰克林、杰斐逊。

民主（Democracy）

源于古代雅典的民主意味着公民统治（demos），今天用林肯的说法，就是“民治，民有，民享”，这里的“民”是指一个国家正常的成年人口。

在人民统治和民主实践的构想中关于民主的理论也根本不同。一方面，有人支持直接参与的民主。在古希腊，民主在字面意思上真正意味着公民（30 岁以上的自由民出生的男性，在 5 世纪的雅典占人口的 1/4）统治：他们被多数人选举推上公共主事机构，在全体公民必须出席的公民大会上制订公共政策，被选

出的官员必须接受公众严格的审查，没有权力分割，也没有对公众主权的限制。这种民主制形式正是18世纪最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卢梭所倡议的形式，虽然他所捍卫的不是民主政府而是所谓的共和制度。古代世界对直接民主进行批判的人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谴责纯粹民主制是有害之物，而提出一种混合制度，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要素结合起来。在古代希腊与早期现代欧洲之间漫长的岁月中，大多数政治制度都是封建帝制，精英主义者辛辣地嘲讽民主制，说它是“群氓统治”——而这就是为什么卢梭前后民主思想的复活首先是以共和语言来辩护的。但是，现代直接参与的民主制的倡导者也普遍存在。他们认为，最佳决策是通过所有那些受到特定组织影响的人们有组织的争论、商洽和投票而产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或参与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是平均主义者，相信人民只有在法律、经济和政治制度不是等级的或不负责任的条件下才可能是独立的。

另一方面，又有人提倡间接的代表制民主，他们把民主制定为一种存在着真正竞争来赢得公众支持，获得组阁政府权的体制。因而，民主在最低限度上要求普选权和竞争的政党。代表制民主的捍卫者——最著名的有米尔——坚持认为，如果超出决策单位的一定规模，直接民主即毫无效力；因此他们相信在直接民主的利益与有效决策之间存在着交替关系。他们坚持认为，领袖必须选举产生并且要对人民负责；但是他们又认为，人民自身又不应该直接统治，除非他们投票决定了竞选结果或法定投票。一些支持代表制民主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必须毫不含糊地防止直接民主的危险；对他们来说，财产权与人权必须从宪法上得到多数统治者的保障。

当然也有多种代表制民主。它们可能包括**联邦**、联盟或统一

形式；它们可能以多数主义或**联合民主**原则为中心组织起来；它们也可能具有极为不同的**选举制度**。

代表制或自由制民主在本质上引起了大量的思想争议。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民主制中谁是真正的统治者？"像米齐尔斯、莫斯卡、帕雷托这些欧洲**精英主义理论家们**断言，代表制民主仅仅是一种堂皇的外表，真正对政府的控制权掌握在一个统治阶层或"权力精英"手中。**马克思主义者**同样认为，在资本主义民主中人民统治是个幻象：资本家阶级做出了一切有效决策，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相反，批评马克思主义和精英理论的人认为，由于它们的全部弊端，代表民主制度决不是一组利益单方面控制的：一种多元性的影响作用于代议制政府。为此，美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学家道尔把大多数现代代表制民主描述为"多头政体"（一种有多个统治者的制度。）关于民主制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世界的部分民主化？"或者"为什么有些国家民主化了，而另一些国家没有？"一个直到近来还颇为流行的答案，众所周知是与历史社会学家贝摩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西欧和北美独特的历史形成过程的产物。另一个答案为近来东欧**权威主义**统治的瓦解所强化，这就是指出了**现代化**引起了民主化：这些过程导致了（教育、技术和权利）资源比前现代社会更为平等的分配。因而，现代化使贵族统治和寡头统治更加难以维持。一个更加新近的答案与福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指出自由民主制反对自己的对手渐渐获得历史的成功就证明民主观念的力量，也证明了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的穷竭。

参见：联邦制，自由主义，多元文化论，共和主义。

人口统计学（Demography）

人口统计学（希腊语的意思为“关于人的文字”）可应用于**生态学**、**地质学**、**生命科学**和**社会学**领域，是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人口结构的科学。人口统计学通过对人口普查，收集人口信息、研究人口变化的趋势、并据此改进社会规划。所获得的数据对某些学科（如**流行病学**）极为重要。流行病学的发展，有赖于对人口变化趋势和关系的分析。通过对社区成员的研究，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结构，这在17世纪就很普遍。美国于1790年开始定期的人口普查，英国和法国开始于1801年。在此之前人口信息是不完整和非正式的，常常是基于对土地所有者的调查，因而对社会中某些因素存在偏依。在经整理后的统计数据中，研究者也往往更容易注意死亡率。现代人口普查能收集更多信息，如果设计完善并辅以出生登记、婚姻登记和死亡登记，所提供的数据可以非常准确。

参见：群体生物学。

魔鬼信仰（Demonism）

“魔鬼”（demon）一词源于希腊词daimon，它指介于神明和凡人之间的一种超自然物。有些daimones是源于**黄金时代**人们的灵魂，他们在死后的来生中仍保持对某些地方或人类的兴趣；有些是栖居于山川林泽中的精灵；有些是人们已故的朋友或亲属的灵魂；还有些邪恶的魔鬼则是人们的仇敌或对头的灵魂。

此种魔鬼是世界上所有超自然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万物有灵论**信仰以之为基础，罗马**天主教**的圣徒和**佛教**的金刚就是魔

鬼。在宗教中，魔鬼是支配生活的主要精灵，即使像中国宗教和前基督教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宗教这些迥异其趣的宗教亦然。在许多宗教中，如古代中东的宗教中，魔鬼并非天生就是善或恶的、仁爱或敌意的。它们并非超然离群，而且像神祇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它们的性情变化无常，就像凡人一样。人们可以劝说它们帮助自己（甚至比神灵更听话），反过来，它们也可能翻脸无情，与人为敌。因此，许多宗教的大量仪轨，都是为了讨好和颂扬魔鬼，或者努力为了禳除和避免魔鬼的邪恶力量，甚至世界上最“先进”的宗教中，许多节日和典礼都是从此种魔鬼信仰中发展而来的，而且一直是许多宗教实践中最多姿多彩、最富人情味也最动人至深的内容。

魔鬼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地位，颇耐人寻味。早期犹太教**一神论**，除了上帝之外不承认有其他任何超自然存在，非犹太教信徒们的神灵被斥为偶像，精灵和魔鬼被视为与恶魔同属一丘之貉，它们时刻都伺机侵入信仰不坚定者的心灵和肉体，使他们背离上帝。如果有人患病或者发疯，这是魔鬼在作怪；如果小孩顽皮捣蛋或者是邻居说谎欺骗，肯定是魔鬼缠身，要想使事情恢复正常，就不能直接求诸魔鬼，而应祈求上帝来对付它们。在这种信仰体系中，所有的魔鬼天生就是邪恶的，它们皆是撒旦（魔鬼的首领）手下的扈从。后来，人们相信虔信者死后其灵魂变成了天使，但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仁慈的鬼魂（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是仁慈的）。天使赞美并沐浴于上帝的灵光中，甚至连圣徒，当他们参与基督教的仪轨时，也被认为无法仅凭自己而创造奇迹（像在别的宗教中魔鬼的所作所为那样），而只能依靠上帝的力量，或者是为了我们的福祉向上帝代祷。

魔鬼信仰这种独特的宗教现象，有一种世俗的对应物，即唯灵论。死者的灵魂，也被同样认为依然保持着对生者世界的兴

趣，并时时想倾听我们、跟我们说话，或者帮助我们，或者，如果他们想做的话，还能加害于我们。唯灵论与魔鬼信仰的主要区别在于，诸灵之间没有魔鬼的真正等级体系（没有为我们而代祷的上帝），亡灵亲近我们或疏远我们，或多或少是出于自愿，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需要对它们采取劝诱或废除措施。

参见：巫术；撒旦崇拜。

树木年代学（Dendrochronology）

树木年代学（希腊语意思为“研究树木年代的科学”）是一门通过研究树木年轮以确定改变树木年轮结构的过去事件发生年代的科学。树木长有年轮，当树木被砍伐时，其横断面上年轮的宽度表示树木生长期的长度和特性，因此，计算年轮总数可确定树木年。另外，从已知年代的年轮宽度，可推断历史上这个时期的气候条件。某些树木能生长几千年，因此可提供有关史前时期的气候信息。不同树木的年轮可以相同，因此，古代树木的年轮可以与已知年代中被砍伐的树木年轮一致，这使得气候变化能完全按发生年月顺序得到确定。树木年代学的资料也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树木年代学”一词，是由这门学科的创始人天文学家道格拉斯提出的，他在植被中找寻过去太阳黑子周经过的痕迹时，道格拉斯首次对树木年轮进行了研究。

参见：生物气候学，古植物学。

否认（Denial），参见防卫机制（Defence mechanism）

义务论（Deontology）

在一种义务论（希腊语 dei，意为“这是正当的”，加上“学说”后缀）伦理学体系中，存在着某些道德规则，正义之人就遵循这些规则。依据这些规则，有些行为是必须绝对禁止的，无论不践行这些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即使一个孩子之死可以拯救整个世界，都不能杀害一个无辜的孩子。所以，义务论者认为，行为之正确或错误独立于其引起的后果，所以，他们都反对唯行为后果论。

参见：“唯行为后果论”，“伦理学”，“善与恶”。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依附理论研究的是那些由于工业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无力控制其经济生活命脉的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

依附理论是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那种流行很广的观点，即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只要效法那些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就能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主张依附理论的学者强调全球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这导致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欧洲和日本）处于主导的和核心的地位，而第三世界国家则被排挤到边缘并依附于它们。

依附理论家认为，发达国家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榨取了“剩余价值”。当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宗主国掠夺殖民地时，此种榨取就已开始了。然而，后来由于通过据说正常的渠道将榨取的利益

输送回宗主国而使此种榨取体制化了。依附理论被用来分析新殖民主义，它通过对原材料的开发和对出口市场的垄断，用对前殖民地的经济控制代替了过去的政治和行政控制。

依附理论学者将经济援助和技术协助视为操纵手段，它导致文化上的依赖性。在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论著中也可发现对依附理论的运用，在此，它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出依附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因为“核心”经济需要从较弱的“边缘”经济吸取原材料，并在那里为制成品开辟市场。依附理论大多有过于强烈的决定论色彩，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存在不少漏洞，因此，它在知识界已不像过去那样流行了。它过去主要受到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欢迎，现在，其中不少人已经认识到，不发达国家的贫穷恰恰应该归咎于资本主义的缺席，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在场。

参见：殖民主义；趋同理论；传播论；进化论；全球化；帝国主义；社会；现代性理论；世界体系。

压抑（Depression）

压抑通常被定义为诸如失望、沮丧、消沉等情绪。在诊断学中，由于压抑与精神的低落有关，因此被归于通常被称为精神忧郁症的一系列综合病症。处于压抑状态的人对生活持悲观厌世的态度，他们总是觉得事情对自己无关紧要，他们还会因为任何事情毫不留情地责备自己，不管事情是否真的与他们有关。精神病学家区分了内成的和外成的压抑，前者是由人格本身一些尚未明确的原因造成的，后者是对恼人事件的反应。

精神分析学将压抑视为对于母亲的矛盾情感的结果，母亲本身也可能受到了压抑，或者无法与孩子形成良好的交感，不能很

好地照料孩子。孩子对“缺场”的母亲既依赖又恼怒，这种矛盾的情感给孩子留下的印象，导致内在的母亲现象破碎，因为悲惨印象较之矛盾的印象更容易被接受。内在的母亲现象一旦破碎，随之而来的就是因失却依赖而产生的哀伤情绪，这种哀伤情绪是压抑的标志。压抑焦虑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内在的敌对行为能够摧毁其他的内在对象。

经济萧条（Depression，economic）

在经济学语汇中，萧条是指经济活动持续较长时间的衰退，在延长的衰退期间，存在着高失业和高剩余劳动力的低水平经济活动。公司倒闭，需求下降，失业升高和人们更加贫困。

当经济活动的低线非常之低时，这就是**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像施姆彼德（1883—1950 年）这样的经济学家就保留周期的这一阶段的术语，描绘出向低谷的趋势线，而其他三个阶段就是从低谷到复苏，由复苏到繁荣，由繁荣到高潮，由高潮到衰退的趋势线。现在，萧条仍然被保留而用于描绘这么一种经济状态：非常高的失业，许多工厂瘫痪，生活水平非常低，强下降的压力和物价。从 1929 年到 1933 年，美国就是这种极端经济发展的典型。

稍微缓和的经济活动的下降就被称之为衰退，这个名称不那么令人恐慌，因而也不太可能引起对家庭开支与企业消费的进一步紧缩。这么一种对于可能的逆反心理作用的敏感是非常明显的，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联邦财政部长格林斯潘甚至避免使用“衰退”一词，而代之以“一种有意义的下行增长结果”。

压抑情境（Depressive position）

压抑情境是克莱因提出的概念，是其对象关系**精神分析学**的进一步发展。压抑情境是婴儿在**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情境**之后的发展阶段，开始于婴儿开始认识妈妈之时。

在出生的最初几个月，婴儿生活于梦一样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充满物象和声音、愉快和不愉快的体验，而妈妈只是由一系列碎片尤其是乳房、手掌和声音而已，这是一种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式的情境，此时婴儿能够辨别开那些非常危险的无意识对象。

从这片混沌中妈妈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涌现出来，这导致婴儿对分离的逐渐理解：眼前这个人，即妈妈，既好又坏，让孩子既爱又恨。这一分离使孩子觉得分离得归咎于自己，是他的怨恨之情导致这种分离。婴儿感到内疚、痛苦，将之体验为死亡，想象自己给所爱的对象造成了永久的伤害。此后是一个修复阶段，这一阶段得到婴儿受到安慰的哀悼情绪的推动。这一阶段发展成为成年后的压抑，分离的痛苦藉与精神分析医生的临床关系得以缓解，通过设定压抑情境，临床治疗和哀悼期的结束被视为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除管制（Deregulation）

解除管制，就是在工业经济中削减或消除政府调节经济行为或经济实体的控制和统治。解除管制是**供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管制改革和解除管制在尼克松政府统治期间的美国发展呈强劲势头，持续发展于福特、卡特和里根政府统治期间。在那些年间发生的解除管制是指经济上的消除管制，因为它是回到依赖市场竞

争来控制物价和生产数量，而不依赖法律和授权法规。当经济调节渐渐衰落的同时，以保护调节形式出现的新型管制运动又发展起来，由此全面保护人民，依法保护他们免于生产的社会后果，为他们提供清洁空气、纯净水、职业安全和卫生等等。

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于美国飞机运输业的解除管制运动，也许是成功的典型。当时对飞机飞行路线和价格的规定都被废除了。其结果是这种活动的突飞猛进，许多航运公司不断建立，到运营循环高度发达时许多新的路线又得以定型，与原来的状态相比毫不相像。像"人民快运"这样发起大规模降价的新公司经历时间不长，或者已由更大更古老的竞争对手取代了。

描述论和规范论（Descriptivism and prescriptivism）

考虑一下"健康"一词。按照规范论者，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的意义分为两个组成部分：描述意义和评价意义。第一种意义是对身体状况的描述，在不同的生命之物的情况中也有显然不同的意义。对人类而言，健康意味着有活动正常的心脏、肝，没有癌也没有艾滋病等等。对植物而言，情况可能迥异。第二种意义是评价（规范）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它常常是赞许的标志。当我们说某某人是健康的，这通常就是一种嘉奖，表达了对他的身体状况的赞许。按照规范论者，这两种意义是可以分开的：我们可以用一种轻蔑的语气说某某人是健康的，因而是抑制我们的赞许时把某种身体状况归之于他。但是，当我们在标准的意义上运用健康一词，我们就是在嘉奖（对自己和对他人）这种身体状况。

描述论者认为，根本不可能在"健康"的意义中认出评价因素。"健康"意味着"在一种适合于这种生物生活的身体状况中所有"的那种类似的东西。这种适合性是一件客观的事实，生物

的特有生命功能，而不是我们所赞许的事。我们也可能、也不可能赞许有功能正常的心脏的人，但这与具有功能正常的心脏是否健康根本无关。进一步说，仅仅说一种身体状况是“健康的”，我们并不表明任何立场。“我不喜欢健康”这句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描述论者和规范论者也把这种分析运用于像“勇敢”这样的伦理学范畴。按照规范论者的看法，勇敢的行为具有某种为我们所赞许的特征，而且我们还可以详细说明这些特征（这个术语的描述意义），而无需评价它们。我们可以从“勇敢”一词中抽象出一种非描述的意义。按照描述论者的看法，根本不可能详细说明某种行为之所以勇敢的特征，只不过是使用像“英勇”这样的词语，连规范论者也可能认为它是评价性的。但是，按照描述论者的看法，“英勇”，“勇敢”这样一些词语也不是评价性的，因为说“我不赞成英勇”是完全讲得通的。不如说，“勇敢”的意义纯粹是描述性的，其他伦理学范畴如“慷慨”，“仁慈”和“同情”也是如此。

参见：“情绪主义”，“伦理相对主义”，“伦理学”，“事实与价值”。

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ist linguistics）

通向语言科学的描写主义方法，同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1887—1949年）联系最紧密。描写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直到60年代，它都是一种主要的研究范式。描写主义出现的根源，来自于要恒久记录北美土著语言的紧迫需要，因为它们中的许多，面临即将灭绝的威胁。为了这个目的，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率先进行了早期的调查。1911年，他发表调查结果，

即经典著作《美国印第安语言手册》。今天，看到语言学家都研究全世界形形色色陌生的和异国的语言，这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不过，正是由于博厄斯的先锋性工作，这些语言才拥有了和人们更熟悉的研究对象如拉丁语、希腊语、德语之类语言的同等地位。在这方面，描写主义代表和欧洲语言学传统的明显断裂。

原初的惊奇，不断带给描写主义者以感动。它来自于他们发掘的语言学的丰富性的广阔领域。表面上，他们无意中发现的每种新语言，都具有异常独特的结构与范畴。例如，人们发现：在夸扣特尔部族语言（一种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土著语言）里，动词的曲折变化，不像大多数欧洲语言里是指行为的时间，而是指说话人是否实际上亲眼目击了一个事件，或者只是从另一个人听说它，或源于可获得的证据，甚至根据一个梦。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看法的差别，落脚在语言的**句法**中。在英语中，我们需要长长的、可能是不实用的词组来传达何事；在夸扣特尔部族语言中，它将通过动词的曲折变化反应在语法上。

为了在他们的分析中处理异己的概念和结构的障碍，描写主义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抛弃他们关于语言的偏见。适用于拉丁语与希腊语的分析方法，当运用在土著的美洲语言时，很容易得出一幅扭曲的图像。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要设计出一种客观的方法，一套“发现的程序”。这套“发现的程序”可以用于任何语言，以便正确地解释它们，对它们展开精确的描述。这种方法，在下面这一点的假设上是失效的：任何程序或分析技巧，完全独立于研究对象。事实上，在任何科学里总是存在的情况是：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家所使用的调查方法，将反映他们的期待与偏见。

和流行的语言学偏见（参照**普遍语法**）相对照，描写主义的

一大显著特征，是它蔑视如下的思想：某些普遍的语言学概念和范畴，为人类所有语言所固有。相反，布龙菲尔德主张“无限多样的”视点。他的观察表明：人们无意发现的下一种语言，也许会同迄今观察到的任何普遍倾向相矛盾；因此，用一种现成的、潜在的普遍特征的观点来研究语言，是无益的。

独裁统治（Despotism）

在**政治学**中，独裁统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大体与**极权主义**、**权威主义**等概念互相补充。但是，像**专制主义**与暴政一样，独裁统治在政治修辞中用来描述那些运用独断的明显极权的政府。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独裁统治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一直联系着东方。直到18世纪，四个核心要素复活在西方关于独裁主义的政治思想之中。人们认为，这些制度是一个独裁者统治，其权力的运用既无法律约束，又没有政治上的限制；它们主要存在于东方，存在于亚洲以农业为基础的帝国，尤其是波斯、印度和中国；由一个精英人物统治，其权威、职位和税收都依赖于独裁者（这不像西方封建制度下更加独立自主的贵族）；其压迫如此深重，以至于他们的臣民完全是奴隶。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指出，古希腊语独裁者一词有双重意义，既是“一家之主”，又是“奴隶的主人”，从古典时代以来，这两层含义与独裁主义概念同时存在。希腊人特别地把他们的自由对立于野蛮人的独裁统治。亚里士多德对政治体制的类型分析的基础是这么一种思想：坏的统治形式或越轨的统治形式——暴政、寡头和民主——都具有统治者的独裁行为特征，这些统治者是按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以他们臣民的利益进行统治。他还按照因袭制

和皇室卫士的存在刻画了亚洲独裁统治的特征。

罗马人运用暴政一词来表现对独裁统治的蔑视；但是，在中世纪早期随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重新发现，独裁统治一词重新回到了思想交流中，尤其用来抨击中世纪教权，后来又运用于颇具争议的土耳其政府的设想之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成为正在兴盛的欧洲人用来划分东方和非洲政府体系的陈旧标准之基础，在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孟德斯鸠的著作中达到了顶点。

孟德斯鸠认为，独裁制是极不稳定的政府，有组织的恐怖是它的基础；他还认为，在地理学上大规模的农业帝国、尤其是在热带和干旱地区更为可能存在独裁。伏尔泰——孟德斯鸠最知名的批评者则持相反的论点：他们支持“开明的独裁统治”，指出孟德斯鸠的论证是对残余的封建贵族统治利益的辩护，其所依赖的是很成问题的不可靠的“旅行”传奇。像其同时代的许多哲学家一样，伏尔泰也是个中国崇拜者，他相信中国皇帝通过文治武功而又理性地管理臣民的官僚来进行统治。因而，中国被当作一种进步的政体模式而被推荐和颂扬。

独裁是（或可能是）开明的，这种思想并没有延续到 19 世纪。自由言论敌对于不负责任的统治者，在独裁统治尤其是东方独裁变种的统治时代所发展的哲学被时间化，成为人类发展的舞台背景。在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哲学家孔多塞，德国后期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康德、黑格尔、赫尔德等人的著作中，亚洲政治制度被认为是独裁、停滞、僵死的，无法从其自身资源之内有所进步发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这些观点成为老生常谈，比如穆勒就认为独裁的“东方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们也以某种修正的形式为马克思区分**亚细亚生产方式**提供了思想基础。20 世纪 50 年代的冷战高潮中，汉学家和前马克思主义者维

特福吉尔复活了一种鲜明地具有东方特色的独裁统治的观念。他认为，东方社会从可以在功能上以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大规模的中央计划的灌溉的需要来解释——但亚洲许多历史学家坚决反对这种学说。更有争议的是：维特福吉尔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体制是“亚洲水利独裁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和工业社会的等价物。

决定论（Determinism）

决定论，源于古法语 déterminer，意为“固定；它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在它之前发生的事所决定的。从完全描述在时间 t 所给予的知识看来，一个决定论者相信在时间 t+1 世界的状态是可以推知的；换言之，决定论者认为每个事件都是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产物。至少在西方世界，这种思想的广泛接受是 18、19 世纪理论物理学发展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就如像是牛顿及其学说继承者把世界还原为等价方程式系统；如果对于影响宇宙运动的要素具有足够的知识（换言之，如果所有其他分子在宇宙中的位置已知），那么分子在宇宙中的位置都永远可以通过数学方程式来预见。决定论不是牛顿本人的立场，因为决定论否定了上帝存在的必要，似乎把人类存在还原为可预知的机械地位。但另一些人（如 18 世纪数学家拉普拉斯和拉格朗齐）就认为决定论是**科学**的胜利，通过因果律揭示了未来与过去一样恒定不变。

在科学上，随着牛顿世界观的毁灭，作为一种严肃的哲学，决定论也不可能延续存在。20 世纪初普朗克及其同仁的量子理论给理论物理学带来了新的机遇，海森堡（1901—1976 年）的**测不准原则**揭示有些事件本质上不可预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时间**概念以至于物理学家再也无法确定哪些事件在先哪些事件在后，——从此，决定论越来越不合时宜，许多哲学家（如罗

素）就认为因果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幻觉。不仅如此，而且康德的**数学**（尤其是**欧氏几何学**）是先验真理的观念同时也被罗巴切夫斯基、波利尔和黎曼的**非欧几何结构**所毁灭——这一事件让科学家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思想：数学方程式并不必然是宇宙中发生的事件的仲裁者。

从上述情形所产生的新非决定论导致了一种观点的诞生，整个20世纪的科学家和其他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即认为宇宙在本质上是紊乱的，行动根本得不出任何结果。这种观点对**存在主义**发生了重大影响；所谓存在主义一般认为它在西方世界广为流行。按照这种世界观，所有行动都同样是有意义的（或者同样是无意义的），重要的是通过采取行动来确证自己的存在，尽管这种行动是什么并不重要。存在主义的第三个看法是“兼容精神”，即坚持认为既可以考虑人类自由，又不导致对人类行为的非决定论解释。

决定论一旦运用于政治思想和历史思想，它就描述了下面的思想，即认为个人的“选择”：（a）是由超出个人所能控制的条件所决定的；（b）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历史决定论强调先前世代和长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所形成的限制，正如**年鉴学派**的主张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决定论是这么一种思想，把一切重要的社会政治利益、行动与组织都归之于经济原因的主要作用。在**理性选择**理论中，经济决定论所采取的形式是假设个人总是追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实用功能，并永远热衷于“对利润的追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那种努力把历史解释成物质条件变化的产物，而不是思想、文化和价值变化的产物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支持了经济决定论。经济还原论常常作为历史决定论推理的贬义标签，因为历史决定论在解释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权力**时忽略或压抑了非经济因素。

在哲学中，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有清楚的区分。决定论是这么一种原理：一切事件都具有一个确定的原因，即那种在因果关系上足以引起结果的原因。某些原因可能仅仅是提出了其结果的可能性，而对其结果并没有因果决定作用。吸烟导致癌症，但吸烟仅仅是提出了可能得癌症的可能性，而不是在因果关系上决定了得癌症。

非决定论是这么一种观点：某些事件没有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因而，仅当某些事件不具决定起因，或某些事件仅仅有可能向非决定性起因发展，或者在这两种情况下，非决定论才是真的。

哲学家长期以来担心，自由与责任是否能和决定论相容。但最近他们又担心自由与责任是否与非决定论相容。很显然，如果自由与责任既不与决定论相容，也不与非决定论相容，那么它就既不可能自由，也不可能有责任。

在**心理学**中，像弗洛伊德这样的相信**精神病学**的心灵决定作用的人，假定所有精神事件都有原因。弗洛伊德相信，无意识力量的存在证明心灵决定论是精神生活的事实，但是他也认识到意识远远不仅是无意识力量的结果，在精神现象中有它起作用的地位。因而，他认为**精神分析学**是一种以因果决定假设为基础的科学，而当描述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选择和决定等等方面时，就造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困难。

心理分析的精神决定的一个方面遭到了妇女们严厉的批评，这种观点就是**自我**和**超我**（我和道德良知）在生物学意义上是被决定的；女孩经历了两种主要的儿童情绪，**俄狄浦斯情绪**和**阉割焦虑**，分别是因为她们缺少阴茎。波伏娃和后来的女权主义者反对弗洛伊德的决定论，把女性的性征纳入社会政治语境，而不回避心理学语境。

弗洛伊德还发明了超决定论概念，这是一种多重因果的理论，即在各种要素强化了一种情境或行动的地方，存在着一种比简单决定论更加复杂的观点。超决定论的例子是，当像气愤这样的情绪状态为过去对其他事物和其他事件的气愤所决定时，气愤也被带到现在的处境中。

参见："混沌理论"，"二元论"，"心身问题"。

威慑理论（Deterrence theory）

在政治中的威慑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控制理论，它假设报复的威胁可以防止个人、集团和国家从事侵略活动。有效威胁的最基本标准是一种可信的报复威胁可能性的确立。可信性的决定因素有：(a) 这种威胁是否被潜在的侵略者所理解，而这又要求清楚地表示报复的意图；(b) 潜在的侵略者是否认识到潜在的目标评价其策略地位足以实行报复；(c) 侵略者是否相信潜在的目标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报复。

威慑理论在犯罪学、法理学和策略研究中得到了最精致的发展。在犯罪学中和在法理学中，威慑为刑罚提供了一种功利的正当性论证。刑罚公开地作为对个人犯罪和大规模的社会的威胁：刑罚必须给予国家防范犯罪行为的报复意图以可信度。在策略研究中，一种区分存在于威慑的运用领域之间，威慑或者用于有限范围，如两个国家之间，或者用于一个地区或全球水平的扩大领域，如"策略防御"（"星球大战"）创制。另一个区分存在于固定反应威慑战略和灵活反应威慑战略，前者是预先决定了报复的威慑，后者的报复程度取决于侵略的规模。在肯尼迪执政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采用了灵活反应的威慑策略，他鼓励北约维持在欧洲的可信常规军事威胁，以便先发制人地使一切与

华沙公约军事力量的潜在的冲突迅速上升到原子战争水平。

参见："权力制衡"，"博弈理论"。

发展（Development）

当代西方的发展观念自始至终与经济增长、社会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观念都与充分工业化的观念相关。在此意义上，发展的观念和欧洲扩张的历史一样古老，在发展的名义下，**帝国主义**缔造了殖民者和殖民地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只要有发达国家的存在，必须有一些被认为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国家存在。

发展是**人类学**有限的几个用武之地之一。人类学家经常参与援助计划，研究援助计划是如何影响和改变接受援助者生活的。基于其在社区中的**田野作业**所获得的观点，或者基于其对小规模社会运作方式的一般性知识，人类学家经常为发展计划的筹划者提供其所需要的关于当地社会关系的详细知识。因此，人类学家的作用是扮演发展者和被发展者之间的中介，希望能够尽量地使计划满足当地的需要和期待。

人类学家同样关注本土的技术知识，即关于有利条件、危机、局限性等的实用知识，这些知识通常藉口头代代相传，常会被发展者忽视，因为他们过于关注科学和统计目标，而忽视了重大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参见：经济人类学；现代化；西方化。

发生生物学（Developmental biology）

发生生物学，是研究生物机体形成过程的科学。这门学科起

源于胚胎学。现代发生生物学，包括对细胞分化、特化和增生的遗传防治的研究。细胞的分化、特化和增生，导致了组织和整个机体的形成。

参见：胚层说，种质说，卵源说，泛生论，系统发育，畸形学。

生长周期（Developmental cycle）

生长周期的概念是人类学家福特斯在 1958 年提出来的，用以取代理想化的家庭观。在人的一生中，家庭组成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结婚生子时家庭膨胀，人老归西时家庭萎缩。家庭还有可能因为包含与之并无亲缘关系的人而膨胀，并伪称其具有亲缘关系而使其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合法化。关于家庭组成成长周期的研究让人注意到了它的变化性，而在以前，在统计分析中，家庭一直被视为一个稳定的生育单位。福特斯引进这个研究所必需的动力学观念，正是为了拒斥僵化的亲缘关系研究。

周期性变化的概念也用于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分析。为了充分实现其社会地位，一个人必须经历人生的各个特殊阶段，这些阶段通常是以通过仪式作为标志的。这种周期被用来解释个体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如何为维护社会现状服务的，个体在被赋予人生各阶段之特权的同时，也被诱导接受相应的社会规范的制约。例如，在肯尼亚的马塞人中，未婚男子组成一种独特的年龄会社，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相脱离，这些年轻的战士接受年长者的管教，然而，一旦这种年龄会社的成员晋身于长者之列，他们就会反过来享受管教年轻人的乐趣。中东地区的妇女对男人的依赖性就像一场交易，在那里，妇女的地位和名声是凭借其长子获得的。新媳妇的地位相当低下，常受同住的婆婆的管教，一旦她生了儿

子，就标志着其权威开始提高。

发生语言学（Developmental linguistics）

发生语言学，是在通向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方法之间，对索绪尔（1857—1913年）描绘的另外具有巨大影响的特征的一种反应。19世纪，语言科学在定位上，大多数是历时性的：它是关于各门语言如何在时间中发展的解释。另一方面，一种共时性方法强调：对于一门语言本土的谈话者而言，语言的历史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们及时考察特定时刻中的一种语言，它会被当作自我包容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同形成语言的历史过程分离开来进行分析。事实上，索绪尔提倡的共时性方法，本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已显然成为占居主导地位的范式。

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发生主义者开始向人们对共时语言学的严重偏见挑战，因为作为静态的现象，共时语言学代表一种关于语言的人为视点。语言变化的动力学过程，只是适应一系列互不相关联的语言学体系的人为概念。而这些体系的更迭，如同一根线上的珠子。不过，对于发生主义者而言，各种语言展现出巨大的差异，并从属于许多变化力量。这些力量，通过一种纯粹的共时性方法将难以把握它们。因此，发生语言学，把焦点集中在一门语言成长、变化的多方面活动上。这些活动，有助于解释一门语言如何形成它的方式。所以，第一、第二语言的习得、混杂化、语言的变化与方言的变更，都是特别重要的。这种方法的自然结果，是拒绝如下的观点：语言科学构成一门自治的学科。人们确信：来自其他研究领域的证据，包括神经病学、解剖学、社会史和人类学的证据，对于语言如何进化的解释，是直接相关联的。

发生主义理论一种口气较轻的说法会主张：语言的静态模式是不完全的，因为它们不适合语言变化与变更的过程。一种口气较重的说法将证明：静态的、共时的模式完全歪曲语言固有的动力学本性。两种情况下，都让人联想到：语言在社会交流与神经生物学的因素所构成的影响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平衡。语言的社会交流方面，由社会的无数可变因素而引起，包括社会地位、**性别**、**种族特点**、**话语**结构与实际的语境；它们会造成所谓偏离自然的发展。另一方面，语言的神经生物学方面，根源于人种的遗传天赋，决定着所谓天生的发展。语言的自然性概念，常常用下面的暗示解释天生的发展：一些语言的属性比起另一些来，更接近语言的原型本性。在某些特定领域，各种语言，根据它们接近原型的程度而显然有区别。作为其结果，一个语言范畴的各部分，可以按照标记的范围来排列，连同那些最接近原型的东西。这个原型，被描绘为无标记的。因此，发生主义者拒绝以下正统的看法：根据所有语言体系提供给它们的谈话人的交际资源，它们都是一样的；在原则上，因为某些效果；一种语言可以判断为比另一种好。

参见：比较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方言学；生成语法；混杂语与混合语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结构主义；转换语法。

德宗（Dharmic religion）

德宗是由伯德里纳特发明的术语，其他的激进分子用来指以施行德为中心的**印度**的宗教。这个词很难译，但也许最好译为“恭顺”，译为“英国人所期盼……”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孝道”概念。很明显，拉丁语 pietas（正如维吉尔的《埃涅伊特记》中的埃涅阿斯所例示的那样）和它非常相似，因为两者都内

含对诸神、人的祖先的崇敬，对长者的尊敬，对父母的顺服，对统治者的忠心，在对待人时的公正的含义。它们的差别在于：在德里，人们通过完成和他们的**种性**相应的社会角色来实现他们的德。种性是由业决定的身份，是对某人前世所行的德的回报。人不可能改变他的种姓或他的德，但信实将会在来生得到回报，并且是一种被改进的德。这正是《薄伽梵歌》的主题。在书中，克利须那，向阿朱那这位国王的武士兄弟显现，劝他不管因意识到不伤生（“非暴力主义”）而产生的忧虑，要忠实于作为一名武士的德、杀死他的堂兄弟。上帝本身有一种德。这德流溢、维系、反复吸纳着他本身。我们并不是自由的执法官；我们惟一的选择，在于是否完成我们的德，甚至这种选择也受业的影响。一位妇人没有她自己的德，一般说来，她的生命历程受她的丈夫的限定。丈夫使妇人在他死后，不可能再婚。妇人的忠贞和寡妇的信实，对于她的丈夫而非她本人的得救是必不可少的。

辩证法 (Dialectics)

辩证法（源于希腊语“讨论”）是一种哲学推理方法，它最初形成于古希腊。它是由对抽象事物的合乎逻辑的言说组成的。柏拉图和色诺芬写的那些苏格拉底对话录，显示了这种方法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实际情况。辩证法有两个路数，一是反驳，一是归纳。在前者中，对话的主角（在现存的对话录中，主角都是苏格拉底本人）让对话者说出他的想法，然后将这一想法在逻辑推演上可能导致的结论一一推翻，直到使这一想法再也无法立足。在后者中，对话的主角首先提出一个普遍性的陈述，然后向其对话者证明这一陈述对于一系列特例是成立的，因此就（含蓄地）断定它是普遍成立的。一个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在其《命

题篇》（Topics）一书中发展了辩证法。在他那里，讨论是从一个陈述或命题（“提出的观点”）开始的，例如“德性是好的”或“水是湿的”这样的命题，然后围绕这一命题进行争论，提出支持或反对意见，最后，通过对提出的论据进行衡量而得出结论。这种方法类似于后来的辩论会、**法庭辩论**以及政府辩论的方式，它们的缺陷也是类似的，其局限性不在于可获得的客观证据的多寡，而在于参与辩论者的知识，脾性和气质。亚里士多德本人已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在《分析篇》（Analytics）中）区分了真正的论证与辩证法，前者可被称为客观的、逻辑的证明，而后者是从意见进行推理。

在许多伟大宗教的**哲学**和法典中，辩证法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然而，在其中，辩论不再仅仅是在同时代人中展开的，它全面囊括了过去的陈述和意见，当代思想家针对前人的说法进行思考和评论，有时会一直追溯到宗教创始人本人的说法。这种方法，导致了两种独特的宗教伦理学体系，即**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教法）和**犹太教**伦理学。犹太教的辩证法，进一步发展为**基督教**的辩证法，然后，又被枯燥无聊的**经院哲学**滥用，后者在中世纪欧洲被认为是真正的学问。一种值得肯定的经院哲学，是所谓“论辩”，用于学位或职务的考试系统中，候选者围绕几个选定的命题进行论证或反驳，并根据其修辞能力而非洞察能力决定是否授予其学位或职务。（这种方法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伽里略的大学同事对他的敌意，他抛开了论辩方法，而采取了观察的反驳方法，他的同行对此种方法一无所知。）

在近代哲学中，黑格尔认为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推理过程，而且还是存在于历史、生命、思想以及宇宙运行中的永恒运动，从正题走向反题再趋向合题的运动。这样以来，辩证法不再是人为的建构，而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而人类思维仅仅是一个更

大的整体的特例。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让苏格拉底来谈论这种无法证实的观念，他会多么得意。

方言学 (Dialectology)

在**语言学**里，方言学根据方言本身的特质把它们当作**语言**体系来考虑。事实上，用一种完全客观的方法区分语言与方言，这是异常困难的。多数方言学家，实际上都采用往往由系列一向同各种方言相联系的特征构成的定义。因此，至少同每种方言相对应的语言之间，它们通常有着音系学的、词汇的和句法的基本的相似性。此外，一种方言被使用的区域，通常不能划入另一种语言（对许多语言而言，不可能存在相反的情况）。许多定义也承认：方言普遍缺乏有助于一门语言标准化的那些特征（建立的书写规则、词典、书面语法等等）。

人们可以孤立地研究方言。但长久以来，人们承认：关于语言本性的许多赋有成效的洞见，是通过系统比较各种方言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发展变化的方式得出来的。的确，基于区域变化大规模调查方言，构成方言学研究的中心焦点。区域方言多样性的研究表明：语言的变化，不只是语言的一种表面的、由地理决定的特征。相反，变化被显露为人类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例如，人们的研究结果曾显明：区域方言变体的存在，在语言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传统的方言调查的目的，旨在确定一种给它的方言的核心特质。这种给定的方言，是一个共同体的土著语言，一种共同体的成员在孩提时代习得、成人定期地使用的语言。在这种情境中，所谓“非流动的乡村男性老人”，常常被选为提供方言资料的人，因为他们往往可以最可靠地提供传统的言语形式的资源。考查一

个共同体的方言是否存在稳固的人口和与外界相对少的接触，这是方言学研究相对明确的任务。但 20 世纪显示出如下的特征：人口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迥然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之间伴随着接触机会的增多，再加上通讯系统权力的戏剧性增长。其结果造成许多方言日趋消失。在 19 世纪，这些方言，同偏僻的乡村共同体相联系。因此，当今方言的调查常常带有**分类学**演习的性质。研究者设计出这种分类演习，是要记录面临灭绝危险的语言的变化。

还有一种通向方言学的可选择的**社会语言学**方法，它并不期望遇上这种语言的纯粹性。其着重点的差别，是由以下的认识促成的：语言的变化，常常同某些社会因素而不只是和一个地理区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样，人们曾发现：社会地位、性别、谈话的社会背景、谈话的类型，都是重要的因素。语言运用在各种给定的语境中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产生出不同风格或音区的概念。其中，每一种风格或音区，带有自己特定的词汇和结构规则。因此，律师在法庭上使用的音区，非常不同于足球队员在调温室里所用的。每个人向来掌握着特定音区的全部领域，它们使个人在一个给定的背景下具备正确言说的能力。所以，变化并不只是局限于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的方言间的比较。它是每个人的言语一大固有的特征。

自然音阶论（Diatonicism）

自然音阶论（源于希腊语 dia tonikos，“一个音的音程”）是（人造的）声学体系。这个体系，构成大部分西方音乐的基础。一个音调与同一音调的底八度音或高八度音的音程，被分为全音和半音音列：这些音列，就是调式或音阶。（一个调式从开始音

算起，将八度音分为六或七个单位，而一个音阶，却分为八个单位)。自然音阶，含大调式（全音—全音—半音—全音—全音—全音—半音）与小调式（全音—半音—全音—全音—全音—全音—半音——今天，常常伴随着由小三度半音取代的最后两个全音)。

自然音阶音乐中，旋律的每个全音音列——从全音过渡到全音——或和声的和音，必须同基本音阶相一致。自然音阶的音乐，据说“用”的调式或调是按照该音阶赖以开始与结束的音符命名的。最初，自然音阶体系外，不允许有任何音符，但随着音乐变得更加精细化，人们引入了转调观念：使用自然音阶基本体系外的音符，短时间或长时间地将该音乐转入其他体系（参见**多音体系**)。

古希腊人使用各种调式——这些调式类似于音阶，只是七个调式中的每个调式，全音与半音的排列彼此有细微的差别，因此对应着细微不同的“特性”——它们赋予每个调式以特殊的主观“意义”。多利亚调式英勇好战，利第亚调式脉脉含情，弗里吉亚调式充满牧歌情调，等等。音乐带有一定的联想，在习惯上创作者得使用相应的调式。因为，除了它们的起始点外，音阶乃是彼此相同的，不存在调式的联想。不过，17、18 世纪的欧洲，当铜管乐器相对简单的特性意味着它们只能“用”某些音阶来演奏时，那些音阶就同使用铜管乐器的音乐相联系，并联想到创作该音乐的原因。例如，狩猎与军乐，通常用 B 降调、C 或 D 调。同样，牧歌音乐使用风管，常用 G 调（风管的自然音阶)。某种程度上，这些联想定式甚至在器乐形成后保留下来。器乐可以轻易地演奏出所有的变音音符。19 世纪末，作曲家斯克里亚宾与其他人，实验给与（或试图发现）每个调具有的特定的心理联想意像，以此来创作音乐。但是，这种思想只有短暂的流行。

至少，从古希腊时代以及也许是更远的时代以来（没有什么证据流传下来，因而无人知晓），自然音阶音乐一直成为了西方音乐的标准。它不断受到其他体系的冲击，如**民间音乐**，常常将自然音阶的八度音分为比全音和半音更小的单位。变音体系使用的连续扩展，曾丰富并修正了自然音阶音乐。但是，自然音阶音乐从未被取代过，在所有形式上，它是大部分西方音乐经验的根基。各个时代，人们曾想阐明自然音阶音乐是乐曲本身所特有的，并在声学上可以得到确证。但是，现代的学者们声称：这是一厢情愿的思考，并且，我们只是简单地假定它，因为我们的耳朵几千年来对自然音阶音乐已经习惯了。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多元论的现代，我们对其他传统（特别是来自非洲与东亚的传统）的非自然音阶音乐不断的熟悉，和电子技术的应用（这种技术允许对八度音进行无限多样的分割），开始颠覆自然音阶论。不过，这个过程，依然不是那么的超前，也许，像变音体系一样，它会作为对自然音阶论的丰富而不是取代告终。

参见：音调、调弦和调律；调性。

独裁专政（Dictatorship）

独裁专政是个人或少数团体完全行使行政和立法权而不受宪法制约的政府形式。虽然独裁专政一词现在用于贬义，来描述暴政权威人物，但独裁专政原来是指宪法指定个人在军事紧急时间对罗马共和国进行暂时的管理（拉丁语 dictator 的涵义是一个人能不花时间咨询就可以给予秩序）。作为罗马习惯法的回应，现代独裁统治者常常努力强调在不稳定时期实行独裁管制的必要性，从而将他们的权力前提合法化。在宪法传统不够强大，军人自古以来在政府中充当干预角色，**现代化**危机已趋尖锐的地方，

更可能出现现代独裁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设想出来的名称，特指推翻资本主义之后的时代；他认为在这一时代工人阶级必须掌握生产资料，必须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残余。马克思认为，正像罗马模式一样，这种专政是暂时的，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国家必须消亡。但实际上有些人则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的独裁专政。

参见：权威主义，马克思主义。

微分（Differential calculus）参见分析；微积分

传播论（Diffusionism）

“传播”一词（源于拉丁文 diffunder，本义为“发送出去”）被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用来表示诸如艺术传统、**语言**、**音乐**、**神话**、宗教信仰、社会组织、技术观念等**文化**样式在历史上从一个社会到其他社会的扩散。首先使用这个词的是人类学家泰勒，他在《原始文化》（1871 年）一书中用这个词说明特定的文化要素何以会出现于并非其发生地的社会当中。

泰勒的著作此后在人类学家中引发了长达 50 年的论争。传播论者运用不同地区的文化相似性材料绘出了文化地理分布图，提出所谓“文化区域”说。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埃及考古发现不断增多，史密斯等人提出埃及文化是扩散的原型，认为各种文化特征是从这个“文化的摇篮”撒播到世界各地的，就像一块投进池塘中的石头激起的涟漪层层向外扩展一样，他们认为，这一过程是由文化接触、贸易或人口的迁徙引起的。相反，进化

论者指出，假如在不同的社会中发现相似的文化特征，可能仅仅是平行发展的结果，不同的民族固能沿相同的理路进行尝试和发明，而无须有什么实际的接触。

到20世纪后半期，在人类学界，传播论—进化论之争归于沉寂，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关于历史的主张都无法得以证实，人类学家转而关注从当代一些社会中收集到的那些田野作业材料。然而，在考古学领域，这种论争仍在继续，并受到放射性碳测年法的推动（此种方法是利比在1946年创始的）。争论集中于人类的发源地和扩散途径（这一研究依据骨骼的考古发现）、物质文化的渊源（这一研究的根据是人工制品、作物种植、金属冶炼技术等考古遗迹）。

在传播论—进化论之争中，社会学家一般是站在传播论一边。有的社会学家走得更远，甚至认为，时至今日，文化传播日益深广，以至于现在所有现代化社会都是同一种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的传播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是必需的；其反对者则指出，恰恰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向第三世界的传播造成了后者的落后而不是发展。

社会学家还在更为精确的意义上使用“传播”一词。模式化研究表明，扩散的过程是最初较慢、然后加快，最后当尚未波及的人越来越少时，再次变慢，这种模式类似于疾病的传播，但一般认为社会传播较之疾病的传播更变化多端。

参见：考古学；同化；文明；趋同理论；依附理论；种族考古学；进化论；田野作业；全球化；规范；社会；混合派教义；现代性理论；价值；世界体系。

数字逻辑（Digital logic）

数字逻辑（“逻辑”一词源于希腊语 logica，意为“推理”）是一种用来设计智能电路的方法。数字逻辑在目前最常用的场合是数字**计算机**的控制和算法功能，离开它，现代社会将陷入停顿。

数字系统用离散值表示要传输的信息，最简单的例子是仅用两个值，0 表示“关”，1 表示“开”，这样的系统被称为二进制系统。

第一次将数字逻辑应用于电路的是美国的香农，他在 1938 年将**布尔代数**（见**布尔逻辑**）应用于开关电路的设计，开关电路是一种二进制系统。布尔代数使对诸如“与”（AND）和“或”（OR）这些逻辑函数的数字控制成为可能，例如，一个有两个变量输入的“与”函数，只有当两个输入值都是 1 或“开”时，其输出值才会是 1 或“开”，这里，要求一个输入与另一个输入皆为 1，其输出才为 1，任何其他的输入组合，如两个输入都是 0 或“关”，或其中任何一个是 0 或“关”，其输出都将是 0 或“关”。

香农最初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简单的智能电路，例如，设计一种用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的电路，当两个开关全都合上时灯才会亮，在这个例子中，开关设置中应用了上述逻辑：如果两个开关的值不全部是“开”，灯的值就是“关”。因此，像“与”、“或”等逻辑函数就可以通过电路开关的设置得以具体的体现，这种开关电路称为逻辑门电路。

不久人们就认识到，只要根据布尔代数配置必要的逻辑门电路，就能用电路实现简单的算术计算如加法计算，这一认识导致

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个电子计算器的问世。

随着其他电学领域的发展，如**电子学**理论、**半导体元器件理论**等的发展，人们运用逻辑门电路和磁带驱动器、数字集成记忆电路发明了记忆单元，它能够保存逻辑门电路算术运算的结果，使计算机能够按**程序**运行（计算机程序包含一系列指令，其中有的指令是运用门电路执行算术操作，有的指令是运用门电路判断一个开关是“开”还是“关”，从而判断相关的条件是否满足。）记忆单元使程序能够自动运行，并将逻辑运算的结果保存起来在需要时随时调用。

现代数字计算机是数字逻辑发展的高峰。给计算机输入一个信号，计算机将在储存于记忆单元中的程序的控制下处理这个信号。这种程序意味着现在人们能够在一秒钟内进行上百万次的计算，这在以前是无法达到的。

维度（Dimension）

在**数学**中，维度（拉丁语，“横穿测量”）是最基本的**几何**概念之一。数学对象的维度，是描述其每一可能成员时所需的最小坐标数目（参见：**笛卡尔坐标系**）。例如，一条线的维度是 1（因为表示一条线上某点的位置，只需一个数就足够了），描述地球环绕太阳运动的系统具有维度 12（太阳和月亮的位置描述分别需要 3 维，它们速度的描述则又分别需要 3 维）。还有些系统，需要有无穷多坐标才能描述（譬如液体流动的某些复杂描述）。

最近，数学家还发现了**分形**：具有分数维度的物体。例如，某些物体上点的位置，需用一又二分之一个数来描述，这大概是现代数学中听起来最荒诞的想法之一了。由于（通常）从一维线中产生出来的分形方式，如此复杂以至于不能仅用一个数来描

述，但是，为了获得二维性，它们并不是以这种不得不采用的方式充满空间的。

话语（Discourse）

话语（源于中古英语，意为“口头交流”）是批判理论、**语言学**、文学理论、**社会学**诸多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术语尤其与法国哲学家福科（1926—1984年）等有关，他用这个词描述**文化**、**意识形态**、**语言**、社会中的运作方式，以及这种运作体现和维持**权力**及其操纵者的方式。对于社会学家，话语是指知识的专家体系和社会的维护措施，它们与社会的公共假设融为一体。其作用是封闭其他可能的思考、谈论或行为方式，其权力通常是藉描述事物的语词得以维护，律师的行话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至于科学分类体系、宗教**仪式**模式等则是较复杂的例子。福科及其追随者主张运用“知识考古学”，通过解构相关话语对社会结构和它对诸如疯狂、**性**等事物的态度进行研究。

在文学理论中，话语研究方法依据过去社会及置身于其中的个体或群体的精神背景对创造性的作品进行考察，这种精神背景使作品的内容和意义得以凸现。因此，荷马的《奥德赛》就不能仅仅凭其意象、叙述和诗学品质得以充分的理解，而且还必须知道荷马在写作时的精神背景、荷马作品所依据神话的创造者和讲述者的精神背景、荷马的听众社会的传统和观念以及我们在阅读荷马时的精神背景。诸如此类的知识会彻底改变我们对一部艺术作品的见解，例如女性主义对简·奥斯丁小说的读解。

语言学对语言性质的研究直到最近还几乎完全局限于对个别句子或句子成分的分析，然而，情况越来越明确，较之句子更长的语言序列更值得注意。因为话语并非毫不相干的句子的随意组

合，实际上，不管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独特结构，除非我们超出句子的层面，否则就无法把握这种结构。一旦我们着手对语言的组织方式进行探索，关注的焦点就必然从作为一个抽象对象的语言转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语言的使用方式。

全面的话语分析必须考虑一个文本的说（写）者和听（读）者及其社会语境，尽管有这种多重的理论取向，话语研究的核心仍是语言在言谈或写作中的运作方式。从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模式出发研究课堂中的语言是运用这一原则的一个有影响的典型。有论者主张，通过有意地偏离那种纯粹基于语言形式的语言，就能将话语描述为一系列的单元，这些单元是按照其在话语中的功能确定的，例如，课堂中一个普通的互动序列包含三种所谓的行动：发起、反应和反馈，各有其不同的话语功能：

教师：2加2等于什么？——发起
学生：5。——反应
教师：恐怕错了吧。——反馈

每一种行动又包含一个或多个低一级的层次单元，被称为行为；另一方面，行动又相互结合为更高一级的层次单元，被称为交谈，这样，发起、反应和反馈这三种行动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课堂互动中的一个典型的交谈。在这一模型中，多次交谈结合在一起对一事进行处理，多次处理就组成为一堂课，这是课堂互动中的最高单元。

更重要的是，这一分析揭示了话语的结构具有层次性，一个层面上的多个单元结合为上一层面上的一个单元。话语层次的概念被从各个方面加以修正，用于课堂互动之外的其他领域。显然，这一分析将话语视为一系列行为，其对互动结构的描述并未

诉诸所采用的具体语言形式，其他各种话语分析模式则强调，要弄清传达和理解信息的能力，需要考虑话语的社会语境，而不应仅仅关心语言形式是如何组织为语句的。

参见：统治的意识形态；霸权；现实的社会建构；社会控制；知识社会学。

歧视 (Discrimination)

歧视的字面意思是辨别，即判断或区分客体、人物和属性。在政治上，它是指正式规范地参照那种不合适的、对假设的使命与功能怀有偏见的标准，不公正不平等地对待个人或团体的任命或提升。歧视的意图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消极的歧视是正式地以种族、性别、年龄、语言、宗教、民族性或性别取向为基础，用于否定个人或团体靠近某种特权地位，或否定他们接近权威的机会。例如，在南非对黑人投票权的否定就是以一种种族标准为基础否定黑人接近权力，而种族标准与这个人实行政治选择的能力无关。相反，积极的或逆向的歧视是归还个人或团体一种优先权或机会而努力补偿过去消极歧视的不足（参见“肯定行动”）。

歧视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间接实施的。直接歧视可能最明显是有害的，但事实上它的暗示也让它在公开的调查中更难防范。间接歧视的隐蔽性质让它渗透于一切制度，所以它在潜在意义上害处更大。间接歧视的例子包括：大学入学考试中根深蒂固的歧视穷人的文化偏见；为造成某些共同体代表名额分配不足而弄虚作假，“擅自改划”选举界限；雇佣来自某些学校的人，恰巧这些学校的学生人数不平衡，又具有特定的自然文化背景。

参见："保守主义"，"平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

疾病（Disease）

疾病是指人体的功能受到损害，它包括人体对损害的感知（症状）、医师观察到的病症（体征），以及可识别的生物化学或细胞学改变（病理变化）。如果疾病病因明确，将有助于提高疾病描述的质量，增加它在临床上的使用价值；如果已经建立起公认的对疾病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它的使用价值将进一步提高。

西方医学重视疾病的外因（如损伤或有害制剂）。19 世纪，在英国人们注意到清扫烟囱的男工中普遍患有阴囊癌，因此，人们称煤焦油为有毒物或致癌物。微生物学研究表明：细菌、真菌和后来的病毒是许多疾病的病因。此外，科赫（结核病病因的发现者）也认为一种微生物要导致某种疾病的产生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百年后，科赫的假设仍然令人信服，然而也常被人们所忽视。例如，对结核病的认识虽已深入到该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但结核病的发病率或患病率仍无法预测，这就提示其病因除病原体外，还需要考虑其他致病因素。

另一类疾病是由于缺乏生命所必需的物质所致，例如：失血可导致缺铁性贫血，其治疗方法是止血和补充铁剂。恶性贫血患者不能吸收一种叫维生素 B12 的生命必需物质，这种吸收障碍很难治疗，简便的治疗方法是注射维生素 B12。除个别情况外，营养缺乏性疾病的分类仍没有充足的科学依据。最常见的营养性疾病是营养不良、饥饿，以及西方国家流行的痼疾——营养过剩。内分泌腺功能失调能通过内分泌系统功能不全或亢进而导致疾病。

仍有大量的疾病，对其认识模型或描述并未深入到疾病病因、预防措施或治疗方法。

对糖尿病的一项实验检查，是人类思想与医生行为之间相互影响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糖尿病病名的意思为“虹吸管”，最初以“撒尿鬼”而闻名。17世纪生物化学诞生前的内科医生们发现：该病表现为尿频、尿多，尿液中带有甜味（所幸的是，对研究者来说这些令人恶心的研究往往带来丰厚的回报）。大量呈甜味的尿液形成原因是：血液中过量的葡萄糖进入肾小管，在肾小管处吸取人体大量水分，以便使尿液维持在“正常”浓度。血糖增高是糖尿病的主要病理现象。19世纪末，实验发现切除动物胰腺后，动物会患上糖尿病。1921年班廷和贝斯特共同发现了胰岛素，并把胰岛素用于治疗糖尿病患者。然而，当幸存者的急性病理变化发展成慢性病理时，仍然会对生命构成威胁。生化知识的积累，以及后来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最终准确且清晰地揭示出新陈代谢的全过程。糖尿病是一种复杂的、常见的代谢性疾病，其中，合成人体需要的能量的“喷烧器”，似乎因许多可阐明的理由而发生喷溅现象。胰岛素的不足，可能也是造成这些原因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糖尿病的治疗须靠饮食调节。由于血糖增高，碳水化合物（一种含糖的食物成分）被认为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糖尿病患者必须进食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也就是说，须进食高蛋白质、高脂肪的膳食。糖尿病患者的食谱，与战争时期人们因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所进食的食品相似，在这类人群中，心脏病发病率增高。在实验室里，用这种食物喂养兔子，也获得同样的结果。

对食物中蔬菜纤维重要性的认识，是源自于对乌干达人膳食结构的观察：他们吃富有纤维素的食物，其结肠癌的发病率较低。由此也带来了对糖尿病认识上的另一个转变。这产生出一些

采用高纤维素、全谷类食物治疗糖尿病的临床试验。这些试验表明：这类食物对许多并发症也有预防效果。因此，在发现胰岛素后，形成了对糖尿病的合理治疗方法，而这些治疗方法很少受到阐释该病发病机理的精确的生化模型的影响。一些揭示出糖尿病重要信息的临床试验，均直觉地源自于早期有关高纤维膳食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已影响到人类对所吃的食物究竟起什么作用的思索方式。许多试图从谷物中分离出预防糖尿病的有效成分的努力均已失败。富含全谷类的膳食，对糖尿病有明确的治疗作用，但是究竟它是如何发挥治疗作用的却不得而知。

西方医学倾向于强调疾病的外因。例如：当情感因素诱发疾病或情感障碍成为疾病的临床表现时，往往将这类疾病划归为“应激性障碍”或外源性疾病。相反，传统中医学则列举出 14 种疾病病因，其中 7 种为疾病外因（热、冷、干燥等），7 种为疾病内因（情绪等）。

参见：流行病学，健康，医学。

转移（Displacement），参见：防卫机制（Defence mechanism）

感觉分离（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

“感觉分离”是 T·S·艾略特提出的一个术语，用于诗歌写作活动。简单地讲，他区分了“反映性”诗人和“知性”诗人，前者将语词和意象作为“感性的技巧”，用以“吞灭形形色色的经验”，后者则将其感觉与诗歌写作活动分离开来。表达玫瑰的香气是一件与经验玫瑰的香气完全不同的事情。在文学批评界，这

个概念一度盛行了半个世纪，但即使艾略特本人，后来也后悔不应将这个概念当成一个关于诗人的普遍性观点，除了弥尔顿·德莱登及其模仿者（艾略特最初正是把这个概念用于这些诗人的），这一观点显然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占卜（Divination）

占卜（源于拉丁文，意为“根据征兆进行预测”）是一种历久不衰的人类活动，它让人们觉得自己能与他虽有所知却又永远无法把握的存在之维——时间——保持联系，准确地说不是支配时间（参见时空）。占卜无非是通过对存在的现象进行解释以预言未来的活动。例如，古罗马人，就是古代所有民族中一个最狂热而迷信的民族，他们常常通过观察鸟的飞行，倾听雷声，解释过路人随意留下的痕迹、家畜突然的怪叫，考察某些用作牺牲的动物内脏的颜色和形状占卜未来；实用主义者（诸如海军将军未能预测到他想发动战争的时间时，他会把一群神秘的鸡抛向船外）是很罕见的。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成百上千种占卜方法中，最常见的有如下几种：**占星学**（根据天体占卜）、书册占卜（随机地从书中拈出几个句子，然后将它们与卜问之事联系起来。在西方最常用的书是《圣经》和维吉尔的《埃涅伊特》）、拈阄（随机地从一大堆东西中抽取一个，认为可从这种选择中得到超自然的启示）、晶体卜（根据岩石或结晶体的形状进行预测）、占梦（根据梦进行预言）、云卜（根据云彩的形状占卜）、**手相术**（根据人们手上的纹路进行占卜）、骨相学（根据人的头颅的骨相进行占卜）、树叶卜（根据风吹树叶的响声占卜）、火卜（根据火焰的形状占卜）、棍卜（根据将火柴棍状的棍棒随机抛在地上时所形成的构图进行占卜）、树结卜（观察树干上的疤结及疤洞进行

占卜)。最流行的占卜术，是**数字占卜**（根据数字的排列组合进行占卜），古代的巴比伦人、中国人、埃及人、玛雅人以及其他不少民族，都用这种方法预卜未来，我们今天仍在使用这种方法，构造统计模型和计算机模式，自以为或者（像古代的数字卜筮者那样）谎称它们决非仅仅是有知识的猜测。

参见：魔幻数字；通灵术。

劳动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

劳动分工的概念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劳动分工的理论最初是由亚当·斯密（1723—1790 年）提出来的，指根据任务对工作进行专门化。斯密将劳动分工视为市场规模和生产单位规模增长的结果，在经济学理论中，这被称认为是**规模经济**的根源。

社会学在三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首先，它可以指劳动的技术分工和生产过程，亚当·斯密用这个词指由于将工作进一步细分为由操作工人操作的简单环节而导致的专业化，按此种方式组织生产，能够提高工人的生产力，降低劳动成本。在马克思看来，这样对劳动的划分，对于工人而言，工作将丧失创造性和意义。

其次，“劳动分工”被用来指劳动的社会分工，在此意义上，它可用于指整个社会。这时，它一般是指社会区分，即社会生活中不同领域的划分，如家庭和工作。

第三，“劳动的性别分工”指男人和女人之间工作的分工。不同性别的劳动分工通常是被归结于生物学差别，然而，女性主义则从普遍存在的男性统治和家庭与公共领域的分离寻求其根源。

参见：异化；官僚制度；履历；比较优势；进化论；女权主

义；性别；全球化；劳动过程；职业；组织；专门职业；理性化；社会闭锁；社会分层；社会；地位；工作。

半即兴式爵士音乐（Dixieland）

半即兴式爵士音乐（其名称源于人们给美国南方取的绰号），是一种**爵士**音乐，在欧洲被称为“传统”爵士乐，它是由**新奥尔良爵士乐**发展而来的，其标志是一种“比较粗犷”、更自由的风格，这表现在其即兴独奏和即兴合奏两个方面。

实录戏剧（Documentary drama）

实录戏剧是指直接依靠实事材料和常久融合性引用实事材料的戏剧与戏剧事件。与**历史剧**一样具有的问题是，作者的视点常常决定了批评反应，因为实录的意图是提醒公众对于戏剧地呈现的主题有所意识。皮斯卡托在“生活报道”和“利特尔沃德作品中实践的实录戏剧”，是20世纪美国和欧洲戏剧中重要的亚剧种。

12音体系音乐（Dodecaphonic music）参见序列音乐

统治的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

统治的意识形态指一个社会中主要的观念、价值和道德，在关于现实的多种可能的观点中，它仅仅是其中之一。然而，这种观点却可能被安排得天衣无缝，以至于在其社会的成员看来它似

乎是天经地义的和毋庸置疑的。在一个社会中，可能多种意识形态并存，但其他意识形态却不可能享有统治意识形态那样的说服力，也不可能像后者那样被普遍地接受。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指出，意识形态很少是中性的，而是为社会的权力群体凌驾于弱势群体之上的利益提供辩护和根据。统治意识形态学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从属地位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统治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统治观念总是其统治阶级的观念。女权主义从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道出了相似的观点。

像**艾伯克龙比**这样的社会学家对统治意识形态学说提出批评，认为它高估了统治性的文化对不同群体的整合程度，同时低估了不同群体形成与统治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观念的能力。

参见：同化；阶级；冲突理论；批判理论；文化；话语；霸权；意识形态；内在化；马克思主义；规范；权力；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社会化；社会运动；知识社会学，亚文化；价值。

双面理论（Double aspect theory）

在哲学中，这种理论认为，尽管心理和物理方面或属性根本不同，但它们仍然是同一事物的方面或属性。心理和物理属性是判然有别的，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归结为另一方。它们根本上互不相同，哪一方都不能被看作比另一方更加实在。但是它们仍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那些从根本不同的心理与物理属性出发宣称心非物，心灵没有物理属性，肉体非心灵，肉体没有心理属性的人都是错误的。

参见：二元论，心身问题。

双重结果原理（Double effect，doctrine of）

在哲学上双重结果原理是：即使我们能够预见行为将产生坏结果，这些行为在道德上也是被允许的，只要不是有意造成这些结果。例如，一个在打仗的国家为了摧毁军事目标而轰炸敌国的城市，这些军事目标又接近居民生活的地方，许多公民在轰炸中死亡。但是，由于目的仅仅是摧毁军事目标而不是屠杀公民，这种轰炸是允许的。

双重结果原理在某些道德神学家中间颇为流行，但是极难与通常的责任观相协调。我并不想放大音响惊扰我的邻居，我只是想自己欣赏。我仍然要对我明知故犯而引起的不快负责。双重结果原理是反唯行为后果论的，因为它声称我们不必对一切可预见的行为后果负责，只是对我们有意造成的后果负责。

参见："唯行为后果论"。

戏剧（Drama）

戏剧，源于希腊语，"行动"、"表演"是它的原始涵义。它第一次在技术意义上用来指事先写好剧本的舞台表演，这是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用法。对戏剧艺术，尤其是其文学形式上的戏剧艺术更为理论化思考也是开始于亚里士多德。但是，在现代，随着人类学、考古学、古地理学越来越发现了全世界更多的人类行动，戏剧观念就包含了上述第二种意义，即"表演"，因而戏剧观念包含了比亚里士多德所想象的远为广阔的范围。

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戏剧的本质成分是模仿（mimesis），

即对现实的模仿或再现。法国特鲁瓦古代洞穴壁画上手执鹿角跳舞的人像为最早时代的这种理解提供了线索，这条线索得到了全世界各地所发现的证据的支持。舞蹈者模仿动物，用舞蹈模拟它的动作。也许它是某种仪式的组成部分，这种仪式的目的在于祈求正在注目的神民保佑打猎成功；也许它是打猎之后的再次表演的一部分，为的是庆祝成功；也许它是可以称之为打猎的抽象再现的一部分，只是为表演而表演，除了娱乐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在古代以色列，一只羊在仪式上负有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原罪与罪恶，必须被驱逐到荒野让野生动物吃掉，这种仪式在双重意义上是真实的和象征的戏剧。基督教弥撒上牧师给每一个崇拜者面包和酒，牧师同时就是在重新演示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的行为，又是在这一片刻创造一种现实的崭新的行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仪式的要素，真实的行动，也许在戏剧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印度寺庙舞者迈开游行方阵，牙齿闪闪发亮、高高跳起的恶魔和降服他们的神民，或者这些舞者以屈服的姿态、谄媚和亲昵的注视（再次表演勾引牧牛女的故事）迎接不可见的黑天神王的降临。这里突出的重点转到另一方面，表演中的取向更多是统治，而更少仪式。但是，日本能剧中的打斗与引诱，中国古典戏剧中幽灵和魔鬼的出没，与礼仪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几乎存在于表演的整个过程，给观众带来享受。它们是戏剧而不是礼仪，同样，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打斗、席勒戏剧中的疯狂，都纯粹是表演。

把一种戏剧表演称为“纯粹的”，这实际上回避了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的另一种重要主题，即戏剧表演的目的和功用。在一句已变成无意义行话的说法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戏剧的功用是唤起“怜悯与恐惧”（即认同人物及其困境，对所表现的事件以及人们自己内在情感或思想可能导致同样灾难的可能性的恐惧），从而净化观众。亚里士多德特别地讨论了雅典悲剧如《俄狄浦斯

王》中描述的令人敬畏（字面上的令人敬畏）的事件。在一种层面上这也是一种仪式功能，雅典戏剧是盛大的宗教节日的组成部分，具有从舞蹈到献祭、从游行到公众祈祷的各种各样的仪式。在另一种层面上，亚里士多德所暗示的是这种普遍娱乐（而不仅仅是戏剧）所激起的兴奋感、心理满足感。（这是一种狂喜，一种自我丧失感，一种被征服的瞬间，即在理性自制与沉迷于本能的“更高现实”、“更高知觉”之间的门槛，而达奥尼索斯就是这种狂喜的神民。在神话中，为了产生这种狂喜，达奥尼索斯给有限的人生两件独特的礼物：神圣的舞与酒。）

雅典的酒神节（即达奥尼索斯庆典）与这种狂喜最为相关。戏剧竞赛仅仅是激发狂喜和庆贺狂喜的一种方式。表演的空间如此安排以便在露天的空间所有观众彼此相望：观众本身也成为场景的构成部分，不仅与戏剧中描写的人物同一，不仅与职业演员与歌手同一，不仅与（城邦各地位精选出来的业余表演者）合唱队同一，而且也与其他观众、其他参加者同一。这种普遍的同一现在仍然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宗教剧表演中，而且仍然可能发生在我们今天世俗的戏剧中，具有激动人心的效果。

亚里士多德不是牧师，也不是戏剧实践者，他是个学者，提出理论并依赖证据。为此，他对我们今天可能当作是戏剧的人类学和心理学作用的东西（对此我们只能断言而不能证明）所说甚少，他更多讨论的是现实存在的表演。他参照特殊的戏剧表演来证明他的观点，这些戏剧离他相对较近（大约写于他之前的一个世纪），许多还是当时流行的剧目。（就算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是精挑细拣，他的理论适合于他屡屡引以为证的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但很不适合许多其他存留更长时间的希腊悲剧，尤其不适合于欧里庇德斯的作品。）他只是论述了书面戏剧，口传戏剧传统只是偶尔提及，这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这种口传戏剧对于听众和读

者是不可接近的，或者都是些书面戏剧所不足的变动的证据。在自此以后（至少到20世纪）的戏剧研究中，这种因素导致了如下观点的形成：书面戏剧也许是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艺术，起码是西方优越的艺术。（在西方喜剧中，书面戏剧是“高级的喜剧”，而即兴戏剧是“低级喜剧”，好像学者关注的可能性就提高了这种形式。）戏剧一词有时也被认为具有仅指书写戏剧传统的意义，结果是忽略了大部分东方艺术形式的口头传统和自然生长的传统，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戏剧仅仅是指西方戏剧及其表演方法。

亚里士多德把戏剧分为两种主要的等级类别，**悲剧**与**喜剧**。尽管《诗学》中论述喜剧的章节已经失落或仅存残篇，其大部分现存的章节是论述悲剧，但是他的观点在西方仍然运用于所有的戏剧形式。由于他为思考悲剧而设立的前提是以逻辑的哲学基础建立起来，所以它在所分析的戏剧上施加了他认为对生活是必要的逻辑价值。一种对道德与社会作用的反思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他的种类等级之中（后来罗马作家在他关于为什么写作、如何写作的诗中即《诗艺》中糅合了这种反思，不过在他笔下，“诗歌”在这里实际上指“文学”）。随着读写能力的增长和对经典知识的渴望，——这标志着**文艺复兴**期间西方的精神生活，这些观念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戏剧的发展，对种类划分、形式结构和社会作用的强烈意识决定了写作戏剧与感受戏剧的方式。比方说，一般认为悲剧仅仅是为了使贵族痛苦，喜剧则涵盖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诗歌**就是悲剧的语言，被提高到日常生活的言语之上，所描述的情感与困境被认为是升华了；散文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和喜剧的语言。

上述区别——以及从亚里士多德和他所分析的戏剧之中派生出来的比较次要的思想，如五場结构——也对文艺复兴以后的戏

剧发生了重大影响，既影响了雅剧作品（如拉辛的作品），也影响了大量枯燥乏味、规则严格和陈规旧套的戏剧。但是，也存在着一种生气勃勃的可选择的传统，一种几乎可算是**后现代主义**的折衷主义，这可以在卡尔德隆、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等人的著作中体现出来。这些戏剧的灵感部分地来源于古典理论，部分地来源于方言传统，部分地来源于他们自己的想象力和他们所写的每一个别作品的需要。职业喜剧与惩治异端（Commedia dell'arte and auto da fé）是决定了这种戏剧的两大著名的传统，它们现在却具有了一种令人伤感的特征，与它们所影响过的戏剧风格相比，它们更不为人所知。像给予约翰逊创作灵感的四种**幽默**的**占星学**思想这样的异类理论导致了戏剧领域的实验，这种实验就如我们现代的戏剧家所使用的荒诞理论、**异化**理论一样令人着迷，妙趣横生。

尽管几百年来的戏剧实践中技术有所发展（如场景设计、照明与化妆），但在戏剧理念方面却很少发展。古希腊和拉丁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更小程度上的莫里哀戏剧对席勒和雨果这样的文学巨匠产生了重大影响；成千上万的“完美戏剧”被创做出来，受人大加赞美和最后消失——麦塔斯塔修（metastasio）的自由歌剧就是最好的证明，恪守亚里士多德的规范和索福克勒斯以及塞涅卡的实践，但是舞台生命被抽空以至于克拉克或莫扎特这样天才音乐家的作品也无法使戏剧场面起死回生。变化发生在19世纪。当时**自然主义**的信徒倡导遵循达尔文的“环境决定行为”原理，把观察和分析的科学技术运用于戏剧（这种方法在19世纪初以来，尤其在法国小说中形成，在19世纪中渗透到戏剧中，1880年左拉“自然主义与戏剧艺术”一文发表，这一趋势被给予了强大的动力）。在戏剧中严格使用这种理论常常是不成功的，就像前一个世纪的**新古典主义**一样。陈腐格套和简明清

晰的独幕剧，“**精心构造的戏剧**”，其中虚幻的人物表演了在场景中的没落（这种没落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缺陷”，而是因为不堪忍受的环境，亦或像贫困、梅毒的疯狂等可怕的遗传素质），即使是今天非常自重的计算机也无法确定这种场景的作者归属，因而这些戏剧都成为过时的陈规。比较成功的自然主义戏剧家——从质量之树的顶端的易卜生，到低级的分枝上的萨尔杜、斯克莱布、琼斯等人——就已超出了自然主义的规范，但仍然表现了中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意欲，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爱情与义务的冲突。

对于自然主义戏剧，至关重要的是**幻觉主义**概念，其目标是造成“真实”事件正发生在舞台上的幻觉，掩盖其作品的人为性质。自然主义戏剧的编写方法把这一点考虑在内，详尽描述熟悉的家庭环境，使用明白的口语形式（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戏剧实践离东方流行的一切戏剧形式最为遥远。直到 20 世纪东方观众才开始看西方戏剧，东方作家（如 mishima）才开始用西方的风格写作剧本，自然主义在东方的任何戏剧艺术形式中都没有地位）。假如幻觉主义必须充分发挥作用，戏剧并在本质上要求有自然主义风格，但是观众必须参与交流，想象地接受戏剧所表现的一切，无论它是多么超自然的或者是幻想的。这种参与，柯勒律治称之为有意对怀疑存而不论便是亚里士多德所陈述的在酒神节庆典上对雅典人的“同情与怜悯”的反应的延伸，但又完全不同于这种反应。

20 世纪，布莱希特发展了一种反幻觉主义、暴露作品人为性的戏剧，从而开始对上述明显的来源于观众的非批评反应提出了挑战。他创立的**史诗剧**并未表现一种政治立场，但它在本质上却是政治的。生产方式就像剧本写作一样重要，因而就要反对书面文本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优势。同时，其他戏剧家也吸收生动活

泼的地方传统（如音乐厅）、依靠电影与实验小说去创作其他非幻觉主义的戏剧。虽然“精构戏剧”、“历史剧”和它们的后代在舞台上仍然还在迅速增长，但是一种全新的戏剧正在变为规范，它快速运动，永恒创新，以其不可预料性而充满挑战精神。不是以“同情与恐惧”净化观众，这些戏剧现在运用不协调性、（广义的）荒诞性和一种在场景中的共有的默认，一种对过去整个戏剧传统的共有意识（比如，表现在对一切形态和在一切层次上的**戏仿**之中），这种意识又重新激活了这种形式。日益增长的对其余世界、对别样社会的意识也使东方观念影响了西方戏剧，西方观念影响东方艺术，这样就使艺术多元化、综合化，而且也改造了艺术。

参见：“舞蹈”，“表演艺术”，“戏剧”。

拟剧模型（Dramaturgical model）

这是**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主义**学派的一种研究方法，符合互动主义主要与高夫曼有关。这一社会研究方法将社会日常生活与戏剧相类比，社会行为被视为“表演”，个体是其中的角色，对其行为进行舞台监督以给他人留下他所希望的印象。高夫曼将这一过程称为“印象监督”。他指出，演员们总是使自身置身于对自己有利的光亮中，总是尽量适合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场景。在他看来，许多社会生活都可以划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舞台上的表演”，而后台类似于剧场的后台。高夫曼还研究了社会中的“演员”们是如何与团队通力合作，掩盖“后台”行为，以维持前台的表演。

高夫曼还强调指出了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由于前台的困窘和违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的危险深刻都存在。

参见：行动观点；履历；抽象的他者；角色；现实的社会建构；社会自我；结构—动因之争；理解。

素描（Drawing）

欧洲美术中，素描意味着线条、明暗的构图。这种构图，通常是在纸上用铅笔、钢笔、炭笔、粉笔或者类似的绘图手段来完成。素描在传统的意义上，服务于绘画的准备阶段，从最初的轮廓到将构图转换到画布、画板或墙上。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将素描当作独立的艺术创作，创作草图受到欢迎，因它们提供了洞见艺术家的创造能力而为人们所重视。17 世纪，学院派理论认为：素描的价值胜过绘画，作为思想的如实转换，素描远离了沉重运用色彩的“机械”创作。这种创作，使人回想起行会的手工方法。由此产生了线条优于色彩（表现在普桑派与鲁本斯派中）的信念———种假定色彩画家忽视素描的主张。当鲁本斯、伦勃朗、弗拉戈纳尔和透纳之类许多艺术家画素描时，安格尔等艺术家走得更远，使素描成为了艺术的试金石。(安格尔喜欢的两句格言是:“素描是艺术的德行”、“我能在一周内教你绘画,但要用一生教你素描”。)20 世纪,素描已经摆脱了它普遍的从属地位。这表现在罗丹、马蒂斯、较近的霍克尼之类杰出艺术家的作品中。

梦（Dreams）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认为梦是来自“远方”的信息，具有隐秘的意蕴。理性主义认为梦毫无意义。唯物主义者则认为梦无非是睡觉时的身体活动和感官所受刺激的结果。弗洛伊德恢复了传统的观点，认为梦具有隐秘的意蕴，他将梦比拟于音讯和信件。

弗洛伊德认为，在睡觉时，精神的监督放松了，梦是那些在清醒时无法得以流露的无意识愿望经过伪装了的表现。弗洛伊德所谓的“梦中作品”应用了一系列的表现手法，如比喻的移植、意象的压缩、象征和具象性象征等，这些是隐秘内容（愿望）的表现形式。弗洛伊德称梦是“通向无意识的康庄大道”。

对于荣格，梦是我们的象征知识的主要来源。梦中出现的个别符号是无意识的自然的和自发的产物，它们并非征兆：符号所表示的多于其本身的直接含义，而征兆所表示的则少于它所代表的。梦中出现的许多符号实质上往往并非个人性的而是集体性的，它们主要是一些宗教符号，荣格发现，病人事前并不了解的一些古老符号也会出现于梦中，因此，在他看来，梦证明了**集体无意识**的存在。

二元论（Dualism）

二元论者认为：心理不是物理，物理不是心理。他们通常主张存在着不是物质的心理事物（如我的心），也存在着不是心理的物理事物（如我的身）。

参见：“附随现象论”，“唯心论”，“相互作用论”，“唯物主义”，“平行论”。

义务（Duty）

从**哲学**上说，一种义务（古法文“占有物”）、一种强制（拉丁文“束缚物”）就是我们在道德上应该或不应该做的事。我们不应该引起别人的痛苦，也就是说，我们有不引起别人的痛苦的义务，我们被迫不干这种事。义务或强制可能彼此冲突。我们有

义务不去激起别人的痛苦，但是我们也有义务说真话。当如实回答一个问题会引起痛苦的时候，这些义务就是冲突的。

阅读障碍（Dyslexia）

阅读障碍这个术语，来源于希腊语，意思为“在文学与语言方面的阅读有困难”。1887年它开始普遍地被使用，代替了早期的、感情色彩更浓的词组“字盲”。阅读障碍，决不是一个稀有的现象，虽然估计的结论千差万别，但大约10%的人都感染有这种疾病。

阅读障碍，会作为大脑损伤的结果而出现。这种大脑损伤，或者是大约出生的时候，或者可能是伴随着中风之后的生命晚期。人们见到的阅读障碍的类型，作为出生时受伤的结果，常常混合着活动亢奋、难以集中注意力和天生愚钝的增加。但是，这类由外伤导致的阅读障碍患者，人们普遍认为占少数；研究的主要焦点是第二类，以伴随发育的阅读障碍患者而著称。伴随发育的阅读障碍，来自于神经病学开拓的一种不同类型。这种类型，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是由遗传决定的。广为人知的事实表现为：阅读障碍患者面临着学习阅读的困难，但有许多潜在因素将造成这种结果。一些阅读障碍患者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普遍缺乏理解以前熟悉的符号的能力，即把文字识别为连贯的、符号整体的能力受到阻碍。人因阅读障碍，削弱了这种根据每个词的符号价值，整体地确认它们的通常能力。其他症状包括：无法感知语言的范式，如音调、重音和节奏；在书写所要求的运动技巧方面不灵活；在活动着的声音和字母顺序上感到困难；遇到前后相继的符号系列时，出现短期的记忆功能失调；甚至在空间定位和时间判断上有问题。

大多数人那里，语言活动位于大脑的左半球，此外还有分析与象征的技能，比如使用数字的能力。所以，阅读障碍患者所面临的问题，有时可以追溯到大脑左半球功用的减弱。这些病例中，右半球的技能，会在阅读障碍患者那里得到高度发育。大脑右半球的技能，包括物体的面的识别、情感表达、视觉空间的以及整合协调的技能。因此，发现阅读障碍患者在建筑、艺术、设计、科技等领域的成功，这并不少见。

大多数病例中，迄今有相当多的证据涉及到阅读障碍的深层的神经病学原因。但是，受过教育的心理学家们，却显然不愿把阅读障碍当作一种遗传疾病，相反，他们常常老是谴责孩子所面对的外部因素。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的社会适应不良、情绪阻碍、拙劣的教育方法，这些都被引证为阅读障碍的病因。这样的观点，通常看起来更多地受到政治的而非科学的诱发；不幸之处在于：它们往往是妨碍而不是改进阅读障碍患者的治疗。承认阅读障碍潜在的神经病学原因，这在诊断某些早期小病上有帮助，并因此设计和实施相应的教育计划。例如，一些患阅读障碍的孩子们，更擅长按照声音模式处理听觉的而非视觉的信息。对这样的孩子而言，一种典型的教育计划，也许应侧重于包括声音模式、节奏、重复、引述等等方面的游戏。换言之，孩子的个别技能，应用来战胜阅读障碍所造成的语言困难的一种手段。

异托邦思想（Dystopianism），参见：乌托邦思想

E

大地艺术（Earth art）

大地艺术（又称为地景艺术或环境艺术）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流派，它与**概念艺术**有关，并与**极少主义**的都市世故针锋相对。它试图拓宽雕塑的传统边界，使环境不仅仅只是一种背景，而是成为构成作品本身的材料因素。因此，史密森在大盐湖建造了500米长的《螺旋形防波堤》，而玛莉亚在内华达沙漠中刻画出两条白线，构成作品《一英里长的刻画》。

教会学（Ecclesiology）

教会学（希腊语 ekklesia，"教会" + 学说），是关于基督教会性质的教义。在从1830—1930年的100年间，在自由的新教徒中教会学实质上消失了；而在其他教派的信徒中，它已为**末世论**所代替。这之后，"教会性质的重新发现"构成了本世纪基督教神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其可能性，在于现代学术对早期教会文献的再次发现，以及在圣礼改革方面取得的共识；它发生的原由，因为来自现世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压力和普世运动成长的动力，乃是一样的大。1929年，卡尔·巴特把他计划写作的"基督教教义学"改为"教会教义学"。他在新教中和康加尔在天主教方面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是，那些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神学家们如朋霍费尔，也曾写过重要的教会学著作。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教会作为自由的代表者的角色，在20世纪50年

代和60年代赋予了这些课题以一种新的动力。教会的角色，和一种普遍重视人的需要——人生活在各种团体里并要捐献东西给它们的需要——相结合。目前，一方面因妇女授圣职、另一方面因**基要主义**而产生的危机，以及家庭教会运动，都要求进一步发展神学。

参见：基督教；仪式；圣礼。

折衷主义（Eclecticism）

折衷主义（源自希腊语 eklegein，意为“挑选”）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个哲学流派，它的观念都是借自和选自其他哲学体系的，但同时又不完全坚持任何一种哲学体系。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西塞罗和塞涅卡；老普林尼也采取相似的方法，他考察各种现象——从战术到岩石的年龄，从海藻的生命周期到教育孩子的最佳途径等——都有所研究和著述。在**艺术**中，折衷主义也采取相似的原则：像鹊一样从自己喜欢的地方东拿一点西挑一点，加以修正用以表现自己的灵感。在**文艺复兴**的**建筑**和美术中，它形成了一场（非常自觉的）运动，这可能也是出于对当时那些层出不穷的竟相标榜的“主义”的反动。同样，或许出于相似的理由，折衷主义也成为**后现代主义**中所有艺术形式的主导原则，艺术家们摈弃各种狭隘拘泥的“手法”，改进创作程序。而这些手法和程序，是20世纪上半叶艺术的典型特征。

折衷主义的问题（如果这算得上问题的话）是，许多天才都是折衷主义者，并总有大量的追随者。因此，一开始看起来是折衷主义的东西，很快就会变成一种风格，随后，一旦它被批评家和学者盯上，它就变成了一个流派。或许，真实情况仅仅在于：艺术的变革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我们所谓的流派和运动，仅仅是

一些描述性的标签，它们与真正的艺术家毫不相干，而只是便于那些追随者自我标榜。

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

在生态女权主义中，对环境和世界福祉的关怀联系着女权主义者对父系权力的分析与反应。“自然”作为仰卧的被动实体由男人耕作、播种、收获、控制和统治的形象，在偏爱和解的非干预主义的方法中遭到了拒绝，这就导致了来自两性的平等分配。女权主义者相信，如果改变立场（一般认为她们似乎相信立场能够被改变），创造的姿态就会中止。但是，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是女性的、宽容仁慈的，而不是充满敌意与危险，“张着血盆大口生着利爪”的怪物，这是不容怀疑的。

生态女权主义是对世界的肯定，同时也对生命采取“绿色”姿态。对自然世界**性别**角色的激进批判要求修正**医学**、**伦理学**和神学，比如，女人们重申要控制自己的肉体，而不做（男性）医生们要她们做的事。这就导致了对工作/家庭，家室/劳动场所，性别角色等等采取整合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重新唤起莫里斯和**前拉梦尔时代**。有些女权主义者进一步接纳**女神**神学和盖亚假说。

参见：“女权主义”，“女权神学”。

生态学（Ecology）

生态学（希腊语意思为“对居所的研究”）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群落中生物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所有生物均为生物群落的组成部分。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门重要分支科学，它与**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息息相关。对生命系统的研究除非在它们自身的

环境中进行，否则毫无意义。通常生态学家把所有生物及其组成结构看成是完整的生物群落。

19世纪前，大多数科学研究仅关注生物体本身，而脱离了生物所处的自然环境。有时，物种分类的研究也会涉及到典型生境，但也仅仅是对不同气候条件下植物种类的地理分布的调查，这也是最早的生态学科学研究。1859年达尔文（1809—1882年）发表了《物种起源》，由此激发了人们对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极大兴趣，1866年海克尔（1834—1919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起初对生态学最感兴趣的是植物学家，但到了20世纪，生态学已深入影响到生物学的各个层面，附带地使这两个看来不同的学科紧密结合起来。

现代生态学并不摈弃从现场调查获取原始资料的工作方法，但是由于计算机的出现，为建立生态模型提供了新的可能。计算机的应用使得复杂的数据经整理和分析后，能够为生态变化趋势的推测提供依据，因而，它可作为预测环境变化结局的手段。对宏观生态系统（如**温室效应**）和局部生态系统（如河流污染）的生态变化过程进行**计算机模拟**，能够准确合理地预报生态变化的结局。在应用生物学和**污染**影响监测领域内，生态学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牢记：生态系统是极其复杂的，因而其内在本质仍不可预测。自20世纪60年代，生态学已赋予环境**保护**者科学重任，并成为最具政治价值的学科之一。

参见：群落，生态系统，群体生物学，竞争。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

计量经济学（源于希腊语，意义是“预算——测定技术”）是运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计量经济学家最

著名的活动是建立经济关系的数学“模型”，使用方程式体现投资、利息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旦建立了这种模型，即通过电脑技术把它运用于对经济前景的预测。

计量经济学在量化经济关系中清楚地起着有价值的作用，电脑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因而计量经济学分析不仅实际而且可行。但是它也有批评者。剑桥大学经济学家J·鲁宾逊指出，“我对数学一无所知。我必须思考”。如果计量经济学的种子不是撒播在完全有意准备的土壤上，它们提供的信息和结论就是没有连贯性和缺少合适性的。

参见：博弈论。

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

经济人类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的，其首要的目的是将传统的**经济学**问题纳入人类学的视野，藉以将这些问题置于社会关系、观念和价值的广阔语境之中。这些问题包括劳动分工的方式、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手段、所有权、财产及遗产等问题。人们认识到，在西方**市场经济**中，经济机构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是分开的，但是，这一区分不适合作为理解其他社会的框架。在此之前，非货币经济被大大地忽视了，这一领域落于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经济学家主要关心的是货币经济。经济人类学家的贡献在于，对农业、园艺、涉猎和采集经济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后来，他们又转向研究这些经济组织与殖民统治、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之间的相互影响。

20世纪50年代，波拉尼批评经济人类学家不恰当地将供应、需求、利润最大化等源于市场经济的观念用于那些不受这些原则支配的社会当中，从而引发了一场论争。他指出有三种商品

分配体系，它们可能存在于任何社会：其一，以“互惠”即礼物的交换为特点，它与亲缘社会有关；其二，基于“再分配”，先将商品汇集在一起以便以后进行分配，此种体系典型存在于那些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的社会中；其三，市场交换，商品按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进行分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波拉尼的追随者被称为“实质主义者”，相反，“形式主义者”认为，某些普遍性的经济原则适应于所有社会，这场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之争，双方各执己见。其他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类学家，将关注的焦点从对这些产品在社会中是如何被分配的研究，转移到对决定物质产品生产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参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也同样关心再生产的概念，物质生产活动是经济组织的基础，同时，再生产通过提供劳动力使经济组织得以维持下去。

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相关问题是“经济人”的理论建构问题。“经济人”概念将个体视为置身于经济体系中根据其自身利益进行决策的人，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的能力，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并被视为理性行为的指针。然而，经济人的概念忽视了决策中的非经济因素，它对社会语境也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尤其是在经济组织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如此。这些社会中罕见界限分明的经济领域，因为它常常是与亲缘、宗教、仪典等社会价值融为一体。

参见：殖民主义；发展；交换；礼物；现代化；理性；匮乏；城市人类学。

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是平均人口的产量增长过程，也指潜在进步的经济

福利。它是潜在的，因为这种经济福利取决于可使用的更大生产力。假如以一个国家的耕作经济为例，经济发展就可能随生产资料的质量与数量、劳动力素质的增长而增长。教育和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的巨大驱动力量。

不发达的国家通过获得更多更好的生产资料以及更大范围的劳动力教育培训而经历较大的发展。它们通常缺乏社会统一管理的资本，如高效的交通和通讯系统，因而它们需要更多的资本、交通与通讯系统作为发展的前提。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具有实在的资本作基础，越来越依赖于发明和创造，并把它们转化为技术革新，以此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源泉。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是一种经济增长其生产商品和服务能力的过程，以产量为衡量标准。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1）生产资料在量上的增加；（2）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机器。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是发明与创造，人口增加与教育改革。人口增加可能增加总产量，但其他因素也增长生产力（劳动时间产量），为平均人口的增加提供潜能，改善经济状况。经济增长的数量理论包括史密斯、马克思、熊彼德、哈路德、杜马尔和莫迪格里亚尼的经济学说。

参见：“经济发展”。

经济学（Economics）

经济学（希腊文，“家政管理”）是研究社会为生产、分配和消费商品与服务的方式。它主要关心社会如何回答这三方面的基

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样的商品与服务？如何生产？为社会的什么人生产？

这一学科在规范意义上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这两大分枝上，经济学都寻求某些操作标准：概括、选择和分析事实，然后依据它们来再次检验理论。通过这种（无终结）的过程，经济学要为普遍适合于不同国家、时期和环境并仍然起作用的一般命题。尽管几乎无法像物理学家日复一日地做的那样建立实验室实验，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把经济学称之为“科学”。

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

规模经济是指大生产带来的效益。在许多国家，大即美（非常低廉），因为产品的单位成本下降。如大规模生产汽车，巨大的造船业、钢铁工业，它们的初始投资可能非常大，如果扩大生产，其成本则可以变小。

所有过程都有一个最终的最佳水平，一旦超出这一水平，效益即会下降。这常常是因为管理方面的问题，大规模生产可能变得僵化，可能迟缓于技术革新，因为其初始投资太巨大了。

平均成本的下降伴随着生产性的工厂和经济实体的增加，也就是说，当所有投入的资金增大，平均成本也就持久下降。这种情况可能发生，这是因为某些设备在其最低限度的效率规模上是非常巨大的。或者，不同的和更有效的生产配置与技术手段也可随着工厂或公司的扩大而被使用。史密斯认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是规模经济的主动力。

生态系统（Ecosystem）

生态系统（源于希腊语 oikos，意思为“居所”+系统）是指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与其生长环境共同组成的自然系统。生态系统是一个重要的人文概念，它有助于对生物群落的**生态学**研究。但这一定义的使用也受到一定限制，因为任何生物群落不可能生活在与其他群落完全隔离的环境里，因此也许只有**生物圈**本身才是惟一完整的生态系统。为了研究生命网络中各组成成分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需要将生物圈分解成一些很简单的单位，例如：生态系统可以是一段朽木和寄居其上的所有生物；或者为牛的肠子与寄生在肠道内的各种微生物。在生态系统的研究中，以生物体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最为详尽——这些相互作用关系，被称为沿食物链的能量转换和/或物质转换。以这种方式，生态系统可分为各种营养级，每个营养级由以某种基本方式（如吸收太阳辐射能或捕食动物）获取营养的生物体所组成。

任何生态系统的基本营养级，包括生产者（绿色植物）、消费者（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和分解者（细菌、真菌以及将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的其他微生物）。物质随能量一同转换，并在生态系统内循环，最后回到非生物环境中，并再次被生产者利用。化学元素（如氮元素和碳元素）变化的循环过程，即可揭示出特定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环境是指有益于生物群落生长的非生物环境，就陆地生态系统而言，可分为土壤环境和大气环境。环境提供了物质来源，它是生产者所需基本物质的储藏所。广袤的自然环境表明：将任何生态系统从其周围的其他生态系统中孤立看待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参见：生物群落区，保护，食物网。

普世教会运动（Ecumenism）

普世教会运动（源于希腊语“有人居住的世界”及“那些像我们一样的信仰者的共同体”），是欧洲基督徒的一个普遍运动。从宗教改革的时代开始，以伊拉斯谟、莱布尼兹为代表的促使和解的精神，都哀叹基督教世界的分裂。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现代普世教会运动，只是从 19 世纪才开始的。当时，在英国、印度，低教会派圣公会信徒、公理会教徒、浸礼会信徒着手合作。他们的目的，是要组建布道团，把圣经译成东方的、大陆的各种语言，同奴隶制、文盲、工业革命可怕的工作处境、虐待儿童作斗争。这种对福音派教义与社会改革的关心，不断把基督徒团结起来，贯穿于整个 19 世纪。它最值得注意的，是建立了基督教青年会（1844 年)、基督教女青年会（1855 年)、福音派联盟（1846 年)、学生自愿者运动（1886 年)。它构成了国际传教理事会（1910 年）和生活与工作运动（1920 年）的基础。后两者合并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1948 年)。

正如它的希腊词源所提示的那样，“普世的”这个词，内含普遍的适用性与包容性的意思。正是这种力量，使万物统一起来。因此，在存在“世俗的”普世教会运动的同时，基督徒主张：正好在基督里万物才凝聚一体。基督徒的合一，仅仅是人类更大范围内的合一的开始。所以，目前的普世教会运动，关注的是公正与和平、地球的生态与保护诸问题。

自我（Ego）参见本我、自我和超我

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

自我心理学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变种，源于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1923年），是其女儿安娜·弗洛伊德提出的。她的著作《自我与防卫机制》（1936年）提出了与早期的本能理论和同时代的由克莱因倡导的**对象关系**理论相对立的观点，旨在借助自我的结构和建构关注现实的实质。她认为自我包括四个相互区别的部分，其一是自主的，并负责说话、呼吸、走路等行为；其二被视为与其他部分存在着局部解剖学上的区别，能够与神经症保持独立；另外两部分关乎升华的两种形式，一个负责阉割，首先是对婴儿期力比多的阉割，其次是对前生殖期的性冲动的阉割，另外一个针对力比多的进攻性方面。自我心理学被用来是完成这后两个过程，如果它们在儿童或成人的成长过程中得以解决的话，其目的是将发展建构融合于自我之中，就像科赫特的自我理论所做的那样。

自我状态（Ego state），参见“交互作用分析”

埃及学（Egyptology）

埃及学是研究古代埃及文明和古物的学问，其希腊语词源已暗示了这一点。古埃及是最先得到认识的古代伟大文明，出现于6000年之前，与苏美尔和中华文明同时。根据30卷本《埃及历史》的作者曼内托的说法，美尼斯国王（约公元前3100年）是第一王朝的统治者，正是他将古埃及的多个族群凝聚为同一文

化，这一文化最终在**建筑**、**艺术**、**天文学**、**数学**、**医学**、**音乐**和**宗教**等方面都达到辉煌的高度。埃及关于社会组织的观念影响了古希腊，并通过后者影响到当代社会。曼内托的著作原藏于亚历山大的一个庞大的图书馆里，后来在恺撒（公元前1世纪）占领此地时焚于战火，同时焚毁的还有大量记载法老时代埃及的文献，其残卷在公元391年又被蓄意焚毁，这大大妨碍了当代埃及学试图重建和理解这一古老文明的努力。

1799年，在法国军队侵入埃及期间，在靠近亚历山大的罗塞塔发现了一块刻有铭文的黑色玄武岩石碑，铭文是一篇古希腊文字，附有一段同时用象形文字和古埃及俗体字书写的文字，法国天才的语言学家商博良着手译解这一“失落的”语言，他在1822年将其研究成果提交铭文和美文学科学院，这一年被视为埃及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起点。

在古代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旅行者的报告，有痴迷于古代世界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后来，到17世纪，又有了对遍布埃及的考古奇迹的记述，这些奇迹在过去先后遭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废弃和亵渎，并常常会湮灭于流沙之中，**考古学**最先注意到这些废墟，1858年法国人马雷特创建了埃及文物服务处和开罗博物馆，在此之前，业余爱好者的发掘在发掘过程中常常造成严重的破坏，此后，由于像皮特里、赖斯纳和卡特等热心家的艰苦工作，埃及学才逐渐具有了科学的品格。

古罗马和拜占庭的帝王就开始劫掠法老雕像、狮身人面像和石柱等文物，17世纪的探险家、收藏家以及欧洲的执政官们继承了这一劣习，直到马雷特创建开罗博物馆和埃及文物服务处，这一趋势才被部分遏止。甚至在建造坟墓掩藏王室或贵族成员及其宝石、黄金、护身符和木乃伊外套时，盗墓就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了。1922年卡特发现的图坦卡蒙国王的墓葬，几乎保存

完好，其中殉葬品的豪奢与工艺的高超令世人瞠目，它的出土，令西方世界亲眼目睹了古埃及的辉煌成就。（由此导致的埃及热酝酿出一种想象的古埃及时尚，影响及于建筑风格设计、电影、时装等，此风从20年代兴起，迄今不衰。）

拿破仑在进军埃及行动开始之后，立即委托一组学者对埃及碑刻进行记录和研究，其成果就是《对埃及的描述》一书的出版，现在的埃及学家仍主要使用这两种方法。考古发掘和金石学（铭文研究）被用于对古碑的研究和古代文明画卷的重建。埃及学依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至今仍不断有新的文物出土。

埃及学者一味关注铭文研究在一开始可能妨碍了他们形成一种理解法老时代埃及的更为融会贯通的方法，学者们一直致力于理解这一古代文明，但对其理论前提却未加追问，直到最近，这一研究取向才略有改观，就像坎普在《古代埃及》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所谓古埃及，至多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最近的思考可能有利于我们理解文明的构成。埃及学家勾画了一个在王权统治下的高度官僚化的社会，精心设计的宗教机构维护者王权的统治，这是一个墨守成规、拒绝变化的社会。当代学者主张埃及人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民族，不喜欢哲学沉思，而在古典时代，希腊人却认为埃及人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智慧，除了希罗多德记载的神秘祭仪，埃及还有高度发达和仪式化的丧葬礼仪，以超度死者脱胎换骨。在许多墓葬中发掘出大量的用以引导死者阴间生活的文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亡者之书》（The Book Of The Dead）。

始自第一王朝时期的一批出土文物说明当时的文明已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高度，而这一文明却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并无明显的前身，在这些文物体现的知识中，测量和比例的精度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发现引起了对这些知识的来源的思考。埃及学家德·卢比兹穷其一生研究埃及陵墓所体现的数学法则，得出结论认为

这些法则是一门神圣的科学的组成部分，他宣称埃及僧侣掌握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并用艺术和建筑将这一关系予以表现，一般认为，利用圆周和圆周率之间的无理数关系表示比例是希腊人“发现”的，德·卢比兹指出；这些知识在埃及就已被大量应用，并认为希腊文明仅仅是古埃及文明的一个苍白投影而已，随着古埃及的衰落，许多重要的玄奥知识被湮灭了。他的理论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拒绝，他们竭力想维护希腊作为文明起源地位这一公认的观点，然而，正是通过这些热心家的工作，埃及学才不再仅仅是一个只关注古代文献研究的学科，而是试图从这种文化内部因素出发理解其世界观，不再把一种与之格格不入的事后聪明强加于它。

参见：种族文化考古学。

选举制度（Electoral systems）

选举制度是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也是最少由公众来讨论的制度之一。它们是把选票（推举候选人）转化为代表席位（或职位），虽然它们有时也被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把决策倾向转化为公民投票或多重选择中的决策。

从本质上说，选举制度在数量上是无限的，但常常分为三类：平衡制，多数制和多元统治制。**平衡代表制度**在当代民主制中最为常见。**平衡制**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各政党（候选人）的选票份额和他们在相应大会上赢得的席位份额的平衡，其复杂性我们在下文讨论。**多数制**的目的是保证候选人在赢得大多数选票（即50%以上）的时候才算当选。如果像以差额选举的澳大利亚所出现的情况一样，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都没有获得多数选票，那么就要在候选人出局后进行第二轮公决，以保证候选人获得多数

选票；或者，像在法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在两个得票最高的候选人之间举行第二次（决定性）投票。多元统治制是最原始的选举制度，它们把席位给予了最多选票的候选人（所赢选票少于半数）。

把选举制分为平衡、多数、多元统治三种类型所参照的仅仅是在每一种情况下的选举规则，即把选票转化为席位的支配原则。但是，所有选举制度的效力受到地区大小（即“选区规模”）的决定性影响。在单一多元统治制度中，选举发生在单一成员选区，但也可能像在日本发生的那样把多元统治制与多重成员选区结合起来。多数制也与单一成员选区结合使用。相反，平衡制在规范意义上与多重成员选区结合使用。也可能把单一选区与平衡制结合起来——如在德国的“补充成员体制”中，这种体制包括两种系列以不同方式选出的代表。多元制、多数制和平衡制明显地影响了选民做出选择的方式。在多元统治制中，选民被迫选举出府，而且这种制度也鼓励两党竞争，虽然它也与一党长期统治相协调。多重统治模式因为不足多数代表的少数党派的存在而遭到批评，因为只要这些党派候选人常常位于大部分选区中的第二、三名，它们亦可戏剧性地出现代表不足的情况。“胜者决定一切”，就是多重统治制度的简单逻辑。多重统治制度也迫使选民选择政府，但起码是因为他们的第一次选择（第一次投票），他们又可能平静地选择他们最喜欢的候选人或党派，即使这些候选人或党派当选的前景渺茫。与之相反，平衡制度则一般促使选民表达他们真正的选举倾向，这种制度力求保证正当的会议一般反映了公众的偏好。因而它也更可能走向多重党派制度。

平衡制在它们所能达到平衡的方式以及在实现平衡的规模上各不相同。任何体制都不能达到完美的平衡，在现实状态下赢得席位的党派（或候选人）的数目不少于赢得选票的党派（或候选

人）的数目。从根本上影响平衡的因素有：是否存在着基本域限（比如，要求党派或候选人在确定当选之前获得5%的最低限度的选票）；选区的大小；用于分配席位的数学公式（包括洪特〈d' Hondt〉方法，哈根巴赫·比雪夫〈Hagenbach-Bischoff〉方法和圣拉格〈Sainte-Laguē〉方法），这些方法在帮助大小政党的程度上是相当不同的。最近似的平衡是这样达到的，即把整个国家的选票当作一个单一的选区，不存在基本地域限制，以直接平衡于党派所赢得选票份额的百分比分配席位份额的百分比（考虑到立法者不可能以小数点的形式存在而采取“四舍五入”的方法）。

平衡制之间的基本分工是：旨在保证党派平衡代表的名单制与旨在保证选民具有比政党更大的选择权力和表达对不同候选人的选择意向的单一可转让选票（STV）。最极端的党派名单制把候选人的排名次序留给由特定党派完全掌握的政党：如此一来，只要你投了党派A的票，那么，你就必须接受由它所选择的秩序表上的候选人提名。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最平衡提名制也授予选民以某种程度上的选择，就像在瑞士那样，让选民能够从一个以上的党派名单上投候选人的票（Panachage）。与此相反，单一可转让选票（STV）则是让选民享有在不同候选人之间排出次序的权力（在选票上排出1，2，3，……n次序）。如果候选人在多成员选区，那么要当选就必须获得一个限额，Droop公式就定义了这一限额：

$$\left\{\frac{V}{(S+1)}+1\right\}$$

V是所投的有效选票的总数，S是必须安置的席位总数。当一个候选人在第一次意向投票之后获得的票数大于这个除数，则

被宣布当选，其“所余”选票则要按选民的第二次意向投票转移给其他候选人。如果其他候选人都没有当选，底线候选人则被淘汰出局，第二次意向投票则进行分配。这种程序或计票活动一直延续进行到适当的席位数安置完毕。单一可转让选票（STV）使选民能够进行跨党派选举，区别对待同一党派的候选人。多元制、多数制和平衡制都有其倡导者和批评者。多元制和多数制之所以被维护，其理由是它们产生了强大而又负责的政府，而且有人宣称，选民能够辨出谁最可能形成政府。它们之所以遭到批评，原因在于它们总是赋予那些并不实际具有多数支持的党派，而压制了少数的对立党派的代表；它们甚至还特别不适合于在民族上深刻分裂的社会而备受谴责。平衡制之所以得到辩护，是因为它们产生了更精确地表达公众选举意向的公平结果。它们又因为公开引向了党派体系的分化和鼓励了多党联合政府而受到了批评。

二战以来，新建立的民主制国家大多数都选择了平衡制：单一可转让制并不如党派提名制那样受欢迎，因为设计与执行新选举制度的往往正是政党。

多元统治制用于英国这样的国家，以及除日本之外那些曾经受大英帝国统治的国家，如加拿大、印度与美国。除英国之外，欧共体全部成员国都使用平衡制。在许多民主国家之间也许存在一种普遍的趋势，那就是有差别地仿照德国的“附加差额成员制”，这种选举制把多元与多数制度下的单一成员选区的某些特征和提名平衡制结合起来。选举法的政治后果仍然是政治家与政治学家之间激烈争论的主题，虽然要使一般大众深入理解选举研究更神秘的方面常常是更加困难的。

参见：联合主义；民主制；党派体系；代议制政体。

电学（Electricity）

电学（源于希腊语 eletcron，本义为“琥珀”，摩擦它可以产生静电现象）是对研究电传导、电引力和斥力、电磁效应和其他一些电现象的科学的统称。虽然早在 17 世纪初人们就开始研究电火花了，电学作为一门成熟的科学仅仅有一个世纪多的历史，在这一相当短的时间内，电学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人们最早对电现象的知识是希腊人对静电引力的认识，他们注意到摩擦一块琥珀，它就会吸引像树叶和稻草之类的小东西，希腊人认为琥珀中有一种吸引物体的魔力，直到 17 世纪对此现象才有了一个较科学的解释。1600 年，吉尔伯特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论述了磁力和电引力，后来，在 1670 年，德国人范·盖里克摩擦硫磺球产生电火花，从而证明相反的电荷相互吸引，1729 年，葛瑞发现用导体（通常是金属）连接可以使电荷从一个物体跑到另一个物体，而用绝缘体连接（通常是非金属）则办不到，从而发现了电传导现象。

直到此时，电的惟一的来源是摩擦生电器，即摩擦物体使之带有电荷，然而，1800 年伏打发明了电池，这种电源不需要摩擦就能生电，而是利用两种金属在液体中的化学反应生电。伏打还注意到，通过将几个电池叠加一起，就能产生足够的电荷形成电火花，电池还能产生持续的电流，而不像摩擦生电器那样只能产生瞬间电流，电流被断定为电荷的运动，可与水管中的水流相比，而电压被认为是导致电流流动的“压力”。

持续电源的出现使电流和电压的测量成为可能，并导致了今天所谓**电路理论**的产生。欧姆定律的发现迈出了第一步，它是将电流和电压与导体的电阻联系起来。1820 年，奥斯特发现电流

会产生磁场。1831年，法拉第则发现，磁场能够产生电流。电磁学由此发端，它将原本互不相干的电和磁现象联系了起来。

不久就开始了对电的实际应用。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泡，19世纪80年代，为新式路灯供电的电力网开始建设，19世纪40年代电报出现，随后于70年代出现的电话预示了现代通讯时代的到来。

19世纪，电学理论快速发展，至麦克斯韦电磁理论达到了顶点，这一理论和其他一些理论预示，电不用电线也能传送，德国人**赫兹**证明了这种所谓“无线的电”确实存在，现在被称为无线电（radio）。

尽管当时的电学理论已经非常先进，但仍有几种观察到的电现象是当时的理论无法解释和预测的。这一局面随着1897年汤姆逊发现**电子**并将之归为基本粒子而得以改变，实验表明电子带负电，而电流则是电子通过导体运动的结果。此后，利用电子特性的电子学器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二极管，随后又派生出三极管。

电子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研究已知物质及其相互作用的手段，**量子理论**的发现解释了那些用经典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促进了量子力学和半导体时代的到来（参见**半导体元器件理论**），人们发现半导体材料具有特异的电学特性，从而有可能制造出性能可靠的电子元件，如晶体管。

晶体管以及其他一些电子元件标志着**计算机**时代的开始，具有算术运算功能和简单的智能的数字逻辑电路出现了，第一台电子计算器出现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明，硅芯片出现了，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应运而生。

电解（Electrolysis）

电解（由新拉丁语 electricus 和希腊语 luein 两个词组成，前者意为“琥珀似的”，后者意为“放松”）是电流在电解液中引起的化学反应。电解液一般是某种盐的水溶液，例如普通的食盐（即氯化钠）溶于水就是一种电解液，铝就是用碳电极电解矿石获得的。

电解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原子或分子失去的电子被另一个原子或分子得到。当电流通过电解液时，溶液中的阳性自由离子被阴极吸引，阴性离子被阳极吸引，接触电极后，离子会得到或失去电荷，有的会沉淀，有的会变成气体从溶液中放出，并形成元素或化合物，例如，氯化铜（$CuCL_2$）电解就会形成铜和氯气。

电解是电镀的基础，电镀是在一种廉价的金属上沉淀一薄层贵金属，在钢的表面镀铬是通过电解先在钢表面镀一层铜再镀一层更结实的铬，这样，钢表面就附着了一层光滑的耐腐蚀保护层。与此相反，镀锌钢则是将钢材浸于熔化的锌中得到的，不是利用电解。

在有些化学过程中也可能利用熔化的金属作为电解液。

电磁（Electromagnetism）

人类熟悉这种力已经很久了。也许最早获悉其特性的是中国人，他们发现磁化的针总是指向北方。后来，静电和电火花迷住了一代人，电流的发现则导致了原始电动机的发明。人们很快便发现，电和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运动的电荷或电流会产生磁

场，而磁铁也可使运动电荷的轨迹发生偏斜。

19世纪后期，麦克斯韦尔用四个方程把所有这些现象统一了起来，这些方程被称为麦克斯韦尔方程。它描述了电流和磁场的全部详情，而且证明了光、红外辐射、紫外辐射、无线电波和X射线都完全是同一类波，其区别只在于波长。它们是电磁波，由相互成直角振荡的电波和磁波组成。麦克斯韦尔方程，使用其他已被熟知的常数预言了光速。这个成功的理论，也许是各种力之统一的第一个例子，表明电力和磁力仅仅是同一种力的不同方面。所有已知力的统一，是20世纪物理学的首要目标之一。

麦克斯韦尔方程中，一种不对称存在着，这归因于磁单极子的不存在。正负电荷，可存在于它们自身，但我们从未见到过没有南极、但有北极的磁铁。一块磁铁被分成两块时，它仅仅在中间形成两个新的磁北极和磁南极，因此，缺乏另一极的单极从不存在。然而，一些现代理论指出：磁单极子可以存在，因而磁单极子项有时会被包含在方程之中。

如今，我们认为：电磁力通过光子交换而起作用——光子是电磁力的场载体。当代理论提出：正如电力和磁力可以统一为电磁相互作用那样，弱核力和电磁力也可统一为电弱相互作用。弱核力以Z—玻色子和W—玻色子作为其场载体。在相当高的能量中，例如在粒子加速器产生的能量中，光子和Z—玻色子看起来非常相似。

电磁现象遍及于我们的生活。通过使用麦克斯韦尔方程，所有电气设备、静电、磁铁、电动机、发电机以及诸如闪电之类的自然现象，都可以得到相应理解。

电子音乐（Electronic music）

顾名思义，电子**音乐**不是由演员演奏的而是用电脉冲信号生成的。早期的电子音乐，只能录制在唱盘或磁带上，而像电脑和合成器这样的现代设备则可以按需制作电子音乐，从而使之具有了“现场”表演的特点。这些设备还提供了一些新技巧，而这在以前的作曲者是很难应用于人工演奏的，如使音乐瞬间变慢或加快，逆序演奏、混音、使回响延缓，尤其是能够变调。合成器根据操作者的要求改变生成的音响的频率，计算机为声音合成器输入数字化指令，其方式就像输入其他指令一样，由此形成的信息由操作者随心所欲地进行处理。

用电子方法处理的初始声音，可以是“白噪声”（由音调发生器产生的纯信号），也可以通过“取样”获得。在取样时，由任何声源（乐器、自然界的声音、人声等）发出的一个音响，被用数字化的方式记录下来，输入计算机，并按通常的方式进行调节，计算机能够模拟操作者选中的各种声音，从交响乐到云雀的啼啭，可用电子手法对它们做各种微妙的调整。音乐按“真实时间”编排，也就是说，用计算机模仿真实的演员表演时的韵味和抑扬顿挫；也可以按“步进时间编排”，使用由计算机时钟的等时间分段所形成的精确的节奏。作曲家艾克纳吉斯发明了他所谓的“随机音乐”，其宏大的结构是根据（通常由计算机生成的）数列由微小的个别单位形成的。

电子手法和电子乐器，是现代**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的标准乐器，对电影、广播、电视音乐的作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除了马特诺电琴（它的声音是纯净、明快的尖叫声，像乐锯的音色）之外，其他电子乐器除了最前卫的艺术音乐外，很少排上用

场，而电子作曲技巧在偏爱比较传统的手法那里仍然普遍受到抵制。然而，先锋音乐虽少，却充满活力，几位著名的作曲家一直坚持创作电子音乐作品，或者是在工作室中“录制”于磁带上（如巴比特、凯奇、伊莫特以及其他几位先驱之所为），他们或者利用合成器和混音器与“正统的”乐手一起在现场音乐会表演（如保莱兹、斯多克豪森之所为），另外一些人则将电子表现技巧用为一种整体上比较自由的作品的一部分，这些人包括这样一些重要人物：贝里奥、李吉蒂、普塞尔、埃克纳吉斯等。由于电子工业飞速发展，整个电子音乐领域看来更像是一场持续的试验，而不是形成永恒的杰作，并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电子设备不管有多么先进，它是否能与活生生的演员用自然音响所表现的情感力量相竞争。

电子学（Electronics）

电子学是研究电子元器件的学科，借助真空或半导体材料制成电子元器件，能够控制电子的运动。电子（源于希腊语 electron，意为“琥珀”）是带电的基本粒子，当电子通过导体运动时，就产生电流。

电子学是电科学和工程诸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从我们在家中看的计算机到我们在工作上用的电脑都与之有关。1897 年英国的汤姆逊正式发现电子，并将之归类于基本粒子，这一发现刺激了一系列的研究，最终导致**量子理论**的建立，从而加深了人们对我们周围所有物质的认识。在汤姆逊发现电子之前，通过对**电解**作用和阴极射线的研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存在一个基本电荷单位。现在的电视机就使用阴极射线管。

第一个商业化的电子元件是爱迪生发明的二极管，又称热电子管，爱迪生是在研究白炽灯的过程中发明二极管的，当时，电子尚未被“发现”并用来对一些现象进行解释，虽然爱迪生后来认识到正是电子导致其二极管工作。白炽灯是由一根封闭在真空中的灯丝构成，他发现在灯泡中，电流会从灯丝上穿过真空流到另一根接在阴极的灯丝上，这就是所谓“爱迪生效应”，这种效应使电流只能在一个方向流动，即从灯丝到电线，后来这种效应被应用于早期的无线电接受器（参见**无线传送**）。

电子学的下一个重大发展是德福雷斯特对二极管的扩展，使之具有了三个端点，因此称为三极管。德福雷斯特证明，三极管可用作放大器，它将接受到的输入信号加以放大然后输出一个大大加强了的信号，这一发现极大地提高了无线电接受器的质量。

早期的电子元件就其本身而言虽然已经很成功了，但仍有种种缺点，主要是性能不稳定，容易破碎，半导体元器件的出现，使电子元器件的性能和可靠性大大提高，引起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子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件重要的**半导体元器件**是晶体管，又称“传导电阻”，它是半导体器件理论的产物，实即电子三极管的新版本。晶体管可被用为优良的放大器，至今仍用于成千上万的无线电收音机中。

在半导体元件的制造技术不断改进的同时，晶体管的微型化也产生了，于是电子学的新时代开始了，这就是**微电子学**时代。应用微电子技术能够在指甲盖大小的半导体片上装置由成千上万个晶体管组成的电路，集成电路技术使数字逻辑技术和科学在物理学上得以实现，此前，这样的领域尚处于幼稚状态。现在的**计算机**都是利用的微电子电路。

取消主义（Eliminativism）

在**哲学**中，取消主义者认为，我们应当取消某些本体论断言，即我们应该把某些断言从我们对什么存在的理解中消除出去。

迷信的人曾经断言女巫存在。今天人们已经把女巫存在这一断言从他们关于现实所包容的内容的理论中清除出去了。因而他们就是关于女巫的取消主义者。关于取消主义还有更为引起争议的变体。一般说来，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皆为物质。大部分唯物主义者相信心理事物存在，现实包容精神事物，但他们只是宣称一切心理事物皆为物质。取消主义的唯物论者还主张万物都是物质的，他们还否认精神可能是物质的。所以，他们推论并不存在心理事物，即不存在精神、计划或者意图。我们应该把心理之物存在这一断言从我们关于现实包含什么的理论中清除出去。我们应该是关于精神的取消主义者。

参见：唯物主义。

资产阶级化问题（Embourgeoisement thesis）

资产阶级化（源于法语，意为“使成为资产阶级”）问题是20世纪50、60年代一种流行于英国的**经济学**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已经采取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之后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人们相信，由于福利制度的建立、就业率的提高、生活标准的改善以及消费品的大批量生产，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和文化差别已经消失，财富的增长削弱

了工人阶级对激进的政治运动的支持，据说，这一时期保守党的成功就得益于此。

这种观点似乎得到了一些社会学研究的支持，但是由戈德霍普和洛克伍德通过直接调查工人态度进行的富裕工人研究课题却反驳了这一观点，其他研究也表明仍有大量的工人没能享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

参见：资产阶级；阶级；文化；职业；专门职业；社会流动；社会分层。

胚胎学（Embryology）

胚胎学（源自于希腊语 bruon，意思为“隆起、突起”＋学）是研究动物胚胎生长发育的科学。公元前 4 世纪，亚里士多德提出胚胎是由经血逐渐汇聚而成的假设。然而，在 17 世纪解剖学兴起以前，人们对该假设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科学研究。笛卡尔对胚胎组织作了解剖分析，并记录下它们的结构因素。哈维则从事对鸡和鹿的胚胎研究，并提出假设：所有生命物质的胚胎均形成于卵细胞。当时，预成说和渐成说思想也很普及，预成说认为胚胎组织的前体是一个被称为雏形的微小成体，而渐成说认为胚胎组织植入的环境决定了胚胎的生长发育。

18 世纪德国解剖学家沃尔夫以其对胚胎发育的观察研究，开创了现代胚胎学。他注意到在胚胎发育的同时，未分化组织也在进行高度分化。19 世纪贝尔（1792—1876 年）对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过程进行比较，他注意到胚胎组织彼此间非常相似，以至于爬行动物的胚胎与鸟类或哺乳动物的胚胎难以区别。这个发现，促使在 19 世纪有广泛影响的“个体发育在重演系统发育”思想的形成，换言之，这种思想认为：胚胎组织在发育形成其亲

代的形状前，要依次经历亲代进化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事实上，进化关系的密切程度反映在胚胎的发育过程中。胚胎学在**系统发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现代胚胎学研究涉及到对细胞分化的控制、以及从受精卵（精子和卵子融合而成的单细胞产物）到个体形成子代的胚胎发育的整个过程。

参见：发生生物学，胚层说，种质，卵源说。

层创进化论（Emergence）

生命科学中，层创进化论是指在**进化**过程中新物种或结构可突然产生，且无法根据先前的条件加以预测的一种学说。它的提出，是由于预期的进化过程与现实中化石标本所显示的情况相互矛盾所致。本质上，进化不是从低级到高级的一个连续不断的适应过程，而是生物在其结构复杂性方面不时产生剧变所致，如具核细胞的出现。这些剧变，虽不太可能遵循变异和**自然选择**的一般规律，但人们往往仍假设它们按照这些规律变化。另外，化石记录也可能不完整，但这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目前采用的是精确的放射性同位素追踪技术。在 20 世纪科学哲学领域内，层创进化论思想一再受到关注，由于在进化过程中机体产生了各种感知水平，使得层创进化论与机体论思想在概念上密切相关，不过层创进化论对**新达尔文学说**的原理却几乎无任何影响。

情绪（Emotions）

“情绪”（源于拉丁文 emovere，意为“向外运动”、“离去”、“搬出”）意味着什么，在英语中是非常明白的：常常伴着生理变化的强大情感经验，内在的情感体验。但是，进一步研究就呈现

的困难。应该如何命名情绪？类似的情绪（如气愤和挫败）是如何互相区分？情绪又是如何相关于体验者的内在状态？

生理学家研究不真实或非现实的对一事件的期待引起不适的情绪或反应的方式。在古典**行为主义**中，有一种刺激——反应——模式。一种外在事件直接引起一种情绪反应，即产生一种先前的决定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理论中，思维并没有进入互动；刺激被认为永远来自外在，而意义也被否定了。

从**认知疗法**的视野看来，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决定了情绪反应。意义寓于形象或思想之中。观察报告或情感报道也永远依附于思想。若情况真的如此，则可能追问什么样的思想引发了什么样的情绪。不同的情绪处境导致了相同的情绪反应，又导致普遍化。

在**精神分析学说**中，一种内在刺激发生了：这是一种普遍不可接受、而且其突然出现强加了一种威胁的冲动，或者一种无意识的愿望。如果一个人不能避开禁忌的冲动，他就会体验到罪感或焦虑的情绪。刺激是内在的又是无意识的，其重点在无意识的意义。如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男孩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性冲动，而看到母亲就是一种刺激。这种愿望可能闯入意识，因为可能的惩罚（他父亲的存在）而使孩子充满焦虑感。

在**人类学**中，研究分类社会中的情绪因为迻译语言和转换概念而复杂化了。这个领域紧密相关于近来有关**人格**的不同概念的关心。人类学与个性理论都受到了关注，并提出了某些重大的理论课题。

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假如上述行为主义所描述的，情绪被看作是不同于理性逻辑的东西。但是，仔细思考一下则会揭示情绪常常与相关于价值或合乎理性的行为相叠合。例如，激情可以在演讲中当作工具，用来达到某种目的。实际上，理（性）与情

（绪）之区分依存于灵与肉二分的笛卡儿式观念。这种观念把精神定位为理性思想之所，而把肉体定位为情绪活动之在。与此相对立的是肯尼亚的泰塔人的观点，他们的信念是头脑等价于心灵，而肝为意志之所，与心相联系的是情绪，以及通过情绪活动而影响别人的神秘能力。

人类学关于情绪的观点范围广泛，从社会的或公开的情绪表现研究，到致力于发现人性本质规定的更彻底的心理学方法。许多人类学家把情绪的公开表现（如在葬礼上的表现）更多地解释为一种社会习得的义务，而不是个人内在状态的显示。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是对情绪行为的社会期待如何依赖于社会中不同年龄、性别、地位等等的个人立场，以及这种情形又是如何以不同的环境而变化。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下，其他人类学家把情绪体验与表现解释为释放不同紊乱的安全阀门。这一观点把社会的一切其他维度还原为这种假设的第一因，因而招致了批评；这种观点还依赖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主观地感受到情绪。在另外的社会，强加这么一种假设，就可能歪曲他们的世界观。如，传统的印度人关于情绪的观念就来源于 Rasa 理论（rasa，意为“汁”、“精华”、“原味”）。这就是按照社会处境而不是按照个体情感来描绘情绪。味觉与营养的隐喻广为使用，而不同于在西方那种熟悉的水体隐喻（释放水流）。

历史的概览已提供了对各种有关情绪的感觉、概念与行为的进一步洞察。流行地把恐惧理解为可怕、恐怖、惊恐的等价物，理解为不可预见、不可控制和不可知晓的情绪，这已非常不同于 19 世纪的用法，在那时是以恐惧体现在对上帝的害怕中的敬畏观念。每一种范畴的形成都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基本结构。

尽管情绪状态、术语与行为可能千差万别，但人类学家还是一般地同意存在着决定我们作为有感情的人类存在的体验的共同性。在可能的范围内，情绪人类学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一方面提供一种对人类如何解释可见与未见的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如何相关于社会文化语境的洞见，另一方面又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有关情绪本质或个人本质的假设。

参见：死亡，解释人类学，合理性，仪式，自我。

情绪主义（Emotivism）

在**哲学**中，情绪主义认为当我们做出道德判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表达一种对于判断对象的情绪反应。当我说“纳粹是恶的”，我就是运用“恶”这个词来表达我对他们的厌恶，这也就是这个词的惟一功能。情绪主义否认，说纳粹是恶的，我也为这种对他们的厌恶感赋予某种理由。相反，这种情绪主义认为，说纳粹是恶的，仅仅是表达我的厌恶。

规范论是情绪主义的渊源。这种理论认为，道德判断表述的是赞成或不赞成的情绪反应，但它又断言道德术语又紧扣所论事物的非道德特征，这些特征解释了我的反应。

参见：描述论和规范论，伦理相对主义，事实与价值。

经验主义（Empiricism）

经验主义（源于希腊文 empeirein，意为“经历”），在**哲学**上是这么一种原理：全部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在我们占有经验之前，在我们感知或内省之前，我们根本不具有知识。但是，经验主义具有不同的变体。只要考虑一下“来源于”这个词组在不同

经验主义者那里所具有的不同意义，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不同变体中的两种形式。有些经验主义者主张：全部知识不仅在因果意义上源于经验，而且也由经验来确定。另外一些经验主义者仅仅是主张一切知识都由经验来检验。

让我们考虑第一种变体。某些经验主义宣称：所有思想在因果意义上都来源于经验，因而我们在不具有经验之前也不具有思想。在具有经验之前，心灵是一块白板，一张没有任何思想的白纸，经验尚未留下标记。根本不存在内在观念（天赋观念）——即在第一次获得经验之前心灵所拥有观念。

但是，在我们获得思想或概念之前就不可能具有任何信念，只有信念才能获得知识的地位。所以，如果拥有知识在因果关系上依赖于占有经验，因而知识在因果关系上也依赖于占有经验。经验不仅验证了知识命题，而且对于具有能获得知识地位的信念，经验在因果关系上是必要的。

主张一切思想在因果意义上来源于经验，这第一种经验主义形式难以避免如下的反驳：很难理解我们所具有的全部思想与概念在因果意义上是如何可能来自于经验。让我们考虑一下必然性概念，即如此这般必定如此这般的概念。很难理解事物必定如此的概念，是如何可能来源于事物现实存在方式的感觉或内省的经验的。

经验主义的第二种形式避免了上述反驳。它并不主张全部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因而它可能退一步认为，心灵具有天赋观念，甚至还具有天赋信念。可是它又坚持认为，全部知识都由经验证实，于是，直到为经验所证实之前任何信念都不能算作是知识。所以，第二种经验主义者主张，全部知识由经验证实，但对于是否一切观念与信念在因果意义上都依赖于经验这个问题却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它可能承认在具有经验之前我们具有观念与信念，

我们具有天赋观念与信念。

参见：天赋观念；理性主义。

编码和解码（Encode/decode）

在**传媒**研究中，编码和解码这一对概念有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用法。其一，它们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传媒文本的制作者使用通讯**代码**对一个文本进行编码，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尔后**观众**对文本进行解读或解码；其二，它们又指传媒研究中针对文本和观众的关系这一困难的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

“效果”理论和极端**马克思主义**等传媒观都暗含了一个观念，即认为传媒能够精确而牢靠地传递信息，而且观众能够按照编码者的期望理解其中的信息，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一过程就是形成**统治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环节，这种忽视观众作用的观点反而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传媒文本的关系、传媒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以及人们对文本进行解码的方式。

这种批评意见的核心观点是认为文本及其组成部分具有多义性，也就是说，尽管传媒文本的意义有一定的确定性——例如，电视新闻就不是以卡通的形式出现——对它的理解仍可能见仁见智。莫利发现解码过程至少部分地取决于解码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此语境中，性别、阶级和种族问题特别引人关注。

霍尔对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他对编码和解码双方面的复杂性进行了考察，反驳了那种认为大众传媒仅仅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编码的观点。他的研究表明，编码和解码过程可能会追随统治的意识形态，但同样也有可能与统治意识形态唱对台戏。

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s）

百科全书派是1751年至1776年间的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团体，他们一起合作编写了由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他们相信，人类深受无知和迷信的束缚，使他们获得自由的途径就是告诉他们真知。他们想使这套35卷的《百科全书》成为此前全部人类知识的荟萃，摈除形形色色的意见和教条，对存在进行理性的探索。除狄德罗和他的副手达朗贝之外，主要的百科全书派成员还有布丰、孟德斯鸠、卢梭、杜尔哥和伏尔泰。

参见：启蒙运动。

内分泌学（Endocrinology）

生命科学中，内分泌学（源自于希腊语 endo 和 krino，前者意思为“内部”，后者意思为“探究”＋学）是指对机体内分泌物（总称激素）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内分泌腺分泌这些化学信使物质进入血液，随血流在全身循环，与对其敏感的组织（靶器官）结合，并在组织结合处发挥生物效应。许多生理机能（如从月经到泌乳，从口渴到尿液形成）均受到激素某种程度的控制，一些激素作用于内分泌腺，使内分泌系统可进行一部分自我调节，其余的内分泌系统则受到激素的负反馈调节，即激素引起一些生化改变，其生成物使该激素分泌受到抑制。

日本化学家高峰让吉（1854—1922年）注意到肾上腺的提取物能使血压升高，随后首次分离出肾上腺素。随着20世纪人类的发展进步，在研究人类疾患的过程中已发现许多其他种类的激素，其中最重要的激素是由加拿大医师班廷于1921年发现的

胰岛素。胰岛素是在控制糖代谢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一种激素，胰岛素的缺乏可导致糖尿病，在胰岛素替代疗法成为可能以前，糖尿病常常导致人体死亡。如今，胰岛素和其他许多激素（如人体生长激素和类固醇激素）均可人工合成，并广泛应用于医学和科研领域。口服避孕药的基础成分就是类固醇性激素黄体酮和雌激素。

参见：体内平衡，新陈代谢，物候学，协同作用，向性运动。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指18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壮阔运动的总称，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人文主义**的思想，由帕拉切尔苏斯、培根、波义耳（《怀疑论化学家》一书的作者）、伽利略、牛顿等人物所预示的“真正”**科学**的兴起，以及笛卡尔和帕斯卡的著作。这一运动的初始动因，源自大革命前的法国，源自布封、孔多塞、狄德罗（他主编的《百科全书》是这一运动的第一座纪念碑）、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启蒙运动的基本前提，是自由、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并认为国家是改善人类境况的恰当途径。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名字，构成了18世纪思想和文学的一串光辉夺目的名单，他们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吉本、赫尔德、休谟、杰弗逊、康德、莱辛、亚当·斯密。他们认为，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被愚昧所禁锢，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的思维习惯基于非理性，为宗教教条迷信所笼罩，墨守历史陈规陋习，而要冲破这一切得以进步，就要寻求各个生活领域的真知，发现真理，并以真理为基础。这样，人们心中的黑暗真正地就被驱除了，即获得了“启蒙”。

启蒙运动与当时的工业革命（它从中吸取了丰富的灵感和力量）一道，在欧洲导致了自**基督教**出现以来人们思想倾向的最深刻变革，其人数也是最多的。它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成为现代的源头，它导致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爆发（从《独立宣言》到种族平等运动和奴隶制的废除），也导致了达尔文、赫顿和普里斯特利等人的科学发现。这一运动在欧洲人观念中导致了一种新的对**文明**的自信（或自负），并使之认为有必要将这种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落后”民族中。在**艺术**领域，启蒙运动导致人们认为**文学、音乐、绘画、戏剧**都是人类的道德教化和社会改良的手段，并引发形形色色个性表现的尝试，最著名的是**狂飙突进运动**和随后的**浪漫主义**运动。

昆虫学（Entomology）

昆虫学（源自于希腊语 entomon，意思为“切割、碎片”＋学）是对昆虫的生物学研究。昆虫纲是动物中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纲。早期昆虫学家亚里士多德注意到，昆虫的身体可分为三个体节。17 世纪初，意大利博物学家阿尔德罗万迪的研究唤起了人们对昆虫学的兴趣，而显微镜的发明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昆虫学研究的关注，它一经发明即被昆虫学家应用于研究工作。在 17 世纪，早期的显微镜学家马尔皮基对昆虫的神经解剖学作了开拓性研究，此外，斯瓦姆默丹亦对大量昆虫的显微结构和生活史进行了描述，并尝试将它们分类。现代昆虫学仍然包括大量的传统**分类学**研究，与此同时也在不断发现新的物种。病虫害生物学也是昆虫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因为许多重要的病虫害是昆虫（如蚜虫），而且许多害虫也是重要的生物防治物（如瓢虫能吃蚜虫）。很多昆虫从幼虫到成虫要经历多次变形（如从毛虫长成蝶

虫)，因此，人们对**发生生物学**有着极浓厚的兴趣。

参见：解剖学，生物防治，社会生物学。

熵（Entropy）

现在，人们可以按三种方式来考虑熵（希腊语，“转化”）。它与事件自然发生的过程有一方向这个事实密切相关。在微观层次上，它相关于系统能进行自组织的方式的数目。在当今通信理论中，它是信息的度量。

熵的第一个方面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关。这条定律曾被各种形式阐述过，但它可以概括为：以完全功效起作用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任何引擎、电动机或其他把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系统工作时，不会转化百分之百的能量。一些能量会因摩擦、热量损耗或其他损耗形式而丢失。发电站（将燃料中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生物和汽油机是此类系统的例子。像这样的系统，其熵的变化被定义为能量变化除以系统的温度。

所有系统都存在着把熵增加到最大程度的倾向。不能把熵与能量混淆；世界的能量是守恒的，而熵趋向于最大值。

在微观尺度上，熵是系统自组织方式数目的度量。这种陈述暗示了**量子**力学；一个系统，只有当粒子占有的能量或有效“位置”数目是有限的时，系统的粒子排列数目才能是有限的。

为了理解熵为何趋向最大，考虑一个盒子中的几个粒子。通过处理，我们可以让它们都集中在一个角落，或者更均匀地分布在盒子中。可使其均匀分布的方式非常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把一些气体放进盒子，它便不可能聚集在某个角落，而是分散开来充盈整个盒子。杂乱的、均匀分布的排列的熵，比粒子有规则地挤在角落时的熵要高得多，于是系统便找到了熵最大的

状态。

熵是系统内部无序程度的度量。自身所有粒子整齐地处在一个地方的系统，是有序系统，而粒子随机分散的系统则是非常无序的。

熵也可以看作信息量度。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粒子都在角落，便会得到相当多的关于它们的信息。然而，如果它们分散开来，我们能知道的关于某特定粒子的信息，则只是它处于盒子中的某个地方！向农已证明了熵与信息传播紧密联系。

与熵紧密联系的最后一个属性是时间的指向。熵总是随时间而增大。按其逻辑推论，这意味着宇宙正趋于一种最大熵状态。

环境艺术（Environmental art）参见：大地艺术

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

环境保护主义（源于古法语 environner，意为“包围”，“环境”）一词的意义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这个词是运用于**心理学的自然/文化**之争，作为辨识那种认为环境对人类个性与行为具有实质影响的思想流派的标记。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它又被用来指认如下广义的论断：人类社会应该给自然环境以更高的优先性。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观念，的确也是保护运动先前所倡导的信念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它获得了某些新的特征和更引人注目的样态。但是，仅仅考虑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的意义是不够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与自然异化的大规模社会中环境保护主义概念才是有意义的。

在小规模社会，如全体人类在其中生活了一万年的打猎——

采集群体社会，长时间的生存要求人们依自然之果实为生而不毁灭他们赖以生存的植物与动物。农业社会可能维持较多的人口，常常有贵族与牧师占颇大的人口比例，但都避免了重大的环境问题，只有美索不达米亚耕作体系的毁坏是例外。在这种社会建立的主要宗教，特别是**印度教**和**佛教**，都主张内在发展和与自然的和谐。即使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它相信上帝选择人类来统治自然，因而遭到了环境保护主义的批评——也教导我们应该作上帝在大地上的仆人。在中世纪，人口增长与商业发达，这就已形成了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但这仅仅是未来发展的一种模糊的先驱。

19世纪西欧与美国的工业革命急剧地增长了人类对环境的压力。"自由放任"的新经济学原理引起了对效益的追求而忽视了**污染**与浪费。运输的改善允许对远距离资源的更大程度的开发，而地方人民的利益则被忽视了。大工业城市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崛起，也同样对环境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些大城市也激起了实践上的回应，如控制污染灌溉系统，以及先行的环境保护主义理念。

同环境保护主义直接相关的有三种运动、三大思想流派，在对工业化造成的动荡的反应中发展起来。最为极端的是**浪漫主义**，它高扬与自然合一的精神优势，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只有对少数人才有效，而且是充满幻想地把城市驱之于考虑之外。一种可取的也许更有吸引力的途径，则是保护论者去复活管理关系概念。这种**功利主义**概念具有更明确的政治性，它力求追求最大的快乐，而将痛苦最小化，它具有环境政策的涵义，但是也具有以人为本做出决策的限度。实践中，衡量快乐的困难又意味着需要总是被用作指标，所以功利主义又基本上被吸收到市场经济之中。

在美国，环境保护主义产生了最早的实际效果。在西方的发展中，美国环保运动影响巨大，包括19世纪70年代以来所提倡的“国家公园”。但是，环保被规定为“明智的利用”，因而它只肯定由更加单纯的保护主义者所探索的某些发展。在英国，直到1945年之后国家公园尚未建立，这些公园的作用仅仅是促进消闲和保护，其所具有的权力决不会大于规划当局所具有的权力。除了控制吸烟、控制化学放射，早期环境保护主义主要是对特殊活动的局部反应。

20世纪70年代，新环境保护主义在内容及全球覆盖面积上都全面增长。像人口爆炸，核威胁，捕鲸和资源短缺等议题已超出地域而广为传播，似乎要求价值与优先地位上的根本变革。新型国际压力集团出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绿色和平”与“地球之友”在北美诞生，不久即传入许多国家。关于环境污染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并制订了“联合国环境保护计划”。20世纪80年代，全球变暖与臭氧层破缺又促进了环境保护，补充了环境议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工业逆转的要求层次上限制能源与材料使用，才能稳定大气层。在制订计划的时候，少数国家已打算不择手段降低能源使用增长率。

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环境保护主义的目标是影响政府决策。其途径是：或者直接选出“绿色候选人”，或者间接地组织游说团体。现在，公众意识已广为传播，那种明显触目但永远不是最后的科学证据的增长与积累又引起了公众关注的日益增长。这就导致了环保组织的广泛生长，导致了“绿色”政党在竞选中的成功，尽管主流政党总是腐蚀这种成功。蒙特利尔环保草案，就存在限制那种导致世界臭氧层破缺的生产，诸如此类的国际协定意义重大，证明了国际社会对环境主题的更高层次的关怀。

20世纪末叶，成熟的绿色政治哲学正源源不断地出现，它们宣称有一种鲜明的绿色价值论。“深绿色”理论认为：保护地球**生态系统**自为目的，并非因为对人类有利，这应当处于政治活动的中心。持这种见解者声称“该隐理论家”，因为他们认为，大地（盖亚）能忍受我们对自然的调适；但他们又认为，我们无法忍受自然在回敬我们的干预时造成的剧变（见“盖亚假说”）。“浅绿色”理论则相反，他们赞成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公共政策，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政策最终会给我们人类带来利益。所有这些绿色理论尚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有助于创造一种有力的全球政府，有能力通过必要的强制措施执行绿色公共政策，或者说，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从根本上废除中心的政治共同体，以此作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他们也不能解决如下问题：他们是否有助于更大的而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或者有助于降低全球消费（人口）。他们还对西方**文明**的主要成就持一种可以理解的矛盾心理，有许多绿色理论家就认为，如国家这样的人类组织和实证科学这样的人类文化成果是灾难性的。环境保护主义主张的严肃性，在那些可能导致“新时代”奇异宗教的“绿色生活风格”的支持者那里被神秘化了。

酶（Enzymes）

酶是来源于活细胞的蛋白质，其功能是调节生物**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化学反应，在实施调节功能时，酶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催化剂无需由蛋白质构成，但是酶制成的催化剂则有极强的催化作用，并具有高度特异性，即它们仅能催化特定的化学反应。酶能明显加快化学反应的速度，没有催化剂化学反应常常不能继续进行。酶是通过与反应中最初的化学物质（又称底物）“结合”而

发挥生物作用的。以这种方式，酶可与一个或数个底物结合使得化学反应能顺利进行。若没有酶的参与，化学反应能顺利进行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酶的功能这种思想被人们称为“钥匙——锁假说”。

酶对环境条件非常敏感，尤其是对温度和酸度。如果环境条件没有严格控制在与活细胞和器官中的条件相同，酶就不能发挥最佳的生物功能。酶之所以对外界因素如此敏感，主要是因为它们是由链状的蛋白质分子构成。蛋白质为氨基酸按一定顺序连接而成的多肽链结构，据多肽链上氨基酸顺序折叠成一定形状。蛋白质的这种立体结构对酶的功能非常重要，但也并非一成不变，这就如同钥匙与锁的关系。温度或其他条件的改变，可致酶结构发生变化，以至于酶不再与底物结合。底物与酶的结合部相连，由于结合部呈立体结构（与锁孔类似），使得能与酶结合的底物结构范围极为狭窄，这也是酶之所以具有特异性的原因。但是，具有与底物分子结构相似的化学物质也可与酶连接，有时甚至比底物本身与酶的结合更为牢固，从而阻断了酶的功能。这就是许多药品和毒素的作用机理，即通过阻断酶的功能，改变底物的新陈代谢。对酶立体结构的研究显示，有可能研制出特异的酶抑制剂作为药物。目前，大多数药品仍是意外发现合成的产物。

酶促反应是由毕希纳于 1897 年首次发现的，他的研究显示：酵母的无细胞提取物能催化先前认为需活酵母细胞参与的发酵过程。1926 年人们首次提纯出呈蛋白质结晶状的酶，此后，人们发现所有纯化酶都是以蛋白质分子为其基本结构。酶是基因的产物，通过酶的作用 DNA 能够控制生物功能，即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指令有赖于酶来实现。

参见：生物化学，生物技术，发酵，药理学。

史诗（Epic）

史诗（希腊语的意思是“庄重的言说”）是对各种事件的叙述，它通常具有神话或英雄的属性，并常常涉及到超自然的存在。大多数早期的史诗，是诗歌体的，并且大多是源于那个社会的**神话**和**传说故事**。这些史诗的最初源头，是口头**文学**，其诗体形式和结构有特定的传统渊源。有些史诗篇章，人们不知道其作者；还有许多史诗，如阿兹特克人和伊努伊特人的神话，非洲、澳大利亚以及古代中东地区的宇宙论史诗，尚处于萌芽状态，并且是地域性的。另外一些史诗则比较成熟和定型，但仍是匿名的创作，例如，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虽然具有最为恢弘的“文学”形式，却据说不是由一位作家编纂的，而是一位传说中的智者，缚雅莎向伽尼莎神颂吟的。不过，有一些史诗却留下了某位作者的意匠安排，他将原本个别流传的史诗片断熔炼为一，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卡勒瓦拉》（19世纪20年代才由托佩留斯收集起来）是此类史诗的典型代表。

文学作家对所有这些形式的史诗都加以利用，或者自己动手创作史诗。其中杰出者如维吉尔的《埃涅伊特》（它在半是传统半是独创的神话框架中构造了一个复杂的历史和政治的**寓言**）、弥尔顿的《失乐园》（其对《圣经》神话的处理既有荷马的影响，也有寓言的风格）、卡蒙斯的《鲁西亚德》（这是一部葡萄牙民族史诗，基本情节是伽玛的航海活动）。近代，有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也采取了史诗的风格，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梅尔维尔的《白鲸》。

戏仿性史诗作品也几乎同样流行，它们是采用史诗的手法表现一些琐屑而非宏大的事情，有的仅仅是游戏笔墨（如《天方夜

谭》中辛巴德的故事)，有的则寓讽刺之旨（如蒲伯的《夺发记》)。戏仿性史诗作品，包含以下一系列长篇小说的先驱，它们是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拉伯雷的《巨人传》。在西方小说史上，此种戏仿性史诗形式颇为常见，如果戈理的《死魂灵》、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历险记》、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托马斯·曼的《菲利克斯·克鲁尔的悔改》和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都富于个性而选择性地应用了这种形式。

史诗剧（Epic theatre）

史诗剧这一术语被戏剧学家用来描述最初和布莱希特与匹斯卡图（Piscator）相联系的戏剧实践。这种戏剧理念是与观众的同情反应倾向（像自然主义戏剧所要求的那样的倾向）作斗争。布莱希特发展了一系列造成间隔效果的戏剧策略，以便观众意识到戏剧事件的过程，能够在事件的发生时反思它的精神内容与情感涵义，而不为戏剧事件所吞没。在某种意义上，当代剧本创作与表演很少不受史诗剧的影响。

参见：戏剧，戏剧艺术。

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ism）

伊壁鸠鲁学派因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0 年）而得名。他是一个希腊贵族，他创立了在本质上叫做哲学秘仪的东西，这种秘仪，起初是由一群生活于雅典城中由高墙环绕的花园中的人们践行的（伊壁鸠鲁学派是今人的命名；在古代，其哲学和秘仪被称为“花园”)。这一学派的宗旨，是追求“不动心”，

即“不受烦扰”，他们称之为“灵魂的幸福”。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远离尘嚣、沉思冥想、心平气和，宁静地享受人生的乐趣。

伊壁鸠鲁哲学对那些不那么自负的古希腊罗马贵族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使他们远离了当时的政治纷争。但是，由于其秘密性，由于它没有成文的信条和仪轨（伊壁鸠鲁学派绝非一个秘密教派），其成员遂被控享乐和荒乱的罪名。尤其是早期的基督徒，斥责伊壁鸠鲁学派的如下观点：他们认为世界是倏忽易逝的，以及我们所能够拥有和（如基督徒所想的）能够企望的“幸福生活”无非是及时行乐，而不是追求伦理的、道德的和神学的成就和德性。用现代的目光看，伊壁鸠鲁学派的观念与远东哲学和宗教的观念之间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但这一点在古代从来无人探究过，这与其说是由于当时东、西方之间的隔阂，不如说是由于伊壁鸠鲁学派的“离群索居”对他人不闻不问，如果说它不是历史的遗憾的话，至少也是历史之魅力所在。仅举其一，如果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西欧历史的统治者们遵循像诗人贺拉斯（他也许是迄今最著名的伊壁鸠鲁主义者）或哈德良和朱利安皇帝那样开明的异教学说而不是像凯撒（在世俗事务中）和圣·保罗（在属灵的事上）那样严苛的斯多噶学说，西欧历史可能会是完全另外一种样子。

流行病学（Epidemiology）

生命科学中，流行病学（源自于希腊语 epidemia，意思为“疾病的患病率”＋学）是研究群体中决定疾病行为的因素的科学。流行病学家对宿主与寄生群体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参阅寄生），其研究范围包括：运用统计学技术确定疾病的感染率、传播效率和各种人群的易感性等，以及评估疾病

的大量相关因素（如饮食习惯、社会经济状况和季节影响等）的显著性范围。流行病学的一个著名研究是传染性肝炎的发现，约克郡一位家庭医生在整理乡村的病例资料时发现，所有病例均与一个儿童茶会有关，由此他发现了传染性肝炎。在另一个著名研究中，通过对医生生活史的记录和随访，揭示出吸烟与肺癌有关。前者的后期研究发现了疾病的病原体，而后者的后期研究尽管不能分离出病原体，但是吸烟与肺癌的关系得以进一步有预报价值的印证。

从世界各地汇集的资料，能全面反映疾病病因与人类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使制定疾病的防治策略成为可能。世界卫生组织运用这类全球性流行病学资料，制定出预防接种和健康教育的一些规划，使得在20世纪内根治了天花。

流行病学研究可用于现场试验，如测试预防接种是否可改变疾病的发病率；或比较预防接种与另一不同的干预措施（如用净化水代替疫苗）的差别。流行病学研究，也可用于测定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如测定某种药物治疗疾病的效果。具体的方法是：首先选择两个具有足够样本含量且具有可比性的病例组，一组给予药物，另一组给予难以分辨的制剂（安慰剂），然后依次对治疗结果进行统计，如果实验组结果好于对照组，那么说明治疗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试验人员知道受试者采用何种制剂，他们可通过不知不觉间表现出的热心、同情或过度好奇影响实验结果。因此，流行病学家设计了双盲对照试验（即试验人员和受试者均不知道实施或接受的是何种药物）来控制这类影响。但是，许多药物或治疗方法并不是按这种方法检测的，甚至试验结论发表后，一些疗法仍未进行必要的改进。

流行病学研究，能被用于测定所有治疗方法或干预措施的作用和有效性。换句话说，人们不必知道一个治疗方法是如何发挥

作用的，但却能设计出一个研究方案来发现这种疗法是否足够有效而值得采用。流行病学研究，也可用于检测有关致病因素信息的准确性，从而为研究提供有效的途径。

参见：病原学，医学，寄生虫学，毒理学，病毒学。

附随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

在**哲学**上，**附随现象论**者（epi，希腊文，意为“额外”＋phenomenon，意为“事件”）都是二元论者，他们主张心理不是物理，物理不是心理。他们还进一步主张，当物理事件（如身体上的受伤）产生心理结果（如痛苦）时，心理事件（如痛苦）并不产生物理结果（如畏缩）。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主张心理不是物理，他们另一方面又否认非物理的事件有物理结果。只有物理事件才有物理结果，心理并非物理，因而在因果关系上心理对物理无能为力。

参见：二元论，互动论，平行论。

认识论（Epistemology）

在**哲学**上，认识论如其希腊语派生词所示，就是关于知识的理论。知识有许多（明显）不同的来源。我们用来感觉世界的不同能力（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都显然给我们以现存世界状态的知识。记忆给我们以世界之过去存在的知识，想象给我们以可能的世界的知识。

认识论的两大中心内容是：知识的本质——什么是知识和知识的范围——我们能知道多少。

什么是知识？一种传统的答案是：知识就是真正确证了的信

念。我知道伦敦是个大城市，因为这句话是我的信念，而且是被确证了的真信念。认识的另一要求是，人们的信念是通过一种在特定语境中可靠的方法来获得的。伦敦是个大城市这一信念满足了这一要求，因为它是通过一种在特定语境中可靠的方法来获得的，也就是说，我相信地理老师说的话。

哲学家常常区别两种知识形式。我先验地认识到 2+2=4，因为我们都可以认识到 2+2=4 是独立于经验的。与此相反，我后验地认识到伦敦是个大城市，因为我们不可能独立于经验而认识到伦敦是个大城市：我必须听一位专家的讲演，或者到伦敦一游，或者从上空俯瞰。

我们认识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按照怀疑论，答案是知之不多。怀疑论者认为，我们不能获得不同范围内的知识。怀疑论的有限形态则是主张如下观点：我们不能获得对他人心灵、对未被发现的事物和外在世界的知识。全面的彻底的怀疑论则是这么一种学说，认定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知识的本质主题与知识的范围问题并不是独立的，各不相关的。假若不可怀疑性是知识的必要条件，如果仅当对伦敦是个大城市这一断言毫无疑问时才认识到伦敦是个大城市，那么我们几乎就一无所知，尤其是，我甚至不知道伦敦是个大城市，因为我可能怀疑：也许我的地理老师说谎，也许我的整个生活是场梦，甚至伦敦根本不存在。

要反驳怀疑论就必须指出：我们知道我们认为所认识的东西，这种反驳常常被称之为基础主义。这就是主张存在着一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确证了所有其他算作是知识的信念，但这些基本信念为了算作知识并不必要求自我确证。也许，基本信念所关涉的是所予物，假想中的经验原始材料，没有被理论解释或认知解释的污染。这种基础确证了所有其他被当作是关于外在世界和

他人心灵的知识的信念。逻辑一致论者主张基础主义是错误的，并没有什么基本信念，而只有在逻辑上粘在一起并在单一的一致逻辑网络中互相调节的信念。

参见：先验与后验；因果论确定性经验主义；基础主义与逻辑一致主义；所予物；唯心主义；幻觉；想象；归纳推理；内省；知识；记忆；朴素实在论；他人心灵；知觉；理性主义，知觉再现论；怀疑论。

同等调律(Equal temperament)，参见音调、调弦和调律

平等（Equality）

平等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核心的伦理、道德和政治价值之一。当然他们也知道，假如平等被认为是同一，那么 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就不存在平等。根源于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一种把平等解释为原则的方法是作为一种持久的要求：在决策的一切方面都平等的个人之间不应该做出某种歧视。但是，这种形式原则承认在一切相应方面不平等的地方也存在着不平等。一种更为根本的平等理论存在于基督教和西方政治哲学中，这种理论假设一切人按照共同人性或共同需要说来从根本上是平等的。所以功利主义说，任何个人都不应该只考虑自己；而康德（1724—1804年）及其追随者则指出，任何人都不应该被看作是满足其他人目的的手段。

这种对平等的实质性的构想预定了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又规定了法律和政治的平等——起码是正常人与成年公民之间的平等——这些假定在全部现代民主制中被接受下来。但是，政治上

的分歧集中在：平均主义是否要求一种道德承诺，保证人们享有收入、功利与福利上的平等水准。大多数哲学家一致认为，那些偏爱“结果平等”的人必须说明为什么偏爱这种政策。他们所提出的相应理由有：如卢梭所论，如果没有经济平等，人就不可能作为独立自主的公民；正如伦理社会主义者所论，没有在资源方面的广泛平等，就不可能建立人类同志关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人根本不值得占有许多优越面，不平等性必须予以正当化——特别是在不平等能增进一个社会中贫困者的福利的条件下，这样的不平等可能是正当的。

大多数有关平等要求的分歧产生于促成机会平等的意义与机制的争论之中。一方面，机会平等是否仅仅意味着享受不平等报酬和地位的公平机遇，还存在着争论。另一方面，创造“平等机会”所要求的程序也还有广泛的争议。比如，分配政策或创造“**赞助性行动**”的政策就受到批评，因为它们否定了富有者与非少数人享受机会平等的权利。

参见：保守主义；女权主义；人权；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

女性平等与平权（Equality and equal rights for women）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一辩》（1792 年）和泰勒的《女人普选权》（1851 年）是两部要求女性平等的早期著作。19 世纪自由女权主义者发起为女性权利立法的运动，相信靠立法可以解决女性附庸地位的问题。20 世纪初，激进的社会积极分子，如“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采取女性投票的方式，举行集体行动，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与平等机会。1968 年，英国福特女工罢工要求平等报酬。甚至在“同酬法”颁布之后（1970 年）和“性

别歧视法案”颁布之后（1975年），许多激进团体还继续为同等报酬与平等机会而斗争，这并不能有效地归在立法名义之下。

某些女权主义者反对为同等报酬与平等机会立法，其批评意见是：尽管在理论上通过立法保证了女性经济平等，但是不能通过立法反对在女性进入劳动竞争场所之前发生的在结构上的不平等。某些女权主义者认为，社会之父权结构抗拒任何形式的对不平等的变革，而依靠官样文章从歧视的要求中努力进行自身辩护。为女权主义所开发的一个领域是教育。在此，人们已经证明，男孩学“男性化”的学科，而女孩则选“女性化的”学科，其结果是男孩女孩在劳动市场上的不平等。

密利特的著作《性政治》一书指出，1970年，美国妇女在同等工作中比男人更能胜任。在英国，1992年平等机会委员会宣称，女人比男人更富有 $GSCE_s$ 和更高层次的学历。《同酬法案》（英国，1975年）在1984年被修改，要求同等的价值获得同等的报酬。这里的问题是，在妇女承担的许多工作中，没有男人从事同类工作，因而执行同酬法案是不可能的。《同酬法案》并没有考虑到如下事实：许多妇女从事无酬家务劳动或者临时工作；而且这一法案并没有给劳动妇女提供儿童看护，所以妇女仍然被剥夺了权利。

应该注意到，同酬与性别歧视法律在世界上并不是普遍的；就是在这些法律存在的地方，它们也不能成功地处理阶级、种族歧视，不能处理决定妇女生活的父权制的方方面面。

人类工程学（工效学）（Ergonomics）

人类工程学（古希腊语，“工作安排”）是关于人们实际地利用物体的方式的关联**设计**，它的目标是增加效率、舒适和安全。

作为一种直觉过程，人类工程学一直都是设计中的有机因素。例如，一把铲子或小刀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其被使用的方式，否则便根本没有设计的目标。（近年来，我们已见到了“人类工程学设计的家具”，它认为传统的椅子和桌子的形状，完全不适合使用者的需要——并且它使许多现今的使用者既感到困惑又感到便利。）

一个著名的人类工程学实践的优秀范例，是 18 世纪英国的陶器制造商威吉伍德。他在自己的厨房里试验他生产的茶壶的实用性能，诸如倒水的平衡、稳定和便利等等。然而，作为一门“科学”，人类工程学是二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人类工程学家们，研究诸如飞行员或潜水艇工作人员等的工作环境。他们研究利用有效空间和操作仪器的最有效方式，并把科学研究应用于像人眼的视力范围或手的握力之类的事件。战后，同样的研究技术被用于家庭器具、工厂机器和交通工具等方面。然而，尽管已有关于此学科的大量著述和研究成果，许多人仍坚持认为：人类工程学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不过是设计过程中的一个细小的组成部分。但是毫无疑问，它已经改良了舒适和使用的领域，并且尤其使针对老残病弱者的设计受惠颇多。

色情（Eroticism）

色情（eroticism）一词源自 Eros（音译“厄洛斯”），即古希腊神话中的性欲之神，它既表示性的态度或本能〔这时它与“好色”（erotism）是一个意思〕，又可表示旨在刺激性欲的艺术作品〔这时它与“黄色艺术”（erotica）是一个意思〕。

前一种意义上的色情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由于它使人们注意到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一种区别。就目前所知而言，大多数现

存的生物物种，仅仅将性活动用于生殖目的，不管它们的交配活动是多么激烈和频繁，那都是出于种族繁衍的本能冲动的结果，仅此而已。人类似乎是将性用作快乐目的少有的物种之一，并以之作为对爱情关系的庆祝，以至于在有的时候，生育被视为一种讨厌的累赘。我们知道猴子也手淫，因为人们亲眼目睹过它们这样做，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在手淫时是怎么想的，更不知道它们的想法是否与人类在这样做时的想法完全相似。进而言之，色情与其说是关涉实际行为的，还不如说更关于对性快感的期待与记忆。看来，色情是关于观念的，就其本身而论，观念为人所独有(迄今为止)，人类是已知的惟一有观念的生物。

黄色艺术意义上的色情，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毫无疑问，色情作品是黄色的（也就是说，它导致性兴奋)，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并非所有黄色艺术都是色情作品，认识到这一点，就应将多恩的情诗或雷诺阿的裸体画与《列车情劫：一位女士在苏格兰快车上被强暴和鞭打的真实故事》（大不列颠图书馆称这本书在维多利亚时代被绅士们广为传阅）这样的书区分开来。简单地说，春宫画是粗俗的色情艺术，而色情艺术则是高雅的春宫画。但是，这一观点（尽管在“反对性自由”的活动家那里是一种标准的观点）仍然似乎忽视了色情艺术的基本属性，春宫画是赤裸裸的，而色情艺术则含蓄暧昧，因此，其对读者或观众的影响也不同。春宫画通过性爱形象激发观众的性欲，而色情艺术则激发男人或女人的性想象，想象那些被描绘或暗示的性事，想象他或她自己正设身处地于其中。

这一区分对许多情况都是适应的，例如，印度神庙艺术是色情艺术，但不是春宫图；而飞机场中常见的下流小说中的性描写则是春宫性的，而非色情艺术。但仍有许多艺术作品无法归于这种区分，譬如说，美女挂历是色情画还是春宫图（或者两者都不

是，而应归为庞杂的“软性读物”范畴，也就是说，并非十足的“色情读物”)？那些“另类”文学作品又该如何归类（如《尤利西斯》的末章或纳博科夫的《艾达》，更不用说他的《洛丽塔》了)？撇开其社会情境不谈，在土耳其肚皮舞和西方单身俱乐部中的脱衣舞有何区别？电影中充斥着痴男情女的艳遇，演员的性感是一部电影成功的关键，但是，这与三级片中表演者的艳遇和性感不同。童话往往有色情的底蕴，但这并不能使它们成为黄色作品。

可能答案和以前一样，即春宫画刺激客观的反应（本质上是一种观淫癖），而色情艺术则激发主观的反应（令人回味其自己曾经历过的性关系的偷欢和春情）。20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曾有人就此问题对一组七岁的儿童做过实验，结果令人难以置信，面对那些（选自黄色电影的）赤裸裸的性交照片，他们哄堂大笑，而对（诸如卢梭画的丛林中的老虎和科克托的电影《美女与野兽》的剧照这样的）色情艺术作品，他们则一脸困惑，有的甚至表示出恐惧。这似乎证实，如果二者的区别在于其精巧性的话，精巧性也不是取决于春宫或色情艺术本身，而在于它们在每一个人身上所激发起的反应。

参见：性别；自我。

末世论（Eschatology）

现在，人们承认：关于末世论、“最后的事”（希腊语为 eschaton 即“最后”的意思）的教义，在**基督教**里是耶稣教导与新约信息的最重要部分。这个词本身，直到 1844 年才被发明出来的事实表明：末世论的含义，长久以来一直遭到忽略式漠视。1844 年前，耶稣关于“上帝之国”即将来临的教导——或者甚

至可以说人子在审判中降临的图像——被解释为在历史终结时（在上帝取悦的时候）要发生的事件。（路德曾相信：这个世界会在1535年结束，但在他之后，天启信仰变成了极端持不同意见者所独占的东西。）或者，人们认为：耶稣的寓言及格言，在教会史的事件中已经实现了。保罗书信中，既没有对末世论的紧张状况的评价，也没有对耶稣将在几年内回来的信仰之道的重视。这种信仰，主宰了第一批基督徒的崇拜仪式、伦理观念和各种期盼。保罗书信中的上述现象，意味着：学者们也未注意到因耶稣“再来”的推迟而导致的危机。历史仅仅是从创世（不久遭到达尔文主义的质疑）到救赎的平稳发展，中间伴随由死亡与复活而导致的一种范式转换。

致使这种观点发生革命性剧变的，正好有三大因素：随着福音派信徒强烈渴望末日的到来和在与耶稣的个人关系上的完美，“福音派的”复兴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学生自愿者运动，投合了有教养的阶层；批判性的学问对耶稣是全知的信仰的驳斥，要求对他的教义进行一种激进的再评价；最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看起来如同世界末日的体验，或至少可以说是“文明”社会终结的经验。旧的自由神学，似乎永远遭到了毁灭。现代战争，代替了罗马天主教庭作为末世论的催化剂的位置。

重新解释末世论的早期努力，把“上帝之国”的概念属灵化了，宣称：关于上帝直接治理地球的这种“末世”理想的教导（他们注意到旧约也能发现这种理想），和那些让自己的生活顺服于耶稣的人们的属灵状况相关，并且属于早期教会的产物。它不是源于历史上的耶稣。虽然正是布尔特曼最直接地面对了耶稣在期盼一个临近的末日时犯下的错误的问题，但那提出把末世论作为理解耶稣的生活与教导的钥匙的现代评价的人物，是施韦策。

施韦策后来牺牲一段学术生涯，在刚果做一名医生。他的书，出版于1902年至1904年。施韦策相信：耶稣努力促成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首先通过派遣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然后借助骑上驴子进入耶路撒冷、顺服地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实现旧约的各种预言，从而开始“上帝之国”。施韦策，也是第一个觉察到不可能把早期教会对末世论的信仰同对历史上的耶稣的信仰脱离开来的人。施韦策的耶稣，是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他将自己抛向历史的车轮而被碾得粉身碎骨，但他有效地恢复了末世论的名誉，纵然他在评价犹太启示文学的背景时犯了错误。

从那以来流行的争论中，英国神学纵然慢慢地承受了卡尔·巴特神学的彻底冲击，但其中出现了三种普遍的观点。首先，是严格意义上的未来主义的观点。它主张：在最近或不久的将来，会发生大灾难，自然灾害、战争、饥荒、瘟疫将袭击地球，教会会受到可怕的逼迫。然后主将显现、审判活人与复活的死人，义人将进入他的国度。从2世纪以来（例如在帕皮亚斯、伊里奈乌斯的著作中），人们可以发现另一种关于未来主义的末世论的变化了的形式，其中，基督和他的圣徒们，将在末日前先统治一千年（**千禧年论**）。一般说来，这是保守的福音派信徒采纳的立场。其次，有多德主张的已经实现了的末世论。他的著作，几乎和施韦策的影响一样大。他注意到：对福音书里的“上帝之国”在约翰福音中改变成了“永生”，提出“已经实现了的末世论”理论。由于强调耶稣教导中的“现在”特质，和“天国”在保罗的书信中以什么方式成为一种现在的力量，多德得出结论：真正的天国，已经是现在的，它通过耶稣的生活、死亡和复活在今生中形成了。生活已经被耶稣改变，生活只是一个进入天国的问题。在这两极之间，是那些相信如下观点的人们：在耶稣的生活与死亡中，一个过程已开始了，它将在最后的日子结束。“天国”已被

展开，但未结束。因此，早期教会生存在耶稣的复活与再来之间的空隙里，靠圣灵来维持（参见**圣灵论**）。关于这种粗略的陈述，有许多种变化了的和精妙的形式。富勒，坚定地为那可以被称作“开始的”末世论理论辩护。在这种理论中，人们认为耶稣曾相信：天国的发展和他的福音传播有关，但直到他死后和再来之前，天国都不会最终被建成。

人们会觉察到：无论哪种末世论的信仰，都依赖于一种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在**佛教**、**印度教**里，末世论作为一个临近的现实是不可能的——依存于人们抱有的如下观点，即拿撒勒的耶稣是谁、或至少他认定自己是谁的观点。

在**犹太教**里，自从公元前8世纪和阿摩司、弥迦的预言书出现以来，一直都有一种对“耶和华的日子”的强烈的信仰。那时，审判并不必然地是证明无辜的，它将照例要临到以色列和非犹太民族。艾赛泥派信徒团体和库姆兰会社，退回到旷野，等候弥赛亚，但是，当革命者巴尔·库克巴（“星星之子”）被捕遭罗马人处决（公元前135年）时，他们失望了。从那以后，虽然有许多次的绝望，但希望从未泯灭过。以色列在现代的复国，再次将希望之火点燃（参见**犹太复国运动**）。

超感觉力（Esp），参见：通灵学

本质（Essence）

洛克在实在的现实本质与名义本质之间做出了区分：实在的现实本质是它们隐含的“内在结构”，如我们知道水的现实本质是H_2O；实在的名义本质是其可以观察到的属性，如水的名义

本质是它的外表、气味、给人的感觉等等。

仅当某物具有这种实在的本质时，它才是这种实在的特例。洛克认为，仅当某物具有水的名义本质，仅当它的气味、给人的感觉以及看起来像水，它才是水。如果某物具有水的名义本质，但它又不是 H_2O，它仍然是水。如果某物是 H_2O，但不具有水的名义本质，它就不是水。之所以持上述主张，其部分理由是洛克的这么一种看法：我们不能认识一个实在的现实本质——即它隐含的“内在构成”。

科学的发展推翻了这种认识。我们现在毕竟认识到水的现实本质是 H_2O。当代哲学家主张，仅当某物具有水的现实本质，仅当它是 H_2O 时，它才是水。如果某物具有水的现实本质，但看上去、闻起来、感觉起来并不像水，它也仍然不是水。如果某物看上去、闻起来、感觉起来像水，但它不是 H_2O，那么它也不是水。

参见：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在哲学上本质主义是这么一种学说，事物具有本质属性，没有这些属性，它们就不是这种事物。许多哲学家主张，水的本质是它的现实属性；水的本质是 H_2O。因而，杯中之物具有一种本质属性，舍此它就不是这种事物；如果我的杯中之物不具有 H_2O 这种存在的属性，那么它就不是水。

反本质主义者则认为，根本没有独立于我们的定义和分类方法而存在的本质属性（即那些舍弃就不成其为这种事物的属性）。作为一个理性动物而存在，这是人的本质属性，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选择这种属性来把“人”规定为“理性动物”。因为我们选

择这种属性来划分事物，仅当某物是理性动物时，我们就把它归于人类。但是，事物并不具有不依赖于我们的定义与分类方法的本质属性。

参见：本质。

伦理直觉主义（Ethical intuitionism）

在**哲学**上，伦理直觉主义拒不承认道德判断仅仅是情绪或赞成的表达。他们认为，存在着一种特有的道德直觉的能力，它使我们接近道德真理，接近我们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实。这种直觉能力可能使确定的行为法则成为不证自明的正确法则，因而道德行为就是遵循这些法则。如此构想的伦理学知识就可以与数学知识相比较，后者是由某种自明公理的结论的认识构成的，而数学直觉的某种形式就把握了这些公理。另一方面，道德直觉能力可能更像我们的感官，它可能使我们从帮助老人过马路的兄弟身上看到善，正如我们可以看清马路是宽阔的。

参见：伦理相对主义，哲学事实与价值。

伦理相对主义（Ethical relativism）

哲学上的伦理相对主义是这么一种观点：伦理判断的真假仅仅是相对于特殊的语境。相对主义者对于什么是我们的现实语境，其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现实语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因而，同类相食的习性在太平洋岛的“原始”土著人之间可能是被允许的，但在现代欧洲城市则是不允许的。另一些相对主义者认为，现实语境即是特殊个人语境，因而，同类相食在你可能是正确的，在我却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是具有不同天性的不同

的人。但是，一切相对主义者都否认根本上存在着那种借以表述道德判断使其在一切可能的语境中都成为真理的方法。在这一方面，他们背离那种认为我们可能合理地评价他人行为、对其做出道德判断的常识见解，甚至当他们来自不同社会或历史语境的时候。

参见：情绪主义，伦理直觉主义，事实与价值。

伦理学（Ethics）

在**哲学**上，伦理学（源于希腊文 ethikos，意为“论述〔人的〕本质”）可能一般地分为三个部分：规范伦理学，实用伦理学和后设伦理学。

规范伦理学研究普遍的规范原则或规范德性。关于普遍的规范原则，有许多不同的学说。**利他主义**主张，当决定如何行动时，我们应该考虑别人的利益，同时也考虑自己的利益。**享乐主义**主张我们只应该追求自己与他人的快乐。中庸原则表述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应该像要求别人对己一样地对待别人。

唯行为后果论认为，我们应该做一切具有最佳后果的事。（**功利主义**，即这么一种学说：我们应该做一切能够实现福利与幸福最大化的事，这也是**唯行为后果论**之变种。）**义务论**主张，行为之正确与错误在于它们如何遵从道德法则，而不在于它们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必须遵从应该讲真话的法则，即使违反这一法则可能产生更好的后果。另一些人主张，仅仅以一系列道德法则是无法把握行为之正确或错误的，也不仅仅是行为之后果决定其道德地位。不如说，我们应该做一个有德性的人，一个对不同处境具有某些情绪反应的人，正是对处境的反应使一个人以德性、

诚恳、慷慨或仁慈的行为方式行动。

实用伦理学研究特殊的实践伦理问题，如堕胎、安乐死、战争和我们对动物的处置。显而易见，实践伦理问题的研究离不开普遍规范原则的研究。普遍规范原理对特殊实践伦理问题具有隐含意义，因而，接受普遍规范原理可能导致人们改变对于特殊实践问题的意见，进而一个人对于特殊实践问题的稳定信念也可能使人看出普遍规范原则的失效。

后设伦理学既不关心我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原理，也不关心这些原理怎样相关于特殊的实践问题，而是研究一切道德原理都会遇到的抽象概念和形而上学主题。一个后设伦理学命题是：一切关于一种特殊的道德判断对一切类似的特殊都是可普遍适用的。**情绪主义**宣称道德判断仅仅是情绪的表达。描述主义主张道德术语是纯粹的描述。规范主义要求道德命题必须具有两种独立的意义构成：描述的和评价的意义（参见**描述主义与规范主义**）。**伦理相对主义**是这么一种学说，它认为道德判断之真假仅仅是相对于特殊语境而言的。有人认为，上帝命令我们不要杀人，所以谋杀是错误的。**伦理直觉主义**是这么一种原理，它认为有一种道德直觉的特殊能力，使我们接近道德真理，即接近我们应该如何行动的事实。

自然主义的迷误是一种假想的失误：从“实然”中推出“应然”。问题在于，伦理学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参见：事实与价值；神谕；道德规范；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实用伦理学；普适适用性；善与恶。

民族性（Ethnicity）

民族性在广义上被定义为一种（既为客观又为主观的）共有

特性的集合，这些共有特性规定了相对于其他集体性的一种人类集体性。民族的显著标记是人们所表现的那些可以认知的自然的或社会的特征，如“种族”，语言，宗教，习俗，地理起源，方言，这些特征把这些人辨识为可认识的民族种类的属员。某人既是又不是某一民族种类的属员，虽然他们可能具有不只一个民族种类的所属性之叠合特征。民族特异标记具有客观性，即使那些天生禀赋这种标记的个人否认这种客观性。与一个民族种类相对立，一个民族集体由那些自认为是这一集体的成员、而且被别人认为是这一集体的成员的人们构成。同族通婚保存了民族集体的同一性，民族性也假定了一个集体成员之间（真实或虚构的）的祖源，尽管这种用来规定集体归属关系的学说在两种人那里是不同的：一些人强调亲属关系或种族，另一些人则突出以共同语言、历史、宗教为基础的继承性共有文化。在后一种人看来，民族性是隐喻的或想象的亲属关系。

上述分工为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民族性理论奠定了基础。那些可能吸收社会生物学家的思想来研究原生社会的学者，则把民族性规定为必要的现实的共同来源。他们认为，民族忠诚就像裙带关系，就是忠诚于共享同一基因库的人们。他们强调民族同一体的“预定性”：即具有自然标记（如肤色）和显形特征（如体形）的共同性质。他们相信，民族同一性和情感上的依恋比那些基于共同利益的同一性与依恋更为有力。相反，工具主义者（或情境主义者）则假设共同文化、利益与自我定义对于规定一个人的民族同一性是最为重要的，他们认为民族同一性更有弹性，而不是原生论者所宣称的那种社会发明的结果。他们强调指出，民族集体可以出现和分裂，甚至完全是以新的虚构、伪造的神话来发明“共同的起源”。

19～20世纪的政治社会理论中广为传播的信念是：在现代

化的条件下（自由整合论）和发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下，民族集体及其同一性必将"消亡"。在今天，几乎不可能表达民族性消亡的信念。确实也有人提出相反的命题：现代化（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民族同一体更为重要，更可能成为冲突的根源，因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大规模移民，国家发展，都联合起来把民族集体带进了为争夺稀有资源的竞争之中。

民族性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学**、**政治科学**与**社会学**中存在着更大争议的主题。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者发明了国家，构造了共同种族过去的神话；同时另一些人坚持认为，可信的和成功的民族主义运动必须建立在目标听众之间真正的民族同一性意识之上。这种推理的判案是多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捏造了共有的民族同一性。

民族中心论，即人们以自己的文化标准为圭臬去判定其他共同体的价值的倾向，在许多人看来这就是民族冲突的最初根源，同时另一些人认为民族对立具有经济学或遗传学上的基础。

在当今世界，民族冲突几乎是无时不在的，但是也有许多情况表明，在民族集体之间也存在相对和睦的关系。可以在两类国家之间做出一种简单的区分：一类国家是提出许多策略，力求（通过种族屠杀，大规模人口迁移，隔离，**退出**，**整合**与**同化**等政策）消除民族集体的现实对立；另一类国家则力求（通过控制，**仲裁**，**联邦制度**，**联合主义**等政策）调适或管制民族差异，而不想终止或废除现存的民族同一体。

参见：共同体；冲突理论；人种历史学；社会封闭；社会冲突；社会整合；社会分层；社会；传统；部落制度；典型化；城市人类学。

种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

种族文化考古学（源于希腊语，意为“对古代社会的研究”）结合了在特定社会的人类学**田野作业**研究和**考古学**研究。选择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以哪一个社会作为其研究对象，这取决于其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是，学者一般选择那些有助于揭示环境和技术相似性的方法和对象，例如，通过对北美、南非和澳洲的狩猎和采集文化的研究，就可以建立关于工具制作、屠宰技术、居住模式等方面的工作模型，这一模型可以用于考察古代涉猎—采集社会的物质文化遗迹，就此而言，考古学并不仅仅限于对考古发现进行描述和分类，而是想进一步追问古人是如何使用这些物品的，并试图建立一系列合理的工作模型。

19世纪的学者从这一理路出发建立了进化论的工作框架，将当代“原始”社会视为古代社会的“化石”，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社会并非生活于与农业社会相互隔绝的孤立状态中，而是深受周围社会和国家政策的影响，由于供其生息的土地越来越小，这些社会随之发生变迁。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在印度，对为定居社区提供蜂蜜和羽毛的穆里亚贡德人来说，狩猎和采集不失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生计，在像斯里兰卡的文德人这样的社会中，涉猎和采集则被当成吸引旅游者的手段。

种族考古学的另一个问题是，并非所有古代的行为都能与现代的行为相互类比；此外，仅仅依靠对物质遗存的研究不可能澄清一个社会错综复杂的符号体系和社会制度，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简陋的器物遗存就一定意味着其社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

尽管如此，种族考古学的理论前提依然是：物质器物制约着

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是时空中所有人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尽管其具体的观点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种族考古学所提出的各种模型对加深我们关于先民的行为和技术的认识仍有促进作用。

参见：文化；传播论；人种历史学；进化论；匮乏；象征主义。

人种植物学（Ethnobotany）

人种植物学（源自于希腊语 ethnos 和 botanikos，前者意思为“人”，后者意思为“植物的”）是对传统植物学知识的科学再评价，其研究范围包括可制成食物、原料和药品的所有植物。库克是最早的人种植物学家，他认为在太平洋诸岛他所遇见的面包果树，可做成对西印度群岛奴隶们的理想食物。现代人种植物学研究，最初感兴趣的是在某些地区（如远东地区和南美热带雨林地区）的植物中寻找新药。对传统医学和民间验方的研究，能使人们发现具有潜在药用价值的植物，然后采用传统的科学的药物筛选技术，使人们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成分，其活性可抵抗从癌症到疟疾的许多严重疾病。

参见：药理学，毒理学。

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种族中心主义”这个术语（源于希腊语 ethnos，意为“民族”）是在 1906 年由社会学家萨姆纳提出的，意指将本民族文化看得比其他文化优越并用自己社会的准则衡量其他社会的倾向。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暗含了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观念，它源于

关于“原始”和“文明”的进化论观念，这些观念常被用来为那些关于异文化的论调进行辩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人类学家那些研究他们曾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著作，对其“原始”观提出了挑战。20世纪20年代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明确的目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眼睛认识他人的世界。

然而，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充斥着关于其他社会中**食人**行为、暴力和**献祭**等风俗有意无意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判断，当代人类学凭借其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明察，避免了对其他社会的文化体制轻易地做价值判断，这些体制都是这些社会针对其面临的具体问题而建立的。人类学对其潜在的前提公开地进行检讨，这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多见的，这使它在社会研究这个快速变化的领域中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

参见：文化相对主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自反性。

民族志学（Ethnography）

民族志学一般是指人类学家经过在某些社会长期生活之后对这个社会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所作的书面描述，这样的著作被称为民族志专论。

民族志学同样也涉及到**人类学**的方法论基础，即参与观察。在一个社会中生活并用当地语言向人们收集资料，这种经验为理论上的论争提供了基础。马林诺夫斯基最早奠定了民族志研究的重要地位，他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活于美拉尼西亚的特里布里恩群岛，他关于当地人的著作得到读者广泛的赞誉。

克利福德和马尔库塞的近著《书写文化》对马林诺夫斯基所描述的田园诗般的景象提出置疑。他们指出，社会科学的理想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之间的差异常常会危及人类学家那些纯

正的结论，用写作作为传达经验的媒介，进一步局限了社会科学试图获得纯粹的社会事实的自信。

参见：田野作业；自反性。

言语人种论（Ethnography of speaking）

言语人种论，是**人类学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和**布拉格学派**关于语言功能的概念相一致，强调**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习俗的作用。言语的人种论者，注重各种各样的方面；在这些方面中，**语言**的社会功能，从一个言语集团到另一个表现出异常明显的差别。因此，正如语言显现在自然发生的社会互动现象中那样地分析语言技能，这被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样，大量的言语事件可以得到确证，它们显示出交谈如何通过语言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产生意义。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参与者的角色与地位、他们所采纳的话语策略。

由于部分是根据言语事件明显的特定结构来定义言语集团的，言语人种论，主要致力于文化多样性的任何讨论。因此，在越过文化边界甚至包括那些具有共同的代码或语言的地方，普遍流行的错误传达获得了一种解释，因为也许存在谈话理由与谈话方式的根本差异。

人种历史学（Ethnohistory）

人种历史学（源于希腊语，意为“对社会的研究”）通常是指对无文字民族的历史的研究，它也可以指将**人类学**和人们经由口头传承获得的历史表象的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或者是指对由旅行家、传教士、征服者、殖民者提供的关于其他社会的文献进

行重新评价。

这个术语是威斯勒在1909年首先提出来的，当时被用为文献记录的同义词，直到20世纪50年代它才被引入人类学，并获得现在的含义。在此之前，英国人类学家所关注的是社会体制是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这是对前期的人类学反动，它曾经一味沉迷于对社会从古到今的进化过程的研究。

但是，埃文斯－普理查德在1950年著文对当代人类学完全忽视历史提出了责难。他指出有必要将一种“好”的历史学视野纳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存在很多基本的共同点，因为两个学科都是对在或是在时间上或是在空间上业已消逝的个体或社会实践的认知和译解，它们共同展开了一个广阔的生机勃勃的研究领域，它们的结合将能全面地认识人们对其过去的理解，认识人们是如何区分诸如“神话”、“传说”、“史志”、“事实”、“小说”等各种形态的历史的，它们的结合还能改变民族志的缺陷。后者往往将一个社会视为静止的和无时间的，那种认为“原始”社会只有与欧洲接触才能发生变化的错误观念也就不攻自破了。

埃文斯－普理查德观点中的主要问题是他企图建立的“好”历史是典型的西方式关于事件的编年史，关于建构历史事件以及将过去概念化的别种理解将会提供一种与此模式迥异的另外一种理解历史的尺度。例如，澳洲土著的历史观体现于其“黄金时代”的叙述中，这种历史观非常不同于编年史，但是对于土著人的现实和价值观却同样富于意义。

有的人类学家意识到过去历史的建构与个体和社会在当下世界的认同和兴趣有关，历史的建构可能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因此，这些人类学家所关心的不是过去如何产生现在，而是现在如何创造过去。与此相关的是人、**时空**、宗教观等概念，以及形

形色色乃至相互对立的历史观是如何与当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竞争联系在一起的。

参见：传播论；种族特性；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神话；东方学。

民族医学（Ethnomedicine）

民族医学，是对本土健康制度的探索。各个民族处理问题、事故和疾病的努力，将产生许多重叠的制度。这些制度，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比作为医学的“发展”概念；但是，关于什么构成一个健康或疾病的人的思想，却有很大差异。

民族医学已取代医学人类学这个术语，为的是强调除了那些体现在传统科学医学外的东西，还要研究信仰与习俗。医学人类学利用**医学**与**人类学**，来解释不同文化对健康的文化理解。最初，它从一种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视点出发，把注意力放在技术原始的各个共同体的健康习俗和解释疾病的方式上。现在，医学人类学关注对个人与集体不幸的解释所具有的多样性，关注医治者与病人如何在这些思想体系的背景中完成社会化的过程。

这些思想体系，常常互相借用各种因素。特别是自从引入西方生物医学的系统以来，我们不能将那些体系视为相互排斥的。西方的生物医学系统，普遍对地方知识曾有过深刻涵义。例如，医治者越来越专业化，显著地改变了一些社会的权力关系。按照西方医学的方法来培养专科医生的明显需要，已经改变了严谨的专家与病人的关系。专科医生们，现在有机会占有一大堆知识（这些知识，常常内含在书面文本里）；根据救治病人会主动影响治疗过程的经验，他们以前也许享有大量共通的知识。

医学的体液系统，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运用。它一

度是欧洲医学的基础。它把个人与集体的机能障碍，视为各种基本力量缺乏和谐的结果。这些力量，被认为构成了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例如，传统中医通过饮食调节、草药剂以及针灸之类的治疗，来医治这种阴阳能量的失衡。中国人发明针灸疗法，目的是为了恢复人体内的生命能量（或气）的平衡（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努力保护传统中医，使其免受生物医学的影响）。

参见：民族精神病学；体液。

民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

在**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中，民族方法学是关于民众日常生活方法的研究，藉此对社会中发生的时间进行重建、说明和理解，简言之，它的意思就是“民众方法论”。这个术语是这个学科的创始人加芬克尔在20世纪初提出的，人们在日常世俗生活中实际采用的常识性的思维方式一直受到社会学各个分支的严重忽视。

社会学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凭借其社会学方法他们能够较之一般人更好地认识社会，传统的社会学认为普通人对社会的认识不足为凭，并用自己的认识取代它，加芬克尔认为这种观点低估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知识，他认为，普通民众自有其特定的规则，使他们能够在实际需要中理解社会境遇并获得一种秩序感，虽然他们对此多不自觉。

民族方法学者主要运用两种研究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故意破坏日常生活的平静进程，以凸现社会秩序的底蕴，此即所谓“中断实验法”，加芬克尔指导他的学生回到故乡时假定自己是一个过路人来投宿，父母和亲属的反应非常具有戏剧性，他们表现出困惑、茫然甚至敌意，加芬克尔相信这样就揭示出了那些精心构

筑的日常生活秩序。

由于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活动都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因此，民族方法学者尤其重视对会话的研究；民族方法学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对话分析，人们相信这种方法能够揭示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共同理解以及人们在理解现实中所使用的实际技能。

民族方法学重视语境在日常生活理解中的作用。据说，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话的索引特性，民族方法学认为，只有从对话发生的情境出发才有可能理解对话，对话或谈话的含义从来不是毋庸置疑的，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把握，为此，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技巧。

这一学派揭示的日常生活的另一个特点是解释的自反性。这一观点认为，不可能将社会行为与对这一行为的解释判然分开，人们对某种情境的解释会反过来改变这一情境。

民族方法学的批评者指责它所关心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它提供的是一幅条理分明的日常生活画面，而生活实际上充满了矛盾和误解，它不了解宏观的社会结构，因此无法解释人们的活动是如何被制约的，此外，它实际上使用了它所指责的那些研究方法。

参见：行动观点；个人主义；微观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社会秩序；结构；结构—动因之争；符号互动主义。

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民族音乐学这个术语（希腊语为 ethnos，“民族”＋音乐学），字面意思为对不同文化中音乐的研究。1950 年，荷兰音乐学家、印度尼西亚音乐权威孔斯特，首次创造了这个词。它是（欧洲人）以前所说的学术考察领域即比较音乐学更准确的命名。

人们将比较音乐学理解为“外国”音乐的研究，即是对欧洲传统之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因此，人们把它当作音乐史的原始的东方的分枝。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比较音乐学在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欧洲**音乐学**。欧洲以外的音乐，没有记录的手段，靠口头传下来，由于它的即兴特点和无限多样的调性调音体系，它要求使用不同于西方艺术音乐的研究方法。

人们认为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音乐定义，并且它很容易区别于非音乐。这种思想，也受到挑战。我们只要考察某个社会，便提出了音乐与非音乐的细微差别问题。在其他社会，如保加利亚的乡村背景中，口头的而非器乐的表演才被当作音乐。民族音乐学的其他研究还发现：音乐思想与分类，差别非常大。语言学的模式，一度用来研究这样的问题。它最普遍的观念，便是位——非位相区别的结构体。1967年，派克首次提出这一点，用来指一个群体拥有的主观视点即位的，以及群体外的人所用的分析模式即非位的。纵然难以描绘内部与外部的人们的视点的明确差别，但位——非位的维度为分类和比较各个社会的音乐概念提供了一种有用方法。

1950年，孔斯特写道：“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所有非欧民族的音乐与乐器，包括所谓的原始民族与文明开化的东方民族”。但是，到1959年，他修改、扩充了他的定义：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从所谓原始民族到文明民族所有文化阶层的传统音乐与乐器。所以，我们的学科，是要考察所有部落与民间的音乐，以及每种非西方的艺术音乐。它也要研究音乐的社会学方面，以及**音乐涵化**即不同于自身的音乐因素的混杂影响现象。”不过，他又附加地说：这个领域，不应该含西方的艺术音乐与流行或娱乐音乐。

关于民族音乐学这个术语的准确涵义，至今在学术界没有形

成真正的共识。但是，主要的争论，集中在两个学术观点上。人类学的观点，将民族音乐学视为社会背景中的文化音乐的研究；另一种人类学观点，把音乐当作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个普遍方面来研究。如果这种立场要将重点放在某个特定文化或社会的原则上，即创作音乐是一个明显特征的那些原则上，那么，作为音乐学的目标，它的视点宁愿选择该社会的音乐体系的原则，以便有效地按照所研究的音乐本身来理解音乐。

纵然许多人已接受民族音乐学为音乐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一个边界领域，但它的重点还是在继续强调调查者本人背景之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西方人也许可以将爪哇木琴（一种管弦乐）之类音乐即我们自己文化之外的音乐当作民族音乐学来研究描绘，但爪哇的学者们会如何评价它呢？毕竟，欧洲的学者们不可能把一首贝多芬的交响曲视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来对待，纵然爪哇的学者也许会如此想。所以，民族音乐学这个术语，可能被认为是种族中心论的。但是，前些年，一些民族音乐学者一度拓展了该术语的范围。它包括对基于各种层面的不同音乐的研究，重点是各类城市亚文化的社会与大众音乐，以及所谓原始少数民族群体的音乐创作。

1977年，洛马克斯发明了一套音乐乐谱体系。他打算把它用于所有音乐文化。人们称之为曲调衡量标准，将各种音乐表演的特征与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这方面的例子有：经济、政治组织的复杂性如何与人们创作的音乐风格相关联。洛马克斯还注意到；妇女用尖利的声音唱歌的程度，依赖于他们在自己社区中性别从属的严重性。批评者指出：虽然洛马克斯的理论是富于启发性的，但它们只是偶然的巧合，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因为，尽管有足够的案例支持他的曲调衡量标准理论，但同样有许多反对它们的证据。此外，这种理论，并未考虑到音乐家与表演家们

的观点。

洛马克斯也警告过一种“文化灰视”：比较多的文化与音乐体系，都是在广泛的旅行传播与交流网络中诞生的。他尤其担忧：由于西方音乐的影响，它们会消失。但是，详细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已经驳斥了这些预言。音乐的发展表明存在无数的变化及同其他音乐体系相熔合的趋势。有时，音乐从业者会在他们自己的音乐风格样式中挪用西方音乐。另一些时候，正是技术革新致使不同的音乐形式现代化，同时又保留了明显的音乐要素。偶尔，音乐的不同风格，也许与其他音乐形式混合。这些音乐形式，例如印度的电影音乐或雷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英国经历的变化，带有旁遮普传统乡村音乐表演即彭戈拉的成分，正好可以说明上述三个一般的特征。

民族音乐学，现在作为研究任何音乐的一种方法而出现，其条件为：这种研究不仅根据音乐本身，而且同它的文化背景相关。音乐常常形成各种身份的本质部分，这些身份是个体为他们自己建构的，并可以超越社会的分工。此外，音乐的形式与风格，常常和特定社会群体的传统是同一的。这正是 20 世纪晚期扩展民族音乐学范围的主要动力。它们包括研究西方社会与文化背景中的音乐样式——的确，还内含传统的、历史的音乐学之外的一切音乐。传统的、历史的音乐学，就是对西欧艺术传统中高雅音乐的研究。

参见：文化；舞蹈；种族特性；性别；混合派教义；传统；西化。

民族精神病学（Ethnopsychiatry）

民族精神病学指不同文化中关于精神状态和精神病态的本土

观念。这个术语含义含混，它体现了西方关于心—身分离的观念，以及应该用特定的科学方法治疗精神病的观念。在澳洲阿纳姆地区的伏都教中，人们对巫师诅咒力量的确信能够导致一个人的死亡，在这里，心与身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什么是精神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定义，社会决定了什么行为是正常的，什么是反常的，并为之贴上适当或不受社会欢迎的标志，社会同样还决定了精神紊乱的表现方式以及社会认识和应付它的方式。

在西方现代社会，决定什么是健康、精神病和犯罪的是医生、精神病学家和法理学家。西方社会在创立医疗“学科”的同时也制定了医疗的“纪律”（译者按：英语的纪律和学科是一个词，即 discipline），按照福科《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的观点，要区分开精神病学学科与社会控制机制并不容易。由于**种族中心主义**偏见，人类学家所关心的是，像萨满这样的巫医或术士，尽管经常在神秘地经历灵魂出窍后对病人施治，但按西方精神病学的标准，是否会被视为精神病学家。萨满的技能并不是为了通过对个体反常行为的管制缔造社会秩序，而是被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术语加以描述。（参见**变异的意识状态**。）

通过对形形色色解释和处理凶咎的体系进行观察，就能揭露潜在于本土方法下面的观念系统，凶咎观念不仅涉及应对它的治疗方法，而且也涉及宗教和仪式因素，自然，这些系统并不总是关于疗法的，而可能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就像**魔法**的情形，例如，坦桑尼亚赫赫人的萨满用魔术、草药、物理或社会等一系列手段治疗他认为精神错乱的病人，他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对病人的情况进行确认的，萨满用**占卜**判断其病因，究竟是由于做了错事、乱伦，还是由于中了魔法、得罪了精灵，抑或是由于自然的原因。

用这种从依据当地的文化情境了解精神错乱的方法对精神病进行早期检验远比用西方的精神病学手段有效。

参见：情绪；民族医学；身—心问题。

动物行为学（Ethology）

动物行为学（源自于希腊语 ethos，意思为“特征、特性”+学）是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动物行为学是一门现代科学，但在 20 世纪以前的很长时间里，是由博物学家来研究这门科学，然而，他们的研究却常带有人类中心说的偏见。19 世纪“行为学”一词被米尔用来描述“性格的科学”，海因罗思（1871—1945 年）首次用动物行为学来描述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对行为的研究，既可在对环境刺激能够控制的实验室里实施，也可在野外自然环境中进行。20 世纪中叶两位动物学家洛伦茨和廷伯根首次对动物行为进行了对照研究。从那以后，这一研究领域已取得迅猛发展。动物行为学，大都局限于研究动物的本能反应，其部分原因是因为后天性习得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另外，动物的本能行为在**自然选择**中有着重要意义，因而动物行为学家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动物行为学研究可用于解决病虫害防治问题，不过目前的许多行为学研究却是由于阐明人类后天和本能的行为极其复杂所引起，为此人们对哺乳类动物，尤其是高级灵长类动物社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参见：攻击行为，利他主义，本能，拟态。

欧氏几何（Euclidean geometry）

在**数学**中，欧氏几何是用来描述整个经典几何的术语。经典

几何是指18～19世纪以前，人们认识到的关于点、线之间关系的一切几何知识。它称为欧氏几何，是因为自从欧几里德（公元前3世纪）把他那个时代所知晓的、此领域内的所有东西编入《原本》以来，人们只获得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进展。直到19世纪，《原本》都是严密数学的标准。在此书中，欧几里德从少数规则（公理）和定义（参见：**公理化**）中推导出了其时代所知的所有结果（例如，**毕达哥拉斯定理**）。

除了平行公理，大多数欧几里德公理被人们没有争辩地接受了。平行线是指一条过给定点而不与给定直线相交的直线；欧几里德公理说明：对于任一直线和不在其上的任一点，恰好只有一条过此点且平行于该直线的直线。这条公理未被接受的原因是：现实世界的某些情况下它似乎不正确，例如，一对铁轨看起来相交于地平线。甚至欧几里德自己都不太能确信该公理的真实性，因为在平行公理真正用到之前，他已从其他公理推导出了所有他可能得到的结果。

《原本》产生之后的两千年中，数学家们试图证明平行公理实际上可以由欧几里德提出的其余公理推导出来，但没有成功：它证明了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16世纪起，一些数学家尝试通过假定相反的结果（不存在平行线或至少有两条）来推导出一个矛盾，从而证明此假定不合理。在假定没有平行线的情况下，矛盾出现了，但在另外的情况下，数学家们并没有找到什么矛盾。对此进行研究的数学家中，任何人都没有更进一步宣告**非欧几何**的发现，他们怕遭到其他数学家嘲笑。最后，两位不出名的数学学，鲍耶（1802—1860年）和罗巴切夫斯基（1792—1856年）发表了他们的结论：至少有两条平行线存在的假定与恰好一条的假定同等正确。由于设计出了确切地具有鲍耶——罗巴切夫斯基几何性质的模型，数学家们逐渐开始接受了这项成果。随着20

世纪的开始，特别是在爱因斯坦运用非欧几何系统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之后，欧氏几何作为支配宇宙的学说这一理论地位就被取代了。

希腊几何也曾提出三个问题，它们没有一个能够解决。《几何原本》中每一作图都可以用直尺和圆规实现；于是对于角度或距离的度量工具的限制就没去考虑。第一个问题称为以方化圆；它要求（只用圆规和直尺）作一个与给定圆等面积的正方形。第二问题是给定一任意角，（只用圆规和直尺）构建出一角，其大小恰好是给定角的三分之一。第三个问题是给定一立方体，（只用圆规和直尺）构建一个正好体积加倍的新立方体。通过运用**伽罗瓦理论**这一工具，现已获悉在其规定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可能解决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未能阻止数学协会每年收到数百种不正确作图法的文章。

优生学（Eugenics）

优生学（希腊语意思为“良种繁殖的科学”）是改良后代的科学，常用于对人类的研究。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书中提出了**自然选择**的概念。随后，认为科学方法能使人种改良的思想受到了普遍认同。1883年高尔顿首次提出了“优生学”一词，他把优生学引入到人类遗传学和智力研究中，并在此基础上发动了一场旨在改良人种的轰轰烈烈运动。优生学通常可分为积极优生学和消极优生学，积极优生学采取鼓励具有特别“优良”遗传素质的个体生育后代，以此研究繁育优秀人种的可能；而消极优生学则是防止被认为携带有“劣等”基因的个体生育。一些在其他方面极为开明的人士也常常赞同采取某些极端措施（如强制性绝育术），制止“劣等”基因的个体生育。这些人

士坚信他们的观点也得到了遗传学客观现实的支持。

事实上，优生学支持者的观点难得是客观和科学的。20世纪初优生学在英国极为盛行，并迅速传播到美国和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许多州允许对精神病院的病人强迫施行绝育手术。在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使得强制性消极优生学规划直接用于对付某些少数民族、残疾人和其他“非优秀”人群。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在“遗传净化”的名义下被杀害。相反，具有“北欧日耳曼民族”血统者的生育受到鼓励，对他们的后代也给予优待。由于这些事件的缘故，从此人们避免使用“优生学”这一字眼。然而，尽管这样，为了某些政治原因，优生学思想仍常常受到人们的拥护。另外，对人群中有害基因的基因频率的计算结果显示，携带有一个或多个有害基因的个体在人群中的比例非常高。虽然能够识别这类有害基因，但是优生学规划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不使用强迫手段规划就不可能得以实施。

从医学角度来看，假如给予了客观全面的医学建议，自愿优生是有益处的，具有某种严重遗传病家族史的人可以决定不生育孩子，将来这些人能够通过**基因疗法**获得帮助。基因疗法是一种尚在发展中的医学技术，它对减轻病人的痛苦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但是也存在着优生学的一些支持者滥用这一技术的可能。

参见：**返祖现象**。

绮丽体（Euphuism）

绮丽体是一种过分夸饰绮靡的英语文体。英国作家莱里在他的小说《绮丽》中首创了这种文体（1578年），大量使用过分华丽的古典引喻，尤其是明喻、骄侈的隐喻、头韵与母韵等修辞手

法。莱里的著作极受欢迎，他的风格也广泛地为人所模仿。确实，即使是莎士比亚也未能免受这种风格的影响，在《亨利四世》中佛卢伦与俾索尔的讲演中，在《十二夜》的大托普斯的轻浮华丽的表现中，就充分体现了绮丽文体的特征。在后代英国文学中，绮丽体的成功运用有：17 世纪，厄克特对拉伯富著作的过分华丽的翻译；19 世纪史文明及其追随者（如弗勒克尔）的诗歌的浮华风格。这种文体还决定了复辟时期喜剧的时尚言语，后来谢里顿和乔伊斯又对它进行尽情的嘲弄（如前者的《竞争》中玛拉普罗普对这种语言的抨击和后者的《尤里西斯》中对浪漫文学的戏仿）。

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是欧洲 12 个民主国家缔结的经济联盟，他们通过减少和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障碍，对外采取一致的贸易政策和在联盟内提供劳动力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来整合他们的经济活动。“欧共体”内设部长会议、委员会、欧洲议会与公正法庭。

“欧共体”建于 1957 年 3 月 25 日，欧洲六国（法国，前西德，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意大利）签订了《罗马公约》。它的前身是上述六国以 1951 年《巴黎条约》为基础建立的欧洲煤炭和铜铁共同体，它仍然存在作为欧共体的下属组织。1973 年，英国、爱尔兰与丹麦加入、1981 年希腊加入、1986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共体。

欧共体正在迈向更高的经济整合目标，现在达成的共识是消融单一的贸易障碍。外在于这一组织的国家贸易活动的前景表明，进入欧共同体市场可能越来越困难，因而也正在积极主动地发展分支或联合生产机构，同时也探索开发欧共体市场的道路。

除了经济整合之外，欧共体还有政治同盟的最后目标。

欧洲货币体制（EMS）其成员国一致主张其外汇率与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并不是所有成员国都加入欧币制，甚至还有些成员国退出货币统一，因而，欧共体成员还在讨论如何建立单一的欧洲货币和欧洲中央银行。

20世纪80年代，经济衰退的压力和12国常常因为不同的利益而出现的决策困难，都表明经济领域中的进程基本停滞不前。

安乐死（Euthanasia）

安乐死（希腊语意思为“安祥地去世”）是出于怜悯而结束绝症病人生命的一种行为。西方社会的法律以及信奉犹太基督教的信徒中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安乐死。另外，安乐死也遭到医生们的抵制，因其有悖于他们所宣誓遵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医生道德守则。

人们可以明确表达不必再维持他们生命的愿望，然而，帮助实施这一请求行为的任何人都将面临被起诉的危险。对想要自杀的人提供帮助也是非法的。但是，在其他一些社会中对安乐死有着较灵活的态度，如只让病人置身于自然环境中自然死亡。

近年来人们发现在一些工业化“先进”国家里，对维持绝症病人生命所支出的巨额费用已危及到公共卫生保健事业的经费开支。这些情况，也许可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有关道德和法律的一些问题。正如以前贩卖奴隶的情况，当人们发现其他形式的贸易更能赚钱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道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福音派教义（Evangelicalism）

福音派教义，起源于希腊语“讲述好消息”。但许多世纪以来，“福音派”和“福音派教义”这些词，早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反映了无数传统的融合趋向。伊拉斯谟用它们来描述他所见的，即**路德主义**的狭隘与狂热。路德用福音派来描绘所有那些接受“惟有因信称义”教义的人。他将“惟有因信称义”当作福音的核心。到1700年，这些述语已成为“新教的”或“路德宗的”同义词。在英国，人们把1750年左右循道宗的宗教觉醒描绘为福音奋兴；稍后，圣公会与各个自由教会内的奋兴布道家，也宣称代表这个词的所指内容。

各种福音派，共同都支持威尔伯福斯的反对奴隶贸易运动，组建现代传道团，并在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圣经协会的工作中相互合作。1846年，为协调各种活动，欧洲与北美的教会，在伦敦组成福音派联盟。它们的**思想体系**，建立在新教、早期的虔敬主义以及福音奋兴的基础上。然而，到1910年代晚期，新教传统处于剧变中。一方面是自由派传统另一方面是奋兴布道家，它们在“保守派”“福音派”和**基要主义者**的名义下实现了各个团体的教派联合。1957年，当格雷厄姆因他的纽约运动接受自由派教会领袖们的帮助时，福音派和基要主义者发生了最后的分裂。占主导地位的基要主义者，谴责格雷厄姆与他的福音派跟随者为“内部的叛徒”。今天，世界各地的福音派，组成了世界福音派联谊会及洛桑世界福音化委员会。

事件（Event）

事件（源于拉丁文，意为“发生的事”）是一种事态变化或发生的过程。在**哲学**上意向行为都是事件——我开车绕过公路上的坑洼这种行为即事件，天体的爆炸也是事件，但它是非意向行为。事件一进入因果关系，它们就互为原因与结果。打开开关使灯亮，第一个事件引发第二个事件。

参见：行为，因果关系。

进化（Evolution）

进化（源自于拉丁文 evolutio，意思为“展开、呈现”）是对自生命起源以来地球上的物种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化其原理的理论解释。进化总的趋势是物种呈现多样性，物种的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增加。这些现象均可用进化论进行解释。公元前 4 世纪亚里士多德注意到：物种变异似乎不像是自发产生的，他认为这提示：在此之前，物种的形态已发生了渐变。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对生命起源的解释以创造论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人们普遍认为：上帝创造的物种是永恒不变的，而且也不可能改变或杂交。尽管化石以难以否认的事实依据，使人们接受了物种灭绝是会发生的观点，但在 18 世纪以前，人们并没有对进化思想进行认真的思考。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考证了物种起源的问题，他认为在创世纪初几乎没有什么物种，但此后物种成倍地增加。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指出：马与驴有亲缘关系，因为它们能进行杂交，他还注意到人类与类人猿间的相似性。18 世纪末，老达尔文

（达尔文的祖父）在其诗作《动物生物学》（1796 年）中总结了进化发生的思想，然而他对这些思想并没有提出严格的理论。

19 世纪初，人们开始思索物种演变也许是环境直接影响的结果的思想。1809 年拉马克提出：用进化树表示来源于共同祖先的生物，并阐明生物天生具有使功能变得更为复杂的内在倾向。如果这种内在动力使生物更适应于它的生存方式，那么，生物将会从中获益。拉马克与那时的大多数博物学家们认为，个体在其一生中获得的性状可遗传给子代。尽管拉马克的进化理论是错误的（并已为他同时代的许多科学家所认识），但他是第一位对进化过程提出系统理论的学者。

现代进化论思想是由达尔文（1809—1882 年）创立的，他仔细观察了生长在邻近地区的相似物种间的关系，并试图证明这些物种的差异与它们各自的生存方式有关。另外，达尔文也运用地质学知识对化石残骸进行研究，并由此得出物种突变的结论。与此同时，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也致力于类似的研究。1858 年，两人均向林奈协会宣读了各自的论文。一年之后，达尔文发表了著作《物种起源》引出一场争论风波。然而，直到 19 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才被人们所接受。这些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其理论也变得更为清晰，同时进化论思想也受到生物学各研究领域中观察结果的证实。

有关进化的证据均来自于已灭绝物种的化石标本，以及对现存物种的对比研究。若岩层按年代顺序依次排列，则化石标本显示：低级生物总是出现在高级生物之前。例如：最初，水生动物出现在爬行动物之前，而爬行动物又先于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当达尔文和华莱士正在构建各自的理论时，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研究却已经提出不同物种间相互关系的重要证据。同样，物种的**生物地理学**分布也是支持进化观点的重要依据。由于现代**生物化学**

和分子生物学技术，能够比较生物的代谢途径和基因间的相似性，因而对进化关系可进行定量分析。

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思想，是基于对生物的观察研究：生物有繁殖能力，然而其群体数目总是趋于恒定，因此每代中都有一定比例的个体不能生育。另外，所有个体彼此间都不完全相同。因此，达尔文认为：在获取资源方面最具竞争力的个体通过将有益的性状传递给子代，使子代更有可能生存和繁殖。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也是通常所说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内容。自然选择过程是完全自发产生的，它受环境的驱动和调节。自然选择也导致物种的多样化，物种数目增多，因它倾向于在生物群中产生并有助于特定化的适应能力。许多现今业已存在的哺乳动物是由少数几种远古时期的哺乳动物，经过对不同栖息地（如树林、地洞、水等）的生存适应而逐渐演变形成的。进化论承认生物有变异现象出现，并用**泛生论**解释变异现象。实际上，泛生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它相继被**种质说**和**孟德尔**遗传学所替代。起初由于几率的影响，基因随机突变的思想似乎与自然选择理论相互矛盾。但是，实验研究和数理分析却显示：孟德尔遗传学允许产生的变异可能性，恰恰是达尔文理论所需要的。它仅仅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补充。

现代生物学以进化论为基础，正是共同面临的威胁把许多不同领域维系在一起，尽管进化论仍不断受到新证据的重新检验，对自然选择、突变、生殖重组的相对重要性也存有争议。进化导致新物种的形成几率实在太少，以至于人们在实际中无法观察到，但是现存物种的**遗传漂变**现象是可以见到的。例如：著名的例子有**蝴蝶**的颜色可以逐渐变深，因此它们在被煤灰污染的工业区仍能伪装起来。

参见：适应；适应辐射；同功；创造论；达尔文学说；层创

进化论；绝种；群体选择；杂交；同源现象；亲属选择；拉马克学说；形态学；小生境；古生物学；性选择；物种形成；分类学；均变论。

进化论（Evolutionism）

进化论（源于拉丁文 evolvere，意为“展开”）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兴盛一时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运动，它是一种关于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变得复杂多样化的变化的理论，它与发展和技术的观念密不可分，这些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流行。

进化论在19世纪的流行得益于赖尔的地质学理论、斯宾塞的社会学观念，尤其是得益于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人们相信有机体和人类都经过了相同的发展阶段，人类被比作生物有机体，并用“适者生存”的观点解释发展的过程。当时，体质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19世纪主张进化论的著名人类学家包括摩尔根和泰勒，他们精心构筑了一个从狩猎—蒙昧时代到游牧—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的进化框架。马克思、恩格斯深受摩尔根的影响，他们将进化论用于其社会和经济关系发展的阶段理论，这些阶段主要包括原始社会、古代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弗雷泽主要关心**巫术**、**宗教**和**社会**的进化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于他的名著《金枝》（1926—1936年）中。

通过对不同社会形式的历史比较，可以发现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学中的古典进化论思想就是源于对这一点的认识。古典进化论认为社会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和进步的，只存在惟一的一条进化路线，每一社会都将经历一系列线性的发展阶段。社会进化论将社会和生物进行对比，两者都处在生

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此同时，它们也变得日益复杂和分化（在社会日益复杂的同时，原本浑然一体的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也越来越变得泾渭分明）。社会发展使社会越来越复杂，但同时也使社会的各个方面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0世纪60年代，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尤其是帕森斯）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功能主义一味强调社会的整和与和谐，因此无法对社会的变化做出解释。新进化论就源于功能主义社会学对这种批评的反应，社会学家再此回到了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但新进化论在两个方面与其前身分道扬镳了，首先，他们主张发展的途径是多样的而不是惟一的；其次，他们更加重视不同进化阶段之间的变化机制，他们认为古典进化论忽视了这一点。新进化论认为，社会变化过程与一个社会的体制密切相关——其所谓社会体制包括社会生活的构成，以及政治、经济、宗教、家庭、教育等制度，社会变化的机制可以从一个社会维护其社会结构的需要出发得以解释。

新进化论对社会变化的解释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他们认为所有的社会变化都是由下面三个过程所导致的，它们是区分、再整合和适应：区分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逐渐相互分化，社会生活变得日益复杂；再整合指为避免由于区分和变化而导致社会分崩离析而采取的调整机制；适应指社会适应其环境的需要决定了其区分和再整合的取向。

新进化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认为人类文明的效率及其对环境的控制能力已经大大提高，因此，晚期出现的社会类型较之早期的社会类型效率更高也更为强大。批评者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最近那些关注人类对地球生态破坏的环境主义者也对所谓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提出了严肃的置疑。

参见：趋同理论；文化；依附理论；传播论；功能主义；历

史社会学，整体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原始主义；匮乏；社会生物学；结构主义；结构；系统；系统论；现代性理论。

交换（Exchange）

交换（源于拉丁文 cambiare，意为“交换物品”）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被定义为一种与“礼尚往来”有关的社会互动形式。交换理论认为个体在其相互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总是想得到最大的回报。交换系统可以包括语言、交流、商品、服务，甚至包括婚姻关系中的新娘新郎，它们是建立和巩固相互关系的基础。交换理论可以区分为两个主要取向：个体主义的交换体系及理论和集体主义的交换体系及理论。

个体主义学派的要义体现于霍曼斯和布劳的著作中，他们以两人交换为基本模式，并将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相对比。他们认为在社会互动中像在市场交换中一样，人们也期待得到与其投入相称的回报，交换的双方都试图得到最大的回报（例如，布劳指出，一个人只会娶或嫁能提供相应的社会资源的人）。批评者认为这一理论过于强调人性中的逐利因素，并指出，这一理论不能超越两人模式，用来解释诸如社会控制乃至社会价值这样更一般性的社会问题，因此仅仅是一种关于社会生活的局部性理论。人们还指责交换理论只关注生活中无关紧要的琐事。

交换理论的集体模式主要与法国人类学家尤其是毛斯和列维—施特劳斯有关。毛斯在 1925 年写的论**礼物**的论文中，从“互惠”的观念出发探讨了交换系统，研究了不同社会中送礼方式对个体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缔造、改变和维护作用。列维—施特劳斯以其**结构主义**理论发展了这一思想，将交换原则用于婚姻体系中妇女的流通，他描述了流行于婚姻中的两种交换形式：复杂

的（存在于西方社会的）和初级的（存在于非西方社会）。他的目的在于表明，所有社会中，潜在于其社会行为和思想下面的交换体系对所有交换物都基本是相同的，不管交换的是语言、商品还是女人，这一观点对其结构主义体系至关重要，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证明所有人类经验现象在深层是相似的。

列维—施特劳斯将女人看作交换物品而非人，被许多学者批评为大男子主义；结构主义模式试图解释所有人类行为的普遍主义也深受指责，结构主义尤其不适用于解释为了策略和政治利益的礼物交换。相互作用理论考虑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算计和追求最大利益的特点，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更为有用的方法论。“适应策略”理论融合了结构主义和相互作用理论的观点，这一理论研究了群体为了应付其内在或外在的制约而采取的行动计划，同时指出，群体所有成员并不总是对这些计划有清醒的认识。

其他一些更具经济学色彩的人类学研究则关注市场交换与非货币交换体系之间的关系和对比，与之相关的是“交换圈”的概念。“交换圈”指某些交换物在社会和道德的约束下可以自由交换的方式，交换圈主要是非货币社会的特征。例如，在欧洲的商品和货币进来之前，尼日利亚南部的蒂夫人社会主要包括三个交换圈：一个用来交换当地的出产，例如食品；一个用来交换与社会名望有关的东西，如奴隶、牲畜、马匹和黄铜棒；另外一个威望最高，它关乎妇女和孩子，这明显地体现于联姻关系中。

有证据表明，在使用货币这种所谓万能交换物的现代社会中，也存在“交换圈”。例如，在家庭或宗教领域中从事的服务就不能用金钱衡量，否则将导致道德价值的颠覆。因此，“交换圈”内部变化的衔接就是社会交换和道德系统研究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参见：社区；文化；经济人类学；个人主义；婚姻；规范；理性选择理论；互惠；交互作用理论；社会整合；社会；结构—动因之争；价值。

汇率（Exchange rate）

汇率是一种货币兑换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在外贸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货币具有当下交易的比率，也有未来某一段时间的交易期货率。

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的价值之比表示为美元/每英镑，或法朗/每美元，或日元/每法朗。当全世界把兑换标准固定于**基金标准**，那么每种货币就法定地比照于黄金，如美国宣布，每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法国宣称每一盎司黄金等于175法朗。因而，每一种货币与他种货币的交换都有法定的比率（1美元等于5法朗）。如果贸易差额造成了美元相对于法国人相持有的剩余，那么为了维持过剩的美元，美国人必须从固定的基金中提取法朗来兑换美元，最后黄金就从美国流向法国。汇率也可能稍微偏离法定比率，这取决于黄金的运载成本。

当全世界处于被动的汇率体制下，每种汇率都由世界货币市场上的买卖活动决定，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甚至直至市场开放开始，每一刻都各不相同。

存在（Existence）

人存在而神仙不存在。存在与不存在的区别何在？有些哲学家主张，存在是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任何存在物都具有的。所以，有人认为上帝存在，其根据是存在是一种属性，一种有总比

没有更好的属性；上帝，一种完美的存在，几乎就不缺少一种有总比没有好的属性。如果存在不是一种属性，上述证明就站不住脚了。

认为存在不是一种属性的理由如下：一种属性是把实在彼此区分开来的东西，使我们辨识同与不同，使拥有该属性的事物与那些不具有该属性的事物区别开来。但是，如果存在是一种为一切存在具有的属性，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具有该属性的事物与不具有该属性的事物区分开来，对立起来。

上述思考使哲学家们不承认存在是一种属性。我们常常把属性归于实体。比如说，乔治是激进的，这就是把一种属性、即“激进的”这种属性归于乔治这个实体。可是，说乔治存在却不是把一种属性归之于他。相反，是说存在着一个事物，这事物是乔治。

参见：形而上学。

存在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参见：现象学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是一种不严格的哲学形式，它探索的是人的本性与人类“困境”（如存在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存在中的一切仅仅是存在；人类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因而有理解和控制存在的潜能。我们是自我塑造的生物，我们能够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选择，选择存在方式。在选择的瞬间，在向存在的跃进中，我们落入两个固定之点：我们由此而来的虚无与我们死后皈依的虚无。我们的光荣是这种自觉的选择，我们的痛苦就是必需进行选择。这种由

克尔凯郭尔于19世纪上半叶提出的命题，在一个世纪后由胡塞尔加以发展，在20世纪40～50年代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尤其体现在萨特的思想中。

存在主义在当今的主要意义，与其说是作为一种哲学方案，倒不如说是思想创造活动的母体。一些原创性的思想潮流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和1968年学生运动之间统治着欧洲艺术和不同阶层在表达上的兴趣。

在**文学**中，萨特是主要的存在主义作家。他的自传体小说《恶心》、《自由之路》三部曲，以及戏剧《苍蝇》和《肮脏的手》中，他探索了“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这一理念，审视了消极英雄空有渴望又无法谋划自觉行动的困境。其他一些法国作家如卡谬就令人注目地采取了这种姿态。对同一性的探索决定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洲**戏剧**艺术和小说的基本风格；存在主义思想也决定（但并非统治）着风格各异的作品，如格拉斯的《迷途》，厄普代克的《兔子》三部曲，以及贝克特和杜伦马特的戏剧。

存在主义主题也出现在20世纪40～50年代的电影中，尤其是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者和日本导演市川和黑泽明的电影中。尤其是在长崎和广岛大爆炸之后，日本艺术家把存在主义思想发展到极度野蛮和虚无主义的边缘。很少能像大岛的电影《感觉王国》或三岛的小说《假面人的忏悔》那样对存在主义困境进行如此深刻的揭示。特别是美国的喜剧，在显示存在主义的忧患上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特别是汉柯克（英国）和艾伦（美国），萨特的思想都大量地表现为十分丰满但是充满痛苦的喜剧人物。

宇宙生物学（Exobiology）

宇宙生物学（希腊语的意思为“关于外空生命的研究），这

个由美国遗传学家莱德伯发明的术语，是关于地球外的生命的研究或探索。生物学家假定：伴随生命在地球上进化，它也可能以很不相同的方式将在其他大量的行星上发生过演化。迄今为止，并没有公认的证明地球外存在生命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关于这个领域和它的各种理论，有着许多的批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与科幻小说的明显联系。

宇宙生物学家的主要目标，是不管外空生命与地球生命有着多么强烈的区别，都要设计出一种手段探明它们。其中内含的巨大差距，意味着这样的考察，曾经主要限于审视其他行星表明不寻常的热力学模式。

理论的预设提出：存在着大量有人居住的行星，这些行星上的人大多数达到文明的程度，远比人类的先进。人们曾努力企图和他们交流，其方式是通过把明确的图像信息放在卫星上，并发送有代码的无线电信息。无线电天文望远镜，可以观察到从超过1000 光年远的地方传来的信号，特别是苏联科学家，曾利用过这些信号收听源于远程星体的信息。外空智能研究计划，代表着一种搜索无线电波模型的集中努力。也许，这些模型，原本起源于一个有感觉能力的泉源。这样的信号，原来未必是作为有意交流的企图从其他行星发出的，但是，可以把它们当作地球外生命存在的证明。人类从地球上无意发射无线电波，已大约有 100 年的历史，或许，它们最终将为一个在遥远的行星上实施着的类似我们的外空智能研究计划所接受。

借助化学手段探明生命，也是一门高度成熟的科学，只是受到可以获取采样的空间探索科技的限制。虽然各种生物有机分子的存在，也许可以被当作生命存在的环境证明，可实验一度表明：某些物理条件，会促使生物有机分子的非生物的成形。

参见：生物遗传；无生源说；有生源说。

实验（Experimentation）

实验（源于拉丁文 experiri，意为“检验”）是与本能活动相对立的精神活动的第一级标志之一。比方说，当一只迷路的老鼠学习赢得好处或回避惩罚所必要的行动步骤时，它就运用了试错法，一步步消除错误，直至建立最后正确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是一种有意向的刻画形式，不是像海蜥或蚂蚁这种“低级生物”所能完成的，它们只是凭本能而行动，而不依存于学习或记忆。在更高阶段，可以利用电脑来建立具有严格步骤的实验，这就构成了**科学方法**的组成部分：主题，实验检验和结论。在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最高”水平上，实验不仅是检验过程，而且还是创造过程，舍弃枝节主题，显示各种可能性，导出原来思想中不包括的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创新。不是老鼠，不是电脑，差不多只有每一单个的人能实施这种行为。

参见：人工智能，思想。

说明（Explanation）

说明一种现象就是对它进行解释，使它可以理解。因而，说明一个事件就是告诉我们它为什么发生；说明一条**自然律**就是告诉我们它为什么有效。

按照**哲学**中包容性规律说明模式，说明一种现象就是把这种现象归于一条普遍规律之下，也许是提出某种初始条件。我们解释一条自然律就是把它归于更为普遍的规律之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由牛顿的更为普遍的机械论定律予以解释说明。而且，人们还参照普遍规律和某种初始条件说明某一事件之发生。杯子

下落由万有引力定律来说明，其初始条件是我在一定高度上让它下落。

包容规律说明模式面对各种各样的反对。其中一种反对意见认为，仅仅把一个现象归于一条与它实际发生作用的初始条件相联系的普遍规律，这远远是不充分的。比如说，服避孕药的人不会怀孕，这是一条自然规律，但是一个人服避孕药几乎不能正确地说明不怀孕这一现象。

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

在西方**艺术**中，表现主义是横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一种风格。一直到19世纪，艺术主要关注于对现实的描绘，并且艺术家把情感的运用——他们自己的或他们所塑造的人物的——只是当作表现的构成部分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担保人。与此相对照，表现主义的艺术，直接与情感的传达打交道。它是主观的和混乱的，而不是客观的和精确的。涌向情感之公开表现的激流，开始于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运动，但是，真正的表现主义于一个世纪后才得到解放。当时，弗洛伊德的工作使情绪、精神病和个人的强迫症，成为纯学术和艺术共同接受的主题。

在**音乐**领域，尽管更早期的作品如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或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斯奥德》，已清楚地把情感放在首要地位，但术语“表现主义”一般用于指像斯克里亚宾的《狂喜之诗》、施特劳斯的《莎乐美》或勋伯格的《升华之夜》和《期待》（表现主义风格的高峰）之类的作品。

在**文学**领域，尽管主要的表现主义者是世纪之交的作家们，如马拉美、修斯曼斯和梅特林克，但表现主义者的理想和技巧也

影响了后来的作家，如纪德、普鲁斯特、卡夫卡，以及以其更为直率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海明威。在**戏剧**领域，表现主义是这些人的一种风格，如斯春伯格、魏德金德和凯塞。表现主义也存在于电影领域，如导演莫劳或兰格的作品，以及更现代的范例高西克的作品，或恐怖的神秘电影，如希区柯克的《精神变态者》和伯格曼的《第七个印章》，他们都运用了表现主义的技巧。

最持久的表现主义运动，展现于美术领域。在这里，创造者们寻求的是，心灵状态、宗教或社会信条的图像表现方式。他们以粗犷的技巧和简单的线条与色块，打破了学院艺术的常规。在他们的领地，他们赞赏一种受质朴的**民间艺术**影响的参照框架。这一风格贯彻最彻底的两个典型，一个是**桥社**（德累斯顿，1905年），它的成员以强烈的和富于侵略性的构图把表现主义发展到极端；另一个是青骑士小组（从1911年以后），它的成员，创造出一种更具结构性的风格。更一般地说，表现主义绘画的领地从蒙克和柯柯什卡的粗糙油画（他们展示的是可辨认的处于噩梦般心理惊恐状态的人群），或康定斯基的绘画作品（他的目标是画出抽象的情感，而其结果似乎常常是实验性的和混乱的而非准确的），一直延伸到后来较晚时期的**抽象表现主义**的画家，像德库宁、杜布菲或莫热威尔。许多其他的艺术家们（例如，培根、夏加尔和鲁奥），尽管不是完全投入的表现主义者，却运用作为这一风格之标志的表现手段：情感的炽热和炫耀的色彩。

在美术界，新表现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使用的一个标签，主要用于描述以叙事为基础的表现主义画家的工作，他们主要活动于德国，是针对**概念艺术**的乏味和**极少主义**的非个性化的一种反应。典型的例子，是基弗尔的创作，他在像《献给无名的画家》（关于德国纳粹时期的悲剧的阐释）这样的作品中，描绘了其国家的过去，以及巴赛利兹那些充满完全倒置人物的作品，以

这种设计，作为对人类状况的阐释。其他重要的新表现主义画家，包括克莱曼特、伊曼道夫、潘科和史奈贝尔。

在**建筑**领域，表现主义指从一战末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期间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建筑师们的作品。表现主义的建筑物，以怪异的尖角形或有机体形和大容量的内部空间为特征，达到了创造性地使用加固混凝土的可能的极至。历史学家佩夫斯纳把这种风格看作是现代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种偏离，是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危机中产生的**新艺术**之影响的产物。战前最密切地认同于表现主义的，可能是贝伦斯（1868—1940年）的作品，尤其是他在柏林为德国通用电器公司建造的工厂（1908—1913年)；而战后**包豪斯**在魏玛时期的作品，可以肯定地使人感受到吸取了表现主义的主要特点。这在视觉上，体现为僵硬的表现性的简单性，而在理论上则是表达一种建筑师的道德义务的意义，并把建筑作为提升社会准则的工具。战后，表现主义建筑的最著名的范例有，1923年建于汉堡的智利剧院，侯伊格（1877—1949年）的作品和波伊尔兹格（1869—1936年）设计的1919年建于柏林的大剧院的内景。或许，在所有使用表现主义语言的建筑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门德尔松（1887—1953年）的一个早期作品，《爱因斯坦天文台》，一座观测塔，1920年建于波茨坦，一个蕴含流线型主题的有机体形式，这一主题在后来的西方工业设计中变得无比重要。

表现舞蹈（Expressive dance)，参见：抽象舞蹈

外延性（Extensionality)，参见：内涵性与外延性

绝种（Extinction）

绝种（拉丁文意思为“被消灭”）是指先前一个生物种群的所有成员被灭绝的现象。绝种现象已为早期古生物学家所知，他们发现了与地球上现存物种完全不同的化石。19世纪以前，大多数科学家和平信徒们相信生物不可能绝种，因为所有生物均由上帝负责管理。19世纪随着对恐龙化石的修复，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生物绝种这一客观事实。许多人认为绝种是由一些大灾变（如洪水）所致，并且相信这意味着地球上的物种数目在日益减少。当达尔文提出新的物种形成的科学理论后，用这一理论可以解释新物种的形成是如何使得其他物种失去竞争力，并逐渐趋于绝种的现象。

参见：进化，应变能力，自然选择，物种形成。

外向性（Extraversion），参见：内向性和外向性

精英理论（Élite theory）

历史政治研究中精英理论家坚持认为，一切复杂社会组织的形式都不可避免地要由少数集团即精英（其字面意为“精选者”“被选择者”）来统治。在规范意义上，精英主义指出，管理像国家这样的复杂社会组织需要技术，因此就必须把选择出来的集团提高到统治地位。帕雷托、莫斯卡、密齐斯等古典精英理论家证明，自古至今，政府与社会由一个“统治阶级”或权力精英来统治，这是一个经验事实。密齐斯的“寡头铁腕法则”就形容了这

么一个过程：只要处在领导地位，精英通过对获取信息的控制和决策活动的操纵而积累更多的权力。“寡头铁腕法则”与保守主义对人类活动中等级制度的必然性及其优长的信念十分吻合（参见**保守主义**）。

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精英理论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就不会有统治阶级的客观需要。精英理论家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成功之处，那就是他们也形成了一种政治精英。帕雷托的确认为，政治变革的尺度是一批既成的精英有能力应付来自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新精英的挑战。在帕雷托的理论框架中，信息控制、强制与协调、官僚权力的管理构成了政治变革周期的决定要素，他还研究一个政治周期中精英们心理物质的变化——“狮子”代替“狐狸”。

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下要规定精英权力始于何处终于何地，是颇为困难的。这种困难也是精英理论所受到的批判的焦点所在，尤其是那些来自多元主义传统的思想家所批判的焦点（参见**多元主义**）。现代精英理论家认为，虽然大多数自由民主制在表面上容忍非精英人士的竞争与影响，可是在实际上这种竞争是由少数集团由上而下地控制，常常由代议政府、大的商业集团以及有时被称之为“军事工业集团”的军人所操纵。精英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这种论证是不可证伪的。精英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最杰出的运用，是去分析精英的深远背景特征（如他们所受的教育与家族历史），分析他们的社会关系与职业网络。

参见：历史唯物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